

（日）正村公宏著

战后 日本经济政治 史



ZHANHOU
RIBEN JINGJI ZHENGZHI
SHI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日本经济研究室译

1985年10月第1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77656

本书出版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

[日] 正村公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日本经济研究室 译

王沛芳 陆小平 校



200152850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战败和占领	1
1. 日本投降	1
2.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23
3.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36
第二章 战后改革和民主主义	46
1. 旧秩序的解体	46
2. 修改宪法	54
3. 土地改革和劳动基本权	70
4. 解散财阀和禁止垄断的政策	80
第三章 通货膨胀和工人运动	95
1. 在废墟上挣扎	95
2. 通货膨胀	107
3. 战后的工人运动	121
4. 第一届吉田内阁	134
5. 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	143
第四章 在冷战中重建日本	153
1. 二一大罢工计划	153

2. 倾斜生产·····	164
3. 价格差补贴金和复金融资·····	176
4. 东西方对立和体制选择·····	186
第五章 道奇方针和吉田内阁·····	203
1. 道奇方针·····	203
2. 第二届吉田内阁·····	217
3. 通货膨胀的抑制·····	225
4. 人员裁减·····	231
5. 共产党和社会党·····	241
第六章 朝鲜战争,日本重整军备,和平条约·····	256
1. 朝鲜战争·····	256
2. 日本重整军备·····	272
3. 对日媾和问题·····	287
4. 全面媾和论·····	297
5. 旧金山体制·····	308
第七章 走向经济自立的路·····	317
1. 产业合理化政策·····	317
2. 扶植产业的制度体系·····	324
3. 能源、海运、造船·····	335
4. 钢铁、化学、机械工业·····	347
5. 经济自立的战略·····	359
第八章 产业合理化和工人运动·····	375
1. 总评系统的工人运动面临的课题·····	375
2. 劳斗罢工和电产、炭劳的劳资纠纷·····	385

3. 企业竞争中的劳资对立·····	398
4. 总评系统工人运动的转折·····	408
第九章 战后政治的重新组合·····	421
1. 保守政治的转机·····	421
2. 1955年体制·····	435
3. 鸠山内阁与日苏恢复邦交·····	453
4. 亚洲外交的选择·····	470
第十章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	485
1. 岸信介内阁·····	485
2. 勤务评定问题·····	501
3. 警职法与修改安保条约·····	511
4. “安保”与“三池”·····	521
5. 新安保条约的通过·····	535
第十一章 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547
1. 池田内阁·····	547
2.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557
3. 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	570
4. 贸易汇兑自由化·····	585
5. 国土计划与地区开发·····	598
第十二章 社会不平衡和环境破坏·····	610
1. 佐藤内阁·····	610
2. 慢性通货膨胀·····	619
3. 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	629
4. 环境破坏与公害对策·····	641

5. 保守的长期政权·····	657
第十三章 世界中的日本·····	677
1. 越南战争·····	677
2. 共产主义体制的动摇·····	688
3. 繁荣中的叛乱·····	699
4. 信息化社会·····	713
5. 经济大国——日本·····	723
第十四章 通货危机和石油危机·····	734
1. 归还冲绳·····	734
2. 通货危机与日元升值·····	749
3. 田中内阁与日中恢复邦交·····	765
4. 日本列岛改造计划·····	776
5. 石油危机·····	787
第十五章 转折的时代·····	801
1. 高速增长终结·····	801
2. 三木内阁与洛克希德事件·····	815
3. 经济复苏与政治混乱·····	827
4. 面向21世纪的探索·····	843
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年表·····	862

第一章 战败和占领

1. 日本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

过去而已成为事实的历史,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往往容易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理解其中也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历史是由多数主体选择的累积和相互作用所创造出来的。即使在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多数人的决断或不决断也会决定历史的具体面貌。

1931年(昭和六年)9月,在26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以获取辽东半岛和南满洲铁路(满铁)警备权为由而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陆军(关东军),在奉天(沈阳)郊外的柳条湖^①附近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的路轨,并伪造成中国方面的破坏活动,借此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行动。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策划的这一谋略是日本走向侵略中国新阶段的一步,同时也是日本走向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步。1932年3月,日本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并以这一事件为开端,于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从而开始走上国际孤立化的道路。

从20年代到30年代,由于连续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后恐慌”,1927年(昭和二年)的金融恐慌,1929年的世界

^① 即柳条沟。——译注

大危机和1930年的黄金输出解禁(恢复金本位制)失败(1931年再次禁止黄金输出)等事件,加剧了日本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贫困,阶级斗争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右翼、军部和革新官僚等激进民族主义者积极要求以通过扩大在大陆的统治范围的攻击性战略来解决经济困难和减轻人口过剩的压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中国大陆不断策划阴谋、制造事端,并以此为借口采取军事行动。继“满洲事变”之后发生的“上海事变”(1932年1月至3月)也是其中之一。这种方法对煽动日本国民的排外主义情绪起到了明显的效果。宣传工具几乎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当地日军参谋们的宣传,大肆报道其“战果”。在虽然还不完全,但已成为明显趋势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民主(大众传播和大众民主主义,1925年通过关于25岁以上男子的普通选举法)的时代,新闻报纸扮演了激进民族主义传播媒介的角色。

被称为“革新派”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打破欧美帝国主义对亚洲各民族的统治,建立“新秩序”的目标。的确,他们的意图是要打破由美英等国维持的旧统治秩序,但是他们所要建立的与其说是维护各民族的权利和尊严的新秩序,不如说仅仅是要确立以日本为盟主的另一种统治体制的新秩序。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面为摆脱欧美各国使其殖民地化的危机,保护本国的民族自主而推进近代化和工业化,一面又践踏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自立,从而自己选择了一步跨上新兴帝国主义的道路。

在亚洲,正进入一个日本立志打破以美英为中心的旧秩序而采取行动的时代;在欧洲,德国作为旧秩序的破坏者正在重新登上国际舞台。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在德国国民中准备了民族复仇主义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以集团性暴力、威胁和煽动为武器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日益得势。德国现有政治势力的无能和分裂帮助了希特勒获得政权。

无论社会民主党还是工会都未能在大萧条前提出一项足以阻止失业增加的政策；社会主义势力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相互抗争的势力；共产党为了对抗参加政权的社会民主党甚至不惜同纳粹联合起来斗争；纳粹利用了中产阶级对已确立斯大林专制体制的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1933年希特勒获得政权，建立了独裁体制，开始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英法两国对德采取绥靖政策，承认德国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

但是，纳粹德国的扩张政策最终必然引起它同英、法和苏联的大规模战争。1939年8月，德国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达成了分割波兰的协议。为对抗德国，英法两国履行援助波兰的协议，对德国宣战。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第21个年头，欧洲各国便再次卷入了战争。从1940年4月到5月，德国对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发动了闪电般袭击。6月，进攻法国并迫使其投降。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并逼近了莫斯科。

纳粹德国的成功对日本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军部为核心的激进派在德国闪电战的鼓舞下，不顾与美英对立加剧的危险进一步同德国加强了同盟关系（1940年9月日德意缔结了三国同盟）。并乘法国向德国投降之机，开始推行其进攻法属印支的南进政策。

民族主义的错误

激进派要求在内外两方面打破现状的呼声虽然很高，但其中却包含着许多错误的判断。在德国方面，希特勒尽管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但侵略波兰却导致了英法两国的参战。其次由于过低地估计苏联的力量，开辟东方战线，

以致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希特勒虽然将日本人称为“黄色猴”，表现出一种露骨的轻蔑，但为了牵制美、英、苏的力量仍加强与日本的同盟。然而，这种同盟由于日美开战却成了将超级大国美国引向欧洲战争的直接原因，并最终决定了德国的失败。

在日本方面，据说推行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近卫文麿内阁(第二届)外相松冈洋右的意图是通过建立一个日、德、意加上苏联的4个新兴国家的同盟来实现既牵制美英，避免同它们的战争，又改变旧秩序的目的。但事实是，历史并未按照松冈的意图去发展。三国同盟使美国的对日政策更趋强硬；德国不久便开始了对苏联的进攻；日军乘法国向德国投降之机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导致了美国的对日经济封锁。这一切就将依靠美国提供石油这种无论对于战争还是对于生活来说都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物资的日本逼入了对美开战的绝望的行动之中。

“革新派”的致命错误之一是在努力追求其目的时，采用暴力、恐怖和政变的手段，从而使许多政治家、军人和实业家成了右翼和激进派军人的牺牲品。五一五事件(1932年)和二二六事件(1936年)虽然作为政变计划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两次事件却夺去了强有力的政治家的生命，为以后形成事实上的军部独裁开辟了道路。而且从此要想提出改变日本的政策，就必须随时准备面临暗杀和政变的危险。

“革新派”的另一个致命的错误是过于低估了亚洲各民族的抵抗力量。日本的军部和右翼尤其过于低估了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的抵抗。的确，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蒋介石通过“北伐”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仍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实体。日本军部和右翼认为并夸口只有他们才能给中国人带来秩序。然而抗日和反日之强烈却大大超过了他们的预料，傀儡政府连要

用的人都无法集中起来。

日中战争和日美开战

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驻华北的日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因遭到不知来自何方的开枪射击而向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就该事件本身来说,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民众对日军侵略中国领土的愤怒心情,那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了。这一事件尽管达成就地停战的协议,并被作为局部冲突处理了,然而就在事件发生前一个月的6月4日,肩负“革新派”希望的年仅45岁刚就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及其内阁已决定从日本向中国增派3个师团的兵力。这一决定促使中国方面的态度进一步变得强硬起来。

在“满洲事变”中,政府虽然无法阻止关东军的冒进,并事后承认了军方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但在“支那事变”^①中,不论是政府还是军队都在没有明确的计划和战略决策的情况下陷入了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军将战前和战时的日本领导人提交军事法庭审判,追究他们“共同密谋侵略战争”的罪行。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反日抗日浪潮高涨和美英援助的情况下,进行了出乎日本预料的顽强抵抗。最后逃到重庆继续进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也在完成“长征”之后,将根据地移到西北部的延安,独自展开了抗日战争。尽管日本在最高峰时派遣了多达百万人的大军,但也仅仅控制了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1940年9月,日军侵入北部法属印支(北越),试图通过“南进”打开中国战线的僵局。在日本陆军内虽然要求进攻苏联以实现支配西伯利亚的“北进”论的势力很强,但由于1939年诺门坎等事件,领教了苏军的战斗力,也由于对拥有很多的石油等现代化战争所必需的资源南方更感兴趣,于是他们开始选择

^① 即七七事变。——译注

“南进”。

美国为了抗议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对日本采取了全面禁运废钢铁(炼钢原料)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重庆蒋介石政权的援助。美国的罗斯福政权试图通过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来迫使其从大陆撤退。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陆军却反而孤注一掷走向了加强与德国同盟和与美国开战的道路。1941年6月，日军侵入南部法属印支(南越)。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全面停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同时，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也采取了冻结日本资产和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措施。

1941年7月18日，组成仅仅3个月的第三届近卫内阁便宣告总辞职。10月18日，东条英机(陆军大将)组成新内阁。11月26日，在中国的蒋介石和英国的丘吉尔等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科迪尔·哈罗向野村吉三郎和栗栖三郎两位大使递交的新提案，事实上已近乎于最后通牒。这份被称为“哈罗照会”的文件中包含着日本从中国与印支撤兵，不承认除蒋介石外的任何在中国的政权和不承认日、德、意三国同盟等要求。

显然对日本军部来说，要它就此放弃经过多年国民总动员，付出很大牺牲而获得的对中国大陆的统治区域是不可能的。他们受到自己煽动起来而又高涨的国民民族扩张主义和排外主义的严重束缚。对于既无明确计划又无明确战略而陷入侵略战争泥沼的日本政府来说，面临的重大危机就是已没有能够实现政策大转变的力量。恐怖和叛乱的威胁早已扼杀了一切冷静而稳健的舆论，转变政策的可能性消失了。

12月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三国开战。12月8日(夏威夷时间7日，星期日)拂晓，日本海军航空兵奇袭了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本来日本按理应在奇袭夏威夷之前向美国政府

递交最后通牒，由于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处理不当，直到发起攻击之后才将最后通牒递交美国政府。结果罗斯福为了煽动美国国民的反日情绪，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次失误。

日军对夏威夷奇袭的成功，使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到了沉重打击。同日，日军进攻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等美、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2月11日，按照三国同盟协议，德、意两国向美国宣战。日本将这场战争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美国则称之为“太平洋战争”。由于日、美开战，使美国同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侧参战。结果世界上所有的强国都成了战争的参加者。

日、美的差距

将美国作为战争的对手，无论对日本还是对德国来说都是导致它们在军事上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日本虽然已达到了很高的工业化水平，然而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相当大。若以1941年两国的主要物资生产量作一比较，美国的人口相当于日本的2倍，但石油和铁矿石的生产量却分别是日本的528倍和74倍。作为军需物资的生铁和钢锭是日本的12倍，按人均计算则是6倍。在进行战争时，生产的绝对量固然十分重要，然而人均工业生产水平的差距也同样反映了整个工业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差距。

当时美国已实现了汽车和电机等耐久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因而日美机械工业之间的差距更大。在大萧条开始前不久的1929年，美国汽车工业的销售量已达560万辆（其中轿车为480万辆）。而日本的汽车产量在战前和战时最高峰的1941年仅为4.6万辆（其中小轿车的产量在最高峰的1938年为1850辆），实际产量不到美国的1%。

在1921年（大正十年）11月到1922年2月的华盛顿裁军会

议上,美、英、日之间海军主力舰的比率被规定为10:10:6。如果从经济实力的差距来考虑,那么日本相对于美英60%的比率是相当高的。虽然日本海军的强硬派(舰队派)主张对美、英的比率应为70%,但这将意味着加重军备方面的财政负担。因此,如果不达成条约,任凭主要国家无限制地竞相制造军舰,其结果必然会加剧日本的财政困难。为此,海军的明智派(条约派)力求说明这一点以达成裁军条约。在1930年1月到4月的伦敦裁军会议上,裁军的主要议题是限制巡洋舰以下的补助舰艇,但即使这个时候舰队派仍主张对美、英70%的比率,并谴责与美英妥协缔结条约的浜口内阁。右翼势力还袭击了浜口首相。

1941年12月,日本通过奇袭使美军受到打击。日本海军官兵满怀新兴国家的豪情利用具有独创精神的办法和训练来弥补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的不足,并大胆地展开空战获得了成功。但是战争一开始美国便以占压倒优势的物力进行了反击。

1941年底美国的舰艇吨数是日本的0.89倍,但到1945年8月停战时已是日本的6.3倍。战争期间日本建造的航空母舰是15艘。而美国建造的是102艘,约相当于日本的7倍,建造的商船日本是329万吨,而美国是5185万吨,约相当于日本的16倍。战争期间美国总共生产了29.7万架飞机,而日本竭尽其全力生产,也仅65374架。

战前,日本在武器生产的某些领域中已迅速赶上欧美。1941至1942年建造的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武藏号(排水量均为6.5万吨)是明治以来日本造船技术的结晶。海军的零式舰载战斗机^①则是通过减轻机体的重量和改善设计来弥补日本发动机制造技术薄弱的杰作。战争初期美英还没有能与之对抗的战

^① 这个名称是根据神武天皇建国神话中的皇国纪元二六〇〇年(即1940年)末尾的两位数零命名的。——原注

斗机。

根据山本五十六的建议，日本海军虽然采用以空战为主的战术，但开战后美国也对这种战术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使巨舰大和、武藏号成为无用之物。战争中即使在新型机种的开发上，日、美之间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日本不但技术力量落后，而且还缺乏明确的开发思想和指导方针。浪费了本来就不多的人才资源。相反，美国则集中力量大力开发研制出了先进的机种。美国将捕获到的零式战斗机加以研究，开发能与其对抗的机种和战术，从而抓住零式战斗机为了轻量化牺牲防卫的弱点，确保了美国的空中优势。

日本在满洲事变之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轰炸了锦州、上海和重庆等城市，杀伤普通市民，开创了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的先例。德国空军也在西班牙内战中空袭了古城格尔尼卡，杀伤市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又对伦敦进行了反复的轰炸。以后这种战术又被美军更加有计划地加以了采用。战争末期美军使用的B 29轰炸机就是为对敌对国本土进行战略轰炸而开发研制出来的四引擎超大型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能在螺旋桨飞机所能达到的极限1万米高空飞行，具有很好的防卫能力。

在日本的军人、官僚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也有认识到日、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认为对美开战是失策的人。在海军中，了解英、美实情的军官很多，而且海军依靠的是军舰和飞机。因此重技术的风气很浓，唯意志论难以流行开来。但是即便在海军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与陆军相呼应掌握了领导权。至于陆军，自满洲事变以来，由于其与中国军队相比，在装备、士气、组织和训练程度上都保持着优势地位，加之又不了解欧美的实情，因此，产生了许多很容易染上扩张主义思想的强硬派。

在日本“美国物质文明先进，但精神力量不及日本”的议论

也四处蔓延。大多数日本人丝毫得不到有关美国综合实力的情报。

珍珠港的打击和屈辱使美国国民振奋起来，激起了他们要求报复的强烈情绪。罗斯福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称这场战争是打破德国和日本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行为，保卫自由和民主主义，确立持久和平的正义战争。美军的高昂士气大大超过了许多日本人的预料。

美国的参战不但从根本上决定了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失败，而且使这场战争成了一场是选择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是独裁还是自由，是野蛮还是文明的社会体制和文明状态的战争。战争的背景虽然是先进工业国和后进工业国、拥有资源的国家和没有资源的国家之间的对立，但是根据美国的强烈主张，盟国方面在正面打出的则是所谓人权和自由、各民族自决和民主主义的旗号。这个旗号已成为盟国的“公约”。战后，盟国的许多行动都要受到它的制约。

德国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在欧洲和非洲战场，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分别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扩大了各自的版图。德国及其同盟国的统治区域最后除阻止德国进攻的英国和限于中立国的瑞士、瑞典和葡萄牙之外，已扩展到欧洲的主要地区、苏联的欧洲部分和北非的部分地区。而日本则统治了中国大陆的东部、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并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大多数岛屿。

然而不久战局便开始向着不利于轴心国的方向发展。德军未能取得对莫斯科的占领，在苏军的反攻和严寒的打击下被迫后撤。在苏联南部伏尔加河沿岸的战略要冲斯大林格勒（今天

的伏尔加格勒)，德国大军遭到了苏军的包围，于1943年的1月31日到2月2日向苏军投降。它成了苏联战线上的决定性转机。

日本于开战6个月后的1942年6月5日，在中途岛海域的海战中，其联合舰队遭到了重创。同年8月7日，占领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日军向美军发起了反登陆战。在这座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连名字都未曾听说过的岛屿上，双方军队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美军一控制住该岛的主要部分便立即使用工程机械迅速建立了飞机场。而日本方面当时连推土机都没有。在伸展开来的战线上，由于没有空军力量的配合，日本失去了控制权，连粮食也无法补给，大部分日军士兵死于饥饿。美军以太平洋上的各岛屿为“跳板”，向北推进。

1943年5月，驻守阿留申群岛阿图岛的日军2500人被全歼。由于下令不许投降，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死去为止是日本特有的军纪。因此，太平洋上各地的日军面对物力上占压倒优势的美军的攻击，不断重演被全歼的悲剧。而军部却将这种悲剧美化为“玉碎”。

在意大利，自1922年10月墨索里尼掌握政权以来，法西斯党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在1943年7月的政变中，墨索里尼倒台。9月8日，维多里奥新政权向已进入西西里岛的盟军无条件投降。同时，德军则占领了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并救出墨索里尼，建立了傀儡政权。

德国和日本没有改变进行彻底抵抗的姿态。盟国方面也采取了战斗到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针。夺去众多生命的激烈战斗继续在各地展开。

1944年6月6日，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组成的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强行实施大规模的登陆作战。8月2日，

在市民举行武装起义的配合下，盟军解放了巴黎。9月2日，盟军进入布鲁塞尔。9月9日，戴高乐将军建立了法国临时政府。戴高乐自法国投降后，就从流亡地伦敦通过无线电广播号召人民开展抗德运动，并率领由法国人组成的部队加入了盟军，9月12日，盟军由亚琛附近进入德国。10月11日，苏军从东部越过了原德国国境。

1945年3月7日，西侧的盟军渡过了莱茵河。4月22日，由东面进攻的苏军装甲部队突入柏林市区一角。25日，美苏两军在易北河边的特耳科会师，双方面誓决不允许再次发生战争。27日，墨索里尼在靠近瑞士边境的科莫湖边被游击队逮捕，翌日被枪杀(时年61岁)。29日，意大利的德军投降，意大利全土获得解放。

4月30日，在苏军包围下的柏林，阿道夫·希特勒(时年56岁)和情妇一同自杀。其他纳粹干部也纷纷自杀、逃亡或被盟军逮捕。遭到逮捕的纳粹干部和德军领导人后来在纽伦堡被提交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根据1946年10月的判决，12人被处以绞刑，其中赫尔曼·格林在执行死刑前自杀)。5月7日和8日，德军代表在东北部的兰斯和首都柏林分别签署了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文件。

寻求停战的途径

当时日本的主要城市正在受到空袭，烧成了废墟。

美军空袭日本本土的主要基地是马里亚纳群岛。除美属关岛之外，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从德国手中拿走了包括马里亚纳在内的西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各群岛，并以国联托管的名义进行统治。日美开战后不久，日军又进一步占领了关岛。

美军在塞班岛登陆是 1944 年 6 月 15 日。7 月 7 日，岛上的日本守备部队约 3 万人“玉碎”，同时岛上的约 1 万日本居民也选择了死亡。该岛从战前起就居住着许多老百姓，他们也同样选择了与其被捕宁可战死或自杀的道路。大多数妇女儿童跳崖投海而死。8 月 10 日，关岛也被美军占领。

1944 年 10 月 20 日，美军在菲律宾群岛中部的莱特岛登陆。

10 月 25 日，大约 100 架以中国大陆东南部为基地的 B 29 轰炸机编队轰炸了北九州地区。自同年 6 月 16 日以来，B 29 就已对北九州地区进行了间隙性的空袭，但从 10 月份起则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正式连续性的空袭。

11 月 1 日，从塞班岛等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 B 29 首次飞临东京上空侦察。24 日，大约 70 架 B 29 轰炸了东京。这以后 B 29 几乎天天来袭，并且常常以二三百架乃至 500 架的大编队反复进行轰炸。轰炸从东京、大阪、名古屋和北九州的人口稠密地区开始一直波及到地方的中小城市。虽然轰炸的部分目的是破坏以飞机厂为主的军事目标，但主要目的则是烧毁木制房屋密集的日本城市，大量杀伤居民。

1945 年(昭和二十年)3 月 17 日，小笠原群岛硫黄岛上的日军约二三万人遭到全歼。

4 月 1 日，美军在冲绳本岛登陆。6 月 23 日，冲绳本岛的日军主力全军覆没。美军共战死 12520 人。日军方面的战死人数军人为 94136 人(包括本地出生的防卫队队员)，冲绳县县民中的战斗协助者为 55246 人，普通居民为 94754 人。除日军外县民中的死者数达 15 万人，如包括本地出生的士兵和防卫队队员在内，则冲绳县县民的牺牲总人数共为 178228 人。此外，部分日军还以特务等嫌疑罪杀害了许多县民，或以强迫自杀的方式牺牲了不少同胞。也有些人是在冲绳之战开始之前向本土

“疏散”的途中，由于遭到美国潜水艇鱼雷的攻击而牺牲的。根据截止 1944 年 10 月份的调查统计，当时冲绳县县民共有 59 万人，而其中死亡者就达 30%。

自 6 月下旬以后，除了马里亚纳和中国两个基地的 B29 轰炸机队外，冲绳基地的 B24，硫黄岛的 P51 和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也向日本飞来。日本本土上空已完全处于美军航空部队的控制之下。

日军首脑部虽然叫嚷要进行“本土决战”，并要求国民为此而做好精神上的准备，但是为进行本土防卫而召集起来的陆军部队连枪支和弹药都不能完全普及，因此，训练也无法进行。国民只能用竹枪训练打仗。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首脑部不得不开始寻求停战的途径。塞班玉碎后的 1944 年 7 月 18 日，东条内阁因内部意见不一，被迫宣布总辞职。7 月 22 日，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内阁成立。曾反对日、德、意同盟的米内光政作为海相入阁。1944 年 2 月 14 日，近卫文麿因急于要停战单独上奏天皇。4 月 5 日，小矶内阁总辞职。4 月 7 日，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米内仍作为海相入阁。6 月以后，铃木内阁责成外相东乡茂德向苏联试探和平调解的可能性。在这以前，苏联已于 4 月 5 日通告日本，日苏中立条约将不再延长（1 年后条约到期）。但是 7 月 10 日由重要阁僚和大本营首脑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仍决定派遣近卫文麿前往苏联，要求苏方为停战而出面调停。13 日，这一决定传达给了苏联。18 日，苏联作出了拒绝的答复。斯大林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谈中（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与美、英达成秘密协定，同意对德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由于日本政府拘泥于避开与美、英直接谈判而要求苏联出面调停的办法，结果延误了停战的时间，造成了更大的牺牲。

日本首脑部重视的，是“维护国体”，因这意味着天皇统治的存续和天皇及其皇室的安泰。日本政府寻求实现以“维护国体”为条件的投降途径。这对于抑制叫嚷本土决战的强硬派来说虽然被认为是必要的，但同时这也是政府首脑及其重臣们自身的愿望。因为他们不但知道战前天皇是反对军部独断独行和扩大战争的，而且对天皇个人也抱有一种亲近感和信赖感。然而盟国方面已决定只允许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无条件投降的方针。尽管在美国政府内有象前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等人认为的那种应该通过承认保存天皇制的办法来尽早结束战争、减少牺牲的意见。但这毕竟是少数派。自日本攻击珍珠港以来，在变得明显强硬起来的美国社会舆论面前，这种稳健的意见是软弱无力的。

日本的失败虽已显而易见，但停战未能很快实现，双方的牺牲仍在增加。

波茨坦会谈

1945年7月17日，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三首脑会集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宫殿，主要目的是协商对德战争胜利后欧洲的处理问题。

在这之前，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已于4月12日病逝，副总统哈里·杜鲁门升任总统。在英国，临近波茨坦会谈的7月5日举行了国会大选。选举结果工党获胜。7月26日，丘吉尔的保守党内阁宣布总辞职。27日，组成了艾德礼的工党内阁。波茨坦会谈的英方代表中途改为艾德礼。至此，美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高领导人都已从国际政治舞台的前台离去。

波茨坦会谈持续到8月2日，最后发表了有关德国问题的议定书。这次会谈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系列首脑会谈的最

后一次，但却未能留下有关处理战后欧洲问题的具体成果。美、英同苏联的对立已难以掩饰。尤其在波兰问题上，双方的矛盾明显加深。

美、英两国支持 1939 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割波兰之前波兰政府在伦敦的流亡政权。希望在战后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一个民主的波兰政府。但是流亡伦敦的政权对苏联抱有不信任感。“卡钦屠杀”事件公开化后，它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彻底调查，从而加深了与斯大林的对立。“卡钦屠杀”事件是纳粹政府于 1943 年发表了在斯摩梭斯克附近的卡钦森林中发现被杀害掩埋的数千名波兰军官尸体的消息后弄清楚的。据推测，1939 年被进攻波兰东部的苏军带走后失踪的波兰军人是于 1940 年遭到苏军杀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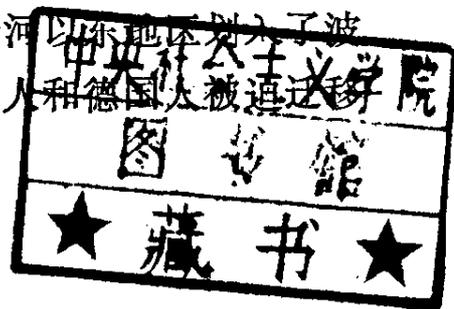
1944 年 8 月 1 日，根据伦敦流亡政权的指示，华沙市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同纳粹进行了历时 9 个星期的战斗。但当时已接近华沙的苏军却停止了进攻，直到在纳粹镇压下起义军失败为止。这是因为苏联估计通过自由选举将不可能建立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波兰政权。因此，苏军在借德军之手将伦敦流亡政府影响下的势力消灭之后，才重新开始了进攻。而这样就能够让流亡莫斯科、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残存下来的共产主义者们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

斯大林的这种政策引起了美英的不信任和警惕，成为“冷战”的出发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开始的直接起因固然是由于德苏分割波兰，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的最初起因也同样是由于波兰问题。

在波茨坦会谈中，为了避免分割德国，有关各国的首脑基本上达成了努力实现统一管理的一致意见。当时无论是美、英还是苏联都不希望分割德国。但是具体处理却又委托给了美、英、法、

苏四国外长级以下的会谈,并以全体一致同意为原则。因此,这样一来,只要苏联一国拒绝,那么任何新的决定都将无法采纳。可见,避免分割占领,并未得到丝毫的保证。

德国全土被分成为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和东部的苏联占领区。同时在苏联占领区内又以“飞地”的形式保留了西柏林作为美、英、法管理区。根据 1939 年同希特勒签订的秘密条约,苏联将所获得的波兰东部地区永久性地划入了其领土范围。而作为其补偿,则将属于德国的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地区划入了波兰领土。这一次的国境变更使数百万波兰人和德国人被迫迁移了居住地。



波茨坦宣言

在波茨坦会谈召开的过程中,还制订了一份劝告日本投降的文件。文件的草案是由美国政府准备的,并得到了丘吉尔和未出席这次会议的蒋介石的认可。该文件作为“美、英、中三国政府的共同宣言”于 7 月 26 日公开发表。这就是“波茨坦宣言”。宣言的内容也向苏联政府作了传达。苏联在 8 月 8 日对日参战的同时即成为该宣言的签字国。

波茨坦宣言是一份表明盟国完成对日作战的决心和意图以及战后对日政策的原则,以敦促日本政府下决心投降的文件。文件共由 13 条组成。其中从第 6 条开始陈述了有关战后的对日政策,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

- (1) 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彻底解除其武装;恢复和平的生活和正常的生产活动;惩罚战争罪犯。
- (2) 恢复和加强民主主义,确立自由和基本人权。
- (3) 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以及由各盟国所规定的各小岛”。

(4) 为了“发展那些既支持日本经济又使其能够征收公正的实物赔偿的产业”，将允许日本获得原料，并在将来“参加世界贸易”。但是不允许“发展那些有可能使日本重整军备发动战争的产业”。“获得”原料应和“支配”原料区别开来。

(5) 盟军将占领日本直到建立新秩序为止。

波茨坦宣言阐述了将履行 1943 年 11 月 27 日开罗宣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共同宣言,于同年 12 月 1 日发表)中的条款。除要求日本归还过去用武力夺走的土地之外,强调盟国方面无意扩大领土,同时附带说明盟国也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使其灭亡。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由波茨坦宣言集中表达的盟国对日要求的基本想法,在日美开战之前,就已用美英两国政府共同声明的方式公开发表。

弗兰克林·罗斯福领导的美国政府判断,从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初为了对付德国和日本的扩张政策,美国将不得不在精神上做好抛弃传统的孤立主义而参加战争的准备。为了使美国国民认识到参战的必要性,并宣布美国对世界的立场,美国政府开始努力确立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基本原则。

1941 年 8 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北大西洋上的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上举行会谈。8 月 12 日,发表了共同宣言。在这个后来被称之为“大西洋宪章”的共同宣言中,提出了以下的原则。

(1) 不扩大领土;不承认未根据国民的自由意愿所进行的领土变更;实行民族自决。

(2) 确保通商和获得原料的自由和机会均等;改善劳动条件,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为确保社会福利的经济合作;从恐怖和贫困中争取自由;公海航行自由。

(3) 确立侵略国的非武装化和一般安全保障体制。

在大西洋宪章中，虽然反映了英国所主张的重视以殖民地帝国为基础的英镑集团(以英镑为通货的经济国)的既得利益，而插入了所谓“尊重已有权力”的词句，但是其基调主要还是罗斯福提出的民族自决、自由和经济政策。当时，纳粹德国正努力确保其从法国到苏联欧洲部分深处的广大统治区域；日本为了打开陷入泥沼状态的日中战争和确保南方的资源以对抗美国的经济封锁，正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

美国在大西洋宪章中宣扬不扩大领土、民族自决等原则，是想给国内外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对美国来说，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对德对日战争将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1941年9月24日，包括苏联和自由法兰西(法国在伦敦的流亡政权)在内的15个国家宣布参加大西洋宪章。继同年12月，日本对美、英、荷开战，德、意对美宣战之后，在1942年1月1日的盟国共同宣言(26个国家参加)中也宣传了相同的原则。波茨坦宣言所谈到的开罗宣言的不扩大领土的原则，也是重申这些宣言所表达的盟国的立场。

但是在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开罗会谈(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举行后不久召开的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德黑兰会谈(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罗斯福承认了斯大林以对千岛等领土要求作为将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的要求。并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谈中，同斯大林正式达成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美、苏秘密约定。美国感到为了减少其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必须让苏联参战。因此，对斯大林破坏不扩大领土原则的要求作出了让步。同时，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美、苏双方还达成了斯大林要求中所包括的由苏联获得日本在中国的权益的秘密协定。

盟军的意图

假如撇开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不谈，波茨坦宣言表明了以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自由化、非帝国主义化和经济的和平化为目的。波茨坦宣言说明，如果不仅能够达到这些目的，而且“还能够按照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建立一个既具有和平倾向又负责任的政府的话，那末占领军就将撤出日本”。然而这一说明中却包含着一个矛盾。这就是根据“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建立起来的政府，未必就是盟国所认为的“具有和平倾向”的政府。如果日本国民的自由意愿是要求再次发展军事强国，那么占领军就必须选择是强迫和平政府否定日本国民的自由意愿，还是扼杀和平政府在日本的建立。这是一个从盟军占领日本起就已潜伏着的问题。

波茨坦宣言中包含“我们的条件如下”、“我们将不会放弃这些条件”一类的表述，这些表述明确表明了盟国促使日本政府下决心投降的意图。因此，日本政府几乎是不可能通过与盟国谈判来改变这些条件。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全日本国军队无条件投降”的措施。

这时候美国已拥有原子弹。战争中经过在极其秘密情况下的开发研制，美国于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进行了首次爆炸试验，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在波茨坦，杜鲁门将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丘吉尔在美国研制的过程中就已得到了这一情报）。

波茨坦宣言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即：“最大限度地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仅将意味着日本军队的不可避免地且彻底地毁灭，而且必然同样意味着日本国的彻底破坏”。这段话就是考虑到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为了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而写的。

前驻日大使，1944年12月就任副国务卿的格鲁主张，应该通过向日本具体通告原子弹的存在以及使用它的意图来尽早结束战争，但是这个主张未被采纳。日本政府将上面的那段文字仅仅理解为一般性的警告。

日本政府最初对波茨坦宣言的正式反应是消极的。铃木贯太郎首相匆忙向国内作了“无视这个宣言”的发言。该发言作为新闻传到了盟国，并被理解为是拒绝波茨坦宣言的发言。

政府如果表示出结束战争的意图，就会出现军部发动叛乱打倒政府，杀害政府要员、拥立彻底抵抗派政府的危险。而这样一来，铃木、米内和东乡等人实现停战的努力就会夭折，并引起极大的混乱和破坏。铃木唯恐出现这种事态，因此，直到最后表面上仍表现出一种彻底抵抗的姿态。

在内部，铃木内阁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可能性进行了慎重的研究。铃木内阁仍旧坚持“维护国体”，并对波茨坦宣言中“惩罚战争罪犯”的条款感到畏惧，想要寻找修改投降条件的可能性。战争仍在继续，牺牲进一步扩大。

战败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是历史上首次将原子弹用于实战，是以日本人作为牺牲品进行的实验。8月9日，美国在长崎又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这次使用的是和广岛不同类型的原子弹。因此，是又一次实验。据说死者广岛是13万—14万人，长崎是6万—7万人，即使是幸存的居民在战后的长时期内，也受到放射能障碍等后遗症的折磨，大多数人被夺去了生命。

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日本从收音机中知道这件事是9日）。苏军在满洲和桦太（库页岛）迅速击破日军，急速南

下。

两颗原子弹的投放和苏联的参战，动摇了以陆军为核心的彻底抗战派，为政府提供了决断的机会。从8月9日到10日下午2点半的御前会议上(天皇、重臣、阁僚和大本营干部出席了会议)，决定原则上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附加了“希望了解波茨坦宣言中不要求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含义”的条件。这一决定于8月10日由日本驻中立国瑞士和瑞典的外交官向盟国作了通报。

8月12日，包括下例内容的美国政府的答复被带回了东京。

(1) 投降后天皇及其日本政府的权限，将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

(2) 最终的政府形态应在波茨坦宣言的基础上，根据日本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来决定。

日本外务省为了避开终战反对派的攻击，将该答复中出现的“从属”(Subject to)一词，译成了“置于……的限制之下”。

8月14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天皇亲自作了停战诏书的录音，其目的是想通过直接向国民发表谈话来避免发生混乱。其间，虽然部分陆军军官发动了阻止停战的叛乱，杀死上司，并试图夺走录音带，但结果是失败而自杀。

8月15日正午，天皇的声音通过收音机广播传遍了全国。实际上，在录音和接收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由于是独特的文件和声音，因此，能够完全理解诏书内容的国民并不多。但它毕竟传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昨天还在叫嚷“本土决战”的政府突然决定了停止战争。

被任命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的停战指示，经瑞士传达到了日本。8月16日下午4时，大本营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分别向全军发布了停战命令。在这前后，一部分军人和国家主义者或自杀、或率领最后的“特别攻击队”断然实行自杀性出击。但就全国而言，在没有发生大的混乱和破坏行动的情况下，终于实现了停战。大多数国民，面对长期来被要求豁出生命去为之战斗的国家目标的突然崩溃，几乎茫然不知所措。

2.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

美国的主导权

得到天皇的裁决后，决定投降的铃木贯太郎内阁于1945年8月15日午后3时宣布总辞职。8月17日，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成立。之所以让皇族组阁是为了要抑制军队对投降和占领的抵抗。

8月19日，为处理停战和联系盟军进驻日本事宜，日军特使经由冲绳飞往菲律宾的马尼拉。8月28日，美军先头部队150人抵达厚木的海军航空兵基地。8月30日，第11空降师主力的运输机约150架，第8军军长R.艾肯伯格中将的座机和美国太平洋方面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座机由冲绳的嘉手纳机场飞抵厚木。这以后，美军在日本各地登陆。

9月2日，在横须贺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举行了签署投降文件的仪式。日本方面的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和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盟国方面参加签字的除麦克阿瑟外，还有美国、中国（国民党政权）、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的代表。

直接打败日本的是美军。中国国民虽然通过抗日战争使日本的侵略陷入了困境,是造成战争胜利的远因,但中国战争本身却并无结果。英国和英联邦各国由于战争初期惨败丧失了战斗力,在亚洲仅仅还保有印度以西的领地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在日本投降前不久参战并给予了日军以打击,但在远东战争中它是一个新加入者。因此,由美国来掌握占领日本的主导权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由于盟国的全体成员国都是对日战争的当事国,因此,美国经常要面临就日本战后处理一事在盟国间进行调整的问题。

苏联政府对日参战后不久,就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分别由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来担任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以及让苏军占领南桦太(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北半部(连结钏路和留荫一线的以北地区)的要求。而当时美国方面也估计占领日本尚有困难,因此,也有要求苏军进驻的意向。在总参谋部于8月16日拟定的分割占领日本的方案中,就曾预定将北海道和东北地方作为苏联占领区。

在德国,自1945年投降后,虽然实施了美、英、法、苏的分割占领,但美、英、法三国和苏联间的对立却日益加深。因此,根据这一经验教训,美国政府急忙修改了对日本的占领计划。8月18日,杜鲁门批准了在由美国人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前提下,对日本实行统一占领的“占领军的基本构成”。这一方针也向苏联作了通告。美国方面的方针是,不用说日本本土,就连千岛群岛的主要部分(昂奈克担岛以南)也将由美军进驻并负责解除日本的武装。但是斯大林未予理睬抢先让苏军进驻了整个千岛群岛。

苏联占领了“满洲”、朝鲜的北纬38度线以北、南桦太和千岛群岛。在这些地区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士兵被带到西伯利亚。

由于长期在过于严酷的条件下被强制劳动，死亡了数万人。开罗宣言虽然约定日本投降后朝鲜将获得独立，但并未制定任何具体步骤。因而，满洲的日军瓦解后，苏军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占领整个朝鲜。为了阻止苏联南下，美国急忙决定了美军占领38度线以南地区，以北地区委托给苏军的方针。于是麦克阿瑟指挥下的美军在没有作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进了南朝鲜。由此开始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美国的单独占领

和苏联占领下的千岛以及处于美国军事管制下的冲绳、奄美和小笠原不同，日本本土避免了分割占领。美国原先也准备对日本本土实行军事管制，但停战后因日本的要求而修改了这一方针，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方式。即允许日本政府继续存在，占领军形式上以日本政府为媒介进行统治。此外，美军还准备了打算在日本流通的军票，但那也因日本方面的要求而停止使用。日银券^①仍继续作为流通货币使用。

美国政府在确定了以美军为主导的集中统一的占领体制之后，要求其他盟国也派遣军队占领日本。但各国对不参加管理只派军队进驻都不感兴趣。苏联表示拒绝。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正准备发动与共产党势力间的内战，因此，就连解除中国大陆日军的武装都好不容易才完成，那里还谈得上向日本派兵。而且一部分大陆的日军甚至还被国民党利用去打内战。结果除美军外进驻日本的只有英联邦的军队(澳大利亚军)，但那也是在1946年以后，而且兵力少，只是象征性的。

占领初期，美国向日本派驻了约40万的兵力，事实上是单独支配日本。伴随停战的到来，在美国军队内，要求军队复员

^① 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译注

的呼声骤然高涨起来,因此,必须削减占领军的兵力。为此驻日美军的长官对能否维持占领体制感到不安。尽管眼前的占领日本、解除日军武装和非军国主义化都进行得出乎预料的顺利,然而随着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抬头、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美、苏对立的加深,兵力不足已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对日本的占领,虽然事实上已成为美国的单独占领,但有关对日政策美国并未完全无视其他盟国成员国的要求。

1945年8月21日,美国向英、苏、中三国提议设立“远东咨询委员会”。但它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对各国政府提出劝告的机构。因此,在盟国内引起了不满。

美国同意设立一个作为决策机构的“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并于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这一决定。远东委员会由11个国家^①的代表组成,机构设立在华盛顿(首次会议于1946年2月26日举行)。

远东委员会规定以过半数的表决来决定对日政策,但只有美、英、苏、中四国代表拥有否决权。同时还规定当委员会无法作出决定时,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向盟军最高司令官发布中间指令来实施必须采取的政策。这样,远东委员会便成了一个即使其他成员国表示异意,美国也可以行使否决权,通过发布中间指令来贯彻自己的方针的机构。

但是有关日本基本政治形态的改变,不允许根据中间指令来处理,而必须由远东委员会来决定。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部之所以急于要在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强行修改日本宪法,其原因

^① 这11个国家是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荷兰和菲律宾。1949年11月,缅甸和巴基斯坦加入后,成为13个国家。
——原注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规定。

在设立远东委员会的同时，还决定在东京设立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咨询机构，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理事会”(Allied Councilor Japan)。该理事会于1946年4月5日成立。

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虽然已成为除美国外的盟国对占领政策提出要求 and 施加压力的场所，但占领日本的实权掌握在美国政府和美军的手里。同样，对日占领虽然采取的是间接统治的形式。但权力掌握在占领军手里，日本政府只是从属于它的一个机构。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盟军最高司令官)或GHQ(General Head Quarters——盟军总司令部)是占领时期日本的最高权力者或最高权力机关。它的指令、备忘录和书信等作为决定占领时期日本政府政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命令，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欧美各国和亚洲

关于远东的战后处理问题，盟国之间存在不同的想法。而且随着战后事态的发展，各国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导太平洋战争并对日本实行占领的美国政府的政策，由于最初过于理想主义，过于乐观，因此，面对战后各种势力间的对立和对抗的激化，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盟国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动向是恢复旧秩序。

和欧洲的德国一样，亚洲的日本也是旧秩序的破坏者。盟国的对日战争具有惩罚采取破坏行动的日本，重建旧秩序的性质。但是重建亚洲旧秩序同重建欧洲旧秩序具有不同的独特的含义。对于被日本夺去旧殖民地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欧洲各国来说，重建旧秩序就是意味着重新恢复殖民地体制。

曾在亚洲建立殖民地体制的先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梦寐以求的是彻底重建旧秩序。丘吉尔之所以要求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中加进“尊重已有的权利”这句话，也就是出于想要恢复殖民帝国和英镑区的意图。

美国也曾通过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战争买下并占有过菲律宾。美国答应于1946年让菲律宾获得独立，是因为美国感到殖民地统治体制代价高而获益少。美国主要关心的是扩大其在亚洲进行自由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机会。这也是自大西洋宪章以来，美国之所以强调民族自决和无差别自由贸易的一个原因。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对日本使中国殖民地化的战争。停战后，围绕实现统一国家的领导权问题，国共之间发生了内战。结果，1949年10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从而最终结束了自19世纪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和半殖民地的历史。

同样对其他亚洲各民族来说，日本占领结束的同时也应该是殖民地体制的终结之时。停战后，包括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在内发生了抵抗欧洲各国统治者恢复统治的独立战争。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虽然不过是日本步欧美后尘试图建立又一个殖民帝国的尝试，但是它的崩溃却成了结束欧美各国统治亚洲历史的起点。

菲律宾于1946年7月4日建立共和国，获得独立。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反对荷兰恢复统治的独立战争。1949年12月27日，印度尼西亚被承认获得独立。为此，美国和其他各国一起曾为停止双方的武力斗争和达成协议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在印度支那也发生了反对法国恢复统治的斗争。在越南，共产主义者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展开了抗法斗争。

美国虽然批判复活殖民地体制，但又警惕民族解放斗争被纳入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之下。在菲律宾，美国支持以富裕的上层统治集团为基础的稳健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让菲律宾获得独立。而以具有共产主义性质为由镇压作为抗日游击队在二次大战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民抗日军。在朝鲜，占领北部的苏军让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强有力的行政机构，而占领南部的美军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担负起了统治的责任。不但原封不动地利用日本占领时代的统治机构，而且支持流亡美国的保守派政治家，与开始组织民众进行斗争的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势力对抗。

打倒军国主义日本

在盟国的战后亚洲政策中所包含的另一个因素是反对军国主义，确立民主主义、自由和人权的大义。这种大义从战争初期起就已被美国领导人所强烈主张，成为动员美国国民的精神力量。

当然，即使在美国人中也存在要求对奇袭珍珠港进行报复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和使欧美列强建立的秩序遭到破坏的人受惩罚的心情。但是，就总体而言，战争的目的是拥护自由和民主主义。因此，美国占领日本的主要目标也是复活和强化自由和民主主义。美国希望将自由和民主主义带入德国和日本，通过彻底打倒军国主义来永久地消灭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火种。此外，不允许在欧洲和亚洲再次兴起威胁美国经济活动的势力，拥护国家利益的动机也起着强有力的作用。

总而言之，使德国和日本彻底非军事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确保永久和平是美国处理战后问题的主要目标。按照这一目标，是决不允许半途同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妥协的。因此，

也就由此产生了无条件投降和盟军占领的严厉要求。美国政府首脑在美国直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开始探讨战后的世界体制和美国应采取的政策。面对欧洲大陆和中国大陆战争的扩大，美国估计参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开始了对战后设想的研究。

1940年1月，美国设立了“外交关系问题咨询委员会”。1941年12月日美开战后，该委员会又被进一步扩编为“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ACFPF——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war Foreign Policy）。ACFPF 是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外交政策咨询机构，下设若干分会，对战后的政策进行研究。自1942年8月以后，ACFPF 国务院办事机构起用东亚和日本问题的学者及专家作为其工作人员，着手研究对日政策。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是美国开始反击的时候。因此，国务院和陆军在起草和讨论日本投降后对日政策的同时，也开始大力培养实施占领所必需的工作人员。

对于日本来说，占领美国是一个不现实的超乎梦想的事情。因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美国来说：从大战初期起占领日本就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因此，这也显示，日美间国力的巨大差距。

在战争末期的1944年12月，由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部组成的“调整委员会”（SWNCC——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开始工作。

SWNCC 是一个对停战前后美国的欧洲和远东政策作出最后调整和确定的机构。因此，即使有关日本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也都由 SWNCC 来负责制定。但就重要的政策而言则要求得到总统的批准。自开始占领日本之后，这些政策都由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向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传达。

1945年4月，SWNCC起草了有关实施占领日本的基本政策的文件。这份文件被称为SWNCC 150。以后该文件又经过了多次修改，于开始占领日本后的8月31日最后定稿。总统正式批准这份文件是9月6日。而在此之前，文件的内容已向麦克阿瑟作了内部传达。该文件作为“投降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于9月22日公开发表。此外，SWNCC还就天皇制和战争罪犯的起诉等每一个问题整理归纳了它的方针书，并同时为负责占领日本的美国军人准备了涉及到各个领域的详细的手册和指南书。由于大多数美国军人几乎丝毫都不具备有关日本的知识，因此，作这样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的对日政策

战后对日政策虽然作了周密的准备，但在现实中难免会有许多不周全的地方。

首先，美国不十分了解远东的情况，专家也不多，而且与中国问题专家相比，日本问题专家就更少。为此，美国政府在动员少数民间专家的同时，一面急忙培养新的专家，一面又通过向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有关日本的资料来分析日本的文化和国民性。但是却存在着最熟知日本的少数意见未必受到尊重，中国问题专家的发言权却变得很大，而政策又强烈地反映了政府和军队的一般印象的倾向。

其次，日本的投降来得要比预料的快，因此，这就必须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占领下的局面。但是由于政府和军方头脑部的兴趣暂时集中在对欧洲特别是德国问题的处理上，因而推迟了对日本及其周围地区政策的确定。加之，他们集中关心的又是打倒军国主义日本这个眼前的目标，对战后的远东形势缺乏冷静的估计。因此，当新的情况发生时，便不得不采

取应急的对策。

开始占领日本后，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表现出独立行动的倾向，并非完全按照华盛顿的想法去行动。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们讨厌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的介入，讨厌因不得不考虑，由这些国际组织所反映的其他盟国的意向，而站在其立场上的国务院的介入。因此，盟军总司令部作为占领者的权力机构，变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美国政府要在修改世界战略的基础上改变对日政策时，就必须从华盛顿向东京做有力的说服工作，而这样一来就必然造成时间上的拖延。

在美国对日政策的制定者中，同时存在着代表强硬和温和的两种观点。其中应当被看作是对日强硬派观点的，至少可以认为有以下3个派系。

其一是以陆军首脑部和麦克阿瑟的幕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正因为直接体验过日军的激烈抵抗，所以他们认为必须给日本以彻底处罚，使其不可能再次发展成为军事大国。由于他们既不了解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也没有充分地关心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当战后面必须利用日本来推行反共战略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动摇和改变方针。

其二是以民间集中起来的专家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为代表的强硬派。他们支持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立场，强烈主张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不过，即使在中国问题研究者中也存在着差异。对共产党的延安政府和人民解放军抱有好感的人，更强烈地主张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改革；而希望战后的中国实现以国民党政府为主导的统一的人，则持有更加稳健的主张。

其三是30年代在罗斯福政权下推行新政的改革派官僚和专家们为代表的强硬派。他们把打破日本的旧体制和推进民主的变革看作是改革政策的实验，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很

大的热情。

在对日本有比较正确知识的人中，也存在意见上的分歧。

战争结束前不久，在国务院担任重要职务的约瑟夫·C·格鲁，持有稳健的现实主义观点，并为说服政策的制定者和美国国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格鲁自1932年到1941年日美开战，一直担任驻日大使。1942年8月，乘日美交换航船回国。1944年5月，就任国务院远东局局长。同年12月任副国务卿，所任职务直到日本投降后未变。

格鲁认为，尽管天皇及其周围的人们希望实现英国式的民主立宪政治，但由于军部的冒进而遭到了挫折。他主张允许保留天皇制，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和健康发展，这对美国来说也是比较理想的政策。格鲁解释说，如果通告日本，保证战后保留天皇制，那就能够使日本政府早些投降，从而进一步减少美军的牺牲。

格鲁的主张是与盟国的无条件投降原则相抵触的。由于当时美国存在必须彻底打败日本，处罚造成战争灾难的责任者天皇的强硬的社会舆论。因此，在这种气氛中，格鲁的观点只能是少数派。

苏联的扩张政策

盟国战后外交的另一个内容，是在新的势力均衡中试图使本国处于有利地位的活动。在这方面表现最为强烈的国家是苏联。

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中，德苏双方商定将波兰西部和立陶宛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而将波兰东部、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一协定，苏联与德国进攻波

兰相呼应进入波兰东部，挑起对芬兰的战争，夺取其部分领土，吞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将比萨拉比亚据为己有。

苏联虽然在1941年6月的德苏交战中，被迫大规模后撤，但战后却将其战前所获得的地区和立陶宛划入了苏联领土，并在苏军占领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拥立共产主义政权，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同时苏联还不仅对芬兰施加压力迫使其在外交上从属于苏联，而且将德国东部（奥得河和尼斯河以东地区）划入波兰领土，以此作为将波兰东部划入苏联领土的补偿。战后，在欧洲的苏联占领地区中，脱离苏联势力范围、恢复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只有奥地利的东部（根据1955年5月美、英、法、苏四国达成的维也纳条约，苏军从该地区撤出）。

在亚洲，苏联继承了过去日本在“满洲”的权益，占领了千岛和朝鲜北部。“满洲”的苏军还以赔偿为名拿走了许多应归还中国的设施。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苏联将过去日本的权益归还给了中国。

苏联之所以意识到古典的势力均衡，全面追求扩张政策，最大原因是对西方国家抱有强烈的戒心。苏联在1917年革命后不久的内乱时期，曾因遭到英、法、日等列强的干涉而陷入危机。在30年代，德国和日本又以“防共”为由结成同盟，使苏联面临东西两面夹击的局面。“满洲国”的关东军还不断提出“北进”问题。最后，由于德军的进攻，苏联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再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采取粗暴专制体制的斯大林，即使在盟国内也认为必须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国民。斯大林虽然通过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军队干部实行坚决无情的清洗而确立了他的恐怖政治，但为此他常常感到反叛的危险。斯大林把对德国的反攻称为“大祖国战争”，极尽全力激发苏联国民的民族

主义感情。斯大林也叫嚷要对革命前沙皇制度(帝政)下,帝国主义俄国作为日俄战争的当事者对日本进行报复,要求获得领土和权益作为报酬。

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极力要求德国和日本实现彻底的非军事化。以至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时几乎忘掉了势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的观点。

美国原本是一个远离欧洲和亚洲的独立的大陆国家。但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深深地卷入了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面临着必须寻求并建立独立的世界战略的任务。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仍旧摇摆于孤立主义与理想化的积极主义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外交遭到挫折,美国迎来了孤立主义的时代。在30年代,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国民都呈现着“向内”,埋头于重建经济的新政之中。但是罗斯福却认为不仅为了保护美国的民主主义和自由,而且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必须参预策划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开战后,美国政府在充分利用日军奇袭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同时,还以理想主义的目标来动员美国国民参加战争。

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导盟国的美国,便热衷于打倒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而英国、法国和荷兰等西欧各国在亚洲最关心的则是恢复它们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在中国的权益。因此,停战后面对各民族独立斗争的激化,这些国家在管理日本或对抗苏联的问题上都无暇去助美国一臂之力。

3. 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由和民主主义

自由和民主主义是美国的“国是”也是美国参战的大义名分。

美国为了向欧洲和太平洋两条战线输送作为盟军主力的兵力，动员了 1635 万美国国民参军。在两条战线上，有 41 万美国士兵战死、病死，67 万人负伤。

能够使美国国民参加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在远离祖国的战场上勇敢战斗的原因，即认为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超级大国的形成已构成了威胁美国的因素。但是要求对珍珠港的屈辱进行报复的民族主义情绪则起到了直接的强有力的作用。而这场战争是保卫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正义战争的观念，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0 年代的大萧条也可以理解为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诱因。在德国和日本，从增大的失业和贫困中产生的绝望与不安，扩大了那些想要在危险的战争政策上进行赌博的势力的政治基础。大萧条是造成“富国”和“穷国”间对立尖锐化的主要原因。

大萧条对美国来说影响也是深刻的。1933 年成立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政权采用新政来对付大萧条，实行了诸如失业救济、产业组织化、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失业保险，以及承认工人的团结权和团体交涉权等一系列的救济、重建和改革的措施，得到了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农民和黑人等社会基层的支持。罗斯福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也包含着新政的思想。如象“改善劳动条件、促进经济增长、确保社会福利”和“从恐怖与贫困中争

取自由”这样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政策都被写入了大西洋宪章。即使关于战后处理,罗斯福政权也认识到充分利用 30 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是解决经济问题的课题。因此,美国的对日政策带有将新政推广应用于日本的性质。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统治下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达国家共同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良的一个环节。

从战争末期到战后初期,美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阶层和军人中的保守势力之间在对日政策上曾一度形成一致的意见。改革派的知识分子阶层强烈要求实施类似新政的政策,使日本彻底民主化。而军人中的保守势力也希望进行彻底改革,不给日本军国主义以重新崛起的机会。但是美国经济界的领导层担心推行过于激进的改革可能会破坏日本资本主义的重建,出现了赞同格鲁等稳健派观点的倾向。

改革派的知识分子阶层(指新政派和亲中国派特别是亲中共派的人士)强烈要求的是实现民主化本身。但对军人中大多数保守派来说改革只不过是狠狠教训日本的一种手段。因此,一旦冷战表面化,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变得强大起来时,美国的保守势力便出于反苏反共的观点停止改革,转向充分利用日本来实现美国的世界战略的路线。这时候,在占领政策上便发生分裂。

主张新政式改革的立场,本来也曾包含实现穷人的解放来巩固民主和自由的基础这个基本目标。但是,如果无视重建日本经济所必需的现实条件,陷入过分的理想主义,反而会阻碍民主和自由基础的形成,有利于新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包含着不容忽视的因素。它抓住了改革派的弱点。而且重建经济如果受到阻碍,美国占领日本的负担就会增加,这也是不能忽视的。

在占领开始以后的两三年间，由于东西方冷战这种新形势的压力，理想主义的改革派不得不后退，现实主义在各个方面占据了支配地位。

强制实行民主主义

面对太平洋各个战场上日军的激烈抵抗，反复进行殊死战斗的美国军人深感天皇和天皇制作为支撑日本人战斗意志的精神支柱，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因此，在美国国民中要求惩罚天皇和废除天皇制的意见十分强烈。这是因为他们既不理解日本的政治形势，也几乎不了解天皇本人是一个主张立宪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但是实际上当天皇的“玉音广播”使日本没有发生混乱便实现了投降，并成为制止日本人抵抗，使占领得以顺利实施的转机之后，美国的军人们反而干脆周密地推行了保留天皇制的政策。

作为一个原则，占领军采取了最终让日本人自由选择其政治体制的立场。这一立场既在波茨坦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也在以后反映占领政策的文件中反复地阐明过。在 SWNC C15014 即在“投降后初期的美国对日方针”（1945年9月22日公开发表）中，提出了以下两条作为美国对日占领的“最终目的”。

（1）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并不再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2）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应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美国希望这样的政府尽可能符合民主主义的自治原则，但是对于那种将国民自由表达的意愿所不支持的政治形态强加于日本国的事情，盟国将概不负责。无论这是怎样的政治形态。

美国希望在日本建立一个民主的、和平的政府，但它应该是完全按照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建立的政府，而不应该是强制建立的政府。美国认为，要实现这种“希望”，就必须并且有效地“除去一切在日本国民中阻碍恢复和加强民主主义的障碍”（波茨坦宣言）。

1945年11月1日决定，同年11月3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送交麦克阿瑟的“投降后初期对盟军最高司令官占领和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中说明，占领日本之所以要采取通过日本天皇及其中央和地方政府来实行的间接统治方式，仅仅是想利用日本现有的政治形态，并不意味着支持它。并指出应该允许和支持变更封建权威主义的倾向。同时也表示了当日本国民或其政府为实现这种变更而对反对者行使实力时，占领军应尽可能不予干涉的想法。美国所要采取的方针，基本上是通过促使日本国民的自发运动活泼化，来实现日本的自由化和民主化。

美国要想有效地变革日本的体制，就只有采取这种立场。因为即使美国行使占领军的权力，强制日本实行民主的政治形态，也不可能在占领结束后阻止日本国民推翻它的可能性。相反，强制反而会有引起日本国民的反抗，助长阳奉阴违和使占领结束后否定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增强的危险。因此，必须尽可能避免采取强制的办法。

然而现实却是，作为日本独裁的最高权威的占领军，却一再将其政策强加于日本政府和国民。战后日本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既不是采用自由主义的方法，也不是采用民主主义的方法，而是依靠美军的权力和权威来实现的。过激的制度改革和机构的重新整编是通过来自外部或上面的强制手段先行实现的。而以国民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形成则是后来才实现的。在占领初期，为了排除日本旧的统治阶层和领导阶层参预政治和

行政的领导过程，占领军采取了强制性的指示。在占领中期以后，美国政府和军方估计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难以并存，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行使了占领军的权力。

在理想主义全面后退，现实主义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的追求变得暧昧了，而保守派却重新恢复了权利。但是，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却越过由于冷战而引起的东西方对立的加剧和国内意识形态对立的激化这种危机的局面而生存下来，并更深更广泛地扎根于日本社会之中。

共产主义和美国

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要求确立和彻底实现民主主义和自由。它们是自19世纪以来，将人权思想普及到贫苦民众之中，推动社会运动的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20世纪，作为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思想潮流之一的共产主义，为了完成革命和维护革命政权，将集权主义和权威主义发展成为合法的理论。

作为共产主义，一方面，它大大促进了被压迫民众解放运动的组织化，起到了鼓舞被压迫民族进行独立斗争的作用。它的思想引起了对资本主义的缺陷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和对受其民族统治感到愤怒的群众的强烈共鸣。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破坏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并具有破坏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作用。在卷入资本主义工业化浪潮较迟的国家中，工业化带来的对社会变动的反感和不安与工业化刺激起来的强烈欲望交互作用，造就出了立志变革体制的共产主义者的战斗集团。

在这些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一般都不发达，批判性的言论也常常受到镇压。因此，社会运动往往倾向于依靠包括武装起义和大规模罢工在内的实力手段，以颠覆现有体制为目的的革命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起到了为这种革命主义提供强大

精神支柱的作用。苏联的革命是使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对亚洲各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巨大影响的契机。

中国、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运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特性。从民族主义这个角度来看，它和美国的建国思想相一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提出的目标也有相似之处。因此，无论在美国政府还是军人中，都存在着批评中国的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认为必须同延安的毛泽东政权合作的集团。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却在这些地区与共产主义敌对。因而，也就导致了与最敏感的民族主义的敌对。

共产主义者们的思想和运动目标并不是美国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如果仅就保障自由和人权意识不强或缺这点来考虑，那么称其为民主主义的确是有疑问的。但是如果就其打着解放贫困无权的被压迫民众这个旗号来看，那么作为一种主张，它至少表达了将民主主义扎根于社会基层的要求。

战后美国之所以陷入与这种运动坚决敌对的关系之中，是因为以下几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其一，对美国人来说，自由和民主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美国人有一种无视对方国家实情，强迫他国接受这种观念的倾向。因此，缺少一种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容许各国为实现政治形态的逐渐进步而作出现实选择的灵活的态度。

其二，对于大多数远离亚洲的美国军人和外交官来说，与各国的统治和领导阶层合作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实现的，而扎根于社会基层的抵抗运动的斗士们，则是他们很不熟识的新兴势力。因此，当各国国内两种势力的对立激化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支持前者而敌视后者的立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其三是冷战。当东西方的对立在欧洲激化时，美国在亚洲

的政策也随之被冷战的理论所支配。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被看作是实现克里姆林宫企图将一种集权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体制推广到全世界,并趁此机会扩大苏联势力范围的得力帮手。于是,在冷战意识的支配下,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美国往往不得不去支持那些既不是民主主义,又不是自由主义,既无能,又无效的政权。这就是以民主主义和自由为大义名分的美国所推行的世界战略的矛盾和弱点。也是它以“自由的旗手”自居,一本正经地想要担负起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责任的悲剧。

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作为寻求民众解放运动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同时又带来否定人权和自由的意识形态,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权威主义和集权主义的萌芽。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在民众运动中常常存在着一种要求权威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

对现状感到绝望的民众往往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和按照指令来发动群众的组织。作为组织社会运动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包含着使社会运动走向否定自由的危险。因此,所谓人民民主主义的立场并不具有保障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种古典民主主义的基础的性质。相反,倒不如说,它带有破坏它们的权威主义和集权主义的性质。

因而,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一方面,表现为人民主义与反人民主义的对立;倾向于无条件地支持民众运动的立场与对民众运动表示警惕和敌意的立场的对立。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张权威主义、集权主义和专制(独裁)的立场与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多元化民主制的立场的对立。

战后美苏间的对立,虽然就表面来看,当欧洲各国和日本在

国际政治舞台上失势之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围绕确保各自势力范围而相互对立斗争的局面。但实际上，前面所叙述的围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也与这种确保势力范围的斗争深深地纠缠在一起。

苏联当然不用说，即使战后被拉入苏联势力圈的东欧国家，掌握政权的共产主义者们也不仅彻底镇压了反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势力（其中包括作为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势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而且还清除了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因此，其结果，在苏联东欧集团内，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围绕政治路线的斗争，作为现实的政治问题在其内部几乎不可能得到发展。然而在将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制度化了的西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被允许作为内部合法的势力而继续存在。

在因战争的破坏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而面临经济危机的西欧和日本，共产主义者正是想要利用这个弱点。冷战既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同时又包括各种势力之间围绕解放运动的对立，而且还包括西欧各国以及日本国内的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对立。

日本的民主主义

战后的日本虽然具备了使美国谋求复活和加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策获得成功的条件，但是其内在主体的因素却未必是牢固的。

近代的日本曾有过明治维新、自由民权运动、1889年宪法（明治宪法）、帝国议会、大正民主和普选制（于1925年即大正四年实行，但仅限于男子）这样一些政治方面的经验。1889年的宪法是模仿德意志帝国的法制，所以民权受到了严厉的限制。然而它毕竟包含了比战时和战后许多人所认为的要多得多的立宪主

义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又不能因此认为战前的日本就已经确立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说起来,正是因为它的脆弱,才使军国主义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统治。

然而,尽管如此,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负责实际业务的领导层中的大部分人都倾慕欧美文化,具有一种对欧美政治思想的亲近感。这一点对于战后改革的实现和巩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在青年时期就曾受到过大正民主洗礼的。至于民众,虽曾受到过极其素朴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鼓动,但是由于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惨祸和战败所引起的对国家前途的悲观失望,因此,他们对于“进驻军”(占领军)强制推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能够几乎不感到是强制而加以接受。

说起来,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激进派还有某种渊源关系。20年代到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正民主的发展。倘若无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击,那就无法说明日本要求人权、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历史。

在战后的日本,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仍旧是来自社会基层行将处于破产和贫困中的民众,在开展抗议与争取权利的斗争中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主体势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追求“战后民主主义”的最有力的社会政治组织。但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确实由于它的巨大冲击力给刚刚重新引入的自由和民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因此,曾强迫日本政府释放共产主义者的美国占领军采取了严密压制和封锁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

共产主义者们在政治上的一个弱点与其说是无条件地支持

斯大林的苏联、倒不如说是美化和宣传斯大林的苏联。这种立场在冷战公开化的情况下，必然决定了它同占领军权力的对立。不仅如此，这种立场还遭到了叫嚷日本面临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直接和间接侵略危险的势力的有力攻击。

当冷战加剧时，共产党甚至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不惜否定好不容易才导入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议会制，采取武装斗争的方针。但其结果，不仅遭到敌视他们的反动派和保守派的攻击，而且也遭到了自由主义改革派的谴责、批判和抛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的状态。

第二章 战后改革和民主主义

1. 旧秩序的解体

对共产主义的戒备

1945年8月17日,刚完成组阁的东久迩宫首相,在广播中发表声明:“今后,将促进建设性言论的展开,承认健全的结社自由。”不过他在承认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同时,却加上了“建设性”、“健全的”等条件。在8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东久迩宫首相提出要彻底改革“特别高等警察”(特高)。

特高警察是明治时期由大阪、东京等地方高等警察渐渐发展、确立起来的、用于压制社会运动的专门机关。战前及战争中,它逮捕了许多提倡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反对战争的人,并严加拷问。有些人甚至惨遭杀害。战后,对这些滥用职权的特高警察的罪行进行追究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东久迩宫首相虽然承认必须纠正特高警察的过火之举,却没提到废除。

东久迩宫内阁没考虑废除战前为了镇压思想犯、政治犯而制定的《治安维持法》(1925年,即大正十四年公布),并指示继续取缔以“变革国体”及“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运动(这些曾被治安维持法禁止)。因此,由于违反治安维持法而入狱的人都没能被释放。曾因窝藏在逃共产党员的罪名于1945年3月被逮捕的哲学家三木清,战后40天后于9月26日终因营养不良

导致身心衰竭，死于丰多摩监狱。

这一时期，政府对共产主义所怀的戒心，在1945年2月近卫文麿给天皇上呈的奏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奏文中，近卫论述了战争的继续将导致苏联的参战，其结果将会由在延安的日本反战同盟（领袖是共产主义者野坂参三）等使共产化在日本萌芽。近卫还说，战前及战争中曾企图推翻当时日本政府的一些革新派的军人、官僚们都是受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在当时，一些接近革新派的组织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如1938年到1939年的近卫内阁的参谋、协助政府决策的原《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和佐罗凯一起作为苏联间谍被处刑一事（1941年）；又如曾系内阁直属的综合国策机关计划院（1937年10月到1943年10月）的一些专家（和田博雄、正木千冬、胜间田清一、佐多忠隆、稻叶秀三等）因为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逮捕一事（1941年1—4月）等等。但是，说革新派是受共产主义者所鼓动则未免过于夸大、言过其实。近卫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曾经明确表示过当时日本的立场，即必须重新改造被英国等欧美列强强制形成的社会秩序，因而被看作是革新派的主要人物，肩负着革新的重任而参政。近卫在上奏文里并没有表明自己在这次毁灭性的战争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并且，该奏文为继续维持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既成的社会体制，可谓是煞费苦心。同时，文章中也明显地表明了对于战前就曾大胆地提出废除天皇制的共产党抱有强烈的戒心。

东久迩宫内阁不久就将近卫作为副首相级的国务大臣让其入阁。外务大臣由重光葵续任，他曾在太平洋战争中担任东条、小矶两任内阁的外务大臣（于9月17日辞职，后任为吉田茂），负责治安问题的内务大臣由东条内阁的内务副官山崎严就任。

东久迩宫内阁过分地轻视了美国占领的意义，并且对后来在日本国内所实施的各项重大改革没有精神准备。内阁让美军占领总部驻扎横滨，试图不让其进入“帝都”（东京）。于是美国占领当局只得暂且在横滨开始工作。但是9月15日以后，占领总部就移到了能看得见皇居的东京日比谷第一生命大楼，直到占领期结束，这个地方一直是统治日本的权力中心。

美国占领总部在9月2日、3日及22日，先后发出指令，要求日本军队投降并解除武装，释放联合军俘虏，向美占领当局提供各种情报，实行资源统制，向占领军提供劳务及住宅，加强民需生产，禁止军用品生产，由美国占领当局实行贸易统制等等。9月10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言论及新闻自由的备忘录》，以后，又规定了新闻、报纸的发表规范（有关新闻出版准则的备忘录于9月19日公布，有关新闻广播备忘录于9月22日公布）。这些备忘录虽然都提倡言论自由，但严禁发表任何对美占领军的评判等报道。

这些备忘录都属于事务性的指令，包括战后初期的终战处理、占领实施以及为索取赔偿作准备等。它并没有包含占领军将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介入的含义。由于日本的投降比预料的要早，因此当时美国占领军并未做好对日本立即进行改革的准备，而且还等待日本国内产生自发的改革动向。但是，日本国内自发的民主化趋向在占领初期并未出现。

远东军事审判

1945年9月25日，发自华盛顿的AP电讯谈到：“日本国民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希望不大，……至少最初的时候，真正的变革原动力是由于麦克阿瑟的指令，这一点是很清楚的。”9月27日，作为SCAP（盟军最高司令官）由国务院到东京就任不久的

乔治·阿奇森也向国务院转告了他到东京的第一印象，他这样谈到：“政府和行政官员整天埋头于处理日常事务和执行占领军的指令，……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忙于表面上的民主主义活动。……正如预料的那样，由于战败的打击、军国主义秩序的突然崩溃以及极度贫乏的生活，使国民处于自失状态，进步的、有知识的领导者的空缺，在当时又似乎不可能被填补。”

美国占领军要真正介入日本的改革多少也需要时间，但是，美国占领军总部对于日本旧体制下人的素质所进行的改造在很早就已经开始了。9月11日，占领军发表了首批“战犯名单”，命令首先逮捕作为A级战犯39人（包括协助日本的外国人12人），其中包括原首相东条英机等开战时的官僚。东条9月11日在自己家中开枪自杀。由于子弹没有穿透心脏而自杀未遂，结果在重伤的情况下被送进监狱。12月6日美占领军又指定9人为A级战犯，包括公爵近卫文麿，侯爵木户幸一等。木户是明治时期的元老木户孝允的孙子，在历任文相、内相之后，从开战前到战争结束，一直作为扶佐天皇的内大臣。近卫在被逮捕前夕12月16日在东京获注自己家中服毒自杀（54岁）。

A级战犯中结果有28人被起诉（审判中有2人死亡，1人因为精神病而免于起诉），从1946年5月起开始在东京市谷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被告者都特别注意不要使自己陈述的内容被作为对天皇起诉的材料。1948年11月12日，法庭判决7人绞刑，16人终身监禁，1人有期徒刑20年，1人有期徒刑7年。被判绞刑的有如下7人：东条英机（陆军大将，原首相，陆相、内相、参谋总长）、广田弘毅（原首相、外相、驻苏大使）、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原满洲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原驻中国派遣军参谋长、陆相）、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驻缅甸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陆军大将，原驻上海派遣军司令）、武藤章（陆军中将，

原陆军军务局长)。

日美开战时和停战时担任外相的东乡茂德被判 20 年监禁，1950 年 7 月，服刑中病死在美国陆军医院。东久迩宫内阁的外相重光葵被判 7 年徒刑，于 1950 年被假释。曾经是德、意、日同盟促进者的松冈洋右在审判中于 1946 年 6 月病死。木户幸一曾被判终身监禁，但 1955 年 12 月因病被假释，1958 年 4 月和其他 A 级战犯一起被赦免。

对东条等 7 人的绞刑于 1948 年 12 月 23 日在东京巢鸭监狱内执行。第二天，另 19 个 A 级战犯嫌疑者被释放。

远东军事审判是针对 A 级战犯的，它主要是追究发动侵略战争的、参与共同策划战争的、在奇袭开战中无故掠杀的以及在日中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暴虐行径的。此外，战争中虐待俘虏和被拘留者，有非人道的残暴行为以及参与指挥战争的人，则作为 B 级和 C 级战犯加以追究。B 级和 C 级战犯分别在新加坡、马尼拉、关岛、香港和横滨等军事法庭受审。审判结果：其中 937 人死刑，358 人终身监禁，1046 人无期徒刑，3075 人有期徒刑。

对战犯的审判是胜者单方面以军事审判形式追究败者的战争责任。由于战争责任由盟军单方追究，日本国民反倒难以亲自追究战犯的战争责任，并且也未能很好地将日本战前和战争中的历史加以总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 A 级战犯的审判确实打击了战争中的领导层，成为动摇保守统治的一个要素。

治安维持法的废止

1945 年 10 月 3 日内务相山崎严和法务相岩田宙造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准备修改治安维持法，但没有考虑废除，也没有考虑释放政治犯”，“对要改变国体或是有构成不敬罪的言论行动

要加以取缔”。他们发言的一部分内容登载在第二天即4日的驻日美军机关报《星条旗》上。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喜欢共产主义，但对日本的治安维持法压制对政府的批评，致使日本容易走上战争的道路是很理解的，认为这样的体制不能再维持下去了。麦克阿瑟很担忧来自本国的批判，因而立即采取了行动。10月4日美军占领当局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废止政治警察的备忘录”，要求撤消对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限制。其内容如下：

(1) 保障包括对天皇及皇室进行自由议论在内的思想、宗教、集会及言论的自由。

(2) 废除治安维持法及其他剥夺自由的一系列法律、敕令、省令、命令等(被废除法律的具体名称在备忘录里列举)，并立即使其失效。

(3) 释放根据上述法令被监禁的人。

(4) 废除所有秘密警察及言论控制机构。

(5) 罢免内务大臣、警察系统首脑、全国思想警察及与镇压活动有关的官员职务。

东久迩宫首相认为自己无法执行这份备忘录的内容，他以推动终战初期的事务发展为理由，于10月5日表示内阁总辞职。内大臣木户幸一与近卫文麿等协商后推荐币原喜重郎接替内阁首相职务，这一任命通过外相吉田茂取得了美军当局的谅解。根据旧宪法，首相由天皇指名、首相或内阁成员不必一定是帝国议会的议员。

币原喜重郎生于1872年(明治五年)，当时73岁。历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1921年)的全权大使，1924年到1931年任外相(加藤高明、若槻礼次郎、浜口雄事等内阁)。他重视与英美合作，反对扩大战争，满洲事变后从重要职位上退下。

10月9日币原内阁成立，外相吉田茂、海相米内光政、法相

岩田宙造等留任。

10月10日，全国的监狱、拘留所释放了大约3000名政治犯、思想犯。其中包括德田球一、志贺义雄、宫本显治等共产主义者。战前的共产党由于不断受到镇压，很多领导人转向，有的在警察的拷问下致死，一部分逃到中国等国开展活动。有的还成了苏联斯大林清洗的牺牲品。日本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在1935年最后被破坏，尽管各地有少量的小组进行了努力，试图重建，但要真正以一个政党进行活动是不可能的了。德田和志贺在狱中18年，宫本在狱中12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10月15日用“敕令”名义废除了《治安维持法》(1925年公布)、《思想犯保护观察法》(1936年公布)等，还废除了取缔政治犯、思想犯的法规。在此之前的9月20日，政府公布了题为“根据波茨坦公告发布命令的办法”的敕令，即为了实施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有关的事项，在必要时可不通过法律而直接由敕令、阁令、省令确定进行(542号敕令也被叫做波茨坦紧急敕令)。敕令是指在1889年宪法体制下当有紧急事态及其他理由时，可以不用经过议会批准的法律形式而以天皇命令的形式公布实施的一种命令。这种限制议会民主的旧宪法制度，被占领军用来当作实现日本民主化的手段，是象征性的。

上述的542号敕令，与阁令、省令一起总称为“波茨坦政令”。1947年5月新宪法施行后，敕令制度消失了，根据内阁会议决定的政令，和总理厅(府)令或各省的省令均可用于此目的。波茨坦敕令、波茨坦政令在占领的初期用于排除军国主义者和加强民主化，之后又用于抑制过去的群众运动和限制共产主义者的活动。

解除公职

1945年10月4日在“关于废除政治警察的备忘录”中，盟军总司令部要求大量罢免内相以下的警察系统人员，这是有关“解除公职”最初的具体指示。波茨坦公告要求“铲除军国主义者的势力和权力”，美军占领总部根据这一公告，采取了把公认为是“军国主义的人物”全部从当时日本的重要社会地位上赶下台的方针。

10月30日盟军总司令部把“关于教师和教职员工的调查、精选资格审定的备忘录”递交给日本政府，指示把职业军人和鼓吹军国主义的人开除出教育界，让战前、战争期间因宣传自由主义、和平主义而被解职的人恢复教职。日本政府直到1946年5月7日才公布了有关这方面的敕令。据此被开除教职的人数达7000人。

盟军总司令部进而在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把不受欢迎的人免除公职的备忘录”，这里涉及的人物是指下列对象。

- (1) 犯有战争罪者。
- (2) 职业军人、与情报机关、宪兵队有关者。
- (3) 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恐怖团体等的主要成员。
- (4) 大政辅佐会、辅佐政治会、大日本政治会等及其合作团体的主要成员。
- (5) 与旧殖民地、占领地有关的开发机构、实力企业、金融机关等的骨干。
- (6) 旧殖民地、占领地的行政机关的骨干。

开除公职的对象后来进一步扩大到大政辅佐会战时在市町村、实力公司、金融机关、经济团体、报社、通讯社、电影公司，

NHK（当时唯一的广播机构）等机构任职的人员。被开除者禁止在所有公共性职业上就职，禁止进入旧勤务机关，禁止去亲戚、配偶所在机关就职。政府1946年2月28日的109号敕令和扩充内容的1947年1月4日的1号敕令以及其他许多敕令、省令等，使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得以执行。后据负责开除公职的人正式统计，被开除公职的总数超过20万人。

开除公职的措施使大量的政治家、经营者、行政官员等被解职。1949年以后逐步开始“撤消开除”，但这些人仍没能回到社会各组织的领导职务上。这项措施使支持战时体制的人受到了打击，加速了民主化的进程。由于大量地开除，使官厅、企业的领导干部的人员结构更新和大幅度年轻化了。

但是，在战争中，处在地方、企业官厅等实力地位上的领导人，即使不是军国主义者也不得不与政府和军队合作。执行开除公职措施时，多半并没有对每个人的思想或人格进行调查，只是根据在战时的职业、地位、所在团体来机械地形式地决定。所以不是军国主义分子而被开除公职的也大有人在。不少有实力的政治家，利用开除公职进行权力斗争，使开除公职成为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斗争手段。

2. 修改宪法

修改宪法的指示

1945年10月4日美占领当局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废除政治警察的备忘录”，同一天麦克阿瑟约见东久迩宫内阁的国务相近卫文磨。麦克阿瑟对他强调以下几点：

- (1) 修改宪法时必须加上自由主义的观点。
- (2) 现在的议会是反动的，为了使之面貌更新，必须确认妇

女参政及工人的权力。

第二天，东久迩宫内阁总辞职。因此近卫已经不算内阁成员了。但是根据麦克阿瑟对近卫的谈话和其后占领总部的反应，使近卫确信，占领总部是期待着近卫能利用个人影响为修订宪法而努力的。因此近卫与内大臣木户幸一商量后，于10月11日请求任命自己为内大臣府的御用大臣，并委托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一起草宪法修正案。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中规定，当需要修改宪法时，“必须根据敕命将议案提交帝国议会裁决”，但形式上应由天皇提议。木户是能经常同天皇会面的大臣，近卫想在其帮助下准备上奏天皇的宪法修改草案。11月22日近卫委托佐佐木起草的草案要点由近卫本人进宫报告天皇。此后不久内大臣府被废除，近卫、木户均受到A级战犯嫌疑的指控。近卫被定为战犯后，美占领总部正式否定了麦克阿瑟要近卫为修改宪法作出努力的想法。近卫于12月16日自杀身亡。

1945年10月11日当近卫开始宪法修订的准备工作时，麦克阿瑟接见了上任不久的币原首相，并读了声明书，提出必须进行以下五项内容的改革。

- (1) 妇女参政权。
- (2) 促进工会的发展、强化工人的发言权、纠正儿童劳动的弊病。
- (3) 开设进行自由主义教育的学校。
- (4) 取消压制和专制。
- (5) 禁止产业、贸易垄断，实现经济结构民主化。

当时麦克阿瑟向币原指出：“为了改造日本传统秩序，需要宪法自由化”。币原答道：“如是这种程度上的改革，就没有必要修改宪法”。

话虽这么说,但币原内阁第二天还是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研究宪法修改,并任命国务相松本烝治为此事主办大臣。松本在1934年任斋藤实内阁的商工相,历任满铁和日银官员。松本很快组织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任命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宫泽俊义、东北帝国大学教授清宫四郎、九州帝国大学教授河村又介为从外部邀请的委员,并邀请学士院会员清水澄、美浓部达吉,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野村淳治为顾问。委员长则由松本自己担任。1945年10月27日到1946年2月2日期间召开了22次包括小委员会在内的会议。

币原首相本人认为未必一定要修改宪法,为此松本委员会的顾问美浓部达吉也做过不必修改宪法、运用现有宪法也能民主化的发言。

美浓部在1935年因其“天皇机构论”遭到来自右派和军队的攻击,被控“不敬罪”,第二年即1936年又遭右派的枪击致伤。1932年退休离职后担任东京帝大教授的美浓部,其“天皇机构论”可以说是当时学术界解释宪法时用的一种定论。“天皇机构论”认为,天皇不是一手操纵主权的专制者,而是根据合法程序统治国家的一个机构。这种立宪主义的解释,遭到了主张用天皇亲裁的名义实行国家主义体制的一部分宪法学者及右派、军方的攻击,美浓部就是根据历来对旧宪法的立宪主义的解释,来力陈战后也可不改宪法而实现民主化的主张。

但是,首先开始研究修改宪法的近卫,在对美国通讯社记者谈话时说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和天皇退位的可能性,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其中也有要求修改宪法的呼声。11月11日日本共产党发表了题为“新宪法纲要”的提案。高野岩三郎、森户辰男、铃木安藏、马场恒吾、杉森孝次郎、岩渊辰雄、室伏高信等民间有识之士也在11月5日成立了宪法研讨会,并在12月27日

发表了“宪法草案要纲”。在这种气氛下，当时持消极态度的松本委员会也不得不准备对宪法进行最小限度地修改。

按麦克阿瑟两个发言的基调，在政府周围形成了近卫·佐佐木小组和松本委员会这样两个审议机构。两者之间并不进行交流。松本委员会一直认为自己是政府的正式机构。进入1946年后，美占领当局开始对加快修改宪法施加压力，于是松本委员长亲自归纳了宪法修订草案向内阁会议报告，2月4日得到批准。2月7日向天皇报告，2月8日把宪法修订草案和说明书的英译本提交给占领总部。

各种宪法修订草案

1945年11月22日向天皇报告的近卫一佐佐木修订草案，把天皇的统治权看作是依靠万民辅佐的中心，草案限制了天皇过大的权力；强化了议会的地位；指出内阁对天皇对议会同时负责；强调保障“臣民”的自由；要求取消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包括一般国务权力，这是企图对旧宪法中的主要缺陷进行修改的一种尝试。

这部在维持君主制的同时加进立宪主义内容的宪法修订案，由近卫一佐佐木小组非正式地与占领总部交换了意见，后因此案未强调民主化而未予认可。但是从近卫一佐佐木小组的立场看来，他们为加强草案中的改革色彩已经煞费苦心。最后草案仅仅在一部分报刊上登载，并未正式公布，它只供天皇参考。

作为政府正式草案的松本案也是与近卫一佐佐木草案一样，是在旧宪法基础上进行必须的修改而制订的，所以结果与近卫一佐佐木草案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不过近卫一佐佐木草案废除了凌驾于内阁和议会之上作为天皇咨询机构的枢密院，还提

出皇室经费可以由议会自由变更。而松本草案则保留了枢密院和对皇室经费的审议限制等，因此更具有保守色彩。在保障国民自由方面也有微妙的差异，松本草案都有附加条件的规定。

1945年11月11日日本共产党发表了“新宪法纲要”，它提出了由六方面内容构成的简要提纲。纲要从“主权属于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给予18岁以上的所有国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出“民主议会”，政府对“民主议会”负责。并提出给予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自由以及保障生活权、劳动权、教育权。日本共产党从战前就开始主张废除天皇制，这部纲要就是主张共和制。纲要与后来1946年6月29日发表的“日本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都表明了同一立场。

日本社会党在1946年2月24日发表了“新宪法要纲”，提出“权力归包括天皇在内的国民共同体”，把统治权分散给议会和天皇，在此基础上，保持天皇制、建立议院内阁制。

1945年12月27日发表的宪法研究会的“宪法草案要纲”指出，保存天皇制，但天皇的职能是根据国民的委托只起国家礼节性的作用，统治权由国民付予。即是“象征性的天皇制”。并且规定国政由内阁负责，首相由两院制的两院议长推荐产生。此外，在这份“要纲”里还提出，保障言论、学术、艺术、宗教自由及政治权力，也规定有劳动的义务、给予健康地经营文化生活设施的权力、实现带薪休假制、禁止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小作坊、保障劳动者结社和运动的自由。

12月26日，这份“宪法草案要纲”由宪法研究会成员转交给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士。松本国务相认为过于激进不予重视，而占领总部则将要纲在内部迅速翻译了出来，它对后来占领总部提出的草案具有很大的影响。

宪法研究会的成员之一高野岩三郎执笔起草了一份与研究

会的要纲不同的“修订宪法草案的要纲”，于12月28日发表。其中提出废除天皇制建立总统制和共和国，由国民直接选举出的总统担任行政领导、建立如同美国模式的政府机构。高野 1871 年（明治四年）生于长崎，当时 74 岁。他就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系，德国留学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教授统计学。他受到日本工人运动的先驱之一、他的哥哥房太郎的影响，很早就关心工人运动和社会问题。1907年（明治四十年）参加社会政治学会的创立，从1920年到 1949 年去世为止，一直担任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在 1945 年秋日本社会党成立时，他对安部矶雄、贺川丰彦等起过协调作用，当过顾问，1946年就任日本广播协会会长。

盟军总司令部的宪法修订案

麦克阿瑟们确实具有要加快宪法修订的政治理由。澳大利亚、苏联和中国等都准备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美国国内也有同样的要求。他们强烈要求把天皇当成战争嫌疑犯，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尽快开庭，使天皇下台、并废除天皇制。

美国政府通过以SWNCC（由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部组成的“调整委员会”）为中心的对日政策的研究，决定允许天皇制继续存在。麦克阿瑟和其同僚们也感到为了圆满实现占领，有必要保留天皇及天皇制。由于天皇做出投降的决定才避免了混乱，因此占领军如果直接攻击天皇和天皇制，将很容易引起日本人反抗。

麦克阿瑟是想把保存天皇制写进新宪法来换取日本政府接受新宪法。新宪法包含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它具有平息联合国及美国反日舆论的作用。照理说，修改宪法本身就意味着“基本改变日本的政治形态”。但是在远东委员会成立后，这将必然地

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其时，美国政府通过中间指令让盟军最高司令官来执行保存天皇制的使命就非常困难。因此，麦克阿瑟想赶在1946年2月26日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完成宪法的修改，造成既成事实。

修订宪法的提案，说到底还是必须采取让日本政府自己拿出方案的形式，在占领军强制下进行宪法修订是与“最终的政治形态的选择应按日本国民自由的意愿”的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在远东委员会成立以前，如由占领军强迫日本政府进行宪法修订，就会遭到美国背离联合国独断专行的责难。其他联盟国家虽没有介入日本占领的有效手段，但华盛顿自然也不愿意在这种问题上卷入到外交纠纷中去。此外，如果占领军露骨地强制修改宪法，也会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感，最后还会产生日本国民对宪法进行再度修改的可能。

盟军总司令部示意近卫及币原对宪法进行修订后密切注视日本政府的动向。近卫的工作币原内阁未予认可。后来起诉近卫战犯之事确认了，盟军总司令部不得不装做从一开始就和近卫无关的样子。盟军总司令部对内阁审议松本委员会议案的状况很不满意。负责此项任务的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一边催促松本委员会加快提出宪法修订草案，一边秘密地亲自参与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准备。

1946年1月31日盟军总司令部表示，“日本政府自己着手修改宪法时，无论是事前或事后均无须经过盟军总司令部或远东委员会的同意。但是修改宪法事关重大，故在定案过程盟军总司令部应与日本政府保持接触”。盟军总司令部声称“日本政府自己修订宪法”，是为了美国单独介入日本宪法的修订而作的铺垫。

2月1日《每日新闻》披露了松本草案的消息，盟军总司令部

要求日本政府提供该草案的正式内容，然后再进行研究。第二天2月2日麦克阿瑟对民政局长、C·坡多尼准将表示，新宪法的内容必须具有以下三原则：

(1)以世袭制的天皇为国家元首，按宪法规定行使他的义务和权力。并对人民的基本意愿负责。

(2)放弃战争这一国家主权，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纠纷保护自己的手段，以防卫和保护世界为崇高理想，不允许拥有陆军、海军。没有交战权。

(3)废除封建制度，除了皇族，华族(贵族)的权力仅限于现在活着的一代人。授予华族的权力中不包括政治权力。预算方式参照英国的制度进行。

麦克阿瑟笔记的三原则中，最后的预算方式内容是独立的一条，所以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麦克阿瑟四原则。

2月3日民政局的斯坦夫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开始进行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它由法律专家出身的陆军大尉C·L·凯利斯总负责。一鼓作气，该项工作于2月10日完成，2月12日得到了麦克阿瑟的认可。期间2月8日松本草案要纲及说明的英译本提交到盟军总司令部。但实际上此时正准备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份新宪法草案。

新宪法的产生

1946年2月13日波坦尼准将、凯利斯大尉等盟军总司令部人员在外相官邸会见了吉田外相、松本国务相。波坦尼等告诉对方，麦克阿瑟不赞成松本草案，并转交了盟军总司令部方面的草案。表示，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无论如何日本的宪法修订案都必须以此为基础。

其后，虽然松本国务相与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币原首相与

麦克阿瑟之间有过若干冲突，但在2月22日币原内阁还是做出了根据盟军总司令部草案来完成宪法修改的决策。此后又在与盟军总司令部商议后进行了若干修改，于3月6日发表了“宪法修订草案纲要”。纲要的文笔基本上是译文的腔调，与此一月前报道的松本草案大相庭径，这当然无法避免人们会出现盟军总司令部从中施加了压力的猜测。但是“纲要”是日本政府自己提出来发表的，这就把真相隐匿了起来。

宪法修订草案纲要明确规定天皇是象征性的，主权在民。宣布放弃战争和非武装化，强调基本人权和自由、男女平等、保障社会福利和工人结社的权利。这些特点说明纲要是基本上按盟军总司令部交给日本政府的草案制定的。但是盟军总司令部草案中的一院制的国会改成了众院和参院两院制，并加了一些其他修改。纲要写法本身有大幅度的调整，它一改历来的法律、公文惯用的文件形式，改成口语体，给人以面貌一新的感觉。币原内阁在文字表达上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于4月17日正式发表了“宪法修订草案”。

在4月10日进行的战后第一次大选中，币原领导的进步党没能获得第二大党的地位，4月22日币原内阁总辞职。经过一段政治上的空白与混乱以后，5月22日组成了自由党的吉田茂内阁。在他领导下，完成了宪法修订工作。

宪法修订草案按旧宪法的修改程序经枢密院的审议、通过（6月8日）后，6月20日提交给众议院。在众议院经过多处文字修改后于8月24日通过。然后又经贵族院作若干修改后再还回众议院，最后在10月7日经帝国议会通过正式成立。枢密院在10月29日召开大会予以通过，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开始施行新宪法。

正如预料之中的那样，日本政府、国会审议宪法修正草案期

间,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许多联盟代表表示对日本发生的事态感到担心,决定派出联络员加以调查,要求重新研究宪法的修改问题。麦克阿瑟和盟军总司令部则认为如此修改宪法是日本自主的选择,并表示日本国民选择了提倡自由、民主、和平的宪法是值得欢迎的。实际上他是在赞赏自己炮制出来的新宪法。

这次宪法的修订从形式上看仅仅是对旧宪法加以修订,并且还是经过天皇提议,由枢密院、帝国议会审议通过的。但是从内容改动来看,它否定了旧宪法中的主权在天皇,确立了主权在国民的内容。旧宪法的宗旨是天皇大权来自于苍天神授,“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3条)。新宪法对此全都否定。照从前的规定,修改宪法是不允许改变国体的。但是这次却是没有经过革命就把需要经过革命才能改变的国体改变了。为此,松本委员会的成员宫泽俊义后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后投降在法律上不能不认为具有革命的性质”。

象征性天皇制和放弃战争

经过上述过程而产生的新宪法(“日本国宪法”,以下称“新宪法”或“1946年宪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象征性的天皇制”。宪法明确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总体的象征”。天皇的地位由作为主权者的日本国民的意志所决定。宪法规定天皇只是在礼节性方面代表国家进行活动,不具有任何实质上的政治权力。

旧宪法是君主立宪制,统治权由天皇掌握。内阁不是对议会而是对天皇负责。统帅军队的权力独立于内阁之外由天皇持有。由于这种统帅权的规定,使它在30年代成了军队推翻政府的工具。新宪法在形式上采取了君主制,而实质上是与共和制相

近的政治体制。新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是作为立法机关的国会。由于保留了天皇因而未采纳有人提出的总统议案，用议院内阁制作为行政机构。

第二，放弃战争和非武装宣言。新宪法第9条中规定，“永远放弃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永远放弃以武力相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还规定“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将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

这种大胆的非武装规定是依据1946年2月2日麦克阿瑟笔记中的指示而定的。据说这个观点早在1月24日麦克阿瑟与币原会谈中就已产生。但究竟由会谈的哪一方率先提出并不清楚，不过可以说，这是深刻体验了战争的日本方面的反省与希望完全排除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美术方面的要求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晶。

麦克阿瑟提出的非武装的想法，当时也遭到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波伊多及凯利斯等人的反对，但后来基本上还是原封不动地写进了日本政府的草案中。

不过，第9条的规定在审议过程当中，还是经过了重大的修改，审议宪法草案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在1946年7月到8月期间，由芦田均委员长提出在第9条第2款中插进“为达到上述目的”这几个字。这部分通常被读成“为了坚持放弃战争的方针而不保持武力”。当然，如果牵强附会，也可以读成“不保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武力（即这个目的以外的武力可以保持）。”提案者芦田说，他的意图是表明“并不放弃为了自卫而进行的战争和行使武力。”盟军总司令部注意到了这种修改的含义也许会导致日本将来的再次军备，但他们还是默认了。因为盟军总司令部也认为日本永久性非武装是不现实的。

远东委员会也认为此修改可能会导致日本重新武装，苏联、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都向美国代表追究此事。盟军总司令部让日本政府在宪法草案中(第6条第2款)插入“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都必须是文官”这样一段话。最后远东委员会对经过上述修改的宪法草案表示认可(1946年9月25日)。美国对日政策原来就包括有文官制的要求,因第9条明确写进非武装规定,所以考虑没有必要把文官制再写进宪法。现在因感到日本有重新武装的可能,所以急切地插进文官统治的条款。

新宪法制定后不久,日本政府正式解释了第9条的完全非武装的含义。后来即使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在美国强烈要求下日本开始重新武装之后,日本也一再声称,警察预备队(后来改保安队、自卫队)“不是战斗部队”,“不是军队”。不管芦田修正的意图如何,要说保持国防军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从情理上看也是不合的,在体验了战争之后,日本大多数国民毫无疑问把第9条理解为是非武装规定,并对此表示欢迎、接受。因此要无视大多数国民的感情是不行的。

人权、自由权和社会主义

新宪法的第三个特点是确立了人权和自由的概念。在这部新宪法的第3章(第10条—40条)中详细规定保障基本人权,废除人种、信仰、性别、身份以及门第等差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行普通选举和秘密投票,保障思想、信仰、集会、结社、行为、学术自由,废除检查制,确立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原则、禁止拷打和摧残等刑罚,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力,等等。

旧宪法是将天皇主权和主张民权互为折衷,所以虽说倡导信仰、行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加了很多附带条件,如“在法律范围内”“不违背臣民的义务”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自由也被明显地限制,警察对人权的侵犯及拷打更是家常便饭,对共产主

义者等批判体制的人更是严加迫害，在战时体制下这种控制和镇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旧宪法中保持贵族身份制度，法律上也恪守夫权家长制，男女差别很大。

新宪法开宗明义，宣布“基本人权不容侵犯，是永恒的权力”（第1条和第97条），并详细规定了保障方法，以防战前体制的再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宪法使1776年美国革命（独立）及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倡导的保障人权，终于在20世纪中叶进入了日本。

第四、新宪法中写进了保障人权和自由及保障一系列新的社会权利。保障国民享有“经营健康的文化生活设施的权力”，提出“提高、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是国家的义务（第25条），规定了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力和义务教育（第26条），指出“工作”是国民的权力和义务，其基准必须由法律来定（第27条），保障劳动者的团结权和集体交涉权等（第28条）。

这些规定表明，新宪法虽然是以古典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但同时，它又包含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即为了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出现的深刻社会问题，欧美国家也正在摸索和引进的新体系。

这里体现的，一方面是国家对国民负责的福利国家思想，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者的组织化来提高他们交涉能力的方法论。

作为推动日本这次改革的主导力量的美国本土，原来是与古典自由主义相结合的自由竞争市场万能的 思想极盛行的地方。它对引进社会保障和认可劳动者的团结权是很消极的，认为组织劳动工会是违反垄断禁止法的。但是这些观点在经历了1929年大危机及1933年的新政实践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转向追求混合经济体制。

在高野岩三郎的宪法研究会提出的宪法草案纲要中，也包括了一系列社会权的主张。这个草案纲要是日本国民通过自身历史的体验而产生的。盟军总司令部就是参照了这个纲要。可以说，它反映了当时日本改革的知识分子的见解，并通过占领军进入了新宪法。

新宪法是占领军直接强制下产生的，日本方面的审议受到了制约。当时有人认为新宪法草案应经过国民投票才能生效，但最后也只是由枢密院和帝国议会参加审议而已。尽管如此，新宪法的内容与当时日本国民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和感情还是比较吻合的。如上述的第9条中的和平主义观念和声明放弃武装的内容，对于刚刚经过战争惨祸体验的国民来说是符合他们的心愿的。后来由于战后冷战的发展，美国本身首先感到有必要修改日本非武装的宣言，并要求日本重新武装。但是上述理想主义的条款一经采用后，就已决定性地使旧军部土崩瓦解，再也不可能重建。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也可以放心地让日本重新武装了。

美国从稳定占领考虑，承认了天皇制的继续存在。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大多数日本国民不希望出现废止天皇制这样激烈变革的愿望。根据当时的舆论调查，主张天皇废止论者也居少数。象征性的天皇制，是尊重当时日本国民大多数意见而进行的通情达理的改革。而作为舶来品的政治制度，就当时来看，可以说是没有比它更完美、更彻底的民主主义了。

选举法、地方自治、教育改革

与修改宪法并行或相应进行的还有其他有关制度的改革。其中之一即是选举法的修改。关于修改选举法，早在战后不久的东久迩宫内阁领导下就已进行了研究。在1945年10月11日麦克

阿瑟向币原首相提出的5项改革要求中就包括要让妇女参政。币原内阁于10月13日表示即将修改的选举法中,包括有妇女参政、放宽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人的年龄限制。选举法修改案于12月14日在国会通过,17日公布。根据修改案,具有选举权者的年龄下限从25岁降到20岁,具有被选举权者从30岁降到25岁;女性享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46年4月10日举行的战后首次大选,就是按照新选举法进行的。新宪法废除了贵族院而设置参议院。为此,1947年2月24日公布了参议院议员选举法。选举资格与众议院选举一样,但是被选举者的年龄限在30岁以上。同年3月31日公布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正案,又对限制选举权的条款进行了调整,扩大了选举权。

新宪法的第8章提出了“地方自治”(第92至95条),其中第93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长官、地方议会议员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官员都由该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直接选举之”。为此修改了东京都制、府县制、市制、村镇制,并于1946年9月27日公布。

日本近代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确立是在实施了1889年宪法以及实现了市制、村镇制、府县制以后。但是由于中央集权主义严重,府县市都受内务省的管辖,市镇村都由府县知事监督。虽说府县议会和市镇村议会的议员都需经过普选,但是镇村议会选出的镇村长须有内务大臣的认可,市长由内务大臣从市议会推荐的候补者中任命。府县知事则更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国家行政官员。1910至1920年,虽然进行了加强自治的修改,但30年代以后,战争气氛浓厚,遂又变本加厉回到中央集权,特别是1943年又进行了修改。把东京府和东京市合并成东京都就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

战后改革的结果,强化了地方议会的权限,确立了居民直接选举知事和市镇村长的制度。内务省反对直接选举知事而主张

间接选举,但被盟军总司令部顶了回去。新宪法公布后,有关都制、府县制、镇村制的法律都被统一了起来,并在1947年4月17日作为地方自治法予以公布。有关众参两院议员、都道府县知事、市镇村长、地方议员等的选举法律都归纳进1950年4月15日公布的公职选举法内。

盟军总司令部对强化地方自治非常热心。它创设了“自治体警察”(1947年12月17日公布),以便使警察制度分权化。还创设了“教育委员会”(1948年7月15日公布)。所有的市以及人口满5千人以上的镇村都可设置独立的自治体警察,除此之外的归国家地方警察管辖。这一制度直到媾和条约生效后的1954年、新警察法成立后才被取消,并实现了都道府县警察一体化。教育委员会当初是经普选产生,1956年改为由知事和市镇村长任命制。

新宪法倡导保障基本人权和男女平等,为此民法与司法制度也必须进行修改。1896年(明治29年)制定、公布的民法是重视“家族”的夫权主义体系。新宪法实施后,为了使之相应配套,首先用了应急法(1947年7月3日执行)。后来到1948年1月1日才开始正式实施民法修正案,它否定了嫡系长子优先的家长继承制以及“户主权”,并保障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1947年11月15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取消了批判天皇而构成的不敬罪以及以有夫之妇为对象的通奸罪。

盟军总司令部还对教育制度改革倾注了很大力气。麦克阿瑟为了确立日本新教育制度,要求从美国本土派遣使节团。1946年3月5日以伊里诺大学校长G·D·斯突达得为团长的27人教育使节团来日。使节团3月31日提出报告书,力陈自由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搞地方分权、实行六三三学制、民主地改变教科书、进行日本国语改革(罗马字化)、及男女共学制等等。提案的大

部分后来都得到实施。1947年3月31日公布并开始实施教育基本法。

1947年4月起学制改为六三三四制。在战后经济窘迫的时代要设置义务制的新学制中学，对于各市镇村来说是一笔极大的财政负担，但大多数国民都支持这种改革，欢迎这种教育机会的扩大化、平等化。后来，旧学制的中等学校改为三年制的高等中学，旧学制的高等中学、高专以及师范学校等与旧学制的大学一起改为新学制大学（四年制，仅医学系为六年制）或者短期大学（两年制）。

过去的双轨型学校制度改成了单轨型，普及了男女共学制，大学也对女子开放了，强化了机会均等思想。这一切提高了国民对教育的关心，为后来经济生活的提高以及升学率的急速上升打下了基础。

3. 土地改革和劳动基本权

第一次土地改革

占领军对政治、行政制度进行变革（以修改宪法为代表）的同时，还着手对经济制度及经济组织进行了变革。其中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劳动基本权的确立、解散财阀、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制定垄断禁止法等等。在这些改革中，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被日本有关人士认识得最清楚。

战前的日本虽然工业迅速发展，但是就业人口的近半数属于第一产业（农林水产业），人口中过半数住在山乡渔村。所谓“半农业国”的特征并未消除。据国势调查，193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者占49.4%（其中农业占46.8%）。因战时经济的发展和战争动员，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率稍有下降（1940年为44%），到

了战败后,由于取消征兵、解雇、疏散以及城市遭战争破坏、从外复员和士兵撤回等等,据1947年的调查,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又上升到53.4%。这一比率和1920年(大正九年)基本相同。

生活着日本过半数人口的山乡渔村还处在“寄生地主”的支配下,不少研究者认为“寄生地主”是属于“封建遗制”。寄生的土地所有制的规模、形态因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一般都是由不亲自经营农业、而依赖收租生活的大大小的地主支配着全国大部分耕地。

战时为了维持农业生产,日本政府实施了控制地租的政策,以保护佃农。在此之前,佃农要把50%左右的收入以实物形式(主要是大米)缴给地主作佃租。农民极度贫困,地主的经济力量却越来越膨胀。20年代至30年代,由于经济不景气,农民更加贫困,在日本各地出现了佃农要求减免地租以及阻止地主收回土地(确保耕作权)的斗争。政府站在维护地主财产权的立场上,镇压了农民运动。

农村的贫困是战前日本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它也是青年军官们谋求变革、走上国家主义的动因之一。农村的贫穷又与城市工人的贫困联系在一起,在穷苦的农村无法生活下去的人们涌入城市,不得不在低工资、恶劣条件,以及无视人权的劳务管理下劳动。

无论是右翼的国家主义,还是左翼的共产主义,这些谋求激烈变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广泛展开,其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的极度贫困以及不公正激起了人们的仇恨。

1945年10月,在币原内阁的松村谦三农相的领导下,农林省农政局很快搞出了土地制度改革案。其主要内容如下:

(1)佃租用现金缴纳。

(2)强制地主把土地转让给佃农,使之成为自耕农。

(3)民主地改革农田统制机构,把土地委员会改为土地改革推进机关。

根据这一改革案,将把不在地主(即不住在村内的地主)的所有租地以及在村地主超过一定面积(全国平均为3公顷)的租地,强制性地转让给佃农。这个方案如果实施的话,全国大约一半的租地将成为强制转让的对象。

但是,农林省这个方案首先就遭到内阁会议的反,他们将在村地主的保有份额从3公顷提高到5公顷,这一修改使作为强制对象的在村地主从100万户减少到10万户。然而这个方案还是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而难以审议。

早在战前和战时,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就想推进土地改革,他们考虑到,为了解决农村这一社会问题,为了增产粮食,就必须保障农民的权力、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使之能有必要的积蓄来改善农业经营。但是,帝国议会的政治家们许多都是扎根于地主阶层的,他们绝对不答应那样做。

面对这种状况,盟军总司令部单独起草了“关于土地改革的备忘录”,于1945年12月9日递交给日本政府。在此推动下,日本议会只得在12月18日批准了“土地改革方案”(1946年1月20日实施)。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土地改革”。

第二次土地改革

盟军总司令部官员对第一次土地改革公开表示不满,并说:“这仅仅是第一步”。对日理事会的英国、苏联代表也批评说改革不彻底。苏联提议,把大地主的土地无偿没收,分配给农民。英国提议,把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减少到1公顷。英国这一提案是英美为了对抗苏联提案、两国悄悄合作共同准备的,它成了盟军总司令部劝告日本政府的基础。

1946年6月17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劝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对超过地主应保留限度的租地，由政府强制收购，然后优先转售给当时的(1945年11月23日)佃农(在第一次改革时，没有政府强制收购的规定)。

(2)在村地主保留的租地，内地定为平均1公顷，北海道平均定为4公顷，保留面积的计算单位以户数为准。

(3)对于居住在都市的地主不承认其保留土地，即使是居住在邻近的市镇村者仍作为不在地主。

(4)改革的实施期限为2年(第一次改革为5年)。

(5)自耕农的土地，内地平均为3公顷，北海道平均为12公顷，超过上述面积的土地可以作为买卖对象。

“劝告”还规定了佃农购买土地后的年税金水准及剩余租地的租金上限。与第一次改革相比，这次作为收购对象的土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从大约100万公顷增加到200万公顷)。改革的步伐加快了。

日本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第二次土地改革方案，并于1946年9月7日向议会提交了“土地调整法修正案”及“创设自耕农特别措施法案”，国会于10月11日通过，并分别于11月22日和12月29日付诸实施。

由于第二次土地改革的实施，日本的农户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农林省的调查，截至改革前的1945年11月23日，全国耕地面积的45.9%是租地，到改革后的1950年8月1日，租地面积减少到9.9%。通过土地改革“被收购或者所有权转移”的租地达到改革前租地总面积的80.1%。

通过这次改革，大量减少了佃农户数而增加了自耕农户数。对美英荷开战时的1941年，“佃农”占全农户的28%，约152万户

(借入土地占9成以上的)，“佃农”与“半自耕农”(借入土地占5成至9成的)一起合计占全农户数的48.2%，约262万户，其耕作的土地半数以上依靠租地。经过战后10年，到1955年，“佃农”减少到只占总农户数的4%，“半自耕农”也只占4.7%，两者合计为8.7%。自耕农(自己拥有的土地占9成以上)的比例从1941年30.6%上升到1955年的69.5%。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合计从1941年的51.4%上升到1955年91.1%。

小规模农户经营占绝大部分的日本农业经营形态虽没有发生很大变化，但是土地的所有权关系有了巨变，确立了以自耕农为中心的结构。即使是那些尚保留的佃租土地也被去掉了实物地租，只能收取被控制得很低的租金。这样，消除了地主的掠夺，农户的收入增加了，并可积累起经营资本及生活资料。

农村与农业的变化

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是以美英主张为基础，避开了苏联提出的革命主义的无偿没收、无偿分配的方式，采用了有偿收购有偿转卖的办法。不过，土地的转卖价格是根据土地最初的价格而定的，在当时剧烈的通货膨胀下，用年租税来偿还购买土地时的钱，实际上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户的负担。

地主由于这次改革遭到了巨大打击，原来的佃农获利最多。后来有人提出战后的土地改革没有涉及山林地主的所有权，批评改革不彻底。但是，这次改革起码带来了作为主体的农耕地所有权的变化，这不能不说是“革命的”进步。

在战后的经济危机中，政府为了抑制工资、物价的上涨，压低了官定米价，并强制农民把米卖给政府。而且，在这一时期从大陆遣返归国的不少人开荒种地，这些人的生活也不稳定。但是从总体来看，农民的粮食能自给，仅就这一点来说，农民的生

活比起面临饥饿的城市工人要舒服。住在城市附近的农户还把售给政府余下的大米和其他农作物用黑市价格卖给“中间商”或出来抢购的城市居民，用来换取现金或衣料。战前，农村的生活水准比城市低得多，尤其是现金的收支极少。战后这一差距缩小了。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也从为了维持城市居民的粮食配给和抑制物价转向稳定农户收入、支持米价。

土地改革的成功使以农村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战前，要求降低佃农租税、确保耕作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2年（大正十一年）日本农会成立以后，逐步建立了全国组织，但在分裂和镇压下崩溃了。战败后又试图重建，1946年2月9日建立了新的统一组织日本农会，但不久又重新分裂，随着形势的变化，最后丧失了战斗力。围绕着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方针，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也存在着对立。日本共产党主流派在50年代还坚持认为，土地改革是骗局、日本农村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半封建制式”的“寄生地主制”。由于日共偏离了现实，因此在农村丧失了影响力。

农会的领导及社会党、共产党的活动家们也同盟军总司令部及农林省的政策相呼应，主张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彻底的自耕农主义。这是对强烈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的农民的愿望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后来，农业问题专家玉城哲提出疑问，“除了这种单纯的自耕农主义以外，别无它途了吗？”并指出，可以尝试一下农民“以村为单位”的新型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利用组合（据玉城哲《稻作文化与日本人》P.174—175）。

甚至连左翼势力也没有考虑到把综合的农业政策结合起来的合作式农业经营，事态直接转向以自耕农为中心的体制上去了。这样就削弱了农村的革新势力、重建并强化了保守政治的基础。玉城指出：“甚至可以说，战后30年保守政治的出发点是始

于土地改革选择了自耕农主义。”

与农会衰退相对应，盟军总司令部领导下的重建的农业协同组合却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战前的日本农村，根据产业组合法，作为信用、销售、购买利用等共同事业的组织，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建立了产业组合及各类农业团体。这些团体在战时的1943年3月都合并成农会。战后盟军总司令部在农村采取了重视农业协同组合的政策，在1945年12月9日的《土地改革备忘录》里也强调了其必要性。日本政府按照盟军总司令部的政策，决定了将农会改组为农业协同组合的方针，并在1947年11月19日公布的农业协同组合法和农业团体整理法中加以具体化。

盟军总司令部在1948年12月12日又发表了“农民组织的16项原则”的文告，叙述了对农协的要求及期待。其后，由政府给予补助金，成立了全国农协中央会（1954年11月）。农协负责组织农村的经济活动，完善以农户为中心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与此同时，它还代表农业者同政府谈判米价及协商农业政策，成为巨大的压力团体。

农村的社会运动，战前的租地斗争中可以经常见到的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情况基本消失，社会政治运动的主要内容转化为，在政府的粮食管理制度、全面的补助金行政、政策金融等管理之下，农业者团体参加谈判，参加调整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

工会法的制定

土地改革给农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而给城市工人生活带来巨变的是以确立劳动基本权为中心的一系列变革。

美国政府和军部对于这个问题也早在日本投降以前就进行

了研究,确立了大致的基本方针。主要内容是废除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等镇压工人团体活动的法律及机关;保障劳动者团结权(组织劳动组合的权利)和团体交涉权;用法律规定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

美国方面认为,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就必须使城市 and 农村一样,防止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人们贫困化、缩小贫富差别。美国并期待强有力的健全的工会能成为保卫和平及民主主义的强大势力。

战前日本纺织业依靠极低的工资和无视人权的劳动条件发展了出口,使一些发达的产业国(尤其是英国的纺织业)经济受到很大打击,日本这种通过恶化社会生活条件来拼命对外倾销的做法遭到了人们的责难,也引起了倡导公正地进行国际竞争的联合国的关注。

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投降后美国对日初期方针”曾强调,对于立足于“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工人、产业、农业组织的发展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向币原首相提出的“五大改革”中也包含了“发展工会”。1945年12月28日SWNCC(由国务院、陆军和海军三部组成的“调整委员会”)决定的“关于对待日本工人组织之态度”的文告也要求日本政府保障工会自由发展。

同时,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也确实开始组织起来了,以便在战败引起的混乱时期能维持就业和改善待遇。战前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及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也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这种不迫切保护生活条件就不能生存下去的背景下,日本工会迅速发展了起来。

在战时,日本政府镇压、解散了自发的工会,组织了经营者和劳动者一体化的大日本产业报国会(1940年11月成立)。产业

报国会是内务省及警察领导下的官方组织，以动员国民参战为目的。不过，它为战后建立工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战前的自发工会的影响力是比较有限的，而产业报国会则是按官方意图而建立的，因此以各企业为单位编成了网络式组织。产业报国会为战后在各企业或各工厂矿山迅速建立工会奠定了基础。

战前日本也曾经研究过需要制定一种工会法，以承认劳动者的团结权、确立劳动运动和劳资交涉途径。1919年（大正八年），政府、经营者团体以及工人团体曾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协商，1925年当时负责该问题的内务省甚至准备了工会法案。由于经营者团体的猛烈反对才未实现。

1938年1月设置了厚生省，工人问题归它管辖（劳动省设置于战后1947年8月）。厚生省在日本战败前夕开始了工会法问题的研究。与土地改革一样，日本政府机构对于这个问题也很早就进行了准备。

币原内阁根据占领军的意向，让芦田均厚生相赶快起草了工会法案。该法案于1945年12月6日递交国会，12月22日获得通过，1946年3月1日实施。议会对此案的审议时间极短。法案经过盟军总司令部的修正和赞同，并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压力下通过。接着，开始起草、审议、决定劳资关系调整法，以使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能仲裁、调停日益急增的劳资纠纷，并使之制度化。此案于1946年10月13日实施。

工会的形成

占领初期的盟军总司令部对工会运动的自由化很热心，尤其是负责这个问题的经济科学局劳动课更是起劲。

但是当被解放的工人运动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强大影响之后，在盟军总司令部里认为改革过头的批评声高涨起来。盟军

总司令部转而开始让推进改革的“新政派”归国，并对工会的活动加以限制。尽管如此，战后由于确立了劳动基本权，工会还是成了日本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一环。

由于工会法的制定，工会才首次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和保护，并确立了团体交涉和团体争议的权力。那种仅仅由于参加了工会活动而被经营者解雇或调遣工作的现象被取缔。战前，组织工会会遭到种种阻碍，当劳资发生争议时，不仅会利用经营者雇佣的暴力团和破坏罢工的工贼，而且还制造口实动用警察介入，逮捕工会活动家。战后，类似上述的现象也多次出现过。为了巩固工会的权利，还需要工人本身加以斗争。不过，从法律体系来看，战前和战后毕竟是大不同了。

由于这种变化，在战后日本，工会作为制度化的交涉团体的地位被确立了。在战前的1936年（这一年是战前工会人数达到高峰的一年）工会共有973个，人员有42万人。到战后的1949年，工会达到34688个，人员达到666万人（据内务省及劳动省的调查）。

盟军总司令部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制定有关劳动条件问题的工人保护法和失业保险法。战前，作为日本工人保护法的有工厂法（1916年实施，后经过修改、强化）。工厂法禁止儿童就业，对少年及妇女就业的时间加以限制。1929年以后该法又加进了禁止妇女在纺织行业深夜工作的规定。工厂法的制定多少有些效果，但是其基准极低（例如对保护对象——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规定为12小时），还有不适用工厂法的例外规定，因此是很不健全的。同时，实施工厂法的体制也不完善。

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工作基准法，规定了普遍的工作条件基准（1947年4月7日公布，同年9月1日实施），以此取代了工厂法。工作基准法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制，禁止不满15岁的少年就业，对妇女及青少年的工作时间及工作性质作

了限制,禁止强制工作(依靠暴力、威胁、监禁来强制工作),排除中间剥削等等。

此外还制定了保障失业者生活的失业救济法、失业保险法,并于1947年12月1日正式公布。在此之前,类似保障失业者生活的法律只有1937年实施的“退职积累金及退职救济法”。战后的失业救济法、失业保险法是日本首次引进以救济失业为目的的社会保险制度。

4. 解散财阀和禁止垄断的政策

批判财阀

解散财阀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分集中的政策也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留下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反垄断政策是直接以日本的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为目的的,但其背后也是美国本身在国内竭力推行反垄断政策的延续。

在战前的1938年4月,罗斯福总统就向议会递交了《反垄断白皮书》,说明了改变经济力量集中的必要性。对此,国内设立了一个称作“临时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的机构(TNEC)。TNEC于1941年发表了一份详尽的报告。那是在日美开战的年代。这份报告中的提案于战后付诸实施。

就这样,反垄断政策就成了罗斯福政权的新政政策后半部分的重要主题。由美国占领当局制定的日本的反垄断政策对新政推行者来说具有试验的性质。

在前面提到的“投降后美国的初期对日方针”中规定,“应该加强旨在解散日本大部分具有统治能力的财阀康采恩的政策。”1945年10月15日,美国占领当局的经济科学局长R·C·克莱马上校就此问题发表声明,阐述了解散财阀的目的:

(1) 粉碎具有整体垄断力量的经济势力,使日本的军国主义不能重建。

(2) 使财阀退还在战争中所获得的巨额不义之财,让战争不是有利可图的事业这一思想在日本人的头脑中扎根。

美国占领当局当初采取了等待日本方面自行解散财阀的态度。但是,各财阀总公司的首脑所提出的改革方案都未使美国占领当局感到满意,最后,还是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提示和压力下开始解散财阀。

财阀是指以同族资本为核心开展多边实业活动的大企业集团。强大的财阀一般由中枢机构(财阀总公司或与其相当的核心企业)及属下企业群组成,中枢机构通过持股和官员的派遣等形式统治企业群。但是,从部分来看,每个财阀历史起源不同,组织形态、产业领域、规模也是多样的。三井和住友等系,起家于江户幕府时期的商业或矿业,而三菱(岩崎)、安田、浅野、大仓、古河、片仓和涩泽等在近代产业的发展中,因政府增产兴业政策的推行而得以形成。日产(鲇川)、日室(野口)、森、日曹(中野)和理研等新兴财阀则创立于第一次大战后的重化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

多数财阀都由创始者同族拥有财阀总公司的股份,再由财阀总公司拥有属下企业群的股份,且股份都不上市。由于这种形式具有排他性,经济力量过分地向这种封闭性财阀集中,在战前社会问题尖锐化时,也曾受到严厉批评。30年代,右翼势力和军部攻击了财阀。1932年3月三井财阀总公司(三井无限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就被倾向国家主义的日莲宗的井上昭血盟团员暗杀。在同年的五一五事件中,三菱银行也被纳入袭击的对象。受到冲击的诸财阀纷纷被迫将一部分利润捐献给社会事业,或把下属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公开上市。这些动向当时被称之为

“财阀的转向”。

新兴财阀是财界的新成员，它需要寻求水力发电用地和重工业资源，因此，积极地开拓殖民地。军部和革新官僚对旧财阀持批评的态度，而对于新兴财阀，在朝鲜和满洲的殖民当局则主动采取了引诱、支持的政策。旧财阀进入旧殖民地并不一定具有积极意义。不过，一部分旧财阀同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逐渐密切，在那里投资了一些工厂。

在中国大陆从事实业活动的三井财阀体系的骨干企业、三井物产的职员森格，后来成了政治家，他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担任了田中义一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外相由田中兼任）、犬养毅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等职，他与军部联合向中国大陆推行了扩张政策。担任了三井无限公司常务理事的池田成彬在职时指导了财阀转向，他于1937年任日本银行总裁，于1938年和1941年分别担任第一届近卫内阁的大藏相兼商工相和枢密院顾问，参与了政府的核心活动。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财阀的领导阶层处于与当时的政府和军队的领导阶层能紧密接触的地位，所以，战后在涉及日本的战争政策时，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追究财阀责任的呼声。随着经济的军事化，支配重工业的新旧财阀得到了许多武器和军需物资的研制和生产的订单，从而扩展了财阀的实业活动。

解散财阀

在战前、战时的日本经济活动中，财阀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

1945年秋天，即在指定解散财阀的时候，十大财阀下属企业的实缴资本金额合计占全国公司实缴资本金额的35.7%，仅就四大财阀而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就达24.5%。按产业门

类看,在金融业,十大财阀的比率占53%;在重工业(包括矿山、化学),达到49%。在金融业,安田(后来的富士银行体系)、三井和三菱的占有率很大。在重工业领域,三井、三菱、鲇川(日产)和住友处于优势地位。在与此相对的轻工业领域,则三井的占有率就比较大。十大财阀在信托业、机械仪表工业、海运业、陶瓷工业、矿业和银行业中的占有率为50—85%。在金属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仓库业和商业贸易业中具有20—42%的占有率。财阀通过金融机构和商业公司的活动,能间接施加影响力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从1945年10月至11月,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之下,四大财阀的解散方案由各财阀总公司的干部与政府制订完成,11月4日提交给美国占领当局。美军当局于11月6日虽然表示基本上认可这项方案,但又向日本政府递交一份照会,表示要在直接监督之下,进而强有力地推行财阀的解散,并指示设立持股公司清理机构。

政府于11月24日作为波茨坦敕令,公布了“限制公司令”。这个敕令规定资金在500万日元以上的公司要转让、解散;指令四大财阀总公司的财产及权利转移;并冻结资本为解散作准备工作。自此以后,120家与财阀有关的企业被指定为限制公司。

1946年4月4日,美军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有关“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的照会。4月20日公布了“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令”(也称“波茨坦敕令”)。

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于8月9日成立,开始从事解散财阀的工作。自1946年9月6日至1947年9月26日该委员会进行了五次指定,作为持股公司的各财阀总公司和同样通过持股方式控制诸多子公司的实业公司合计83家公司被指定为限制对

象,其所持有的股份即将被处理。并且,属于财阀家族的6名个人受到指名,其拥有的股份也都将被处理。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一旦同意转让之后,这些股份,采用向该企业的职工出售、或以投标形式出售、或在股票市场出售等方法进行处理。作为纯属持股公司的财阀公司都被迫解散。

1946年12月,财阀家族的56人被解除实业上的领导职务。1947年1月,在245家大企业公司处于重要地位的约1500人被指定解除公职。进而,1948年1月根据“排除财阀同族统治力量法”,财阀体系的企业约1600家公司的干部合计约3600人被纳为调查对象,其中约2300人被解职。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原以持股和派遣人员控制企业群的财阀形式被排除了。

排除经济集中的政策

解散财阀的目的是要消除跨多种产业的私人统治中枢,同时,削弱各产业领域中大企业统治市场的能力。1946年1月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向日本派遣了以落斯威斯坦大学教授科因·爱德华兹为团长的专家调查团。同年3月,调查团提出的报告中指出,为解散财阀,不仅要打破企业之间的联合以及企业之间的主从关系,还需通过分割企业本身来分散所有权。这一观点被纳入1947年4月27日通过的SWNCC302/2文件。根据美国的提议,远东委员会也于1947年5月13日制定了具有同样内容的“排除日本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计划。”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7年12月9日,“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排除法)在国会通过并成立,于12月18日公布、实施。这一法律规定,对被指定的大企业进行分割,实际性工作与解散财阀同样委托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办理。持股公司清理委员会于1948年2月7日指定工矿业部门257家公司为排除对象,到

2月21日又指定了销售、服务部门68家公司为排除对象。麦克阿瑟2月7日致函日本政府，强调了排除集中的必要性，并表示支持以上政策。

但是美国国内却对此反响极大，批评对日本的反垄断政策过分，特别到1947至1948年前后，为对付冷战，要求修改反垄断政策的意见高涨起来。有人认为过分地反垄断政策使日本经济难以重建，这样会给美国的远东战略带来不良后果。

1948年3月11日，美国政府告知麦克阿瑟，撤回美国支持10个月前由远东委员会制定的“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计划”。盟军总司令部不得不根据美国政府策略的改变而缓和了反垄断措施。

1948年4月19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表示不应把银行作为排除集中的对象，排除集中的对象至多控制在20家公司左右等。美国政府为在实施中缓和排除集中政策，1948年5月向东京派遣了由纽约造船公司总经理坎伯尔为首的五人委员会。

经过以上反复后，1948年12月至1950年1月之间，根据“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对18家公司进行了处理。王子制纸、日本制铁、三菱重工业和大日本麦酒等11家公司被命令分割。日立制作所、东京芝浦电气和日本通运等7家公司被命令处理一部分工厂及子公司（分离独立或出售）。

日本制铁系根据1933年“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法”，由国营八幡制铁所同7家民间公司联合成立的半官半民的国策公司（营业开始于1934年2月）。在排除法指定前1年的全国生产能力中，它的生铁占有率为85.9%，钢锭占有率为41.8%。该公司被分割成八幡制铁和富士制铁两家公司，两公司均作为纯民间企业开展业务。后来两家公司于20年后的1970年3月再度合并成为新日本制铁。

三菱财阀的骨干企业，也是军需产业的代表企业三菱重工业(武藏战舰、零式战斗机均由该公司生产)，当初有人提出将它分成6家公司，但结果分割成东日本重工业、中日本重工业、西日本重工业3家公司。3家公司在被允许使用三菱的名称以后，分别改称三菱日本重工业、新三菱重工业、三菱造船，1964年6月重新合并建立三菱重工业。但1970年三菱汽车公司又从该公司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公司。

除了根据“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而进行处理措施以外，盟军总司令部于1947年7月3日又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商社的备忘录”，要求“立即彻底地”解散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两公司分别是三井财阀和三菱财阀的核心企业之一，被认为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上都具备很强的控制力量。至此这两家公司被盟军总司令部直接解散了。1947年11月30日，两公司正式解散，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的人员及资产被迫分别遣散到170家公司和120家公司中去。

对于三菱重工业、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分割或解散而产生的各个新企业，盟军总司令部命令其禁用三井、三菱等旧财阀的名称。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旧三井物产体系和旧三菱商事体系下的企业，又分别实现大联合，从50年代中期到后期，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又完全复活。

在电力事业领域，战前分散于各地的电力公司在向战争经济的转移中，被清理统一，实现了国家统制。按照1938年确立的“日本发送电株式会社法”，在各电力公司以实物集资电力设备的基础上，成立了日本发送电有限公司(日发，1939年)。由于1941年的“国家总动员法”的强化，电力设备更进一步地完全统一到了日发，实现了电力的统一管理。同时，全国九大街区设立了9个配电公司，确立了配电的地区垄断体制。

1948年2月22日,日发与9个配电公司都被指定为排除法的对象,后来想通过特别的立法措施,重新建立电力事业。日本反对分割日发的舆论很强烈,电气事业工会(电产)提出了发送、配电一元化的方案以及都道府县公营配电事业方案,但盟军总司令部坚持要求分割。1950年4月,旨在恢复九电力体制的“电气事业重新组织法案”提交到国会,其内容是解散日发及9个配电公司重新组合……。但因遭到在野党的反对而未成立。结果,还是根据麦克阿瑟的备忘录颁布了波茨坦敕令(“电气事业重新组织令”和“公益事业令”)。

禁止垄断法

“解散财阀”和“排除法”规定期限实行一次性解散或分割的措施,但,早有人指出也有必要制定一个防止经济力量集中的永久性立法措施。盟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1月6日给日本政府的有关解散财阀的指示中还包括一项规定,提出凡计划制定以下内容的法律,必须得到SCAP的认可:即“消除并防止私人垄断及商业限制,不良的系列性经营集团及不良的法人间相互拥有证券,确保银行从商业、工业、农业中分离开来,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给予公司及个人提供工业、商业、金融以及农业的平等的竞争机会。”根据这一指示,日本方面以商工省(1949年5月25日成立通商产业省取代之)为中心,开始进行研究,于1946年1月制订了“产业秩序法案”,但美军不予承认。接着盟军总司令部的经济科学局反托拉斯、卡特尔科的官员提出一项试行方案,以此为基础,拟定了禁止垄断法。日本政府同盟军总司令部经过反复谈判以后,于1947年3月22日向议会提交了一份禁止垄断法案(“关于禁止私人垄断以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很快于3月31日通过并成立,7月1日和20日施行(各条款的实施有先后)。

1948年7月制定了“事业者团体法”，规定了事业者团体的活动限制在不再产生卡特尔功能的范围内。

解散财阀，目的是要打破依靠以创始者的家族为中心的用封闭性的持股和派员关系来支配旧式产业的中枢，因此，它同土地改革一起形成了铲除日本近代制度的一条改革支柱。与此相对，“排集法”和“禁止垄断法”的内容则是一般性的反托拉斯和卡特尔的政策。不过禁止垄断法还得担负起防止财阀复活的使命。盟军总司令部中的改革派推进了这项政策，试图在日本试验性地贯彻其理想。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已包含了美国法律体系中看不到的严格的内容，全面禁止卡特尔、禁止带来过度集中的合并等项条目，虽与美国法律本质上是相同的，然而，禁止持股公司、原则上禁止公司间相互拥有股份之类的条目，在美国是没有的。

这些规定中禁止公司间相互拥有股份的条目，在1948年以后开始进行引进外资谈判时，显然成了设立合资公司的障碍。并且有关权力机构也感到在处理、出售财阀股份时，可以认可由公司收购一定数量的股份。因此，这一条目同其他两三个条目一起于1949年6月18日得到修改。这样，禁止垄断法的规定很快就放宽了。但是，仍然保留了限制公司拥有股份、禁止持股公司的规定。另外，禁止卡特尔的规定，在1953年9月1日得到修改，改为在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可的条件下允许不景气卡特尔和合理化卡特尔存在。

关于反垄断政策，美国政府和占领军以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为由，在占领中期，大幅度地趋向缓和。日本政府也从优先复兴和强化国际竞争、保证经济增长的立场出发，对禁止垄断法的各项条目作了缓和性修正。与此同时，在实施该法方面，一直采取减少实质性适用的政策，制定了很多不适用于禁止垄断法的法

令及规定，由此，通过行政指导，事实上的卡特尔广泛地形成了。

占领一结束，解散了的企业重新组合，还形成了旧财阀体系企业的经营集团。幸免于解散的银行和复活了的商社在那种“系列”中拥有很多企业，扮演了企业集团核心作用的角色。

尽管如此，解散财阀、排集法、禁止垄断法、解除公职等占领政策，起到了改组日本的产业组织、重振企业实力、改变企业性质的作用。由于这些改革，支配产业的垄断倾向和封闭倾向被打破，形成了发展竞争的基础条件。这些因素对促进后来的日本经济的增长发挥了作用。而且，后来的经济增长之高、结构变化之快，反过来又使垄断性、封闭性难以复活。

禁止垄断法，因受掌握政权的保守势力观点及通产省的影响，在复兴期和经济高速增长期所实施的日本的经济政策中，退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但是，经济增长本身使大量新企业加入各个企业，具有加强竞争的作用。战后旧财阀体系的企业集团的实际状况也同战前的财阀有本质的不同。在战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旧财阀体系的企业也加强了作为产业公司的独立性，以新的产业领域为核心，建立、发展了众多新企业。

赔偿问题

对日本政府和产业界的领导阶层来说，占领军的有关赔偿政策的动向同反垄断政策一样，是他们重点关心的对象。占领军如在赔偿问题上提出苛刻的要求，则日本产业的复兴就将受到很大的阻碍。但是，美国有关赔偿问题的方针，在占领期间逐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最终达到大幅度的放宽。

美国政府早在战争时期就对处理战后的赔偿问题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第一次大战以后，英法等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过大

的赔偿要求，这引起了德国人民的反感，助长了其后的经济混乱，成了纳粹抬头的原因之一。美国政府很重视这一教训。

按理说，赔偿问题是其他国家向被认为是挑起战争的国家索取战争损失及战争所化费用的赔偿，但查阅至今的历史，就可发现实际情况是往往由战胜国单方面解释战争原因，将全部责任推向战败国。这常常会引起战败国人民的很大不满和憎恨。并且，由于战争的规模扩大，战争所引起的一切损失和战争费用如果均让战败国赔偿，其巨大的赔偿将远远地超过了战败国的负担能力。如果强制实行，那么，在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加强的现代社会，就容易带来整个国际经济关系的破灭。美国把德、日的赔偿问题作为实施两国非军事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到经济的合理性，采取了把赔偿问题纳入具有支付可能性范围内的态度。因此，实施的原则是把重点放在征收军需产业的过剩设备上，其总额控制在支付国能维持经济自立的程度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的空袭破坏了城市，战败国的生产力显著降低，其经济复兴成了大问题。鉴于这种状况，如无视支付能力、强制索取赔偿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事态。而且，美国发现日本这个赔偿对象的军工厂的设备已属陈旧破烂。美国主动放弃了对日的索赔权，提出了把这一赔偿用于遭受侵略、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经济恢复上。这一方针早在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9日，杜鲁门总统就在其声明中明白地宣布过。但是，苏联为了本国的经济复兴，却采取了索取巨额赔偿的态度。为此，联合国没能在这一问题上统一意见。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无视西方的抗议，强行从东德征收名为战利品，而事实是大量的赔偿。苏在满洲和北朝鲜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苏联将在满洲、北朝鲜、南海参威俘虏的日本兵带到西伯利亚，强制他们从事劳

动,致使其中很多人死亡,这种做法带有以人力资源形式征收赔偿的性质。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首次讨论了对德赔偿的具体方案,由于美苏的对立而未能得出结论,只决定在莫斯科设立美英苏三国赔偿委员会。美国政府任命E·W·波烈为赔偿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是加利福尼亚的石油业者,也是一位政治家,并曾担任过海军副部长。波烈以总统特使兼大使的资格,负责了此后的对德及对日赔偿问题的的工作。

在对德赔偿问题上,由于美英与苏联的对立而陷入僵局,波烈回到美国。1945年11月13日又率领由22人组成的使节团来到日本。这个波烈使节团,同年12月7日发表了“立即实施来自日本的赔偿计划”(称之为“波烈中间报告”)。波烈使节团于1946年2月上旬解散,SWNCC负责余下的工作,在同年4月1日完成了“波烈最终报告”。这个波烈方案的基本观点,以后也被采纳进了远东委员会制定的“中间赔偿计划”。“波烈最终报告”主张彻底实行日本经济的非军事化,把日本过剩的重工业设备和日本在外资产转为赔偿,并把这些赔偿主要交给遭受日本迫害的亚洲各国。而且提出了“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不得高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标准。

作为赔偿的对象,有陆海军兵工厂、飞机、轻金属和轴承工厂的全部设备,以及钢铁、机床、造船、火力发电、硫酸和纯碱等工厂的一半设备。钢铁生产被容许的生产能力为粗钢年产250万吨。这与满洲事变前夕的1930年的生产能力基本相同(粗钢的实际产量1930年为229万吨,战争中期的1943年为765万吨)。

波烈方案比日本政府所预料的要苛刻,因此日本方面陈情要求予以放宽。考虑这一因素,远东委员会在决定“中间赔偿计

划”的阶段给予一些放宽。

放弃赔偿

远东委员会关于日本赔偿的具体化问题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政府和美占领当局考虑到如迟迟不确定赔偿问题将会妨碍日本的复兴,因此急于把赔偿问题定下来,但这一问题如同德国赔偿问题,由于美苏对立而无法进行调整。苏联已经把在满洲的日本工业设施无遗地全部拆走,并要求美国等承认这些财产为战利品。美国主张这些资产应交还给被侵略的中国。苏联对于来自日本国内的作为赔偿的设备也主张保留索取权,这不仅招致美国、而且也引起英联邦各国以及中国等国的反对。

在此期间,美国方面又出现对预定从日本拆走的设备是否适用于中国和菲律宾也表示怀疑的意见。美国的纳税者对伴随对日占领的长期化所产生的负担而表现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大,形势要求重新认识美苏冷战中日本的作用。因此,重新研究日本赔偿计划,已成了一种强大的趋势。美国陆军部为修改整个赔偿计划,决定向日本派遣由在纽约从事海外调查和咨询的马格罗公司总经理C·S·斯特莱克为团长的“对日赔偿特别委员会”。该团共由5位技术人员组成。

斯特莱克委员会于1947年1月28日来到日本,2月18日向陆军部和麦克阿瑟提交报告(“第一次斯特莱克报告”)。其内容主要有:中止按波烈方案制定的所有赔偿计划、制定新的赔偿计划;同时通知日本政府,在未来的某日将取消美对日援助;除纯军事设施外,当提高工业发展的容许基准等。

有人提议减少设备赔偿,代之以产品赔偿,但是被这个报告否定了。报告建议:粗钢的年许可生产能力为470万吨,并且为恢复日本商船队,有必要重新研究对造船能力的限制。

美国陆军部倡议重新研究日本赔偿计划的这一动向，被远东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讥讽为摆脱包袱，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陆军部仍让 C·S·斯特莱克组织大型调查团，委托该团重新研究包括日本经济自立化设想的赔偿计划。第二次斯特莱克调查团以 33 人的大阵容，于 1947 年 8 月来到日本。在“第一次斯特莱克报告”提出 1 年以后的 1948 年 2 月 26 日，向陆军部提交了另一份报告（3 月 9 日发表）。“第二次斯特莱克报告”下结论说：把在日本还能够使用的设备从赔偿的对象中删除，只拆走不需要的设备（主要是旧军用设备）。

美国陆军部又任命化学银行董事长 P·H·琼斯顿为团长，组成包括美国企业界的巨头在内的新的调查团，派遣到日本，并派陆军副部长 W·H·德雷帕同行。德雷帕—琼斯顿调查团在“第二次斯特莱克报告”发表以后不久的 1948 年 3 月 20 日来到日本，于 4 月 26 日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和朝鲜的经济地位及展望的报告”。这份德雷帕—琼斯顿报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日本确立均衡财政、削减休战处理费、修正公定牌价、强化征税、迅速设立（单一）汇率、扩大民间贸易、缓和排除集中政策等。报告强调要促进日本经济自主。报告建议赔偿的规模削减到“第二次斯特莱克报告”的三分之一左右。

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围绕这个问题继续争论，结果，1949 年 5 月 12 日，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考发表声明，阐明美国政府主张日本赔偿掌握在远东委员会赔偿计划的 30% 水准线上。中国和菲律宾表示抗议，但美国未予理会。

1950 年 5 月截止向菲律宾发完最后一批货时，日本所履行的赔偿额约相当于 4500 万美元，而与此相反，由于战败，日本所丧失的在外资产在 200 亿美元以上。因此在占领之下的日本所支付的赔偿，其规模是比较小的。

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第14条规定,日本造成损失的同盟国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个别地进行谈判,以产品和服务的形式来支付赔偿。中国(蒋介石政权)同美英一起放弃了赔偿索取权。但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与日本分别进行了谈判,根据1954—1959年个别达成的赔偿协定,日本合计要支付10.1亿美元。

另外,根据日韩基本条约(1965年6月签订)实施的对韩援助,以及对以东亚为中心的7个国家、合计为7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实质上也带有赔偿的性质。这一切都从战后日本国民的租税中支付。然而,由于日本经济处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实际上这些负担并不感到多重。结果,赔偿反成了促进日本对这一地区的贸易发展和企业介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章 通货膨胀和工人运动

1. 在废墟上挣扎

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者人数多得难以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武器逐趋先进,加上战区广,甚至有些远离战场的后方城市也遭到毁灭,非作战人员的死亡也相当多。尤其纳粹主义采取种族歧视政策,有计划地绝灭人种;有组织地杀害犹太人(其中被害人数约达600万),成为战争期间非作战人员大量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德国和日本在侵占地区的暴行,使许多平民百姓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同时,由于军队强行征集粮食等迫使许多平民成为饿殍。所以,确切地统计战争中的牺牲者和受害者是不可能的。据推测,在全世界范围内,这场战争所造成的死伤及失踪人数约达4000万。

日本从九一八事变以后,15年来不断扩大战争,使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许多民族成为战争的罹难者。至于在此期间究竟死伤及失踪多少,同样无法具体统计,据通常说法,仅仅死亡、失踪的总数就有一千几百万之多。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就有许多材料记载着日本军队在侵占地的暴行。日本军方将士兵的极其残忍的非人道行为视以为常和合乎规律的事。军队特别欠缺尊

重人性的观念及尊重人权的思想。加上蔑视亚洲其他民族的思潮猖獗,以及战争中的恐怖气氛和士兵对游击队的敌意和戒心,暴行也格外残酷。日本把朝鲜、中国等地的居民强制性大量带回国内编成劳工队,强令他们从事条件极为苛刻的劳动,或逼迫他们参加军队,使许多人死亡。仅仅被胁迫到日本本土做苦工而死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就达数万人之多。当然日本的侵略行为,导致了长期以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各国人民对日本人的憎恨;也使日本本身对这些地区有一种负疚感。

当然,战争也使日本出现了大量的死亡、失踪和伤残者。

据日本“经济安定总部”(后改为经济企划厅)1948年发表的“我国战争受害者”报告,仅仅在太平洋战争中所死的军人和随军人员就达155万人,普通日本平民30万人,合计为185万人。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数字即使仅就太平洋战争中而言也已经被缩小了,特别是平民的牺牲人数更是远远不止30万。还有,统计数字中至少还应加上从九一八事变到对英美宣战期间在中国大陆的阵亡、病亡者及战败后在西伯利亚及其他侵占地区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人数。

据日本厚生省救援局(负责复员、撤退工作的官厅)1964年3月10日提请日本国会的资料统计,从1937年7月7日(日中战争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为止,海陆军及随军人员的死者达194万,军人及家属在战败后直到复员这段时间内死亡人数达18万(其中在中国死亡7万人,在西伯利亚死亡5万人)。这个数字也包括被迫加入日本军队的朝鲜人和台湾人。根据以上统计,仅日中战争,军人和随军家属的死亡人数就达212万人。

另一方面,如空袭所造成的平民的死亡人数,仅在东京地区就达12万,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所致的死亡人数达20万左右(还不包括后来死于后遗症者)。在冲绳之战中,平民死亡

者达 15 万。塞班岛的“玉碎”，平民死亡者达 1 万。再加上由于战争结束以后所出现的混乱而造成的失踪人员据估计达 16 万。总计平民中的死亡和失踪者数共达 90 万左右。

根据以上资料和统计，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日本在 15 年战争期间直接成为战争牺牲品的有近 300 万人。

1941 年日本本土的人口（不包括在国外的日本人）约为 7200 万，加上派遣驻朝鲜、中国等地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则人口总数为 7500 万人。也就是说在战争中每 25 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死亡或失踪。此外，还有大量的伤残人员和由原子弹爆炸所致的后遗症者。

战争使无以计数的人丧生。平时人命关天的观念在战争的严酷现实中荡然无存。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军事消耗，令人不能不做认真的思考。被战争夺去生命的，不论是日本人，或不是日本人都是作为人的生命而被残酷的战争杀害的。他们的亲属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决不会忘记战争给他们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威胁，并且，在战后将带着沉重的精神创伤而生活。

复员和返国

如前引的日本厚生省救援局的资料，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战争结束时日本海陆军人数尚有 789 万（包括随军家属以及朝鲜人和台湾人。根据美国调查团的资料为 719 万人。而其他资料的数字，战争结束后加入陆军的朝鲜人为 4.5 万人，台湾人为 0.8 万人）。这个数字说明，当时的军队人数为日本国内人口总数的 10% 以上。

根据前面所引的资料，789 万人中有 434 万（55%）分布在除冲绳、小笠原以外的日本国土上，355 万人（45%）则广泛分散在中国、朝鲜、东南亚、太平洋地区、桦太（库页岛）、千岛等地。分布

在日本国内的士兵很快地就完成了复员工作，回到他们的家乡。而分散在其他地方的士兵，则由于当地国家运送日军回国的条件不足，或象中国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即发时期，或象苏联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或由于各地对战犯的审判等而无法及时回国。

其实，战争结束时在国外的日本人总数的统计并没有多大可靠性。根据1941年至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的人口调查，居住在国外的日本人中，在中国东北地区为140万、台湾地区为39万、其他地区有10万，在朝鲜的为75万，在库页岛的为39万。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后，这些地区共约有300万普通日本居民。那段时间，不少日本人在当地被动员参军，同时战争的日益激烈，有些人开始返回日本。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平民留在当地。所以，这些平民的返国比士兵的复员更加困难。

大批军人、随军家属以及侨居在外的日本人回国，使日本国内人口剧增。根据1947年7月厚生省发表的“经济实况报告”（经济白皮书）的资料，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5月底的21个月中，从国外回到日本的复员军人及回国者人数总计达536万人。如此大量的复员军人和回国人员，使粮食等其他生活物资的供应及就业机会成为战后初期最大的社会问题。

大量失业者的产生

战争的结束，日本国内由军需产业，而带来的就业机会也就此彻底消失。

战后厚生省的汇总资料表明，战时为紧急动员从事战争所需的武器生产，作为“征用工”被强迫从事军需物资生产的工人为161万人，而原来就在军需产业工作的工人也有455万人，共计616万人。

战争期间，从事战前民用产业、流通产业、服务行业等生产的从业人员，由于战时物资统制的加强，失去原有的工作。有的不得已转到军需产业工作；有的则根据征用命令强制性地转向军需产业工作。这些“征用工”，无论是“现有”的还是“原有”的，都不许自由地流动。

战时，中学以上的学生和学员也被动员中止学业去从事工作，这种被动员的学生叫“动员学徒”，再加上女子挺身队员，共达240万人。征用工人、动员学徒及女子挺身队员在从事其还未适应的工作时，事故迭出，加以军需工厂又是美军空袭的目标，因而人员伤亡不少。除此之外，被迫编成劳工队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包括一些战俘，达35万人。据其他资料表明，到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6月，加入煤矿的劳工数达396712人，其中朝鲜劳工为124025人，白人俘虏为9719人，中国俘虏为9077人，共计142821人（占36%）。另外，还有在金属矿山及其他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场所被迫做苦工的各类人员。

在煤矿，战后首先由中国劳工和朝鲜劳工发起要求改善劳动待遇，这给当时的煤矿生产带来了一些影响，同时，也成了战后煤矿工人运动的开端。

随着战后军人的复员及战时征用工人的解散，他们带着家属回家后都要寻找职业，然而找工作谈何容易。城市成了一片废墟，居住都十分困难，整个经济活动大大缩小了，要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干点黑市生意或小贩生意来糊口的机会也少得可怜。而大工厂由于军需生产的消失，大批原有的雇员也就面临失业的威胁。

据1945年12月16日厚生省对就业情况的分析，到1945年10月底为止，作为第一批复员的军人（内地）有369万人，加上由于工厂的关闭而失业的有413万人，共计809万人，此外还有75万

名女子离职。到第二批复员人员返家，军人复员者达 365 万人，从国外回国的日本人有 150 万人，共计要有 515 万人回国。两批合计共有 1324 万人(不包括 75 万名女子)都要寻找工作。

厚生省基于这种分析，制定了适合各类人员的办法，积极促进他们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同时不再鼓励妇女就业，而对男子复员人员、离职者，优先考虑其就业。即使如此，估计仍有 600 多万人难以就业。根据各官方和各都道府县的报告，在近期内，失业人数仍将保持在 400 万人。

根据 1946 年 4 月 26 日的人口调查，完全失业者(1 个月内完全没有工作)达 159 万人，1 个月里有 1 星期以下工作的为 196 万人，1 个月里有 8 至 19 天工作的为 245 万人。完全失业或近乎完全失业状态的为 355 万人。如加上 1 个月里不满 20 天工作的半失业者，共为 600 万人，即当时有 600 万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占当时 3000 万劳动力人口的 10%，如加上不完全就业者，要占 20%。

战争经济的后遗症

战后国民的生活是在极度贫困的状态下起步的。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很复杂，除战争和战败之外，还有各种关系交叉作用。

第一，在备战和战争期间，生产资料长期以来被用于军需生产，因而国民的生活基础遭到破坏。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进入准战状态，在七七事变以后，这种状态进一步得以加剧，民用部门的生产缩小，而转向军需生产。由于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出乎日本军部预想和宣称之外地长期化了，因而不得不使已日趋落后的工业生产力进一步集中到军需生产上，最后又与在重工业生产上拥有日本 10 倍以上实力的美国展开了一场大战。民用

需求受到抑制，民需生产部门的工厂建筑和工人大都转向军用部门，机器也被砸成碎铁，用作生产武器的原材料。生活必需物资的供应急剧减少，国民被强制忍受物资的贫乏。例如，以棉纱、棉织品、生丝、丝织物为中心的纤维制品是战前日本经济中较有代表性的民用产品和出口产品，且对进口军用产业的原料和军需生产的材料（废钢铁、石油及其他）和获取外汇方面有着积极影响。但它还是因战时经济的转移急剧萎缩了，棉纱、棉织品的生产在1937年以后大幅度地下降。并在大量减少的产品中，又有很多用作军需，民用需求进而受到抑制，国民实行凭票统配制度，即使不需要进口原料的人造丝和人造纤维的生产，也从1939年最高峰急剧下降，但由于它们的耐用性能差，人民对此的不满也日益增多。同样，战前较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如收音机、钟表、自行车等的生产也急剧下降。纺织机械的生产几乎全部停止。然而在军需生产部门内，也是由于机器供应不足而勉强维持开工。战前日本的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机器，战争中不可能更新设备，机器日趋老化。在民用部门，大量的机器成了军工生产的原料，保留的一些工厂仅按分配到的少许原料维持生产而已，无力进行设备更新。因此，战争结束后，虽然恢复了民用工业，但要增加供应则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原料、燃料的紧缺。战争使原材料、燃料的供应大幅度减少，这一状态，在战后仍持续了一段时期。战前，日本的铁矿石及炼铁用的焦炭主要来自中国，废钢铁、原油等则从美国进口，而纤维原料即原棉和羊毛全依赖进口。由于日本与德、意结盟，把其力量从中国大陆伸向东南亚，致使美国对日本采取了经济制裁，使日本在经济、军事上陷入困境。

日本政府将储存的石油用于战争。它起初是把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石油当成可确保的南方资源。但是随着战争的升级，船

船舶吨位不足，物资运送发生了困难。虽然政府征用民间船舶和积极建造新船，但南太平洋范围的战斗激化，需要往前线输送更多的士兵和物资，这就要有更多的船舶。加上日本又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船只损耗增多。而从南方各地区开往日本的海上物资供应线不断遭到美国潜艇的攻击。到战争后期，美国空军在日本和中国沿海设置水雷并进行轰炸，使日本海运受阻。这场战争，使日本的船舶拥有量进一步减少，将1945年底与1935年底相比较，总吨位仅为原来的34.6%，船舶只数则降低到58.7%。而且，每艘船的平均总吨位数，1935年为2871吨，到了1945年为1688吨。由此可知，大型船舶大都在战争中沉没，留下来的都是些小型船舶。

此外，战败的地位使日本濒临断绝物资输入的境地。美军出于担心日本经济危机的深化和社会的不稳定，给日本开放了若干物资，并且允许其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管理下进行贸易，提供其必要和最低限度的燃料和原材料，这就是当年日本开始经济复兴时的状况。

随着向战时经济转移，作为纤维原料的羊毛、棉花等的进口也逐渐减少，到日美正式交战后更是急剧减少。作为武器生产所不可缺少的铁矿石和煤炭，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大部分从中国大陆等地进口，到了战争末期，由于运输困难，其进口也随之急减，战后甚至有一段时期断了来源。石油直到1941年大量依赖进口，在日美交战前，日本的原油库存量接近1年的进口量，在战争中，其供应量也迅速减少，到战败前夕，石油几乎已用完。

煤炭、铁矿石、铝矾土等的供应不足限制了军工生产。粗钢产量1943年为765万吨，达到了最高峰，但自从日本领土遭到空袭以后，产量开始降低。这是由于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原料煤减少而造成的。煤矿开采业由于强制性地大批组织劳工队，其

产量一直呈增产的态势,1941年达 5647 万吨,达到了最高点(这是战前、战后初期煤炭生产的最高记录),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受钢材等开采器械不足的影响而走下坡路。

在空战决定胜败的这场战争中,日本的飞机生产远不及美国。铝的原料铝矾土的供应主要依赖东南亚(主要是马来西亚),而且运输发生困难,机身材料的供给就成了问题,于是以木材等作为机身的代用品。在对日本领土开始空袭后,飞机制造厂作为主要轰炸目标遭到破坏。为了躲避轰炸,生产设备等分散到各个地方,生产受到影响,这也是造成飞机生产降低的原因之一。

第三,战争所造成的破坏。首先是美国军队对日本领土进行空袭所造成的破坏。以马里亚纳群岛和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空军对日本领土的空袭是在 1944 年秋季以后升级的,到了战争末期,加上舰载机的轰炸和舰艇炮击,全国 206 座城市中有 98 座城市被破坏,毁坏程度以平均计,有四成烧毁,京滨、阪神、中京地区约达六成左右。对日本轰炸的主力是 B29 轰炸机群。B29 轰炸机群的 70% 以轰炸一般城市为目标。它由大群飞机编队进行空袭,向容易燃烧的日本都市投下大量燃烧弹,造成大火,使大量居民被害,直到最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用这种轰炸来大量杀伤非战斗人员的直接目的是,可以在登陆日本时,减少日本潜在的战斗能力,也是对军用生产劳动力的一种打击。分散在城市地区的中小工厂,在日本军需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破坏这种军需生产,美军认为这种把整个城市烧毁的“地毯式轰炸”是必要的。这也动摇了日本国民的心理,促其投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不加区别的大规模杀伤也被认为是合理的。B 29 轰炸机群的另外 30% 的力量主要对一些特定目标进行“精密轰炸”,以彻底破坏飞机制造厂。所以这些飞机制造厂也成了被害

者。

根据战争结束后商工省的调查，主要产业的生产设备能力，如与1944年底比较的话，1945年8月15日时的情况是：生铁62%，煤76%，机床52%，汽车50%，合成氨35%，水泥85%。这个时期生产设备能力降低的原因主要在于遭到空袭。有些行业（如铝、机床、汽车、合成氨和煤等），工厂在疏散过程中未来得及转移，也是生产能力降低的原因。

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的资料显示的数字比战争结束时商工省的调查资料要高得多。如生铁在商工省的资料中为250万吨，在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的资料中为560万吨；铝在商工省的资料中为5.6万吨，在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的资料中为12.9万吨；机床在商工省的资料中是1944年的52%，在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的资料中是高峰期（1940年）的90%。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的资料表明，化学工业和纤维工业的生产高峰是在1941年或1937年以前，而战争中有些行业生产力降低的主要原因也不仅仅是战争所致。

经济安定总部进行的战争毁坏情况调查（调查时间为1947年，发表于1948至1949年）的结果也表明，战争结束时生产力下降比较小。根据这个调查，空袭对水力发电的破坏为0，火力发电的破坏程度为30%。当时是“水主火从”的时代（1944年电力的70%是水力发电），所以，水力发电设备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对那时的经济复兴是有利的。但是战后初期，由于煤供应不足，那些未遭破坏的火力发电设备也开工不足，因而电力不足成为经济复兴的一个关键问题。

要真正估算生产设备的能力是很困难的，而这些设备即使遭到轰炸破坏甚至完全毁坏，也有可能经过应急修理而重新恢复。因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各个调查结果均不相同也不足为奇。

但不论怎么说，重工业的主要部门在战争结束时大体上还保存下了70—80%的生产设备能力，这点应该引起重视。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由于在战争中设备能力迅速增强，战争后期虽有破坏，但与战前水平相比，仍然有较高的生产能力，而这便成为战后重化工业发展的起点。

据美国调查团在日本投降后对日所作的轰炸结果的调查，所谓“精密轰炸”除了飞机制造厂，作为主要运输手段的铁路则未成为轰炸的对象。这对轰炸者来说，是没有完全达到效果，但对被炸一方，恰恰为经济复兴创造了条件。

但是，主要城市的住宅被烧毁，大量平民遭到伤亡，工厂被破坏，还有疏散中设备被拆散等等，导致了生产效力降低。据经济安定总部的战争调查，物质损失如舰艇、飞机等的损失为404亿日元，“和平财富”损失为653亿日元，“和平财富”的损失率达25%。

第四，粮食危机，粮食供应不足。粮食危机直接威胁到国民的生死存亡。这是战败后日本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日本在战前主食大米就不能自给。大米靠大量从朝鲜和台湾进口。战前日本国内大米产量由于丰收年和歉收年上下涨落太大，难以单独估计。在此通过1934至1936年3年的平均情况来看一看战前大米的供给与需求情况。

1934年至1936年的大米主要是1933至1935年生产的。这段时期国内稻米产量年均901万吨，包括农户本身的消费在内，估计年均消费1102万吨。而平均每年还要为在殖民地和中国大陆的日本人(包括军队)运去11万吨。总计大米消费量年均1113万吨，生产与消费相差212万吨。为了使生产与消费取得平衡，年均从朝鲜进口132万吨，从台湾进口72万吨，合计共进口达204万吨。此外，从其他渠道进口3万吨，总计达207万吨(尚

有若干欠缺,每年通过库存调节)。

大米的进口依赖程度占消费量的18.6%。其中,从朝鲜进口的就达11.9%。1939年朝鲜由于旱灾大幅度减产,使日本1940年从朝鲜运来的粮食急剧减少。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进口的粮食数又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从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占领区的进口增加(这当中有不少是掠夺性的行为,使当地的居民处于饥饿的境地)。其后由于海上运输日益困难,进口减少。1945年8月日本作为战败国由美国占领后,从国外输入日本的粮食则完全断绝了。

日本政府在奖励国内生产的同时,增加粮食收购的比例(以此来控制农产的消费,制止黑市交易),以保证粮食的供应。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农村劳力大量入伍,大米生产连年减少,同时,为了满足军需,导致化肥和农用物资供应不足。而滥砍山林及治水不力以致水灾频频,农业歉收。在战败后的1945年,大米产量估计仅为585万吨,只有1939年最高丰收年(1035万吨)的57%。战败后的第二年1946年便发生了严重的粮荒。

日本政府从1939年起便根据稻米统配制法实行大米的配给制,1942年以后的粮食管理法使统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把麦类、薯类均列入统配范围。配给的基本标准量为每人每天345克(对重体力劳动者等适量增加)。从战争后期一直到战后初期,不仅麦类等均属配给之列,就连蕃薯、马铃薯、大豆、豆饼、玉米、南瓜等代用粮食也被计入配给定量。而且在大城市里,就连配给的粮食也常常出现不能及时供应的情况,以至仅靠配给粮的人民难逃饥饿的厄运,如不从黑市买粮,就会饿死。1946至1947年间,配给量不断减少,代用粮食的比例仍有所上升,约达40%。尽管如此,1946年的配给量以稻米计算仅为3860万石(相当于579

万吨),为1944年5437万石(816万吨)的71%左右。

政府加强对农民收购粮的管理,并未使城市居民、战争受害者排除深受粮食危机的影响,他们之中有钱或有门路的人可以从黑市弄到粮食。当时有不少人混迹于城市与农村之间,从事买进卖出的投机交易,用战前就有的那些衣物等换取农民的米面、蕃薯之类。但由于通货膨胀的激化,农民也不愿要那些日益贬值的纸币。

那时人们典型的主食就是在仅有的麦米或马铃薯中加入菜叶,做成杂食。虽然以增加水分的办法使饥饿感稍有减轻,但却无法防止热量不足和营养缺乏。蕃薯之类成为果腹的食物使得城市里的孩子们几乎都缺少营养。他们的平均体重和平均身高也显著降低,还时有因缺乏营养而饿死的情况发生。这些人成为粮食危机的受害者。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及战争所造成的对外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日本国民的基本生存条件。

2. 通货膨胀

军费与公债

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毁坏了民宅和厂房,使工农业生产明显衰退,同时,还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支。在战争中,政府为了筹措巨额的军费,仅仅依靠所收的捐税已无济于事,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借款,其结果,给战败后的政府留下了大量债务。

芦沟桥事变后的两个月,即1937年9月,根据明治以来的惯例,设立“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把战争的费用筹措及支出和一般财务会计分开处理。所谓“临时军费特别预算”是预先决定在战争结束后再进行决算的一种特殊的财政处理方法。然而这次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持续,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远在此

前的历次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均与这次不同。这次是在国家崩溃、战败和外国军队进驻日本三重打击下进行战争决算的。

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收入，除一部分是由一般会计转入外，其他的来源于铁路、邮电通讯以及由殖民地朝鲜、台湾、库页岛等地的收入中调入。此外，还用征收特别税、军事捐款等各种办法进行筹措，而其中最多的则是公债和借款。

日本中央政府的财政战前就开始依赖于公债和借款，并且已成为惯例。在日中战争以前的1934至1936年间，政府的一般会计中公债、借款就高达29.5%，在1937至1945年，直接军事费用被划入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公债、借款的比例略有下降，这时为24.4%。而同期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收入中的86.4%是公债与借款。此外，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收入总额为1733亿日元，是1937至1945年度一般会计收入总额943亿日元的1.84倍。如把一般会计与临时军费特别会计两部分收入合并，除去重复，公债、借款占其中的68.9%。

政府以增加捐税和加强征税也未能应付急剧增长的战争费用。租税、印花税、专卖税等在战争中不断增加，公债和借款也扶摇直上。

战前1934至1936年间，海陆军费占一般会计支出的45.9%，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估计为6.1%。在中日战争期间，军费急剧上升，一般会计和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占岁出总额的73.2%，到太平洋战争期间则上升到78.1%。在战前一般会计和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岁出总额在GNP中占的比率仅占13.2%，日中战争期间为26.3%，太平洋战争时为72.5%。军费在GNP中占的比率在日中战争时为19.3%，太平洋战争时为56.7%。太平洋战争期间，国家预算占GNP的比例超过七成，而军费支出则

占了接近六成。

从以上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主要部分有大半是直接或间接地转为军费开支的，而资金筹措主要来自公债和借款，所以政府的债务急剧增加。到1937年中战争开始时，政府债务金额已高达占GNP的57%。这个比率以后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44年末期，竟然是GNP的两倍之多，其债额占该年度GNP的90%。并且一直持续到1949年，不过增加的数额所占GNP的比例相比战时少得多。这段时期急剧的通货膨胀使GNP的名义值变大，因而政府债务的余额占GNP的比率逐渐变小。

通货膨胀的结果

战后的通货膨胀，使政府在战前及战时所欠债务的实际数值锐减，作为一个巨额欠款者，就这样度过了还债的难关。当然，战时被迫购买国家债券的日本国民在战后只能得到已贬值仅有原来几百分之一的原面值纸币。作为金融资产的国债的实际价值几乎近于零。这就如同政府没收了大部分债权。

战后通货膨胀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战时及战后政府所欠的债务实际上已从帐面上消失，从而减轻了偿付这些债务的重大财政支出，避免了财政上的破产。政府虽然没有宣布停止偿还战时及战后的公债，但实际上通货膨胀与此也相差无几。而对国民来说，战时所买的国债实际上与捐税没什么两样。当然，反过来说，战后政府也没有再强制性地加以新的捐税以偿还国债。如从不同的社会层次来看，持有较多债券的人损失较大，而一些有可能缴纳高税率的人则免去了许多捐税负担。事实上，上述巨大的战时公债，并不是直接向国民发行，大部分是日本银行承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止了金本位制后,于1930年1月又对黄金出口解禁(恢复了金本位制),但是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出口并不景气,国际收支出现赤字,黄金作为对外支付的手段大量流出。于是在1931年12月不得不再次冻结,并禁止用日银券兑换黄金。这样就以通货管理制度取代了金本位制。接着在1932年6月,根据有关岁入补偿公债发行的法规,日本银行直接承兑了政府发行的公债。同时,修改了货币发行制度,取消了根据黄金储备发行日银券的限制,改为可以根据公债等有价证券的储备来扩大发行货币,即“保证发行”。

至此,辛迪加银行集团和大藏省储金部(以邮政储蓄等为资本)开始承兑公债。从那时起,日本银行直接办理政府发行的公债,通过增发等值的日银券,作为政府支出的财源。日本银行办理的公债再由民间金融机构发售,民间金融机构购进公债的资金,被政府用于支付军事支出的储蓄和日本银行用于对民间的贷款。这样,以军事支出为中心的政府支出的急剧膨胀的大部分,由增发日银券得到调节。

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末,政府债务余额比中日交战前一年即1936年增加了12.4倍,日本银行持有的国债、债券和向政府贷款的余额增加了9.4倍,日银券发行量增加了8.5倍。1944年3月底国债持有者所占的比率为:包括日本银行的特殊银行占15.7%,包括其他银行的金融机构占56.3%,以储金部为中心的政府机关占29.9%,公众和其他占13%。国债发行额的70—80%首先是由日本银行承兑,然后,相当部分再由民间金融机构售出。表面上其消化率在战争末期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日本银行的放款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因而其纯消化率反而有所下降。1944年底金融机构的存款额比1936年增加5.8倍,贷款额增加4.3倍。相比之下,贷款额的增长低于存款额。与此相应,有价

证券的保有额增加5.9倍,此外,战后1948年底,存款额是1936年的29倍,而贷款额一跃为1936年的44倍。有价证券的保有额只不过增加了14.4倍。这反映出战后经济复兴时期对资金需求的增加使贷款金额不断增大。1948年底政府债务总额达5244亿日元,日本银行持有的债券份额占63%,为3312亿日元。国家财政收支依靠日本银行增发货币,这一方法战后被直接广泛地利用。

通货膨胀的深化

由于日银券发行金额与存款金额的急剧增加,即使在战时严格的统制经济下,也不可避免地使通货膨胀。

1944年制造业生产指数不过是1936年的1.65倍,但是日银券发行量已是9.51倍。从GNP数值和以日银券名义发行的比例看,1936、1940和1948年还是在0.1—0.13的范围里,1944年则出乎意料地上升到0.24。

但是,经济规模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悬殊实际上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日中战争时期的批发物价年上涨率为5.5—21.4%,而零售物价的年上涨率为9.4—16.2%。以日中战争4年的年均率计算,批发物价上升率为12.2%,零售物价上升率为13%。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最初3年间的物价上涨稍有缓和。这3年的平均年上升率,批发物价为7.6%,零售物价为3.4%。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时统制体制的强化。但1944年物价再次上涨,批发价年上升率达13.3%,零售价上升率达12%。

战后物价的上涨率很高。战败的1945年与前一年相比,批发价上涨51%,零售价上涨47%。1946年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批发价上涨率为364%。零售价为6.14倍(上涨了514%)。1947至1948年又比上一年上涨近3倍。

战时增发的日银券和累计的储蓄存款,虽然在战时经济统

制下购买力受到抑制，但其结果却形成了巨大的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战后，人们为了维持生活，纷纷把存款取出用以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这样又刺激了通货膨胀。金融机构为避免破产，只有采取冻结存款的措施。

战后通货膨胀加剧，使以往积累起来的金融资本的实际价值迅速贬值，并且使其潜在购买力的实际规模也迅速缩小。

临时军费开支

战后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在战争结束后由于大量的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支出形成的。当然，战争结束后，军火及军用物资相应地停产了，但是已纳入生产计划的军用物资犹需付款。同时一些已向企业定货的物资因停止生产，必须对该企业补偿损失。此外，还要对军人及随军家属支付退職金，所以还需大量的款项。为此东久迩宫内阁及币原内阁都花费了巨大款额用作这项财政支出。

从战争结束到1945年8月底，支出的临时军费总计达97.34亿日元，其中陆军为55.53亿日元，海军为19.71亿日元，军需部门为22.1亿日元。9月份，陆军又支出了16.02亿日元，海军为29.19亿日元，军需部门为0.4亿日元，总计又支出45.61亿日元。这两个月的支出就达到142.95亿日元（《会计检查院百年史》P.347—348。原资料由日本银行保存），而1945年度一般会计支出中当初的预算仅为244亿日元。只要将其与那两个月的临时军费支出数对比一下，就能知道临时军费支出是如何庞大了。

为了应付庞大的临时军费支出，日本银行大量增发日银券。在战争结束前的4—7月，已发行的数额与上一个月相比增加了5.7—13.9%。这4个月的平均增加率为10.1%，一年中增发的

金额达3.17倍。同年8月，增发的金额为23.2%，9月为25.5%。在8月和9月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元货币的发行量平均增加148.6亿日元。这个数字与那两个月期间的临时军费支出142.95亿日元基本相同。日银券的平均发行量与两个月前相比一下增加了66%。

战争结束后的临时军费支出中还混杂形形色色的不正当的支出，如对企业支付的撤销订货损失赔偿和过多的预付金等。根据对临时军费特别会计决算的检查，会计检查院的报告中（1947年3月），由于战争而导致的证明文件丢失无法查证的除外，违反预算、法律、敕令的支出或作为公共物质处理的就有54件，支出金额合计为5.26亿日元。其中发生在战争结束后的有17件，支出金额为4.08亿日元。这些不正当的支出中有近80%是在战后发生的（参见前引书，P.351—353）。

对临时军费开支的批评当时就已存在，但是盟军总司令部却不予理会。财政学者大内兵卫在1945年10月17日通过NHK电台播放的“致涩泽藏相”中强调，“为废除政府战争时期的债务，应该果断些”。

盟军总司令部在1945年11月24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关于排除战时利益和重编国家财政的备忘录”，禁止日本政府对军用品的生产与供应，以及以战争造成的损失或一些军用工厂以建设和转产为由提出的支付款项申请。而且，政府或下属机构若发行公债或补助金、实行免税等措施时，也要得到盟军总司令部的认可。盟军总司令部在同一天，还发出了停止对旧军人及应开除公职的人员发放抚恤金、养老金等的指令。其中停止支付旧军人等的抚恤金从1946年1—2月起开始执行。

1945年11月24日盟军总司令部在提交日本政府的上述备忘录中，要求日本政府在1946年初召开的议会上提出法案，使

以上这些问题能得到全部解决，而这个法案必须得到盟军总司令部的许可。在币原内阁涩泽敬三藏相的组织下，对此进行立案，然后经由美国专家的建议，归纳成法案。政府认为战时补偿的支付（即补偿撤销订货企业的损失）是必要的，但是盟军总司令部却不这样认为。于是，日本政府又考虑用征收财政税来实行战时补偿，但是盟军总司令部仍然不同意。最后是取消战时补偿，同时征收个人财产税。

盟军总司令部最初的意图在于“使日本人知道战争实际上是不赚钱的，所以要没收战争所得”。但是，正因为取消了战争赔偿，所以也停止了法人上交财产税、战时所得税及个人财产增加税，只剩下了个人财产税。因而一般资产再分配和确保财源就成了当时的主要目的，对政府所支付的战时补偿，来之于战时补偿特别税。1946年10月19日公布、10月30日实行的《战时补偿特别措施法》，即以取消战时补偿和设置战时补偿特别税为主要内容。财产税法于同年11月12日公布，20日开始实行。

这些措施，虽然可使战后临时军费支出一部分得以回收，但是这些支出却形成了引起战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一方面，战时经济以及由于战争的破坏，不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都急剧下降，进口也停止了，国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战争中累积的日银券发行额和存款额不断增加，再加上在战争结束不久又大量增发货币，即使对物资实行统制，也无法避免物价的急剧上涨，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差距拉大。

增加信贷和兑付存款

停战后，政府仍继续从临时军费特别会计中支出费用，抵制盟军总司令部关于取消战时补偿的指令（其结果是盟军总司令部强行取消），其理由是避免当时与军用生产有关的企业全都陷

入绝境。政府认为为不致企业破产，有必要暂行贷款和支付战时补偿。这一应急措施，既挽救一些企业，也使与企业休戚相关的职工不步入失业行列。当然，为了直接保障工人的生活，采取另外一些辅助措施如取消战时补偿也未尝不可。不过，那样做也未必会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因当时政府确实没有替代它的救济企业的办法和高招，能保证工人就业，以及防止失业人数增多而保持社会稳定。

随着军用生产的停止，那些征用工都因为工厂无事可做而离去，留下的则是一些企业的骨干，公司便处于停工或近乎歇业的状况。而人们为了生存又必须吃饭，公司多少还得支出薪金。因此，那时到处可见用丢弃在大造船厂角落里的剩余材料制成的锅盆之类在市场上出售，借以糊口。实在支撑不下去的企业，就不得不紧缩职工人数。为此，开始出现劳资纠纷。

按盟军总司令部停止支付临时军费的指示，防止企业破产的资金就不再从财政款项中拨付。即使不这样做，临时军费中用于战时补偿的也很有限。代替临时军费支付企业补助金，是通过金融途径来提供资金。企业支付工资等当前必要的资金，靠从银行贷款来解决。银行明知贷款对象已是“本利全丢”，生产活动几乎停顿，可还是不得不进行追加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和个人，为了应付燃眉之急，把战争中积蓄的存款都提了出来。

全国银行结算的贷款额和储蓄存款额的情况表明，1945年8月和9月的存款额分别比上月底增加7—8%。这与临时军费的发放有关。可是，10月和11月存款的增加率就下降了，到了12月份和次年1月，反而呈现负数。因为支取的款额超过存入的款额。贷款额在10月暂时出现缓增之后又急剧增加。从1945年7月到1946年1月底，存款只增加17.1%，而贷款却增加45.7%。从7月底到11月底这4月期间，贷款的增加金额和支付提取存

款的金额合计达 226.9 亿日元，超过 8 月与 9 月临时军费的支出金额。

在超额支取存款而又必须增加贷款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弥补手头流动资金的不足，必须增加从日本银行的借款。于是，日本银行对民间的贷款额在 9 月暂时减少（因超额还款）之后持续急剧增加。从 9 月底到次年 1 月底这 4 个月。增加额达 173.3 亿日元。民间银行增加贷款的主要部分，就靠日本银行的信用支持。这也是这一时期日银券增发的主要原因。

虽然由临时军费支出改为日本银行向民间贷款，但通货却迅猛增发，造成物价急剧上升。随着通货膨胀激化，人们便开始采取应付通货膨胀的对策。为尽量减少通货价值贬值带来的损失，开始出现“换物”（将钱换成物）的动向。人们将战争中积蓄的存款一齐取出抢购物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银行向企业的贷款一时无法收回而又面对提取巨额存款的要求，必然要陷于破产。为防止民间银行破产，只好由日本银行对民间银行增加无限期贷款或指令停止支付提取存款。结果，为防止通货膨胀和银行破产，政府采取了冻结存款、停止提取存款这种非常手段（即延期偿付）。

金融紧急措施令

对储蓄存款采取延期偿付的可能性，在战败之时就已议论过。当时专家们认为，通货发行量已大大超过实际经济状况，收入在名义上增加并作为储蓄存款积蓄了起来。为防止战后的混乱，有必要冻结存款，以防提取存款后变成巨大的购买力。可是，采取这种延缓偿付的办法，意味着政府与金融机关对存款户的失信，因而下不了决心。

1945年 8 月 15 日，战败的当天，铃木贯太郎内阁的广濑丰

作藏相表示，“对储蓄存款将负责并确保其安全，绝不采取诸如延缓偿付之类的措施”。他还说：“为了维护通货信用，将采取防止通货膨胀的强力措施并加以贯彻实施。”接替铃木内阁的东久迩宫内阁的津岛寿一藏相，在8月17日会见记者时也说：“绝不采取延缓偿付的政策，希望国民安心，相信以国家为后盾的金融机关”。

津岛藏相在9月11日全国金融统制会召开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表示：“不可否认，通货膨胀的潜在趋势正在形成，但我确信，通过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再辅以国民的决心与努力，是可以阻止的。”当时的估计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支出停止和军需产业向民需产业转换，民需物资的供给会增加，因而可以阻止通货膨胀的加剧。所以他说：“今天物价昂贵的一大原因是工资发放过多，通过复员等办法解决劳务过剩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纠正。”

现实的情况是，政府本身不得不继续支出巨额的军费，而从军需向民需转换也不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样地容易。工业生产力大大下降，而一年只收获一次的大米产量也极度低下。公债和存款之类的国民的金融资产，名不副实成为虚有的资产。

据币原内阁藏相涩泽敬三的回忆，他曾于1945年11月同大藏省次官山际正道（后任日本银行总裁）谈到：“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笔巨额存款。这些存款全都成为虚有。还发出了相当数额的公债。如再继续发行公债，要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坚定了使这些金额资产失效，以财产税的形式回收的设想。这一时期，在大藏省内部，已经在研究在收取财产税的同时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新日元）和冻结存款等措施。

11月26日，涩泽在会见记者时，谈到将实行战时所得税、财产税、战时补偿等综合处理，同时将发行新日元。在12月的议会

答辩中,他又明确表示正在考虑发行新日元和“冻结存款”。财政负责人这种轻率的表态,对提取存款和抢购物资,起了一种强烈的催化作用。结果,政府为了避免出现惨局,不得不违背战争结束以来的许诺,冻结了存款^①。

关于货币与金融的紧急措施计划,在1946年1月至2月经过具体研究并与盟军总司令部交涉后,于2月14日由内阁会议通过了,其中心是“金融紧急措施令”。按照当时旧宪法,上奏天皇并经枢密院会议审议,不需经过议会,并以波茨坦敕令的方式实施。同时,政府还决定了临时财产调查令、日本银行券存款令、粮食紧急措施令、隐匿物资等紧急措施令、紧急就业对策、物价对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生活用品的统制等措施,这些统称为“通货膨胀综合对策”,于2月16日公布。

金融紧急措施令、日本银行券存款令、临时财产调查令等金融紧急措施,是从2月17日起实施的。2月16日星期六傍晚通过广播公布了这些措施。金融机关已有内部传达,但对一般国民来说,是个“突然袭击”。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如下:

(1) 银行、信托等金融机关的储蓄存款、邮政储蓄存款等,一律停止支付,冻结存款。

(2) 流通中的日银券使用至3月2日为止,过期失效。

(3) 发行新日元,旧日元的兑换期为2月25日至3月7日。兑换比率为1:1。

(4) 兑换新日元的限额,个人每人限100日元,其余旧日元作为存款加以冻结。

(5) 支取冻结存款(新日元)的限额,个人的生活资金,户主每月300日元,其余每人每月100日元。事业主支付给从业人

^① 以上引自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12卷P.24—30。——原注

员的工资,月额每人 500 新日元,其余以冻结日元支付;必要的交通费、通信费,以新日元支付。此外,作为特例,从海外撤退者每人支付 1000 日元,婚丧费用支付 1000 日元以内。

(6) 以上所承认的支付新日元以外的场合,以票据、支票、邮政汇兑、证书等形式转入冻结存款。

(7) 旧日元作为一种通货在 3 月 3 日凌晨零点就要失效,所有现金都要拿到金融机关作为存款加以冻结,届时进行财产调查,作为核定财产税的基础。

由于新日元的日银券印刷来不及,当时就在旧日银券上贴上政府的证纸继续流通。

金融紧急措施令的实施,使日银券一下子汇流到了金融机关,存款额急剧增加。这一措施的实际实施日 2 月 18 日(星期一),日银券的发行额共达 618 亿日元,到 3 月 12 日,减少到四分之一,即 152 亿日元。

战后通货膨胀的变化

金融紧急措施令是冻结货币与存款的非常手段。它能够有条不紊地得以实施,证明了政府的统制和日本金融制度具有较高的能力。

盟军总司令部于 2 月 17 日就这一措施发表了见解,认为“尽管盟军总司令部曾就防止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发出指令,但日本政府未能有效地贯彻实施,对此盟军总司令部表示不满,为此,日本政府才采取了这一措施”。并表示,在不侵犯个人基本人权的前提下,支持这一措施。盟军总司令部进一步解释说:“这一措施不一定是革命性的,它不过是按照其他国家为了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而采用过的基本方针而已。”

金融紧急措施令的实施,至少暂时控制了消费物价的上涨,

但其效果毕竟有限。因在这一措施之前就已流传要冻结存款，而掀起抢购物品的风潮，所以在正式实施、黑市物价暂时下跌的同时，冻结存款使货币紧缩。物资供应方面，期待不久会解冻而控制销售，使物价的下跌少得出乎意外。批发物价指数，在3月、4月继续急剧上涨，消费资料的黑市或自由物价指数，3—4月出现了负数，5月以后略有反弹。

随着工资的支付和生活资金的提取，冻结的存款逐步换成了新日元。企业主也在银行认可的限度内尽量提取支付工资用的新日元。而政府的财政赤字仍在继续大幅度扩大，大量资金又流向社会。

金融紧急措施令并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然而，它却避免了金融机关破产的危机，同时为消极的随意性财政通货膨胀转向经济复兴积极的政策性财政通货膨胀作了必要的准备。

金融紧急措施在1946年4月1日、6月21日、8月11日又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方式进行了若干修改。第四次措施把冻结存款分为第一冻结和第二冻结两类（每个家庭一定数额以下作为第一冻结）。于是，存款存在着新日元、第一、第二冻结三种形态。

1948年7月，随着金融机关的重建与整顿工作的结束，开始处理同年4月1日为止的结帐。第二冻结的一部份被舍去，其余转入第一冻结。7月21日，第一冻结又转为自由存款，存款冻结便告结束。第二冻结被舍去的存款者，在后来银行增资时以优先股票的形式进行了实质性补偿。到此时为止，通货已严重贬值，所以冻结存款的实际价值已相当小，没有必要再继续延缓偿付了。

3. 战后的工人运动

工会的组织

1945年12月18日，众议院解散。币原内阁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1946年1月21日或22日举行大选。可是，盟军总司令部于12月20日发出了延期举行大选的指令。据报道，舆论界对众议院战争责任的追究，引起了美国占领当局的关注。

盟军总司令部希望大选的结果能够形成一种有利贯彻非军事化、民主化占领政策的政治形势，而不想让旧势力的原班人马再次当选。盟军总司令部已经逮捕了甲级战犯嫌疑者，准备提交远东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1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递送了关于广泛进行褫夺公职的指示。

众议院已经解散，大选又无限期地推迟，于是，出现了政治空白。失业、通货膨胀、粮食危机等都有待采取紧急对策，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领导尚未确定。只是除了被占领军解散的陆海军和思想警察之外，政府的官僚机构大致继承了下来。以这一官僚机构为中心，对事务性对策，进行了研究、立案、实施。

当时，一方面开始涌现对占领军的民主化政策给予有力支持的势力，另一方面，出现了威胁占领军的新势力，其倾向大大超越占领军设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范围，正在日本社会的底层组织起来。这就是工人运动及对它带来巨大影响的日本共产党。

战后，最早掀起群众性斗争的，是被强行抓来或“俘虏”来送到煤矿做苦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

1945年9月，北海道美呗的三菱矿业和三井矿山的中国籍煤矿工人，发起了要求增配粮食的斗争，接着，各地的朝鲜籍工

人也发起了斗争。中国工人作为战胜的盟国国民，在战争结束后已停止劳动，但朝鲜工人仍维持原来的劳动，其人数也相当多。他们进行了有组织的罢工或怠工，要求早日回国、改善伙食、纠正日朝工人之间的差别。据记载，这种外国籍工人的斗争，遍及全国42个煤矿。在北海道的夕张煤矿，朝鲜籍工人于10月8日至9日举行了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获得胜利。罢工妥善解决后的11月，其开工率仍只有20%的低水平。（参见大河内一男、松尾洋《日本工会史话》战后I，P. 79—81。）

战争结束时，外籍工人约占煤矿工人的36%。他们的停工，给煤矿生产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的斗争，对日本的工人运动也是个激励。日本工人也发起了要求增加工资、增加粮食与生活必需品配给、揭发隐匿物资等斗争，并开始组织工会。北海道的三井矿山首先组织芦别煤矿工会，接着各地相继组织工会。到1945年底，全国各煤矿共有69个工会，会员达16.2万人。公司方面看到成立工会是大势所趋，为了保持劳资关系稳定和防止工会为激进派所支配，还协助工会的组织。

大城市的工厂、交通部门和其他事业所也迅速出现了工会。据厚生省调查，到1945年12月底，全国共成立了509个工会，会员约达30万人。工会在1946年获得更加广泛的发展。到1946年12月，共有工会17266个，会员达493万人，参加工会的比率估计达到39.5%。

战后的工人运动

战后日本工人之所以能迅速组织起来，有下列几个原因。

第一，战争中建立过产业报国会。在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鼓吹国粹主义过程中，掀起了解散工会、推进“产业报国”的运动。这一运动，虽有一部分工人运动领导人策划，但总的来说是

以内务省—都道府县—警察为轴心的官办运动。

1938年7月,以所谓产业报国联盟为推进母体,在从业人员100人以上的事业所组织了产业报国会,府县设立联合会。起初,组织工作进展缓慢,后来内务省与厚生省强力推行,到1940年9月底共有46000个事业所、418万人组织起来了。1940年11月,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基层组织按事业所设立的产业报国会,把所有职员和工人都包罗在内。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于战败后的1945年9月30日解散。这种按事业所把职工组织在一起的方法,在战后沿袭下来,成了按企业组织工会的基础。战后日本许多大企业的工会,是按工厂、矿山的事业所把事务、管理部门的职员与工人组织在一起,建立基层工会,再按企业成立企业工会联合会,然后再按产业组成产业工会联合会。

第二,战前有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战前,即使在严峻的条件下,日本的工会在高峰时仍吸收了42万人参加。在工作岗位上体验过工人运动的人们以及参与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学生和其他知识阶层的人,数量相当多。战前参加过组织全国性工人运动或组织社会主义政党、工人政党的领导人才,仍有不少人健在。这些人,对战后的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政党的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前的工会、农会、无产阶级政党等,由于各派的方针不同和人际关系的对立,不断发生分裂与对抗。战后,这种情况也难以避免。尤其是共产主义者及其观点相近的组织同非共产主义者或反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之间的对立。

第三,战争结束后面临着深刻的生活危机。城市的工人及其家属,挣扎在饥饿线上勉强糊口。粮食的配给量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且得不到及时供应。不靠黑市粮食就无法生存,但

靠统制工资又无力购买，有限的储蓄存款也很快就用光了。在生产崩溃，经营干部拿不出新的良策，于是实行叫做“人员整理”的解雇。对工人来说，要紧的是要保住就业。面临恶化的通货膨胀，迫切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他们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采取有组织的行动。

工人们除了在各自岗位上向管理者、经营者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外，还和有同样情况的伙伴们一起要求政府确保粮食或揭发隐匿旧军用资材等非法行为。在此过程中，他们对造致战争惨祸的体制和领导者们怨恨不已。

第四，价值观念的大转变与制度改革。战败这一事实，使激进的国粹主义者（尤其是右翼和军人们）威望扫地。战败和国家目标的破灭，使大多数国民陷入了丧失方向的状态。占领军几乎没遇到事先曾担心出现的民族主义性的抵抗，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占领军所期待的对改革的内发热情，在起初也很微弱。以前的国家目标破灭了，而以往的秩序却保持着。占领军在按以往秩序开始进行统治的同时，要求对旧秩序进行改革。

占领军提倡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把旧势力从重要位置上拉下来，开始有力地推行制度改革。这样才很不容易地把日本国民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发动起来。盟军总司令部自上而来的强制性地引入的民主主义，在经过一段时期之后终于唤醒了有着深刻战争体验的国民的权利意识，促使国民参加到了解放运动的行列。

为了实现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理念，也为了削弱旧势力的影响，占领军命令日本政府把在意识形态上甚至与占领军本身对立的共产主义者也解放出来。被解放的共产主义者，以鲜明的反对旧势力姿态成了对抗旧势力的领导中心，成为战后一段时期内“自下而来的民主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推进者。这也是

引进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所带来的新的危机。

战后初期的劳资纠纷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解散后的第五天，1945年10月5日，全日本海员工会(全日海)成立。据说会员有6.1万人。起初，沿袭了产业报国会的做法，连公司的干部也参加了。

1921年(大正十年)成立的日本海员工会，是战前日本唯一的按产业组成的工会组织。1940年改组成日本海运报国团(产业报国会的组织之一)时，日本海员工会拥有会员13万人。

全日海是战后日本在面临雇佣问题情况下最先按产业建立的工会组织。船员在战争中蒙受了很大牺牲，仅罹难者就有3万，伤病人员达4万。主要的商船几乎全部沉没，盟军总司令部的方针也不明确，日本海运前景渺茫。而靠应急招募来的加以培养后补充的船员，没有出海的船只，这就必然产生多余人员的解雇问题。

1945年11月20日，战前以战斗力强闻名日本的东京交通工会(东交)，在产业报国会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东交是1929年(昭和四年)建立以东京市营电车(路面电车)从业员为中心的工会，经过一番曲折，于1940年改组成产业报国会。继东交之后，东京都工作员工会也于11月23日成立。接着，各地都纷纷重建或新建工会组织。

横跨横滨市和川崎市一角的日本钢管鹤见造船所，到1945年9月底共解雇了5488人，并声称还要进行第二批、第三批解雇。为此，从10月到11月发生了反对解雇的纠纷。当初，被解雇者组成的争议团只有4人，可是他们得到当地共产党员等外部声援，终于迫使公司在承认工会与被解雇人员复职等要求上作了让步。12月25日，在位于京滨工业地带中心的川崎市召开

了第一届神奈川县工厂代表者会议，共有 21 个工会的 70 多名代表出席。

战后的工人运动中，除了反对解雇、要求保障生活之外，还对主张和平与民主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读卖新闻社，评论委员等具有领导职责的编辑人员中，开展了包括曾经撰稿鼓吹进行战争合作的人自我反省的社内民主化活动。1945年10月22日，朝日新闻社的村山长举社长及其他领导人，以负有鼓吹战争的责任而辞职。读卖新闻社的民主化小组抓住时机，于10月23日召开了工作人员大会。全体职工都参加了大会，并通过了社内民主化、尊重人格与改善待遇、成立工作人员工会等项决议。社长正力松太郎则以对领导人铃木东民及其下属共 5 人实行解雇的措施来报复。

大正时期铃木东民在东京大学就学，就随老师吉野作造提倡“民本主义”。战争中，铃木作为读卖新闻社的评论委员，曾写过批判时局的社论，受到特高警察的追究，一直长期休假到战争结束为止。不仅是铃木，还有在大正民主时期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在战前、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工作人员工会选举铃木为工会会长，并决定由工会管理报纸的编辑和发行，排除了报社重要负责人员的干预。版面更新后，对全国的工人运动、民主化运动是很大的促进。到了12月份，正力社长被盟军总司令部指名为战犯嫌疑。为了处理这一纠纷，立即组织了东京都调停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了协议。该委员会就是后来得到法律承认的地方工人委员会的雏型。委员长是东京大学教授末广严太郎，工会方面选任的调停委员有共产党的德田球一、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朝日新闻社工作人员工会执行委员长听涛克己（后任产别会议议长，共产党干部会员）。

报社方面作了让步后,于12月11日签订协定,就社长引退,将有限公司改组为无限公司,有关编辑和业务的重要事项必须由社长与工作人员代表参加的经营协议会协商,以及承认工作人员工会等作出了决定。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读卖纠纷。由工会来进行“生产管理”以及在协定中确定劳资协议制这些斗争手段,成为后来工人运动的模型。

12月12日,正力以战犯嫌疑被收监。马场恒吾选任社长,铃木东民任编辑局长。正力于1947年9月1日被释放,1951年解除褫夺公职处分后任读卖新闻社长,1955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并曾进入鸠山内阁和岸内阁。

1945年12月5日,连结东京与成田的京成电铁召开了工会成立大会。12月10日,工会提出了增加4倍工资、承认团体交涉权、公开配给品帐目等要求,发生了争议。起初,电车和公共汽车实行“免费乘车”罢工,后来又采取将车费收入以工会会长名义暂存的办法。终于达成由工会管理业务、改善服务、提高生产率的协议。12月29日,以公司方面接受工会的要求而告结束。工会法的制订(1945年12月6日向议会提出,12月18日通过,1946年3月1日起实施)就是在这种环境条件下产生的。

日本共产党的重建

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1945年10月10日日本共产党战前领导人释放。日本共产党加紧进行重新组织,于12月1日召开了党的大会。这是自1922年(大正十一年)建党以来的第4次党的大会。战前,共产党公开抨击天皇制和私有财产制度,作为以革命斗争推翻现行体制为目标的激进派而处于非法状态,受到严厉的镇压。建党后的数年间和1935年以后的10年期间,

组织实际处于空白状态。第4次党大会是首次作为合法政党召开，也是克服长期空白使组织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

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政府、严格执行波茨坦宣言、支持各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等主张。行动纲领中还包含了改善劳动条件、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废除寄生土地所有制等要求。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工会的决议”。决议中，回顾了战前工会分裂的教训，强调工会运动统一的必要性，提出了在全国按行业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的目标。对于工会运动的分裂，决议认为共产主义者有着“机械化、公式化的倾向”，主要责任应归咎于“改良主义工会干部”的分裂政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进行了合作。

1946年1月12日，日中战争中曾在延安从事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组织活动的野坂参三，乘船回到博多港。1月26日，在东京的日比谷公会堂召开了欢迎集会。野坂在集会上发言说，必须成为“受人热爱的共产党”。2月24至25日，共产党召开了第5次党的大会，野坂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重申当前政策的“大会宣言”。

大会宣言对行动纲领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概括，对天皇制的提法更加切合实际，改为“废除封建专制军事警察制度的天皇制”；除了追究在位天皇的战争责任外，对皇室是否继续存在留待人民共和政府成立后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宣言认为，要完成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变革的手段可以不用“暴力”或“专政”的办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主义的、教育的手段来走向社会主义。宣言还解释说，共产党的主张不是“全盘否认私有财产”，只是主张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野坂在对大会宣言进行说明时指出，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于1932年提出的关于日本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和无产阶

级专政来实现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转变的方针,已不适用。他强调了“和平革命”路线的必要性。

在战争时期,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战前的领导人一部分被杀害,骨干关在狱中,不少人表示与共产主义运动分道扬镳,实际上已失去了阻止战争的功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往往导致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分裂。然而,党的正式主张却经常是过激而顽固地提倡反对战争、反对天皇制、打倒资本主义。经历了战败事实之后的国民,对共产党的存在有一种强烈的印象。战争的破坏和战后的贫困,乍看上去,证实了马克思的贫困化学说。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知识界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中间重新有了威望,共产党的影响力也扩大了。共产党员们以他们的能动性、献身精神和凝聚力,在组织地区性、全国性的运动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延安回来的野坂,吸取了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国际在欧洲推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根据他的主张确立的和平革命路线,在当时的情况下起到了加强对共产党的期望与信赖的作用。

社会党,总同盟,产别会议

在共产党重建的同时,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在建立之中。战败后,在当时的帝国议会中,战前无产阶级政党各派的议员共有17人。属于大日本政治会的有9人(杉山元治郎、阪本胜、三宅正一等),无派系的8人(河野密、水谷长三郎、西尾末广、河上丈太郎、平野力三、松本治一郎等)。他们商定打算超脱原来的派系新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另一方面,在议会之外,原社会民众党的片山哲、铃木文治等,以及原日本无产党的加藤勘十、高津正道、铃木茂三郎等,也分别进行会商、准备建立新党。

无论是哪个集团，都从战前多次分离集合的痛苦经历中感到建立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然而，各派基本思想的对立差异不易消除，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是有差别的。河上丈太郎等的原日本劳农党，很多人都与大政翼赞会或产业报国会合作过；而加藤、高津、铃木等的原日本无产党，则在人民战线事件(1937年)中有过被治安维持法问罪的经历，反战色彩很强。因此，要成立统一政党，是困难的。

尽管如此，1945年9月22日，以安部矶雄、高野岩三郎、贺川丰彦三位老前辈为发起人召开了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恳谈会，席间组成了以各派代表19人参加的新党创立筹备委员会。结果，终于在11月2日成立了日本社会党。日本社会党的成立，意味着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势力的聚集，但从建立过程也可看出，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包罗了各种立场不同的集团的联合体的显著特性。

松冈驹吉、西尾末广等战前的合法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在参加日本社会党的创立筹备委员会的同时，又组织了工会重建恳谈会(第一次会议在1945年10月10日召开，参加者有170人)。除日本劳工总同盟(1912年8月—1940年7月)系统的松冈、西尾等以外，被称为合法左翼的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1934年11月—1937年12月)的领导人也参加了。参加的还有，刚成立或重建的全日本海员工会、东京交通工会、东京都工作人员工会等的干部。

工会重建恳谈会确定了按照产业复兴、产业工会联合体、加入政党自由三项原则来重建全国性工会组织的方针。1946年1月17日，召开了总同盟扩大中央筹备会，决定成立日本工会总同盟(简称“总同盟”)。总同盟成立大会于1946年8月1日至3日召开，参加的工会数为1699个，会员人数达855399人。

日本社会党与总同盟成立之时，领导者之间尽量回避分歧谋求大团结，但与提倡社会主义的势力——共产党及其影响的运动所采取的方针不相同。共产党也对社会党和总同盟采取冷淡态度，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路线来组织群众运动。

野坂参三在1946年2月的第5次党的大会上说，共产党采取的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与和平革命的立场，似乎比社会党还要右倾，但社会党的“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貌似左倾的口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社会党与共产党无法联合，只有社会党的左派向共产党靠拢。

1946年1月27日，在京滨地区工厂代表会议的基础上成立了关东地方工会协议会（关东劳协），表明有志于向全国性组织发展的方针。2月9日，读卖、朝日、每日等各报的工会（共34个工会）成立为统一的日本新闻通信广播工会（原来各工会改成它的下属支部），号召筹备全国产别工会会议。煤矿、印刷出版、电影、教员、金属等产别的工会以及关东劳协纷纷响应这一号召，于2月20日成立了产别会议筹备会。

全日本产别工会会议的成立大会，是在总同盟成立大会半月之后的1946年8月19至21日召开的。据报道，有21个产别工会参加，拥有会员1631540人。正式的会员人数为总同盟的1.9倍。

战后首次大选

1946年2月25日，政府总算得到盟军总司令部的同意，决定于4月10日实行大选。这是战后的第一次大选，也是按照1945年12月17日刚公布的新选举法首次进行的选举。女性首次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选举权者的年龄限制由25岁降到20岁。

大选中,很多小政党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据报道,全国性政党13个,地方性政党350个)。保守和中间势力的主流,集结成自由党与进步党,这两个党的得票率合计达43.1%,获得议席数的50.5%。

第一大党的日本自由党,是由旧政友会系的政治家鸠山一郎等人于1945年11月9日成立的。自由党提出了多达485人的候选人,有140人当选。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后,由鸠山来组阁的可能性很大。然而,由于外国记者追究鸠山在战前写过赞赏希特勒的文章,盟军总司令部于5月4日下令褫夺鸠山的公职。自由党只好接纳在东久迩宫、币原两届内阁任外相的吉田茂入党,并选他为总裁。

第二大党进步党,是以大日本政治会的主流为中心于1945年11月16日成立的。大战末期1945年3月30日大日本政治会取代政治统制团体翼赞政治会而成立,1945年9月14日解散。进步党推选町田忠治为党的总裁。町田是东洋经济新报社的创始人,曾任战前立宪民政党总裁和战时小矶内阁国务相。进步党是战争结束后众议院的最大政党,是币原内阁的执政党。该党许多政治家对战时体制进行过合作,提倡反共、维护国体、民本主义,抵制战后的改革,为此受到盟军总部的追查战犯和褫夺公职的打击。进步党干部岛久知平(中岛飞机的创设者,曾任近卫内阁的铁道相和东久迩宫内阁的军需相)于12月以战犯嫌疑被捕。1946年2月,町田总裁及下属260名议员受到褫夺公职处分。4月的大选后,币原被选为总裁。

日本协同党是早期产业组合(农业协会)运动领导人千石兴太郎(东久迩宫内阁的农相)等人于1945年12月18日组建的。它提倡协会主义与劳资协调。后来,与两三个小党合并,成立了协同民主党(1946年5月)与国民协同党(1947年3月)。1950年

4月又与民主党(进步党的前身)合并,组成国民民主党(后来发展为改进党)。

4月大选,社会党有331名候选人,经过努力,获得92个议席(约占20%)。共产党也有143名候选人,当选者仅5人。以社会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的涌现,对保守势力是个巨大冲击。

币原内阁的执政党进步党成了第二大党,而自由党成了第一大党,为此,自由党和其他在野党共同要求币原内阁退位。但是,自由党也只掌握了三分之一的议席,难以单独组阁。鸠山及其继承人吉田,起初想与社会党接近。吉田想成立自由、进步、协同、社会四党的“举国一致内阁”,但未成功,结果是由自由、进步两个保守政党联合执政。但是,政党间的争斗浪费了时间,人选也难以落实,组阁遇到了困难。

粮食危机、物资短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对此,国民的不满日益加重。共产党的活动家等便在扩大工会组织的同时,发动了以解决粮食危机、揭发隐匿物资、破除配给不公为目标的大众活动。在东京板桥的原兵工厂(陆军兵工厂),发现了大量隐匿物资的市民们制造了“人民管理”事件,他们将这些物资实行自主配给。在东京,农林省职员会倡导成立了有工会、农会等参加的关东粮食民主协议会,专门清除配给不公正现象和揭发隐匿物资。

1946年5月1日,事隔11年之久又恢复了劳动节集会。东京的会场就设在皇宫前广场,参加人数据称达50万。5月12日,东京世田谷区民众大会的代表数十人,以揭发隐匿大米为由拥到皇宫的宫内省。5月19日,根据五一参加团体的决定在皇宫前广场召开了“要米饭人民大会”(“粮食五一”),参加者号称25万人。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动政府、建立民主战线的决议,还通过

了要求解决粮食供应不稳定的上诉状。会后，参加者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代表前往皇宫、首相官邸和警视厅交涉。有的标语牌上甚至写着：“朕饱餐终日，孰顾人民死活。御名御玺”。于是，以对天皇不敬罪被起诉。盟军总司令部发表了不敬罪无效的见解。法院以损坏名誉罪判处事者8个月徒刑(11月2日判决。11月3日因公布宪法实行大赦而免于起诉)。

4. 第一届吉田内阁

吉田内阁的成立

1946年5月19日，参加粮食五一大会的代表们在首相官邸静坐，要求会见吉田茂，希望他停止组阁。代表中有共产党的德田球一和读卖新闻社的铃木东民。吉田于5月16日接受组阁命令(当时还是按旧宪法，不是由国会提名，而是由天皇发布命令)进入首相官邸，但组阁人选难以确定，吉田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代表，似乎放弃了组阁。

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因要求迫切或以往受到压抑和不公正对待，往往行为过激。甚至在斗争中，还发生长期关押、殴打工厂经营者和中层管理者的事件。币原内阁于1946年2月1日发表了内务、司法、商工、厚生四大臣联合声明，对“暴行、胁迫或侵犯所有权等事态的发生”表示遗憾，并警告说，对违法行为将果断处理。盟军总司令部也从维护占领秩序和阻止共产主义渗透考虑，开始重视事态的发展。在粮食五一大会的第二天5月20日，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警告说：最近日本的大众活动，出现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大众暴行与暴力威吓行动的倾向，它成为日本未来发展的重大威胁。”声明还说，如果日本国民本身不能排除那些不能保持“眼下所必要的自我克制与自尊心”的“少数”分子，占

领军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麦克阿瑟的声明给了共产党员等运动领导者们很大冲击。静坐在首相官邸的粮食五一大会的代表撤走了。预定在这一天举行的新示威活动也都取消了。

在自由党等强烈要求下，吉田继续致力于组阁。5月22日，吉田内阁终于成立。前首相币原以副总理(国务相)的身份入阁。外相由吉田兼任。藏相为石桥湛山，农相为和田博雄。河合良成被任命为厚相，负责劳务政策。

石桥藏相历任《东洋经济新报》记者、主任、社长，是经济学家，1956年曾任首相。和田农相是制订“经济新体制计划院案”(1941年5月的计划院事件，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受到追究)的负责人，战后，曾在松村谦三农相的领导下任农林省农政局长，推行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后来成为绿风会参议院议员(1947年)，加入社会党后任左派社会党政策审议会会长、书记长等职。河合厚相是实业界出身的政治家，当时是敕选的贵族院议员，后来成为进步党、民主党的干部。吉田首相在币原内阁任外相时代曾为敕选的贵族院议员，4月大选时还不是候选人，所以任首相时也不是众议院议员。石桥在4月大选时被列为候选人，但落选了。和田也不是议员。

政治上长期空白好不容易组成的吉田内阁，面临着很多课题。

首先，是修改宪法以及按照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推行改革。

第二，是对付通货膨胀，使经济走上复兴的轨道。

第三，是采取对策，克服粮食危机。

第四，是要应付在野党势力，尤其是来自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方面抓住这些问题对政府的攻击。

其中，粮食问题尤为深刻。它是国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最关切的事。政府为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曾一再恳请盟军总司令部给以援助。盟军总司令部从执行占领政策着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向本国要求提供协助。但是，受战争的影响，粮食供应在世界各地都处于短缺状态，美国能提供给日本的也很有限。美国农商部在1946年提供给日本的粮食，只有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数的四分之一，约70万吨。这是以美国占领地救济资金支付的。后来，这笔费用由日本政府以美元偿还。

1945粮食年度(1945年11月—1946年10月)的主食配给量为579万吨，70万吨的进口相当于年配给量的10%以上，这对缓解粮食危机是很重要的。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象日本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申诉的那样窘迫。

盟军总司令部于粮食五一大会的第二天(5月20日)，在麦克阿瑟发表批评大众行为过火的同时，就决定对京滨地区紧急发放8535吨面粉，这固然是从政治后果考虑，但也是想通过粮食的重点发放，以缓解危机。

工人管理生产的斗争

1946年6月13日，成立20天的吉田内阁发表了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声明。声明首先对“最近群众运动动辄背离本来的意愿，通过非法的压力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深为遗憾”。并宣布对强行要求接见、非法占据民宅、为揭发隐匿物资而私自进行搜查等行为进行取缔。声明还表示要根绝已发生的一些妨害粮食搬运的行为，并认为经营者与工人有必要共同合作促进生产的发展。发生劳资纠纷时，不管是哪一方使用暴力，都要严厉制裁。

声明最后指出，“最近出现的名为管理生产的纠纷，很难认

为是正当的争议行为”，它“有可能导致企业组织的破坏和国民经济的混乱”。“工人管理生产”的出现，是经营者方面对生产的怠工引起的，为此，经营者有必要进行认真的反省，政府也在努力采取必要的增加生产的措施。不过在此时刻，希望无论是经营者还是职工都要“在有条不紊的秩序下”努力增加生产。为此，双方的代表可以成立经营协议会，“预先商议措施，以免发生纠纷”。

“工人管理生产”这种争议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战争结束后各企业的目标丧失与市场的消失，以及以往的价值观念崩溃乃至经营者领导能力的低下自然产生的。大量的工厂无工作可干，拒绝干活已没有意义。于是，工会便要工人亲自管理工厂企业，找活干，开展生产活动。对工人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但由于它在实际上包含着否定经营者管理权的因素，因而在重视传统秩序的人看来，这是危险的。相反，共产主义者等激进的领导者和活动家，却把它看成是将生产活动实现全面的“人民管理”的初始手段，所以对它抱欢迎态度，并加以推崇。

读卖新闻社和京成电铁的工潮就是工人管理生产问题的先例。在1946年以后，日本钢管鹤见制铁所、三菱美呗煤矿、东洋合成新潟工厂、东宝（制片厂、剧场）、东芝车辆、高萩煤矿、东北配电、北海道煤矿汽船、西羊毛工厂、正田制作所等，掀起了工人管理生产的斗争。战斗的工会集团对关于工人管理生产为违法和不正当的政府声明（1946年2月1日、6月13日）表示抗议，提出了“贯彻生产管理以实现全体工人阶级高度组织化”（反对镇压生产管理斗争委员会纲领，1946年4月24日）等方针。然而，以1946年5月到6月盟军总司令部与政府的“维持秩序”声明为转机，生产管理斗争迅速衰退。而以经济复兴为目的的积极政策确立了，通过褫夺公职等更换上来的新经营者总算掌握了

领导权。

1946年6月4日,《读卖新闻》刊登了一篇“奖励提供麦、芋者”的报道。文章提到,“政府的态度从本质上讲带有保护地主的性质”。盟军总司令部民间新闻教育部新闻处的英伯登少校发出严重警告说,在新闻报道中夹杂倾向的做法,违反了盟军总司令部的新闻准则(1945年9月19日的备忘录)。据此,读卖新闻社的马场恒吾社长要更新编辑队伍,并于6月12日命令编辑局长铃木东民以下6名编委退出报社。6人中有2人是从业员工会的干部。工会以不经过经营协议会而单方解雇是违反劳动协约为由,阻止公司任命新编辑局长上任。工会的行动队同公司动员的警卫、销售店主、外部势力发生了正面冲突(第二次读卖纠纷)。多数从业员对以往工会干部的领导和报纸的激进化持批判态度,出现了建立“不干涉编辑权的健全工会”的动向(工会更新派)。于是,工会便一分为二。7月17日,工会更新派将工潮团赶出报社,恢复了报纸的编辑、发行。

在盟军总司令部,民间新闻教育部是鼓励公司的,而盟军总部经济科学局劳工处的科恩处长等则认为压制工会是不妥当的,盟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对立也表面化了。

工潮团得到其他工会的支援而坚持斗争,但是原计划10月5日举行的声援读卖工潮新闻界总罢工却没有发动起来。1946年10月16日,继先前6人被命令退出报社之后,又有31名工会干部自动退出报社,至此,工潮团方面完全失败了。“生产管理”斗争的先驱及其象征,工会管理下的激进的《读卖新闻》,就这样消逝了。

石桥财政演说

吉田内阁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强力支持下,维护了社会秩序,

遏制了工人运动的过激化，与此同时，大力推进经济的复兴，以克服面临的危机。作为政府经济政策要害的政府预算，编制工作被大大推迟。1945年12月解散众议院后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推迟举行大选，币原内阁未能向议会提交下一年度的预算案。吉田内阁成立是在5月22日，这时1946会计年度已经开始两个月了。即使按照旧宪法，国家预算也必须得到议会的赞同，如议会未作出决议，则按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施行预算）。1946年度的财政就是以施行预算的方式开始的。吉田内阁成立后，议会从6月到7月又审议通过了追加预算案。到7月24日，政府以修订预算案的方式向议会提出了年度预算案，9月2日终于通过了这种不正常的做法。

吉田内阁的石桥湛山藏相，于1946年7月26日就修订预算案进行说明，在众议院发表了财政演说。其主要内容如下：

日本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因需求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而是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和生产设备闲置的开工不足状态，为此通货膨胀是不能用紧缩通货政策来克服的。当前国家财政的首要目标是“让国民就业，复兴产业，实现完全雇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石桥认为，即使财政收支平衡，但只要国内存在大量失业和大量生产设备闲置的状况，财政状况就算不上良好。而在1946年度预算案中，还包含有同胞撤退费、战灾救济费、价格调整补助金、终战处理费等许多不得不在本年度内支出的费用，因此，要在过一段时间才可实现收支平衡。石桥的这些观点，是为了说明大幅度赤字的预算是不得已的，是正当的。也是为了说明正因为现状是就业不充分，那种认为只要增强购买力就可以了的想法并不妥当。石桥还认为，即使是通常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必要采取紧缩通货政策的办法。他所提出的政策如下：

(1)为了扎实地打好重建经济的基础,需要进行同建设和平日本的方向合拍的整顿。加快补偿问题和财产税等的处理,尽早废除金融紧急措施等。

(2)推行积极的经济复兴政策。

①对基础产业采取特殊的促进政策。尤其是对政府已着手计划的煤炭、肥料等。

②大力推进复兴金融。不久即将设立复兴金融机构,在此之前作为过渡措施,先由日本兴业银行承担金融复兴。日本银行也要积极提供生产资金。此外,还要鼓励储蓄,进行证券交易所的机构改革。

③推进产业合理化。

④解决失业问题。为了给一般失业者、海外撤退同胞、旧军人及军属创造就业机会,向他们提供开业资金,推进公共事业与善后复兴事业。

⑤经济的民主化(石桥特别强调“提高道德与文化”,“对实现真正的民主主义化是必要的”)。

1946年度一般会 计修改预算于9月12日拟就。岁出规模预定为561亿日元,其中租税等普通岁入部分为305亿日元,岁出亏空(赤字)为256亿日元。到1947年3月止,实际上进行了7次预算追加,最终预算的岁出规模增加到1191亿日元,为当初预算的2.1倍,成为该年度通货膨胀加剧的最大原因。特别会计也同样一再进行追加。

一般会 计的最终预算赤字达到了445亿日元。即使征收财产税、临时利得税、增加所得税(以上合计384亿日元)等大规模的临时收入,也还有37.4%的赤字。这些临时收入和赤字的合计额约为岁出总额的70%。靠经常性租税收入等筹措的收入只占最终预算的约30%。赤字部分靠发行公债和借款来调节,主

要部分由日本银行承担。也就是说,通过增发货币来调节,这就成为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的重大原因。

差价补贴与复兴金融贷款

这一时期的一般会计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战后处理费,其大部分是日本政府负担的美军占领费用。内容有:占领业务费,宿舍与兵营的建设和环境改善的费用,供美国军人使用的私人住宅、休养娱乐设施、家具与家庭用品,以及工人与雇工的人事费等。在财务计算上美方都是细加斟酌,甚至连朝鲜和美国直接占领下的冲绳的宿舍建设费也要日本负担。除了这种狭义的战后处理费之外,还要加上复员费等支出。这些处理费在岁出中占的比重,1946年度为36.6%,1947年度为33.9%,都占三分之一以上;1948年后相对减少。

另一项占比重很大的费用是产业经济费。其比重从1946年度到1949年度分别为16.2%、25.5%、30.8%、45.3%,逐年上升。其内容为:农林水产费,工农矿业费,运输通讯费,物资与价格调节费。以鼓励生产和稳定物价为主要目的,特别是“价格调整补贴”(也叫差价补贴)占很大比重。运输通讯费也多半用于为控制国铁运费而对赤字的补贴,实际上也是一种价格调整的补贴。这种价格调整补贴,是对各种物资生产所需要的实际费用与生产物的统制价格(官定价格)之间的差额,通过财政补助金来进行的补贴。

这种补贴,是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940年度为增产煤炭和控制煤价而采用的,1943年度扩大到钢铁、粮食等。战后的1945年12月停止补贴。1946年2月17日发布金融紧急措施令之后,为了维护从3月3日起实行的物价新体系(3·3物价体系)和物价统制,在1946年度预算中恢复了对粮食和煤炭的差价补贴,1947

年度又扩大到钢铁、肥料、有色金属及其他产业。

币原内阁在1946年3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除了决定采用3·3价格体系外,还决定成立“紧急经济对策中央本部”。对此,盟军总司令部表示了建立具有强大权限的独立政府机构的意向。吉田内阁成立后的6月19日,枢密院会议决定设立以国务大臣为长官的新机构——经济安定本部。8月12日,经济安定本部(简称“安本”)与物价厅成立。安本是政策立案机构,物价厅是物价行政的实施机关。工作人员和长官都是一套班子,两方兼任,实行一元化营运。任命原农商务省官员、曾任财界团体董事的膳桂之助为这两个机关的长官。1949年6月,物价厅合并到经济安定本部。而经济安定本部也于1952年8月改组为经济审议厅,1955年7月又改称“经济企划厅”。

吉田内阁在1946年6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战后产业重建的应急金融对策”,并于7月27日组建了“复兴金融委员会”。委员长由大藏省次官担任,经济官厅、日本银行及日本兴业银行的干部职员任委员。日本兴业银行是继日本劝业银行(成立于1896年)之后于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成立的。它受政府资助和监督,负责对产业提供长期贷款,是一种国策银行。^①1950年4月,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方针,兴业银行与劝业银行都改为普通银行。在日本兴业银行中设立了复兴金融部,于8月1日开始营业。

政府本来打算设立复兴金融特别会计,后与盟军总司令部交涉,结果改为设立特殊的政府金融机关。10月8日公布“复兴金融金库法”,10月29日实施。1947年1月24日,在政府第一次出资40亿日元的基础上成立了复兴金融金库(简称“复金”),

^① 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银行。——译注

从1月25日起开始营业。同时，以往由兴业银行复兴金融部进行的特别融资，也移交给复金。

吉田内阁1946年12月27日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克服危机的对策，决定将资源重点投入煤炭业与钢铁业。1947年会计年度的煤炭生产目标订为3000万吨（1946年实际产量为约2000万吨）。这是一种叫做“倾斜生产方式”的政策，在资金方面的基本手段就是差价补贴与复金融资。

5. 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

反对解雇

占领军以“军国主义者”的名义，对大量的人进行了褫夺公职处分。在这种异常事态下，吉田内阁把稳健的现实主义保守势力和自由主义中间派势力集结起来，打算依靠他们来掌握日本经济与社会的领导权。吉田内阁首先加强了与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对抗，加速确立和推行经济复兴政策。但是，以大幅度财政赤字增发货币为主要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却日益严重，生产难以恢复。

1946年5月粮食五一大会时麦克阿瑟的警告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共产党所采取的在街头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静坐示威等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战术，遇到了困难。然而，对工人来说，被解雇的危险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以及粮食缺乏等困境并没有消除。于此，工会所开展的要求改善生活的活动则更加活跃了。

7月24日，运输省向国铁工会总联合会提出，打算将国铁的7.5万名职工解雇。国铁是1949年6月按照占领军的指示改为国营铁道公司的，此前由运输省直接经营。战前的国铁作为国

家垄断事业，是盈利的，但战后在通货膨胀下运价不准上调，变为赤字经营。因此，必须大幅度提高运价。运输省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前提是经营合理化，为此需要将55万人的职工中多余的7.5万人解雇。战败后，国铁收纳了大量军队复员者以及从大陆（旧满铁等）撤退的国铁职工，到1946年度末，过剩人员达12.9万人。

国铁工作人员的组织化，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10月，由运输省当局成立职员会或铁道委员会开始的。后来，又按机关和地区成立了自主性工会，分别开展了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1946年3月15日，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国铁工会总联合会。国铁工会总联合会刚成立不久就面临着大量裁减人员问题的考验。8月2日，总联合会认为解雇将造成失业的增加和社会不安，表示反对。8月15日，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决定了9月15日进行总罢工的方针。可是，于9月5日至6日在三重县宇治山田召开的反对解雇临时大会上，大阪、名古屋、门司、广岛、四国的地区联合会代表，因主张延期罢工而退场，致使大会流产。尽管如此，总联合会的斗争委员会，还是决定由东京、新潟、札幌、仙台4个地区联合会举行总罢工。

在海运业，全日海（全日本海员工会）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8月27日，海运业统制机关船舶运营会（1942年4月成立，1950年3月解散）提出了裁减人员的方案。海运业的剩余人员有6.5万人。

全日海内部，虽然存在着共产党员领导的中央斗争委员会（中斗）与稳健派占多数的干部之间的对立，但终于决定，如果在9月9日之前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就在9月10日举行总罢工。可是，出乎意料的，“中斗”同正在进行罢工斗争的国铁工会总联合会及8月份成立的产别会议所属各工会联合，进行了联合斗

争。

产别会议自6月以来，支援了读卖新闻社的第二次工潮，声援了国铁与全日海反对裁减人员的斗争，打算以打倒吉田内阁为目标组织更大的斗争，决定于9月15日组织所属几个工会举行罢工，以与国铁工会总联合会相呼应。

9月8日，船舶运营会与全日海就裁减人员达成了妥协协议，尊重工会关于设立劳资协议会的意向。在协议签字前，全日海的“中斗”突然改变态度，于9月10日按预定计划进行了罢工。9月20日，达成了不解雇的协议。

9月14日，国铁也达成了不解雇的协议，预定15日举行的总罢工取消。

在工会的抵抗下，国铁与海运的大量裁员暂时被阻止，但不久工会方面的步调却乱了，在各工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纠纷。国铁工会总联合会属下的东京地方工会加入了产别会议，而其内部要求退出产别会议的动向则表面化了。全日海内的“中斗”派在内部斗争中失败，在稳健派的主导下取得了统一。这样，在1946年秋季，工人运动在表面上高涨的背后，路线的对立却深刻化。为支援读卖工潮而原订于10月5日举行新闻总罢工的计划，也流产了。

10月斗争

为了声援读卖、国铁、海员的联合斗争，同时为了加强所属各工会反对裁减人员的斗争和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产别会议于10月1日成立了最高斗争委员会。共产党为了把以经济要求为起因的工人运动引导到改变制度的阶级的政治斗争上去，通过产别会议提出了“10月斗争”这一方针。根据产别会议10月底汇总的资料，在10月斗争中，新闻通信广播、煤矿、电力、电

机、机械、钢铁、化学、电影戏剧、印刷出版、医务、教育和食品等各个产业的工会，共有 56 万多人参加了斗争，罢工次数达 257 起。

1946 年 10 月 1 日，总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对预定在 10 月 5 日产别会议领导的新闻总罢工进行了批评，认为总罢工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10 月 12 日，总同盟发表了反对政治总罢工的声明。声明指出，工人为了维持生活，在吉田内阁执政的前提下奋起斗争，是理所当然的。即使不要求吉田内阁辞职和成立民主政府，也不能象产别会议领导人所企图的通过政治总罢工来推翻政府，用暴力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那样做，是对今天主客观条件认识上的严重谬误，会使工会脱离国民，从而促使反动势力抬头。对此，我们是决不参与的。

同一时期，吉田首相也对政治罢工进行批评，自由党与进步党发表了抨击罢工的联合声明。社会党也表明了不赞成用政治罢工的方式使全产业停顿的见解。

针对这些批评，产别会议和共产党争辩说，10 月斗争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经济斗争；政府不给工人生活补偿而进行无理镇压，才不得不要求他们下台；一旦要求得到满足，工人会停止罢工，努力生产。但是，产别会议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却于 1946 年 11 月 11 日在决定结束 10 月斗争的同时，提出了“以往的工人运动强调不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但现在与政府发生了正面冲突，今后要采取明确地加入政治性内容的斗争”的方针。他们还提倡以产业“民主化”为目标，加强同“中小工业资本家”的共同斗争和地方组织的联合斗争，认为“10 月斗争中过分强调各工会的自主性，削弱了领导力。”

领导产别会议的共产党，一贯为实现民主革命这一政治目标而动员群众，10 月斗争实际上是他们向吉田内阁发动政治攻

势的一个阶段。所以，到了11月，产别会议便公然表明了斗争的政治倾向。

然而，从10月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不管领导层的意图如何，大部分斗争仍是经济斗争。参加10月斗争的工会，各自就反对解雇或提高工资提出要求，与经营者交涉并得到一定让步后便结束斗争。同时开展斗争虽然造了声势，对工会带来了有利的形势，但并不等于已经形成了动员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条件。随着实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参加10月斗争的民间工会的斗争也不存在了。

在10月斗争中，“电产”（日本电气产业工会协议会）也参加了斗争。“电产”是日本发送电公司与九家配电公司的工会，成立于1946年4月（起初叫“电产协”，1947年5月改为单一工会后将“协议会”三字去掉）。10月斗争中，“电产”采用了停电罢工这种大胆的手段，给社会造成了很大冲击。“电产”的中心要求是确立新工资体制，以保障生活。政府很重视这一工潮的影响，很快按刚于1946年9月27日通过的劳资关系调整法，以电力事业的公益性为理由，要求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强制调停。“电产”对此表示抗议，斗争一直延续到12月份。12月22日，在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调停下，“电产”与经营者方面签订协议，结束罢工。在协议中，规定了电气事业的民主化以及保障生活的最低工资制等。

双方商定的工资，是包括年龄津贴与家属补贴在内的保障生活为中心的工资制。保障生活的工资包括加上连续工龄工资的基本工资与超额劳动、特种劳动等补贴。这种“电产型工资”，后来被许多产业采用。

以往由经营者方面随意规定的工资，经过交涉，明确地标准化、体系化了。在工资中，与能力工资、职务工资等“按照工作”

决定的部分相比，更重视年龄工资、家属津贴等保障生活的部分，这是划时代性的。电产型工资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是保障生活所必要的实际对策，对稳定劳资关系和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是有效的。

经济复兴会议

总同盟在批判产别会议把10月罢工斗争政治化的同时，与经济同友会等合作，推进了“经济复兴运动”。经济同友会是1946年4月30日由当时50岁以下的经营者发起创立的，志在实行资本所有与经营的分离，实现劳资协调，推行修正资本主义路线。经济同友会响应总同盟的号召，参与了“经济复兴会议”的筹备。

1946年10月25日，既不属于产别会议也不属于总同盟的一些工会，成立了日本工会会议(简称“日劳会议”，号称拥有30万会员)。日劳会议也表示愿意参加经济复兴会议。

1946年12月6日，由总同盟、日劳会议、经济同友会主办，召开了经济复兴会议成立预备大会。主张采取贯彻日本经济民主化，大力推行经济政策的民主化、生产体制的民主化，确保国民生活的稳定与进行工资制定的改革及利润分配的合理化，推进产业民主教育，开展摆脱生活危机等基本方针，强调了由经济协议会来协调劳资关系和劳资共同决定重大问题的必要性。

1946年8月当总同盟和产别会议分别召开成立大会时，这两个组织都确定了推进产业复兴运动的方针。但是，总同盟的基本态度是通过劳资协调来实现经济复兴这一目标；而产别会议则主张优先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产别会议是在共产党的直接影响下。它的最终目标是废除

资本主义制度，当前则谋求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政治势力来掌握政权，推行“民主革命”。对于总罢工会妨碍生产的复兴和破坏生活的批评，产别会议和共产党则回答说，通过总罢工确立新政权才能真正得到经济复兴。根据这条路线，产别会议起初想由工会方面单独成立“产业复兴会议”，并邀请了一部分非成员工会，于10月7日召开了成立预备大会。11月8日“产业复兴会议”正式成立。

总同盟系的经济复兴会议的具体化稍微迟了一些。产别会议起初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复兴会议应该成为劳资双方参加的进行建设性协商的场所。对此，产别会议也不能视而不见。从11月到12月，产别会议与日产协（日本产业协议会）及经济同友会就此问题几次进行了接触。日产协是1946年2月战时的重要产业协议会解散后，于同年8月成立的产业界团体。它是同月成立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的成员之一。1952年11月，日本商工会议所等脱离经团联后，经团联与日产协合并，改组成现在的经团联。

1946年11月23日，产别会议与日产协及经济同友会大致取得谅解，交换了备忘录。双方确认，经济复兴运动不是产业报国会那样的劳资休战运动，而是互相承认经营权与劳动权，同时通过协商来实现协定，以推进经济复兴。12月27日，产别会议决定参加经济复兴会议。

产别会议如不参加经济复兴会议，就会被认为在经济复兴这一国民性课题上由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而采取不合作态度，从而会遭到非难和孤立。因此，产别会议认为可以利用经济复兴会议作为提出自己要求的场所。此外，他们还认为，与总同盟保持某种程度的联系，对于实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权也是有利的。因为总同盟的领导层同社会党有着密切的关

系。

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方面，通过其意识形态及活动家的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在整个国民中却只得到少数的支持。其时在自由选举的前提下，共产党单独掌握政权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共产党尽管对社会党和总同盟进行了激烈的非难和批评，但感到有必要同社会党和总同盟进行联合与合作。

总同盟则主导了经济复兴会议的活动，在同意产别会议参加进来的同时，于1946年11月和12月，领导所属的各工会开展了过年斗争。其目标是，要求提高工资，缔结团体协约，以及消灭经营者违反各种劳动法规的现象。

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

产别会议系统的十月斗争和总同盟的斗争等，使民间的主要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改善待遇的成果。而公共企业等职工的待遇改善问题尚有待解决。当时公共企业还不是独立的实体，政府机关人员与公共企业职员统称为“官公厅劳动者”。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同政府进行交涉。

1946年3月17日，成立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职员工会联络协议会（简称“全官公劳协”）。5月，以全官公劳协为中心的联合斗争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政府以受预算制约和维护三三物价体系（1946年3月3日施行）为理由，对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职员增加工资的要求表示为难。到了7月，总算改善了待遇，将平均工资606日元提高了80日元。

在10月斗争中，首先由教员工会在10月18日召开了要求“最低薪金600日元”、“废除新日元500日元的限制”的大会。当时，教员的工会分为教员工会全国联盟（会员约12万人）和日本

教育工会（会员约 12 万人）。他们采取了统一行动。全国邮电从业员工会（全递）、国铁工会总联合会等也开始对政府进行交涉。全递是 1946 年 5 月 31 日成立的邮政事业的工会。1949 年 6 月，递信省分为邮政省和电气通信省，工会也随之分为全递和全电通（全国电气通信工会）。1952 年 8 月，又撤销电气通信省，成立日本国际电信电话公司。

1946 年 11 月 21 日，全官公劳协提出发给过年津贴最低本人 1200 日元、家属每人 300 日元，保证每月最低基本工资 600 日元、家属津贴每人 200 日元，废除勤劳所得税，将综合所得税免税的上限提高到 3 万日元等要求。11 月 26 日根据各工会的要求成立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官公厅共斗）。

在 10 月斗争中，产别会议曾一再要求总同盟开展共同斗争，甚至提出无条件地联合。可是，总同盟以产别会议采取“暴力革命方式”和共产党员左右着工会基层组织为由，加以拒绝。然而，结成统一战线终究是多数劳动者的希望，也是工人运动的宏旨。因此，总同盟感到有必要留有统一的余地。在这种背景下，产别会议、总同盟、日劳会议三方于 11 月 29 日召开了全国工会恳谈会。12 月 2 日第二次恳谈会决定于 12 月 17 日召开打倒吉田内阁国民大会。这一时期，总同盟和日劳会议也支援全官公厅共斗的运动，采取了增强打倒吉田内阁声势的姿态。12 月 2 日，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由于对政府的答复不满而通过了斗争宣言，并于 12 月 10 日在皇宫前广场召开了“维护生活权利全国官公厅职员大会”，参加人数号称有 4 万人。

12 月 14 日，政府发表了禁止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职员参加预定 17 日召开的打倒吉田内阁国民大会的方针。同日，盟军总

司令部的劳动处长科恩发表声明说：“工会对自己强大的实力行为要负责任。考虑到日本的经济状况，提高工资并不意味着能改善生活。妨碍增产的罢工行为应尽量回避。”可是，“确保生活权利、打倒吉田内阁国民大会”仍按预定计划于12月17日在皇宫前广场召开，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的职员也参加了。据称参加者达50万人。在大阪、横滨也召开了同样的集会。

12月19日，打倒吉田内阁国民大会的发起人开会，商定成立“打倒内阁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产别会议（细谷松太）、总同盟（高野实）、日劳会议（三田村四郎）、社会党（加藤勘十）、共产党（伊藤律）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于12月24日决定设立“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斗），并于26日成立了筹备会。

这样，产别会议和总同盟在上层总算采取了统一行动。可是，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两派的工会会员激烈冲突事件。在埼玉县上尾町的东洋时计上尾工厂，总同盟系统的工会干部，对增产运动采取合作的态度，而对此不满的以共产党员为中心的反对派，自10月以来在附近产别会议系统工会的声援下，继续坚持斗争。12月12日，工会干部等反对工潮的一派对争议团采取强制行为，发生了武力冲突，造成轻重伤130人，产别会议系统的一名支援工人死亡。

第四章 在冷战中重建日本

1. 二一大罢工计划

大罢工的筹划

1946年12月24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了远东委员会于12月18日通过的“关于鼓励日本工会办法的十六条原则”。其中虽然没有提出特别新的内容，但却详细地规定了保障工会的权力。对此，产别会议认为这是远东委员会对其运动的原则上的支持。产别会议在1947年年初发表的号召书中阐明，“十六条原则”充分证明我们的斗争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并在结尾处写道：“准备好了吗？前进！民主主义的革命之年，1947年。”

与此同时，吉田首相在广播中向国民发表谈话。他指出，使劳资纠纷和罢工频繁发生的劳动攻势和波浪状攻击的工人运动，“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严重妨碍了举国一致重建经济的目标。对此，我深表遗憾”。并表示“我不相信这些不逞之徒在国民中占有多数”。吉田的“不逞之徒”一语，大大地刺伤了工会组织。

1947年1月11日，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再次在皇宫前广场召开了“确立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工会罢工态势大会”。同时，继去年12月3日递交第一次要求书之后，又向政府递交了第二次要求书。自从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成立以来，所提的要求没有取得完全一

致。虽然工资和过年津贴等方面的具体金额已委托各工会去谈判，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仍再次表示了一致的原则，并坚决要求政府作出回答。其内容是：确定最低基本工资（最低基本工资为 16 岁 560 日元，要求从 12 月起实施）；立即支付过年津贴的余额（已支付的金额和工会要求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即刻签订劳动协议等 13 条。其中也包括要求吉田首相取消“不逞之徒”一说，并作公开道歉。

1月 15 日，政府对此作出了答复，但内容和 12 月 10 日对第一次要求书的答复并无大的差异。还是“审议会将进行研究啦（工资）”、“将在可能的范围内作出最大努力啦（过年津贴）”之类的空话，没有具体的改善办法。至于有关“不逞之徒”的发言，政府的答复是，“引起了误解，深表遗憾”。

1月 18 日，全国召开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在确定将要求把最低工资的统一金额定为 680 日元的同时，决定以 2 月 1 日为举行大罢工的日期。

这一天，参加会议的除了全国邮电员工会、国铁工会总联盟、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工会协议会、全国公共团体职员工会联合会和全日本教员工会联合会（以日本教员工会为中心于 1946 年 12 月 22 日成立）外，还有日本城市工会联盟、大藏三现业工会联合会、全国财务工会、全日本医疗人员工会协议会、东京都工会联合会、全国大学高专教职员工会、全日本进驻军要员工会和日本城市交通工会协议会等 8 个工会。总共有 13 个工会组织，号称有 260 万人团结在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的周围。同时，还宣告上一年就已开始筹备的“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斗）正式成立，并已于 1 月 15 日召开。有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产别会议、总同盟、日劳会议等 30 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

了号召全国工人起来斗争的声明。

1月8日,共产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声明,提出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职工的罢工“是打倒吉田亡国内阁、建立民主人民政权的全民斗争的前奏”。1月14日,产别会议干事会也决定了将工人、农民和劳动大众以经济要求为基础的斗争,迅速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并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建立起民主政府为止的方针。这样,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产别会议便确定了将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通过大罢工来夺取政权的路线。

吉田首相试图通过与社会党的联合来扭转这种局面。自12月起,吉田分别会见了社会党右派的西尾末广、平野力三和左派的铃木茂三郎,试探合作的可能性。但左派为了加强工潮攻势,坚决反对联合。吉田和币原(国务相)对社会党片山哲委员长的说服工作也以失败告终。1月7日,吉田放弃了联合的念头。

1月20日夜,产别会议议长听涛克已遭到两名自称新锐大众党党员的谋刺,负重伤治疗了一个月。两名凶手供认,之所以行刺,是因为尽管他们劝告停止罢工,但听涛却答复:“大众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罢工不能停止,何时结束也不知道。”

罢工中止

1947年1月22日,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局长马尔卡特准将和劳动科长柯恩召见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会议长伊井弥四郎(来自国铁),向他递交了劝告书。劝告书阐明:通过罢工及其他任何联合行动来阻碍全国通讯和运输机构日常业务的行为,均被视为对占领当局计划的干扰,罢工将对日本全体国民造成极大的破坏。对此,盟军总司令官有必要采取坚决彻底的措施,以实现停止罢工。

同日,政府作出答复,同意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职员的工作

资从1月开始每人一律增加110日元，将工资和薪金提高25%，并同意将工资中支付新日元的额度从500日元增加到700日元等内容。然而尽管政府已作出了让步，但23日，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仍表示拒绝。

23日，共产党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罢工，号召建立人民民主政府，反对社会党右派同吉田派的联合行动。同时，社会党也发表声明，认为导致今日危机的责任在于吉田内阁，但罢工必须避免。声明希望问题通过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斡旋来解决。并且提出了吉田内阁总辞职，新政权应通过各党派之间的协商来决定等主张。

即使是如此的重大斗争，但在25日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和政府代表(币原国务相等三名内阁成员)之间终于开始了谈判，此前彼此仅仅是相互递交要求书和复函，没有达到在同一个桌子上进行谈判的地步。在25日的第一次谈判中，政府方面只是听取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方面的要求。同日，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的代表向盟军总司令部的柯恩劳动科长说明：“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全体工会会员就不会同意”，并转达了不改变坚决举行罢工的方针。

28日，在皇宫前广场，召开了“打倒吉田内阁，突破危机国民大会”。参加者号称有40万人。产别会议、总同盟、日劳会议、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和社会党的代表分别担任议长和副议长。大会通过了“确立最低工资制”、“打倒吉田亡国内阁”和“建立以社会党为核心的民主政府”等口号。在大阪、名古屋和横滨等地也举行了集会。

1月27日，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决定从中斡旋。28和29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谈判，就提高工资问题交换了

意见。最后，石桥藏相等政府方面的代表对联合斗争委员会方面提出的平均实际收入 1200 日元的主张做出了让步，同意实际收入包括税金在内为 1200 日元。29 日夜，联合斗争委员会方面表示拒绝。

1 月 30 日，马尔卡特准将等人再次召见了联合斗争委员会的伊井议长和各工会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严厉指出：“必须发出停止罢工的指令，这是命令。”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虽然直到 30 日夜里为止还在努力斡旋，但仍未取得进展。

但是，1 月 31 日下午 2 时半，麦克阿瑟发表了命令停止罢工的声明。他指出，“当前，在日本处于穷困和衰弱的情况下，使用如此致命的社会武器是决不容许的”。并在明确指令停止罢工的同时谴责说：“与罢工有关的人虽然只是日本国民中的少数，但这些少数人也许会将大多数人投入如同过去少数派将日本引向战争所带来的同样的灾难之中。”在谈到美国的对日粮食援助问题时，麦克阿瑟还进一步警告，如果进行类似二一大罢工那样的破坏行动的话，盟国就将停止对日本的援助。

马尔卡特准将向工会传达了麦克阿瑟的声明，并要求工会通过广播播送停止罢工的命令。下午 9 时 20 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议长伊井在广播中宣布“如果是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绝对命令的话，那么，很遗憾，罢工将不得不停止。”伊井说，“现在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就是退一步，进两步。”（这是列宁的一本著名著作，原名应是《进一步，退两步》。）最后，他高呼“工人农民万岁！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二一大罢工以后

1947 年 1 月 31 日夜，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在说明“我们所面对的内外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之后，

宣布解散联合斗争委员会，并决定今后的斗争将由各工会自己进行。几乎完全服从了停止罢工的指令。从1月31日到2月1日，各团体和机构也都各自发表了声明。

共产党指出：“总司令官的声明是通告停止总罢工，不是限制贯彻合法目的的行动”。并进一步说明：“我们是衷心希望我国能尽快地从荒废中得到恢复并为此而进行奋斗的，但是妨碍这一目的是将一切牺牲推给劳动人民，维护少数垄断金融资本利益的政府的政策”。为此，它声称要将打倒吉田内阁和建立民主人民政权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社会党表示：“我党确信，正象麦克阿瑟元帅在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国当前的特殊形势下，罢工必须完全避免”。并再次表明了希望“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采取积极的活动”。同时，社会党一方面指出将警惕“地下政治活动”和“经济怠工”，另一方面，又要求对“引起严重事态”负有责任的吉田内阁总辞职。

政府方面对停止罢工表示欢迎，并在呼吁趁此机会停止一切劳资纠纷的同时，声明希望工资改善委员会等机构积极活动，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

总同盟一方面谴责政府“没有诚意”和“劳动政策的贫乏”，另一方面，又指出：“一部分极左分子回避和平解决，以至造成政治罢工的事实，也是引起混乱的原因。为此，作为总同盟今后将向加强我国工人运动健全化的方向前进。”

产别会议指出，这次对罢工的态度，暴露了政府的反动性，现政府必须看到，“我们的切实要求决不会忍受这种压制”。从而表明了继续斗争的决心。

二一大罢工计划是在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中出现的要求切实改善工资待遇和权力意识在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及政府企业的工人间迅速扩大起来的基础上的产物，而且，对战前和战时国

家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反抗怒火也一起喷发了出来。战败和占领动摇了官僚机构的等级制度，群众的解放感大大增强，大批中下层公务员纷纷参加了工人运动。

针对这种形势，共产党采取了通过罢工来实现民主革命的战术。共产党对工人经济要求的切实性和权力意识的正当性进行了最强有力的辩护，对现存的秩序给予了最激烈的抨击。同时，竭力鼓吹变革体制是不仅可能而且必须的思想。这样，共产党就将工人的经济要求的切实性和权利意识的正当性同自己的革命主义路线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了。当时，在承认通过议会而产生的政府的正统性前提下，共产党也遵守占领军提出的自由民主原则。但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公正自由选举的自由民主原则，只具有相对的、暂时性的价值，因此，当为了保护劳动大众的利益，而且认为是必要的时候，共产党就会毫不犹豫地否定自由议会制的原则。

显然，按照这一立场，采取通过罢工这一议会外的强有力的武器来打倒以议会中的多数为基础而成立的政府的战术，也就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了。

从占领军方面来看，毫无疑问，这种战术会造成破坏占领秩序和破坏经济的危险后果，并且它将使自由和民主本身的确立成为不可能。共产主义的这种趁危机之际制造危机，从而掌握政权的做法，是盟军总司令部所不能容忍的。

革命主义的挫折

占领军对罢工介入的不可避免性，从事前的多次警告中就应该充分估计到了。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的干部对此也感到危惧。但是共产党的德田书记长等人对此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针和展望，而是在相信占领军不会介入的前提

下制定大罢工计划，并排除了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然而，当麦克阿瑟的指令一下达，他们却又立即放弃抵抗，指示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联合斗争委员会的干部停止罢工，并急急忙忙地解散了斗争体制。

虽然事实上只有依靠占领军所给予的自由和民主，共产党才获得了活动的自由，但是共产党的立场本质上具有一种从正面同占领军背后的美国政府相对立的性质。共产党干部也许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对立，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仍避免正视这一事实的深刻意义。

对盟军总司令部来说，自己给予的自由和民主却造成了共产党发展的局面，是极其尴尬的。既然采取自由民主的原则，那么要禁止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就是困难的。如果共产党并没有公然提倡武力革命，而去否定民主主义的话，则会更困难。而且，简单地否定作为工人斗争手段的罢工权力，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估计还会引起抵抗。因此，当时盟军总司令部避免介入围绕政治目标的大罢工的是与非这种一般原则性的争论，而极力说明，“在当前的困难形势下，举行这样的罢工将会给国民的生活带来致命的打击”，是想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计划罢工的左翼势力是脱离广大国民的。

二一大罢工的停止，使共产党和产别会议的革命主义路线遭受挫折。这一挫折的直接原因虽然是由于占领军权力的阻止，但更基本的原因则是作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基础的劳动大众的要求和思想与共产党及产别会议的战略战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二一大罢工的高涨，似乎证实了共产党革命主义路线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但那实际上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而现实却并没有象许多共产党员所认为的那样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第一，作为整体，工人运动本身并没有朝着革命形势高涨的方向发展。

二一罢工计划的斗争，是上一年10月斗争前后当民间的主要工会都基本上实现了待遇改善之后，作为剩下来的政府机关、公共机关和政府企业的工人为改善待遇而发起的斗争。同往往把革命作为自身目的的共产主义者不同，一般大众的思想认识主要是实现经济要求。因此，只要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妥善解决，那么，脱离战线就是理所当然的。二一大罢工计划，实际上就是在民间主要工会的斗争已大体结束，高潮时期过去之后的情况下制定的。

政府机关、公共机关和政府企业中的大多数工人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迫切要求改善待遇而参加斗争的。二一大罢工的停止不仅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了占领军的权力，而且随着经济形势和制度条件的变化，许多工会活动家都不得不脱离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共产党和产别会议虽然解释只有通过罢工实现民主革命，才是改善生活的道路，然而，实际上不能否认的是，罢工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共产主义者的这种将革命的政治目标放在首位，不考虑手段的战术，既包含着将工人运动从广大国民中孤立出来的危险，也孕育着从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中产生出批评势力的可能性。共产主义者的这种战术，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战后的法国和意大利也同样被采用过，并且遭到了相同的批评，从而以失败告终。在日本，二一大罢工的停止，成为产别会议系统的工人运动由于内部批评势力的抬头和加强而走向自我解体的起点。

产别会议的衰落

共产党提倡“民主革命”，但实际上日本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正按照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迅速推行。集中了民主化基本内容的新宪法已于11月3日公布，并已决定在来年的5月3日施行。新宪法所代表的民主化的内容，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相比，虽然被认为是不彻底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日本社会的现实的话，可以说还是革命的。盟军总司令部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在确立了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体系之后，不是进一步提出新的革命，而应是将保卫、培育、普及和巩固已实现的各种民主制度作为基本课题。

共产党和社会党左派的领导们希望进一步前进，实行“社会主义”的纲领。为此，通过各种方式反复提出了包括银行等在内的各种产业的国有化和国家管理的口号。但是，这些政策就现实而言，究竟有多少必要性和有效性，是不清楚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的提案，是和各种产业的现存的所有制关系相冲突的，必然要遇到强大的抵抗。而且这些提案并不能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打破这些抵抗。

这时，在吉田内阁领导下，经济复兴政策终于得到了实施。首先将目标交给官僚和经营者阶层，使他们恢复信心，重新确定他们组织领导方面的作用。虽然复兴的进展缓慢，但已开始看到了大众经济生活有实际改善的可能性。共产党通过合法化后的活动虽然不仅终于缓和了战前政府当局植于大众内心的反共恐怖感，而且在社会党政权之后，共产党的得票率仍在增长，但是，他们所希望的革命的机会却开始变得渺茫了。

1947年2月6日，二一大罢工停止后所引起的冲击尚未消失，召开了自上一秋天起就已筹备的经济复兴会议的成立大会。总同盟、产别会议、日劳会议与几个较大的行业工会、日产协、经济同友会以及其他有实力的经营团体的代表参加了大会。经济

复兴会议作为一个网罗民间实力的组织，促进经济复兴的团体，它负责各产业复兴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但是，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相比，也许可以说经济复兴会议成立的最大意义是在于它为实现经济复兴这个基本目标而创造出了一个形成不同意见相互合作的环境。

3月10日，召开了上一年由全劳恳（全国工会恳谈会）为主筹备的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联）的成立大会。全劳联是一个包括产别会议、总同盟和日劳会议等主要工会，合计450万人参加的统一组织。但正如其名称一样，它是一个联络协议体。总同盟讨厌产别会议的支配，要求实行全体一致制（即给予参加的工会以否决权的制度）。这一要求得到了认可，因此，实际上方针很难决定，远远称不上是一个统一战线。

遭到二一大罢工停止的冲击后，在产别会议内部要求排除共产党领导，使工会彻底民主化的活动加强。1947年11月，在国铁工会中，首先组成了反共联盟，并展开了反对共产党控制的指导部的活动。二一大罢工停止约1年后的1948年2月13日，以产别会议领导人之一（事务部次长）细谷松太等人为首组成了“产别民主化同盟”。

1948年4月12日，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成立。日经联是一个以对付劳务问题为主要目的的经营者团体。该团体的建立象征着经营者的领导权的恢复。它的成立宣言号召“经营者们，坚强起来”。

产别民主化同盟和日经联，与总同盟、日产协以及经济同友会等一起，在经济复兴会议中形成了批评产别会议的势力。

经济复兴会议成立之初，产别会议和其他团体之间，在态度上就有本质的差异。产别会议的想法完全以行使工会的实力为背景，通过掌握政权，来控制经济复兴的领导权，并表现出了将

经济复兴会仅仅作为宣传自己立场的场所的态度。总同盟、日产协、经济同友会、日经联和产别民主化同盟等团体，谴责产别会议是“经济复兴运动的破坏者，是怠工势力”。双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1948年7月5日，经济复兴会宣告解散。

在经济复兴会议成立前后，作为工会的统一组织而成立的全劳联的内部，产别会议和其他势力之间的对立也开始加剧。总同盟攻击共产党对产别会议施加影响，提出了工会的民主化运动。1948年6月28日，总同盟谴责全劳联受共产党的支配，并为此退出了全劳联。事实上，全劳联已变成以产别会议为中心的共产党系统的工会组织。

2. 倾斜生产

重建工业国

在亲身体会了战争的破坏之后，由于占领军采取了严厉的非军事化的政策，因此，战败后不久，不少人对日本重建工业的可能性持否定态度。

有人一本正经地提出了日本应以重建农业国为目标，成为“东方的丹麦”的意见。还有人主张日本应以西方的瑞士为楷模。瑞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免遭战祸的少数欧洲国家之一。在日本，了解瑞士情况的人很少。它给人们的强烈印象是一个依靠发展农业、畜牧业和精密机械工业而获得成功的国家。但是，无论是丹麦还是瑞士，都是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农业国或作为一个以精密机械工业和金融业为中心的国家而存在，不能忽视的是，它们依靠了其周围具有发达工业、收入水平高的欧洲这种特有的国际环境。

日本山多，在可耕地面积很少的岛国上拥有近1亿人口，平地的人口密度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高。依靠明治以来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上升，才使迄今为止的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而且，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是一个孤立的工业国，一直将所有主要产业部门都承揽在本国之内谋求综合发展。当时，和邻近各国之间没有发展所谓水平分工（发展阶段相似的各国间的分工和交流的关系）的可能性。因此，只能发展依靠进口原料、出口制成品这种垂直分工的加工贸易型经济。

当战争结束时，日本人的生活虽然陷入了极其穷困的状态，但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处于这种贫穷的生活水平。城市居民因战灾失去了住宅和职业，在疏散地或避难所生活既艰苦，粮食也不足，为了生存而饱尝了未曾有过的艰辛。战前和战后的落差很大。正因为如此，从贫困中摆脱出来的欲望也就更强烈。因此，即使就这种国民的要求水平和内容来说，日本重建农业国的路线也是不现实的。

早在战败后的混乱之中，就已有人明确提出了要想尽早从贫穷中摆脱出来，就只有重建工业国的这种现实的观点。

后来，成为第一届吉田内阁藏相的石桥湛山在1945年9月1日号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题为“重建产业之要点”的文章。文章论述了如下的观点，即：在波茨坦宣言中，阐明了“允许日本维持其经济，并允许维持足以用实物来支付赔偿的产业。”因此，最重要的是调查为维持我国的和平经济，什么样的产业需要多少，制定产业复兴计划，并“一个接一个地坚决加以实施”。即使是盟国也只能用我国的材料进行调查。因此，只要依靠我国明确详尽的资料，提出合理的方案，是不会被拒绝的。

从这种想法出发，石桥说明必须推进积极的产业复兴计划。除此之外，不仅没有可以避免“不景气和产业瓦解”的道路，而且

如果实施的话，“农业国衰落论”等就会一举驱散。石桥在战前就是反对军部统治和反对推行战争政策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大力介绍凯恩斯理论的积极政策论者。

两条路线

即使在日本的官僚机构内部，从认为战败必然到来的战争末期起，就已开始摸索重建战后经济的办法。在民间的经济团体中，也开始研究向和平经济转变和复兴的途径。

1945年9月8日，日本经济联盟、重要产业协议会、全国商工经济会协议会和商工组合中央会4个团体为答复商工大臣的咨询，整理了一份关于“战败后日本经济的整顿”的报告。

报告说明为了不被追索超过“维持民族生存界限”的过大的赔偿，必须提出合理的资料同盟国进行交涉。为了达到接纳复员军人和从国外撤回来的返乡者，维持民族的生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光靠农业是不可能的，还必须确保工业。并提出了需要发展和平民需产业、出口产业和作为基础生产部门的重工业等三种工业。此外，报告强调为了确保原材料和粮食的进口，必须尽早加入国际贸易。

外务省调查局委托由各界专家19人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去研究“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委员会从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举行了约40次会议，并于同年3月整理了一份报告书。

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属于“讲座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山田盛太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井上晴丸和属于“劳农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内兵卫、有泽广巳、宇野弘藏和胁村义太郎（都是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等人。

讲座派的名称来源于野吕荣太郎等人編集，1932年到1933

年由岩波书店发行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一书的书名。被视为讲座派主流的山田盛太郎等人的理论，站在与1932年共产国际关于日本问题的方针相同观点的立场上，重视日本的半封建遗制。在战前和战后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劳农派的名称来源于1927年创刊的《劳农》杂志。筹划组织“劳农派”的有，堺利彦、山川均、荒畑寒村、猪俣津南雄、大森义太郎和铃木茂三郎等人。劳农派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产生过许多分歧和对立，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形成了一个批判共产党的路线和运动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集团。战后，劳农派的一部分和社会党左派结成了密切的关系。

在外务省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中，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外，还有中山伊知郎、山中笃太郎（都是东京产业大学——战前的东京商科大学，战后的一桥大学的教授）、东畑精一（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稻叶秀三（原在计划院工作，战后担任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理事）和土屋清（朝日新闻社评论委员）等人。

虽然参加关于重建经济方向的讨论要求跨学派，但由于委员会是这样一种构成，因此，报告书的内容不尽统一。报告书的前半部分讨论了重建经济的前提，后半部分则归纳了重建经济的方针和政策。作为重建经济的方针和政策，报告书首先强调了经济民主化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农业、中小工商业的合理化和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会排斥出过剩人口，要雇用这些过剩人口，并且增加对农业的肥料、机械等的供给，工业化将是很重要的，为了进口粮食以及其他产品，也必须出口工业品。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实现技术的高度化和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期望振兴对外贸易，但这不能单靠日本的一厢情愿。而且，过分依赖对外贸易，会造成经济基础的“不稳固”，妨碍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在着眼于国际分工大局的同时，还必须谋求开发和

利用国内资源”。报告书将振兴对外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外向型”政策和开发利用国内资源以及开拓国内市场的“内向型”政策并列提出，而且较强调后者（内向型的政策）。

当然这两项政策并不一定是对立的。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和扩大国内市场往往会相互作用、互为促进的。但是过度的“外向型”政策，会忽视那些能够扩大和深化国内市场的各种条件的完善；而过度的“内向型”政策，又对参加国际分工的不可避免性产生轻视的态度。在占领这一特殊情况下，参加国际贸易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当时必然会出现向“内向型”政策的倾斜。但是，在50年代初经济自立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又再次成为论争的主题。

倾斜生产的思想

1946年5月成立的吉田内阁，继承了币原内阁处理停战的各项业务，并一边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指示下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一边努力推行将经济复兴纳入轨道的政策。其中，尤其是被列入1946年度预算的价格差补贴金和最初由日本兴业银行实施，后来由复兴金融金库接受的复兴资金的融资，是吉田内阁的主要政策手段。

吉田首相在内阁成立后，为了得到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成立了由数位专家组成的顾问会议。1946年11月5日，顾问会议改名为“煤炭委员会”，成为讨论和提出煤炭增产政策的正式官方机构。当时的成员有：有泽广巳、稻叶秀三、都留重人、吉野俊彦、佐藤尚邦和大岛宽一等6人。“倾斜生产”的思想，从顾问会议时期就已产生，并由煤炭委员会具体化。这是一个以有限的资源为前提，为增加煤炭生产，以倾斜的方式投入的想法。

煤炭委员会委员长有泽广巳，在1946年12月10日的论文

(《挽救日本经济的残局》，有泽广巳著《通货膨胀和社会化》P.68—69)中作了如下的阐述：

“针对面临的难题，过去就曾尝试过各种补救的办法和手段，今后也许还会尝试。但现实过程将推开它前进。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照此下去，我们就只能随波逐流。为此必须抵抗这种潮流，以我们的计划和组织，将这一自然过程改变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正常的过程。

我把为实现这一改变的计划和组织的全部体系称为倾斜理论。如果采用激进的说法，那就是说将所有的经济政策都集中地向我们手中唯一能够处置的基础材料煤炭的生产倾斜。就是说要组织起一个暂时以煤炭政策为核心的经济。它是向煤炭倾斜的经济。当然，这是不稳定的经济，既不能长期维持，也没有这个必要。然而，只要是全面普遍地提高生产水平还存在着许多无法抗拒的困难。那么就只有使经济有计划地倾斜，迅速提高基础部门的生产，然后以此为杠杆创造出使生产水平全面提高的转机。”

在同一篇论文中，有泽还指出，纠正通货膨胀收益固然是必要的，使通货膨胀平息则更为必要，但是如果不改善“经济的现实过程”，那么，也许我们就会一步步地从文明倒退到野蛮。“应该改革的不是消费，而是生产”，生产斗争是必要的。

有泽的这种见解清楚地表明了扩大生产应优先于通货膨胀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对吉田首相和石桥藏相敢于增发通货膨胀性货币来积极供给产业资金这一政策的肯定。

有泽认为，正象过去苏联国民敢于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进行“英雄般的转变”那样，我们必须采取与苏联相反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从强有力的统制经济向部分容许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混合经

济转变,而有泽主张的是从作为“自然过程”的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制向吸收了计划化和组织化成分的混合经济转变。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部分,有泽指出,“必须立即集结能够贯彻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势力”。

有泽的新经济政策论,反映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最现实主义的分析家和作为实际调整者的有泽,在其思考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素养,表明了他对市场经济自动调节能力的不信任。但是敢于将有泽为新经济政策的倾斜生产政策导入和推向现实的,不是社会主义势力,其动机也和社会主义几乎毫无关系。

向煤炭和钢铁倾斜

倾斜生产虽然是一个新的名词,但为实现倾斜生产的主要政策手段体系在倾斜生产这个名词出现以前就大体确立了。如价格差补贴金和复金融资就是这类政策。倾斜生产一词则强调了这些手段的正当性,并有意识地加以重点地运用。

从1945年到1946年,生产急剧下降,复兴难以取得进展。对以吉田为首的政府领导层来说,如果经济活动极度下降的状态长期化,就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使政治危机激化的危险增大。事实上,激烈的工潮攻势和共产党影响力迅速扩大的基础,就是饥饿状态的蔓延和就业不稳定的加剧。在这种状况下,政府无论怎样坚持保守信条,都很难下决心将整个过程寄托于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能力,因而不能不采取某种产业复兴政策。

在战后日本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战前的中央集权制度和以官僚为主导的传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队和政治警察虽已被解体,但其他的官僚机构则大体上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并成为直接承担制定和实行战后改革以及复兴计划的主体。日

本的官僚机构既保持着明治以来殖产兴业政策的传统，又存在着战前被称为立志计划化的革新官僚集团。战时，迫于需要，在很大范围内建立了根据物资动员计划实行统制和配给的制度。战后，这种战时体制的相当一部分，通过重新整编后，成为经济复兴的手段。

担任吉田内阁藏相的石桥湛山是最先认识到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重要性，并且将其介绍给日本的开明的经济学家。他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正如在先前介绍的财政演说中所表明的那样，石桥湛山强调要防止失业的发生和增加，就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因而，当前所追求的经济复兴政策，应该是采取依靠积极的财政资金散超的通货膨胀性倾斜生产政策，而不是通货紧缩。

价格差补贴和复金融资是政府将资金重点投入基干产业，促进其复兴的手段。但是，为了复兴产业，还必须重点地分配能源资源和基础材料，而其中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也必须依靠进口来筹集。

政府已多次向盟军总司令部恳请紧急进口粮食，其中的一部分已得到同意和实施。1946年10月，吉田内阁再次恳请盟军总司令部紧急进口重建产业的各种资材。12月7日，盟军总司令部批准允许进口重油、烟煤和焦炭。这对当时事实上被割断与外界联系的日本产业来说，是极为宝贵的生产资料。政府的政策是将这些进口的材料重点投入钢铁业，然后再将增产的钢材重点投入煤炭产业。在物资的流通方面，倾斜生产具有物资动员计划的性质，即将有限的进口材料重点投入钢铁生产，将钢铁重点投入煤炭生产。当时，为维修和改造钢铁产业以及煤炭产业的设备所需资金的主要部分是靠复金融资来提供的。同时，将钢材以比生产所需费用低得多的价格出售给煤炭产业。同样煤

炭也以比生产所需费用低得多的价格出售给钢铁、电力、硫氨和国铁等重要产业。而所需要的费用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则由价格差补贴金来填补。这样，倾斜生产的目的是试图以煤炭和钢铁为基轴，从生产资料流通和资金流通两个方面来促进经济的复兴。

煤炭3000万吨

以1946年2月的金融紧急措施令为核心的经济危机紧急对策，暂时压缩了货币量，使通货膨胀出现缓和状态。但是，这以后，由于财政赤字使日本银行继续承担公债的发行以及由于为弥补家庭赤字提取存款和产业贷款的增加等原因，货币发行量再次增加。1946年9月，日银券的发行额超过了金融紧急措施令以前的最高纪录，物价随之暴涨。

虽然存款的大部分被冻结，但仍允许每个月在一定限度内支取家计所需的新日元。而且企业间交易的很大部分和银行放款等虽然是用支票进行的，但却允许工资在一定限度内用自由日元来支付。因此，一部分冻结存款便渐渐地转换成自由日元，使自由日元的余额也逐步增加。

企业手头的军需物资等原材料已经用光。因此，暂时上升的工矿业生产也在1946年9月达到高峰后开始滑坡。

对于当时处于战败和被占领这种异常状态下，原料和燃料不可能自由进口的日本经济来说，只有能够自给的煤炭和发电用的水力是产业用的能源资源。其中，在煤炭产业中，自战争期间被强制做劳工的朝鲜人和中国人离去之后，出现了劳动力的不足，维护坑道和矿井作业所必需的钢材也出现了短缺。另一方面，在钢铁产业中，由于煤炭不足，增产受到障碍。至于电力，虽然更多地是依靠水力，但火力的燃料也全是煤炭。由于严重

缺水再加上煤炭短缺使发电量不足，造成经常停电。同时，煤炭不足也给当时作为主要运输手段的铁路蒸汽机车的运行带来了障碍。化学产业也要依靠电力和煤炭。因此，用于增产粮食的化学肥料的增产也与煤炭产业的动向有关。但是计划煤实际数从1946年年中下降，以后虽然出现了稍稍增加的势头，但1946年下半年的实际数相对于上半年的实际数来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倾斜生产的思想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提出来的。

1946年12月10日众议院作出的特别决议指出：“产业的重建和稳定国民生活都有赖于煤炭的生产”，要打破煤炭生产停滞的状态，就必须超越不同的政治主张，齐心协力，全力以赴。

12月12日，以有泽广巳为委员长的煤炭委员会整理了“煤炭对策中间报告”，建议政府采取有关资材、煤价、资金和劳务的各种措施。12月24日，在内阁会议上，政府根据经济安定总部的提议，决定了以煤炭和钢铁超重点生产为核心的突破经济危机的基本方针。根据这一基本方针，1947年度的煤炭生产目标被确立为3000万吨。

日本的煤炭产量从1934年到1936年年均约为3852万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创造了5647万吨的最高纪录。以后这一纪录虽然始终未被突破，但战争期间的产量一直保持在5000万吨以上。战败后，产量急减，1946年仅为2038万吨，相当于最高纪录时的36%。

根据1948年5月23日发表的“经济形势报告书”（第二次经济白皮书）所揭示的统计，1937年度的煤炭消费实际数是5116万吨，其中50%为“产业用”（工业用），而钢铁产业的消费就占13%。1946年度的总配煤量只有2277万吨。其中产业用为28.2%，提供给钢铁产业的下跌到6.3%。另一方面，“非产业用”的消费量，如以1937年为100则1946年为64。非产业用是指：煤

矿现场消费、铁路、船舶、进驻军、电力、煤气、焦炭和暖气等。在生产量急减的过程中，因为要优先确保非生产的使用，结果使产业用煤炭的供给进一步大幅度下降。

政府确定 1947 年度 3000 万吨的目标，是想通过增加总配煤量来扩大钢铁和化学肥料等产业用煤的供给。为此，政府充分利用价格差补贴金和复金融资，采取优先向煤炭产业分配钢材和向煤炭工人增配粮食的措施。

片山内阁的成立

在 1947 年 5 月 3 日新宪法施行之前的 4 月 20 日，举行了第一届参议院议员选举。同时，旧宪法下的众议院在 3 月 31 日解散之后，也于 4 月 25 日举行了大选。从帝国议会时代开始算起，这是第 23 届。按战后计算，是第二届。事实上，是新宪法体制下的首次大选。

参议院议员的选举因为是首次，所以全国和地方选区合并起来，将选出 250 名议员。其中一半任期为 6 年，其余的一半任期为 3 年。在当选的 250 名议员中，无派别的为 111 人（占 44.4%）。在这期间，参议院和众议院不同，希望多选举各界无党派代表的要求很强烈。参议院议员选举后的 5 月 17 日，以作家山本有三议员等人为核心，以无派别身份当选的文化人、旧贵族院议员和官僚出身者组成了绿风会。绿风会虽曾一时成为参议院中最大的派别，但很快便衰落下去。在政党中，各党派当选的人数分别为：社会党 47 人，自由党 38 人，民主党 28 人，共产党 4 人。

4 月 25 日大选的结果，从得票率来看，吉田首相的自由党虽然勉强保住了首位，但在议席上，社会党已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的得票率从上届（1946 年 4 月 10 日）的 17.8% 上升为 26.2%，

增加了 8.4 个百分点，议席数从 93 人增加到 143 人，一下子增加了 50 人，自由党的得票率虽然也增加了 2.5 个百分点，但议席数却减少了 10 席，仅为 131 人，变成了第二大党。

自由党倒退的原因之一，是在该年 2 月 7 日麦克阿瑟指示举行大选以后，由于吉田拒绝了进步党总裁币原希望自由党和进步党合并的要求，因此，自由党的部分成员（9 名议员）和国民协同党的部分成员（15 名议员）与进步党合并，于 3 月 31 日组成了民主党。但是民主党本身从组成时 145 人的众议院第一大党退居为大选后 121 人的第三大党。协同党在 1946 年 4 月的大选后，虽然纠集各派组成了协同民主党（同年 5 月），但在这届大选前已与国民党（1946 年 9 月成立）合并成为国民协同党（3 月 8 日）。国民协同党组成时，在众议院的议席数是 78 席，但由于部分成员转入了民主党，因此，大选结果议席数下降为 29 席。

共产党的活动只是在二一大罢工这场戏剧性的事件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得票率从 3.8% 下降为 3.7%，议席数从 5 人减少为 4 人。尽管共产党和产别会议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很大，但国民对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支持仍很小。

社会党虽已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议席数却连众议院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因此，如果不通过联合，就不可能掌握政权。自由党尽管议席数减小，但只要和同是保守派的民主党联合，就能够维持过半数的席位并保住政权。但是，吉田决意下野。社会党便开始朝着同保守派联合执政的方向努力。

5 月 20 日，吉田内阁总辞职。吉田多次表示将站在在野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主义。

6 月 1 日，成立了由社会党、民主党和国民协同党三党联合的新内阁。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片山哲任首相、书记长西尾末广任内阁官房长官。取代币原掌握民主党领导权的芦田均任外

务大臣。此外，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任电信大臣。

片山内阁几乎完全继承了第一届吉田内阁在其后半任期内提出的倾斜生产思想。因此，倒不如说将煤炭和钢铁放在优先地位的倾斜生产的思想，是在片山内阁及其以后的芦田内阁时期得到正式推行，并且取得明显效果的。

在社会党参加的片山、芦田两届内阁和吉田内阁之间，对有关重建经济的路线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由于片山内阁在社会党左派主张重要产业国有化的政策背景下，提出了煤矿国家管理法案，因此，这便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争论点。但是煤矿国家管理是一个一方面保留煤矿私有制，一方面实施国家管理的中间性政策。对此，社会党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国有化论者感到不能满足，而联合执政的民主党则认为这种政策会破坏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而强烈反对。煤矿所有者也表示反对。最后法案在朝温和方向修正的基础上，终于在国会上通过，并于1947年12月20日公布，1948年4月1日实施。提出煤矿国家管理的社会党，认为这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增加煤炭产量，暂时强化国家统制的一种手段，而且并未取得明显的效果。1950年5月20日该法案便被废除。但是，以煤矿国家管理为转机，改善和稳定劳资关系，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效率的活动却得到了加强。

3. 价格差补贴金和复金融资

价格差补贴金

吉田内阁时代建立并由片山和芦田两届内阁继承的价格差补贴金和复金融资制度，在1947年到1948年度的经济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价格差补贴金制度在战争期间就已存在。战后的补贴金，从1946年度的90亿日元开始，1947年度为225亿日元，1948年度急增为625亿日元。但这个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的发展，因此在实际规模上，1946、1947和1948这3个年度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别。1949年度以后，又新增了进口补贴金。国内补贴金在1950年度以后得到统一。

就价格差补贴金在主要产业中的构成来看，1946年度补贴金的对象仅为煤炭和粮食，其中粮食的比率(71.9%)特别大。1947年度，对象扩大到了钢铁、肥料和其他产业，同时重点也移到了煤炭(44.2%)。到1948年度，煤炭的比率(29.7%)下降，钢铁的比率(34.2%)上升。1949到1950年度，煤炭的比率进一步下降，重点转到了钢铁和粮食(进口补贴金)上。

价格差补贴金的基本作用就是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通过用财政资金来填补趋于上升的现实的生产和低的被固定的公定价格之间的差额(赤字)，从而使企业能够一方面保持公定价格，一方面又做到收支相抵。

1947年7月4日，经济安定本部发表的《经济实态报告书》被称为第一次《经济白皮书》，它用简单的指标描述了政府、民间企业和家计都是赤字的危机状况。其中，显示出了从1946年末到1947年初这段时期每吨煤炭的运煤原价和生产价格。运煤原价因反映通货膨胀而持续上升，从1946年10月的389日元上升为1947年3月的613日元。5个月约上升到1.6倍。与此相反，生产价格(公定价格)因1946年11月被提高，所以赤字暂时减少了，但这以后又再次扩大。就1947年3月的数字来看，生产价格只有运煤原价的56.6%，赤字达43.4%。《经济实态报告书》所显示的4家钢铁公司的经营状况也表明，总收入只占总支出的67.6%，32.4%是赤字。其中靠价格稳定资金(价格差补贴金)填补了

17.1%，剩下的15.3%是“纯赤字”。

煤炭的价格差补贴金发挥了压低煤价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才有助于压低购入煤炭的产业的原料和燃料费用。而低煤价起到了压低购入煤炭的钢铁产业的生产费用的作用。低钢铁价格又起到了压低购入钢铁的煤矿业的生产费用的作用。这样，价格差补贴金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达到了压低生产价格的目的。而生产价格的降低又使需求相应增多，从而使生产量的增加成为可能。

政府虽然压低了被认为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基础产业的公定价格，并相应地采取多提供价格差补贴金的政策，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急剧发展，现实的生产费用和公定价格之间的差距仍在急速扩大。为此，政府不得不增加价格差补贴金的供给。同时，也不得不反复提高公定价格

复金融资

作为经济复兴的政策手段，与价格差补贴金并行的是复兴金融金库(复金)。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它是继承日本兴业银行复兴金融部的业务，于1947年1月25日开始其业务的。就在二一大罢工这一政治性的舞台的另一面，政府金融机关开始了实务性的工作，并在以后发挥了巨大作用。

复金的实际活动时期是到1948财政年度末为止。在这期间，贷款额1946年度为62亿日元，1947年度上升到970亿日元，1948年度又急增到1963亿日元。但是由于物价急剧上涨，因此，实际增长并没有那么多。作为参考，如以战前的标准批发物价指数(日本银行)以1946年度的固定价格来看实际规模的话，那么，1946年度为62亿日元，1947年度为328亿日元，1948年度为250亿日元。实际上1947年度最多。从产业来看，以煤炭为主

的矿业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产业。其次是电力和化学工业。此外，对各种公团的融资也间接地促进了各产业的复兴。各年度贷款的相当部分被按期回收，1948年度末的余额为1320亿日元。其中，矿业占39%，电力占17%。

银行等一般金融机构的存款等原资，因通货膨胀而大幅度贬值。同时，国民为了维持“剥笋生活”，又逐步提取存款。在货币急剧贬值的过程中，任何人都会认为以存款的形式来保存自己的资产是愚蠢的。因此，吸收新的存款是困难的。而且由于遭到象军需生产停止、财阀解散、排除经济力过度集中法和赔偿问题这样的反复打击，产业的前景也很不明朗。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在证券市场上筹措资金都很困难。因此，在整个的产业资金的筹集中，复金融资便占了很大的比率。

在复金融资、全国银行贷款、股份缴纳金与公司债发行额这三者的合计额中，复金融资1947年度占48.3%，1948年度占21.5%。如果仅就设备资金来看，复金融资的比率则更高。1947年度为72%，1948年度为65%。但无论是哪方面的数字，1948年度都比上一年度要低。

就1948年度末全国金融机构融资余额中复金融资占的比率来看，煤炭、电力、海运、钢铁和肥料5种产业，设备资金融资的64—98%是依靠复金的。

复兴金融金库是作为政府投资的一个特殊金融机构而设立的。原资的一部分是用政府投资来提供的，但大部分是靠发行债券(复金债)来筹措的。在1947年度末的资产负债表中，政府投资70亿日元，债券发行额559亿日元，利润累计4.85亿日元，合计为633.85亿日元。债券发行额占总额的88.2%。1948年度政府投资增加。虽然截止上年度的债券已偿还，但因为又发行了新的巨额债券，所以在1948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中，债券发行额

仍占79.2%。

复金债的主要部分是以日本银行直接承担的形式发行的。换言之，是通过增发货币来提供资金的。从各年度末发行额中日本银行所拥有的部分的比率来看，1946年度末占94.1%，1947年度末占76.0%，1948年度末占64.4%。复金债的发行是1947年度和1948年度增发货币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个时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又被称为复金膨胀。

复金膨胀

在1947年5月3日的新宪法施行之前，制定了财政法，并于同年4月1日施行。在财政法的第4条中规定：“国家的岁出，必须以公债或借款以外的岁入作为财源”，明文规定了禁止随便发行公债。不过，在第4条中又附加了这样的保留：“但是，关于公共事业费、投资和贷款的财源，在经过国会议决的金额范围内可以发行公债或借款”。但是，在第5条中规定，原则上不允许日本银行承担公债和借款。盟军总司令部担心通货膨胀加剧和因此使国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扩大。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强大压力下，政府被迫在一般会计方面编制收支均衡的预算，并从1947年度的预算起，停止了对公债的依赖。

这样，在一般会计方面，便防止了因通过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而产生的通货膨胀。但是复兴金融金库这一政府机构可发行的大量公债是让日本银行来承担的。因此，使货币大量增发，通货继续急速膨胀。

各种物价指数也呈波浪状逐级上涨。到1948年末已达到了战前的200倍左右。仅就长期统计所得到的批发物价指数和东京零售物价指数来看，1946年的物价上涨虽然最激烈（相当于上

年的4.64倍和6.14倍),但1947年和1948年的物价也上涨到了相当于上年的将近3倍。1949年的平均物价,和1945年的平均物价相比,零售物价上涨了约80倍,批发物价上涨了约60倍。

作为战争期间缓慢发展的通货膨胀和战后急剧发展的通货膨胀的结果,1949年的货币价值同战前相比,下降到了二百分之一以下。事实上,战前的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值已接近于零。

战争期间,物资受到统制,而且因物资短缺而买不到东西,战后,由于存款被冻结又无法靠买实物来防止货币贬值所引起的损失。因此,大多数的国民只能坐视货币急剧贬值。结果通货膨胀造成了与政府将国民的金融资产没收和抛弃的同样结果,取得了使债权人遭到巨大损失,而债务人则勾销借款的同样效果。

在战前、战时和战后连续发行大量公债的政府获得了最大的债务利益。而偿还公债这个难题却几乎消失得一干二净。但是,由于这种金融资产贬值,为了防止意外的支出而拥有某些存款或拥有在战争期间被摊派的国债的一般国民都受到了打击。尤其是拥有巨额金融资产靠利息和股息生活的上层阶级,由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而彻底衰落。

地主阶层因土地改革土地收买价被冻结,也遭到了近乎被强行无偿没收的结局,许多人在经济上走向了衰落。

靠政府的补助和贷款而被促进复兴的重要产业,尽管面临战争的破坏和军需的停止,但却避免了金融上的破产,并因通货膨胀而获得了巨额的债务利益。在接受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和偿还这些贷款这段时间内,无论物价上涨了多少倍,货币贬值到了几分之一,这种债务利益都主要是以有助于复兴的生产设备

的修复和改造这种实物资产的形式来积累的。

生产的恢复

由吉田内阁着手、片山内阁继承的煤炭增产政策，开始时并未取得十分明显的效果。1947年度的煤炭生产未能达到所期待的那种增长幅度。1947年7月3日，在内阁会议上，政府决定了“煤炭非常增产对策纲要”，提出了彻底实行二十四小时轮班生产体制，提高工资待遇，“健全”工会改善劳资关系，优先分配资金与生产资料，开发新煤矿和新煤层等方针。

1947年度下半期，优先投入钢材等生产资料的政策终于开始产生效果，1947年7月5日发表的新物价体系使煤价上升，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结果，煤炭生产趋于上升。1947年度的煤炭生产实绩达到2932万吨，取得了大体上接近3000万吨目标的成果(达标率为98%)。

煤炭的增产也给其他的产业带来了有利的影响。1947年度普通钢材的产量为57万吨(比上年增长75%，达标率为75%)，硫酸的产量为73.5吨(比上年增长34%，达标率为70%)。但是，1947年度的工业生产却没有达到所期待的那么高的增长幅度。倾斜理论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虽然煤炭的发货量增加了三成，尤其是产业用的配煤量增加了四成，但工业生产的综合指数仅增加了二成。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1948年5月23日发表的《经济形势报告书》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尽管煤炭增产，但工业生产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增长。原因是：第一，煤炭的增产是在这个年度的下半期开始的，它对工业生产的影响要到1948年度才会反映出来；第二，由于运输困难，煤炭和其他物资的滞货现象增加，使增产受到阻碍；第三，因枯

水(河流量不足)的影响,电力持续不足;第四,进口原料不足和手头资材的减少限制了增产。

《经济形势报告书》还指出,甚至在重点产业中,也出现了主要原料比较宽裕而次要材料和劳动用品不足的情况以及生产资料的生产虽很顺利,但消费资料的生产却相反下降的一些不均衡的现象。

报告书暗示,为了复兴生产,不仅是恢复重点产业,而且还必须使各种主体所承担的产业活动全面恢复。从而早已指出了倾斜生产方式的限度。同时,也明确说明为了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复兴,必须通过进口原材料来填补基础材料的短缺。进入1948年度后,工矿业生产加速上升。但正因为如此,摆脱占领下的不正常的封闭体制,恢复正常的对外贸易,建立一个能够自由地输入原材料的体制已迫在眉睫。

事实上,支撑经济复兴活动的不仅是被作为政府倾斜生产政策对象的重点工业。在所有的产业部门中,都以战前和战时的经验为基础,开始了各种创造性的事业活动。虽然其中有些是黑市商人或小贩等巧妙利用通货膨胀的投机买卖,但是他们也暂时成为流通活动的重要的承担者。

以在战争中作为军需开发的技术和得到普及的熟练技术为基础,试图使战前就已萌芽或已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民用机械工业等得到复兴的活动蓬勃发展,而且新开业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许多领域中,出现了大量中小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虽然在1949年压缩通货膨胀时破产倒闭,但有一些却生存了下来,并作为象征着战后发展的一批有活力的企业而成长起来。

新的重化学工业化

电力在1945年下跌到了最高峰时期(1946年)的60%左

右,即 210 亿千瓦小时。但尽管如此,相对 1935 年来说,仍达到 94% 的实绩,大体与战前相等。1946 年电力是 271 亿千瓦小时,达到了超过战前 20% 以上的水平。以后逐年增加,1949 年达到了 362 亿千瓦小时,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此外,1975 年度的总发电量达 4758 亿千瓦小时,为 1949 年的 13 倍。)

电解铜、粗钢分别下降到了战前的数分之一。虽然从 1949 年到 1950 年总算超过了战前的实际产量,但是,因为战争中大规模增产,所以同战时最高纪录相比,仍旧是相当低的。粗钢的产量到 1950 年时,也只有 484 万吨,相当于最高产量时的 60%。(在战后最高产量时的 1973 年粗钢的生产量为 11932 万吨,相当于 1950 年的 25 倍。)

硫氨和过磷酸钙的实际产量在日美开战前不久的最高峰时也是相当高的。战后,尽管为了增加粮食产量政府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直到 1949 年以前,其产量始终未能突破最高峰时的纪录。

在民用机械类中,作为新兴产业的缝纫机的增产十分引人注目。其生产台数在战前的 1935 年仅为 1.2 万台,但到 1940 年时却创造了生产 15.7 万台的纪录。战后,经过战争造成的中断后,又重新发展起来,1948 年时就已超过了以前的最高纪录达到 18 万台,1950 年又达到了 51.3 万台。至于战前就已相当普及的收音机、钟表和自行车等产品,战后虽然迅速地恢复了生产,但却没有轻而易举地超过以前的最高纪录。不过,这些民用机械的生产,却为那些被军需产业解雇的人提供了保障就业的机会,并为许多企业的复活和开设创造了条件,成为它们以后发展的重要转机。

这一时期的民用机械工业,就耐用消费品产业来说,虽然还处于初步的发展阶段,但它的成长预示着战后的一个新趋势。

一般认为日本的军需产业是依靠众多中小企业来支撑其基础的。但是这些中小企业在战后的复兴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上面那些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复兴相比较，作为战前的主要民需产业纤维产业的生产是恢复得非常缓慢的。这是因为战时体制使生产设备大幅度压缩；贸易限制使棉花和羊毛等原料的进口面临困难；以及由于同样的原因出口产业迟迟得不到恢复等各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转机。

一般来说，金属、机械和化学这3个部门被统称为重化学工业。它在工业的附加价值和就业中的比率的上升被称为重化学工业化。日本的工业虽然在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已迅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但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军需物资和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需物资的生产比率急剧缩小。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了复兴和成长，进行了旺盛的设备投资，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其内容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耐用消费品、家庭用品、农业物资和建筑材料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化学工业产品中已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通过战后改革建立起来的稳定和提国民生活的制度，对消费资料产业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发生了从以军需物资和生产资料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时代走向以消费资料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时代的巨大变动，重化学工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萌芽，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混乱时期，就已经产生了。

如果根据国势调查的统计来计算一下就业人口中制造业的比率(工业化率)和制造业中重化学工业的比率的话，那么，首先

工业化率在 1940 年虽已提高到 21.1%，但在战后的 1950 年却一下子下降到与 1920—1930 年相同的 16.0%。不过，这以后又再次上升。1960 年已提高到了大体上与 1940 年相同的 21.8%。其次，重化学工业化率在 1940 年已上升到 45.6%，战后虽也曾降低，但即使是 1950 年仍达 34.8%，高于战前的正常时期。

代表战前轻工业的纤维工业的雇佣，自从因战争而大幅度下跌之后，在战后的复兴和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增长。相反，战后机械工业的雇佣却从略高于战前正常时期的水平出发，急剧上升。

4. 东西方对立和体制选择

美苏对立

当美国陶醉于为动员国民参加战争而鼓吹的理念之中，忘却强权政治原理的时候，苏联却更加彻底地根据实力外交的原理行动了。苏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扩张领土的大国。

斯大林在扩大苏联的领土和权益的同时，将一些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们送入东欧和北朝鲜等占领地区，让他们建立政权。由于苏联的占领，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转变成了共产主义体制。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坚持进行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共产主义者集团，也独立自主地掌握了政府。在希腊，共产主义者反对英国援助的王国政府，并发生了内战。战争期间，苏联进驻伊朗北部，并无视停战后 6 个月以内撤兵的协定（英国、伊朗和苏联），继续实施占领。

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谈中，罗斯福提出了“欧洲解放宣言”的提案。其内容是：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代表所有国民组织的临时政府，并尽快地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代表国民意志的政

府。必要的时候，美、英、苏三国将进行合作以便使自由选举能够顺利实施。邱吉尔赞成这个提案。斯大林也表示同意。但是苏联没有表示将在占领地区保证实行完全的自由选举。

美国和英国也并没有坚持单纯地在所有的占领区和解放区内履行自由选举的原则。但是在包括西德的西欧和日本，自由选举这一原则则基本上得到了遵守。它加强了在这些地区重建起来的政治体制的正统性。在东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同西欧相比虽然较弱，但象捷克、波兰和东德这些在政治和文化上同西欧相近的国家，当纳粹崩溃之后，确立和重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条件是完全存在的。然而，苏联却朝着与其相反的方向行动。因此，在本应建立自由与民主主义的地区，苏联却彻底破坏了这种条件。

当然，开始时苏联也并没有考虑到必须将所有的邻国都搞成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即使共产主义者的统治没有确立，只要形成一个亲苏的稳定的中立国家群，苏联仍能达到国家安全这个目的。斯大林常常选择与其支援那些夺取政权的前景还不明朗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不如与共产主义者所敌视的国家的正统政府合作的道路。他与其冒着危险在“世界革命”上下赌注，宁可优先考虑本国的安全。

但是，在东欧，同苏联相邻国境线最长的波兰，确立亲苏中立政权的可能性却最小。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前的数百年间，一直处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苏联根据1939年的德苏协定，分割占领了波兰，大批地杀害波兰军人。苏联军队故意回避支援流亡伦敦的政权影响下的游击队，直到纳粹将他们彻底镇压。战后又将波兰东部划入苏联领土。显然，在有着这段经历的波兰人中间，亲苏集团要形成多数派是不可能的。为此，苏联占领军让大清洗后残存下来的斯大林派共产主义者组

织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建立了政权。在其他东欧国家中，也以类似的方法先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

铁幕

1946年3月5日，应杜鲁门总统邀请，正在美国旅行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指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横穿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下”。在美英等民主国家，伴随停战，军队被大幅度裁减。美国经济萧条，法国刚刚获得解放，德国国家崩溃。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已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苏联战后仍维持着战时的一部分庞大军队，并正在确立对东欧的统治。东西方出现了军事上的不平衡。丘吉尔的演说直率地表明了西方的许多领导人所怀有的危机感。

1947年2月，英国决定停止对希腊的援助，并向美国作了通告。这是因为，英国本身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因而连防止东地中海的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对希腊的援助都已无法进行下去了。3月12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宣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杜鲁门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美国和其他各国能够创造出自由的制度”。他解释说，如果对各国人民反对“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强迫实行专制政治的斗争不进行支援，就会动摇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的安全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这是在日本停止二一大罢工后不久所发生的事。

问题不仅仅限于希腊和土耳其，整个欧洲也都陷入了危机。美国代替英国援助希腊，也是因为英国陷入了危机。因此，必须向欧洲的主要国家提供援助。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国务卿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欧洲复兴援助的构想。这个被称

为马歇尔计划的构想是由乔治·F·凯南等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周密准备的。凯南批判了战争期间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无原则的协调政策。在驻莫斯科最后时期的1946年2月，他分析了苏联的行动之后，指出必须对共产主义实行“封锁”。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援助欧洲的自主复兴计划，因此，不会发生伴随援助而引起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这项计划是以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除外的整个欧洲为对象的。所以也邀请东欧国家参加。但是苏联拒绝参加，同时也禁止其各卫星国参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在由流亡伦敦回国的威尼休总统领导下，通过选举成立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参加马歇尔计划之后，便立即遭到苏联的压力而不得不取消。这一事件使斯大林感到必须强化统制。

1947年9月22日，欧洲主要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云集波兰的西里西亚，创立了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虽然是与共产国际不同的情报交流机构，但事实上，它是苏联的世界战略机构。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已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从而修改了苏联经济学家认为战后的资本主义通过一定程度的调整还能发展的观点。斯大林强调西方体制危机的意图是想鼓舞共产主义者，团结东欧各卫星国和扰乱西方内部。

1947年6月27日，就接受美国援助而召开的巴黎会议（英、法、苏外长会议）破裂。7月12日，在巴黎召开了除苏联控制下的各国和西班牙之外的欧洲十六国会议，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1948年4月16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成立。1961年9月，OEEC在美国和加拿大加入之后，改组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64年4月，日本也加入了OECD。

1948年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内阁想要解除忠于莫斯科、将警察作为共产党一党机构的内务部长（共产党员）时，共产

党发动了政变。在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中，支持共产党的力量较弱。因而政府表示出了对莫斯科的反抗。

从1948年4月到1951年末，美国通过OEEC向欧洲提供了120亿美元的援协。随着经济的复兴，即便在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也开始呈现衰落。

亚洲的共产主义化

即使在亚洲，美国对战后形势变化的反应也是迟缓的。虽然日本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计划得到了周密的推行，但在其他地区却未能事先制定出适当的对策。

朝鲜半岛被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后，针对朝鲜的统治，苏联方面的反应十分敏捷。而美军则什么准备都没有，在苏军之后才进驻南朝鲜。因此，无论是突然接受进驻南朝鲜任务的占领军，还是从流亡地美国回来的保守派政治家，都无法确立有效的统治体制。由于左翼势力的强烈抵抗，也由于经济危机和粮食短缺，不断发生民众的反政府运动，因此，民主制度虽已建立，但却没有作为一个稳定的政体发挥作用。

根据美苏协定，双方军队应于1948年12月从朝鲜撤军。但美军因南朝鲜政局不稳，半年后才完成撤军。留给南朝鲜的则是形式上虽然通过国民的自由选举而具备了正统性，但实际上由于一些政治势力因南北分裂而拒绝参加，因而缺乏坚实基础的保守政府和在士气和装备上都差的军队。

中国革命的发展使亚洲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采取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在国民中，反对内战的要求也十分强烈。但是蒋介石却暗中指示发动内战。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共产党统治区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由于农民坚决支持共产党，而且共产党军队

在士气和道义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以美国的援助物资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虽曾暂居优势，但不久便全面败退。孙文所提出的民族、民主变革的大义已不在国民党方面，而是移到了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提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之后，在政治上加强影响力的同时，组织了大反攻。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京)，4至5月占领了南京和上海。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12月，蒋介石从成都转移到台北。中国大陆在经过数十年之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国民党的惨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美国外交上的重大失策。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书。这份被称为《中国白皮书》的文件，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无能，认为继续提供援助是毫无意义的。国务院批评自己支援蒋介石的政策，判断与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可行的，因而想将真相告诉国民。事实上，即使从希望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政权这一美国对中国政策的传统来考虑，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也是理所当然的。

美国的大多数国民不了解中国的实情。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由于忠实地执行了第三国际的指示而遭到了失败和巨大的打击。在30年代自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和莫斯科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几乎已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事实，大部分美国国民都不了解。相反，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已掌握在共产主义者手中这一事实。讨厌赤化的保守派认为这也是莫斯科的称霸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内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美国牧师被杀害和奉天(沈阳)的美国总领事被投入监狱的事件，使美国国内对北京政府的反感进一步加深。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在寻找承认代表中国正统政府的北京政府的可能性。只是在北京政府成立8个月后，由于爆

发了朝鲜战争，这种可能性才彻底告吹。

罗亚尔演说

由于美军占领日本没有遇到多大抵抗，以非军事化、民主化为目的的改革得到了顺利的推行。因此，早在1946年到1947年，在美国政府和军队中就出现了希望早日实现对日媾和的动向。

美国的决策部门关心的问题是：独立后的日本是否能继续维持美国强制改革所建立的民主体制；日本是否仍旧是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尤其是在占领结束后，用怎样的办法才能够保持日本非武装化这一特殊状态。

在初期，曾制定了由美、英、苏、中四国签订日本非武装条约和通过派驻观察部队来实施为期25年监视的方案。但麦克阿瑟表示反对，认为这事实上等于是继续占领。1947年3月17日，麦克阿瑟在占领后第一次会见驻日外国记者时谈到签订对日媾和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麦克阿瑟反对允许日本保留小规模军队的意见，主张由盟国来管理。这是在停止二一大罢工计划后的一个半月，杜鲁门主义发表后的数日。

麦克阿瑟的讲话使对日媾和的形势高涨。因美国政府已开始活动，所以在远东委员会的11个国家中，除苏联外，10个国家都表示了参加促进对日媾和的意向。然而美国主张对日媾和的内容要以远东委员会11个成员国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通过。苏联则要求举行美英苏中四国的预备会议和拥有否决权。蒋介石政权在苏联压力下也反对美国的方式。结果，虽然连预定1947年8月中旬在旧金山召开媾和会议都已确定，但却一再延期，并于1948年初被彻底取消。

1947年7月末，担任片山内阁外相的芦田均想将外务省整

理的日本方面关于媾和的期望书交给盟军总司令部的有关官员。其中包括媾和后日本加入联合国和强化日本警察等内容。结果遭到了盟军总司令部的拒绝。同年9月，芦田将这份期望书加以若干修正后作为私人备忘录交给了临时回国的美国第8军司令官艾克尔巴格中将。其中第一次提出了日本的安全保障依靠美军，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的设想。

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的凯南等负责制订政策的官员中，让美军长期驻扎日本，以便对付冷战的看法也逐渐占了上风。这样，早日签订媾和条约和结束占领的可能性便消失了。

1948年1月6日，罗亚尔陆军部长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的演说中论述了美国的对日政策。他谈到：“占领日本和占领德国一样，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估计到的负担。”并表明了如下的想法。

根据罗亚尔的想法，美国占领政策的目的在于如何使日本非军事化，如何排除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因而从这一观点出发，实施了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等政策措施。但是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政策和赔偿计划等包含着过度打击日本工业的危险。

罗亚尔指出日本在同加利福尼亚差不多的国土上拥有7000万至8000万的人口。如果仅仅作为一个农民、小商店店员和手艺人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必须鼓励发展工业。在非军事化和使日本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自主的国家这两个目的之间，虽然很难划出明显的界线，但是为了让日本担负起阻止今后在远东估计可能产生的新集权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必须重视让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充分自信的、完全能够独立生存和稳定的民主国家。

罗亚尔强调：从将日本置于冷战中美国的强有力的合作者的位置这个观点出发，必须认识到要重建日本经济，就只有坚持再工业化的路线。

不管与冷战的关系如何，只有发展工业才能重建日本经济这个观点，在日本的许多专家中已成为共同的认识。作为克服饥饿、贫穷和失业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处方而提出来的倾斜生产方式，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现代工矿业积累(物与人的积累)依赖的复兴政策。它已成为遵循再工业化、再现代化路线的政策。随着这种产业复兴政策多少取得一些成果，库存的原材料已经耗尽。因此，为确保原材料而全面恢复对外贸易已成为不可缺少的条件。虽然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在战前和战时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日本工业，只要以参加国际分工为前提，就能够生存。日本工业的复兴，在封闭经济的状态下，终究是不可能的。

日本放弃论

罗亚尔陆军部长的演说清楚地表明了冷战中美国开始希望日本发挥新的作用的意图。虽然在日本认为“罗亚尔的演露骨地表明了美国要将日本作为反共基地的意图”的反应很强烈，但是在这个演说中，日本如果不作为一个十足的工业国家，就不能进行它的重建。如果没有这一目标，它也不能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国家而存在。然而，这个时期，在华盛顿的政策制订者中并没有形成稳定一致的意见，在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中也存在着对立和分裂。在盟军总司令部中，想在日本实现彻底改革的理想主义势力和重视对付共产主义危险的现实主义势力之间的对立也在加剧。

关于日本的地位，美国的政策也并未完全确定。

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讲过:“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线,是从菲律宾经过琉球群岛、日本和阿留申到阿拉斯加”。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国务卿又指出:“防卫的前线是从阿留申到日本和琉球群岛”。在这些谈话中,之所以没有包括南朝鲜和台湾,并不是偶然的。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失败已确定无疑,因此,美国放弃了对亚洲大陆的干涉,注重于向边缘防线后退的方针。

即使关于日本,美国也存在着战略上的放弃论。罗亚尔陆军部长在1949年2月访日时,曾作了暗示有可能放弃日本的发言。由于反响太大,不得不公开取消。但是就个人而言,罗亚尔认为“因为美国没有保卫日本的责任,所以希望在战争发生前撤退。作为军事基地,还是以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台湾和冲绳为好”。

从1948年4月到1949年5月,苏联采取了全面封锁从西德经过东德地区到达西柏林的地面通道的措施。这是试图让西方各国放弃西柏林而采取的强硬手段。西柏林是东德大批流亡者流入西德的入口,也是造成东德体制危机的原因。因此,东方利用西德坚决实施货币改革的时机,采取了强行封锁的措施。为了对抗柏林封锁,美国和英国向西柏林市民大量空运急需物资以支撑他们的生活。美国方面甚至有人认为应该在苏联还未研制出原子弹以前,就对苏联实施核攻击。事实上,美国已在英国配备了核轰炸机。因此,柏林危机甚至孕育着发展成为核战争的危险。但结果,由于大规模空运的成功和西柏林市民的团结,苏联的政策遭到了失败。

然而,欧洲的危机却加重了美国的负担。美国的领导层虽然出于对付冷战的需要加强了重视日本的态度,但却又表示出也许不仅要放弃南朝鲜,而且还要放弃日本的想法。其原因就

在于这种负担。美国政府仍然持有优先考虑欧洲的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日本和南朝鲜毕竟还是遥远的国家。

柏林封锁事件导致了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关于德国，美国在占领初期的政策也是着眼于非军事化。但当东西方的对立激化时，则认为有必要重整西德军备。关于日本，虽然出现了允许重整军备的意见，但由于刚让日本制定了宣布非武装的新宪法，因而麦克阿瑟对重整军备感到为难。

冷战的加剧使美国清楚地意识到将日本重建为工业国这种现实主义的路线，对日本国内立志实现再现代化和再工业化的势力来说，也是个有利条件。因为过于严厉的占领政策很可能妨碍日本重建为工业国，而且美国对日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增大，也会使日本的领导层感到困惑。

但是由于冷战而引起的美国对日政策的修正，并不意味着对战后改革的否定。而且即使到了想把日本作为反共的防波堤而着眼于日本作为工业国的潜力的阶段，美国也并没有全面否定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路线。美国方面对日本复活军事大国仍存有强烈的戒心。对美国国民来说，战争在他们的脑海中仍然记忆犹新。

使日本发展成为工业国的政策，完全是以在日本确立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的。正因为认为战后改革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将有希望在日本实现，美国才放心地考虑修正对日政策的问题。

再工业化的前提

美国修改对日政策，本质上并不是想否定民主化路线，而是想要阻止共产主义者试图从革命主义的立场出发利用民主化成果的活动。同时，从日本必须再工业化这点来看，是要停止被认

为发展过头的产业管理的过度分散化。战后改革虽然被中断和修改，但民主化的框架却被保留了下来，并在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得到生长。

以实现日本国内的再现代化、再工业化路线为目标的人们，立场也是一致的。凡是明确意识到要将日本重建成工业国的人，都认为战后的民主改革是重建日本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但是，关于经济体制的类型，在各个主体之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方向并未确定。当然，就体制的选择问题来说，也不能无视美苏对立和冷战的作用。罗亚尔的演说，意味着确认日本沿着再工业化路线来促进经济复兴这一目标，否定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景，确认了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必不可少性。

从战后初期起，一些势力就曾主张除了推进解散财阀、土地改革和确立劳动基本权等一般性的民主主义改革外，还必须对产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体制进行改革。随着战后改革的实施，这种意见的现实意义日益显现出来。

社会主义者们从战后初期起就理所当然地提出了产业的国有化和民主管理的纲领，然而其内容却并不是十分明确的。

1945年11月2日，日本社会党在党的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设立最高经济会议，对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化肥工业、电气事业及其他重要产业，以及银行、信托和保健事业实行国有化的主张。这些主张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内容。但是这些主张，究竟是想从民主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形成一种在广大范围内能够保障和推进经济和政治自由的社会控制手段，还是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是不明确的。社会党是作为一个各种民主社会主义势力和非共产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势力的联合体而成立的。因此，即使在基本体制的选择上也存

在许多不明确的地方。这在以后的政治活动过程中，成为社会党内部发生对立、抗争和分裂的基本原因。

1945年12月1日，日本共产党在第四届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出了所有的银行合并成唯一的国立银行并实行人民管理，工人管理重要产业和由人民共和政府来实施统制等主张。可以看出，除了银行之外，并没有提出对重要产业实行国有化和国家管理的原则，而是提出了人民管理或工人管理这种形式，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战前的日本共产党是以1932年共产国际所提出的题为“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三二年纲领）作为其基本纲领的。三二年纲领规定：当前日本共产主义者革命目标的性质是“具有强行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提出了推翻天皇制，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和实现七小时工作制等“任务”。而且在加上“在革命形势的各种关系下”的条件后，提出了将所有的银行合并为唯一的银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对银行和资本主义大生产（尤其是一切康采恩和托拉斯的生产）实施统制的课题。

这里所表示的“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二阶段革命论”和依靠“由工人、农民和士兵苏维埃统制产业”的思想，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翻版。日本也同俄国一样是一个结构落后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在革命的形势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二阶段革命论”，具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力。但是，实行同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另一种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却暗示着共产主义者对以自由和人权为基础的一般民主主义原则的轻视。

在现实的社会运动中，为了将当时的革命规定为民主主义

革命，在战前和战后，共产党都没有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充分明确地表示出来。战败后不久虽然先主张“民主革命”，后来又采取了反美民族主义路线，提出“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但不管怎样，当时的目标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如果除去1945年12月所采用的行动纲领中提出的银行一元化和国有化的主张，那么，没有提出苏联式的国有和以国家管理为中心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立场。

这个行动纲领提出的“人民管理”、“工人管理”这些口号，在战后的特殊情况下，只是一种以动员发动自下而上的民主革命为目的，以便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战术课题。后来，当拒绝服从斯大林，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权和市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南斯拉夫铁托，遭到情报局的攻击时，日本共产党便毫无疑问、毫无保留地与斯大林和情报局一唱一和。

企业经营的民主化

国有或公有的主张和产业民主主义的主张，不仅是由社会主义政党，而且也由更广泛的人士提出来的。前面提到的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就曾论述过：“并不是只有公正的自由竞争，才是唯一的道路”。“不是还需要金融机构及重要基础产业的公共化、经济的计划化和强有力的国家统制吗？”如果考虑到这个调查委员会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参加，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官厅的周围也存在着公开谈论和书写这种观点的情况。而且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要求推进工人积极参加经营的产业民主主义的提案，是战后初期由经营者方面提出来的。

1946年4月30日成立的经济同友会是一个以经济民主化和建设和平国家为目标，集中了一批起中坚作用的、年轻的经营

者的组织。它批评旧的财界人士保留保守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理论,对工会方面的生产管理斗争也表示理解,主张必须通过经营协议会来促进劳资间的合作。

经济同友会欢迎通过解散财阀等办法来实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主张必须将企业经营从资本所有的狭隘观点中解放出来,并倡导在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确立了独立权限的经营者同构成企业共同体伙伴的工人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民主化。

在高涨的工潮冲击下,为了恢复私人企业的生存所必需的经营者的首创精神和统制力,还必须确立同工会间的民主的、建设性的合作原则。

1947年8月,经济同友会的经济民主化研究会(委员长是日本特殊钢管公司董事长大冢万丈)发表了题为“企业经营民主化”的试行方案。大冢委员长的经营民主化的构想如下:(1)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完全分离,禁止股东成为经营者;(2)以经营协议会代替股东大会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机构;(3)经营者和工人以相等的表决权参加经营协议会;(4)为避免因两方面的对立而陷入无法做出决定的情况,将在经营协议会中加上股东代表。但是股东大会将变成专门行使监察权的机构,而经营者的选任则由经营协议会负责。

大冢认为,实际上从作为智力工人的经营职员层中选拔作为经营者的人才已成为惯例。他还指出,不能无视在经营者指挥下担任经营管理的职员层参加工会的现状。

大冢的主张是在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工人职员层中寻求经营干部的形成基础。同时通过民主手续,即让由工人代表参加的经营协议会来确认给予他们的权力的正统性。这是想要通过强化民主来确立专家在现代产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经营主导权。

如上所述，作为将日本重建为工业国的前提，革新宏观和微观体制的主张，是以软硬两种形式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些主张却没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在片山内阁时代实行的煤矿国家管理虽然反映了国有化和公有化的主张，但它却远未能达到所有权的变更，而且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就很快失去了作用。国有化和国家管理这一社会主义的传统主张没有使人感到它的现实性。由于战后的民主化大大纠正了战前日本经济所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现象，因而使急于实现国有化和集权计划化的要求失去了它的说服力。

象共产党那样，仅仅从战术上考虑而暂时将国有化理论搁置起来，虽然这能减少国有化理论对社会运动和经济政策带来现实性障碍的危险，但重新研究它的有效性、改善战略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减少。人民管理和工人管理的口号也没能成为产生出新的经济体制观的萌芽。

大家万丈的大胆的企业民主化理论，在经济同友会内部也没能获得多数人的同意，只是停留在试行方案上就被人们遗忘了。结果，经济同友会的改革色彩逐渐淡化，仅仅成为“财界四团体”中的一个。同时，随着重建日本经济走上轨道，危机被克服，同友会的成员本身也转变成了权势集团。

从形式上来看，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以战后改革中所建立的各种制度的组合为基础的，并没有增加远远超出它的成份。当美国为了冷战而修改其路线时，植根于日本社会底层的保守派在政治舞台上便占据了稳定的多数，对“民主主义过头”的公开或隐蔽的批评抬头，并开始对制度进行修改。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分裂为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激进派集团，和在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结成松散联盟的合法派集团。社会民主主义集团虽然担负着与激进派和保守派对抗，拥护和巩固自由民

主义的历史任务，但它却没有主动地意识到要在这一历史任务中成为核心力量。社会民主主义集团本身也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分别被激进派和保守派两方面拉了过去。战后民主主义多多少少已变得空洞化，在法制上也进行了修改。所谓“倒退路线”的时代开始了。

然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民主主义在国民的生活中扎下了根。产业民主主义的主张，无论是共产党的那种人民管理的激进主义，还是经济同友会的那种企业民主化试行方案的改革方案，都被无视和遗忘了。但尽管如此，日本的经营者经历了50年代产业合理化中发生的许多深刻的劳资纠纷，体会到如果不同工会协调，企业就得不到稳定。本来，承认工会的合法性，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理论上来说，都是产业民主主义的基础形态。作为战后民主化支柱的劳动基本权的确立，实际上构成了日本产业民主主义巨大进步的基础，并最终成为日本经济和产业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当这些还未明确之前，仍会发生许多事件，产生许多牺牲，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第五章 道奇方针和吉田内阁

1. 道奇方针

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

片山内阁是新宪法制定后的首届内阁，也是第一次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内阁。这次内阁不仅是由社会党与民主党、协同党等三党联合组成，而且面临着社会党内部本身存在着的左右两派的对立等麻烦问题。

社会党的左派议员结成了“五月会”团体，他们与右派的西尾末广书记长（任内阁官房长官）等人在国家管理煤矿、人事等各种问题上都有严重分歧。1947年12月13日，“五月会”声明自己是“党内的在野党”，表明了对片山内阁不合作的态度。在1948年1月16日至19日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上，左派的主张取胜，宣告了四党（包括在片山内阁成立前夕组成的自由党）政策合作协议的破裂。在人事问题上，右派的片山委员长（再次当选）、浅沼稻次郎书记长等人虽然以微弱多数当选，但是，四党政策合作协议的破裂，事实上意味着对由右派组成的片山内阁的不信任。

2月5日，左派铃木茂三郎担任委员长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预算案。铃木等社会党左派议员认为政府靠提高铁路运输费与通信费来作为公务员增加工资的一部分财

源，会加速通货膨胀，因此，投了反对票。在所谓“复兴金融金库通货膨胀”中工人阶级的日益不满，就是以左派的反叛为背景的。片山首相眼看着社会党内部如此的不统一，只好表明了辞意。1948年2月10日，片山内阁集体辞职。

2月21日，众议院提名民主党总裁、片山内阁时期的外相芦田均为首相。芦田内阁作为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等三党的联合内阁于3月10日组成。社会党把主导权让给了民主党，但是以西尾末广（副首相）为首的社会党人仍然留在了内阁。“五月会”的成员加藤勘十、野沟胜也加入了内阁。左派处于分裂状态。

7月6日，西尾副首相因在担任社会党书记长时期接受了土木建筑业清水组不正当的捐款而被追究，从而辞掉了内阁职务。6月，昭和电工事件表面化，昭和电工会社社长日野原节三，原农林次官重政诚之，原藏相、经济安定本部长官末栖赳夫，大藏省主计局局长福田赳夫等很多实业家、官僚以及政治家因行贿受贿嫌疑被逮捕。10月6日西尾末广也因受贿嫌疑遭逮捕。日野原等人为了扩充昭和电工会社，想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贷款，因而用巨额资金贿赂政界和官界。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0月6日将西尾开除出党并要求芦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天10月7日，芦田内阁总辞职。12月7日，芦田本人也因涉嫌昭电事件被逮捕。

因昭电事件，64人被起诉，审判一直延续到1958年。结果是，日野原和末栖二人有罪，其他人全部无罪。不过，动用了既可作为政治捐款，又可用作贿赂的巨额资金这件事是不可否认的。西尾就上述清水组的捐款问题，作了“以西尾个人身份”接受了资金的发言，承认收了钱。在政府统制和政策金融盛行的体制下，实业家为了有利于发展自己的事业，一般存在着行贿的诱因，而

政治家为了给刚成立的政党筹措资金，也存在着受贿的诱因。

昭电事件给予被宣告无罪的芦田、西尾等政治家以很大的打击。在片山和芦田两内阁期间激化了的社会党左右派抗争，使社会党出现了解体的动向。从右派中分离出来的由平野力三（片山内阁时期的农相）等人为代表的集团，组成了社会革新党。从左派中分离出来的以反对芦田内阁预算案的强硬派为核心的，建立了工人农民党（劳农党）。

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都是短命内阁，前者存在8个多月，后者存在不足7个月，两内阁一共存在15个半月。社会党参加的这两届内阁，因联合的制约和党内不统一在作怪，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同保守派政权有明确区别的令人注目的独立政策。

在1947年5月至1948年10月的两内阁时期，正是国际上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和马歇尔计划（同年6月5日），东西方冷战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麦克阿瑟领导下的占领军一方面夸耀以新宪法（1947年5月3日）的实施为代表的日本民主化的成果，期待着民主化进一步发展，争取早日媾和。另一方面又担忧在二一大罢工计划中出现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抬头，开始强烈地感到在冷战中有必要采取对日本国内革命主义势力进行抑制的政策。

在这种状况下，盟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改革推进派和冷战重视派的对立尖锐化了。据说由于昭电事件的表面化，盟军总司令部内部出现了以改革推进派为代表的GS（民政局）与冷战重视派、大多数是保守派军人的G2（参谋二部，分管情报）的严重对立。参谋二部要终止社会党参加的政府，成立保守政权，因而力求使昭电事件表面化。

对工人运动的限制

在继片山、芦田内阁之后的第二届吉田内阁时期。由于受到二一大罢工计划的影响，因此，修改有关工会运动的法律问题便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在二一大罢工计划中，公务员工会以共产党影响下的产别会议为中心显示出了出人意料的斗争力，而且在二一罢工被中止以后其要求改善待遇，修改劳动协约的工潮仍象五月春雨接连不断。面对这种状况，盟军总司令部强烈要求限制公务员闹工潮。

1948年3月29日，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长麦加特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备忘录，表明了以全国邮电员工会为中心的“地区罢工”以及“要求一齐放假斗争”是“属于麦克阿瑟在禁止二一大罢工的通告中所列举的破坏行为”。7月22日，麦克阿瑟向芦田首相发出长篇书信，指示必须严格区别私营企业的工会与公务员的工会，禁止公务员闹工潮。

麦克阿瑟在书简中说，在民主的公务员制度下，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否认公务员劳动者的权利。麦克阿瑟最后强调，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限制公务员工会的活动，是为了防止工会把其意志强加给公共机关，来达到不依靠民主选举推翻政府、维护少数者的特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无政府状态、暴动以及破坏的重要之举。

芦田内阁收到麦克阿瑟的信后，于7月31日把这封信作为波茨坦政令，公布实施“政令二〇一号”。芦田内阁不等正式修改公务员法就采取了否定公务员的工潮权和团体交涉权的措施。工会强烈反对这样做，但是最终无法抵抗以占领军为背景的政府政策。参加反对“政令二〇一号”斗争的人不少遭逮捕或被解雇。

1948年11月，刚组成不久的第二次吉田内阁向国会提出了国家公务员法修正案以及公共企业体劳资关系法案。两案都在同年12月先后通过。修正后的国家公务员法严格禁止国家公务员闹工潮行为。根据麦克阿瑟书信的指示，国铁、专卖两事业会社被列为公共企业体。所谓公共企业体劳资关系法就是把这两个公司的人员与一般公务员区别开来而制定的新劳资关系法规。

该法列有对公共企业体工作人员的限制条款，其中虽然许可有团体交涉权，但是否定了罢工权。以后，这一法律又扩大了对象，规定适用于所谓“三公社五专卖事业”^①的劳资关系。

1948年至1949年，盟军总司令部对民间的工会活动也进行了不少干涉，1949年3月指示停止向专门搞工会工作的人支付工资。同月，又规定凡反对修改劳动法规的罢工是违反占领政策的，因而一律禁止这类罢工等等。而且，对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的、工会在战后斗争中也已获得的既得权，也强令进行修正。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于1949年6月公布了工会法和劳资关系调整法的修正案。两法案对工会、团体交涉以及闹工潮等都详细地重新制定了法规，特别是对那些与安全有关的业务以及公益事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通过这些措施，使工会在战后劳资斗争中已获得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中间稳定论

在经济政策方面，片山、芦田内阁基本上继承了第一届吉田

^① “三公社五专卖事业”：三公社（国营公司）是：国铁，电话电讯公社，专卖公社。五专卖业是：国有林野事业，邮政事业，印刷事业，造币事业，酒专卖事业。——译注

内阁开始实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即继续实施用价格差补助金和复兴金融金库贷款的方式来促进重要产业的复兴。

对主要的物资仍然进行统制，大量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由经济安定本部为首的各种公团进行分配处理。但是，复兴金融金库的债券主要由日本银行来承购，结果大量增发通货导致通货膨胀迅速发展。在公定物价以外，形成了黑市物价，不少物资通过配给以外的渠道用黑市价格在交易。消费者仅仅依靠自己的配给已不能维持生存，不得不去依赖黑市物资。黑市物价的飞涨使生活费急剧增加，迫使工会不断要求提高工资，从而又引起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因此，政府又不得不反复地大幅度提高公定物价和公定费用。

战后对公定物价工资体系进行全面的调整始于币原内阁时代实施金融紧急措施令后的1946年3月3日（所谓三三物价体系）。后又在片山内阁时期的1947年7月5日和芦田内阁时期的1948年6月22日实施过。

1947年7月的物价体系设定月工资为1800日元，是战前的28倍，“稳定性物资”的价格是战前的65倍。约1年后的1948年6月的物价体系设定月工资为2920元，是战前的45倍，稳定性物资的价格是战前的110倍。即在一年间不得不把工资提高0.6倍，稳定性物资的价格提高0.7倍。1948年6月的价格调整还把国铁运输费和通信费用分别提高3.5倍和4倍。

以这种物价体系的改定为契机，要求提高工资的工潮不断加强。盟军总司令部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实行工资稳定政策。1948年11月6日，盟军总司令部经济科学局的赫普拉劳动课长发表了要求实施工资三原则的讲话，即不支付以提高工资为目的的补助金；不向那些因提高工资而出现赤字的企业贷款；不承

认会引起物价上涨的工资提高。这一发言反映了美国方面开始强烈要求日本经济稳定的意向。

美国对日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重点从使日本非军事化转向了重建日本经济。注意到这一变化的芦田内阁，组阁伊始就制定积极的经济复兴计划，向国内外广泛宣传。还成立了以首相为委员长的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芦田首相准备从美国那里得到援助和引进资金。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于1948年8月10日决定了以1949年度为第一年度的五年计划最终案。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在5年期间，使国民的生活水平接近战前（1930—1934年）；依靠出口来维持必要的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实现经济独立。这一计划准备依靠积极投资来扩大生产和贸易。

当时关于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一举稳定论”，即认为应该主要着眼于抑制通货膨胀，采取能一举实现经济稳定的政策。另一种是“中间稳定论”，即认为应该把重点继续放在扩大生产上，谋求分阶段地克服通货膨胀。在日本政府中，以经济安定本部为中心的“中间稳定论”占优势。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按照“一举稳定论”的意见，强行抑制通货膨胀，企业倒闭和失业就会急剧增加。1948年8月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立足于优先扩大生产的“中间稳定论”的基点之上的。

盟军总司令部对这种考虑也是默认的。作为占领者，他们也想避免因一举克服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稳定恐慌”和社会混乱的危险。而且，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在盟军总司令部的经济科学局的干部中间，认为只要严格控制物资、抑制物价与工资的上升，就能克服通货膨胀的意见占优势。但是，一边在通货方面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即由日本银行承购发行复兴金融金库的债券，一边又要求抑制物价、工资上升，这显然是办不到的。在盟军总司令部里没有金融财政问题的专家，虽说有一些是经历过30年

代大危机、执行过罗斯福新政的人，但是都不具备克服严重通货膨胀的经验。盟军总司令部虽然一再强调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但是并未具体地要求实施能够根除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

实行单一汇率的必要性

准备优先扩大生产，然后分期分批地实现物价稳定的“中间稳定论”有着致命的弱点。其一是贸易问题。

占领下的日本贸易是由占领军管制下的国营贸易。1947年8月日本恢复了带有限制的贸易，采取的方式是，输入品全由商工省贸易厅进口，然后批发给各领域的贸易公团以及工商业者；输出品也全部由贸易厅通过贸易公团收购，然后出口。外汇全部归盟军总司令部管理，日本政府连外汇储备有多少、外汇的收支状况如何都不知道。日元与美元的总换率根据商品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汇率，其间上下差别很大。出口商品时，为使商品价格便宜些，就把日元汇率压低，以便使美元计价的商品容易销售；进口商品时，从稳定国内物价观点出发，则把日元汇率定高些，以便日元计价的商品便宜些。

生产要扩大，原料必须有稳定的进口。为此扩大贸易就是必备的条件，从而必然要求设置单一的固定汇率制，以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但是，国内的物价因通货膨胀而不断上涨，在这种状况下，要设置稳定的单一固定汇率制是不可能的。

其二是美国对日援助问题。

占领时期的日本经济复兴依赖美援的地方很多。日本的粮食、工业原料以及燃料都必须靠进口。在当时，这些东西的大部分依赖美援输入。例如，1947年日本进口额为5.2亿美元，出口额仅1.7亿美元，出口额只有进口额的三分之一。约77%的进口即4亿美元是美援。

美国的对日援助,名义是援助实质上是贷款,后来日本政府都偿还了。而且在美援中,一部分是以美国的过剩农作物来支付的。但是,美国援助的资金当时是在美国财政上开支的,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反对政府继续援助,并要求削减预算。因此,美国政府不可能对日一直援助下去,这是必然的了。

在日方,有人谋求引进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来代替美援。但是要想积极地引进外资,必要的条件就是,经济确实在恢复,通货膨胀在收缩,设置稳定的单一固定汇率制,确立正常的对外关系。

总之无论如何,物价稳定与设置单一固定汇率制,对于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1948年3月,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计划部部长乔治·凯南以及财界出身的经济问题专家、陆军部的陆军副部长威廉·特莱柏先后来到日本。特莱柏还率领了一个包括财界权威人物的“约翰斯顿调查团”。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实情,和盟军总司令部进行了协商,依据陆军部长罗亚尔声明指示的方向确定了新的对日政策。4月26日,提出了“约翰斯顿报告”,认为日本经济还经受不了单一汇率制。但是,同年5月来日的以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理事会(美国的中央银行制度政策决策机关)的调查统计局副局长R·A·扬格为团长的“日元汇率政策特别调查团”,在6月12日提出报告书,劝告美国政府“授予麦克阿瑟以下权限:在1948年10月1日以前在1美元等于270至330日元范围内决定日本的一般的单一汇率。

盟军总司令部对**这种**一举稳定型的政策表示反对,但是也不能继续无视它,因此于1948年8月26日在盟军总司令部内设置了汇率委员会,开始研究单一汇率的设定。

道奇方针的实施

1948年10月7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了由凯南以及特莱柏提出的新的对日政策基本方针。其内容主要是:为确保日本治安,加强日本警察力量;缩小盟军总司令部的权限,使之转让给日本政府;停止改革,解除对被褫夺公职人员的处分,结束对战犯的审判等等。

在经济方面强调:继续减少对日援助,消除有碍于贸易和产业复兴的绊脚石,搞活私营企业,减少劳资纠纷,抑制通货膨胀、实现均衡预算等。这些经济政策方面的要求被归纳成“经济九原则”,于1948年12月18日由盟军总司令部作为指令向日本政府提出。九原则内容如下:

- (1) 谋求综合预算的真正平衡。
- (2) 加强税收计划的实施,严格取缔逃税漏税。
- (3) 贷款对象限于对经济复兴真正有贡献的事业。
- (4) 实现有效的稳定工资计划。
- (5) 加强价格控制,可能的话将扩大控制范围。
- (6) 改善外贸管理和外汇管理,尽可能把管理权委托给日方。
- (7) 以振兴出口贸易为目标,改善物资的分配、供应制度。
- (8) 谋求增加重要的国产原料和工业制品的生产。
- (9) 提高粮食计划征购的效率。

这一指令强调,为了设定单一汇率制,首先必须实现以上计划。在九原则指令和同时发表的麦克阿瑟致吉田首相书信里,不少提法都是同以前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和日本政府实行的政策相吻合的。从中可以看到有些是折衷意见,即华盛顿方面主张的一举稳定型与对此有异议的盟军总司令部意见的折衷。不

过,在强烈要求实现综合预算均衡、根除通货膨胀根源的同时、早日设定单一汇率的基本具体目标是新的提法,表明了在美国的决策当局内一举稳定派占了优势。

12月10日,即九原则在日本公布前夕,美国杜鲁门总统召见底特律银行总经理乔瑟夫·道奇,要求他去日本。道奇是老资格的银行家、同时也是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战后初期作为占领军的顾问搞过西德的通货改革,在制定对日政策、确立经济九原则过程中都发表过意见。

1949年2月1日,道奇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命全权公使来日,按照经济九原则指导实施经济稳定化政策。为此,这个时期实行的稳定化政策被通称为“道奇方针”。3月7日,道奇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会上道奇首先表示,可能的话将尽量避免通货贬值,基本方针是不搞通货改革,把物价稳定在现状。其次,他认为设定单一的汇率并不困难,重要的是如何维护住它。他特别强调必须决定一种既不牺牲进口又能发展出口的汇率。道奇论述说,为了克服通货膨胀,政府的财政预算就必须实现均衡,为此,生产要增加,要搞生产合理化,要健全财政、振兴出口,坚持不断地过艰苦的生活。最后,道奇比喻日本经济的现状就如骑在一匹“竹马”^①上,它一脚踩着美援,一脚踩着政府补助金,根基很不牢固,强调必须砍短这匹“竹马”的腿。

道奇的发言是立足于只要政府没有赤字、减少通货供给就能克服通货膨胀这一简单明了的理论之上的。他确信只有让私营企业自由,经营生产活动才会有发展。

在道奇的指导下,盟军总司令部为日本政府编制了1949年

^① “竹马”:类似我国的踩高跷。——译注

度的预算案。日本政府不得不照单全收。这一预算案不仅是收支平衡,而且是收入超过支出的超均衡预算。包括一般会计、特别会计以及政府有关机关在内的政府部门预算赤字,1946年度为923亿日元,1947年度为1039亿日元,1948年度为1419亿日元,到1949年度,则一下逆转为1569亿日元的黑字。岁入合计总规模为25362亿日元,黑字占6.2%。在黑字中约1300亿日元是偿还已经发行的国债和复兴金融金库的债券等。这些债券的相当部分是属日本银行拥有的,因此,用政府从租税和复兴金融金库收回贷款的收入偿还债务,就起到了收缩通货、制止物价上涨的明显效果。

被道奇看作是“竹马”一条腿的价格差补助金当时虽然还在继续,但预算已被控制住。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在1948年度末已停止。产业界都要求继续得到“复金”的贷款,但道奇没有答应。

1949年度预算案,新设置了“美国对日援助回流资金特别会计。”

在这以前,美对日援助物资在国内的销售款都和其他进口物资的资金一起被纳入贸易资金特别会计中。贸易资金特别会计是把出口商品的资金支付给出口商,并从进口商手中收取进口商品的资金。从美元计价来看,这个时期的贸易是大幅度入超,如果实行的是单一汇率,那么贸易资金特别会计理应是黑字,即进口资金的收入超过出口资金的支付。但是,当时的汇率是依商品而定,出口商品时,日元比价就定得低些,进口商品时,日元比价就定得高些,这就形成了出口商品时日元向出口商支付得多;进口商品时,从进口商收进得少的局面,从而导致贸易资金特别会计赤字。假定与单一汇率已设定的场合比较一下,就可看出这一赤字实际上是扮演了保护出口产业、并使进口商

品也便宜些的“补助金”式的角色。而美国对日援助物资的资金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填补这种贸易资金特别会计一部分赤字的“贸易补助金”。

以设定单一汇率为契机,正好结束这种“看不见的补助金”。为此,用美国对日援助物资的资金建立新的特别会计(回流资金特别会计),使之为稳定通货、促进出口、复兴经济发挥作用。道奇一直以稳定通货为优先目标,因此即使在运用回流资金时,也把其1949年度的收入共1141亿日元中超半数的629亿日元用于偿还复兴金融金库的债券了。产业界希望回流资金代替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以作为产业资金运用,但是当初正在限制对产业的融资。

道奇方针的意义

道奇方针是在冷战深刻化、美国转变对日政策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举稳定政策。是依靠占领军的权势,由日本政府(不管它本身愿意与否)来实施的。中间稳定论被取消了。由芦田内阁主持编制的、于1948年8月搞出最终方案的经济复兴计划,由于立足于优先扩大生产,违背了道奇方针,因此未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通过。

1949年4月20日,依据道奇方针编制的超均衡预算,按政府提出的原案在国会被通过。3天后的4月23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转交了关于设定日元公定汇率的备忘录。日本单一汇率定在什么水准上,日方也讨论研究过多次,但是最后是以盟军总司令部指令的形式决定的。4月25日,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开始实施。1949年12月又公布实施了外汇管理及外贸管理法。1950年1月1日外汇管理权由盟军总司令部移交给日本政府。此时的外汇储备额仅有2.3亿美元。

从单一汇率制设定前不久即,1949年1月底的不同商品汇率来看,出口商品多半在1美元=500至600日元的范围内;进口商品时多半在1美元=100至200日元范围内。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的设定,对于大多数出口商品来说意味着日元大幅度升值,因此以日元定价的商品就要跌价,以美元定价的商品就会涨价。与此相反,单一汇率的设定,对于大多数进口商品来说意味着日元大幅度贬值,从而引起日元定价的商品涨价。这一切对于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出口的日本产业来说,则意味着将面临“原料高价制成品低价”的局面。

道奇方针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与单一汇率制的设定,就象一次大型手术,它是对从战争破坏中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的一次考验。也是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中那些急于要使日本经济稳定的意见占了上风后的政策的具体化。不过,如果以占领地区救济金为名目的美国援助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这种考验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如日本经济对这种考验没有充分的承受力,象道奇方针这种大手术的危险性就极大,它可能产生“稳定恐慌”,导致社会不安,秩序动摇。但是为了使经济进一步复兴与增长,贸易正常化是不可缺少的,为此,道奇的这种方针政策是势在必行。

现实状况是,当时与其说是经济机制的问题重要,倒不如说是政治的、社会的问题重要。停止发放补助金和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以实现财政的综合均衡,稳定通货价值,依靠市场机制,增产社会必需品,使经济复兴走上正轨等等,这一切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进程中发生的困难将会危害政治的稳定,这是统治者最害怕的事。因此盟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对一举稳定政策都未敢下决断,只是在华盛顿的压力下才终于实现了这种转变。

道奇所作的战略判断是：稳定化政策尽管暂时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困难，但是从长期来看，它是切实地重建日本经济、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有力的同盟军的唯一良策。这种战略是同坚决防止共产主义向日本渗透，以及为维持日本秩序而推行强力政策的“冷战对应型”的对日政策相配套的。与此同时，它也意味着，日本经济体制选择了恢复以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这条道路。

道奇方针的实施是对日本经济的一种考验，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政治势力及它们影响下的工人运动的一种考验。

2. 第二届吉田内阁

第二届吉田内阁的成立

1948年10月7日，芦田内阁因昭和电工事件总辞职。这对于在片山、芦田两届内阁时期作为在野党的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来说，则意味着掌握政权的机会来临了。但这时民主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是151席，仅占全议会席位的三分之一。10月14日，众议院举行首相提名投票，吉田茂获得185票，片山哲只有1票，弃权213票。弃权票超过半数这是罕见的。投票结果吉田被提名为首相，10月19日第二届吉田内阁组成。

吉田任命铁道省(战后改运输省)出身的佐藤荣作为官房长官，起用泉山三六为藏相。泉山是原三井财阀的常务理事池田成彬(战前的日本银行总裁、藏相)身旁的人。泉山于12月13日因喝得酩酊大醉在国会内耍酒疯而于翌日辞职。在追加预算案被通过后的12月23日，在野党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并表决通过。吉田以解散众议院来回敬。

1949年1月23日进行了大选，这是战后的第三次，新宪法成立后的第二次。结果，吉田的民主自由党从解散前的151个议席猛增到264个议席（如果包括当选后变更党籍的议员，共有269个议席）。这时众议院的议席总数是466个，民主自由党独自控制了超半数议席。

民主党从90个议席减少至69个议席（加上当选后变更党籍的，为70个议席）。社会党在劳农党分裂出去以后还有111个议席，大选后仅剩48个议席。从社会党左派分裂出来的劳农党从12席减到7席，国民协同党也从29席激减至14席。片山、芦田两内阁时期的联合执政党、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以及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劳农党等的议席，解散前合计是242席，大选后变为139席，比解散前议席总数减少103席（约40%）。在联合执政时期的各派中，保守的民主党受打击较小，而社会党和国民协同党则大幅度地失去了席位。

与前一届（1947年4月25日）的大选比较，得票率的变化也很大。吉田的民主自由党是在片山内阁崩溃时期由民主党的一部分与自由党合并以后组成的政党，因此单纯地比较得票率也许有些不恰当。上次的自由党得票率是26.9%，这次的民主自由党获得43.9%。民主党由于分裂、改组（一部分与自由党合并）以及昭电事件等影响，从上届的25%降到这次的15.7%。不过民主自由党与民主党这两个保守党的得票率合计是59.6%，占了近6成。社会党从26.2%跌到13.5%，即使加上分离出去的劳农党的2%也只有15.5%，国民协同党也从7%降到3.4%。

共产党从解散前的4席猛增至35席，得票率从上次的3.7%上升到这次的9.7%。日本共产党的35席远远超过国民协同党的14席，接近社会党的48席。

大选的结果,可以称作是“中间派的衰败”。对片山、芦田两届内阁失望的国民,大多数转向了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一部分转向了共产党。片山、芦田两届内阁时期的执政党得票率失去了23.6个百分点,被民主自由党拿去了17个百分点,被共产党拿去6个百分点。如果不按照以有效投票总数作为分母来计算,而是以有选举权人数为分母的“绝对得票率”^①来计算,原联合执政党失去的14个百分点加上投票率本身增加的6个百分点,共计20.2个百分点。其中民主自由党占去了14.2,共产党占去了4.7,其他无党派占去了1.1。

原联合执政党失去的票数以及投票率本身增加的票数中,71%进入了民主自由党,23.5%进入了共产党。社会党、劳农党的绝对得票率(上次仅有社会党)从17.5%降到11.2%,跌了6.3个百分点,共产党占去的4.7个百分点与此相比而言还算是少的。

吉田内阁与美国

得票率以及议席数的激烈变化反映了国民政治选择的变化。

民主党并不比吉田的民主自由党激进,它也是保守党,只是从政治上着想,与社会党联合组成了内阁。因此并不能认为离开民主党而转向民主自由党的国民在立场上发生了特别的变化。但是,对包括社会党在内的联合政权的失望,清楚地表明了政治的主流移向了保守方面。

1949年2月11日进行了大选后的首相提名投票,吉田在众参两院都获得了绝对多数。3月16日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吉田从民主党中也选了两人入阁,采取了两党联合的形式。

^① “绝对得票率”据石川真澄的《战后政治构造史》。——原注

任命大藏省出身的池田勇人为藏相。池田勇人和前官房长官佐藤荣作都在1月的大选中首次当选为国会议员。道奇方针就是在池田藏相的直接指导下具体化的。

对美国当局来说，吉田的民主自由党获得过半数的议席，民主自由党和民主党联合组成保守政权，是值得欢迎的事。

吉田茂在战前历任奉天(中国沈阳)总领事、外务次官、驻英国大使等职。周密细致、现实主义的姿态是作为外交官吉田的特点。驻中国时期，为了保障日本的权益，吉田曾主张积极干涉中国的内政。但是当意识到要与美国、英国敌对时，他又同松冈洋右等革新官僚、亲纳粹德国派以及军部等发生对立。在战争末期的1945年4月，与近卫文磨等一部分大臣一起开展和平工作，遭宪兵队逮捕入狱。战后，曾在东久迩宫内阁和币原内阁时期任外相，在第一届吉田内阁时也是首相兼外相，与盟军总司令部接触的机会很多。他批判盟军总司令部内的以民政局为中心的理想主义改革派，抗议说：“改革过头了就会招来赤色革命。”对于废止不敬罪以及扩大开除公职等做法也一一唱反调，因此很遭盟军总司令部内改革派的嫌弃。但是随着冷战的深刻化，盟军总司令部内保守派军人占多数的参谋部的发言力增强了，这对于吉田恢复政权是很有利的。

昭电事件为吉田掌握政权创造了机会，而该事件的被揭露是与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部进行干预分不开的。芦田内阁倒台后，盟军总司令部中改革派的据点民政局，为恢复自己的影响力，曾积极地说服过民主自由党，试图阻止吉田组阁。因此当时曾出现过拥立民主自由党干事长山崎猛的动向，后因吉田拥护派的反击才未成功。在组成第二届与第三届吉田内阁的1948年末至1949年初这段时间内，盟军总司令部内的斗争关系发生了

决定性的变化，现实主义的势力确立了主导地位。

1949年1月的大选结果，确立了保守势力的稳固统治，这对于美国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由于对社会党政权的失望而使共产党的得票率和议席大为增加，这对美国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又是头疼的事。在丧失了中国以后的亚洲，防止共产主义向最有力的同盟者日本的渗透，对美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美国人把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看作是在莫斯科的统率下进行的世界性一体化运动，把共产主义的渗透单纯理解为“间接侵略”。对于日本共产党，他们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因此对于日本共产主义的封锁就成了这个时期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基本课题之一。

封锁

为了实现对共产主义封锁这一基本任务，美国对日本在战后的民主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以防范这些制度被共产主义运动“滥用”。对于有关劳资关系的法律，侧重在限制工会一方的权利方面进行修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后日本共产党对以产别会议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具有强大影响力，对当时日本唯一的铁路交通动脉国铁等公营企业和政府机关及公共机关的工会具有左右行动的威力，故盟军总司令部特别重视对这些公营企业和政府机关及公共机关的工会运动进行限制。

同样，一般的政治权利也受到了限制。1949年4月4日，吉田内阁公布实施作为波茨坦政令之一的“团体等限制令”（团规令）。这一政令规定，凡具有“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暴力主义、反民主主义”性质的团体，根据法务总裁的指定，一律解散；

凡进行政治活动的团体有义务申报其全体成员的姓名以及思想政治经历等。违反上述规定者将被处以10年以下的徒刑或监禁。团体规定令作为取缔左右两翼的反民主主义运动的方针，在政治上则是以限制共产党的运动为目的的。

战争刚结束时把美军当作“解放军”来欢迎的共产党干部们，自麦克阿瑟禁止二一大罢工以来，面临着盟军总司令部不断强化的限制，也不得不彻底改变原来对盟军总司令部的看法。

这时，苏联通过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正开始动员各国共产党进行反对美国对苏联封锁政策的运动。但是日本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不想与占领当局发生正面冲突。日本共产党虽然批评“团规令”否定了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是仍然提供了共产党党员的名单。这就被以后各企业开除“赤色分子”所利用，共产党组织受到了很大打击。

为了封锁共产主义，美国重视的另一方面是，迅速促进日本经济稳定化，帮助日本经济健全地发展。

不可否认，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招来要求改善待遇等工潮的根本原因。必须在收缩通货膨胀的同时，设定单一汇率，使贸易正常化。因为饥饿、贫穷以及不安定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必须予以消除。

如果日本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前景明朗，那就可以停止已成为美国公共财政负担的那种援助，同时也就可能吸引美国的民间资本来为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作用。在美国经济界实力者中间有对日本经济的潜力感兴趣的人，但是日本当时的状况是发展前景不明朗，因此他们对日的投资还很消极。

美国对日新政策的基调同吉田茂的立场大体上是一致的。吉田也公开表示嫌弃共产主义。在临近二一大罢工前的1947年1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吉田把煽动激化斗争的势力称作是“不逞

之徒”，曾引起非议，但这确实是表白了吉田的心声。同时，他认为唯有克服贫困才能建立稳固民主主义的基础。对盟军总司令部，他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吉田是新宪法的表面责任者，因为新宪法是在首届吉田内阁时期制定、成立的。但是吉田本人是不相信新宪法中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观的。吉田认为，日本战后的安全保障只有在战后国际新的势力均衡中追求现实主义才能维护。为此，他很早就指示外务省官员对这方面进行研究。吉田凭借在自己的职业经验中建立起来的国际感觉，对美苏的对立趋势十分关注，期待日本在这种对立中求得生存。

冷战和保守立场

美国开始强烈感到在世界战略中日本作为有力同盟者的必要性，开始重视日本经济的复兴与增长，这对于吉田那种受到了战败与占领的打击后、在屈辱中摸索重建日本道路的人来说，意味着环境将发生明显的好转。

吉田面对因冷战而分裂的国际社会，选择了紧跟美国、利用美国的援助、积极谋求重建的道路。这条道路与吉田反对共产主义的信条和心境是合拍的。当然吉田的意图并非是积极参与冷战，并对此作出贡献，而是为了重建日本才利用这种冷战状态。这就是战后日本保守政治的基本路线。

在保守政党内及其周围，有着一批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共立场的人和主张恢复军备、更进一步参与冷战结构的人。对战后的民主化持怀疑态度，叫嚣要限制自由和民主主义的人也不少。事实上，在防止共产主义侵略的理由下，军备在强行恢复，自由和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在日本，这种行为被叫作“逆流”。不过，当时在保守政党内基本上是由吉田所代表

的适应现状的“保守”路线占主流地位。

第二次大战前，日本的军部以及“革新派”试图用暴力改变日本所处的环境，采取了野蛮的扩张政策。在这些政策失败后的战后时代，努力去适应既成环境的保守风气盛行起来。而且，在占领的条件下，也只能一边注意观察占领者的态度变化，一边悄悄寻找民族自立的可能性。如何积极适应创造环境、变革环境，在当时还未考虑到。因此，适应现状的态度应运而生。

作为这种适应的例子，第二届与第三届吉田内阁有过出色的表现。无论是片山、芦田内阁，还是第二届、第三届吉田内阁，对于抑制通货膨胀这一战后最大的经济问题，都没有下决心采取过对策。日本的政治家也好，官僚也好，都回避对此下决断。真正下决断的是华盛顿。抑制通货膨胀、彻底改变日本状况的倡议是在冷战中对日本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价的美国首先提出的，但是，在抑制通货膨胀政策一被强制推行后，日本政府表现了相当出色的适应力。

日本的政策当局在注意防止因道奇方针的过度影响而导致通货紧缩的同时，首先下力气抑制通货膨胀，并且为了在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下全面恢复对外贸易，使优先扩大数量的经济复兴政策转向了优先改善质量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政策目标也从“复兴”转向了“自主”。

当然，吉田所代表的保守派的适应现状的现实主义路线也并非毫无问题。

第一，期待日本在冷战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的美国与着眼于利用冷战、促进日本经济自立的吉田型政策之间，存在着对立。这种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表面化了。美国要求日本更迅速地增强军备，而吉田担心经济负担增大，对此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当然日本政府对美国的要求也不可能全部拒绝。每当这

时，在野党势力就攻击政府是“从属美国”、是“支持战争政策。”

第二，对共产主义的戒备、敌意、焦躁会导致过度加强对自由和民主主义的限制。即使是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在左右对立的政治状况下，也不得不用同反动的势力结成同盟的形式来参加统治，对大声疾呼的反动派起不了多大的影响。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左右的对立。

第三，道奇方针下的稳定化以及1美元 = 360日元体制下出口竞争的激化，给各产业带来了暂时的困难，并使工人与中小企业主蒙受了牺牲。这本来是美国强制推行的政策所产生的后果，但是最终是直接增加了对日本政府的不满。这也成了共产主义者对政府进行攻击的材料，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对立。

3. 通货膨胀的抑制

日本经济的复兴

1949年春，正当日本政府强制推行道奇方针的时候，日本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水准的七至八成。

据经济安定本部以战前为基准的产业活动指数显示（1934—1936年 = 100），1949年3月，即道奇方针实施前夕，日本制造业的综合指数已达到战前的77.5。但从产业来看，各产业的恢复程度差异很大。指数特别高的是机械工业，达到145.1，即已超过战前约0.5倍。与此相反，在同是重工业的材料部门，金属工业的指数只有75.5，约是战前的四分之三。战前的代表性产业纺织业仅有27.6，低得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

在战时经济中，机械工业的设备与就业急剧增加，纺织工业则被大幅度调整而缩小了，因此在作为战后出发点的潜在力量

上就存在巨大差别。加之纺织工业、金属工业等类产业要大量依赖进口原料,在被占领的异常状况下要恢复就受到了限制。到了战后,虽说经过战时的长期艰苦生活后,存在强烈的潜在需求,纤维制品等全是“生产多少卖完多少”,但是由于原料和机械的不足,只能限制供给。与此不同,机械工业是加工度高的产业,因此用当时能够弄到手的原材料,能够迅速把军需转化为民用,使生产迅速增长。1949年3月,耐用品的生产已达到战前112.3%的水准,但非耐用品的生产刚恢复到战前的44.5%。这是因为受到占非耐用品比重相当高的纺织业不振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基础物资、生产资料以及消费资料三类来看,生产资料的生产已达到战前的130%,而基础物资的生产只有战前的三分之二,即66.6%,消费资料的生产还不到战前的一半,只有44.3%。

据后来经济企划厅的推算,以战前为基准,1949年日本城市的消费水平只是战前的65%。仅就经济生活来说,因战争的破坏以及战后的混乱遭受打击最厉害的城市居民,其消费生活水平的跌幅也最大。据推算,1951年农村的消费水平已经超过战前,而城市还只及战前的七成不到。如果考虑到战前农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城市更穷的话,那么战后这种动向也许可以认为是朝着纠正城市与农村差别的方向在转移。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超过战前是在1954至1955年之间。

1948至1949年,日本还在经济恢复途中,无论是生产或消费,都还处在低于战前水平上。但是在这两三年中,生产确实在迅速上升,1948年会计年度从年度初至年度末的时间内,矿工业生产水平提高了50—60%。

粮食生产也有改善。1948年大米丰收,生产量达997万吨,接近战前的最高记录(1062万吨,含冲绳生产量)。小麦的生产也

急剧增加,达到312万吨。虽说还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粮食危机已经缓和。

在优先扩大生产、逐步分阶段抑制通货膨胀的中间稳定论的政策实施下,生产恢复到了战前七至八成的水平上。就在这一时政策开始向道奇方针——一举稳定政策转变。

财政膨胀的抑制

道奇方针的基点是,因赤字财政(主要是复兴金融金库增发债券)而引起的通货增发才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因此必须消除这个根源。1949年度的预算实行了综合收支超均衡预算。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不仅完全停止,而且还要求偿还。这种在财政方面实行的强有力的通货收缩政策,首先抑制了日银券的增长。

事实上,日银^①一直很担心财政方面的通货收缩对经济的过分冲击,因而采取了缓和冲击的政策。日银为了使财政上吸收来的资金能通过金融渠道再还流到民间,积极地进行放款以及买进国债。在1949年度,财政虽然盈余约900多亿日元,但在这期间,日银贷款增加了约450亿日元,购进民间银行的国债约400亿日元,结果增加通货850亿日元。这种政策当时被称为“通货紧缩政策”。这是由日银对形势独自判断后采取的政策。日银虽然以克服通货膨胀为课题,但又非常关心防止因“银根收缩”而引起的企业不断倒闭这种稳定恐慌的深刻化。

在1948年12月以前,日银券发行额每年都以60—70%的速度递增,到1949年6月,日银债券的发行比半年前的1948年12月减少约6%,与上年同期相比,也只增33%。到了1949年12月,日银债券的发行与上年同期完全持平,甚至略减。1950年6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仅增加了2.6%。

^① 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的简称。——译注

因从货币方面消除了通货膨胀的根源，物价上涨率迅速下降。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批发物价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200%多，即物价在一年间上涨了2倍多。道奇方针实施前的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批发物价指数与1年前相比又上升了1倍以上。但是到了1949年9月，该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只上升了30%，同年12月仅上升20%。1950年6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率停留在10%。这时与3个月前相比，上涨率降到1.3%（换算成年率为5.3%）。不过，在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后，物价上涨率又再次腾升。

看一下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1949年3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甚至更多。但1949年6月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率跌至24.8%，同年9月和12月的上涨率都只有5%左右。9月份以后与3个月前相比甚至开始下降。表明了道奇方针在稳定物价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夏普劝告

道奇方针是通过实现财政收支均衡来谋求抑制通货膨胀的，因此在削减支出的同时确保税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美国政府决定派遣道奇公使后，几乎在同时又决定为改革日本税制派遣专家代表团赴日。

1949年5月10日，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S·夏普为团长的、由7位专家组成的税制使团来到日本。7人中6人是大学教授，1人是任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大教堂收税厅税制调查局长职务的实业家。使团在日本滞留约4个月，调查了日本的租税制度后写出了报告。8月26日，夏普教授以谈话的形式向记者发表了“劝告”概要。9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正式发表了报告书正

文。以后又发表了几乎与正文具有相同份量的“附录”。

夏普使团 1950 年 8 月再度来日，9 月发表了第二次报告书。为此 1949 年 9 月发表的报告书就被称为第一次报告书。第一次报告书着重对日本税制进行了研究并作出劝告，所谓“夏普劝告”即指第一次报告书。

夏普劝告的正文，英文稿有 6 万多字；日文稿有 17 万字（400 格子的稿纸用了 400 余张）。“劝告”的基本内容与其说是确保当前的税收，倒不如说是确定永久稳定的租税制度，整个劝告贯穿着一个思想体系。夏普劝告重视的是，租税必须是公平的、一贯性的。全文认为，为了建立财政基础，保证税收是基本的目标，但为此也必须使纳税者理解税制，取得纳税者对征税的合作。

关于国税的形式，夏普主张实行直接税中心主义。

对于直接税的核心所得税，该报告书有几条具体的建议：“劳动所得扣除”从 25% 降到 10%，最高税率从超 500 万日元的 85% 降至超 30 万日元的 55%，对转让所得（资本收益）全额课税，对转让损失（资本损失）全额扣除，引进“富裕税”（即财产税）来补充所得税等等。

“劳动所得扣除”是为了调整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个人经营以及自由业等相比在税制上的不利而设置的。夏普使团认为现行的扣除率过高。而且过度的累进税率会妨害高收入者的工作欲望和纳税欲望，因此建议降低最高税率。另一方面认为应该对资本收益全额课税（现行是半额课税）。对利息所得，指责按比例分开课税的提案毫无根据，主张综合累进课税。夏普使团的想法是，通过这些改革来有效地实施“现代化的累进所得税制度”。

夏普劝告对法人税采取“法人虚拟论”的立场，表示尽可能要避免对所得税进行双重课税。

“法人虚拟论”认为，法人所得（会社的利润）归根结蒂是属于这个法人的所有者（股东）占有，因此对法人课税，再对股东的红利收入课税属于双重课税。对此，有人主张“法人实在论”，认为法人作为法律上的独立人格也应负担租税。美国是崇拜个人主义的，因此夏普使团支持“法人虚拟论”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夏普使团从这一立场出发，劝告日本政府排除对法人利润的双重课税，而对个人的红利收入扣除25%的所得税。

夏普使团还指出，对于因通货膨胀而发生价值变化的现有资产，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价。通过资产再评价，企业就能大幅度加快折旧，从而减少帐面利润，减轻企业过重的租税负担。

对于所得税和法人税，夏普使团还劝告引进“蓝色申报制”。其目的也是为使税制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后“蓝色申报制”形成了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所谓“蓝色申报制”，即对于事业所得、不动产所得、以及山林所得填在规定的帐本文件上，进行准确的申报，政府根据查帐结果进行准确的更正和决定。

此外夏普使团还就间接税的调整与合理化，建议取消高交易税、织物消费税以及砂糖消费税，同时提高酒税等。

确立战后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财政基础，也是夏普劝告中重要的一部分。为保证地方税的收入，它建议引进“附加价值税”作为都道府县税；让市町村征收固定资产税和市町村民税；基准财政需求与基准财政收入的差额用一般平衡交付金来弥补等。

夏普劝告的主要部分从1950年度起形成制度化，但是后来则进行了有幅度的修改和删减。尤其是作为夏普劝告基础的直接税中心主义以及一贯性的累进所得税制等，由于为了促进资本积累和鼓励储蓄引进了“租税特别措施”而发生了动摇。此外原已决定引进并实施附加价值税，但是后来又延期实施，到1954年就被废除了。同年，平衡交付金制度也改变为地方交付税交付

金制度，即由原来的用一般平衡交付金来弥补地方财政不足额改为机械地从三种国税(所得税、法人税、酒税)中抽取一定的比率分配给地方。

在战时，因筹集军费的需要，国民的租税负担迅速增加。到了战后，国民实际收入水平显著下降，但是财政支出的需求仍然很大，从而国民的租税负担反而更重了。因此，一部分国民盼望实施夏普劝告以后能够大幅度地减税。同时，道奇方针实施后，经济发展停滞，各方要求减轻租税负担的意见强烈。但是，税赋最终减免得极少。

日本方面对实现当前的短期效果的愿望强烈；而夏普使团则立足于长远的打算，以确立合理的税制为目标，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4. 人员裁减

生产停滞

道奇方针实施的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当然对生产活动有抑制作用。不过，这种抑制作用的大小因产业的不同而异。

制造业综合生产指数，1949会计年度期间几乎停滞。不过，其中生产下降最厉害的是机械工业，而其他主要工业生产还是在继续上升。

道奇方针从两方面使机械工业受到了打击。

其一，战后，利用军需产业的残存（人力资源以及残存的设备和资材）一齐涌向轻量廉价的耐用消费机械生产的中小企业，大多数因需求停滞和减少而倒闭。其典型就是收音机。1948年收音机生产达81万台，1949年降到61万台，1950年又降至29万台。1947年生产收音机的工厂有86家，到1950年只剩下18

家。

其二，因有复兴金融金库的融资等资助，企业的设备投资急剧增加，为此产业机械的生产也迅速增长起来。当复金融资一中止，就使机械生产不得不缩小。道奇方针实施后，整个经济需求萎缩，设备投资不振，机械需求缩小。例如：煤矿机械等直接受到了复金融资中止的影响，机械的生产台数从1949年的7.4万台激减到1950年的4.8万台。

机械工业，无论是耐用消费品机械还是生产资料机械，本来就是最容易受到经济繁荣变动影响的产业。在家庭收支中，当收入增长放慢后，往往首先就是控制购买耐用消费品。在企业中，如果社会对自己产品需求减弱，就必然停止购进新设备。对生产资料机械的需求，不是同总需求成比例，而是同需求的增加部分成比例。简单地说，就是如果需求增加部分减半，则对生产资料机械的要求也减半。因此，经济不景气对生产资料的影响是加速度的，经济学家称此为“加速原理”现象。

总之，与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比较，不景气使社会对机械类的需求减少得特别厉害。因道奇方针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发行，名义需求的增长停滞，对机械工业影响最甚。

当然，那些把统制物资“倒流”到黑市、用黑市价格出售以及囤积居奇的工商业，也受到了道奇方针的直接打击。不少人因估计错误而破产。

如上所述，以机械工业为中心的一部分产业因道奇方针而受到了重大打击。但是在这期间也有产业在继续增加生产的。制造工业的平均生产指数大致是“持衡”。一般来说因抑制通货膨胀、采取通货收缩政策而导致经济缩小的叫做“稳定恐慌”。道奇方针实施后产生的不景气，有时也被冠之以“稳定恐慌”。不过事实上，道奇方针只引起了一部分产业的“恐慌”。就全体来

看,可以说是比较轻微的“恐慌”。虽然一部分产业和一部分经营者确实受到了巨大影响,但是就整个经济来说,并未出现惊人的下跌。这得益于日银为缓和道奇方针的抑制作用而采取的“通货收缩”政策。从经济实态来看,道奇方针在日本经济复兴过程中只是起了一种“楼梯平台”(楼梯中间的歇脚平台)的作用,而并未导致经济的惊人下降。

因实施道奇方针才开始的经济调整,由于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出现了军需繁荣而中断了。因此,经济“平台”短时间内就消失了。除了机械工业,其他主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在朝鲜战争以前就有相当高的增长率。因此可以认为,即使没有朝鲜战争,整个日本经济也能经受住为克服通货膨胀而进行的必要的调整,进入新的经济发展轨道。

单一汇率制与产业合理化

无论怎么说,道奇方针引起的“稳定恐慌”是暂时的、过渡性的,而道奇方针的重要目标、单一固定汇率制的设定却产生了长期的效应。

1949年4月25日开始实施的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与过去按商品定汇率相比,对于大多数主要出口品来说,等于日元大幅度升值。因此,当时出口变得很困难。例如,道奇方针实施以前,收音机是按1美元=550日元的汇率出口的,而设定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后,就等于日元升值约53%。如果用美元定价的产品不涨价50%以上,那就收不回和以前相等的日元了。

单一汇率设定后,按美元定价统计的出口,都无增长,有的甚至下降了。为了适应日元事实上的升值,各出口产业一般会提高用美元定价的产品价格。在此状况下,出口数量即使不增

长,用美元计价的出口额也会上升。但是现实情况是,按美元计价的出口额不是无增长就是下降。之所以会如此,可以认为是由以下两个原因的复合作用导致的:(1)为了出口竞争,很多产业往往不能大幅度提高用美元定价的产品价格,与此同时,还不得不降低用日元定价的产品价格。(2)尽管如此,在出口数量上还不得不减少许多。

另一方面,因美国对日援助的削减,原先依赖援助的进口减少,加之受道奇方针的影响国内不景气,又减少了原料等进口,为此到1949年下半年,总进口开始下降。尽管如此,大幅度的外贸入超仍没有好转。1950年下半年,进出口水平虽然暂时取得了均衡,但是这只是因为出现了朝鲜战争这一异常事态才增加了出口。

在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固定汇率下,为了克服贸易的经常赤字,就必须在50年代进行旨在实现“经济自立”的产业合理化。

1949年5月25日将原来的商工省与贸易厅、煤炭厅合并,成立了通商产业省。其目的是,成立一个把国内产业政策与对外贸易政策综合起来的机构,以结束战时与战后的经济统制时代,形成正常的对外贸易关系,以代替异常的国家管理贸易。

实施道奇方针后,日本的各产业就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了,这使人们痛感日本产业的技术与设备与欧美比较起来太落后了。在战前,日本在许多领域就依赖从外国进口的技术与产业机械。战争时期,外国的技术与机械的进口中断,而且,所有的资源都被动员用于战争。因此,到战后和平时期,要改善作为产业基础的技术和设备就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首先是修复现有设备,增加生产,即着眼于“量”的方面,对于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质”的方面的改善还未排上议事

日程。因此,以这样的状态去迎接国际竞争、发展日本产业是极困难的。

1949年9月23日,吉田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产业合理化”的方针书。该文件首先表示,按照道奇方针在“确立了均衡预算,设置了单一汇率,推行了健全的金融方针”之后,接下来就必须进行产业合理化。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 为了推进合理化,必须展望将来的产业结构,据此确定各产业的指导方针。

(2) 合理化原则上是以迅速缩小与国际价格之间的差价为目标。

(3) 关于企业部门的合理化,原则上是期待民间企业自己独创,作为政府主要是为创造推进企业合理化的环境以及消除障碍而努力。

(4) 积极地推进效率的提高与优秀技术的采用。

1949年12月24日,成立了通产相的咨询机构产业合理化审议会。这一审议会不仅研究产业合理化的一般方针、劳务、工程管理、资金、流通等共性问题,而且还研究各产业如何采用现代的生产方式、提高技术水平等合理化推进政策。为此在最初阶段还设置了29个有关业种的部会。以后,1961年又成立了产业结构调查会,它与上述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于1964年合并组成了产业结构审议会。在那期间内,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作出了各种咨询,为推进合理化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在其成立的第二年1950年6月,发表了关于钢铁与煤炭合理化的答询。1951年12月又发表了题为“关于我国产业合理化方案”的阐述整体方针的答询。

在着手制定并实施这一立足于长期展望的产业合理化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决定,将充分运用对日援助回流资金作为复

兴金融金库融资中止以后，确保产业设备资金的对策的方针。盟军总司令部当初决定把回流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复金债券，抑制通货膨胀，禁止当作产业资金运用。但是产业界强烈希望得到回流资金的贷款，日本政府从促进设备现代化的观点出发也要求能运用这笔资金。为此，在征得了盟军总司令部的同意后，从1949年9月起用回流资金对电力、海运、煤炭等民间企业以及国铁、电信电话等国营企业进行了贷款。这些回流资金在1951年日本开发银行成立以前，作为对基础产业的政策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员裁减

因道奇方针引起的经济停滞，使一部分产业蒙受巨大打击，面临倒闭与裁减人员。可是就整个经济活动来说虽出现低潮，但并未发生猛烈下跌。劳动者的生活虽然难免窘迫，但整体并未显著恶化，还可勉强度过难关。

据总理府统计局统计，月平均现金工资总额，以工厂从业者为例，从1948至1949年，平均从4369日元升至8416日元，增加约0.9倍。1949至1950年，从8416日元提高至8627日元，仅仅增加了2.5%。虽说名义工资的提高受到抑制，但是由于消费物价下降，实际上工资仍然有所上升。从总理府统计局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看，1950年的消费物价比上一年下降7.2%，因此虽然工人名义工资仅增加2.5%，但是实际工资提高了10.4%。

道奇方针抑制通货膨胀，对日本经济是一种考验，但是，总的来说，它并非是破坏性的。经济恢复和增长的步伐虽一时停顿，但是接着又继续前进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经济与社会的危机，而在危机中强化了官僚与经营者的指导权，即确立了所谓“专家政治”。战后，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的中小规模的企

业,相当部分在这次调整过程中被淘汰,但也有掌握了优势经营资源的企业经受了考验而生存下来,以后成了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因道奇方针而破产的经营者、劳动者以及被作为裁减对象的失业者承受了重大牺牲,这也是事实。中小企业者破产后一家集体自杀等悲惨新闻时时在报端出现。

据当时劳动力调查(总理府统计局)的统计,年平均完全失业人数 1948 年是 24 万,1949 年是 38 万,1950 年又增加到 44 万。即使如此,失业率也只不过分别是 0.7%、1% 以及 1.2%。不过,必须考虑到,日本统计中规定的完全失业者是严格地指在一周中连一小时工作都没有的人,因此众多的半失业者和不完全就业者都被列入就业者行列,事实上,失去工作后,正在寻求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

据劳动省调查,1949 年 2 月至 12 月有 884 个事业所进行了紧缩(整顿),解雇人员达 43.5 万人。

其中,按照力主财政均衡的道奇方针精神,严格地进行合理化的公共部门中,也有大量人员被解雇。

1949 年 5 月 31 日公布了行政机关职员定员法(6 月 1 日实施),宣布解雇 285124 人。从 4 月 1 日开始和专卖公司一样作为国营公司采取独立核算的国铁,7 月 4 日宣布第一次解雇 30700 人,7 月 12 日又宣布第二次解雇 63000 人,并立即开始向本人通告。从 6 月份由递信省分割而成的邮政省和电气通信省 8 月 11 日向全递工会通告,合计解雇将达 26500 人。

民间大企业在这一时期,以电机等机械工业为中心,也面临着人员缩减。从 4 月到 5 月,大企业相继通告了人员裁减数:冲电气为 2800 人,川崎车辆为 1300 人,三菱电机达 1800 人等。电机行业最大的企业东京芝浦电气根据 1949 年 6 月持股会社整

顿委员会的指令，在44个事务所中解散了28个，用剩下的16个事务所继续经营。东京芝浦电气趁机于7月5日宣布解雇4600人。

这一时期的人员裁减，采取的形式几乎全是由经营者指定解雇对象。经营者利用这一机会，有意识地选择共产党员以及产别会议系统下的工会活动家为解雇对象，把他们逐出企业。

共产党和产别会议组织了反对裁减人员的斗争，以国铁、东芝等为首在各地掀起了工潮。总同盟系统下的工会一边采取反对裁减人员、反对降低工资、保护劳动者生活的立场，一边又坚持同共产党系统有政治色彩的强硬斗争划清界线。

在产别会议内部，这时也已经对共产党指导工会、利用工人运动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的政治倾向表示不满，并逐渐形成了民主化同盟，工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在1949年1月的大选中，国会议席一下猛增到35个的共产党，也由于在工运战线强制实行严厉的防卫战而逐渐孤立、败北。

下山、三鹰、松川事件

1949年的夏天，有关日本劳工运动的悲惨事件相继发生。

这一年的5月30日，东京都议会提出了公安条例案，想以此来限制东京的集会、游行等群众运动。掀起了反对裁减人员斗争的各工会，以东京都劳联^①为中心，又组织了反对公安条例的共同斗争委员会。

5月30日，在共同斗争委员会的动员下，众多的工人涌向都议会，在都议会大厅静坐示威。晚上九点半，示威工人与前来驱赶的警察发生冲突。在混乱之中，东交工会（都营交通事业工

^① 东京都劳联：东京都职员工会与东京都公营事业部门从业员工会的联合会。——译注

会)的一个会员(社会党员)从三楼摔下死亡。工会方面认为这是警察的暴行所致,掀起了抗议运动。自发组织的罢工、怠工也纷纷起响应。

7月5日,国铁总裁下山定则在上班途中,进了日本桥的三越总店后下落不明。6日零点二十五分左右,在东京北部的足立区常磐线绫濑车站附近的铁轨上,发现了已被轧成几段的下山尸体。

下山总裁在7月1日曾向国铁工会通告了裁减96000人的计划。其后,连日一直同劳资代表谈判。在去向不明的5日,为了回答工会方面的提问,又约定由下山本人去同工会代表会晤。

关于下山事件,有人认为是他杀,即下山是在其他场所被杀害,然后为造成自杀假象被抬到铁轨的。另有人认为是自杀,即下山在占领军的压力下,不得不强制裁减人员,心神劳累,自杀身亡。到今日为止,下山事件还未揭开谜底。当初有人对左翼持怀疑态度,后来又有人认为这是美国的谋略机构所犯罪行。总之,无论如何,下山总裁的死给予工会方面以重大打击,抵抗裁减人员的斗争显著减少。

在国铁工会内部,围绕着斗争方针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强硬派主张,为了反对裁减人员,必须无视公共企业体劳动关系法,不惜采取非法的罢工方针。而民主化同盟(民同)等则认为,这种斗争方针是以共产党的暴力路线来煽动工会会员,主张为了经济重建,必须实行战术转变,坚持国铁运输畅通。

下山事件发生后的第十天即7月15日夜九时半左右,在东京西郊的中央线三鹰车站内,停在三鹰电车区车库里无人驾驶的列车突然狂驰,致使正在车站内行走的市民6人当即死亡,20余人受伤。据判断是有人把停在车库内的列车主控制器调节在

全速状态上,然后拉起导电弓架使车开动,导致列车风驰电掣般地狂开。16日,吉田首相发表讲话,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煽动社会不安”。17日以后,任国铁工会分会干部的共产党员,作为三鹰事件的涉嫌者先后被逮捕。结果,包括非共产党员在内共10人被起诉。其中一部分被告供认是共同策划的,但是后来又全面否认。最后被捕者中只有一人,非党员竹内景助承认是他自己一人单独犯罪。

1950年8月10日第一审判决,否定了共同策划的可能性,认定竹内单独犯罪,宣布其他人无罪。第二审以及最高审判(1955年6月)基本都同意第一审的判决。对竹内的量刑,第一审是判无期徒刑,第二审判为死刑,最高审判以八比七仅一票之差判竹内死刑。但竹内在公判中几度改变供词,后来又大叫冤枉,最后于1967年1月死在监狱内。

三鹰事件发生约1个月后,8月17日凌晨三点零九分,在东北本线的金谷川与松川两车站(福岛县)之间,从青森发出沿着奥羽线开往上野的旅客列车前部突然脱轨,机车翻了个底朝天。司机与副司机等3人死亡。行李房乘务员与乘客5人负伤。据查,铁轨的连接板被松开了,铁轨固定在枕木上的道钉被大量拔了出来,很明显是蓄谋犯罪。18日,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说:“这是集团组织的蓄谋妨害行为。”

9月10日以后,国铁工会有关人员与东芝松川工场工会的有关人员共20人被逮捕、起诉。除一人之外其余全是共产党员。

松川事件的审判,于1950年12月进行第一审判决(福岛地方法院),判5人死刑,5人无期徒刑,10人有期徒刑。1953年12月进行第二审判决(仙台高级法院),判决在第一审中被判有期和无期徒刑的3人无罪,其他17人有罪(其中4人死刑)。但是

人们认为检察官方面的起诉，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根据不足。后来连作家广津和郎、宇野浩二等人也批判了这一裁决。1959年8月，最高法院驳回原判决，把此案又退回到仙台高级法院。1961年8月，仙台高级法院判决全体无罪。1963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检察官的上诉，确认全体被告无罪。这一判决是距离事件发生14年后才作出的。

5. 共产党和社会党

共产党的败退

下山事件、三鹰事件以及松川事件迄今为止仍然是未解开的谜。

现在看来，可以说这些事件确实不是工会或共产党组织的蓄谋犯罪。恰恰相反，有人认为有关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是美国谍报机关为挫败共产党运动而制造的。对此，虽然得不到决定性的证据与证言，但是这一疑问始终存在。这些事件的直接结果是，使国铁工会以及共产党运动在国民中间处于更孤立的状态，给予反对解雇的斗争以沉重打击。吉田内阁的阁僚们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就立即反复地发表讲话，推测事件是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蓄意犯罪，以此来诱导舆论。现在且不论事件是谁所为，总之由于这些事件，不少人丧失了性命，许多无辜的人失去了生活的权利。

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并不想使这种破坏行为合法化。但是，面对着那些认为事件是共产党所为而进行的搜查以及以此为借口来操纵舆论的严峻形势，共产党采取的态度是软弱的。共产主义者的无视议会制以及为夺取政权不惜使用武力的立场，俗称为“暴力革命”。被人们理解成“为了目

的而不择手段的立场”。

下山、三鹰、松川三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即1950年1月，日本共产党受到了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严厉批评，被指责说其和平革命路线是错误的。因而日本共产党不久就采用了武力革命路线。这一路线的转变对于击破三鹰、松川事件是共产党的破坏行为的舆论是一种妨害，对于获得国民对本事件被告的支持也是不利的。

1949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打着反对解雇的旗帜，激化矛盾，制造了紧张空气，这也是事实。在这样的气氛中，三事件就被解释、宣传为同共产党有关。

在东京都厅发生五三〇事件后，以牺牲者所在的东京交通工会柳岛支部为中心的全劳联和产别会议系统下的工会掀起了激烈的抗议运动。各支部的车间、工场甚至不听工会干部的劝阻屡次进行罢工。国铁为反对国铁国营公司化和行政整顿，从6月起，从京滨、京叶地区为中心开始了停止国电的罢工。对此，东京铁道管理局处分了工会的负责人，从而使劳资对立进一步激化。6月10日，悬挂书写着“人民电车”红旗的列车在正处于罢工中的京滨东北线及横浜线上徐徐开过。

6月15日，在日本制钢所广岛工场，工会方面为反对解雇，3000人占领了工场。他们同前来驱散的警察争斗发生冲突，结果很多人负伤，不少人被捕。6月17日，东芝加茂工场（新潟县）的工会同警察又发生冲突。6月30日，在福岛县平市，警察要把共产党设置在车站前的宣传板拿走（据说是根据驻福岛县的美军指示），共产党员等闯进了平市警察署，最后从拘留所抢出了被捕者。

从7月至8月，人员裁减具体化了。以国劳、全递等为中心的各工会都掀起了包括罢工形式在内的反对斗争。但是，即使

在产别会议系统下的工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动向，脱离产别会议的工会不断产生。以共产党员为中心的活动家集团在工人运动中逐渐孤立，陷入困境。由于共产党在各个领域都有组织，因此，他们动员还在其影响下的其他工厂的工人、在日本的朝鲜人以及学生等等来支援斗争。

占领军强烈的反共方针，保守势力占优势的政治形势，以此为背景的警察和检察部门的强力干预，经营者逐渐掌握已脱离了混乱的企业领导权，以及工人运动本身的分化与瓦解等等，这些对共产党的运动都是不利的。为了对抗，共产党员们动员起地方势力展开了强烈的抵抗运动，使各种事件频频发生，这又为保守势力的反共宣传提供了材料。

被解雇的工人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道奇方针抑制通货膨胀给大多数国民带来了安心和稳定。以战后改革与复兴的现实为前提，专心致志、加倍努力、创建安定的生活是大多数国民的愿望。在这样的气氛中，强烈斗争形态的提案或激烈行动的开展，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结果，这个时期的反解雇斗争几乎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工人运动的改组

1947年二一大罢工时处于顶峰状态的公務员工会运动的核心组织国铁工会，在1949年夏的反解雇斗争中遭受挫折后，也从共产党领导下脱离了出来。在1949年8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国劳（国铁工会的简称）中央委员会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同盟几乎完全掌握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月14日召开的国劳大会上，决定脱离全劳联，加盟国际自由劳联。全递信工会在1949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也因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再建同盟派的退席而使会议流产。10月，号称“正统派”的

再建同盟派和余下的称为“统一派”的组织分别召开了大会。以后统一派逐渐衰弱；从全劳联、产别会议脱离出来的正统派作为全递信职员工会继续发展了下去。

对国铁、全递人员裁减的成功增强了经营者的自信心，民间企业也相继开始大量解雇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活动分子。

在1949年11月28日召开的产别会议大会上，号称加盟会员有77万人，由于全递的分裂等，实际人数降至50万人左右。与去年号称的125万人相比剧减了一半以上。

另一方面，从产别会议分离出来的产别民主化同盟，于1949年12月10日召开了全国产别工会联盟（新产别会议）成立大会。号称32万人，但实数是20万人左右。

新产别会议和总同盟中的左派倡议总同盟与新产别会议合并。但是，总同盟中的右派认为这是社会党左派、总同盟中的左派以及新产别会议想控制总同盟而加以反对。因此劳工战线未能顺利实现统一。

民主化同盟系统的工会，从1949年末至1950年春，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的“合法化”斗争，公务员的工会也同政府反复进行了谈判，均未获得大的成果。

1949年11月21日，脱离了全劳联的各工会组织了全国劳动组合统一筹备会。这一统一筹备会于1950年3月11日召开了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成立准备大会。总同盟、国劳、全递、日教组、都劳联、海员组合、全矿、炭劳以及私铁总联等代表参加了准备大会。新产别会议认为组成总评是盟军总司令部在幕后活动的结果，因此在准备大会召开前夕决定不参加。

总评成立大会是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会员有365万人，是日本工会运动史上最大的组织。正在衰退中的、会员降到10万人的产别会议，表明不参加总评

的新产别会议,以及总同盟中反对加入总评的右派工会,均留在总评之外。总同盟右派工会在一年后的1951年6月重建了约有30万会员的总同盟,以后又同抗议总评左倾化而退出来的全纤同盟、海员组合等一起,于1954年4月成立了全日本工会会议(全劳会议)。全劳会议于1964年11月,又与总同盟、全官公合并组成了全日本总同盟(同盟)。

由于政府和经营者方面的攻击以及来自内部的批判和分裂,产别会议逐渐衰落。1950年,残存下来的比较有实力的日立总联合反解雇斗争失败,加之日本电影东宝支部也拗不过经营者强制推行的人员裁减,这些又给了产别会议以决定性的打击。日立制作所在其他电机会社裁减人员期间还勉强维持着,但是随着道奇方针实施后不景气的深化,终于在1950年初决定关闭清水工场,并且还实施其余各工场的剩余人员强制回家休假的方针。工会方面(日立总联合)对此表示抗议,但是经营者一方于1950年5月8日又宣布裁减占总数17%的5555人。工会方面的斗争由于步调不一致,最后全面败北,8月上旬就草草收兵了。东宝于6月18日裁减1328人,东宝工会也只得承认失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各方对共产主义者的革职、解雇更趋激烈,这就进一步打击了产别会议。

来自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

1950年1月,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发表了署名观察员的《关于日本形势》的文章,激烈地批评了日本共产党。

文章首先谈到,美国国务院和军部把日本作为抵抗苏联以及亚洲各国“民主运动”的军事冒险的主要基地,从而开始十分重视日本。为此作为第一步,美国推迟签定对日和平条约,以便使对日长期占领合法化。为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占领军勾结日

本反动势力镇压日本“民主运动”，企图消灭共产党和工会。文章进而批评说，日本共产党面对这种动向没有进行有效的斗争。

文章点名批评了被公认为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野坂参三。

文章说，野坂期待盟军在使日本非武装化的同时实现日本民主化，以为在被占领的条件下也能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认为占领军不存在使日本殖民地化的意图，只要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占领军就会撤离日本等等。文章指出，这种“资产阶级情调的言辞”表明，野坂的理论是“赞赏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骗取日本人民大众的理论”。野坂的理论是“和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理论”，也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关系的理论”。文章进而断定，野坂的理论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是仅仅对占领日本的帝国主义者和日本独立的敌人有利的理论，因而也是卖国的反日本的理论。

因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复兴西欧，从而使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层企图渗透西欧的希望破灭，采取封锁柏林的强硬措施也因西方空运战术而失败。与此相反，由于美国同西欧加强了结盟，倒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封锁”的政策。认识到这种可怕后果的苏联领导层为了平息各国共产党内部的混乱，加强反美斗争力量，开展了一系列宣传运动。对日本共产党的批评就是其中的一环。

美国深刻反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协调政策的失败，转而采取了阻止苏联扩张政策和渗透政策的“封锁”措施。美国政府主流派对苏、对共产主义的防卫政策的强化并非是要攻击苏联或夺回东欧。即使是对中国，在蒋介石政权确实垮台以后，美国也开始尝试同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权建立关系。但是美国对苏军事包围圈的形成刺激了斯大林，使之心神不安。战后

不久，美国保持着原子弹的垄断地位，这也使斯大林感到不安。斯大林绑架德国科学家，让他们协助苏联进行原子弹研究。1949年9月，苏联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这比美国预想的要早得多。

美国把苏联的军事侵略危险性估计过高，因此急忙地加强了对苏的军事包围体制。这又使苏联增强了戒备，对全世界共产主义势力发出加强反美斗争的指令，就是在这—状况下产生的。

日本共产党的混乱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对日本共产党高压式的批评，带来的后果与情报局当事者的意图正相反，它在日本共产党内引起了巨大混乱，结果反而打击了日本共产党的运动。

情报局对日共的批判最初是通过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传过来的，当时日共不相信，声明这是敌人妄图破坏共产党团结所散布的谣言。日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纪律委员会联名发表的声明说：“如果我们相信外国电讯，那么斯大林同志早已死过二十回了，毛泽东同志也已犯过十次错误了。”声明呼吁：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载于1月9日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

但是莫斯科广播与苏联驻日代表团证实了情报局的批评是事实后，日本共产党又一次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日本形势读后感”的文章。（载于1月13日《赤旗》）其中说，情报局批评的野坂的论文确实有不足的地方，但是这些不足正通过实践在克服。

文章说，在日本主客观的条件下，野坂不得不用婉转的语气使用“奴隶的语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外国的同志无视这种状况来批评日本的党和同志，将会给党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文章中讲到的“奴隶的语言”，是指不能批评占领政策而言。这个词

最初是列宁使用过的。当时列宁为了能够在帝俄严格审查出版物的条件下发表自己的《帝国主义论》，在文章中不得不把许多观点省略掉。“奴隶的语言”就是列宁在说明这种情况时使用的。

1月17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抨击日共。社论声明支持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同时指出，日共发表反对意见，说什么野坂的错误正在被克服、情报局的批判是对日共立场不理解等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社论主张“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武装革命才能夺取国家政权。议会制仅仅是斗争的补充手段，即仅仅是揭露敌人的讲台”。

1950年1月19日，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评论的决议”。决议评价了“情报局批判的积极意义”，认可了野坂的自我批评。仅仅在一、两个星期内，日本共产党的态度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后，对情报局的批评表示无条件的屈服。野坂在2月6日发表了充满苦衷的自我批评书。

作为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反美宣传的一环而进行的情报局对日共的批评，对于已经受到巨大打击（因美国占领军的政策转变以及产别会议的衰退、分裂等）的日共来说，又遭到了双重性的打击。

第一，围绕着是否接受情报局的批评问题，日本共产党活动家领导层与知识阶层共产党员之间产生了意见对立。日本共产党由此出现了深刻的政治与组织的分裂。当日共中央声明外国电讯是谣言后，一些拥有实力的党员就发表讲话说：遭到情报局的批评是自然而然的事，为此这些党员受到了开除处分。对于政治局“读后感”认为情报局批评的错误正在克服的观点，在日共中央的领导层中就有不同意见。野坂参三、德田球一以及伊

藤律等中央委员会的主流派采取“读后感”的立场，而志贺义雄、宫本显治等有实力的少数派党员则主张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接受情报局的批评，对斗争方针重新进行充分的研究。

1月19日，在扩大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读后感派”迫于党内外的压力，作了自我批评。其后，两派的抗争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

“读后感派”为了维持自己在党内的主导权，欲将反对势力从领导层排除出去或将他们开除出党，事实上促进了日本共产党的分裂。当初就十分重视情报局批评的人被叫作“国际派”，他们没能形成完全统一的主体势力，而且除了知识分子党员以外，也组织不起众多的党员，为此，“国际派”中的不少人被开除出党。

国际派中的一部分人最后不得不同“读后感派”妥协，还有些人则保持沉默。就这样，日本共产党暂时维持住了以“读后感派”这一奇妙名词为名的主流派组织。

第二，在情报局以及《人民日报》对日本共产党的批判中，责难利用议会制、依靠和平手段获取政权的方针，强调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所以，日本共产党不得不转而采取武力革命路线。这就使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国民中陷入更孤立的状态。

武力革命路线

迄今为止，日本共产党一直被指责为“暴力革命的政党”，如从俄国革命经验来看，这种非难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共产党却是采取了以野坂的“慈爱共产党”、“和平革命”等口号为代表的重视议会制的路线。在实际运动方面，因为由具有组织能力的热血汉子德田球一掌握领导权，他使日本共产党明显地成为行动的政党。但是在占领条件下日

本实施了民主改革以后，日共为适应日本的现实所作的努力则是体现了野坂的理论。

情报局断定野坂的和平革命论是反人民、反民族的欺骗性理论。为此野坂、德田等主流派一方面从组织上排除那些要求接受情报局批评的反对派(国际派)，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全面接受情报局的批评，把斗争方式转换成武力革命路线。日本共产党从这时起，开始重视“反美”，提倡建立“民族民主”战线。在1951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了“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新纲领强调，“认为依靠和平的手段就能实现日本解放和民主变革的想法是错误的”。日本共产党在公开的党组织之外还成立了由少数活动积极分子党员参加的秘密军事组织。但是，在实际上日共除了在群众游行时投掷装有汽油的火焰瓶的活动以外，并没有其他什么“武力革命方式”的行动。不过，这已经成了保守派攻击共产党的好材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盟军总司令部采取了对日共干部开除公职、停止“赤旗”发行等强硬措施。日本共产党把干部转入地下，成立了公开的与非公开的双重组织来对抗。这种半合法的状态，也加速了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向武力斗争路线倾斜的过程。武力革命路线给了统治者以镇压共产党的理由，而这种镇压又加固、强化了武力革命路线，从而互相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攻击“读后感”主流派的国际派也不可能制止主流派的错误。国际派本来就采取原则上支持情报局与《人民日报》批评的立场，因此根本不可能去对抗情报局的武断批评，进而去拥护、发展适合战后日本固有国情的和平革命路线。

正如对情报局批评所持的态度发生迅速变化所反映的那样，这个时期在日本共产党中央，德田的领导权加强了。由于德

田坚持自以为是，在党内引起了不满。这表明了日本共产党必须向重视党内民主的方向改变。但是日共半合法的状态却进一步强化了德田派的专制体制，在政策上也进一步向破灭的方向滑去。

社会党的分裂

1950年初，在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日本社会党内也发生了混乱。

社会党在进入片山、芦田两届内阁以后，并未拿出什么看得见的成果，为此在1949年1月的大选中，议席数剧减，受到了沉重打击。此后，围绕着政治路线，内部对立激化。在1950年1月19日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对立激化到组织上的分裂。

在1年多以前的1948年12月，一部分左派曾分离出去独立组成了劳农党。其后在1949年4月14日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左右两派的对立也深刻化了。两派围绕党的性质、路线发生了正面冲突。在第四次大会的运动方针起草委员会上，在左派的铃木茂三郎起草委员长的领导下，左派的稻村顺三执笔起草了“铃木案”（实际是稻村案）。与此相对抗，右派的森户辰男起草了另一种草案。由于双方观点完全对立，结果闹得不可收拾，森户与稻村之争表明了双方对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解完全不同。

稻村案认为，社会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政党”或者是“工人阶级政党”，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森户案则认为，社会党是“劳动国民大众的党”，所谓革命则是意味着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变革等全过程。森户案采取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立场，它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前提，以社会改革为目标。稻村案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级政党的色彩很浓厚。

第四次大会的运动方针起草委员会的争议最终没有结果，后来只得例外地向大会递交两种方针案。最后党的首脑们只得让中间派的胜间田清一起草一份调停案提交大会。但是，调停案并不能决定方针，为此大会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继续审议。在人事方面左右两派也严重对立。围绕着书记长的职务，左派铃木茂三郎和右派浅沼稻次郎相持不下，最后铃木当选。在片山、西尾体制下参加联合政权受到挫折以后，社会党内向左倾斜的倾向强烈。特别是，从议会斗争转向了重视群众斗争的年轻党员的活动非常活跃。而且从产别会议分离出来的民主化同盟（民同）派的工会干部都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党，从而开始形成了社会党与总评联合发展的左派组织的基础。在1949年11月的总同盟大会上，总同盟左派领袖高野实被选为总主事，这就打击了与总同盟右派联合的社会党右派势力。

1950年1月19日社会党第五次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由于左派铃木任委员长，因此向大会递交的是同上述第四次大会的稻村案相接近的运动方针案。对此右派反响强烈，最后两派发生冲突，右派的代表都退出了会场。接着右派代表另外召开了大会，选举片山哲为委员长、水谷长三郎为书记长，同时发表声明“坚决反对重建偏向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留在会场内的左派，选举铃木茂三郎为书记长，并指责右派的分裂行为。这时，退场的右派代表258人，留下的左派代表275人，大会真正地一分为二了。

社会党这时的分裂没有波及到下面组织。在2月份选举京都市长时两派推荐同一个候选人。以此为开头，两派又开始对话。4月3日召开了两派统一的第六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委员长职位空缺，选举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

但是，这种统一只是暂时掩盖了路线的对立，再次出现分裂

只是时间问题。大约一年半以后，在1951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八次大会上，围绕着赞成还是反对旧金山和平条约的问题，左右两派再次激烈冲突，最后分裂为左派社会党与右派社会党。

共产党与左派社会党

随着美苏对立的日益明显以及美国封锁苏联与共产主义的世界战略的确立，盟军总司令部为了消除共产党在日本的影响，也开始对工会等群众运动加以限制。由于道奇方针期待一举消灭通货膨胀，因而以国铁、电机产业等为中心的企业开始大量裁减人员。以经济复兴与盟军总司令部的政策转变为背景，已经恢复了经营权的资方以道奇方针不景气下需要开展经营合理化为借口，在裁减人员时，专门瞄准共产党员以及接近共产党的工会活动家来解雇。而产别会议系统下的工会，领导层左倾化，脱离了一般劳动大众；同时，有一些批评“工会被共产党牵着鼻子跑”的人又组织了新活动家集团，使内部陷于分裂状态。因此，对于盟军总司令部、政府以及资方等三位一体的攻势没能组织有效的反击。政府抓住下山、三鹰、松川等事件，对共产党进行攻击，又离间了国民与共产党的关系。加之斯大林要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进行反美斗争，通过情报局对日共进行批评，致使日本共产党的斗争路线转而正式采用暴力革命路线。这样日本共产党便自己选择了脱离国民和孤立化的道路。

因战后改革而引进并在日本已经加强了自由、民主主义机能，虽说由于占领军的政策改变而有所修正，但是它已经在日本国民中间被广泛理解。正是在这种时候，共产党却回归到了实质是否定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立场。

共产党本来就讥笑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坚持武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的

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战后，共产党有时虽也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但是这种民主主义只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加以利用的，在可能的时候，也会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提倡“人民民主主义”。回到了武力革命路线的日本共产党，无视当局的限制，用实力去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靠投掷火焰瓶来制造骚乱空气。但这一切都不利于强化共产党的政治立场，相反却减少了国民对共产党的支持。

在共产党采用武力革命路线而陷于孤立的时候，社会党的左派却暂时处在上升期。对片山、芦田两内阁的政绩表示失望的情绪，使原支持社会党的势力及其周围的相当部分力量倒向了左派势力。共产党在1949年1月的大选中票数大增就是这种动向的反映之一。但是共产党后来滑向暴力革命路线，于是代表民主、改革与和平主义势力的主体——社会党的左派就取得了广大国民的支持与期待。冷战的深刻化，在对战争还记忆犹新的日本国民中间引起了巨大不安。朝鲜战争以及紧接着的重整军备动向，广泛唤起了日本国民朴素的和平主义感情。左派社会党在美苏对立中倡导“中立”，这就使它相当成功地利用了这种感情。

在这一时期，虽说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复，通货膨胀也有所收缩，但是国民生活仍然贫困、艰苦。在道奇方针的影响下处在严峻状态下生活的人仍然不少。左派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此时恰好适应了这种状况。左派社会党的主导思想是所谓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这时它正准备脱离同苏联以及情报局的公开、半公开的联系，而组织日本独立的理论集团。左派社会党也重视群众斗争，但是，同时并没有丢弃尊重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态度。日本大多数国民对战后现体制抱有强烈不满，持批评态度，但同时对战后导入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则十分珍视。左派社

会党就是得到了这些国民的支持。

一方面，保守势力从精神上、信条上都离开了以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为基础的 1946 年宪法的立场；另一方面，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组织了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共产党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开始轻视 1946 年宪法的意义，滑向无视宪法的方向。在这二者之间，左派社会党比任何政党都清楚地表明了拥护宪法的立场。左派社会党的运动是朴素的和平主义、古典的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微妙特异的结合物。在一段时间内，它代表了战后民主主义的改革立场。

第六章 朝鲜战争,日本重整军备, 和平条约

1. 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

1950年6月25日凌晨4点,北朝鲜与韩国(南朝鲜)爆发了全面战争。在30分钟的炮轰之后,以苏制T34型坦克率先,北朝鲜军从五个方面越过了三八线。

在此之前,北朝鲜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攻势。6月7日以后,平壤广播电台就反复地播送南北和平统一提案,并表明要向驻南朝鲜的联合国临时朝鲜委员会及南朝鲜的政党领导人递交统一方式提案。联合国委员会接受倡议,于6月10日在开城附近的三八线同北朝鲜代表会晤,并收下了文件。北朝鲜代表声称要同南朝鲜政党领导人直接会面而越过了三八线,被南朝鲜警察逮捕。对此,平壤广播电台强烈要求释放他们的代表。

约两年半前的1947年11月,美国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倡议:

- (1) 首先设置联合国临时朝鲜委员会。
- (2) 在1948年3月底以前,在上述联合国临时朝鲜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全朝鲜成人秘密投票制的大选。
- (3) 用大选方式,从南北各个投票区中按人口比例选出代

表,组成朝鲜中央政府,然后以驻扎在南北两方的美苏军队手中接受行政权力。

对此提案,苏联等共产圈代表弃权,提案最后以 43 票赞成、零票反对、6票弃权的压倒优势获得通过。由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菲律宾、萨尔瓦多、叙利亚、法国及“中华民国”等八国代表组成了临时朝鲜委员会。但是,在苏联占领下的北朝鲜拒绝联合国临时朝鲜委员会进驻北朝鲜。

1948年5月10日,联合国只得仅仅在南朝鲜进行了第一次大选。南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们反对大选,在济州岛等地组织了叛乱。主张南北协调优先的“协商派”政治家也未推荐候选人。为此李承晚等保守派在大选中获得了压倒性胜利。8月13日,宣告“大韩民国”独立,美国的军事统制结束。联合国承认韩国政府为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

同年8月25日,北朝鲜也进行了大选,9月9日即宣告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50年6月16日,作为对北朝鲜倡议的回答,李承晚总统通过广播再次提出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秘密投票和按人口比例选代表的方案。对此,北朝鲜表示沉默。6月19日,北朝鲜又发表提案:由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员565人和南朝鲜的国会议员210人组成朝鲜共和国立法机构,并逮捕李承晚等民族反叛者。当时朝鲜的人口南方约有2100万人,北方约有960万人。但是北朝鲜的提案是,仅占人口三分之一的北方要掌握议会席位73%,并且还要逮捕南朝鲜的领导人。

6月10日北方代表越境事件发生后,南朝鲜军为防不测,曾发布非常戒备令。但是6月23日零点这一非常戒备令解除了。战争爆发的25日正是持续紧张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而且正值农忙季节,不少部队给农村出身的士兵放了假。结果,北方

的突然进攻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南朝鲜的脆弱

南朝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北朝鲜军。开战时的地面兵力，北方的陆军与内务部军队(维持治安部队)合计 182680 人，南方是 94974 人，只有北方的一半兵力。海军包括海上陆战队，北方有 2.27 万人，南方仅有 8881 人。空军方面，北方拥有牦牛 9 型战斗机和 IL10 型、IL12 型轰炸机共 211 架，南方只有联络机 14 架和练习机 10 架。北方拥有 T34 型坦克 242 辆、装甲车 54 辆，南方无坦克，装甲车只有 27 辆(据村上薰《朝鲜战争》P.63)。大炮的数量与口径北方也占压倒优势。南方的反坦克火箭炮对北朝鲜的 T34 型坦克根本不起作用，南朝鲜军士兵见到坦克就溃逃。

北朝鲜军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指导，受过充分的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人师团以及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的第二代朝鲜人的苏军官兵也被编入了北朝鲜军队。金日成是满洲抗日游击队传说中的英雄，他也作为苏军的将校进入北朝鲜。

在战后北朝鲜的共产主义集团内，除了金日成等苏联派以外，还有在日本统治时代坚持在国内进行抗日运动的玄俊赫等国内派以及战时在中国解放军内的金武亭等延安派。金日成立志搞苏联式的革命，期望一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玄俊赫等与金日成对立，主张当前应该实现民族自立和民主革命。

金日成一掌握政权就实施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与产业国有化。北朝鲜的国民都被编入共产党(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被排除在各组织之外的人作为难民逃到了南朝鲜。到 1947 年 12 月为止的两年间，逃跑人数据说达到 111 万人，超过北朝鲜人口的 10%。

在南朝鲜，政治持续混乱。没有料到日本这么快就投降的美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占领了南朝鲜。美军尝试地搞了土地改革等，但都不如对日政策那样周密。在南朝鲜还未形成完全的主体势力。最活跃的共产主义者面对议会、自由、人权，更喜欢革命和专政。美军保障政治活动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就利用这点在各地组织抵抗运动，进行暴动与叛乱。稳健的改革派没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个派别的实力政治家宋镇禹（韩民党领袖）于1945年12月30日被右翼暗杀。宋镇禹在日本留学后，任《东亚日报》社长，是坚持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国内派领袖。

玄俊嫻和宋镇禹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是都持现实主义的观点，都在国内经历了困难时代。他们两人的被暗杀象征了战后朝鲜的苦难。林建彦曾写道：

“二位都是留在国内、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苦难时代的代表国内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在刚迎来解放的日子，就先后遭到了暗杀的命运。这一事实直接暗了解放朝鲜的苦难历程之长。”（见林建彦《北朝鲜与南朝鲜》P.28）

最后，从美国流亡归国的李承晚坐上了南朝鲜的统治交椅。李承晚等人反对改革，对民众运动采取了强硬态度。共产党选择了与李承晚政权势不两立的路线。他们在南朝鲜的军队内建立秘密组织，发动各地进行暴动。被发现以后，不少包括将校在内的军人遭逮捕，共产党成了非法的政党。许多军人逃跑，与从北朝鲜潜伏进来的部队合流，编成了“人民游击队”。据说，到1949年6月驻南朝鲜美军撤退时为止，作为共产主义者被开除的官兵人数超过了当时全部韩国军队的10%，达8000人左右。

美国政府考虑到南朝鲜的军事空白会诱发北朝鲜的侵犯，

因此,在美军撤退后仍留下了500人左右的军事顾问团。但与此同时,美国又警惕着南朝鲜发动战争,禁止向南朝鲜提供坦克、重炮以及轰炸机等,军事援助限制在很小数量上。这是因为美国注意到,在南朝鲜以李承晚为首的一批人面对拒绝自由选举、试图用武力统一朝鲜的北方,也持强硬态度,叫嚷应该对北方实行反进攻。

美国的介入

1950年6月25日,战争一开始,南朝鲜军队就遭到了沉重打击。在汉城正面的平野部,以坦克作先导的北朝鲜军通过主力强攻,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韩国军的前线。汉城在开战后第4天的6月28日就被北朝鲜军占领了。北朝鲜军逮捕了还留在南方的政府官员、政党人士、资本家、军人、地主以及警察等等,将他们或处刑或押到北朝鲜。主张与北方协调的政治家们都被带走,下落不明。北方军在南方强制推行无偿没收土地等变革,不少被称为“民族反叛者”的人被处刑。韩国政府先是逃到汉城南方的水原,随之又逃到大田、大邱。8月18日,韩国政府转移到朝鲜半岛南端的釜山。

美驻南朝鲜大使发给美国国务院的关于北朝鲜进攻的首份电报时间是在1950年6月24日下午9时半(美国东部时间,朝鲜时间为25日下午11时半),正是华盛顿的周末之夜。接到电报的艾奇逊国务卿立即用电话向回到自己出生地密执安州度假的杜鲁门报告,要求紧急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二天25日下午2时(朝鲜时间26日凌晨4时),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1949年10月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政权还留在安全理事会内。苏联为了抗议这种做法,从1950年1月起就开始抵制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

苏联不参加会议，就不能行使否决权来否定美国提案。结果美国提案以 9 比 0 通过(南斯拉夫弃权)。通过的决议认为，北朝鲜军的行动是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并要求联合国援助韩国，呼吁北朝鲜立即停战与撤军。

杜鲁门总统 25 日夜召集了美国政府国家安全会议。杜鲁门命令采取以下措施：

(1) 命令麦克阿瑟撤离在韩的美国人，为此目的允许动用美国海军。

(2) 命令麦克阿瑟迅速给韩国军队补充武器。

(3) 派遣第七舰队去台湾海峡。

派遣第七舰队是为了防止中国进攻台湾以及预防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

26日，美国政府以麦克阿瑟那里得到了韩国军即将崩溃的报告。杜鲁门第二次召集了国家安全会议。他说，朝鲜的事态是和大规模的“柏林封锁”同一性质的。为了支援韩国，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南动用美国海空军。

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美国的提案，“为了击退北朝鲜的武力进攻，恢复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成员国援助韩国”。于是前往韩国支援的美军就以联合国军的身份出现。英国等 15 个国家也派遣了少量部队参加。

6月 29 日，华盛顿同意美国的海空军攻击远离苏联国境的北朝鲜目标，并从日本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两个师。在日本的第 8 军的 4 个步兵师由于只是为了维持占领秩序，因此部队编制规模小，装备也简陋，大部分是训练不足的新兵。结果，最初投入朝鲜的美军部队遭到了严重打击。7 月 7 日，麦克阿瑟要求华盛顿派遣增援部队。华盛顿以美军分散在全世界，派不出援兵为由，没有同意。

美韩军一直被追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釜山桥头堡”。美第8军司令瓦克中将命令一定要死守釜山桥头堡。“死守”的命令后来在美国国会遭到批评，认为这对于民主国家的军人来说是不适当的。从南朝鲜各地拥到釜山桥头堡来避难的人据传有300万人，混杂在难民中的游击队也拥了进去。8月，北朝鲜开始发动总进攻，凄惨的战斗接连不断。

中国军队的参加

9月15日，麦克阿瑟命令从本国来增援的新编第10军在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仁州登陆。麦克阿瑟在潮起潮落十分厉害的海岸上实施登陆作战的大胆计划获得成功。9月26日，美军夺回汉城。在釜山桥头堡的瓦克第8军开始北上，切断了北朝鲜军的退路。至此，北朝鲜军走向崩溃。

联合国部队围绕着越过三八线进军北朝鲜问题，意见发生对立。英国等认为，击退北朝鲜的进攻和恢复和平是联合国军的目的，应该在三八线上就停止追击。在美国政府内部也有持慎重论的，认为越过三八线进军北朝鲜很可能会招来苏联或是中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后的四年间，美国垄断了原子弹，但1949年9月，苏联宣告原子弹试验成功，形成了两大阵营都拥有核武器的对峙时代。人们开始感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大战。但是强硬派无视慎重论。麦克阿瑟认为，即使轰炸满洲，苏联也不会参战。中国当时没有原子弹，麦克阿瑟判断，即使美国使用原子弹，中国方面也没有反击的手段，而苏联则不会为了保卫中国而甘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当时在美国国民中北进论占优势。美国大多数国民认为，即使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威信也应该狠狠地教训一下北朝鲜，如对北朝鲜软弱，就会导致它再进行侵略。并以为北朝鲜军正在溃退，进军北

方统一朝鲜是很容易办到的事。

9月27日，杜鲁门同意麦克阿瑟进兵北朝鲜，但附加条件是，陆海空部队都不能越过满洲与苏联国境；在国境地带只使用韩国军。10月3日，韩国部队越过三八线。10月7日，联合国“为确保朝鲜全土安全和建立统一的朝鲜民主国家”，允许联合国军进兵北方，即美军也越过了三八线。杜鲁门为了牵制经常无视华盛顿指示的麦克阿瑟，于10月14日在威克岛会见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表示，中国与苏联不会介入。联合国军于10月20日占领了平壤。麦克阿瑟认为光靠韩国军太弱，于是让美韩全军压向鸭绿江。

在中国，展开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宣传。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一周年的国庆节上强调要抗美援朝。同一天，周恩来对驻北京的印度大使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介入战争。如果仅仅是韩国军队的话中国就不派兵。”这一警告由印度政府传到了华盛顿，又传到了东京，但是都被忽视了。

10月25日，韩国部队被身份不明的军队包围，受到重创。在其他各地，美韩联军也遭遇到强敌，从而判明中国军队已大举介入。正式参战的军队名义上是义勇军，实际上是林彪的精锐部队。他们切断了前期到达鸭绿江岸的联合国军的退路，联合国军面临被消灭的危险，开始败退。还有众多的民众跟随着败退的联合国军一起南移。

中国军队的介入与美军遭受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败，沉重地打击了华盛顿。11月30日，杜鲁门表示“不惜使用原子弹”，震惊了同盟国。12月上旬，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同杜鲁门会谈，确认了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的原则。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置由印度、伊朗以及加拿大三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停战委员会。三人委员会与中国代表进行了接触，后者是应联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之邀为讨论台湾问题而来纽约的。三人委员会建议“按现状停战”。所谓现状是指联合国军已退回到三八线。但是，中国提出了苛刻的条件：（1）外国军队立刻完全撤兵；（2）美军从台湾撤兵；（3）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停战仍然是遥遥无期。

12月23日指挥联合国军的第8军司令瓦克中将因车祸死亡。后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战场上非常活跃的李奇微中将。中朝联军于1951年1月1日越过三八线南进，1月4日再次占领汉城。李奇微一方面竭力鼓舞联合国军的士气，加固防卫线；另一方面考虑到南朝鲜防卫困难，暗暗地已向麦克阿瑟提出朝日本撤退的计划。麦克阿瑟认为如按现状下去，会导致联合国军全面败退，因此要求华盛顿派遣增援部队。但华盛顿以派不出更多的兵援为由拒绝了。

麦克阿瑟被解任

麦克阿瑟对华盛顿的方针表示不满，建议：轰炸中国本土，封锁中国沿岸；让蒋介石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在中国南部登陆，形成第二条战线；使用原子弹等等。

1951年1月31日，加拿大等国向联合国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以下决议案：

（1）在现状下立刻停战；（2）休战期间政治解决朝鲜问题；（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兵；（4）台湾问题和加入联合国问题由美、英、苏、中四国协商。

此时，联合国军已后退到三七线附近，汉城在北朝鲜的占领之下。以上停战案对于美国来说是屈辱的提案。但是美国已经感觉到从朝鲜半岛完全败退的危险，因而同意这一停战案。但是，中国提出了看谈判的结果再停战以及谈判开始时就承认中

国加入联合国等强硬方案，谈判破裂。李奇微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顶住了中朝联军的正月攻势。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非难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案。联合国军又击退了中朝联军的二月攻势，于3月7日再次夺回汉城。在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汉城的统治者更换了4次。其后，在三八线附近的新防卫战线上持续了多次激烈战斗。北方用大量的兵力压向联合国军阵地，展开人海战术，激战后中国兵士伤亡很大。以日本为基地的美国空军对以满洲为基地的共产党空军占很大优势。美国空军猛烈轰炸中朝联军阵地以及他们的后勤供应点，破坏北方的主要城市。激战阵地因炮击而发生地形变化，中朝联军到处挖地壕来对抗美军空袭。北朝鲜全土都要塞化了。

麦克阿瑟反复要求华盛顿实行包括轰炸中国本土的强硬政策，他与杜鲁门的对立越来越深刻化了。当杜鲁门正准备发表呼吁休战的声明时，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在东京自作主张独自发表了有必要采取包括轰炸中国本土的强硬政策的声明。使杜鲁门失去了发表呼吁休战声明的机会。麦克阿瑟给在野党共和党议员的回信中，猛烈抨击杜鲁门政权的政策严格限制了联合国军的行动，使之丧失了取胜的机会。这封回信在议会被当作攻击杜鲁门的材料。

1951年4月11日(美国东部时间)，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接替。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者麦克阿瑟，于4月16日(日本时间)离开了日本。这时在美国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憎恶，因此，作为对日作战的英雄以及作为反共十字军的指挥官，麦克阿瑟归国受到了议会与国民的热烈欢迎。

联合国军最高司令李奇微的任务是，在加强南朝鲜的防卫体制后提出停战谈判。1951年4月，中朝联军又一次发动了大

规模攻势。联合国军虽然掌握了制空权，但地面兵力中朝联军占压倒优势。联合国军被迫退了四五十公里。但是汉城总算保住了。最后中朝联军后退了。5月，中朝联军在东部山地再次发动攻击，联合国军陷于危机。后因派遣了增援部队才击退了中朝联军的进攻。据推测，仅仅在4至5月的攻势中，中朝联军的死伤者就达20万左右。6月，联合国军向前推进，确保了前哨防卫线。新战线在西部向三八线以南发展，在东部向北突进。朝鲜的古都开城在开战前属于韩国，现在则在北方的统治下。战争还在继续，但这时中朝联军也已痛感无力彻底改变战局了。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呼吁进行朝鲜停战谈判。6月30日，李奇微也向金日成和彭德怀提议进行停战会谈。7月1日，金日成表示同意。李承晚对于美国“越过”南朝鲜提议停战会谈表示愤慨，强烈反对进行停战谈判。李承晚对停战后韩国的安全保障非常担忧。他感到自己的政治基础薄弱，期待美军采取强硬路线。但是美国开始促进谈判。7月10日，首先在开城附近开始了停战会谈。

停战会谈

开城的停战会谈以下面4个项目为议题。

(1) 确定军事分界线和设置非武装地带。(2) 决定停战监督机关的构成、权限、机能以及停战的具体事宜。(3) 解决俘虏问题。(4) 对有关国家的劝告。

关于军事分界线，联合国军主张维持现状，北方则主张以三八线为界。

8月22日，北方声称美军飞机侵犯开城上空而中断了谈判。美军为了再开谈判，向北方施加压力，在战场上发动了攻势。10月25日，谈判恢复，地点移到了开城东面的板门店。北方终于同

意以现在两军的接触点为分界线。

最大的难点是俘虏问题。联合国军主张,为了尊重人权,必须按照每一个俘虏的自由愿望,送他们到自己想去的国家。对此北方坚决反对,主张全部按原籍送回。据公布的俘虏人数,联合国军方面有中朝俘虏共计 13.2474 万人,中朝联军方面有美韩军及其他国家的俘虏共计 1.1559 万人。

1952年4月19日,北方同意按俘虏的自由愿望送还俘虏。在此之前,联合国军估计中朝俘虏中不想回国的人数大概有1.6万人。但实际问下来,近半数即6万人拒绝回国。北方又一次反复强调要强制送回。

1952年11月,美国进行总统选举,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选。他以实现朝鲜停战为竞选口号,满载着美国国民的期待登上了宝座。大多数美国国民在1950年秋还热烈支持麦克阿瑟的北进,但是随着战争胶着状态的出现以及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人们开始盼望早日停战了。

1953年3月5日,苏联的斯大林主席去世。接替斯大林职务的马林科夫在3月15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的演说中表示要和平解决朝鲜纠纷。可是在此后不久,苏联的政局持续不稳。7月10日,副主席兼内政部长贝利亚动用其管辖的国家秘密警察,企图夺取政权,结果因失败而被处刑。

在最后阶段,坚决抵制停战的是李承晚。他在全韩国组织了反对停战的示威游行。在即将停战的6月,释放了韩军管制的俘虏25000人,引起了骚乱。最后,在俘虏问题上中朝联军也作了让步,7月27日在板门店签定了停战协定。

朝鲜的悲剧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首次大规模战争。战斗

虽是局部的，但其性质却是国际范围的。兵力、武器弹药的数量及牺牲人数之多可以同世界大战相比。

据公布，停战时的联合国军的地面兵力，美军有 30 万，韩国军 59 万，其他国家的联军 4 万，共计 93 万，加上空军及非战斗人员等，总数为 117 万^①。

另据公布，美军的战死者达 3.3629 万人，负伤者达 10.3284 万人，被俘及下落不明者 5178 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战死者为 26 万人，其中在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时牺牲 9 万人）。韩军的战死者为 41.5 万人，负伤及下落不明者达 42.9 万人。美韩以外的联合国军死伤者为 1.7 万人，其中英联邦各国为 7000 人。中朝联军是仅仅发表“战果”、不公布自己损失的。据美军方面的公布，中国军的死伤约 90 万人，北朝鲜军的死伤约 52 万人，合计 142 万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投入了比太平洋战争还多的武器弹药。联合国军丧失飞机达 1986 架（其中因事故损失 945 架），中朝联军被击落的飞机达 976 架。全朝鲜半岛都成了战场，民间人士牺牲众多。据说，韩国牺牲人数包括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共 76 万，负伤者 23 万，共 99 万人；北朝鲜国民的损失，逃向南方的难民达 68 万，死伤者约 200 万人。

北朝鲜的政策决定过程虽然不可能知晓，但是其进攻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推理的。

第一，共产主义者们抱着最终要靠实力来实现朝鲜民族统一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战争不是侵略性而是革命的内战。

第二，共产主义者们断定，他们的企图具有成功的现实条件。

^① 以下的数字见上述的村上薰《朝鲜战争》P. 241，儿岛襄《朝鲜战争》Ⅲ.P 480，及其他。——原注

一方面，他们对形势的看法是基于美国不干涉。1949至1950年，麦克阿瑟以及马歇尔国务卿在谈到有关“美国的太平洋防卫战线”时，列举了阿拉斯加、阿留申、日本、冲绳以及菲律宾等，没有提及韩国和台湾。蒋介石失败以后美国不得不对远东战略进行调整。他们避免介入亚洲，开始考虑把日本作为前线的新的防卫线。并感到韩国的战略重要性降低了，成了巨大的负担。这些想法在美国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中反映了出来。这就诱发了苏联、北朝鲜断定美国不会干涉朝鲜事务。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认为南方的政治形势对他们有利。他们判断：进攻南朝鲜以后，韩国就会一举崩溃，大多数民众就会举双手欢迎他们。战争前夕，在1950年5月30日进行的韩国第二次大选中，李承晚总统派的得票率与议席数激减。但是最终却并未出现南方民众全面欢迎共产主义的局面，而韩国军队也未烟消云散。

说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无意间承认苏联占领北朝鲜，乃是朝鲜悲剧的发端。这是美国的第一大错。北方既然已由共产主义者掌握，与此不可分离，南方也理应由共产主义者来统治的政治攻势便增强了。美国在南朝鲜推行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体制，面对以集权主义为行动原理的共产主义的攻击，显得软弱无力。占领了南朝鲜的美军未能成功地建立能干的改革统治体制，只好承认反动色彩很浓的李承晚政权。在战后困难形势中所滋生出来的民众不满被共产主义所利用，并成了北朝鲜在南方的革命势力的种子。

中国两大势力之间的内战由共产主义取胜而结束，美国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它使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也暧昧起来。但是，朝鲜毕竟不同于中国。尽管如此，类似要放弃南朝鲜的各种讲话诱发了北方的进攻，这又是美国无意间作出的，这是美国的第

二大错。

美国的第三大错是仁川登陆以后，又令全军北上。美国特别是麦克阿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意图与战斗力。预防北方再次进攻的戒备心与仁川登陆作战的胜利感扰乱了美国的判断。杜鲁门以预防战争向全远东扩大为由，军事封锁了台湾，也增强了中国反美的姿态。

朝鲜战争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此中美关系恶化，两国的外交正常化被远远推迟。还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在远东对共产圈的政策，成了以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远因。这些战争不仅对美国，更主要地是对亚洲民众来说，给他们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对国际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对共产圈的政策绝对地向强化军事对应的方向倾斜。1947年美国外交官乔治·F·凯南提倡的“封锁政策”，原来主要着眼于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从政治上、经济上加强西方各国的实力。经过柏林封锁与朝鲜战争，美国的决策层与大多数国民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从军事上加强对共产圈的包围体制。

美国面对1949年的中国革命，曾被迫重新研究对亚洲的战略。那时，美国当局还比较冷静，还能把苏联的世界战略与以亚洲民族主义为背景的共产主义相区别。正如永井阳之助在其著作中所写，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当局的言论还表明是“尊重亚洲民族主义，从长期观点来看，预计中苏会发生对立，准备利用这种对立，并强调亚洲人的自助自立精神，坚持不介入亚洲内部的原则”等等。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一下丢弃了比较克制的“封锁”观念，而向“封锁世界化和军事化”发展（见永井阳之

助《冷战的起源》P.302)。

美国开始按凡是共产主义的渗透都用实力来阻止的原则行动。美国只要在某种场合失败，都认定是共产主义在加强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这种判断所导致的美国行动的典型是60年代的越南战争。

朝鲜战争对当时还处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导致日本重整军备。

朝鲜战争开始后不久，一部分在日美军就被派遣去朝鲜，由此产生的日本国内军事空白使华盛顿与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部十分担忧，特别忧虑的是共产主义者搞“间接侵略”，发动革命骚乱。为此麦克阿瑟命令建立“警察预备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创设军队。

第二，对于“对日媾和”的内容、形式、程序的影响。

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前就开始研究对日媾和，但是朝鲜战争使美国认识到了日本战略重要性，从而确定了确保日本成为西方同盟者的对日媾和方向。而且由于朝鲜战争，美中关系修复的可能性已极小，因而最终否定了中国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可能性。

第三，对经济的影响。

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资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急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战斗部队的集结地、休养地。军需物资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军的要求。日本因朝鲜战争，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种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

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正是朝鲜的大杀戮战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2. 日本重整军备

麦克阿瑟书信

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写信给吉田首相,指示创设国家警察预备队以及扩充海上保安厅人员。这时朝鲜战争刚爆发两星期。麦克阿瑟在信中说:“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少数不法分子在合法的、正当的手段掩盖下,寻找攻击和平与公共福利的机会”,为了保卫民主主义社会的安全,必须加强警察的力量。

日本的警察制度根据1948年3月实施的警察法,已重新编制了自治体警察与国家地方警察。这也是根据当时麦克阿瑟的信进行改革的。1948年再编警察时,盟军总司令部批准人员总数可达12.5万人。1950年7月8日的麦克阿瑟书信指示,除了已建立的一般警察外,再创设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使警察总数达20万人。盟军总司令部准备将警察预备队与一般警察分离,成为独立组织。这事实上就是重建军队。

关于海上保安厅,在战后初期帝国海军解体后,就感到需要建立能够维护、戒备海防治安、取缔偷入境者、维持海上保安与救难等活动的机构。在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美国派来了海防警备队的军官来日,指导新机构的设立。曾经有过好几种设想,最后决定设置直属运输省的海上保安厅,于1948年5月1日正式建立(总人数为8150人)。

海上保安厅的人员几乎都由原海军构成。相当多的海军学校出身的原海军军官也因缓期执行开除公职处分而被录用。处理原海军遗留事务的厚生省第二复员局的反潜艇、扫雷艇等小型舰艇以及人员都移交给了海上保安厅。扫雷艇部队战后主要从事排除日本主要港湾及沿海的水雷。麦克阿瑟书信指示，海上保安厅增员8000人。

海上保安厅的扫雷队于1950年10月，按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和美国海军一起从事朝鲜半岛沿岸的扫雷。两艘扫雷艇因触雷沉没，发生伤亡。因为日本这种行为是无法可依的，因而作出的牺牲一直被隐瞒着。

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也感到需要加强警察力量，因此麦克阿瑟的指示正是天赐良机。在日本政府内部，多数的意见认为，为了预防日后被“小人”当作把柄，创设警察预备队这样的新组织，比较妥当的是应该先在国会审议，然后制定成法律。但是盟军总司令部嫌国会审议的做法会耽误计划，要求日本政府以波茨坦政令的名义来执行。麦克阿瑟书信发出约1个月后的8月10日，公布了政令260号“警察预备队令”。8月13日开始征集预备队员，8月23日第一批入队。

重整军备的动向

麦克阿瑟之所以指示创设警察预备队和增加海上保安厅人员，虽然其直接起因是朝鲜战争爆发，在日美军派往朝鲜，担心维持不了日本国内的治安。但是华盛顿在这之前很早，认为必须促进日本重整军备的意见就已抬头。

美国对日政策基调的变化，早在1948年1月6日罗亚尔陆军部长在旧金山的演说中就已经有所反映。同年3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长乔治·F·凯南在视察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

以后，在提交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就曾提议将正在研究的对日媾和延期，与此同时，还就有关日本安全保障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

(1)在媾和以前美军继续驻扎日本，但是兵力要缩减到最低限度。

(2)媾和后的日本安全保障依照那时的形势再定(此时考虑到的是或者非军事化或者带有限制的再武装)。

(3)冲绳为美国永久占有，辟为基地。

(4)辟横须贺为海军基地，媾和后继续使用。

(5)强化警察力量，改善装备。

此外，凯南还建议：中止在日本强制实行进一步的改革，给日本以自主权；对日政策重点应转向经济恢复，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考虑长期对日援助；缓解开除公职的处分等。

美国国务院在1948年5月以后，以凯南为中心，归纳了题为“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各项建议”的政策。同年10月7日，该“建议”在国家安全会议上通过，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认可，成为NSC(国家安全会议)13—2号文件。凯南报告书的想法都包括进了文件。其中指出，要长期拥有琉球、小笠原等作为基地开发，长期利用横须贺海军基地，同时必须强化日本的警察力量。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部有感于同日本军队苦斗的教训，在占领初期热心于日本非军事化。后来随着冷战表面化，因与苏联对峙及维持日本国内治安的需要，美国军部一变而成为热心于日本重整军备了。在NSC13—2号文件的决定过程中，陆军部曾主张创设15万“国家警察军”，实现日本再武装。但是美国国务院反对，认为“虽然日本宪法第9条是不现实的，但是也无需这么直截了当地作出规定”，因此文件只写上了“强化警察

力量”。陆军部在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说，NSC 13—2 文件中的“强化警察力量”，并非是改变警察改革的原则，而是为了对非武装的日本占领结束后，日本能依靠警察力量有效地得到保护。为此，需强化日本警察的人员、装备。并要求创设“能处理灾害以及叛乱的适当的机动性国家警察预备队”，以及建立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治安情报机关。

在华盛顿，日本重整军备论占上风后，麦克阿瑟仍持反对态度。1948年3月，访日的凯南以及陆军副部长特莱瓦与麦克阿瑟商谈时，特莱瓦强调日本必须再武装。麦克阿瑟表示反对。凯南折衷，提出日本再武装还是完全非武装，根据媾和后的形势再选择。

麦克阿瑟要使人们感觉到，1947年5月实施的日本新宪法是日本国民自主的选择，但是实际上新宪法是以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原案为基础的。放弃战争这条也是麦克阿瑟亲自指示的。麦克阿瑟把这个宪法赞誉为日本国民自己的贤明选择，自然不能突然又赞成日本重整军备。因麦克阿瑟反对日本重整军备，为此华盛顿便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更换麦克阿瑟，或者放弃无法确立自我防护体制的日本。一时间在美国政府内部，同放弃南朝鲜防卫一样，放弃日本论盛行起来。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远东形势突变，麦克阿瑟本人也要求日本重整军备了。在占领军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开始重整军备。

西德的重整军备

在欧洲，此时西德也在进行重整军备。1948年6月，因抵触东方体制的人们大量流向西方，对此抱有危机感的苏联强行封锁了西柏林。美国果断地通过大量空运来抵制东方竭力想变更边界的企图。1949年4月，在柏林封锁这一非常事态下，美国

与西欧主要国家一起建立了作为军事同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5月,美、英、法、苏签定协约,暂时解除柏林封锁。因而难民继续从东德流向西德,至1961年东德政府在东西柏林边界筑起高墙强化封锁之时,已有300万至400万人流入了西德。

美国与欧洲的领导人痛感,为了对抗地面部队占压倒优势的苏联,必须加强西方的军事同盟,增强与改善兵力和装备。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英法提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建立欧洲共同防卫军,并采取让西德也加盟的方针。

1952年5月26日,美英法三国与西德缔结了结束占领、恢复主权的波恩协定。5月27日,包括西德在内的六国签定了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但是,在西德国内还存在反对重整军备论。邻国法国等曾被德国侵略过的国家也对德国怀有强烈的戒备心。欧洲防卫共同体条约未能在法国国会通过。1954年10月,根据英国提案,签定了巴黎协定(西方九国参加),内容是以把西德军队编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条件,认可西德重整军备。同年12月,法国议会批准了巴黎协定。翌年5月西德议会也批准了该协定。根据协定,西德在禁止拥有ABC武器(即核、生物、化学武器)及长距离导弹的条件下,可以拥有兵力50万(以后变更为35万)。

在西德国内,存在着以当时在野的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反对重整军备论,国内舆论分歧。1957年阿登纳说,西德军队也需要拥有核武器,美国政府表示认可。为此西德国内的对立更加激化。但是西德议会于1958年3月通过了西德军队需要用最新武器装备的决议,从而开始了真正的军备。

当时毕竟是世界大战的悲惨情景还历历在目的时代,因此,反对重整军备的空气很浓。但是战后东德在苏联支配下,大量难民从东德流向了西德。柏林封锁事件后,东西德统一的可能性更

小了，对苏联的戒备心更强了。连西德社会民主党经过党内的激烈争论以后，也同意了重整军备，并开始采取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推进国内改革的现实主义政策。结果，西德社会民主党于60年代后半期坐上了执政的位子。

西德战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体制；与东德的社会主义者不同，西德的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其中革新派占主导地位，这就使西德参加欧洲的防卫同盟成为可能。而阿登纳首相率领的西德保守政党与中间政党联合的政府，则利用了这种条件，使西德恢复了国际地位。

重整军备的潜流

日本的重整军备是在麦克阿瑟的直接指示下进行的，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有必要重整军备的意见广泛存在。在战败、被占领的同时，原陆海军都被解除武装解散了，但是日本大多数有关的人士都确信，这种事态只是暂时的。他们认为，联合国不会使日本永久处于被统治状态，一旦缔结了和平条约，恢复了日本主权，联合国就会承认日本要有作为独立国家的最低水平的军队。无论是东久迩宫内阁的国务相近卫文麿，还是币原内阁的国务相松本烝治（前者是按照麦克阿瑟的个人指示准备了呈交天皇的宪法修正草案，后者是一边抵制一边正式地进行宪法修正工作的），他们都认为重建军队是不言而喻的事。需要费心的只是如何确立一种制度使军部不能象过去那样独断专行。

新宪法草案中写进了放弃战争的条款，审议草案的帝国议会的议员们都犹豫不决。无论是麦克阿瑟还是日本政府都在宣传这一草案的理想主义立场，刚刚经历了战争惨祸的日本国民，大多数迷惑于这一宣传。但是冷静地分析一下，对非武装的规

定就不可能不感到恐惧。在帝国议会的讨论中，东大校长、贵族院议员南原繁认为：“如果正视历史的现实，考虑到作为一个国家的自卫权，配备最低限度的兵力是自然而然的事。把放弃战争写进宪法，实行不抵抗主义，并不能算是一种道德义务。”

共产党众议院议员野坂参三指出：“被侵略的国家捍卫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贵族院议员泽田牛磨说：“如果两个大国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战争，而日本又处于必须依附其中某一大国的窘境时，这项规定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军备，即使要维持国内的秩序也是极其困难的。”

对于这些疑问，吉田首相解释说：“草案中的规定，不是直接否定自卫权。第9条第2项不承认一切军备和交战权，就是放弃包括发动自卫的战争以及放弃交战权。”南原追问：“如果遭到侵略时怎么办？”吉田答道：“回答不了假定的问题。”

正如秦郁彦所指出的那样，吉田在作为币原内阁的外相时，正直接碰上盟军总司令部将宪法草案硬塞给日本政府，现在吉田作为占领下的首相，在答辩时必定是抱着只能如此作答的心情，同时提问者对此也心里明白（见秦郁彦《日本重整军备史录》P.69）。不过，正如第二章所述，在议会审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第9条还是作了重要修改。众议院负责修正第9条的芦田（均）小委员会在第9条的第2项上加进了“为了达到前一项的目的”这句话。

旧军人

因宪法中限制武装的规定而受到最大冲击的是旧军队军官。

他们当初期待和平条约缔结、占领状况结束后，作为独立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必备兵力与军备会得到认可。为此他们悄悄地

组成集团，构思着重建陆海军的设想。有人还同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二部(G2)部长威罗毕少将进行了接触。

终战时在厚木迎接美军、担任联络委员长的原陆军中将末末精三等组合的有末集团，以原海军少将中村胜平为中心的中村集团等，都在威罗毕的领导下从事情报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终战时，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次长、原中将河边虎四郎等被派往马尼拉事先商谈美军进驻日本事宜时，已同威罗毕认识，他们也组成了集团从事情报活动。威罗毕对日本的治安状况非常不放心，因此利用日本旧军人集团来搜集苏联、日共等有关情报。他早就开始批评日本改革“过头”，认为日本重整军备早晚要实行，因而很想把旧军人集团保留下来。

原陆军大佐服部卓四郎也在威罗毕手下从事情报活动。他在原陆军省改编的第一复员省编纂战史，研究日本重整军备的方案。在发生诺蒙坎事件^①时，服部正担任当时的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在这次事件中，由于日本过低估计了苏军战斗力而强行进攻，结果大败，死伤众多。服部是当时直接的责任者。同时，他还属于积极的对美、英、荷开战派。服部在太平洋战争中任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东条首相的秘书官等职。终战时在满洲的抚顺任连队长。同僚们非常担心他会被当作战犯问罪，悄悄地与“中华民国”要人联络，使服部比他的部下早1个月回国。服部集团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编制了1份重整军备计划，连军官的人选也考虑到了。据说服部集团企图重建一支真正的陆军队伍，甚至打算让服部本人担任参谋总长。

1950年夏创设了警察预备队，服部集团的计划未能实现。盟军总司令部参谋部的威罗毕等人热心推荐录用服部，但是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强烈反对。负责创设警察预备队实际工作的原

^① 诺蒙坎事件即指1939年日苏两军冲突事件。——译注

内务省官员们也强烈反对服部卓四郎等进预备队。在旧军人中间，也有人反对重整军备。其中有人向吉田进言：象服部集团这种对战争和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人与威罗毕等盟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士勾搭在一起，积极推进日本重整军备，这是令人担忧的。

吉田战前作为外交官，自然热心维护日本的权益，在一段时期内，他也属于对华强硬派，但是对于关东军等轻率的扩大战争政策，他是反对的。在战争末期，为了促进终战，吉田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参与了呈交近卫首相的上奏文的准备工作等，为此他曾被宪兵队逮捕入狱。由于有这些经历，吉田很警惕旧军部的复活。但是警察预备队创设以后，吉田的顾问、原陆军中将辰巳荣一向吉田进言：必须录用旧军人作警察预备队的军官。30年代吉田任驻英大使时，辰巳是驻英陆军武官。辰巳经吉田的介绍同威罗毕会面，受托承担情报分析工作。并利用河边集团等组成了协作体制。警察预备队一创设，辰巳就主张必须录用旧军人迅速组成能维持治安的部队。辰巳推荐了服部卓四郎等，未被接受。以后，辰巳看了警察预备队的实际状况后，又主张录用旧军人，并向吉田建议，特别需要起用大佐(上校)一级的人才。1952年8月，警察预备队与海上警备队被统一到保安厅之下时，包括原大佐级军官在内的许多旧军人都被作为特别军官加以录用。人选是辰巳与服部商议的，但是服部本人入队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旧海军军官也开始逐步集中行动起来。他们聚集在原海军省改编的第二复员省周围，研究重建计划。领头的是原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野村悄悄地向相识的美海军有关人士提出了日本海军重建计划。但当初美军对此很消极。朝鲜战争爆发后，野村集团进一步加强活动，美军对这一集团的提案开始注意。旧金山和约签定后的1951年10月，李奇微同吉田会谈时，美方提

出了向日本贷款购买菲利凯特舰及大型登陆艇的提案。以此为契机，野村集团的代表与海上保安厅的军官开始协商如何强化海上警备力量的问题。

重整军备的步伐

建立警察预备队，是在军队已经完全解体的基础上再建，而且原则上是尽可能不起用旧军人，因此困难很大。枪支弹药等由美军提供，部队编成、训练、教育都在美军顾问和教官指导下进行。吉田担心人员征集不足，直接指示对预备队员的薪水要特别照顾。但当时整个日本经济出现劳动力过剩，不少人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因此应召者人数之多出乎预料，征兵工作比较顺利。但是军官不足，于是决定解除对旧职业军人的开除公职处分，录用他们当警察预备队的军官。

1950年11月，对美英荷开战以后进入陆海军学校（军官学校、士兵学校等）的原士官，解除了开除公职的处分。翌年3月，警察预备队从他们当中进行了特别募集。1951年10月，旧军人中佐以下的军官也被解除开除公职处分。和约生效后的1952年夏，包括原陆军大佐11人在内的300多个旧军人被录用当特别军官。至1952年4月，警察预备队又增员3.5万人，总数达11万人。

关于海上警备的增强，以1951年秋美国供应菲利凯特舰与登陆艇为契机，组织了旧海军军官与海上保安厅的委员会。海上保安厅考虑要扩充、强化保安厅自身，旧海军方面则立志要创造独立的海军。结果是把当时的海上保安厅改编为海上警备队（当时人员6000人）。于和平条约生效前夕的1952年4月26日正式成立。警备队军官多半由原海军将校担任。

1952年1月31日，吉田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在野

的民主党议员中曾根康弘的咨询时表示，警察预备队令的有效期为二年，作为它的替代，想新设“防卫队”。同年3月6日，吉田又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说：“拥有为了自卫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不算违宪。”在野党要求吉田收回讲话，四天后吉田表示收回上述讲话。

1952年1月，即和平条约生效前，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日本的陆上兵力达到32.5万人。此时在朝鲜虽然进行着停战谈判，但是战争还在继续。美国为了促进日本重整军备，向日本提供了半新的舰艇及其他武器，支援改善了日本的装备。1952年11月日美船舶借贷协定的签定以及1954年5月日美舰船借贷协定的签定都事关舰艇的出借。1954年3月，根据美国的相互安全保障法(1951年)，签定了对日援助的日美相互防卫援助协定(MSA协定)。日本的重整军备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与援助下推进的。

吉田于1952年1月在国会上所说的防卫队设想最后被归纳成“保安厅法案”，于5月10日向国会提出，7月31日成立。第二天8月1日，警察预备队与海上警备队被归属于保安厅之下。同年10月15日，警察预备队更名为保安队。同一天，开设了保安队航空学校，开始了航空部队的创建。

一年半以后的1954年3月内阁会议决定了防卫厅设置法案与自卫队法案。6月两案在国会通过。7月1日，防卫厅成立，确立了陆、海、空3个自卫队的编制。1955年5月，政府提出了国防会议构成法案，可是仅仅在众议院通过，审议未全部结束。1956年3月，政府再次提出该法案，并于6月通过。

日本重整军备的特征

回顾日本重整军备的过程，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在麦克阿瑟关于日本重整军备的指示发出以后，日本

方面的反应敏捷、成效显著。

第二，旧军人的大部分成了新军队中的军官，但是军阀未复活。

第三，在重整军备的出发点上，日本的反应迅速，但是增强军备的具体步伐比美国所期待的要慢得多。

日本的重整军备是在美国的直接要求下开始的。在占领初期，美国自己采取了使日本彻底非军事化的政策，并推行了被理解为是“非武装宣言”的宪法。因此对于重整军备，如果有强烈的抵制、出现各种阻碍也是不奇怪的。但是，麦克阿瑟重整军备的指示发出后，日本方面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重建了一支有一定水准的军队。这同日本方面存在着期待重整军备的动向有关。

许多政治家与官僚都认为，完全的非武装是不现实的，无论如何重整军备不可避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后，至少保持最低限度的军备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肯定重整军备的另一个理由是，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戒备心。对苏联的戒备与对本国共产党的戒备溶为一体。人们把苏联以及其他共产主义者的战略理解为：共产党开展夺权斗争，扰乱国内，然后苏联就会乘机扩大自己的版图。多数人感到，为了抑制共产主义的活动和维持治安，国家必须拥有相应的武装部队。

旧军队的军官期待着军队重建，苦思着重建的计划。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对于引导日本侵略邻国以及因战争、战败带来的破坏，并未反省，对于民主改革也缺乏理解。不过，他们的计划未被照单全收。只是作为旧军队的人才，他们被照顾被录用了。

即使用明确的反共意识来肯定重整军备的人，其主要关心点仍然在于国内的治安维持。重整军备并不等于复活军国主义，也不是重建大日本帝国。为了有效地推进军备重整，录用旧军人进入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但在人选上是很慎重的，并

且竭力想形成、维护文官主导的体制。

日本的军备重整随着麦克阿瑟的指示迅速开始了，但是具体步骤比美国所要求的慢得多。这是因为有以下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不言而喻是 1946 年的宪法存在，以及以这部宪法为政治武器而反对重整军备的国内在野党势力的存在。

第二，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领导层，担心重整军备会增加财政负担，从优先考虑日本经济再建的观点出发，抵制美国增强军备的要求。

美国占领军强行塞给日本的宪法，后来成了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增强军备的基本障碍。在日本如果要求修改宪法的舆论强大的话，那就自然会出现公然修改宪法条目、强化军备的局面，但最终未出现这种状况。也许应该说，在战后日本反对重整军备的舆论很强。

改宪论最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多数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在在野党势力的核心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广大的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对苏联、中国以及共产主义朴素肯定的空气。他们把苏联、中国看作是和平的势力，即使对于朝鲜战争，他们也认为是南朝鲜挑起的，是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

其二，国民对战争的惨状记忆犹新，感情上反对拥有军备的意识很强。大多数国民并不关心关于国家的安全、体制的拥护等问题的争论，而只是从感情上讨厌战争、不想要军队。在野党攻击政府的重整军备政策，正是从政治上动员起了这种感情。而且重建军队在宪法上的地位永远是不明确的。在野党抓住这一点可以攻击政府。

其三，即使在那些认为作为独立国家拥有军备是理所当然

的人中间,以及认为为了对抗革命主义、共产主义,保卫自由民主主义,原则上承认需要拥有最低限度军备的人中间,对于修改宪法也持戒备态度。

他们感到,如果修改宪法就有可能使在战前、战时拥有支配力量的那股势力复活。改宪论从反动的立场出发,主张不仅要修改第9条,而且要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观念以及整个制度进行调整。这种类型的改宪论在战后日本是不得人心的,甚至得不到保守的中间派的支持。大多数人对反动势力怀有戒备,为此一直反对修改宪法。1946年的宪法被认为是阻止日本向“右”偏斜的制动器。

吉田首相等抵制美国增强军备的要求,原因之一是,在上述的政治局面下,担忧急急忙忙地加强军备会增加国民的不满,从而有利于在野党,动摇保守的统治体制。原因之二是,担心增强军备会妨碍日本的经济重建。吉田一直在致力于利用美国政策的改变,恢复日本的独立,提高日本的地位,并从美国那里得到援助。对于美国的要求,如果是同他的日本自立战略不合拍的话,吉田就用语言搪塞,拖延执行。吉田重建了日本军队,但是对于如何增强它,并不热心。

重整军备和日本经济

但是,要求增强日本军备的并不仅仅是美国。

旧军人中的大多数都具有统率强大军队的经验。正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在美苏对立中,武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所以他们强烈要求充实日本的装备。在产业界也出现了期待能有“防卫生产”^①的动态。军需生产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崩溃,而朝鲜特

^① 即军工生产。——译注

需的出现又使之复活了。这也是在道奇方针实施以后的困难状况下对军需生产抱有期待的原因。但是随着朝鲜的停战，特需减少了。

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于1952年8月设置了“经济协力恳谈会”，作为“恳谈会”中的组织之一，又设置了“防务生产委员会”。防务生产委员会中设了“审议室”，招聘旧陆海军军人为委员，研究日本重整军备计划。其结果，1953年2月准备了一部试行案，内容如下：

陆地兵力 = 15 个师，30 万人(但要有 30 个师的装备)。

海上兵力 = 舰艇29万吨，7万人。

航空兵力 = 飞机2800架，13万人。

他们计算，仅仅这些兵力与装备需要用6年时间配备，经费将达到29000亿日元。此时，保安队的陆军兵力是11万人，海上警备队只有舰艇2.7万吨，1952年度保安厅的经费仅553亿日元。在经团联内部也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地增强军备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试行案通过美国驻日大使馆送到了美国国防部。

日本的实际重整军备进展得非常缓慢。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比政府预算(一般会计)的增长率更快，政府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下降。在政府预算中有关重整军备的费用所占比率在1956年以前是一直上升的，但是上升的幅度并不很大。防卫费支出反而显著减少。结果，防卫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度的3.3%降到了1960年度的1.0%。

从需求来说，防卫费的增加对产业界是有利的。它不仅能提高当时的开工率，而且能促进有关军工领域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提高。但是，从经济增长的长期展望来看，军费的膨胀是非生产性的支出，会增加国民的负担，阻碍资本积累，对生产设备的

扩大无益。对于这个问题，财界的主张是只注意眼前的利益，是根本错误的。日本的军备增长慢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3. 对日媾和问题

占领的长期化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从1945年8月下旬到1952年4月下旬持续了6年零8个月。同一开始就想支配外国、使之成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的情况不同，对日本的长期占领，是现代大国作为对战争的处理方法而实行的一种特例。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于1947年2月在给美国国会的信中说：“历史告诉我们，军事占领超过一定的时间就会产生不好的效果。”他从占领一开始就一贯提倡早期媾和论。尽管如此，对日本占领还是长期化了，其基本原因有两点。

(1) 战后改革的进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同盟国一方的领导者，它以坚持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改革各项经济制度等作为战争的目的。战后，美国必然要对极权主义的战败国按照上述的战争目的进行改革。美国原则上是按照战败国国民的自由意愿来选择自由民主主义的体制，但是实际上占领军采取了排除阻碍改革的势力、强制变革制度的方法。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对日占领就需较长时间。

(2) 冷战。在战败的德意日三轴心国中，德国被分割成东西两部分，这使对德国的战后处理更加困难。两阵营的相互不信任在扩大，东西德国的分裂被固定化了，其边境成了东西方紧张激化的策源地之一。西方各国想把西德复兴成能对抗苏联的同盟者，采取了推进西德重整军备的政策。对此苏联害怕德国

军事复活，提出了建立统一、中立、和平的德国的建议。但是，经历了苏联封锁柏林的体验以后，西方各国的态度更强硬了。

在亚洲，苏联的扩张主义表现得很明显。朝鲜的南北分割固定化了。中国大陆激烈内战的结果，与美国政府主流派的期望相反，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美军在朝鲜饱尝了与中国军队苦战的滋味。

在日本，共产主义者的数量不多，大选时的得票也有限，但是共产党的活动能力及对知识分子的渗透力不可轻视。因战争的破坏以及战后的经济危机增加了民众的不满，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正如1947年二一大罢工计划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在占领军所推崇的工会运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成为威胁占领当局的最强主体。美国开始感到，在日本的民主化，结果是帮助了共产党的活动。

美国对日的占领目的从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主义化转向了以抑制共产主义战略为重点的日本重建。为此美国的对日政策集中到了以下两点。

(1) 防止日本共产主义化。因此，在强化日本的自由主义势力的同时，限制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并让日本政府拥有充足的警察和军事力量，以挫败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尝试。

(2) 美军想把日本作为对共产圈战略的远东据点，长期使用下去。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对美军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基地。美国的打算是，如果不能同过去一样自由地使用日本基地，就不承认对日媾和。

对日媾和问题的变化

在日本被占领6个月后的1946年2月8日，美国国务卿邦斯声称：“同日本、德国签订和平条约可望在1年以内解决，但是

对日本的占领恐怕要持续 15 年。”他在当时就已经预感到对日占领将长期化是值得注意的。但当时这种预感恐怕主要还是立足于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主义化需要相当时间的判断上。

美国政府内部开始正式讨论对日媾和问题，是在 1946 年秋。同年 9 月，麦克阿瑟同访问东京的帕特逊陆军部长会谈时，要求起草对日媾和条约草案。在麦克阿瑟的建议下，美国国务院内组织了对日媾和条约起草小组。日本课课长波顿担任该小组主任，故称波顿小组。在这一阶段，美国的注意力还在于如何防止媾和后的日本修正战后的改革、再次成为威胁美国地位的势力。其他的同盟国也担心日本复活成军事大国。波顿小组认为，为了让美国国民能接受和约，并能得到其他同盟国的同意，在和约中必须对日本加以严格的限制。

1947 年 3 月，麦克阿瑟在会见记者时首次表示了促进对日媾和的意向。

此时，波顿小组准备的第一次和约草案交给了麦克阿瑟。其中规定，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缔结非武装条约，为了督促强制履行条约，设置替代远东委员会的管理理事会和监察部队，在日本监督 25 年等。麦克阿瑟反对草案中规定的外国军队长期驻扎日本。同年 8 月，采纳了麦克阿瑟意见的第二次草案制定完成。其中也有非武装化、非军事化的规定。为了监督履行，规定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组成大使委员会，由常驻日本的人员在必要的期限内进行监督。

美国国务院为了早日实现对日媾和，开始努力说服其他同盟国。其他同盟国当初并不愿意，但到了 1947 年 6 月至 7 月，除了苏联，有 10 个国家表示了愿意参加的意向。并预定 1947 年 8 月中旬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但是，由于美苏对立，谈判无结果，会议被延期了。

美国慎重地研究了如果苏联拒绝参加的情况下实现对日媾和的问题，即研究了所谓“片面媾和”方式的可能性。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提倡片面媾和论。美国政府在探求了与苏联谈判的可能性以后，此时也不得不考虑片面媾和。但是，苏联对中国（此时还是南京的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让中国拒绝美国方式。为此早期媾和的希望破灭。因为美国认为，如果不仅是苏联而且连中国也不参加的话，是不能强行实现对日媾和的。

波顿小组在1948年1月完成了再修正案。在这一阶段起草和约的工作事实上中断了。

1948年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上所述，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长凯南于同年3月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在致国务卿的报告书中提议延期缔结对日媾和条约。凯南在报告书中，提出了加强日本的警察力量，长期使用（包括永久占有冲绳）美军基地等保障日本安全措施的一系列建议。此外还强调应停止强制进行改革，促进日本经济复兴。凯南在报告书中还说，将来的对日媾和条约内容要简洁，应该除去有关惩罚的条例。根据凯南的报告书，制定了意味着美国对日政策基本变化的NSC13-2文件，并于1948年10月在国家安全会议上通过。NSC13-2文件的目标是“在经济上、社会上强化日本，以便对日占领结束以后，日本仍能维持安定，并在其自发的愿望基础上使之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文件研究了缔结和平条约的时机及和约性质，提出了复兴日本经济，实现日本经济稳定，停止强制性改革以及加强日本政府自主性等政策措施。

麦克阿瑟对于停止强制性改革、加强日本政府自主性的方针表示强烈反对。不过，NSC13-2文件中的复兴日本经济、实现经济稳定的方针在1948年底以后，以所谓经济九原则以及道奇公使的来日为标志开始实施。

片面媾和的动向

实现对日媾和的努力事实上在 1947 年秋以后中断了，到了 1949 年秋，美国国务院再次开始行动。

1949 年 9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英国外交大臣伯宾会谈。英国原先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主张对日媾和后仍然要对日本加以限制。经过这次会议，英国终于同意实现早期媾和及撤销对日限制。艾奇逊与伯宾会谈以后，法国的休曼外交部长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三国发表共同声明说：“美英法三国对远东问题的意见取得了一致”。对于这一共同声明，一般都认为其内含是表明英国与法国已经同意，即使苏联不合作也要推进对日媾和。

凯南拿出了他自己的设想：即在日本非武装及中立的前提下，实现包括苏联在内的全面媾和。但未被采纳。美国政府内的主流派已经坚持采取排除苏联、实现片面媾和的方针。

强烈反对早期媾和的是美国的国防部。国防部赞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为了继续自由使用在日基地，要求延长对日占领期。

1950 年 2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特雷与陆海空三军参谋长访问日本，与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麦克阿瑟本人虽是军人，但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却赞同国务院的早期媾和论，这使布莱特雷等人很失望。与布莱特雷同行访日的波黑兹陆军副部长回国后，搞了一项折衷案，建议在形式上恢复日本主权，但是盟军最高司令官仍然驻扎日本。美国国务院同意了这一折衷案，但是麦克阿瑟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半吊子方式”会招致其他同盟国与日本国民的反感，比单纯的继续占领影响更恶劣。

杜鲁门为了打开对日媾和问题的局面，于 1950 年 4 月 6

日，任命琼·福斯特·杜勒斯为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是纽约华尔街的法律事务所律师，青年时代出席过凡尔赛媾和会议，具有法律家、外交家的丰富的国际经验。他对美国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影响很大，所以被称为“影子国务卿”。民主党出身的杜鲁门总统起用这样一位接近在野党的人物来推进对日和约，这不仅寄希望于杜勒斯本人的外交手腕，而且还希望对日和约问题不致成为美国政党争论的工具，而以超党派的态度来处理。

1950年6月6日，杜勒斯与国务院东北亚课长亚里逊一起整理出了对日和约第一次方案。要点如下：

- (1) 制定将日本扶植成和平、亲美、反共国家的长期目标。
- (2) 为预防共产分子的叛乱、创设强大的日本警察。
- (3) 分阶段地撤销占领统制。
- (4) 允许日本人向美国移民。
- (5) 媾和后不设对日统制机构，不施加要求赔偿等经济限制。
- (6) 允许日本加入联合国。
- (7) 由包括苏联在内的参加媾和预备会议成员在缔结和约的同时，缔结安全保障协定。

据说杜勒斯认为，“报复性的媾和条款会诱发再一次战争”。这是他本人经历了巴黎媾和会议及凡尔赛和约后得出的结论。

第一次方案所表明的缔结和约程序如下：

首先于1950年秋在夏威夷召开以远东委员会为中心的预备会议。对于中国，则邀请北京、台湾两方政权都参加，待二者意见一致后作为一票。决议采取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形式。最后，在东京召开全体参战国参加的媾和会议。

6月14日，杜勒斯与亚里逊一起来到远东。访问了南朝鲜以后，从21日至27日在日本逗留，与麦克阿瑟、吉田首相等进

行个别会谈。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特雷也来日访问(6月18日—23日)。他们与麦克阿瑟就日本防卫体制、在日美军基地的维持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杜勒斯在日本时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勒斯从东京向华盛顿呼吁：美军应该全面反击。

这时，日本政府方面也倾向于排除苏联实现片面媾和，和约缔结后美军继续驻扎日本的意见。

1950年4月25日至5月22日，池田勇人藏相与吉田首相的特使白洲次郎一起去美，向美国转达了吉田的意向，即日本打算媾和后继续承认美军驻扎日本。但是，吉田6月22日在东京与杜勒斯会谈时并没有就媾和后美军驻扎问题明确表示态度。对此，秦郁彦推测，吉田4月份委托池田等人转达的意向与麦克阿瑟的想法未必一致，双方很可能产生了分歧，因而影响了吉田当时的表态。

杜勒斯对同吉田的会谈很失望。22日晚，他在同日本有关人士进行非正式会谈时说，“在美苏两阵营之间，日本应该决定究竟跟随哪一个。美国可以把日本全破坏了以后再撤退。”他还责问：“保留美军基地这一问题，应该由谁先提出来更好呢？”此时，杜勒斯还谈到了经济问题，他说，曾以为日中贸易对日本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未必是那么回事。他没有询问，在美国援助后进国问题上，日本是否愿意配合。

对日媾和会议的准备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部更强烈要求延期对日媾和。他们的观点是，有必要将日本作为基地自由地使用。但是，杜勒斯从东京回国后，并不管事态发生的变化，仍然主张应该促进对日和约，并积极说服军部。他还急忙将6月6日的和约草案加工后

作为修改案。修改后的和约草案于1950年9月10日得到了总统批准。修改案里取消了中国代表权问题及日本人移民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平地少、国土狭窄、人口密度高并且出生率也高等等，是日本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原因之一。美国限制日本人移民也是导致日美关系恶化的起因之一。第一次和约案放进移民的条款，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修改案中还取消了召开预备会议通过决议的方式，改为通过有关国家个别谈判取得一致的方式。并且在修改案中明确规定，媾和后美军继续驻扎日本。

9月15日，杜勒斯在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日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对日本的重整军备不加限制。”

杜勒斯此时准备了以下7条原则，全力投入了同有关国家的个别谈判。

(1) 缔结和约国只包括对日交战国中意见一致、愿意缔结和约的国家。

(2) 考虑让日本加入联合国。

(3) 关于领土，琉球及小笠原委托美国统治，台湾、澎湖列岛、南桦太(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由美英苏中四国将来决定(如媾和1年以内未决定，将由联合国大会决定)。

(4) 关于安全保障，在作出满意的决定之前，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继续承担责任。

(5) 在新通商条约缔结前，日本享受最惠国待遇。

(6) 缔结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7) 有关要求条件的争议将由特别中立法庭解决。

这些原则的主要部分载入了作为旧金山媾和会议基础的美英最终草案。不过，有关台湾等领土问题，最终草案只规定日本

放弃。

1950年秋以后的约1年时间内，杜勒斯分别与除苏联、中国以外的主要参战国交换、调整了意见，成功地取得了大部分参战国的赞同。

英联邦各国已于1950年5月1日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运营委员会上讨论了对日媾和问题，当时已决定：在和约中不加进过于苛刻的报复性条款，军事基地问题委托美国去决定等。但是，英联邦对日的戒备心仍然很强，担心媾和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意见仍很多。

为此，美国提议缔结“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但有关国家意见不统一，未能实现。作为替代，美国决定分别缔结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保障条约以及美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安全保障条约。后来，美国与菲律宾的相互防卫条约在旧金山和约签定前夕的1951年8月30日缔结。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于同年9月1日缔结。

1951年1月25日，杜勒斯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再次访日，同吉田进行了3次会谈。杜勒斯强烈要求日本重整军备。会谈后，杜勒斯说，媾和后“日本政府欢迎美军继续留驻”。吉田也发表声明加以确认。

和平条约草案

1951年3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日和平条约草案已经制定，正在分发给有关的15个国家征求意见。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任，杜勒斯于16日第三次访日。杜勒斯与新任最高司令官李奇微以及吉田首相进行了会谈。杜勒斯向日本转达了麦克阿瑟的解任不会影响美国对日媾和政策，同时讨论了美军驻留日本的具体事宜。

美国政府虽然不拒绝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以及媾和会议,但是也并不想向苏联妥协,采取的是即使苏联不参加也要实现媾和的方针。美国的和约草案也送交了苏联政府。苏联于1951年5月3日给美国一份备忘录。内容是,美国无视了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国际义务,对日本军队未加限制,未明确占领军撤退时间。并且要求召开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苏联所说的中国自然是指北京政府。美国于5月19日反驳苏联说,采取外长会议方式的波茨坦协定是处理欧洲问题的,与日本问题无关;参加了同盟国决定对日政策的开罗宣言的(1943年11月)“中国”是蒋介石政权。美国并且认为,和平条约生效以后,驻军就不是“占领军”了,而只是根据联合国宪章,按照日本自己的愿望进行集体安全保障而已,这并不构成对他国的威胁。6月10日,苏联再次以备忘录形式批评了美国,但是此时美国和英国对和约已进入了最后的协商阶段。

杜勒斯于6月4日至15日访问了英国与法国。他与英国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日本的经济要求以及中国代表权问题。英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1月就承认了北京政府,因此主张应邀请北京政府参加对日媾和会议。美国认为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北京与台湾之间会发生争议,美国不想让这一争议扯进对日媾和问题中。最后美国提议,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台湾政府都不邀请。英国最后同意了这一提案。

杜勒斯与法国的会谈也在对华政策以及对苏政策上原则达成了一致。法国就对日经济要求以及日本对印度支那三国的赔偿问题表示关心。

美国的对日和约草案经过美英会谈,进行最后修改后,成了美英共同草案。这一共同草案于1951年7月3日送交远东委员会其他成员国。7月13日,草案与议定书案一起在华盛顿、伦敦

和东京发表。7月20日,美英两国向对日宣战的其他49个国家发出了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签定会议的邀请。传说反复抗议美国的苏联将不参加会议,但在8月13日,苏联通告说将派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出席会议。

最终草案在8月15日由美英两国发表。在最后草案中特别加进了菲律宾的要求,强调赔偿问题原本是日本的义务。8月22日,根据法国的要求,向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也发去了邀请书。

印度因反对不邀请中国(北京政府)参加会议以及反对将媾和后美军留驻日本问题放进和约正文中而未出席会议。缅甸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和印度持相同态度,并且对赔偿问题的处理表示不满,因而也未出席会议。

4. 全面媾和论

全面媾和的主张

在和平条约准备期间,日本被剥夺了参加讨论与谈判的资格。日本没有获得与盟国方面谈判媾和条件的正式机会。实际上,只是杜勒斯利用同各国谈判的空隙,三次来日同吉田首相会谈,听取日本方面的意见与愿望。吉田特别希望能促进在海外的日本同胞归国,这一条被列进了最终草案。不过,和约的内容及缔结的程序基本是美国一手包办的。

早在1949年5月7日,吉田首相就表明媾和后也希望美军继续驻留日本。并公然说要采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方式。同年11月11日,吉田在参议院会议上说:“即使是单独媾和,只要它以后能导致全面媾和,我们就乐意接受它。”表明了将采取的方式是,首先进行单独媾和恢复主权,然后与未建交的国家逐个

恢复邦交。

但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种无视苏联的反对而推进对日媾和的片面媾和方式，现在同时也要把中国排除在外了。日本长期推行的侵略战争，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害与牺牲，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排除正式代表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急急忙忙媾和，将会给战后处理带来巨大问题。在此状况下，日本国内的在野势力中，要求全面媾和、永久中立、反对军事基地的意见十分强烈。

重视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的日本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各种势力强烈主张全面媾和，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产业会议的势力虽然迅速削弱，但也开始组织了反对单独媾和的运动。吉田首相在参议院作了肯定单独媾和的讲话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1月12日，产业会议就发表了干事会声明，要求全面媾和。同一天，日本社会党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决定了“和平三原则”，即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社会党这一阶段在全面媾和问题上意见很一致。

1949年12月9日，东京大学校长南源繁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占领地教育会议时，强调了全面媾和的必要性，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1950年1月15日，35位知识分子召开“和平问题恳谈会”，并在《世界》月刊刊登了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

这一声明从以下几点强调了全面媾和的必要性。

(1) 日本应按照宪法的和平精神，为世界和平作贡献。(2) 为了早日实现经济自立，“脱离依赖外国的地位”，全面媾和是必要的。“虽然由于存在两个阵营”，因而产生了“单独媾和”还是“全面媾和”的问题，但日本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谋求两个阵营调和。如果单独媾和，就会使日本加深与一方阵营的结

合，同时与另一方阵营之间继续保持战争状态，这就使今后又可能与后者产生不幸的敌对关系，从而使世界的对立激化。日本欲保持中立、不可侵犯、加入联合国等，唯有实现了全面媾和才有可能办到。

而且，如果单独媾和就切断了日本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就等于日本自己把经济依附于或隶属于特定的国家身上。丧失了经济自立就是丧失了政治自立的基础，这不仅会使国民的生活进一步下降，而且会再次对和平构成日本“自身不愿意”的“潜在威胁”。

和平问题悬谈会的声明在强调了全面媾和必要性的同时还主张，无论有什么理由，都绝对反对媾和后向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

1950年4月26日，在野党外交对策协议会发表了主张和平、中立、全面媾和的共同声明。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于4月27日评论说，“中立就是理想论”。

舆论界、新闻界主张全面媾和的意见也很强烈。《朝日新闻》在1950年5月20日至22日的社论中，对部分媾和论进行了批评，并明确表示了以全面媾和为前提，坚持中立和非武装的立场。

全面媾和的可能性

吉田首相于1950年5月3日在执政党自由党的两院议员秘密大会上说：“东大南原繁校长所说的全面媾和论只不过是‘歪门邪说’之徒的话语”。这一讲话被报道出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南原校长5月6日特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说：“这种攻击同战前日本军部攻击学者完全是一个腔调，这本身就孕育着民主政治的危机。”他解释自己的立场说：“我在华盛顿会议上所遇到的人，以及我的英国朋友和加拿大朋友，许多

人都赞同我的意见。连英联邦的运营委员会的亚洲代表也反对单独媾和。而且中苏方面可能也有具体的提案。即使是美国，今后为了最佳处理对日媾和以及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也会发生某些变化。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努力使现实接近理想，正是政治和政治家的任务。而日本当局与此相反，一开始就将不同议论斥之为歪门邪说之徒的空论，堵住全面媾和以及永世中立的意见，这正体现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危机。”

正如南原所指出的那样，在1950年上半年国际形势动荡。美苏冷战已是不可变更的现实，中国革命的成功又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中国革命后，美国的远东政策正处在摸索方向、重新形成过程中。北京政府成立后，美国与中国双方都很关心邦交的建立，正尝试着非正式的接触。1950年1月5日，美国杜鲁门总统表示，不打算对台湾进行军事干预。这就意味着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战争不介入。杜勒斯在1950年6月6日作成的对日媾和第一次方案中也提出折中设想，将邀请北京、台湾两方政府参加1950年秋召开的的对日媾和预备会议，二者如意见一致，投票时将算作一票。

在这种形势下，要求全面媾和、保持日本中立及非武装，未必一定是脱离现实的空论。正如上所述，即使是在美国政府内部，1949年夏的时候，原来提倡对苏实行封锁政策的凯南本人也提出，要以日本中立、非武装为前提，实现全面媾和。

但是，从主流来看，美国政府首脑的政策，与其说是如凯南等人所强调的从政治上、经济上预防、封锁共产主义，倒不如说其重点已转向确立军事防卫体制。凯南的日本中立化设想并未被采纳，而美军留驻日本的路线已经确定。美国政府在已经丧失中国大陆、并考虑放弃朝鲜的状况下，想要确保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同盟国和有效的军事基地的意向就更坚定了。

而共产主义势力的反击也加速了美国政策向强硬方向的转变。苏联要求日本共产党采用反美武装革命战略。中国共产党也支持苏联的做法,批判了日本共产党的和平革命路线。因指导工人运动失败、在群众组织中的政治基础正在削弱的日本共产党,在受到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以后,党内的对立与混乱表面化了。掌握了党的主导权的德田球一集团把斗争战略转向了武力革命方向。对此,美国政府首脑的立场是,对战后已引进了自由民主主义,并已成为美国能够信赖的同盟国的日本,决不能拱手让给共产党。为此,美国的基本政策是,即使苏联反对,也非实现以日本的重整军备和美军留驻日本为前提的媾和不可。

根据这种冷战理论制定的美国对日政策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更无商量余地了。从此以后,全面媾和、日本非武装及外国军队撤离等形式的对日战后处理的政治可能性,事实上已经消失。

总评的组成

在对日媾和及日本重整军备成为最大政治主题的1949至1950年,作为日本在野党势力中重要部分的工人运动领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重组。

战败后产别会议在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因反对日共领导的民主化同盟在产别会议基层组织内力量增强,使产别会议逐步衰退。1947年3月产别会议与总同盟以及中立系统的工会一起,组织了全劳联(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但在1948年6月,因总同盟的退出以及反对共产党和产别会议方针的工会分离出去,全劳联又成了仅仅以产别会议为中心的左翼势力组织。脱离了全劳联的各工会朝着组成自由民主主义工会的方向开始结

集、协商。1949年11月21日成立了全国劳动组合统一准备会，试图将“自由民主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

进入1950年以后，新的统一组织被命名为“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其方向是尊重各加盟工会的自主性，不搞“全劳联”那样的联络机构，只组成比较松散的联合体。对这一动向，美国国务院及盟军总司令部都极其关心，有关人士甚至亲自出马去动员未加盟的工会加入总评。盟军总司令部的这种做法反而引起一部分工会干部的警惕。新产别会议认为，“总评就象是战后型的‘产业报国会’”，因此在3月份总评组成准备大会召开的前夕，表明不参加总评。在总评成立1年后的1950年11月，新产别曾决定加入总评，不久又退出，成了小规模独立的全国中央组织。

1950年3月11日，在东京召开总评成立准备大会时，美国的劳工联合会会长、产联主席、矿山工会会长、英国联工大会总书记、国际自由劳联总书记等发来了贺电，显示了日本在工人运动方面也同“自由世界”相联结，开始踏上了加入国际社会的道路。总评成立准备大会上通过的“大会宣言”中说：“我们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排除被革命风潮迷惑的极左的工人运动，为建立民主的工人运动基础将进行艰苦的斗争”，并表示，今后要排除“极左与极右”，推进工人运动的民主化，同吉田反动内阁作斗争。

在1950年7月12日的总评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宣言”与“基本纲领”强调：“排除日本共产党对工会的支配及其暴力革命方针，建立自由民主的工人统一战线”。并指出：“劳动者的各项要求要在国民经济力允许的范围内提出，并要在经济建设计划下推进。违背经济建设、故意破坏经济稳定与社会繁荣的破坏性极左工人运动，一概不能容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进

行了严厉的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基本纲领”又强调了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历史表明，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只要阶级存在，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企业都存在着阶级剥削的雇佣关系。”

“基本纲领”还认为，工会与政党在机能上、性质上都不同。工会必须完全独立于一切政党，自由行动。但是“根据和平立宪的手段，积极地同希望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协作、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也是必要的。”表明了与社会党合作的方针。

对于总评的成立，共产党和产别会议用“分裂主义者”、“社会法西斯”等激烈的语言进行非难。不过，总评的组成虽说得到了盟军总司令部和政府的热心帮助，但是其能够组成的基本因素，仍然在于工会内部对共产党以及产别会议的左翼倾向不满，而且工会战线分裂的深刻化也是由此引起的。

总评的组成，使日本工人运动的主体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劳动省调查，总评组成前的1950年6月底，总同盟有83.5万人，产别会议29万人，新产别5.5万人。这时工会的总人数为577.4万人，总同盟占14.5%，产别会议占5%。

一年后的1951年6月底，总评加上新产别，总人数为292.1万人，再建的总同盟为31.3万人，产别会议4.7万人。此时工会的总人数为568.7万人，总评占51.4%，总同盟占5.5%，产别会议占0.8%。到产别会议解散的1957年，其人数仅有1.3万人。

总评的变化

朝鲜战争使东西方进一步对立、使全面媾和的愿望完全破灭。与此同时，人们强烈感到了战争扩大的危险，对和平的关注

增强了。1950年3月，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及其国际管理”的宣言，发起了世界性的签名运动。日本也展开了签名运动。据日本主持这项运动的人发表的消息，截至1952年4月，有645万人参加了签名。在日本，人们强烈感到美军可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因而对上述宣言抱有好感，非常拥护。不过共产党对这项运动特别热心，使之沾上了共产党运动的味儿。

美国政府及日本保守势力认为，这种和平运动是苏联为了牵制美国行动而实行的计谋而已。和平运动与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确实是一项迫切课题，但是由于存在两种体制的对立，使之遭受重大影响。在共产党的严格统制下，除了官办的组织与运动，一切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是不允许的；而在西方各国，各种各样的自发运动都会制约政府的行动。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对于苏联的专政者来说，确实是很有利的。

召开总评成立大会的1950年7月，正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周围的国际形势严峻起来。总评成立大会的“宣言”说，“南北朝鲜的战火虽然不会立即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以此为契机，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对立将呈现新的态势，大战的危机已进一步深刻化了。”大会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是，反对北朝鲜“侵略”，支持联合国军。但是大会的“行动纲领”中提到：“我们要为促进全面媾和，为独立、迅速地建成自由平等有保障的日本而奋斗”。对此，一部分工会表示反对，认为“全面媾和”的要求同希望与自由世界的工会合作的方针是矛盾的，并提出经过删除的修正案。但最后修正案被否决，原案通过。

这一问题在1951年3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总评第二次大会上再次成为争论对象。就行动纲领问题，左派系统的工会提出修正案，要求改成“我们反对重整军备，坚持中立，反对提

供军事基地，为实现全面媾和、保卫日本和平、实现独立而奋斗。”

第二次大会的运动方针是，对于利用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和平运动而大搞共产主义的活动者加以批判，同时，以实现独立、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整军备为目标，与国内外民主和平势力协力合作。对于总评上述的“和平四原则”，海员工会提议删除，但未被采纳。

在这次大会上，以“民同(民主化同盟)左派”的支持为背景，高野实被选为事务局长。所谓民同左派即产别会议系统下各工会内部推进民主化同盟势力的左派。高野任总同盟主事，是总同盟内的左派。高野与民同左派一起积极促进了总评的成立，从而掌握了领导权。

盟军总司令部以及日本政府原来期望总评能成为与共产党划清界线的民主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总评成了直接反对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所提倡的单独媾和、保存军事基地以及日本重整军备的最有力的主体势力。这被人们形容为“一眨眼老母鸡变成了鸭”。

总评形成的时代，正是在占领下完全无言论自由的时候，此时要正面对抗美国是很困难的。掌握了总评主导权的左派领导者们，虽对共产党的运动进行了批评，但是其基本姿态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的工人运动。当时总评不违背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方针，并正是利用这一点才组建了特大的工会组织，以后，总评渐渐地又按照自己的初衷，将总方针转向行动式的、战斗型路线。

当时工人的生活水平还很低，经济要求很迫切。而且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状况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又出现了朝鲜战乱。国民中要求和平的气氛很浓。这就促使总评推出了“全面

媾和、反对军事基地、反对再军备、坚持中立”的四原则。

随着总评的主导权由左派掌握，其方针也向左倾斜，右派工会的不满增强了，新的分裂气氛又出现了。在那以前作为全国中央组织之一的总同盟，随着总评的成立也决定解散了。解散大会于1951年3月28日召开，但总同盟中的右派未参加。最后，于同年6月1日至2日，约30万人的右派系统工会召开了总同盟重建大会。1952年12月，留在总评内的原总同盟系统的全纤同盟以及海员工会等工会，对总评的指导方针进行了正面批评，认为它“偏向了政治斗争，把工会搞成了行动部队”，并进行“与共产党大同小异的宣传”。这些工会以后又加入了总同盟，并于1954年4月组成了全劳会议（全日本工会会议）。

社会党的再分裂

工人运动中的新分裂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党的分裂。从1950年秋至1951年，随着媾和问题成为政治的现实焦点，社会党内部的路线对立又一次尖锐化了。

1950年12月28日，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以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的“和平三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方针。对此在社会党内部出现了不满的动向。在1951年1月19日至21日召开的第7次大会上，右派提出了修正上述外交方针的提案。

修正案主要内容是，第一，不仅仅是主张全面媾和，而且应该把重点放在媾和内容上。第二，为了坚持中立，必须“以一定的实力为背景”。为此，“确立自卫是自然而然的事”。为了自卫进行的重整军备，并非是“封建军国主义的重建”，而且还附加了条件，如“不能作为特定国家的雇佣兵被派往海外”，“不能加重国民的经济负担”等等。修正案还要求：“为了区别于共产党，社会

党不能仅仅偏向工农阶级，而应该作为国民组织，在生产防卫、国土防卫的有机结合上进行重建。”

在大会上，选出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选出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包括委员长在内左派占了半数，因而右派提出的修正案在大会上被否决了。

但是党内的左右派势力在继续斗争。1951年9月媾和协定签约后，在国会中就批准旧金山两条约（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社会党该采取何种态度成了其斗争焦点。左派主张投票反对两条约，而右派中大多数则仅仅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赞成和平条约。另外还出现了两条约都赞成的集团。

从朝鲜战争以后的国际形势来看，全面媾和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丧失。在这种状况下，有人开始感到，与其被继续占领，倒不如先实现单独媾和、恢复主权，然后再与余下的国家谈判媾和。甚至在左派社会党员及左派理论家中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形成了上述的现实主义意见。社会党内部又反复进行了争论，但意见仍不能统一。为此在和平条约签定前后这一重要时刻，社会党内的斗争激化了。

社会党左派主张，用大会决议方式最终确定对媾和的态度，对此右派认为自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稍占优势，因此主张由执行部来决定态度。最后决定按顺序逐个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员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全党大会来决定对媾和的态度。

1951年10月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以16票对14票通过了右派的路线，即赞成和平条约，反对安保条约。在投票中，委员长铃木弃权，执行委员会中一名左派投了右派路线的赞成票。

总评中左派干部支持社会党左派，坚持反对两条约的态度。10月21日，总评向社会党发出“呼吁”，指出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是同1月份召开的社会党第7次大会的决定相违背

的,呼吁按照七大会议决议,贯彻全面媾和路线。

1951年10月23日,社会党在东京的浅草会堂召开了第8次临时大会。当时,在社会党国会议员中右派占优势,在地方议员中左派占优势。高野事务局长等总评的干部向社会党左派议员表示,不要害怕分裂,总评将从组织与资金方面支援左派。

在大会上确定了左派的优势地位。右派10月24日与左派冲突之后,退出了会场。并以“统一恳谈会”的名义另外举行了大会。左派变更了会场后继续开会。左派非难右派“使用市侩暴力团,扰乱大会”。右派攻击左派“无视中执决定,依靠一部分亲共分子的谋划与外部势力来支配大会”。这样,社会党终于分裂成“左派社会党”与“右派社会党”。这是在旧金山两条约在众议院通过前两天发生的。

5. 旧金山体制

占领军与共产党

到了占领后半期的1949至1952年,以占领军及其统治、庇护下的吉田内阁保守势力为一方,以共产党势力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对立、抗争更加尖锐化了。美国政府、麦克阿瑟以及盟军总司令部官员公开非难共产党的革命主义路线不过是苏联的间接侵略而已。

产别会议内部民主化同盟的发展,道奇方针实施过程中中国铁及其他大企业的大量解雇工人,以及政府利用下山事件、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进行攻击等等,使共产党越来越陷于窘迫的境地。企业在解雇人员时,专以共产党员及工会活动家为对象。被企业解雇的共产党员并不能依靠全体劳动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对于口头上强调“自由”,但一旦有人批判自己就要严加处

盟军的盟军总司令部,是继续对抗,继续反对占领政策,还是改变方针?共产党被迫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如果继续对抗,就意味着共产党要冒复归到非法政党地位的危险。

在此背景下,又出现了1950年1月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事件,从而促使党内对立表面化了。德田等主流派服从了情报局的指示,把战略方向转向了武力革命。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排除了国际派,加深了党的分裂。在一般党员中,国际派占少数,但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党员中国际派占优势。学生运动的全国组织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成立于1948年9月)中的大多数活动家都是国际派的共产主义者,因此学生运动不久就同共产党本部对立起来。

1949年7月,盟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局的W·C·伊尔兹在新潟大学的建校典礼上发表演讲,声称要将共产党教授从大学驱逐出去。其后,他在各大学又反复进行了上述同样意思的演讲。对此,大学教授联合会、日本学术会议以及日教组等都表示反对。全学联也组织了抗议斗争。1950年5月,伊尔兹又在东北大学和北海道大学进行相同演讲时,被学生抗议未讲成。最后伊尔兹的主张终于未被采纳,在大学未能展开清共活动。

1950年5月3日,为纪念宪法生效三周年,麦克阿瑟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共产主义展开了抨击。他说:“与世界其他民主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日本共产党为了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自称是保护工人阶级权益的先锋。但是正如国外的实例所表明,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工人阶级的一切权益都丧失了。日本共产党也声称尊重言论及和平集会的自由,热心于基于各人良心的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但是事实表明,共产党一旦掌握政治权力,一切自由就完全被压制了,根本没有争论的余地。”

共产党的新纲领

1950年5月30日,共产党系统下的民主民族战线东京准备会组织了在皇宫前广场上的集会。宗旨是抗议麦克阿瑟5月3日对共产党的责难,并反对共产党非法化。参加集会的工人和学生与便衣警察抗争时,美国军事警察也介入了,最后8人遭逮捕,被军事法庭判服重劳役。此活动被称为五三〇事件,以此事件为理由,不久东京禁止街头示威游行和集会。

6月6日,麦克阿瑟致信吉田首相,指示褫夺共产党24名中央委员的公职。德田球一等共产党干部,一边躲避警察当局的追究,一边建立了非公开组织,在秘密的地下活动指挥部继续指导着共产党的活动。日本与西德、南朝鲜不同,共产党并未完全处于非法状态,共产党有公开和非公开两种组织。6月26日,麦克阿瑟又致信吉田首相,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对朝鲜战争报道不适当为由,命令《赤旗》停刊30天。以后停刊时间又无限期延长。共产党尝试发行的各种机关报,也以《赤旗》续报为由,遭到了停刊的处分。《赤旗》于1952年4月28日即媾和生效后、波茨坦命令开始无效时才复刊。

7月24日,盟军总司令部劝告新闻协会代表开除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从这时起,不仅新闻机关,而且官方以及大企业等都在大量解雇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据说,到1950年底为止被解雇人数达一万数千人。

共产党进行了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整军备的运动,并全力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体制。但由于共产党人被开除出了主要企业,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减弱了,因而共产党的运动就更多地流向“街头”,采取了形式更激烈的斗争。学生以及在日本的朝鲜人不少都被动员进这种运动。

和平条约缔结前的1951年8月21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决定了题为“日本共产党当前的要求——新纲领”的方针书。这一方针书在1951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5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由于处在半合法状态,因此未召开党员大会,而由各级机关代表组成的全国协议会来决定基本方针。

新纲领认为,美国在媾和后将会继续占领日本,并期望永久占领下去。指出吉田政府是美国对日统治的支柱。并说,当前的革命是打破美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以为用和平方式、没有障碍地自然而然就能建立新的民族解放民主政府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强调了包含武装斗争在内的实力斗争的必要性。共产党同时暗中决定了军事方针,编制了军事组织。当然他们的军事方针,并非是建立正式的武装组织,而只是准备火焰瓶之类的“武器”,利用街头示威游行等机会进行威吓性的投掷。共产党还把为了确保东京都市民的用水而正在修建中的奥多摩地区的小河内河坝的建设说成是确立“日美安全保障重整军备体制”,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还派遣了工作队前往工地。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的无意义的活动,使众多党员吃了不少苦头。在其影响下,各种运动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新纲领认为,占领即使结束,强大的占领体制仍会继续,日本仍会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并认为“战后改革虽然大大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但是‘半封建制’仍然顽固地残存着,”等等。应该说,由于战后改革,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体制总算确立了,不允许批判占领军的禁忌随着占领的结束也会消除,进一步强化自由民主主义机能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在这种时期,新纲领不利用议会制度来推进民主主义的改革,而是依靠经典的武装斗争,去搞充满幻想的革命主义,这不能不说是犯了错误。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放弃了批判这种谬误的责任。他们对共产党干部由于受国际性批判转而采取的粗

暴方针竟服从了。为了使这种方针正当化，甚至还牵强附会地寻找理论依据。1953至1955年岩波书店发行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就是其典型的例子。在这一讲座中，起指导作用的人们，根据其自身理论及认识的错误，以及对苏联、中国等国际性批判及日共方针的无条件服从，为使新纲领正当化制造了理论依据，自己砸了理论家、研究学者的牌子，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巨大混乱。

两条约的签字

在美英对日媾和条约共同草案出笼后不久的1951年7月9日，杜勒斯写信给吉田首相，要求吉田本人出席媾和会议，并希望媾和全权代表团的构成是“超党派”的。

社会党围绕着和平条约与安保条约，党内正在发生激烈争论。对于政府邀请他们参加媾和全权代表团，社会党回答说：“和平三原则是党的宗旨，因此不能参加”。参议院的绿风会决定派人参加。国民民主党中，三木武夫干事长为首的同情在野党的一派反对参加；与保守势力有联系的一派赞成参加，党内形势复杂，发生争执，最后还是决定参加。无论是绿风会还是国民民主党，都要求政府在临时国会说明媾和经过。8月16至18日召开了临时国会。吉田在国会上说，美军留驻日本是日本方面所希望的。

参加媾和会议的全权委员，除了首席全权吉田茂之外，还有自由党的星岛二郎和池田勇人，国民民主党的苦米地义三，绿风会的德川宗敬，日银总裁一万田尚登。全权团一行于8月30日离开东京。

从9月4日起在旧金山市内歌剧院召开的对日媾和会议，与其说是协商媾和问题，不如说只是一种签约仪式。

美国杜鲁门总统亲自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演说。他说，对日媾和是一种“和解”的媾和，美国国民对“珍珠港事件”还记忆犹新，为了两国的友好，必须继续努力。他强调，美国最关心的是日本受到保护、不遭侵略以及日本本身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

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提出了中国(北京)代表参加媾和会议的问题，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与苏联同调。担任会议主席的美国艾奇逊国务卿认为此问题与会议议题无关。通过表决，否决了这一提议。

葛罗米柯还提议：承认北京政府对包括满洲、台湾在内的中国全土拥有主权；承认苏联对整个桦太(库页岛)、千岛拥有主权；小笠原、琉球应属于日本主权范围；媾和生效后 90 天以内联合国军必须从日本撤退，任何国家不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等。葛罗米柯还提议：日本的军备必须限制在自卫的范围内，只能拥有地面部队 15 万人，海军 2.5 万人、船吨量 7.5 万吨，空军战斗机 200 架、运输机等 150 架、空军兵力 2 万人，坦克 200 辆等。

各国代表的演说结束后，9月 8 日进行了签约仪式。除了日本，有 51 个国家参加了会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三国拒绝签约，其余 48 个国家参加了签约。

虽然签约的国家很多，但是其中与联合国同调的中南美国国家以及因与德国开战的关系也向日本宣了战的欧洲国家等占了多数。而与日本直接交火的国家只限于美国、英国及其英联邦国家、荷兰以及几个东南亚国家。中国方面，对大陆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未邀请。印度和缅甸，如上所述，因他们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等表示不满，故也未参加会议。

和平条约签约仪式结束后，同一天 9 月 8 日，在旧金山市内的美国第 6 军司令部签定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方面由吉田首相一人签字，美国方面由艾奇逊、杜勒斯等四人签字。吉田考

虑,比起反对和平条约,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空气更浓厚,为此采取了自己一人承担责任的形式。

为审议和约和安保条约而召开的临时国会于1951年10月10日开幕,众议院于10月26日、参议院于11月18日分别以多数通过承认了两条约。众议院的投票情况是,赞成和平条约的是307票,反对的是47票;赞成安保条约的289票,反对的71票。在参议院,赞成和平条约的174票,反对的45票;赞成安保条约的147票,反对的76票。社会党左派(在众院有16票、参院30票)、共产党(在众院22票、参院3票)、劳农党(在众院4票、参院5票)对两条约都投了反对票。社会党右派(在众院24票、参院26票)赞成和平条约,但反对安保条约。在国民民主党、绿风会、小会派及无党派议员中也有少数人对和约与安保条约投了反对票。

11月28日,日本政府将和平条约的批准书交给了美国政府。

12月10日杜勒斯访日,与吉田首相进行了三次会谈。杜勒斯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不要与北京政府、而与台湾政府建立邦交。杜勒斯说,日本政府如不明确表示这一态度,和平条约将很难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吉田于12月24日致信杜勒斯,明确了对中国问题的处理方针。吉田在信中表示,虽然最终是希望同中国恢复全面的政治关系,但是现实状况是,只准备与台湾缔结恢复正常邦交的条约。不过这一条约中的规定只适用于台湾政府统治下的地区。吉田确认,北京政府目前正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日本无意与北京政府缔结和平条约。吉田这一书信于1952年1月16日由日本政府公布。

1952年1月26日,美国派拉斯克特使来日,开始就日美安保条约的行政协定进行谈判。在野党发表了反对行政协定的共

同声明，并提议将行政协定拿到国会审议。这一提议在2月的众参两院上被否决。2月28日，行政协定签定，安保条约体制的基础被巩固。行政协定未经国会的审议与批准就同安保条约一起同时生效。

美国参议院批准对日和平条约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时已是1952年3月20日。

两条约的生效

1952年3月28日，吉田内阁决定了“防止破坏活动法(破防法)案”的纲要，并于4月17日提交国会。其目的是代替1949年4月作为波茨坦政令公布的“团体等限制令”，限制搞“暴力主义的破坏活动”的团体。名义上是限制左右两极端的运动，但当时实际企图是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对此，不仅仅是共产党，就连社会党、总评以及保守在野党的改进党（于1952年2月8日由国民民主党与保守派别的小会派合并而成）都出来反对。他们认为，由于共产党开始搞武装革命，导致政府进行镇压。他们担心，在此过程中，政府会以镇压共产党为理由，进而对自由、人权、民主主义进行全面地压制。但是因执政的自由党与绿风会的赞成，破防法还是于7月4日获得批准成立。

旧金山两条约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从此，宣告占领结束，盟军总司令部撤销。

同一天，日本与台湾缔结了和平条约(8月5日生效)。日本放弃了台湾及澎湖列岛等的拥有权，承认太平洋战争以前的条约和协定无效。台湾方面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在未参加旧金山媾和会议的国家中，缅甸于1952年5月2日宣告结束对日战争状态，印度于同年6月9日与日本缔结了和平条约。

旧金山两条约生效 3 天后的 5 月 1 日,在皇宫前广场上,示威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流血惨案。两名示威者遭警察枪击杀害,不少人负伤。

战后复活的示威游行例年都在皇宫前广场(共产党与工会称之为“人民广场”)举行。1951年开始,政府禁止使用皇宫广场。为此当年只搞了分散的,未能集中举行游行示威。1952年,在明治神宫外苑搞了集中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中的一部分约 6000 人,从明治神宫出发,预定行进到邻近皇宫前广场的日比谷公园就解散。可是在共产党员等活动家的“到人民广场去”的号召下,游行队伍拥进了皇宫前广场。警察前来阻止,发生冲突。警察使用了枪弹。

部分示威者推翻了停在附近的美制汽车,并放火燃烧;有的把美国兵扔进了坑道。但是大多数示威者只是聚集在被禁用的广场上表示抗议而已。当局以骚乱罪、暴力行动等罪名逮捕了許多人,261 人被起诉。审判年月拖得极长。直至 1972 年 11 月,东京高等法院才判决 16 人有骚乱罪,其他人无罪。东京高等检察厅考虑到审判时间太长,不再上诉。这一事件在 20 年后才有结果。

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才 3 天,日本国内就出现了“流血的五一节”,这使有关国家震动不小。“五一”事件以后,5 月 30 日各地又举行了“纪念五三十事件(即两年前反对共产党非法化集会上示威者遭美军逮捕事件)集会”。6 月 24 日,吹田市召开了朝鲜动乱二周年纪念集会。6 月 25 日,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又出现集会、示威游行等,有人投掷火焰瓶等制造骚乱空气,结果有示威者遭枪击,不少人被逮捕。

这一状况虽说是反映了对政府镇压政策的不满及对日美军事同盟形成的不安,但更主要的是共产党极左的冒险指导方针给予破防法案的建立制造了最好的借口。

第七章 走向经济自立的路

1. 产业合理化政策

动乱景气的反作用

和平条约的签订,在政治上实现了独立,紧接着的着眼点就是谋求经济上的自立。

由于道奇路线的实施,日本经济陷于通货紧缩而引起的停滞状态,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经济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暂时的繁荣。然而,这种“动乱景气”,没持续多久。1951年夏天开始,朝鲜战争即进行停战会谈,交战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会谈期间虽有过几次激烈的战斗,但到1953年7月就达成了停战协定。

1955年9月经济企划厅发表的有关特需的报告,详细地记载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特需合同额的发展概况。特需物资合同额第一年为2.3亿美元,第一、第二年都在2亿到3亿美元之间,第四年就下降到1.25亿美元,到第五年只有7900万美元。和特需物资相比,提供服务的合同处于稳定增长,但到第四年以后也趋向减少。特需合同的总额第三年创纪录,达到4.92亿美元。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伴随旧金山和约的生效,以往由终战处理费支付驻日美军的费用也算在特需内。这段时期,日本不但调配武器零件,而且已开始生产完整的武器。另一个原因是美国利用MSA(安全保障体系)资金与东南亚签订的合同也统计在特

需中。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提供的主要物资为卡车、汽车零部件、棉布、毛毯、建筑钢材、麻袋、汽油桶等。之后是以武器、煤、食品、家具、电池、水泥等为主。5年累计，武器占首位，煤次之。服务方面的主要项目为房屋建设和汽车修理等。

特需给萧条中的日本经济灌注了活力，但需求项目的内容有限，而且没有多久就迅速减少了。“动乱景气”带来的出口增加也只是暂时的。出口从1949年的5.01亿美元增加到1950年的8.02亿美元，1951年又增加到13.55亿美元。这两年的年增长率都超过了60%。然而，在出口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进口由于受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影响，金额虽剧增，但国际收支却没有得到改善。1952年的出口少于1951年，1953年也处于停滞状态。

1954年以后，由于出口的稳步增长，经济趋于好转，但进口的迅速增加，再次导致国际收支发生恶化。截止1958年，外汇储备减少到10亿美元以下。因进口持续增加，导致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及外汇危机。进而使经济运行长期处于紧缩金融、抑制景气的状况，不得不依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摆脱困境。到60年代下半期，进出口差额才转为盈余（出超），国际收支表上的贸易收支也转为经常性的盈余。

“动乱景气”成为摆脱萧条的契机，但也带来了物价上涨的副作用。1949年的物价指数和1948年相比，上升率更高（消费物价上升25.3%，批发物价上升63.3%）。这是受道奇路线没有实施之前的战后通货膨胀的影响。1950年消费物价指数比1949年下降7.2%，批发物价指数虽说已开始受朝鲜战争的影响，但仍上升18.2%。然而，到1951年，消费物价指数又上升了16.2%，批发物价指数也上升了38.8%。

1952年以后，反映“动乱景气”的沉滞，物价指数的上升率

趋于下降。50年代后半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价最稳定的时期。

“动乱景气”虽然使日本经济很快地从道奇萧条中摆脱出来，但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随着“动乱景气”的结束，在道奇路线的实施过程中就已议论的，为经济自立产业必须合理化的建议，重新受到重视。这一时期的经济自立，以摆脱美国的对日援助和摆脱对特需的依赖为目标。

产业合理化

1949年12月成立的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既探讨了产业合理化的一般方针，又探讨了各行业的合理化方针。合理化方针最早实施于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1950年6月20日，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公布了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的合理化方案。这正是在朝鲜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

合理化方案，设想了几种降低产品价格的目标值。生铁价格从1950年6月的每吨18100日元降低到1953年度的16200日元。钢材价格，如钢条从25250日元下跌到24300日元。生铁下跌的幅度大约是10.5%，钢条下跌的幅度是约3.8%。之所以能降低生铁的价格，是因为在炼铁过程中，成本费用削减了19%，焦比（每吨生铁所必需的焦炭量）从1062公斤减少到890公斤。除此之外，还将降低国内煤炭的价格，充分利用价格低廉的进口煤炭，扩大重油的使用，在利率方面也将给以优惠，以便把钢铁的价格降低到出口合算的价格。

根据上述咨询，内阁于8月18日通过了“钢铁及煤炭合理化实施纲要”。纲要阐明了“国内的煤炭价格，尤其是原煤等特殊煤的价格，大大高于国际水平，阻碍了钢铁业等重要产业的自立化。如果废除或削减价格差的补助金，就难以保持合算的出口

价格。在大力推进作为对出口产业及基础产业都具有重要地位的钢铁业的合理化政策的同时,通过煤炭业的合理化,降低煤炭价格,使日本产业到 1953 年能具备自立的基础。政策措施有下列几条:

- (1) 确保合理化资金和实施低利率。
- (2) 降低以往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利息和放宽还债的期限。
- (3) 对引进外国机械、技术所需的外汇,重点分配,优先供应。
- (4) 为促进煤矿业的机械化,对用于试验的机械设备由国家资助。
- (5) 与降低煤炭价格、实现运输合理化相对应,调低运输费。
- (6) 确保必需的废铁量;增加钢铁业的重油使用量。
- (7) 确保进口价格低廉的外国原煤,发生炉用煤等等。
- (8) 对主要煤矿、工厂的合理化进行调查、指导。

煤炭、钢铁合理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妥协。既从节约外汇考虑出发,优先利用国产资源(国内煤炭),又要为确保合算的出口价格而不得不使用进口原料(进口煤和重油)。根据当时日本煤炭业的实际情况及外汇汇率水准,仅靠国产资源,是不可能维持钢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然而如果以低价格为理由,全部依赖进口资源,那么,国产资源优先的原则就会付诸东流。因此,产业合理化审议会的报告,打算使用“一定数量”的进口煤炭、重油。即使国产煤的价格偏高,通过进口与国产双管齐下,也还是能够实现合算的钢铁出口价格。

这种折衷的方针只是权宜之计。要重视出口产业的价格合算性,降低价格,就必须更多地依赖进口资源。国内煤炭从煤层

结构看，在合理化方面是有限度的，而且煤的质量也缺乏竞争力。假如预测到进口资源价格低廉，并能确保充足的数量，那么从获取外汇的观点来看，坚持使用国产资源，是不精明的。从长远着眼，使用价廉质优的进口资源来降低基础产业和出口产业的成本，扩大出口，积极获取外汇的战略是切合时宜的。事实上，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谋求自身的利益，尊重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必然会增加对进口资源的依赖。

国产资源优先的原则维持不久便名存其亡。煤炭产业，不仅和进口煤炭开展竞争，而且还要和价格低廉、运输方便的石油开展竞争，结果急速衰退。

这一现象也发生在和煤炭行业相同的基础能源产业电力行业。电力行业由于盟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方面对企业形态存在分歧，重组晚了一步，到1951年5月才确立了九大电力公司的体制。政府把致力于水力开发，作为重视开发国产能源的一环。除依靠财政资金资助九大电力公司的电源开发外，还设立了政府援助和领导下的电源开发公司。然而，随着水力开发的发展，适合于建造大规模水库的用地越来越少。加之技术革新使火力发电的成本下降，于是发生了从水主火从到火主水从的转变，而火力发电也从煤主油从转变为油主煤从。

类似的问题还发生在海运业。政府为重建在战争中损失的商船队、向民间海运业提供补助金和政策金融，并推进“计划造船”。这种做法在帮助日本海运业复兴的同时，也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并为后来日本确立世界第一的造船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是却没有实现海运民族主义，即主要由日本船主来运输进出口物资。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化有了进展。日本大部分进出口产品的运输是由外国船主拥有的船舶来完成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船舶多半是由日本造船业建造的。

贸易主义还是开发主义

自从通过单一固定汇率，同世界经济保持直接联系以来，向进口更加廉价的资源以降低产业成本，从而出口更多产品的“贸易立国”型产业结构转变，就成为日本的基本课题。消除拘泥于国产资源和优先开发国产资源的思想障碍的时机已经来临。1949到1950年，一桥大学的中山伊知郎教授对此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中山教授在1949年12月号的《评论》杂志上，刊登了《日本经济的面貌》一文。文中认为那种因为国际贸易陷于困境从而考虑优先开发国内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他主张日本必须走从前英国走过的路，从海外进口必需的粮食和资源。而要换取这些物资，就必须振兴出口。

中山教授提出的这一意见，遭到了马克思经济学家的反对和批评。东京大学的有泽广己教授，在同一杂志的1950年2月号上载文，对中山教授的这一意见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有泽教授列举了战后国际经济形势不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三个主要原因：

(1) 世界分裂成东西两个阵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缩小了。

(2) 合成工业的发展，使东南亚地区的特产品贸易缩小。此外，随着各后进国工业化的发展，原料消费增加，从而导致原料资源出口的减少。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力量过度向美国集中，由此产生了其他各国的外汇不足问题，阻碍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有泽教授认为：“自由通商、自由汇兑、自由贸易可以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至少是在主要工业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平衡的情况下进行的”，并强调要达到这一

平衡状态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泽教授说：在此背景下，面对“完全依靠对外贸易的增加这种日本资本主义的自立方针，来解决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的扶养，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维持就业”这一任务，中山教授自己是否怀有不安感。并批评中山教授说：“那不是自立，而是隶属，或者说有陷入资本主义破产的危险”。

最后，有泽教授认为，他并不是主张放弃对外贸易，而是对它感到不安，认为它有一定限度，因此有必要进行有计划的努力。他说：

“例如，恐怕不会允许把所有的资本积累都交给私人资本吧。还必须利用国家资本来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国土资源综合开发，以推进经济的社会化。这样虽会造成有步骤地废弃资本主义的命运，但却是日本经济走向自立和达到最高生活水平之路”。

中山教授在1950年3月号的《经济评论》上对此又提出了如下反论：

第一，说什么由于产业与技术的发展。过去的“特产品”已失去其本身的意义，并列举合成橡胶代替了天然橡胶、尼龙代替了生丝这些事例，但这是把技术意义上的“特产品”和贸易、经济意义上的“特产品”混为一谈。在技术方面，国内可以胜任的，但在经济上还是依靠进口合算的做法并不少见。日本今后必须致力于技术开发这是事实，但过高地评价技术，从而大量减少进口的想法是错误的。

第二，对贸易立国型经济抱有疑虑的人们，强调的是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协定贸易”占相当比重，而日本又被排斥在外。然而，现实情况是尽管存在协定贸易，但发展自由贸易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即使协定贸易发展到一定规模，也不能说在此基础上就

无法发展自由贸易了。确实存在在协定贸易下扩大贸易的事例。

不应否定国内开发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忽视贸易立国的必要性。此外，贸易主义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推进开发主义就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这种理解也是片面的。即使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从日本所处的环境来看，也必须重视国际贸易。当然，就现实来说，我认为自由贸易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等新的机构体制下，既要克服困难，又要改革国内的经济体制。要使这一改革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需要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生活。其间，必须充分“提高劳动的地位”，不能再象从前日本资本主义那样受到“廉价劳动”的指责。

中山教授根据以上论述再次阐明了贸易立国的重要性。

这一争论关系到 50 年代初期日本选择基本政策的问题。当时的日本，要发展贸易困难一定很多，但日本除了开始走上重建工业化的道路外，还应以自由贸易主义的发展，来扎实地推进国际化。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需要采取某些“计划性”的处理，但不能象有泽教授所设想的那样，“实行一种摆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计划”。事实上，正是以战后采用的社会性要素很强的民主主义为前提，越来越依靠自由私人企业的活力，才实现了后来的经济增长。

2. 扶植产业的制度体系

间接金融和低利率政策

以产业合理化审议会为中心，政府从制度上、政策上为推进合理化创造条件。在探讨个别产业合理化目标的同时，还致力于推进资本积累。

第一是完善金融制度。

日本银行在战争期间，为筹措战争经费曾被指定发行了大量的公债。战后，又通过发行公债及复兴金融债，来协助筹措财政资金。1949年春，道奇方针的实施，结束了通货膨胀，确立了单一的固定汇率制，使对外经济关系走上正常化，这才使金融政策恢复了应有的作用。日本银行以重视货币价值稳定和国际收支均衡为目标，开始为复兴和发展提供资金。

民间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条件也日趋完备。

当初，银行业虽被盟军总司令部指定为解散财阀、排除集中政策的对象，但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普通银行几乎都免于解散。然而，特殊银行因被认为在战前、战时帮助推行国家政策而被解体。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南方开发金库等机构，在刚战败后就被解散了。在外汇业务和贸易金融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特殊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于1946年7月被解散。其帐目移交给同年12月设立的外汇银行——东京银行。

1950年4月，日本劝业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改为普通银行。根据1952年6月制定的长期信用银行法，同年12月，日本兴业银行改为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一起，开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筹措资金，提供产业资金。1957年4月，设立了以中小企业为主要交易对象的金融债券发行银行——日本不动产银行(1977年改名为日本债券信用银行)。金融债券的发行，除上述3家长期信用银行外，也允许专门外汇银行东京银行、商工中央金库、农林中央金库发行金融债券。

解散财阀使股票公开化了，因而证券业务的意义也就显得重要了。1948年4月，按照盟军总司令部的指令，制定了证券交易法。该法的制定参照了1933至1934年美国的证券法及证券交易法。根据证券交易法的规定，股票交易改为以实物交易为

主；此外，还规定银行和信托公司等机构，只能开展国家债券、地方债券、政府保证债券这3类证券交易业务，禁止开展其他一切证券交易业务。

日本经济一纳入发展轨道，银行和证券公司之类的民间金融机构就吸收国民储蓄，提供给各产业。日本银行支持民间银行以创造信用的方式，对企业公司发放贷款。不仅对民间企业开出的商业票据进行再贴现，而且向民间银行进行贷款。

政府和日本银行为促进产业合理化，实行低利率政策，战时战后一直实行统制利率。即使在为消除国际收支赤字而实行金融紧缩政策的情况下，日本银行的法定利率水平也还是比较低的。对民间金融机构实行个别资金分配时，根据一定的基准，选择采用高利率的对象，开展“窗口指导”。

普通国民的储蓄，虽说也进入了股票市场，但更多地还是投向银行。由于日本银行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贷款，并实行低利率政策，所以在产业筹措到的资金中，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占很大比率。战后的企业公司，由于财阀家族等资本所有者的支配力减弱，并确立了经营者支配型的管理体制。因此，经营领导者已不太注重有意识地区别自有资本（资金+内部保留）和他人资本（借款）。在税制上，股票红利作为公司的收益纳入课税对象，贷款所需支付的利息作为亏空资金（费用）不纳入课税对象，因此，对企业来说，在核算资金成本时还是贷款（借入金）来得便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投资规模将大大超越折旧资金和内部留利。为此，通常的方法是用银行的贷款进行积极的设备投资，增强企业实力，同时为了稳定经营，在必要的范围内增发股票。

财政投融资

为产业合理化实施的第二个政策措施，就是由政府出面开

展金融活动和投资活动。

在道奇路线不允许发行复兴金融债券，禁止实行新的复兴金融贷款后，经政府和盟军总司令部交涉，决定把美国对日援助的专款资金特别会计有效地贷款给重要产业。一进入50年代，政府就致力于组建金融政策机构。

从那时起，政府财政投融资的最大的资金来源便是邮政储蓄。

战前和战时，邮政储蓄集中在大藏省的存款部（建立于明治时代），被用来作为筹措战争费用和扶植殖民地的对策费用。根据道奇的要求，撤销存款部，在1951年4月重新设立了资金运用部（特别会计）。资金运用部集中管理邮政储蓄、福利保健养老公积金以及国库多余的其他资金，对国营公司、公团、政府金融机构、国策公司等机构提供贷款服务。此外，邮政省提出的邮局要区别使用集资到的简易保险和邮政养老金的公积金的要求，于1952年12月得到批准。政府于1953年8月，新设了产业投资特别会计。特别会计是根据藏相池田勇人（吉田内阁）的设想，在发行特别减税国债时筹措到的资金和继承美国对日援助回流资金特别会计的基础上设立的。

1950年12月，创立了日本输出银行（简称“输银”）。它不但要开展日本银行的贸易票据贷款，经营短期输出金融，而且还要作为政府金融机关经营长期输出金融。输银的创立，因为是在日本独立之前，所以当时还必须征得道奇的理解。输银还承担用延期支付方式取得船舶及其他出口贷款时的欠款，以促进出口。1952年4月，输银改名为“日本输出入银行”。开始对出口技术，进口特定原料，或是为获得原料而在海外进行的开发事业投资等，提供融资。

1951年4月，创立了面向重要产业的金融机构——日本开

发银行(简称“开银”)。复兴金融金库残留的回收贷款之类的业务由开银继承。初期,开银对电力公司的电源开发和海运公司的计划造船等基干产业的融资占很大比重。

在电源开发方面,还成立了国策公司。1952年9月,又创设了电源开发股份公司(简称“电发”)。电源开发股份公司的资金来源于政府的投资、贷款及公司债,它的建立促进了当时的水力开发。

随着经济发展步入轨道,政府深感必须进一步充实作为产业活动基础的社会性资本设备。

到了50年代后半期的景气时期,国营铁路的运输能力已不能适应运输的需要,因此,增强国营铁路的运输能力就成为当时的一大课题。后来,汽车运输的发展,也促进了道路的完善。除一般会社进行道路投资外,政府企业也开始从事道路事业,于1956年4月创立了日本道路公团。道路公团继承特定道路整备事业特别会计的资产,从事收费道路的建设、保养、管理工作。1957年制定了国土开发纵贯汽车道路建设法。道路公团除接受政府提供的财政投融资和补助金外,还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承担了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第一条名神(名古屋—神户)高速公路,于1957年动工,1965年全线通车。东名(东京—名古屋)高速公路于1962年动工,1969年全线通车。

中小零星企业、农林渔业、住宅等也是金融政策的重点扶植对象。扶植这些对象是维护保守政权的政治基础所不可缺少的。1949年6月,作为庶民金库以及养老金(抚恤金)金库的继承机构,设立了国民金融公库,为零星企业的事业提供小额贷款。

1953年9月,又设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除上述政府金融机构外,战后,政府也以承兑债券等方法,对战前(1936年)设立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提供资金帮助。1951年4月,建立了农

林渔业资金贷款特别会计。从1953年度开始，作为金融政策机构，又设立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继承这一特别会计的业务及资产。1950年6月，为开展住宅建设资金的贷款业务，设立了住宅金融公库，1955年7月，创立了日本住宅公团，作为提供住宅的机构。

1953年会计年度以后，政府把投融资计划设计成一张表格——“财政投融资计划”，作为预算审议的参考资料，提交给国会。后来随着公司、公团、事业团等数量的增加，财政投融资的计划日趋复杂，规模也不断扩大。

政府的贷款金额，在整个50年代虽然总的来说是在增长，但其占整个产业资金中的比率，1954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便呈下降趋势。1954年，政府的贷款资金占产业外部筹措资金的19%，占外部资金和内部资金合在一起的总的产业资金供给额的10%左右。由于政府的资金重点投向一部分基于产业，所以对这些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开银、输银等机构的贷款，多半是采取和民间金融机构之间协商贷款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政策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也起着诱导民间金融机构贷款的作用。

特别租税措施和补助金

第三个政策措施，是通过特别租税措施和补助金进行财政资助。

特别租税措施是为达到特定的政策目标而实行的各种减税、免税措施。在50年代前半期就恢复、建立了多种特别租税措施。

呆帐准备金、船舶维修专款、价格变动准备金、退職专款、应急准备金以及其他准备金，都是以增加企业内部留利为目的的。

减轻利息、红利的课税措施和扣除生命保险金是以奖励储蓄为目的的。折旧优惠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普通机械在10年或15年折旧完毕,但与合理化有关的机械却采取了加速折旧的制度。即允许第一年折旧三分之一,或者在3年内实行增加50%的折旧。由于实施这一措施,企业在引进合理化机械的初期就可以拿到大笔折旧费,帐面上获利不少,租税负担又轻。机械设备如果提前折旧完毕,后期的折旧负担就会减轻,有利于竞争。在今后重新更换新的机械设备时,也容易处理。

根据夏普劝告而实行的企业固定资产再评价,纠正了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固定资产评价过小和折旧不足的问题。折旧额的增加,租税负担的减轻,使企业资产状况得以改善。

这一时期,由于日本产业的技术力量薄弱,需要进口机械和引进技术。为此,采取了重要机械进口免税及使用外国重大技术的费用免税等措施。当时,象大型发电机和最新式的钢材压延机之类的基础设备,很难做到国产化。这些设备,最初都是依赖进口的,后来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实现国产化的。

另一方面,为促进出口,设立了扣除出口所得、出口损失准备金、海外分公司设备特别折旧等项目。

特别租税措施,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开的减免税补助金。然而,原有的补助金制度依然存在。1950年创立的工业化试验补助金和矿业技术研究补助金就是其中的例子。后来合并成工矿业技术研究补助金,用来扶植应用研究和工业化试验。道奇路线实施后,对各种补助金虽作了全面整顿,但上述补助金却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新设立的。

政府为改进质量管理、热管理、计量等方面的基本技术,制定了工业标准化法(1949年7月实施)、热管理法(1951年10月

实施)、计量法(1952年3月实施)。工业标准化法以促进生产合理化、交易公平化为目的,促进了日本工业标准(JIS)的制订。

为促进产业合理化,政府采取了积极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的方针,于1950年5月制定了外资法。根据外资法,制定了外资引进及与之相关的确保海外汇款方针,以及引进外资的认可手续。此外,设立了作为经济安定本部外围组织的外资委员会,对需经内阁会议决定的重大的外资引进项目进行预审。1951年4月,外资法修改后,明确了准许、申报外资的形式,保证了红利一本金的汇款。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要避免因引进外资而发生支付过多的外汇利息、汇款等风险。为此,由政府出面,统一管理未来将支付外汇的外国资本和引进的外国技术。与此同时,建立了一种在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保证红利、本金、技术使用费之类的外汇汇款制度。

1952年3月,根据议员提案,制定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这正是在和平条约即将生效的前夕。该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3条:

(1) 对一定的试验研究,发给补助金,提供政府所有的设施。对试验研究机械设备等实行特别折旧和减免固定资产税。

(2) 允许重要产业的现代化机械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和减免固定资产税。

(3) 促进道路、港湾等有利于企业合理化的产业相关设施的建设。

第3条促进道路、港湾等产业基础社会资本的形成,也是一种重要的产业扶植政策。

1956年制定了工业用水法,在对用水困难的特定工业地区

利用地下水进行规制的同时，对工业用水的建设费用，提供国库补助。工业用水建设资金的四分之一由国库提供资助，增加了建设项目。这对大量用水的钢铁、化学、纸浆等产业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补助。从防止因利用地下水导致地基下沉这方面来说，这一政策带有防止破坏环境对策的性质，但由政府来对必要的工业用水建设资金进行补助，从负担公正的观点来看，是有问题的。在后来水质污染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压低工业用自来水费用的政策，被批评为是帮助企业用大量的水来稀释排放污染物质。

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要求在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这些原有工业区发展的同时，再在京叶地区、大阪港以及濑户内海沿岸等地建造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地带。在 50 年代后半期到 60 年代政府产业政策中，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作用大大增加。

抑制进口和限制竞争

第四个政策措施是通过抑制进口等措施来限制竞争。

对进口贸易，根据 1949 年 12 月公布实施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实行严格控制。该法规定，企业出口所换取的外汇，全部上缴政府。另一方面，对用于进口等所需的外汇的使用，要控制在政府允许的外汇预算额度内。出口原则上是自由的，但对进口，政府只提供许可的这部分外汇。这种外汇预算分配制度，一直维持到 1964 年，随着贸易汇兑自由化方针的实施而告废除。外汇预算制度，正式的目的是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外汇，但实际上起到了通过限制进口，保护日本各产业的作用。

限制进口的一般手段就是确立关税率体系，这也是当时的一大课题。

关税率自 1926 年(大正十五年)作过一次一般性的修改后,未作过大的修改。战前战时也只修改了一小部分。因通货膨胀使进口物价暴涨,从量税制的关税额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必须改为从价税。修改关税率的工作,是参照占领军的意见,于 1948 年左右开始的。1950 年 1 月,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关税率纲要。从 1951 年 5 月起,实施新的关税率。确立了保护国内产业的关税率体系。调低了国内产业需要使用的原料、燃料及重要机械的关税,调高了与国内产业有竞争关系的高加工度的外国产品的关税。

外汇分配制和关税这类保护政策,大大促进了战后日本产业的恢复与发展。很多重要产业,在保护政策下,赢得了合理化的时机,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例如,对小汽车采取了近似于禁止的限制措施。除特别用途外(1952 年以前,为外国人使用,后来为公共机构和新闻报道机构),不允许进口。当时,国民的收入很低,小汽车市场很小。在国内汽车产业随着市场的扩大得到发展之前,限制进口是必要的。根据外资法,既要严格控制外资的引进,也要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日本。这一阶段,各汽车公司都引进欧洲技术来推动合理化,以增强竞争能力。小汽车的进口(整车)是在实施自由化的 1965 年 10 月。进口实行自由化后,没有多久,关税率就高达 40%。

政府不仅抑制进口,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日本,而且还以振兴出口和合理化为理由,限制国内企业相互之间发生竞争行为。

1952 年 8 月公布的出口交易法,以防止不公正的出口交易,谋求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为理由,允许同行业的出口单位缔结协定和组织出口同业协会。这种卡特尔行为不受“禁止垄断法”的约束。该法于 1953 年 8 月改为进出口交易法,在出口交易扩大

的同时,也允许组织进口同业协会或缔结进口协定。

1954年6月,公布了硫酸铵工业合理化以及调整硫酸铵出口临时措施法,设立了出口垄断机构——日本硫酸铵出口公司。作为增产粮食对策而得到扶植与恢复的硫酸铵工业,到50年代,供过于求的局势趋于明朗化,因此,促进硫酸铵工业的合理化和出口就成为当时的一大课题。在这一形势下,也允许其不受“禁止垄断法”的约束,组织卡特尔。这一时期制定的各个产业的合理化促进法,同样都不受“禁止垄断法”的约束。煤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1955年)、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纤维工业设备临时措施法(1956年)、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生丝制造设备临时措施法(1957年),就是其中的几例。

煤矿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采用了开设坑道口许可制,以应付煤炭萧条和促进合理化。在该法制定的同时(1955年8月),还制定了重油锅炉设置限制法。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为加快设备现代化,提高技术水平,对特定机械工业合理化基本计划的制订,以及限制生产品种等共同行为的指令,都作了规定。第二年作了修改,把与船舶有关的工业,以及一部分与铁路车辆零件有关的工业也列入其范围。纤维工业设备临时措施法,是以摆脱纤维产业萧条,解决过剩设备为主要目的的,允许通过共同行为,处理过剩设备,实行设备登记制度。电子工业临时措施法,对通产大臣制定电子工业振兴计划,以及限制品种实行共同行为的指令等,作了规定。

这一时期,不同产业的特别法,一方面具有扶植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这类潜在性发展产业实行合理化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促使煤矿业、硫酸铵工业、纤维工业、生丝制造业这类结构性萧条产业实行转换的性质。

一言以蔽之,产业合理化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对策,一方面

是为产业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为避免产业因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夕阳化。

3. 能源、海运、造船

电源开发

50年代,政府的财政资金投入最多的产业是电力产业。

日本开发银行,1957年度末的贷款额为 2902 亿日元,其中 1550 亿日元投入了电力产业,占 53.4%。除此之外,还向国策公司的电源开发公司(电发)及国营发电公司、私营发电公司提供财政资金。对电源开发公司,通过产业投资特别会计和资金运用部投入了巨额的投融资。从 1955 年度的贷款金额看,提供给电力公司的财政资金(开银贷款)为 224 亿日元,投入电源开发公司的财政资金为 270 亿日元。另外,在这一年度,还通过政府担保从世界银行筹措外资贷款 57 亿日元。

政府之所以竭尽全力注重电源开发,是因为考虑到,增加电力供应是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降低电源开发的成本和抑制电费是加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所以把低利率的财政投融资和外资优先用于电源开发。

50年代前半期的电源开发政策,以发展水力发电为主。在 1950 年度的总发电量中,水力发电的比重占 82%。基本上维持战前的以水力发电为主的电力供给结构。1951 到 1955 年度,水力发电占 61%。电源开发公司的佐久间(天龙川)、田子仓·奥只見(阿贺野川)、御母衣(庄川)以及关西电力公司的黑部川第四等发电所,都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它们都拥有 20 万到 40 万千瓦级的大规模设备,是一种崭新的水库式水力发电所。战后,由于不断引进大型的土木建设机械,因此,使大型水库的建设

成为可能。然而，在山间僻冷地区施工，工程难度较大，经常发生事故，造成了很多工人伤亡。

到50年代后半期，火力发电开始超越水力发电。尽管水力发电的技术在提高，发电设备也得到了更新，但随着水力开发规模的扩大，适合于水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而火力发电设备，依靠进口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之类的机械，通过不断引进技术，技术革新的步伐大大加快了。结果不仅可以建设依靠高温、高压蒸汽的大容量的火力设备，而且还降低了成本。和水力发电相比，火力发电工期短，能够更好地适应电力需求的增长。一组火力发电机组的发电容量，战前最高为7.5万千瓦，但50年代后半期，东京电力千叶火力发电所一号机组，就达到12.5万千瓦。到60年代后半期，东京电力姉崎火力发电所，一组为60万千瓦的大容量机组开始投入运转。

技术革新加之50年代和60年代稳定的石油价格，使火力发电占相当优势。战后初期的火力发电都是用煤的，但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就建造了很多专烧石油（主要是重油）的火力发电所。

从水主火从到水火并用，进而再向火主水从转换，改变了现实的电力开发状况。火力发电也实现了从煤主油从到油主煤从的转换。后来，又转向以火力发电和原子能发电为主，水力发电为辅。火力发电和原子能发电，机组一经运转就很难进行小负荷运转或停止运转。而水力发电却比较容易实行这种变换，所以，把火力发电作为供电的基础，使水力发电成为一种方便的、灵活调节供给量的手段，应付白天和夜间以及季节性的变动。为此建造了扬水式的发电所，在用电低谷时，用多余的电力把水汲到上游水库储存起来，准备在高峰时用。

发电量，1950年度为463亿千瓦，1960年度为1155亿千瓦，

1970年度增加到3595亿千瓦。50年代的10年中增加了1.5倍，60年代的10年中增加了2.1倍。

煤炭产业合理化

煤矿业，在40年代后半期的恢复时期，作为国产能源中不可缺少的资源，发挥了很大作用，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然而，到50年代，与其确保产量还不如通过合理化来降低成本却成了煤炭行业的课题。在此情况下，政府推行了煤炭合理化政策。然而，国产煤同进口煤和石油相比，在质量和成本上都居不利地位。随着贸易正常化，日本经济加入国际分工行列，日本的煤炭产业却走上了衰落之路。经济的发展与国际化的飞速进展，加快了煤炭产业的衰落。

日本的煤矿，大多分布在北九州一带(包括山口县)、北海道、常磐(福岛县东南部及茨城县东北部)。仅大企业就有18家，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小煤矿。中小煤矿的效率大多数是很低的。在原煤(用于制铁的原料、焦炭)和发生炉用煤等领域，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以上，但普通煤的市场50%左右为中小煤矿所占有。

政府根据1955年实施的煤炭行业合理化临时措施法，为防止建立新的低效率煤矿，制定了开设坑道口的许可制，并决定收买、整顿低效率煤矿。为开展收买、整顿工作，设立了煤炭行业整备事业团。既以提高整个煤炭产业的效率为目的，同时又具有防止因竞争产生价格下跌，改善煤炭企业经营的愿望。为援助效益良好的煤矿引进新型机械，以改善竖坑开凿及其他开发工程设施，通过日本开发银行为这些企业提供了财政资金。但是，由于煤炭行业在战后恢复时期，是接受复兴金融贷款最多的产业，所以，从1952年度以后，还债额要多于来自开发银行的新

贷款。

合理化节约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1953到1956年这3年间，出煤量从4354万吨增加到4828万吨，增加约11%，工人从33.1万人减少到28.3万人，减少约15%。人均每月出煤量从11.0吨增加到14.2吨，约增长30%。

合理化并不能挽救衰退的煤炭产业。煤炭生产在整个50年代，虽多次出现因景气而引起的变动，呈少量上升趋势，但与整个日本经济日趋扩大的规模相对照，却表现出明显的停滞色彩。煤炭产量1950年是3846万吨，1955年是4242万吨，1960年是5107万吨。把每5年的增长率折算成年率，50年代前半期为2%，后半期为3.8%。

在推行煤主油从政策时，用于电力行业的煤炭，其需求是比较稳定的，但普通煤由于受经济繁荣变动的影响，需求变化很大，逐渐因供过于求而导致价格下跌，加上偏偏遇上加速向石油转换，使需求进一步缩小。煤矿公司的经营开始恶化，中小煤矿纷纷倒闭，连大企业也裁减人员。在这一衰退过程中，发生了多起激烈的劳资纠纷。

石油产业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世界处于石油供应迅速增加的时代。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陆续开发的中东油田，扮演了提供大量廉价石油的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20世纪美国型石油文明迅速波及欧洲和日本的时期。它使各工业发达国家的能源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石油的需求大大增加。作为石油依存型文明代表的汽车产业，美国在战前就迎来了它的成熟期。但欧洲是伴随着战争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是在战后经过一段时间后，才正

式发展的。20年代后,在美国作为石油精制的副产品而得以发展起来的石油化学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开始普及到了欧洲和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石油业,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在消费地区发展精制产品以及运输、储备、精制设备的大规模化。在战前的石油贸易中,精制后的石油产品占很大比重,但战后变为以石油为中心。用大型油轮把产油国的大量原油运送到消费地区,在那里利用大规模的精制设备进行精馏。

日本从战前开始,石油就大量依赖进口,但进口的60—70%是石油产品。战后,进口的石油大部分为原油。

在地球上,生产石油的地区是有限的。在勘探石油时要冒很大的风险与化费很多成本。因此,石油产业的很大一部分市场为国际上富有实力的企业所控制。尤其是人人皆知的七大石油公司,几乎控制着世界市场。它们是美国的埃索标准石油公司(后改名为埃克逊),莫比尔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英国的不列颠石油公司,以及英国—荷兰合资的壳牌石油公司。七大石油公司开展综合性经营,涉及石油产业的采掘、运输、精制、销售各部门,营业活动网遍布全世界。据说战后初期,99%的中东石油,掌握在他们手中。

七大石油公司结成了国际卡特尔,协调活动范围,竭力在全球维持石油价格。尽管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石油价格一直是比较稳定和便宜的,甚至呈现下跌趋势。中东油田的大量开发,导致石油供应趋于过剩。伊朗政府把不列颠石油公司系统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53年)的举动表明,产油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大大高涨,这些削弱了国际石油卡特尔控制市场的能力。产油国资源民族主义意识的进一步高涨,从

而导致石油价格进入70年代后大幅度提高。

日本的国产原油少得可怜，精制技术也相当落后。战后重建石油产业，必需得到以国际大石油资本为主的外资的提携。日本的石油精制设备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沿岸，战后，在美军占领时，被下令全部关闭。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残留设备，本打算作为赔偿的对象。后来，随着美国对日政策从非军事化转向重建经济，太平洋沿岸的炼油厂1949年7月才允许重新开工。

能源革命

1949年2月到7月，日本原有的各石油公司开始与外资企业实行合作。例如：东亚燃料工业公司与埃索标准石油公司及莫比尔石油公司合作，日本石油公司和兴亚石油公司与加尔得克斯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合资的企业）合作，三菱石油公司与美国的潮水石油公司合作，昭和石油公司与壳牌石油公司合资。日本富有实力的石油公司都置于外资系企业的系列之下。外资合作的形式，有参与总公司持股的，也有在精制部门搞合资经营的。外资持股率高，经营权大。这些外资的参加，为原油的稳定供应和精制设备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引进技术和筹措资金的道路。

后来，没有外资的“民族系”石油企业也发展起来了。通产省从保障能源供应的立场出发，竭尽全力扶植“民族系”的石油企业。出光兴产、丸善石油、大协石油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出光兴产公司利用1953年伊朗政府和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发生纠纷的机会，收买了伊朗接管的石油公司，从此兴旺发达。50年代后半期，在石油化学工业实行企业化的同时，从事石油精制的企业增加不少。

日本的石油产业是一种由众多企业组成的产业组织，相互

间的竞争很激烈。长期以来,原油进口受政府外汇预算的控制,外汇的分配取决于实际处理原油的能力与销量,因此,各公司为增加实际业绩,都尽可能进口廉价原油,扩充现代化设备,努力促进销售。石油产业中企业之间的这类竞争,使日本石油产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从而缩短了石油替代煤炭的过程。

50年代,由于汽车还未普及,日本的石油市场上,重油占很大比重,与美国相反,形成了一种重油贵,汽油便宜的价格体系。政府实施的煤主油从的政策,虽然限制了重油的使用。但因为煤炭价格昂贵,石油产业即使有重油价格偏高之因素,也还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进入60年代以后,电力产业的能源需求结构转变为以石油为主,加之汽车的迅速普及,石油需求迅速增加。家用能源、暖气设备及其他用品,也开始转向主要使用石油。

1953年度,国产煤炭占一次能源供应量的46.8%,进口石油只占17%。但10年后的1963年度,国产煤炭的比率下降到24%,进口石油的比率上升至51.2%。在再过了10年后的1973年度,国产煤炭的比率仅占3.8%,进口石油又上升至77.4%。此外,令人注目的是进口煤炭大大增加。1968年度,进口煤的比率和国产煤大致持平,以后,就大大超过国产煤。

海运业和计划造船

50年代,海运业是仅次于能源产业,也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的产业。1957年度末,在开发银行贷款中,海运业占31.5%。从1952年度末至1957年度末,在增加的贷款资金中,海运业的比率为36.3%。

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的1940年底,日本拥有798条远洋船只,总吨位达460.6万吨。战败后的1945年底,剩下的远洋船只仅有17条,总吨位下降到10.6万吨(不包括战时赶制的标准

船)。

1942年3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政府根据战时海运管理条例,设立了船舶经营会,集中管理民间海运公司的船舶,实行一元化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一直维持到恢复时期。除沉没的,把海运公司所有的船舶都征用来为军事服务。征用和沉没的,给予战时补偿。根据战后的占领政策,中断了战时补偿。占领初期鲍莱提出的日本赔偿计划(1946年4月),把仅剩的船舶也作为赔偿的物资,并对以后船舶的建造规模也进行了限制。直到1949年,还规定新建船的船型和速度。禁止开设定期的海外航线。允许恢复远洋航行是在1951年。

在这种制约环境中,政府制定了重建海运业的扶植政策。1947年5月,设立了船舶公团。以船舶公团和各海运公司的船舶共有的形式,利用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开始推进“计划造船”。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废除后,又利用回流资金。1950年3月,撤销了船舶经营会和船舶公团,所有的船舶,全部归民间海运公司管理。计划造船的财政资金则接着由日本开发银行提供。50年代,财政投资的比重,占所需建设资金的50%左右。1948到1958年度,国内建造的船大部分是计划造船。然而,以其他形式建造的船只也在增加,船舶出口迅速增加。

虽然得到政府的扶植,但海运公司的经营并没有改善。由于受战后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这一政策思想的影响,采取了对希望造船的公司,尽可能平等地提供贷款的政策,结果海运业的集中程度和战前相比,明显下降,竞争激化。50年代,在计划造船时,接受财政资金贷款的企业数达64家。三菱财阀的日本邮船和住友财阀的大阪商船,在战前的日本海运业中占相当优势。两公司拥有的船只占日本全部船只的近30%,运输船的载运量占40%以上。战后,由于新兴企业的迅速发展,到50年代末,这两

大公司拥有的船只在日本全部船只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10%,运输船的载运量下降至近20%。

世界海运业的发展,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很多国家都把扶植海运业作为国策。希腊系船主等实力雄厚的企业,利用一些国家实行以租税优惠措施来诱导船主的“权宜选籍船”制度^①,以低廉的运费,积极开展国际竞争。

日本的海运企业,在造船成本还相当高的时期,依靠计划造船,建造了一大批船只,并拥有很多造价高的船舶。但由于大部分造船资金来自开发银行和民间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此,支付固定的利息便成为海运公司的巨大负担。为减轻海运公司的利息负担,1953年度,政府实行了利息补助制度。它是战前曾经实施过的奖励建造新型船舶利息补助制度的再现。利息补助制度在1957年曾一度被取消,1960年度再度恢复,并进一步得到加强。

为实现量的扩大政策向改善经营的政策转变,1963年7月,政府通过海运业重建整備临时措施法的制订和建造远洋船舶贷款利息补助法的修订(以上为重建海运二法),促进了海运业的集中化。由于采取只向企业集团提供财政资金贷款和利息补助这种强有力的诱导政策,从而加速了通过合并与系列化所形成的六大集团的建立,形成了下列骨干企业(数字为1964年的,包括系列、所属企业集团的总的船只和总吨位数)。

日本邮船(日本邮船和三菱海运,153条,229万吨),山下新日本汽船(山下汽船和新日本汽船,84条,112万吨),昭和海运(日产汽船和日本油槽船,55条,102万吨),川崎汽船(川崎汽船和饭野海运,103条,154万吨),大阪商船三井船舶(大阪商船和三井船舶,197条,232万吨),日本航线(日东商船和大同海运,

^① “权宜选籍船”制度,就是船主可以到在税金等方面给予方便的国家进行登记,成为外籍船,以便雇用工资低廉的外籍船员。——译注

65条,107万吨)。

日本远洋商船的运输船舶,1960年时拥有的数量,大致接近战前水平,总吨位数超过战前。每条船的总吨位数的直线上升,反映出战后的钢船趋向大型化。虽然载运量在增加,但在进出口贸易上,日本船舶的装卸率要大大低于战前。战前1935年的装卸率,出口为65%,进口为55%。战后1950年,出口为17.3%,进口为26.8%。到1960年,出口上升至52.4%,进口上升到47.5%。然而,到1970年,出口又下降到38.6%,进口下降到44.6%。

造船业的发展

计划造船对战后日本造船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战前,日本政府就重视建造军舰和扩充战时运送士兵、物资所必需的本国商船队,扶植造船业。在建造军舰方面,日本的造船业已达到和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水平。战舰武藏号和大和号(标准排水量达6.5万吨,时速为27.3海里,于1941到1942年建成,建造单位是吴海军工厂和三菱重工业长崎造船所),在以空战为主的太平洋战争中成为无用之物,没有取得任何战果,就被美国空军击沉。但是,战前日本在造船技术上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战后被继承了下来。

在设备遭受战争破坏,占领政策又要把日本引向非军事化的战后初期,根本没有想到还要重建造船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也很可能散失。在这种背景下,初期的计划造船,便成为重建造船业的开端。

各造船公司通过从欧美引进技术,加快技术革新步伐,在船壳建造方面,实现了从使用铆钉工艺到全焊接整体建造工艺的转变。美国在战争期间,使用这一工艺建造了大量的军舰和运

输船只。由于采用全焊接法,既节约了大量钢材,又减轻了船体重量,实现了安全不透水、不透油的密封化,延长了船体的寿命。由于解决了钢材的叠合和铆钉头外突的问题,使得速度问题也迎刃而解。但是,在全焊接工艺方面必需解决许多疑难问题。在发明初期使用时,甚至连美国也曾发生过全焊接船的船底断裂之类的大规模损伤事故。战后,日本也发生过采用全焊接工艺建造的大型船只发生断裂,从而导致沉没的海运事故。由于把电子技术应用于设计制图、钢板切割及加工等领域,才做到了大幅度缩短工时,降低造船成本,建造超大型的船只。超高温高压的汽轮机和大型船舶用的大马力柴油机也是不可缺少的。各公司相继从美国、联邦德国、瑞士、瑞典、英国等国引进锅炉、汽轮机、柴油机设备的制造技术。钢铁业在开展合理化时,也革新了炼钢、压延技术。正是由于钢铁业、造船业的共同开发,才可能廉价地提供优质的钢材。

通过这一系列技术革新,日本的造船业顺应战后国际海运业的变化,获得了飞速发展。实现了油轮和专用矿石船的超大型化,并遥遥领先于其他造船国。在战后的海运业中,石油和铁矿石之类运输迅速增加,专用船的运费收入占全部收入的一大半。船舶建造也主要趋向于超大型的专用船。

战前的大型油轮,最大的容量也只有 1.2 万重量吨。但战后初期的 1947 至 1948 年,就开始建造 2.8 万吨容量的油轮,在这以后,容量进一步增大。到 70 年代,竟能够建造 50 万吨容量的油轮。在建造这些超大型油轮的竞争中,日本造船业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日本造船业于 1956 年超过英国,居世界之首,60 年代,发展成为占世界钢船建造量 50% 的造船大国。

1961 至 1965 年这段时期,出口船舶占钢船下水量的比重为 48.4%。这一比重还不断上升,到 60 年代后半期,出口船舶上

升至60%，70年代前半期更上升至70%。

政府为促进出口而设立的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由于被外国船主利用，从而促进了船舶的出口。造船业的竞争推动了技术革新，降低了船价。其中包括一开始以运送日本进口物资为目的的，委托对方国船主建造出口船舶的做法。这种船舶出口的做法，意味着会加强日本海运业竞争对手的实力。然而，这一做法却保证了日本造船业扩大市场。

战前，日本造船业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建造军舰。战后，这一支柱为建造出口船舶所取代。日本造船业作为出口产业得以发展。

正因为造船业有着战前的历史，所以形成了不少旧财阀系的企业和以强有力的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随着造船业的重建和发展而发展，但其基础却发生了变化。战后，日本造船业实现了根本的转变，从一个战前只接受财阀系海运企业的订货或依赖于建造海军军舰的封闭性的产业，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市场的开放性的产业。

然而，造船业是一个易受繁荣和萧条影响的产业。各企业在扩大造船部门的同时，为应付萧条，也致力于扩建陆上建筑的部门。战前，造船业就建造了许多桥梁之类的构筑物。战后，造船业又开始从事重型机械和成套设备的制造和建设。一部分还参与了复活的军事工业。三菱重工业（旧三菱重工业系3个公司1964年合并）、石川岛播磨重工业（1960年石川岛重工业和播磨造船合并）、川崎重工业、日立造船、三井造船等实力雄厚的企业，既是日本造船业的骨干，又是各种建设设备和工业机械产业的核心企业。

4. 钢铁、化学、机械工业

钢铁业的合理化

钢铁业和煤炭业一样，都是政府最早制定合理化计划的产业部门。后来，钢铁业的合理化投资超出了政府预料和计划的规模。

1951年2月制定的钢铁业设备合理化三年计划（后被称为第一次合理化计划），预定在1951至1953年度这3年期间，投资628亿日元，但实际投资额，包括到1955年度为止的追加投资项目，共达1204亿日元。投资额膨胀的一个因素，是朝鲜战争后物价上涨，但实际规模也确实大大超出计划。1956年度开始实施的第二次合理化计划，当初预计5年共投资1780亿日元，但实际投资额达4434亿日元。60年代又实施了第三次合理化计划。

实施初期，政府虽有制定计划的主动权，但投资权在私人企业手里。企业经营者的竞争性战略决定投资的内容和规模。称之为“计划”，并不是指令性的，只不过是把私人企业的投资计划综合成目标值而已。

合理化投资之所以大大超出原定的计划，是由于下述几个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钢铁业的产业组织，具有加强企业间竞争的性质。日本制铁公司的分割与彻底实行民营化，导致八幡与富士两制铁所之间开展竞争，与此同时，又促使这两大企业再与其他钢铁企业展开竞争。

第二，技术革新与设备的大规模化，使建设最先进的大型工厂成为竞争中不可缺少的手段。经营者希望扩大需求，并预料

到通过技术革新和设备的大规模化会给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带来很大效果,因此,纷纷建造最先进的大型工厂。

第三,钢铁需求的增长比预计的还要快。这是由于造船业等原有需求钢铁的产业的发展,高速增长下高设备投资及公共投资所带来的与建设相关的钢铁需求大量增加,以及电机、汽车等新型机械产业的发展等各种因素复加在一起而造成的。

在实施 50 年代的合理化计划过程中,企业间的竞争导致技术革新投资出乎意料地上升。尤其是原来使用平炉的钢铁企业,积极参与使用高炉的一贯制生产,对扩大钢铁业的合理化投资起了主导作用。

战前与战时,只有日本制铁和日本钢管两家企业实行炼铁、炼钢、轧钢一贯制生产。日本制铁是官营八幡制铁所(1901年〔明治三年〕开工)和几家民间公司合并后,于 1934 年设立的一个半官半民的国策公司。通过这次大合并,原有大财阀系钢铁企业中的三井(轮西〔室兰〕、釜石)和三菱(朝鲜的兼二浦)的企业,被日本制铁所吞并。战后,日本制铁被分割成八幡、富士两家制铁以及多家企业(1950年 3 月)。八幡制铁继承八幡制铁所,富士制铁继承室兰、釜石、广畑等工厂。日本钢管是在 1912 年创建的,它是为了顺应东京市区面积的扩大,需要大量钢管而建造的。1936 年建成高炉后,实现了炼铁、炼钢、轧钢一贯制生产。

对被称为关西平炉钢铁企业的住友金属、川崎制铁、神户制钢 3 家企业来说,确立钢铁一贯体生产,已是战后的事了。住友金属在战争期间,曾计划和歌山建造钢铁一贯制工厂,甚至连厂基都已开始建造,但战败使其前功尽弃。战前,这些企业既利用官营八幡制铁所或半官半民的日本制铁提供的生铁,也利用进口的生铁和废钢铁。战后,在占领初期,由于丧失了作为铁矿

石供应来源的中国,可以想象得到,原材料很难到手。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严格控制炼铁部门的发展,依靠进口生铁开工。然而,作为生铁供给者的旧日本制铁,分割后,已成为民间性企业,与平炉钢铁企业处于一种竞争关系,因此,进口生铁显然就成为一大难题。随着从海外进口铁矿石这一前景展望的确立,企业更急于建造钢铁一贯制工厂。

领头的是川崎制铁。川崎制铁是在解散财阀的过程中,川崎重工业的炼钢部门分离、独立出来的企业。技术人员出身的社长西山弥太郎,感到葺合工厂(神户市)有它的局限性,因此,决定在关东建造新工厂。1950年11月宣布,在千叶市填海造地的旧军用场地建造新工厂。1953年6月建成高炉,点火生产。1954年炼钢、轧制部门开始投产。

对川崎制铁建设新工厂的计划,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有关人士以及创业的3家公司(八幡、富士、日本钢管)的领导都一致表示反对,认为设备规模过大。日本银行的总裁一万田尚登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千叶工厂的地皮将杂草丛生”。然而,西山坚信最先进的大型工厂定将带来经济效益,并对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渝。

钢铁业的发展

川崎制铁千叶工厂是一座效益良好的一贯制工厂。拥有原料装卸深水码头、预处理矿石、焦炭生产、炼铁(高炉)、炼钢(平炉)、轧制等各类工厂及产品装运码头,布局合理。它成为后人在沿海建造先进的大规模制铁所的典范。川崎制铁千叶工厂建造的大型高炉、平炉,在当时是创纪录的。轧钢设备方面,以薄板连续轧制为主。

早在30年代,美国就采用了薄板连续轧制工艺,以适应汽

车、电机等行业大量需求薄板的形势。旧设备是在一副轧辊上，反复操作，轧制钢材。薄板连续轧钢，就是在一个很长的厂房里，并排放着很多轧辊，钢板朝一个方向移动，在很快的速度下连续轧制。钢材市场也从过去的造船、重型机械、军需等以厚板为主的需求，朝民用机械和建设材料等以薄板为主的需求转换。在第一次钢铁合理化计划实施期间，以薄板连续轧制设备为中心的新型轧钢设备的投资占很大比重，不仅限于川崎制铁一家。

除川崎制铁外，其他企业只埋头于修复、改造与炼铁、炼钢有关的原有高炉，建造矿石烧结（铁矿石预处理）设备，推进平炉的大型化，唯有轧钢部门是新建的。在这一时期，住友金属和神户制钢没有建新厂，而是通过吞并小规模高炉炼铁厂，或通过系列化，努力确保生铁。1953年，住友金属买进了小仓制钢的股票，吞并了小仓制钢。1956年，神户制钢乘尼崎制钢陷于经营危机之际，又买进了其子公司尼崎制铁的股票。

第一次合理化计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机械和技术引进。这个时期，与普通钢有关的、享受租税特别措施规定的折旧待遇的合理化机械，设备投资总额为348亿日元，其中约60%的213亿日元，是用来进口机械的，而且大部份是引进轧钢设备。

50年代后半期，第二次合理化计划实施后，设备更趋大型化。这一时期，炼钢部门还引进了纯氧顶吹转炉炼钢工艺。

奥地利是在1953年使用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工艺的，日本于1957年引进该项工艺。

转炉炼钢就是把融解的生铁注入西洋梨式的炉子里，然后注入空气，使生铁中的不纯之物燃烧殆尽，炼出钢材。生产钢的时间比平炉短，成本低，但由于质量不如平炉钢，过去炼钢部门

主要还是采用平炉炼钢。然而，正是因为发明了以注入纯氧来取代空气，从而获得优质钢的工艺，才使得炼钢部门转向以转炉为主。由于日本的钢铁业是在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所以，炼钢部门的转炉比率遥遥领先于其他钢铁生产国，在效率上占优势。

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各公司都热衷于建造新型的炼铁厂。八幡制铁在户畑、君津，富士制铁在名古屋(属东海制铁)、大分(上述两企业于1970年合并为新日本制铁)，住友金属在和歌山，神户制钢在滩浜，日本钢管在水江、扇岛(都在川崎地区)和福山，川崎制铁在水岛，都建造了先进的钢铁厂。各种创纪录的大型设备不断被刷新。战后崛起的3个一贯制企业，其市场占有率超过了战前就创业的3家企业(八幡、富士、钢管)。1951年度，在粗钢产量上，八幡、富士、钢管3家企业所占比重为58.8%，但到1961年度，比重下降到48.9%。

由于各公司向多元化产品发展，各种轧制钢材品种的垄断程度降低，竞争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既体现在设备投资的扩大上，也体现在把技术革新的成果用在降低价格上。它成为扩大钢材使用范围，扩展市场的主要因素。

日本已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钢铁生产王国。1950年制定第一次合理化计划时，粗钢产量只有484万吨，但到10年后的1960年，就增加到2214万吨，增长了3.6倍。再10年后的1970年，一跃为9332万吨，增长了18.3倍。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时的1973年，更创造了11932万吨的纪录。

石油化学工业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形成了石油化学工业，化学工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石油化学工业产生于20年代初期的美国。最初是为了适应汽车用汽油需求的增加,从石油裂解设备的废气中,提炼飞机用涂料溶剂和汽车引擎的冷却水防冻剂着手的。

在这之后,世界最大的化学公司,杜邦公司发明了尼龙,于1938年开始销售。其宣传广告为:“尼龙是一种比蜘蛛的丝还要细,比钢铁还要硬,由空气、水和煤合成的纤维”。其原料,战后从煤转换为石油。英国帝国化学公司,从1939年开始生产聚乙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雷达的绝缘材料。东南亚被日本占领后,中断了天然橡胶来源的美国,把合成橡胶的研究作为国家项目,促进合成橡胶的企业化。除此之外,还发明了多种合成高分子材料,如聚脂、丙烯纤维、聚苯乙烯、聚丙烯等,成为战后石油化学工业的主力产品。

日本从50年代初期开始重视引进石油化学工业。棉花、羊毛全部依靠进口的日本,为促进取代天然纤维的合成纤维的国产化,必须扶植石油化学工业。当初曾像美国那样,想利用石油精制废气,但由于日本对汽油的需求很小,废气的量也少,最后采用了石脑油裂解方式。

通产省于1954年11月,设立了由化学行业、学术界代表以及有关官员组成的石油化学技术恳谈会,从事技术性探讨,于1955年7月,制定了“石油化学工业扶植对策”。主要内容如下:

- (1) 由日本开发银行提供设备资金贷款。
- (2) 利用设备的短期折旧租税特别措施。根据重要物品免税制度免除法人税。免除原料石脑油的挥发油税。
- (3) 允许引进外国技术。确保进口机器的外汇分配和免除进口税。

虽然各化学公司都制定了实施计划,但在通产省看来,工厂

规模还是太小。通产省认为，石脑油裂解方式会产生众多系列产品，必须实施多角化，如果各种设备规模不俱全，就会缺乏国际竞争能力。为此，通产省调整了各公司的计划，形成了由多数企业组成的联合企业。通过这类行政指导，使建设下列四大联合企业的计划得以落实。

(1) 川崎地区的日本石油、昭和电工集团。(2) 四日市地区的三菱集团。(3) 岩国地区的三井集团。(4) 新居浜的住友化学。

三菱、三井两集团，利用拍卖处理的旧军工燃料厂的场地，分别由同系企业共同出资新建了三菱油化和三井石油化学。在技术上，两公司都全面依赖从外国引进。甚至出现过要求美国的化学公司以技术作为资本，开办合资公司的事例。

第一期石油化学工业化计划，实施于 1957 到 1959 年。从这以后，很多新形成的集团，如东亚燃料(川崎)、丸善石油(市原)、三菱化成(水岛)、出光兴产(德山)、大协石油(四日市)等都在加紧实行企业化。原有的集团也因为面临着工厂布局受限制等问题，开始建设第二个联合企业。

第一期石脑油裂解装置，在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下，已达到了具有当时国际竞争力的规模。年产乙烯已实现 1.2 万到 2.5 万吨的水平。到 60 年代，由于各种装置的迅速大型化，年产乙烯都力求在 30 万吨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发展，引起了由大气污染导致健康不良这类深刻的公害问题，并发生了爆炸等工伤事故。在静冈县的沼津、三岛一带，甚至发生过当地居民反对建厂的运动，从而导致企业不得不撤销建造联合企业计划的事。

初期的石油化学联合企业，主要生产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合成橡胶、氧化乙烯之类的固有的石油化学产品。后来，很多原有化学产品从碳化物(煤和石灰石作原料)化学和煤化学

转向使用石油化学原料和制造方法,出现了氯乙烯、尼龙等新产品。化学肥料工业也开始从石油裂解中提取作为硫酸铵和尿素原料的合成氨氢。

日本的化学工业,由于采取联合企业的形式,冲破了因众多企业并存这种产业组织造成的制约障碍,实现了大规模化和多角化。为应付开创石油化学所要承担的风险,以集团形式设立了新公司。这种政策,保留了众多企业并存的特征,有时还起了助长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三菱、三井系企业中的新企业(三菱油化、三井石油化学等)和原有企业(三菱化成、三井东压化学等)是处于一种新的竞争关系。各企业都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可以发挥经营人才的才能;旧财阀集团的控制能力减弱了。

战后化学工业的竞争,由于内外环境都很激烈,所以,产品价格迅速下跌。企业的收益也因此而恶化,但新产品的普及和数量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的。

机械工业的发展

50年代,政府制定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其对象还包括各类机械工业。然而,当时,机械工业的发展战略是不明确的。对能否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起指导作用,大多数人持悲观意见。1950年4月,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作过如下解释:

“日本努力于扶植汽车工业是毫无意义的。当今是国际分工的时代。正因为美国可以生产价廉物美的汽车,所以,汽车依赖美国不是更好吗?”

他的讲话,从当时日本收入水平低和汽车市场狭小的角度来考虑,是很正常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就产生过汽车国产化的想法。随

着在中国大陆上战争局势的扩大,日本开始扶植陆军,重视生产卡车。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汽车产量只有50185辆(其中三轮卡车为4503辆)。和战前处于顶峰时期的美国的数量相比,只占1%。战后,占领军指令汽车工厂转为民用,允许开工,但必需限制生产数量。由于很难筹措到原料和零部件,所以恢复很困难。1949年,生产数量还只有55427辆(26727辆是三轮卡车)。

1949年因执行道奇路线,汽车工业也陷于严重萧条。丰田、日产、五十铃等汽车公司裁减了大量人员。掀起的罢工运动都以工会一方失败而告终,解雇了几千人。东洋工业和大发工业因生产日本独特的三轮卡车,经受住了道奇萧条的打击,而幸存下来,其他几家都淘汰了。

对汽车进口虽有限制,但国产汽车还竞争不过外国汽车。当时欧洲的小汽车,即使加上40%的关税,也还是能和国产汽车展开竞争。

丰田和作为中岛飞机后身的富士精密(后来的王子汽车、以后又和日产合并)是依靠自身的努力,从事技术开发和推进合理化的,但日产、日野、五十铃这几大公司都选择了走引进欧洲技术的道路。1952年,日产汽车与英国的奥斯汀公司签订了为期7年的合同,国产组装A40型小轿车。计划一开始采取进口全部零件的方式,以后逐渐提高国产零部件的比率。1953年,日野汽车和法国国营雷诺汽车公司签订了4C型小轿车国产化7年合同。五十铃汽车公司和英国露茨集团签订了“山貂”小轿车国产化7年合同。名列世界第一的汽车王国日本,当时也是以组装欧洲车的方法,学习技术,促进生产流水线合理化的。

在电机工业中,战后以生产半导体起家的众多企业,在道奇萧条时,大多数陷于破产,剩下的只是少数几家优秀企业。在道

奇萧条时期,大型电机企业也大量裁减人员,发生过劳资纠纷。大型的综合电机企业(东芝、日立、三菱等)一方面通过生产和开发与电力或普通企业的设备投资有关的重型机械,积累技术与资本,另一方面,致力于向家用电器部门发展。关西的松下电器产业、早川电机(这两家公司成立于1935年)、三洋电机(1950年成立)等新兴企业,迎来了开创发展家用电器市场的时期,战后创建的东京通信工业(现在的索尼)也冲出了试制阶段,开始了新的发展。

1953年,电视节目开始正式播映。当初,由于电视接收机的价格昂贵,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1955年,电视接收机的产量达13.7万台。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合理化带来的电视机价格的下跌,生产、销售的数量不断增加,到1958年,越过了100万台。

1950年,轿车产量为1600辆,四轮卡车为2.65万辆。到1960年,轿车产量增加到16.5万辆,四轮卡车为30.9万辆。二轮机动车1960年创生产纪录,约达150万辆。汽车工业是在国内发展的基础上,作为出口产业发展的。50年代前半期,电冰箱和洗衣机的生产规模还很小。然而,到1960年,电冰箱生产就达91万台,洗衣机达153万台,电视机达355万台。收音机生产,1948年达到807万台,以后就逐年下降。到道奇萧条时的1950年,下跌到287万台。可是,后来由于出口的大幅度增加,产量也大幅度增加,1960年增加到1285万台,1965年再度上升至2294万台。

50年代的出口产业

在汽车产业和电机产业处于摸索、徘徊的50年代,以中小企业为生力军的各类机械用品制造业和纤维产业,在创汇方面,

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机械用品方面,出口了大量价格比较低廉的小型产品,如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望远镜、照相机等。这类产品,依靠战前战时积累的智慧,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加上日本的低工资,在国际竞争中占优势。战争中,按照军需(瞄准器等)要求而开发的技术,促进了光学机械产品的发展。这类轻机械产品,之所以没有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拥有充分的市场,一方面是由于这类轻机械产品已经可以同工资水平很高的各发达国家的同行业相抗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发展这类轻机械产品的能力。

无论是轻机械产品,还是钢船这类重型机械,多半是在日本已成为一个“中进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时,世界上和日本处于同一层次达到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很少,所以,才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垄断性很强的供应者。后来曾有位专家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中进国的垄断”。

战前,日本的出口,是以纤维为中心的轻工业产品,其中有以传统的国产生丝、丝织品为原料的,也有以进口棉纱、棉织品为原料的。这种出口对老牌工业国英国构成了威胁。战后,在机械产业领域,同样也是以新兴产业国的姿态,挤进了各发达国家的市场。最初,轻机械产品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也大量出口彩色电视机这类技术密集的产品,后来发展到对轿车这类在美国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进行了冲击。

50年代,在作为代表性的出口产业轻机械产品中,多半是中小企业生产的。由于当时人们相信大企业的名牌,使中小企业无法向国内市场渗透,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就转而致力于搞出口产品,出现了不少专门生产出口产品的零星组装企业。

中小零星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大企业相比本来就低,到50年

代,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开。轻机械、纤维产品、杂货之类,当时的主要出口产品,多半是靠低工资维持的。

然而,要实现出口的稳步增长,就必需通过产品质量的改进来保持产品的信誉。另外,在工资水平逐渐增高的情况下,为使价格保持稳定,就必需提高劳动生产率。通产省为专门从事出口的中小企业,制定了标准化规则,对产业合理化、现代化,给予了热情的行政指导。

50年代,纤维产业仍是重要的出口产业。实行低工资的各类缝制品和轻机械产品一起,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和东南亚市场。

1953到1955年,美国发生了“1美元女式宽松衫”事件。美国的零售店大量销售来自日本的廉价女式宽松衫,1件1美元左右,遭到美国纤维行业的指责。这是战后日美之间发生的第一次贸易摩擦事件。日本缝纫企业的工资水平低,再以1美元兑汇360日元的汇率为前提,成本低是一个因素,但日本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互相压价,导致出口增加,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另一个因素。日本出口的女式宽松衫,1953年度为11.2万打,1.5亿日元,到1955年度迅速增加到505万打,92亿日元。

整个50年代,纤维产品在日本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机械产品之类的重化学工业品的比重却不断上升。这是因为,依靠产业合理化政策和主要产业的技术革新投资,重化学工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加强,生产能力也进一步扩大。在1950到1965年这15年中间,全部商品的出口额,增长到10倍左右,相比之下,重化学工业产品的出口额实际上增长到20倍。其中,机械产品类增长35倍。而相比之下,纤维产品只增长4倍。在出口总额中,重化学工业产品的比率,1950年为32%,1955年为38%,1960年为44%,1965年上升到62%。纤维产品的比率,从

1950年的49%下降到1965年的19%。机械类产品的比率,从1950年的10.5%提高到1965年的35.2%。机械类产品的品种,在国内市场发展、技术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5. 经济自立的战略

经济增长的前兆

50年代前半期,日本在政治上,致力于解决朝鲜战争,重整日本军备,缔结旧金山两个条约这几件大事。在经济上,这一时期确立了产业合理化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主要产业开展了合理化投资。这一时期形成的产业扶植政策体系,基本上一直维持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60年代,后来,它被批评为是过度的产业优先政策。

日本经济的发展超越了政策当局的规划和设想。政府对国内产业采取保护政策,虽采取了限制各产业之间互相竞争的政策,但事实上,使企业行为更富有竞争性。解散财阀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使产业体制发生了变化。财阀型所有者的集团统制瓦解了,私人企业在战略决策上的独立性增强了。各企业的经营者都寻求发展的时机,独自地开展积极的投资活动。

战前和战时,日本经济已开始向重化学工业化发展,但内容却偏重于军事、资金和生产资料。战后,大力发展以消费资料为中心的重化学工业化。

战后初期,国民收入水平很低,能源发展的机械产业也有限。钟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小型、廉价的机械类产品,最初是立足于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发展成出口产业。这些产品很多都是中小企业生产的。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这

类产业合理化政策,推进了这一领域范围内的产品标准化,起到了提高零件的精密度、改进加工工艺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一大批技术水平很高的中小机械产业,为电器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0年代,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大型的高价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洗衣机、冰箱、电视机之类的家用电器就是其中的代表。摩托车、轻型四轮车也开始向四轮轿车发展。合成纤维和塑料之类的高分子合成材料也实现了国产化,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确保了原材料。随着家用洗衣机的普及,石油化学工业提供的合成洗涤剂产量不断增加。这些重化学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非常显著。小规模工厂,因为产品的单位成本高,缺乏竞争力。技术革新的发展,使具有竞争能力的最低设备规模(最小适度规模)越来越大。各企业纷纷采取了建造大规模设备,积极开展大幅度降低价格的销售活动和开拓新市场的行动。设备投资的规模大大超过政府当局的设想和计划,生产能力扩大,经济得到发展。

与此有关的很多企业都加入了预计会迅速发展的产业领域。

在钢铁业,炼钢、轧钢厂开始建造作为生铁制造部门的高炉。各公司纷纷建设大型的钢铁一贯制工厂。汽车产业的两轮车和三轮卡车制造厂,打进了四轮车领域,渗透到了轿车部门。原有的化学纤维制造厂和纺织公司开始向尼龙、聚乙烯、丙烯等合成纤维部门渗透。化学产业在从煤化学、电气化学向石油化学转变的同时,开展多角化,形成了石油化学联合企业。在这种多角化、改进产品制造工艺的趋势中,发展领域的企业数大为增加,又助长了企业之间的竞争。

硫酸工业等夕阳工业,也不顾政府的劝告,在企业间展开了

激烈的竞争。各企业表面上接受政府的诱导和扶植，暗地里却推进设备的现代化和合理化，因为即便是这类领域，基本的手段，还是通过大规模化来带动成本下降。为此，尽管市场萧条，但因为实施合理化，设备规模还是在扩大。

当时，政府是抑制外国产品进口的，但主要企业意识到，要加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在未来实现自由的国际竞争，在技术革新方面就要作极大的努力。外汇汇率限定在日元稍高的水平上，加之实行固定汇率制，事实上已经起到了明确产业合理化目标水平的作用。

政府把控制技术引进和外资引进作为抑制企业竞争的手段，其作用是有限的。在重要的新产品领域，要求引进技术的申请书蜂拥而至，政府以可能造成设备过剩为理由，谨慎从事，但结果还是不得不批准所有的申请。有时也因政府的统一管理，使各公司的新产品国产化时间重叠在一起，导致竞争更趋激烈。

50年代初期，政府制定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现代化起了诱导作用。后来，在政府的控制和保护下，企业间的竞争激化，结果又起到了加快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企业间的竞争，使得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越了政府的设想和计划。

走向经济自立的课题

1952年7月，废除了经济安定本部，于第二年8月，新设立了作为总理府直属机构的经济审议厅。

经济安定本部是在1946年8月，首届吉田内阁时期，在战后的危机情况下，作为推进包括物价统制在内的经济稳定政策的机构而设置的。和平条约生效后，以自由经济为前提的经济自立的方 向，逐渐明朗化，所以，认为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的经

济安定本部必须加以改组。经济审议厅就是在此背景下，以自由经济为前提，作为咨询机构设置的。它负责筹划制定长期经济计划，综合调整与经济有关的政策和进行内外经济动向的调查、分析等工作。1955年7月，在鸠山内阁执政时，经济审议厅改名为“经济企划厅”。

虽说以自由经济为前提，但要实现经济自立，仍必须制定诱导性的计划。经济审议厅于1953年2月，发表了“昭和三十三年（1957）年度经济计划表”。作为制定经济计划的一种尝试，该表展现了5年后日本经济的蓝图。“经济表”实际上是为前来访问日本的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调查团，商讨当时日本产业的各类项目贷款时，作为审查贷款对象的标准而制定的。它也成了国内各产业推进合理化计划的目标。“经济表”测算了包括电力、钢铁、海运、机械、煤炭等基础产业的合理化在内的，整个产业设备投资所需要的资金，结论是必须引进相当数额的外资。

1953年12月，编制了一份“关于我国的经济自立”的计划书。当时以经济审议厅长官冈野清豪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冈野设想”。冈野设想强调，要改善国际收支，第一必须扩大出口，通过产业合理化，降低成本。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调低国内利率，谋求税制的合理化；第二，必须节约外汇，提高国内的自给能力。因为依靠上述措施还不可能改善国际收支赤字。节约外汇的方法就是增产粮食与合成纤维，增加远洋船舶，促进电源开发等等。计划方案既注重“贸易主义”，也重视“开发主义”。

1957年度的经济计划表和冈野设想并行不悖，筹划制定了各个产业的现代化计划。如电力开发五年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石油需求五年计划、钢铁合理化计划、粮食增产五年计

划、港湾五年计划、国铁合理化五年计划、电话电讯公司现代化计划、国际观光公路计划等等。

1957年度的经济计划表和冈野设想这类尝试性的宏观经济计划,并没有正式成为政府的决策。然而,从1954年开始,由经济审议厅着手编制的“月度经济情况”,就提交给了经济内阁协议会,此外,从1955年开始,公开发表作为内阁会议的正式文件,用国民生产总值方法编制的政府的经济预测。政府为筹划制定经济运转的方针以及长期战略,开始重视宏观经济指标。政府正式决定制定经济计划是在经济企划厅成立以后,也就是在1955年12月鸠山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制定“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之后。

加入国际经济机构

战后,日本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的同时,就立志参与战后的国际经济,在和平条约生效前后,加入了各类国际经济组织。

和平条约签署前的1951年6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的ILO(国际劳工组织)大会正式承认日本为该机构的成员。1952年8月13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IBR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常称之为世界银行)在华盛顿签署协议,接纳日本为正式成员。1953年2月14日,在万隆召开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大会,决定接纳日本为正式成员。ILO和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或地区机构,在日本未参加联合国之前,各机构都接纳日本为正式成员。1953年2月13日,日内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间委员会建议日本加入该组织,同年10月23日召开大会,承认日本为临时成员。约两年后的1955年6月7

日,在日内瓦签署协议,承认日本为正式成员,同年9月10日生效。日苏恢复邦交后的1956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联合国组织。加入该组织,既是上述一系列活动的继续,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总结。

众多的国际经济机构,是在美国主导和联合国协助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这段时间内设立的,它们对形成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是取代金本位制,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战前和战时,黄金集中在美国,加上战后美国在经济上居绝对优势,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以美国政府向外国货币当局(政府、中央银行)保证美元和黄金能够进行兑换这一条件为基础,而设立的以美元为基本货币的国际货币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因为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4年7月22日,在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签署的最后决议书而设立的,故又称之为“布雷顿森林机构”。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各国货币的对外汇率,原则上和实行金本位制时一样,维持固定汇率。在国际收支出现明显不平衡时,允许各国的对外汇率实行浮动,但浮动幅度不得超过10%,一旦超过时,必须征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同意。之所以实行了这种可以调节的固定汇率制,是为了避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30年代大危机时,各国都调低对外汇率以增加出口的“汇率倾销”事件的重演。

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对外汇率确定后,根据日本的情况,对外汇率虽说是比较严峻的,但只要固定在能够维持的水平上,如果国内产业具有充分的潜力,通过合理化、现代化措施,还是

可以引导产业为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积极开展投资活动的。固定对外汇率明确了通过合理化和现代化来降低成本的具体目标水平，它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对日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下的固定汇率制，在保证国际贸易稳定的同时，还起到了加速设备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维持固定汇率制，帮助各国经济稳定发展，使陷于国际收支赤字的国家摆脱危机，还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贷款基金。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这一机构名称的来历。为解决国际收支赤字而实施的强有力的紧缩政策，恐怕会增加失业，所以，贷款是缓和、克服危机中的困难所必需的。日本在50年代，为克服国际收支赤字，就利用了该组织的贷款。

IBRD（世界银行）是一家着眼于长期目标，提供复兴和开发贷款的机构。日本在50年代，为开展合理化、现代化投资，接受了该机构的巨额贷款。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作为国际性的多边交涉机构成立的，致力于世界贸易的自由发展。

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11月，发表了一份“世界贸易与增加就业的提案”，同时，向主要的15个国家，发出了参加降低关税谈判会议的邀请书。根据上述提案，1947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了贸易就业会议的预备会议，讨论设立“国际贸易机构”（ITO）。同时，还召开了由各国代表参加的关税谈判会议。到10月30日止，参加的23个国家，终于达成了123条相互调低关税的协议。整理成文后，补充了几条原则，同时，增加了一部分经过审议的ITO章程草案的内容，这就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ITO因后来没有召集讨论过各国间需要交涉的事宜，流产了，所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就扮演了ITO的角色。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强调国际贸易应本着自由、多边、平等的原则，规定各缔约国之间通过谈判削减关税，并以这一做法无条件地适用于其他缔约国的方法来减少关税壁垒。此外，还希望取消限制贸易数量。

50年代，日本走向经济自立的过程，既是摆脱美国援助和特需的过程，也是日本参加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机构，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强迫日本实行贸易与汇率的自由化，削减关税。为此，日本政府在60年代，开始采取促进自由化的政策。这使日本产业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要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必须进一步开展合理化、现代化。从而加速了6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吉田茂内阁于1954年12月集体辞职后，由鸠山一郎组阁上台。鸠山内阁执政时的1955年秋，实现了社会党两派的重新统一和保守政党的联合，确立了保守—革新对峙的政治体系。

鸠山本人对修改宪法、恢复日苏邦交等一系列政治、外交问题很感兴趣，但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不是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政治家，然而为了稳定统治，有必要制定长期的经济政策。和平条约生效后，过了3到4年，大致上确立了以产业合理化为中心的经济自立的政策体系。

鸠山内阁于1954年12月组成后不久，就曾提出过“综合经济六年计划”。1955年7月，经济审议厅改名为“经济企划厅”，负责计划制定工作。经经济审议会审议，“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在1955年12月23日由内阁会议批准。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提出了两大目标：

第一，实现不依靠美国援助和特需的、扩大国际收支平衡意义上的“经济自立”。

第二，充分吸收大量增加的适龄生产人口，实现“完全就业”。

产业合理化政策的目标，是在不依赖援助和特需，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汇率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实现经济增长。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是要将这个目标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展望中明确化。然而，经济发展如果不能解决扩大就业问题，也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事实上，在产业合理化实施过程中，就是出现了就业减少、人员整顿问题激化的产业。在煤炭、纤维、化肥等产业，在市场发展有限的情况下，实施了降低成本的合理化措施，以引进先进机械、谋求设备的大型化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导致人员过剩，企业不得不以希望退职和解雇的方式来裁减人员，不然就将失去竞争力。在激烈的竞争局势下，削减人员还往往导致劳动强度的增加。对此，工会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合理化意味着削减人员和增强劳动强度。50年代发生的劳资纠纷，体现了工人们产业合理化政策抱有极大的反感和不信任。

除此之外，劳动力人口迅速增加。战前和战时，政府不仅不限制生育，而且还将其作为国家实力的基础（直接动员参军的人员），奖励多生孩子。战争结束后，大量的复员军人和从大陆撤退归国的人员，马上进入了和平生活时期，使出生率大大提高，出现了婴儿热。战前，一般的出生率（出生儿童人数占总人口的比率）超过3%。到战争末期，下降到近2%。战后的1946到1949年上升至3—4%。出生率降低到1%以下是在50年代

以后。

50到60年代初期，如果适龄生产人口一齐拥进劳动力市场，那么，可以想象得到，人口数量是非常之多的。如何对付迅速增长的新的劳动力，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课题。

经济自立五年计划，首先从预计的劳动力人口和劳动生产率(工人人均实质国民生产总值)，来测算实现完全就业所要达到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然后用检查是否能在不违背经济自立和稳定的原则下实现这一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进行策划和制定。为平衡各经济部门的比例，还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和各部门的计划加以对照调整。这样就制定了1956到1960年度这5年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为5%的目标。工矿业生产指数的增长率，平均年率为7.4%。

上述目标，后来看来是太低了。事实上，5年中，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年率平均达到9.1%(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工矿业生产指数的年平均增长率，实际为15.6%。计划预测，实际国民生产总值5年后为1.28倍，但实际达到1.55倍。工矿业生产指数预测为1.43倍，实际达到2.06倍。

1955年这一时期，对日本经济的潜在能力，存在着很多使人不得不持谨慎看法的因素。从完全就业的观点出发，最好是以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率为目标，但要考虑到受国际收支制约的因素。经济增长率一提高，原料、燃料的进口就会增加，国际收支赤字就要扩大，这是日本经济的最基本的制约条件。考虑到当时日本出口产业的竞争能力有限，不可能把“国际收支的最高限度”预计得过高。因此，计划当局认为，不可能把实际增长率定得太高。

已经不是战后

内阁会议慎重地判定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的 1955 年，正是世界性生产与贸易增加的繁荣兴旺之年。日本经济也因经济的增长，处于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得到改善的大好形势下。从价格稳定、数量增加的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之为“数量景气”。1956 年度，政府的《经济白皮书》在分析了“数量景气”之后，作出了日本经济已经结束了“战后”恢复阶段的结论。《经济白皮书》把意味着经济变革的经济改革称之为“现代化”，把意味着技术上、组织上变革的革新称之为“技术革新”，结论是，今后必须依靠现代化和技术革新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现在，依靠经济的恢复来维持繁荣的局面已经结束了。正因为日本贫穷，所以和世界各国相比，消费和投资的潜在需求也许更高，但和战后初期相比，这种强烈的愿望明显减少了。现在已不再是‘战后’。我们现在面临着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局面。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的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因此，只有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才可能获得稳定的经济发展”。

“所谓现代化——经济改革，是一个自我改造的过程。进行这类手术不可能没有痛苦。明治初期，我们的祖先就进行过这类手术，好不容易把落后的日本农业国改造成成为亚洲的发达工业国。从那以后，日本经济再也没有经受过与此相类似的大的结构改革。而且为避免自身改造的痛苦，企图以改革外界来迎合自身的需要，结果，导致了军事扩张。”

《经济白皮书》强调，必须重新走战前没有走完的现代化道路。

1955 年出现的“数量景气”好景不长。1956 年由于经济过热，进口大增，国际收支出现赤字。1957 年 3 月，日本银行实行了

提高法定利率的金融紧缩政策。同年6月，政府也公布了改善国际收支的紧急对策，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同时，为避免发生外汇危机，从国际货币基金借了12500万美元。

1957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在分析了事情的经过后认为，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和日银的政策必须更加灵活。与此同时，《经济白皮书》还着重分析了日本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了日本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的特殊性。

据《经济白皮书》记载，1956年，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人数为60万人，失业率不到2%，低于欧美发达国家3%的失业率，大体上实现了完全就业。仅仅从数字上看，日本是实现了充分就业。但这一数字并未真正反映日本的现实就业情况。因为日本存在着反映不完全就业的“双重结构”。

《经济白皮书》列举了“双重结构”的几个特征：

第一，在日本的就业人员中间，“家族劳动者”所占的比率很高。在日本全部的就业人员中间，被雇佣者的比率只占46%。英国为90%，美国为80%。日本就业人员的构成形式，和各发达国家比较，自家经营者多，尤其是家族就业人员的比率更高。英国为0.2%，但日本高达30%。

第二，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差别很大。大企业（500人以上）和10—30人的小企业的工人的工资，是100比50。零星企业的工人工资和大企业相比，是100比40。而各发达国家则是100比90、或100比80。

第三，在不同的产业企业规模结构上，日本产业形成了一种大企业零星企业两极分化的局面，中等规模的企业很少。原因之一是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多，分散的农家经营占很高比率；原因之二是即使在工业等产业部门，也没有大力扶植中等规模的企业。

《经济白皮书》在例举了上述特征后指出：日本是一个现代化部门和前现代化部门并存的国家，这种并存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双重结构”。《经济白皮书》主张，努力降低表面上的失业率，解决双重结构问题，是日本当前实施完全雇佣政策的实质性内容。

就这一点证明，尽管日本即将迈入高速工业化和服务经济化的时期，但就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农业部门占很高比率的、中进国的产业结构。国势调查表明，各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农林水产部门的就业人员，1950年占48%，1955年为41%，1960年迅速下降到33%。整个50年代，农林水产部门的就业人员，从1748万人减少到1439万人。减少了17.7%（309万人）。尽管如此，到50年代末，就业人员中还是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农林水产业。

双重结构论的意义

最早使用“双重结构”这一词语的是有泽广巳先生。有泽在1956年1月号 and 3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在论述雇佣形势时，作了以下论述：

(1) 昭和二十年代后半期(1950年前半期)，就业人员大幅度增加，但其中的大部分就业人员是不完全就业者、低收入就业者。在不完全就业者的家庭里，家族人员为补贴家庭开支而工作，从而导致劳动力供应的进一步过剩。

(2) 昭和三十年(1955)以后，因出现经济繁荣，雇佣者增加，家族从业人员减少了。然而，雇佣者的增加，只不过是从小规模零星企业或大企业需要临时雇工的形式增加的。

有泽在作出上述分析后，谈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的就业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厚冰式结构，经济繁荣这

种温暖的太阳不可能照射到冰的底层，因而起不到解冻的作用”。

“双重阶层的结构，经过战后的改革，至今依然存在”。

这一论述使人们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克思经济学家争论的痕迹。

战前，马克思经济学者中的一个学派认为，日本是一个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和各种半封建制度并存的、特殊的资本主义。1932到1933年《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的主题，就强调这一学派的主张。这一派的观点，为1953到1955年《日本资本主义讲座》(岩波书店)所继承。主办这次讲座的人认为，虽然经历了战后改革，但“半封建制度”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是根据1951年日本共产党的“新纲领”提出的。

有泽属于马克思经济学派中的“劳农派”人物，对“讲座派”持批判态度。有泽提出的“双重结构论”，也同“讲座派”所持的观点具有本质上的不同。战前和战后，“讲座派”强调日本资本主义体制上的双重性问题，而有泽强调的则是结构上的双重性问题。“讲座派”主张，战后，要铲除“半封建制度”，就必须提倡革命(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但有泽对此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不一定要通过革命来改变体制，可以循序渐进地实行改革，与此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推进现代化。

然而，香西泰却认为有泽的观点“象一堆沉淀的东西，始终不会前进”，对前现代领域中遗留下来的弊端，还抱着沉重的心情(有泽广巳主编：《昭和经济史》P.381)。这是战前和战后日本有知识的领导人所害怕和担心的。香西把这归结为是“一种自认日本倒霉的，对发展成发达国家抱绝望态度的明显的意识差”。

然而，1957年度《经济白皮书》的执笔人，却把这一“意识差”

写进了以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目标的政策体系之中。《白皮书》为解决“双重结构”问题，提出了两点政策性的意见。

第一，是经济的持续发展。《白皮书》作了如下论述：

“1950到1955年这5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8%左右，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员75万人。依此框算，如果增长率维持在6—7%左右的话，新涌现的工作岗位就能吸收很多就业人员，这样就能防止双重结构的恶化。10年以后，适龄生产人口的增长比率就会大大下降，由于已经拥有很大的经济规模，到那时，增长率再低，也能顺利地吸收新增的人口。……”

“因为战后的特殊情况是不能作为将来的参考的，所以可以调查一下从明治时代到昭和初期，这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经济是以何种速度增长的。我们知道，当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相比之下，4%的增长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外国的经济学家对日本的增长率持非常惊奇的态度。然而，4%的增长率是不可能做到吸收每年增加的人口，防止双重结构恶化的。总之，11%的高速发展有点蛮干，但4%的缓慢增长也嫌美中不足，最好是长期保持6—7%的增长率。”

第二，是前现代化部门的现代化政策。

《经济白皮书》提出，日本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方法：(1)是加速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现代化部门的发展，以这些企业为火车头，带动非现代化部门的发展。(2)是引导非现代化部门向现代化发展，提高生产率。并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农业和中小企业占很大比重的国家，只用第一种方法，拉开双重结构的差距，是否就能实现充分就业呢？因为事实上，所有一切非现代化部门不可能都实现现代化，甚至于对零星规模的企业也不可能给予积极的帮助，所以，要尽力扶植中等规模企业的现代化。

后来，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大大超过《经济白皮书》的预测。就

业形势趋于好转，“双重结构”的解决也比预料的要顺利得多。因此，当时的《经济白皮书》提出“双重结构”问题，并明确提出日本充分就业政策的目标在于“消除双重结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经济自立到实现完全就业，经济政策的目标变了，完全就业政策带有“消除双重结构”这一具体内容。实现这种特殊形式的，符合日本具体情况的完全就业，其根本原因，在于提出的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政策体系是正确的。

第八章 产业合理化和工人运动

1. 总评系统的工人运动面临的课题

总评的作用

1950年7月,总评(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宣布成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人运动的转折点。50年代工人运动的主流就是总评。

总评成立后,面临着下述两大难题。

第一,克服工人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裂,改变原有的组织体制,实现工会大团结。

第二,在工人运动处于危机和面临考验时,保持工会的独立性和战斗力。

实现工会大团结,建立统一战线,是工人运动的重大目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由于战后初期富有战斗力的工会“产别会议”的衰退以及整个工人运动面临危机,才产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总评所承担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利用这种可能性来建立统一战线。

战后,工会重建以来,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劳动统一战线问题,但因左右两派对立,始终得不到解决。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对共产党和产别会议按照革命的政治路线来组建工会的做法,一直持反对意见。产别会议也一直攻击总同盟是推行“劳资调和

路线”，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凶”等等。二一大罢工停止后不久的1947年3月，总同盟、产别会议、中立系（中立工会联络会议），联合成立了全劳联（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1948年6月，总同盟退出后，许多工会也纷纷仿效退出，全劳联变成了以产别会议为中心的左翼团体。然而，由于组织内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化运动”的发展以及不断遭到占领军、政府、企业界的指责，产别会议于1949年以后，趋于崩溃。至此，工会大团结才开始具有现实性。

产别会议竭力反对成立总评。但由于产别会议自身势力已削弱，所以组成不包括产别会议在内的统一战线，事实上也能团结极大多数工会会员。

然而，以封锁共产党和产别会议的革命主义路线为目的的盟军总司令部和政府所实施的限制工人运动政策，阻碍了战后劳动基本权利的确立。加之道奇路线强行推行通货紧缩政策，使拥有实力的产业的经营也趋于恶化，不断裁减人员。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工会运动的独立战斗力，是总评所承担的第二个任务。

当时还处于占领时期，与占领军保持合作是组织得以生存的前提。重要的是，既要维护这一前提，又要在组织上以群众运动为基础，保持工人运动的自主性、自发性。

工人运动陷于危机

共产党与苏联的世界战略相呼应，强行向占领军当局开展斗争，诱发了镇压事件，被工人群众所遗弃，在政治上、组织上不断遭受重大打击。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工会活动家，在“道奇萧条”时，被列为首先解雇的对象。朝鲜战争以后，很多工厂都开展了清除共产党员的活动。厂里的共产党组织消亡了，产别会

议也趋于崩溃。这为取消共产党对工会的支配提供了机会。然而，在裁减人员的过程中，在大量解雇工会活动家和清除共产党员的同时，许多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也被赶出工厂大门。工厂经营者想确立对工人运动的专制性体制。保守的政治势力，也乘此机会全面攻击反体制势力，以加强自己的政治、社会基础。因此，对于要对政府和经营者的权力保持独立性的工会运动来说，已陷于深刻的危机。

产别会议的崩溃，意味着克服工人运动中存在的革命主义偏向的时机已经来临，但同时也意味着，整个工人运动将面临危机。为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建立一个能代替产别会议的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产别会议的消亡，既可能促进工会实行大团结，但也可能因工会的不团结，陷于不能自拔的危险境地。

为使拥有群众基础的工会得以继续生存，必须抛弃共产党和产别会议推行的冒险主义路线。然而，要确保工人在战后争取到的基本权利，保持工会的独立作用，在工厂继续拥有发言权，就必须保持不受占领军、政府、经营者控制的、富有战斗力的独立组织这一基本性质。由于总评是在新宪法下，把工人和工会提出的各项符合宪法的要求，作为以工厂为基础开展群众性工人运动的依据。因此，总评决心积极地承担起上述两大任务。

总评还把同以议会制民主主义为前提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之间开展合作，看作是参与反体制、反政府的政治运动的起点。总评通过采用这一方法，决心在占领体制的制约下，确立具有独立性的民主工人运动的基础，捍卫战后确立起来的各种民主主义的制度，并成为在占领体制下推动各项改革的政治主体势力的核心。

工会会员的人数，战后初期最多时（1948年）曾达到668万人，后来逐渐减少，1951年减少到569万人。在这之后，会员人

数虽逐渐有所增加，但整体上仍趋于减少。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占全体工人的比率，1949年估计为55.8%，到1959年下降到31.5%。道奇萧条时期，就业人员曾一度下降。50年代，就业人员虽有增加，但相当多数是中小零星企业的工人和临时工。工会没有把这些工人都组织起来。

然而，只要看一下各主要团体组织的人员占工会会员总数的发展比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1950年总评成立的同时，“其他团体”的比率迅速下降。总评不仅吸收了脱离产别会议的各种组织和总同盟的主要力量，还聚集了不少不参加任何团体的工会。这表明，总评使作为战后改革的产物的工会，重新拧成了一股绳，引导工会在实施新宪法的民主主义体制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在总评刚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其参加的人数，占有组织工人总数的51%，1953年达56%。总评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代表大多数工人利益的组织。整个50年代，参加总评的工人人数一直占50%以上。但后来，这一比率逐渐减少，到60年代后半期，下降到30%左右。

50年代的工人运动

以总评为主导的50年代的工人运动，面临许多课题。总评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威望。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总评内部也发生了冲突和分裂。

50年代，总评系统的工人运动尽力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各项：

第一，拥护劳动基本权利和捍卫工会组织。

第二，站在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立场上，进一步开展政治运动。

第三,应付产业合理化。

第四,增加工资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在工人运动陷于危机时,限制战后初期确立的工会权利的势力在加强。克服萧条、实施产业合理化,加强国际竞争能力、实现经济自立的经济目标,成为经营者加强统制,压制工会谈判力量的理由。在这种形势下,拥护劳动基本权、捍卫工会组织,就成为总评工人运动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战后,以产别会议为代表的富有战斗力的工人运动的基础,是由于战争而陷于极度贫穷的大众的反抗以及以战后改革为契机的工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工厂,工人的发言权大大加强。但是,产别会议在其革命空想主义指导下采取的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不仅使其自身组织遭到崩溃,而且由于占领军和政府为防止共产主义革命,反而加强了限制性措施,使工人的既得权利面临丧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现实的应付措施,保护作为工人的自发性组织的工会的力量。

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工人自身的权利意识,培养工会活动家,保护工厂的自发性组织。另一方面,要把工人运动的合理性和战后一般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要求相联系,以此加强工人自身的信心,并取得广大国民对工会运动的支持和同情。

1950年,在全体就业者中,从事农林渔业的占48% (国情调查)。在就业者总数中,被雇用者占35.4% (劳动力调查),自主经营者占28.3%,家庭就业者占36.3%。1950年,被雇用者参加工会的组织率是46.2%,只占全部就业者的16.4%。

农民、中小零星企业的自主经营者与家庭就业者,是保守势力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尽管战后实行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但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在多数国民头脑中还没有扎根。参加工会的人,是这种庞大保守势力中的极少数人。工会直接、

间接地所代表的全体被雇用者阶层，在国民中也是少数派。工会要同国民中的各种民主主义集团联合，就必须与占压倒优势的保守势力作斗争。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某些集团要借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加强工人的权利意识。并试图将民主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发展成为全面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变革体制的契机。从而在作为战后初期左翼工人运动的产别会议瓦解之后，发展起新的左翼运动，恢复和加强工会的战斗力和战斗力。这种做法，的确取得了加强总评工人运动的战斗力和扩大其政治影响的作用。但是，它使总评工人运动的运动方针趋于僵化，不能随机应变，并成为产生新的分裂的原因。

和平与民主主义

总评系统的工人运动所面临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抵制政府在政治、外交路线上，继续朝着有损于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观念的斜坡滑下去。

从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生效起，吉田内阁选择了以日美同盟为基轴，逐渐恢复日本在国际中的地位。美军继续留驻，再加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基地和演习地反而扩大了。吉田内阁不得不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来判断、选择路线，结果依然坚持不恢复同中国大陆的邦交，重整军备，警察预备队改名为“保安队、自卫队”，扶植正规的军队。

一些战死者的遗属对战争的悲惨情景仍记忆犹新，战争给他们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因此，无论以何种理由来扩大军事基地和促进重整军备，无疑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当然，聚集在总评周围的极大多数的工会会员也持反对意见。总评系统的工人运动是在上述情况下，以大多数工会会员的意志为基

础，代表、集中了极大多数国民的感情。总评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整军备，反对军事基地的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掀起的。

保守势力否定战后各项民主性改革的价值，批评非武装条款，提倡恢复旧秩序，甚至强调修改宪法。因此不仅推动要求修改战后的民主教育制度，加强政府统制和恢复旧的价值体系的活动。而且还采取了限制工会运动权力的措施。在占领末期，制定了限制公务员和公共企业团体开展工会活动的法律。在1952年电力产业、煤炭产业举行了大罢工之后，吉田内阁于1953年制定了罢工限制法（限制电力产业和煤炭业工潮的法律）。此外还加强了以限制极左势力为理由的治安体制。例如，吉田内阁时期制定的“破坏活动防止法案”（1952年成立），岸内阁时期制定的“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案”（1958年，审议中断）。这些行为，使极大多数的国民回想起否定民主主义与人权的战前和战时的情景，因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

总评一方面批评共产党系统的运动，另一方面打着保卫和平和民主主义、拥护劳动基本权的旗帜，与保守政权势不两立。总评在整个50年代，成为政治上对抗“逆流”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然而，沿着这条路线搞政治斗争，使总评的工人运动偏离正题，在总评工人运动内部，重新形成了左右对立，产生了新的分裂。在左派领导者中间，也围绕着实现政治路线的方法和对苏联评价等问题，产生了新的对立。围绕总评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内部斗争，也以上述问题为契机，趋于激化。

对产业合理化的对策

50年代，总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适应政府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和产业合理化计划，对付各产业的合理化措

施。

产业合理化在重视削减产品单位原材料消耗量的同时，也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产品的单位工资成本。

从长远着眼，产业合理化有利于加速日本经济的自立发展，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每个企业也可能由于合理化和经营革新，使职工收入提高。然而，要协助贯彻产业合理化，工会对各企业实施产业合理化的方法以及生产率提高后的成果分配，应持有充分的发言权，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向，必需拥有能行使其影响力的地位。为此，工会以及支持工会的政党，必需以具有现实意义的替代性政策路线来对付保守政权的政策路线。

日本的工会运动，对此问题，没有找到一条十分统一的实施路线。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其成果分配上的劳资合作问题，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针缺少一种有效的改革设想的情况下，是以由经营者掌握主动权，仅吸收一小部分工会参加的形式进行的。1955年，通过经团联、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等主要经营者团体的努力，设立了日本生产率本部。劳方主要参加者为总同盟和全日本工会会议系统的工会。

在实施产业合理化计划的过程中，劳动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动，配置变化也频繁出现。在市场扩大上存在结构性限制的产业，由于设备的现代化和大规模化，生产更加集中，结果导致人员过剩，造成因事业所关闭、大量解雇和劝退所引起的就业人员的削减。

这一时期，从整个日本经济来看，由于劳动力市场还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所以大多数被解雇和被迫辞职的工人，只好在更加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被迫陷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

经营者以产业合理化为契机，强化经营者的权力，贯彻其经营思想。正因为如此，与想在工厂中保持独立地位的工会之间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样一来,产业合理化问题经常导致发生劳资冲突,并使工人运动内部的对立和分裂公开化、尖锐化。第一工会和第二工会之间的冲突,有的甚至发展到工人之间的流血争斗。

对产业合理化,工会的行动产生了明显的分裂。尽管各工会的产业状况大相径庭,是导致分裂的一个因素,然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应如何进行评价,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具有很大影响。把征服资本主义作为革命的最终目标,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致力于加强工人运动的集团,必然对产业合理化采取全面对立的态度。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分享现实成果,以改善工人生活为目标的集团,则对产业合理化原则上持同意观点,反对意识形态上的左翼路线。

提高工资

50年代,总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大幅度地提高工资。

在现实的工人运动中,能够动员更多工人参加的,就是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

当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按战前基本的消费水平计算(经济企划厅),1950年的城市生活水平,大概是战前的70%。消费水平指标超过战前是在1954年。国民对战前的生活记忆犹新,城市居民强烈要求增加收入。工会要求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当然也是反映了这种情绪。50年代前半期,受朝鲜战争影响,消费物价大幅度上升,所以,提高工资也就意味着是保障工人的生活。

工会按照工人的实际生活开支,提出了支付保障基本生活的工资。经营者则主张按对生产所作的贡献大小支付工资。形

成了所谓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和市场经济原则之间的冲突。这同时,也是围绕着工资这一基本的劳动条件,工会方面与经营者方面争夺领导权与决定权的斗争。以提高工资为导火线,劳资间产生了长期激烈的斗争。

在日本经济趋向正常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企业间的竞争也日趋激化。经营者认为,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确立经营管理中的领导权与决定权,维持合理的工资水平和工资体系,是实现企业增长,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对维持工会方面在企业中的发言权和以实现大幅度提高工资为目标的斗争,逐渐显示出不妥协的姿态。经营者为对抗战斗的工会,往往支持、扶植协作从事经营活动的第二工会。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劳资纠纷,导致工会逐渐分裂和解体。

在产业合理化的实施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的要求,从经济学原理来讲,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每一个经营者看来,工资水平越高,就越要竭尽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大量削减工人。这就是说,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明摆着就会抑制就业人数。

大幅度提高工资,它将波及整个经济,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结果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需求增加,引起产量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的作用。然而,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还处于供过于求的50年代前半期,大企业和中小零星企业之间,提高工资的幅度,存在很大差距。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在经济持续发展,劳动力市场发生很大变化的60年代。

50年代前半期,大企业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正象“双重结构论”所反映出的那样,多少要加重大企业劳动力需求的不振或扩大不同规模企业的工资差距。大企业的经营者,为稳定劳资关系,接受增加一定限额的工资要求,致力于进一步提高劳

动生产率,为控制增加人员,对增加的工作量,尽可能雇佣临时工或利用承包企业。这样一来,使劳动力滞留在中小企业部门,中小企业就很难增加工资。

整个50年代,大企业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中小企业的工资增长很缓慢。由于中小企业的工资增长率高于物价指数的上升,所以,实际工资还是增加的。只是和大企业相比,增长缓慢。结果,到1958至1959年,大企业 and 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1960年前后,这一差距才开始趋于缩小。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超越了预先的设想,劳动力市场变为供不应求,开始形成对工人有利的条件。

2. 劳斗^①罢工和电产^②、炭劳^③的劳资纠纷

劳斗罢工

总评成立后不久,尽管围绕对国内外形势的评价和工人运动的性质,组织内部产生了对立,但却明确地采取了与政府(吉田内阁)对立的姿态。

在1950年7月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不顾一部分人的反对,通过了全面媾和的要求。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又通过了和平四项原则(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提供军事基地,反对重整军备),否决了反对案。

1951年5月,麦克阿瑟离任后不久,新上任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表声明:为准备缔结和平条约,日本政府必须重新探讨占领时期的法规。吉田内阁对媾和以来的治安深感不安,

① 劳斗——反对劳动法规改恶斗争委员会的略称。——译注

② 电产——日本电气产业工会的略称。——译注

③ 炭劳——日本煤矿工会的略称。——译注

开始研究包括禁止总罢工在内的限制工会活动的法规。8月,经总评和中立系统工会的共同努力,成立了反对劳动法规改恶斗争委员会。

11月6日,总评发表了“紧急事态宣言”。17日,各企业工会决定举行两小时罢工,由于政府明确表态,延期推出法案,才避免了这场罢工。

政府把修改劳动立法一事搁在一旁。鉴于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废除团体等规制令,随着占领状态结束而被废止,政府加紧制订治安立法,以防止采取武力革命路线的共产主义者的破坏活动。为此,1952年3月28日,内阁会议决定向国会提交“防止破坏活动法案”(防破法)。

3月31日,总评和劳动法规改恶斗争委员会共同召开会议,决定在4月12日和18日举行反对防破法的罢工。

全纤同盟、海员工会、私铁总联等组织,反对举行反对防破法罢工,主张斗争的焦点应集中在反对劳动法规改恶方面。总评的实力工会炭劳(日本煤矿工会)的干部同意了劳动大臣在作秘密说服工作时讲的“同意工会提出的修改意见,所以罢工先延期,等看了政府的态度后再说”的意见。结果原定4月12日举行的第一次罢工被推迟了。全矿(全日本金属矿山工会联合会)也和炭劳唱一个调子。全纤同盟、海员工会、私铁总联等组织也都支持炭劳的决定。

4月12日举行了首次反对防破法的罢工。劳斗方面发表的数字是:参加者170万人,罢工30万人。但劳动省发表的数字是:参加者30万人,罢工12万人,怠工8万人。

政府没有采纳工会方面关于删去“煽动破坏活动”也要作为处罚对象这一规定的要求,于17日向国会提交了该法案。

于是,在4月18日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静观第一次罢工的

炭劳和全矿也都参加了。据劳斗方面发表的数字，参加者达340万人；举行罢工的有18个企业工会，达113万人。据劳动省统计，参加人员114万人，罢工39万人，怠工9万人。

4月23日，在炭劳临时大会上，总评事务局局长高野实在致词中指责炭劳委员长武藤武雄（总评议长）是静观第一次罢工的“罪魁祸首”。日本煤矿工会大会通过了对武藤等执行部的不信任动议案。武藤失去了日本煤矿工会委员长和总评议长的头衔。

和平条约4月28日生效，没过几天，5月1日即发生了“血染五一”的事件。这使政府坚定了促进制定防破法和禁止总罢工法制化的决心。增添了首相有禁止罢工命令权（紧急调整）的劳资关系调整法修改案，5月9日经内阁批准，第二天提交国会。

劳斗虽已商定了第三次罢工，但由于全国汽车工会、全国金属、全矿、官公劳等组织认为应以全面撤回5月15日众议院通过的防破法为目标，而私铁总联、全纤同盟、海员工会等组织则认为应以集中反对修改劳调法为目的，从而产生了意见分歧。

第三次罢工分6月7日、17日、20日3次。每次都有几个工会参加。据劳动省统计，参加人员总计126万人，罢工17.5万人，怠工48万人。

防破法于7月4日生效，劳资关系调整修改法也在对“紧急调整”条款进行部分修改后，于7月31日生效。

这时，众议院自1949年1月的大选以来，已过了3年半，接近4年任期结束的大选。这是和平条约生效后，首次举行的大选。

大选与总评

7月22到24日，总评召开了第三次大会。

以高野为首的执行部，作为总评的方针，对即将到来的大

选,提出了“为了把维护和平四项原则、反对两条约的工会出身的候选人送入国会,应该同以左派社会党为中心的各政党紧密联合,进行选举斗争”的方针。

海员工会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必需同左右社会党一道开展斗争。工会支持政党应是自由的”。国铁工会则提出了“支持左右社会党和劳农党”的修正案,炭劳也提出了“支持社会主义政党”的修正案,各唱其调。日教组(日本教职员工会)主张“坚决支持反对两条约的候选人”。

运动方针小委员会以及大会全体会议都一致否决了修正案,但由于原案没有得到大会的三分之二人数支持,成为废案。为此,破例再次表决,才勉强通过。

这次总评大会召开后,时隔约1个月左右,吉田首相突然于8月26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知众议院议长,决定解散众议院。这就是所谓“突然袭击解散”。

1946年的宪法,对解散众议院的规定,总的说来很不明确。在与内阁有关的第5章第69条规定,众议院在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或否决对内阁的信任案)后,只要众议院不解散,内阁就必须总辞职。虽没有对解散众议院作出规定,但一般来说,它被作为内阁解散众议院的依据。1948年12月,第二届吉田内阁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就是根据这一程序进行的。

然而,这次是在不存在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的情况下,由吉田内阁主动提出,单方面通知解散众议院的。吉田内阁以1946年宪法第7条“天皇的国事行为”中包含“解散众议院”,而这种国事行为必需得到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的规定,作为“突然袭击”解散众议院的依据。这在法律上还有疑问。然而,吉田内阁的措施造就了一个既成事实,成为一种先例。

吉田“突然袭击”解散众议院的意图,是针对鸠山一郎等人

已被解除了褫夺公职的处分，他们回到政界后在自由党内拉了一批人进行的反吉田活动。对此，吉田抢先下手，以谋求吉田内阁的长期化、稳定化。

10月1日举行了大选。

在选举时，自由党实际上已分裂为吉田派和鸠山派，两派加在一起的议员席位比解散前减少了45个，为240席。总议席数为466个，自由党超过半数。

共产党解散前还保持着22个议席，但这次大选后，因其干部被占领军褫夺公职和剥夺议席，得票率为2.6%（前一次是9.7%），议席为零。

左派社会党的得票率为9.6%，议席从解散前的16个一下子增加到54个，开始与右派社会党的57个议席并驾齐驱。

总评推荐的候选人为104人，有62人当选，其中现职工会干部为11人。

总评的工资纲领

在推进反对劳动法规改恶的斗争中，1952年2月22日，总评发表了“工资纲领草案”。这是由钢铁、合化、炭劳、私铁、全纤、日教组、全专卖、总评调查部的代表组成的小委员会共同起草的，在同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

这一“工资纲领草案”，强调了提高工资这一斗争目标的意义。

首先，它认为现在的工资“是日本80年工资史上所从未有过的极低的工资”，“名副其实地是一种饥饿工资”。现在生产大大超过战前水平，生产率也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准，但工资仅为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这是决不能容忍的。战前的水平，也只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殖民地式低工资”。战后工会的最大使

命就是解决低工资，“实现与人的尊严相符合的工资”。这就是实现宪法规定的保障“健康和文化生活”的工资。然而，增加工资单凭工资交涉是不能实现的。在最大限度地开展要求各种经营和产业增加工资斗争的同时，要彻底根绝低工资制度，还必须依靠统一战线的力量，与顽固维持这一制度的各种政治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为此，必须把“仍停留在贫农式生活水平的庞大潜在失业”工人解放出来，建立最低工资制和社会保障制，以纠正中小企业、家庭工业的极低工资状况，还必须粉碎以劳动法规改恶和弹压法为突出代表的反动立法。此外，不阻止战争和重整军备，就不可能增加工资，生活水平也得不到提高。阻止战争和重整军备，也必须依靠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开展斗争。……

工资纲领除明确上述认识和课题外，还提出了以下基本目标以及当前争取的目标。

(1) 能维持“健康和文化生活”的工资水平 = 最低实际收入额为 7 万日元。

(2) 立即恢复战前的工资水平 = 实际收入额平均为 2.5 万日元。

(3) 以日用实物方式来计算实际工资。

(4) 以保障最低生活为基础的合理的工资比率——打破职务上的等级制。

(5) 全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上述(3)“以日用实物方式来计算实际工资”，是一种被称为“菜篮子式”的决定实际工资的方式，也就是以工人购买现实生活必需品的总金额为依据，来计算实际工资的方式。

工资纲领草案认为，作为达到上述各项目标的前提条件，必须得到以下四项统一要求。

(1) 撤销所有阻止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法律（绝对反对劳

动法规改恶镇压法)。

(2) 保障全体工人最低 8000 日元的收入 (制定最低工资法)。

(3) 保障失业、疾病、年迈工人的生活 (从根本上充实社会保障制度)。

(4) 反对重整军备, 拥护和平宪法。

有关上述统一要求, 工资纲领作了如下说明。首先要认识到, 这不仅是中小企业、家庭工业工人, 而且是现代化组织工人的一致要求, 在发挥工人积极性的同时, 还要组织全国性、地区性的统一战线, 把中小企业、家庭工业以及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其次, 低工资水平的根源在于“农村的饥饿生活和潜在失业”, 为此, 须动员农民积极行动起来, 建立工农统一战线。要对反对军事预算、反对高额课税、救济潜在的失业者、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农业经营现代化等具体要求作出统一安排。“工农不合作, 就很难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也难以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

上述工资纲领方案, 在后来的总评系统工人运动中, 成为争取提高工资斗争的基本观点。

对工会来说, 工资是件头等重要的事, 正因为当时的工资水平是相当低的, 所以总评提出大幅度增加工资也是理所当然的。很显然, 低工资把整个经济强行限制在低收入生活水平上。继续以要求增加工资为基轴, 广泛动员各社会各阶层采取统一行动, 是提案的根本点。然而, 在总评的工资纲领中, 对实现增资的经济基础, 没有作出具有说服力的阐述。虽然谈了生产和生产率都已达到或超过战前, 而工资还保持在不堪忍受的低水平, 但对生产和生产率以及工资的关系, 却没有从经济结构上作任何说明。

工资是战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说法，具有明显的夸张。对战前工资是“殖民地性质的低工资”这一提法，可能是受了战前讲座派某位马克思经济学家使用的“低于印度的低工资”这一极其不确切的说法的影响。统一战线论和工农合作论看来是受共产党运动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战前共产国际方针的影响。总评的工资纲领本身并没有提倡积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贯穿纲领始终的是对整个经济和政治动态，基本上保持守势，阻止反动化，反对重整军备，反对战争。

纲领反映了工人的生活情况和权利意识，表明了强烈的不满、要求和对抗意识，但没有提及与日本经济发展有关的替代路线。并没有针对政府和经营者的经济自立战略以及为实现经济自立战略而采取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日本经济方针，也没有以主动、建设性的姿态设想出具有现实意义的改善工人生活的步骤。

因此，总评的工资纲领缺乏经济政策理论，成了一种要求和抗议性很强的文件。从这一立场出发，工资纲领本质上，无疑具有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相冲突的性质。为取得保障生活的工资而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既是劳资冲突的一个原因，也是总评工人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

电产的崩溃

50年代前半期，围绕着工资问题和合理化以及人员裁减问题，发生了多起劳资纠纷。

1952年秋，代表总评的两个工会以要求增加工资为契机，发生了大规模的劳资纠纷。这就是电产（日本电气产业工会）和炭劳举行的长期罢工。

电产是电力产业（日本发送电和九家配电公司）工人的工

会，成立于战后初期（1946年4月叫协议会，1947年5月改为产别的单一组织）。最初是产别会议的骨干工会。正如1946年10月经过斗争获得了“电产型工资”那样，在战后初期进行的工资斗争中，起了带头作用。即使是电产，后来由于民主化同盟掌握了主导权，在工厂中驱逐共产党的活动分子。结果，电产脱离了产别会议，成为总评的一支生力军。组织成员约为12万人，作为基础产业工会，电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1952年的劳斗罢工中被迫辞去总评议长的炭劳的武藤武雄，就是由电产委员长藤田进接任的。

然而，电产也已出现分裂的前兆。电产关东地方本部（关东配电网工会）的干部，在1949年9月宣布退出电产。同年12月，他又组织本公司的大多数就业人员，成立了独立的关东配电网工会（1951年5月1日，改成九家电力公司体制后，改名为东京电力工会）。经营者欢迎本公司的工会脱离，极力阻碍确立经营权的产别工会组织，并打算培养本公司的工会。

在产别会议遭受挫折和清除共产党员的活动分子以后，工人中出现了脱离战斗性工会运动的倾向。在电力产业，响应政府的电源开发促进政策，在经营者的领导下，推动事业的合理化和大规模化，创造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基础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想法，在普通就业人员中很强烈。根据盟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确立的九家电力公司体制，对产别工会的电产来说，这也是其发生危机的一个因素。

1952年春，电产和作为经营者团体的电气事业经营者会议（电经会议）进行交涉，要求修改劳资协议和修订基本工资。

电产要求修改劳资协议，是借前几年签订的协议到期的机会，要求劳资协议事项明确化。要求修改基本工资，是将生活保障工资（本人工资、家族工资）和技术工资（能力工资、连续工龄

工资)相加为基本工资,即以所谓电产型工资体系为前提,将4月份以后的基本工资平均定为20055日元。也就是在1951年底协商解决的现行基本工资平均12850日元的基础上,要求再提高56%,增加7205日元。

经营者方面明确表示,同意以改变职务等级制实现工资体系合理化为前提,增加950日元工资(7.4%),但同时劳动时间必须从现在的每周38.5小时增加到42小时(增加9%)。此外,经营者方面还提出了将必定加入工会制改为自由加入工会制^①,规定门卫、司机、打字员等工作人员不能介入劳资纠纷,限制劳资经营会议的讨论事项等提案。

电产彻底拒绝了经营者的提案。从夏天到秋天,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会长中山伊知郎)向双方提出了劳资协议(7月22日)和工资(9月6日)两项调停方案。内容为10月份以后,基本工资提高到15400日元(增加2550日元,19.8%)等。调停案为劳资双方所拒绝。

电产以9月16日事务部门举行罢工,以9月24日切断电源6小时的罢工为开端,使罢工运动进入了波浪起伏的状态。政府认为变电所切断电源举行停电罢工是违法的;电产认为是合法的。实际上,日本电气产业工会采取的,是拒绝为发电所提供劳务,减少实际发电量的战略。截止12月15日的3个月中,共举行了16次、总计为470小时的电源罢工和停电罢工。政府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劝告劳资双方重新交涉,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也再次出面进行斡旋。然而,经营者方面拒绝和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交涉,主张各个企业分头进行交涉。11月26日,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提出的斡旋案,工资额和9月的调

^① 必定加入工会制,是指经营者雇佣的所有工人都必须参加工会。自由加入工会制,是指从业人员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工会。——原注

停案一样,也提议延长劳动时间等,对工会增加了不利条件。电产下达了延长罢工时间的指示:12月2日到3日为40小时,4日到6日为72小时,7日到10日为80小时,10日到15日为120小时,17日以后举行无限期罢工。

然而,12月8日,东京电力公司达成协议,工资额为15842日元。15日关西电力和中部电力也达成了协议。电产提出的统一交涉、统一工资的主张失败了。12月18日,电产本部不得不决定同意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提出的斡旋案。长达90天的大罢工,以电产的失败而告终。以这次劳资纠纷为契机,出现了脱离电产,组织企业工会的趋势。

第二年,1953年7月,作为企业工会的联合体,召开了成立全国电力工会联合会(电力工会)的预备会议。电力工会于1954年5月27日正式成立,成为代表电力产业工人的工会,后来发展成同盟系统的一个实力工会。1956年,电产决定和各地的电力工会联合会采取统一方针。事实上,他们已经解体了。

炭劳的63天罢工

煤矿工会在战后初期也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它是在相当艰苦的劳动条件下,从事危险作业的工人们的组织,所以,煤矿工会是一个非常富有战斗力的工会。经过几次重组,于1950年4月22日,作为产业的单一组织,组成了日本煤矿工会(炭劳),并参加了总评组织。炭劳是一个工会会员高达约30万人的大规模的组织。

炭劳在1952年7月21日召开的临时大会上,决定了10月份以后的工资斗争具体方针,于8月13日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书。基本工资为,从事井下作业的工人平均1060日元(当时550日元),井上作业的工人560日元(当时340日元),(月工资井下

作业的工人为 26520 日元,井上作业工人 13760 日元)。要求给井下作业工人增资 93%,井上作业工人增资 65%。此外,还要求修改家庭生活费、基本工资外的工资(加早班、夜班及其他)、劳动时间以及以工资计算为基础的标准作业量。

经营者团体煤矿业联盟于 9 月 1 日作出答复。经营者摆出了种种理由:如煤矿的工资已大幅度增加,工资额并不低于其他产业;因增加工资,消费物价稳定,家庭经济正趋于好转;今后的经济形势是不容乐观的,煤矿经营由于整个经济陷于萧条,在与进口煤和重油的竞争中,更是困难重重,等等。并据此提出了在现行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根据出煤的实际情况,提高标准作业量的建议。煤矿工人与资本家的意见大相径庭,交涉难以取得进展。

10月9日,煤矿业联盟拿出了第二份书面答复,除在标准作业量增加一项中稍作让步外,其他内容与第一份书面答复完全相同。同一天,日本煤矿工会发表了罢工宣言,宣布从 10 月 13 日起举行 48 小时罢工,17 日整个煤矿进入无限期罢工。10 月 18 日,总评为支援正在实行电源罢工的电产和新加入斗争行列的炭劳,设立了电产—炭劳联合斗争会议。

即使在罢工期间,煤矿也要安排最低限度的工人进入矿井内,从事安全作业。不然的话,一旦岩盘膨胀,坑道和采掘场地就会坍塌,要想再次开工生产就很困难,此外,发生自然火灾的危险性也很大,所以,确保安全人员就成为一项法则。然而,日本煤矿工会,面对经营者的强硬态度,为坚持长期斗争,曾暗示可能撤回安全人员。

10 月 31 日,政府以通产省矿山保安局长的名义,根据矿山保安法,发出了必须确保采掘现场安全的通牒。11 月 11 日,炭劳向政府提抗议,认为这是对劳资纠纷的干涉,并于同一天向煤矿业

联盟发出削减安全人员的通告。11月12日,煤矿业联盟向炭劳提出抗议,指责炭劳违反了劳资纠纷中劳资间的通则,破坏了信誉关系,并警告炭劳,要对产生的一切损失,追究刑事或民事责任。11月19日,前炭劳委员长武藤武雄所在工会常磐煤矿工会临时大会决定,退出炭劳(313票对87票),停止罢工,进行个别交涉。

由于炭劳坚持长期罢工,使煤矿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因煤炭不足,开始出现国铁列车运行次数大大减少和限制城市煤气供应的情况。炭劳于12月1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炭劳认为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斡旋案和人事院对公务员的裁决都同意为电产工人和公务员增加工资,但煤矿经营者却主张维持现有工资,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在抗议一部分煤矿发生的“由暴力团来破坏罢工”,企图破坏有组织的活动的同时,预示将撤退全部安全人员。

12月7日,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提出了斡旋方案。其内容为,基本工资提高7%,另外每月支付300日元,作为出煤奖金;标准作业量原打算根据生产能力的变化作合理的调整,现按原规定;劳资纠纷解决后,为重整家业,维持生活,每人平均可借款5000日元等等。煤矿业联盟承诺了斡旋案,但日本煤矿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以29票对28票一票之差,否决了斡旋案。12月10日,炭劳发出了撤回全部安全人员的命令。

吉田内阁在12月15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实行“紧急调整”。尽早实施根据同年7月31日宣布的劳资关系调整修正法制定的紧急调整条例。按照这一条例,以听取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意见为条件,首相有权决定进行紧急调整,在50天之内禁止劳资纠纷。内阁会议决定委托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实施紧急调整,但因遭到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中工人委员

的反对,结果还是由政府出面实施紧急调整。政府于17日凌晨公布实施紧急调整。炭劳中央斗争委员会,在12月16日宣布停止罢工。长达63天的罢工宣告结束,以接受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斡旋案而告终。

常磐煤矿工会在劳资纠纷中独立出来,在几个煤矿中组成了第二工会,但从整体上来说,炭劳的组织还是保存了下来。然而,经过大规模斗争后,所增的工资是很可怜的。炭劳从属的各个工会,在这以后,在深刻的合理化问题上,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3. 企业竞争中的劳资对立

批评总评

1952年电产和炭劳举行的罢工,由于经营者的强硬态度和政府的干涉,根本没有达到大幅度增加工资的目的。总评失去了富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会电产,炭劳也出现了分裂的前兆,总评自身的分裂也趋于公开化。

在电产和炭劳的罢工结束后不久,1952年12月25日,全纤同盟、海员工会、日本广播工会(日放劳, NHK 工会)、全国电影戏曲工会(全映演)四大产业工会,发表了题为“批评总评的领导方针——站在民主工会的立场上”的共同声明。共同声明直截了当地叙述了作为民主劳动战线统一体而产生的总评,由于实施错误的领导方针,现在已失去了民主工会的性质,有重蹈全劳联覆辙的危险。并提出如下主张。

总评领导方针的最大缺陷,是把工会的经济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由于领导观念上的错误,损害了工会会员的利益。

第一,总评把“只要日本的经济机构不改革,就不能及时解

决所提要求”作为现实的斗争，把工会会员引入了“劳资纠纷的泥潭”。

第二，把一切要求和斗争都集中在“反对重整军备、粉碎军事预算”这一方针上，把工会引导到“同概念上的和平论相结合的反对重整军备斗争行动队的方向”，脱离了广大的工会会员。

第三，指导斗争的方针，脱离民主手段，轻视合法运动，和共产党的“合法非法两面作战”的言行如同一辙。

电产和炭劳要求把工资增加到平均二万几千日元，这一要求本身并不高，但问题出在“无视当今面临的日本经济形势以及与斗争对手的劳动关系，错误地估计了工会的职能和力量，没经深思熟虑就把增加工资的要求提到当前斗争的议事日程上来，再加上在领导观念上又与粉碎军事预算这一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坚持长期罢工的工会会员的团结力量和斗争意识是令人敬佩的，也得到了支援，但是，企图从炭劳和电产的两次大罢工为支柱，并举行多次大大小小的罢工，掀起秋季斗争风暴，来同日本的资本主义势力对立，进而打倒日本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上的政治斗争主义、阶级斗争主义却失败了。向反动政治作斗争是必要的，但必须采取民主的斗争手段。工会运动不能成为达到革命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

四大产业工会在发表了具有上述内容的共同声明后，紧接着在1953年1月21日，召开了筹建全国民主主义劳动运动联络协议会（民劳联）的预备会议。民劳联于2月14日正式宣布成立。参加单位除上述四大产业外，还有总同盟、常磐煤矿工会、国铁新生民同、八幡制铁工会、石川岛重工工会、东电工会等，会员总数达88万人。

在1953年7月8日到11日召开的总评第四次大会上，刚发表过共同声明的四大产业工会，提出了“运动方针的反对提

案”，认为“执行部的中苏 = 和平势力论是背离基本纲领的”，主张“所有成员组织都应加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但这一提案以 222 票对 36 票的占压倒多数被否决了。

对高野实等人的执行部的“中苏 = 和平势力论”，除了四大产业工会的批判外，合化劳联（合成化学产业工会）的太田薰等人也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大会辩论异常激烈。然而，对民劳联派的提案，持拥护意见的却为数不多。

全纤同盟、海员工会、日放劳、全映演四大产业工会，趋向于脱离总评。然而，各产业工会内部对此出现了反对意见。在全纤同盟 9 月 8 日召开的大会上，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反对脱离总评，坚持反对重整军备的呼声很高。脱离总评论虽占相对优势，但仍没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全纤同盟在 11 月 14 日召开的临时大会上，最终以微弱的多数决定退出总评。在日放劳，决心参加民劳联的执行部被迫辞职，在同年 11 月召开的临时大会上，明确反对退出总评。在经历了上述曲折的历程后，1954 年 4 月 22 日全日本工会会议（全劳会议）组成。参加者有总同盟（8 个产业工会）、全纤同盟、海员工会、全映演，总共 84 万人。

“混蛋”解散

政府以舆论界对电产和炭劳的长期罢工进行批判为背景，计划制定罢工限制法。这就是“关于在电气事业以及煤矿业中限制劳资纠纷行为方法的法律”。这是只有 3 条条文的简单法案，其内容为禁止把停电、电源罢工以及停止安全业务作为解决劳资纠纷的手段。众议院在作部分修改后，于 1953 年 3 月 13 日通过。

在这之前的 2 月 28 日，在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上，突然

发生了吉田首相出言不逊的事件。右派社会党的西村荣一议员站起来,作了一个带有讽刺性的质询:“请以日本的总理大臣的身份,谈谈国际形势”。吉田说:“别说无礼的话”。西村反唇相讥说:“什么无礼”。吉田于是接来说了声“混蛋”。吉田认为这句话不妥当,表示收回。然而,右派社会党提出了惩罚首相的动议,由于当时执政党自由党内的鸠山一郎派等反吉田势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一动议被通过了。3月14日,又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吉田以解散众议院作为应付的对策。4月19日,离上一次大选只有半年,又进行了一次大选。

议席的分布情况是:吉田自由党199席,选举前夕另立山头的鸠山自由党35席,改进党(1952年2月成立)76席,右派社会党66席,左派社会党72席,劳农党5席,共产党1席,其他党12席。吉田自由党比解散前的222个议席,减少了23个议席,鸠山自由党比解散前减少了4个议席,改进党也减少了12个议席。左派社会党比上次大选增加了18个议席,超过了右派社会党。右派社会党也比上次大选增加了9个议席。共产党的议席数,从零上升为1。

5月21日,第五届吉田内阁宣布成立。由于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未审议完毕的限制罢工法案,再次被提交国会。

总评在7月4日、11日、27日,举行了3次反对限制罢工法的罢工。然而,限制罢工法还是在8月5日通过,8月7日正式公布、实施。

日钢赤羽、日产汽车、三矿联

不仅限于电产和炭劳,以要求增加工资为导火线爆发的劳资纠纷,逐步发展成长期尖锐的斗争。工会的分裂也在加深。

1953年1月5日，昭和电工川崎工厂的工会因要求生产津贴而举行罢工，但由于公司以关闭工厂来要挟，17日罢工中止。

4月13日，日产化学工会为增加工资，举行了48小时的罢工，5月22日宣布举行无限期罢工。由于公司强行上市肥料，和工会发生冲突，6月8日以妥协了结。

6月16日，日本制钢所赤羽分厂的6000名工人，举行了72小时的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日本制钢所是三井系的铸锻钢制造厂，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军需公司，因朝鲜战争的特需，扩大了武器的生产。赤羽分厂是美军指定的工厂，由手持卡宾枪的美国兵监视。这里的工会没有参加企业工会联合会（日钢劳联），而且协助公司毫不姑息地解雇工会活动家。然而，由于总评系的全国金属工会和地区社会党的支持，1952年12月，顶住公司的压力，革新派当选为干事，工会的人事焕然一新。1953年6月，要求从2月份起一律增加4000日元的工资。公司一开始答应2100日元，宣布罢工后，改为2400日元。工会对此表示不能接受，断然举行罢工。最后，到7月1日，以增资2450日元而告妥协。

然而，日钢赤羽由于秋季特需的减少，也发生了裁减人员的问题。10月26日，公司通知解雇2300人，工会在11月12日举行罢工。由于同第二工会发生乱打事件，12月5日，以同意支付退职金而告妥协。第一工会的干部大部分被点名解雇。

同年8月12日，全驻劳—全日驻劳（驻留军事基地的工人工会，总计15万人），要求修改劳务基本合同，全国200个基地举行了48小时的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抗议和平条约签订后没有召集美军、日本政府、工会三方举行会谈，以修改劳务基本合同，而是由美军单方面提出方案。在9月1日举行的三方会谈中，

由于政府提出了包括工会意见在内的纲要,而达成协议。10月9日,调达厅和美军签署了修改基本合同的协议。同年11月9日,驻留军工会举行了48小时的罢工,反对兵工厂解雇3500名职工。

1953年,也是全日本汽车产业工会(全汽)日产分会发生大规模劳资纠纷之年。

全汽原属全劳联,1950年8月,占领军命令全劳联解散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会。1951年9月1日,全汽独自举行的反对单独媾和的罢工,为世人瞩目。1952年10月,全汽加入总评。日产分会在全汽中,尤其是在生产现场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被称为最有实力的工会。

全汽在1953年5月,提出要求增加工资。7月3日,日产、丰田、五十铃3个分会,连日举行了1小时罢工。8月5日,丰田和五十铃妥协了,只有日产分会还继续斗争。公司以封闭工厂对抗罢工,并组织了第二工会(日产汽车工会)。公司设置了高大的混凝土路障,阻拦第一工会会员,并同主张“生产率提高工资也相应增加”这一方针的第二工会合作,使生产恢复。由于双方发生冲突,发生了第一工会干部遭逮捕的事件。9月21日,罢工以全面撤回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告终。

日产在劳资纠纷中的失利,成为全汽车工会的致命伤。1954年12月,全汽车工会因在日产劳资纠纷资金归还问题上发生对立,导致全汽车工会解体。

在日产发生劳资纠纷的1953年夏天,大量裁减煤矿工人的问题也公开化了。

7月,煤炭协会发表了《煤炭白皮书》。《白皮书》谈到,由于改为使用重油和进口外国煤,煤炭的生产不能不削减,中小废矿多达109个,约有8000人被解雇。

8月上旬,各大公司发表了总共裁减2万人的通告。最大的三井矿山,提出了“希望退职6739人,在达不到目标时,实行指名解雇”的方案。虽然各工会都举行了罢工,但1个月以后,绝大多数都妥协了。只有三井矿山的工会(三井煤矿工会联合会=三矿联)还继续坚持斗争。

8月底,属三矿联工会的各家工厂,在希望退职没有达到预定目标的三池(熊本县、福冈县)、芦别、砂川、美呗(北海道)四大煤矿,实行了指名解雇。三矿联以要求完善安全设施的“合法斗争”,举行部分罢工,以示抗议,使三井煤矿的出煤量减少一半。11月11日,公司明确表态撤销解雇。11月27日,以撤销原指名解雇1815人的通告而结束。

三矿联阻止解雇斗争的胜利,增强了以日常工厂斗争为基础的工会的组织力量。这次斗争被命名为“无英雄的113天”。

在生产现场同样拥有发言权的全汽车日产分会,把很多担任一定行政领导职务的职工也吸收在工会内。一旦劳资纠纷激化,这些职工站在公司一边,工会很快就会解体。与此相反,三矿联的做法是,建立更小规模单位的现场组织,经常对担任一定职务的职工提出要求,开展现场斗争(引自小野道浩、高木郁朗、村上宽治、山田宏二《总评工人运动30年的历程》P.169—170页)。

10月24日,属于炭劳系统的15个大企业,举行了反对裁减人员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无限期罢工,11月20日,获得了有利于工会的解决。然而,后来随着煤炭产业夕阳化的加速,炭劳面临着更严峻的、大规模的人员裁减问题。

在三矿联的劳资纠纷正在开展的1953年10月12日,位于群马县的东邦锌公司安中精炼所的工会举行了要求“特殊作业津贴”和要求解除特定现场负责人职务的无限期罢工。

这次劳资纠纷,以较浓的“人权罢工”形态,抗议工作岗位危

险多、损害健康等非人的劳务管理。但由于成立了第二工会，1954年1月4日，以工会失败而告终。后来这个精制所排出的镉，导致整个地区的污染问题严重化、表面化。

尼钢和日钢室兰

1954年4月22日，加入总评一钢铁工会联合会（钢铁劳联）的尼崎制钢所工会，举行了反对降低工资和裁减人员的罢工。

1932年创业的尼崎制钢，战前和战时依靠发展军需生产，成为一家小规模钢铁一贯制工厂。战时改名为尼崎制铁。战后，炼钢部门独立出来，成立了尼崎制钢。后来以钢铁一贯制为目标的神户制钢，又把尼崎制铁一贯制钢集团作为它的系列企业。

然而，尼崎制钢因特需景气的反作用，陷入了经营危机。因工会保持着人事协商权和上班时能自由地开展工会活动，迟迟没有建立经营秩序。1954年3月，钢铁劳联举行了提高工资的春季斗争。尼崎制钢工会也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但经营者却向工会提出了为取得银行协调贷款重建经营，实施工资下降15%的合理化方案，并说明：“如果不予合作，导致银行拒付票据，企业就将倒闭”。起初经营者表态不裁减人员。然而，面对工会的强硬态度，经营者却宣布要裁减40%的人员。为此，工会更加强硬。

为对付经营者封闭工厂的做法，工会联络附近的工会和公司职工宿舍的家属采用“全地区性”战术。然而，6月2日就出现了拒付票据的情况，公司倒闭了。工会于6月28日决定停止罢工。尼崎制钢举行的长达77天的大规模劳资纠纷，导致了在7月5日召开的工会大会上，承认解雇全体人员和解散工会的结局。

尼崎制钢于1955年4月重新开工。开工时，重新雇用了一

部分尼崎制钢的老工人。1958年，尼崎制铁、尼崎制钢合并，到1965年被神户制钢吞并。

1954年6月，日本制钢所室兰工厂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劳资纠纷。

日本制钢所的工人都参加本厂的工会，这些工厂分布在室兰、广岛、武藏、赤羽、横滨、宇都宫等地。除赤羽工厂外，其他工会组成了企业工会联合会（日本制钢所工会联合会）。在各个工会中，只有室兰参加了钢铁劳联。道奇萧条的1949年6月，实施大规模裁减，全公司9248人中，有1342人（约15%）遭裁减。在裁减35%工人的广岛工厂，工会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1954年2月，日钢劳联要求平均基本工资增加3000日元（现行基本工资13000日元的23%）。经营者以经营萧条为借口，拒绝这一要求。为此，日钢劳联举行了多次罢工。

6月17日，经营者提出了削减1057名工人的方案。其中被裁减的901名工人是室兰的，约占85%。日钢室兰是一个富有实绩的实力雄厚的兵工厂，曾制造过武藏、大和号战舰的装甲板和大炮。正因为朝鲜战争引起的特需，扩大了生产，所以也深受由特需景气反作用所带来的萧条影响。室兰的钢板部门，被解释成是造成全公司赤字的主要原因。

6月底、7月初，属于日钢劳联系统的各工厂，举行了24小时罢工。然而，中央的团体交涉决裂了。在室兰工厂，6月29日，开始募集希望退职的职工，到7月8日，宣布指名解雇。工会于7月10日确立了罢工权，公司从7月21日起封闭工厂。

8月28日，公司提出了从900个工会会员中，解雇784人的方案，为工会所拒绝。为防止公司搬运半成品，工会得到富士制铁室兰工会（钢铁劳联系统的工会）和北海道煤矿工会以及其他工会的援助，结成了罢工纠察线。

9月,第二工会成立。为攻破第一工会和其他支援工会的活动分子组成的罢工纠察线,第二工会发起了进攻,造成很多轻重伤员。甚至出现第一工会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会员,被说服参加第二工会,又自杀的悲剧。

第一工会会员的家属,攻击第二工会会员的家属是“叛徒”。整个地区陷于互相憎恨的漩涡之中。政府为防止工会作出违法的举动,向都道府县的知事发出通牒,从其他府县调遣警察支援队,进入室兰。

11月29日,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干涉,并于12月17日提出了斡旋方案。公司表示了接受的意向。第一工会于12月26日,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为保全组织,决定接受斡旋方案。这样,持续了193天的大规模劳资纠纷的帷幕总算降落了。

12月30日,正式签订了劳资协议。作为重新募集希望退职职工一事,为适应当时的情况,采取了调整指名解雇的方式。最终有622人被解雇。后来,新工会(第二工会)逐渐扩大,到1955年5月,占全部工会会员的半数以上。旧工会(第一工会)逐渐缩小。

电产发生的劳资纠纷(1952年),日产发生的劳资纠纷(1953年),尼钢发生的劳资纠纷,以及日钢室兰发生的劳资纠纷(1954年)等等,都属大规模的斗争,但最终都以总评系统工会的失败而告终。在生产现场拥有很大发言权的各工会,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摆出了决战的姿态,可是经过激烈的斗争后,却失败了。炭劳、尼钢、日钢室兰这类罢工,采取的是一种由全体工人和家属参加的,使斗争扩大为地区性的,以地区支援来维持艰苦斗争的“全地区性”的斗争战术。然而,经营者的决心,大大出乎工会的意料。

经营者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支配他们的是不确立经营者的领导权，不促进企业合理化，在竞争中经营就会陷于破产的危机感。在经营者之间，已经确立了一种对无视经济一经营原则的强硬工会决不让步的原则。

透过劳资纠纷，实际上，企业之间的竞争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罢工中组成的日产汽车工会(第二工会)谴责全汽日产分会(第一工会)的领导人，“把日产的劳资纠纷引向泥潭，使竞争对手丰田、五十铃有利可图”。尼崎制钢和日钢的情况，反映出不迎合产业合理化浪潮的平炉钢厂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困境。害怕企业倒闭，就是经营者持强硬态度，以及担任一定行政职务的职工和普通工人组成第二工会的基础。

1953年，三矿联举行罢工时，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反而对工会有利。三井矿山的经营者，为因长期罢工造成市场为其他煤炭企业所占领而深感焦虑，选择了撤销裁减人员的方案。走暂时休战的道路。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休战。只不过是煤炭产业夕阳化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最后决战，稍稍推迟了一些罢了。

4. 总评系统工人运动的转折

反对军事基地的斗争

50年代，总评在开展增加工资和反对裁减人员斗争的同时，还致力于开展拥护和平运动和保卫民主主义的斗争。

1952到1953年，举行了反对建立防破法、修改劳调法和限制罢工法等的罢工。总评在这段时间里，还参加了由各地组织的反对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扩建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属于总评系统的日教组(日本教职员工会)举行了反对教育反动化的保卫教育斗争。

旧金山两条约生效后5个月,1952年9月,政府决定在石川县内滩村的沙丘上设置美军靶场。这一决定,首先遭到当地渔业协同组合的坚决反对,县劳评(总评的县一级组织)、左派社会党、劳农党、共产党共同发起了联合斗争。县议会也坚决反对。政府以1亿日元的“修订资金”为条件,获得了村长的同意,强行建筑工事。1953年3月18日,正式开始进行打靶。在1953年4月24日,石川选区参议员选举中,反对派改进党的井村德二(北陆铁道社长)当选,而吉田内阁的国务大臣,推进设立靶场的林屋龟次郎落选了。5月12日,北陆铁道工会决定拒绝运输军需物资,并决定在6月14日举行48小时罢工,7月11日又举行了96小时罢工。

6月2日,吉田内阁主持召开的内阁会议讨论决定,永久征地建造内滩靶场。当地的渔协、工会、左派社会党、劳农党以及前来支援的学生等等结成了统一行动组织。共产党最初也是采取统一行动的,但由于和其他团体不团结,被行动委员会开除。统一行动因村民们意见分歧,反对派成为少数,最终失败了。

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反对在位于群马县和长野县之间的妙义、浅间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斗争。因为决定在那里设立美军山岳战训练学校和演习场。选择这一地区的理由,是这一地区的山地接近于朝鲜的地形。在朝鲜战争临近签订停战协定之际,美军根据朝鲜战争的体会,还想继续加强在远东地区应付局部战争的能力。以群马县的左派社会党为中心,组成了由县属总评系统的工会参加的联合反对斗争委员会。在浅间山,有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的观测设施。东京大学的调查团认为,设立演习场会妨碍研究工作。在东京,学生组织了反对在浅间地区设立演习场的示威游行。征用浅间地区的计划撤销了。在妙义地区,警察和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政府对征用妙义地区的

方针不变。农民产生了动摇，斗争失败了。但到1955年3月，征用妙义地区的计划也撤销了。

然而，1955年，再次爆发了在各地扩建基地的问题。同年3月，美军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扩大正在使用的立川、新潟、横田、木更津、小牧5个基地。

东京都的立川基地扩建计划，是强行征收住有130户农家的5.3万坪^①土地，把基地北边的砂川町，分为东西两段，延长机场跑道。对此，首先遭到当地农民的反对，町议会也一致反对。町民们组成了反对联盟，在基地扩建时期，发起了阻碍其测量的活动。反对联盟得到了参加全学联的东京都内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以及参加总评的工会的积极援助。全学联的领导，受共产党的影响，共产党员的学生活动家从加强反美斗争这一战略观点出发，非常重视这次运动。然而，在普通学生中，对扩张军事基地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多，所以才组织起了具有群众基础的斗争。

从8月到9月，政府动员了2000多名警察，强行进行测量工作。警视厅机动队，手持警棍镇压阻止测量静坐示威的学生，以至发生了多起流血事件。砂川斗争一直持续了15年，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调整世界性的扩张计划战略时才停止。后来立川基地归回了日本。

保卫教育的斗争

这一时期，以日教组为中心，掀起了保卫民主教育的斗争。

日教组打着要求全面媾和与拥护和平四项原则的旗帜，开

^① 坪——日本的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等于3.3平方米。——译注

展了一场加强和平民主教育，独立自主地促进教育研究的运动。1951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教育研究集会。保守势力攻击日教组的做法，是依仗工会的力量，使教育带上政治色彩，向孩子们灌输左翼意识。

确实，作为工会的日教组，根据统一的方针，在教育现场直接宣传作为当时重大政治争论点的全面媾和论和和平四项原则一事，即使从自由主义的教育观点上来看，也是存在问题的。以此为开端，围绕教育问题，政治上的对立尖锐化。当然，保守势力批判日教组，决不会从保卫自由主义教育观点这一原则出发，而是针对战后的民主教育一事，提出疑问，倾向于对老的传统观念和原有的国家主义目标开展讨论，确立新的认识。围绕教育问题，右和左的分裂和对立公开化了。

对日教组聚集了全国的教员，并在学校内外开展政治活动一事，保守派的政治势力感到是一大威胁。保守势力为迎合国民中的保守心理，孤立日教组的活动，加强了反对日教组的宣传，内容具有强烈的恢复旧秩序的色彩。

以和平条约带来的独立为时机，吉田首相反复强调要“发扬爱国心，振兴道德教育”。政府也打算加强对教育的统制。代表经营者利益的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也积极主张要振兴教育。日经联强调“培养尊重劳动的风气”，“重视社会生活道德和修养”，主张充实职业教育、产业教育，扩充职业高中。片面强调爱国心和道德心，是同以保障人权为基础、以建立受权力意识支配的自由公民社会为宗旨的战后民主教育改革观念相对立的。这不能不理解为是立志于恢复旧秩序。另外，强调重视细分化的职业教育，不能不理解为无非是想从教育着手，为经营者的专制管理，提供顺从的工人。

政府和产业界首脑的态度，显然包含着废除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引进的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新教育观念的意图。这种尊重个人自由意识、发展个性，培养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负有民主社会责任的国民的自由主义观念的教育目标消失了。也就是说，战后教育改革理念中所要培养的那种以公民自由为基础，亲自创造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国民形象消失了；相反，这个意图描绘了一幅忠实地执行国家制定的目标，服从现有秩序，在经营者的强制统治下，在各个职业领域，不辞辛劳，一心埋头于工作的国民形象。随着致力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这后一种国民形象合法化了。

1952年，政府制定了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恢复了教师工资国库负担制（1953年4月实施）。日美开战前夕，1940年采用的由国库负担经费的制度，因夏普劝告于1950年废除。1952年恢复国库负担制的直接理由，是为了解决采用六三制新教育制度后，地方财政的困难。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加强了。

1953年，政府提出了义务教育学校职员法。该法以工资由国库负担为理由，把教员的身份定为国家公务员。日教组认为这是加强中央集权教育和官僚统制，意图在全面禁止教员的政治活动，为此，组织了保卫教育斗争。1953年2月28日，日教组在全国各地召开了“保卫教育大会”。结果，使政府公布的法律成为废案。

1954年，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关于确保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和“部分修改教育公务员特例法的法案”。目的在于规定教育的内容和限制教员的政治活动（5月通过实施）。对这些法案，日教组于3月14日到15日，采取一齐放假的战术，在全国举行了保卫教育集会（反对教育两法的斗争）。后来，1956年又开展了反对废除教育委员会公开选举制（改为任命制）和反对

加强教科书审定的斗争。1957到1959年,开展了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

拥护和平斗争

总评攻击吉田内阁的亲美路线,采取同“日本资本主义”对立的,要求增加工资和反对合理化的政策。

1954年3月,MSA协定(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签订后,总评竭力“反对日美安全保障重整军备和为经济军事化而实施的合理化”。高野事务局长等打算把总评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但高野路线也有下列弱点。

第一,不批判苏联的专制主义体制和共产党的武力革命方式(朝鲜战争是其中的一例),光把美国作为攻击的对象。

高野从苏联、中国是“和平势力”,美国是“战争势力”这一观点出发,认为日本也要开展加强和平势力、阻止战争势力的斗争。

总评系统的工人运动对和平的关心,反映了多数国民对重整军备的恐惧心情。然而,对形势的评价和实施的战略,本质上和共产党是一致的,无疑是偏离战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的,归根到底是没有国民基础的。

第二,没有把保持工会的发言权同通过经济、经营的合理发展,达到改善各种经济条件的目标联系起来,而是受传统的反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拘泥于反经营者=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中。

对与改善工人生活有关的产业合理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并作出了和经营者保持对立的选择。对这一选择,工人中间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或反对。为此,产生了响应经营者,组织第二工会的后果,并轻而易举地扩大了其规模。结果,导致工会分

裂。第一工会和第二工会对峙，逐渐发展成连家属也卷进去的悲剧性对抗。

总评高野执行部宣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重整军备的合理化”，但这一口号远远脱离现实。事实上，正是为了摆脱对以特需名义进行的军需生产的依赖，才切合实际地提出了合理化这一课题。而合理化需要裁减大量人员。政府的合理化政策也好，经营者的投资行为也好，都不是以日本经济的军事化为目标，而是力求使日本经济走向正常化。

从1949年确定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强行回到国际经济中时起，产业合理化就成为严峻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依靠特需名义下的军需，一时掩盖了其严峻性。可是，特需的减少，以及吉田的优先重建经济政策和包括总评在内的反对重整军备势力的存在，抑制了重整军备的速度，从而使希望通过日本重整军备来扩大军需生产的一部份产业经营者们的期望难以实现。这就是总的来说经济正常化占上风的原因。

产业合理化反映了随着经济基本趋于正常化所带来的环境条件的严峻性。

在日本经济正常化的过程中，企业间的竞争也不不断增强。这就要求每个企业的经营者，建立严厉的经营管理体制。这反映在经营者对工人运动采取决不手软的对策上。

总评高野执行部的反体制路线，是在共产党实施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几乎导致自灭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以战斗的阶级斗争主义来贯彻反体制运动路线，以达到发展拥护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势力的目的。但是，它却重复了把战后的和平主义搞成亲苏亲共的反美运动，把战后的民主主义利用来作为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这种政治偏向。从长远看，这种路线很可能转化成阻碍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巩固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反对原子弹运动和人权斗争

50年代，日本发生了拥护和平运动和扩大的民主主义运动，其内容大大超出总评执行部事先设想的开展反体制运动的范围。

1954年3月1日，以静冈县烧津港为基地的金枪鱼捕鱼船第五福龙丸，在太平洋上行驶时，遇上了美国在比基尼环礁上进行氢弹试验所产生的“死灰”。在美军规定的禁止入内的海域之外，离爆炸中心200公里。由于遭此灾难，23名乘务员都患上了放射性病。其中一位重病人，无线电队长久保山爱吉于9月23日死亡。然而，吉田内阁的外相冈崎腾男却发言说：“日本不应要求美国停止核试验。”

以这一事件为动因，东京都杉并区的主妇，发起了反对原子弹的签名运动，并迅速遍及全国。

1955年8月，在广岛召开了首届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这次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和禁止原子弹签名运动全国协议会，在会后联合成一个团体，于9月组成了禁止原子弹日本协议会（原子协）。

反对原子弹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受核武器侵袭的日本国民的拥护和平的运动，也是战后日本规模最大的国民运动。它促进了对战后苦于严重后遗症的，继续面临死亡恐怖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救济运动。

然而，就连这场反对原子弹的运动，后来由于党派之间在政治上的对立，也趋于分裂。在发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的1959年，自民党和受自民党影响的各个团体，退出了原子协。1961年，民社党和全劳会议组成了新的禁核会议。1963年，主张应该肯定苏联、中国进行核试验的共产党，反对原子协提倡的“反对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的方针。为此，社会党、总评等党

派也退出了共产党占极大多数的原子协，单独召开了世界性会议，组成了原子禁(禁止原子弹日本国民会议)。这样一来，反对原子弹运动，由于政治势力的对立而陷于分裂状态，丧失了国民基础。

发生比基尼事件的 1954 年，近江绢丝发生了劳资纠纷。

近江绢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由夏川社长一人经营，采用现代化前期的劳务管理。工厂的安全设施和女工宿舍很不完善，强迫青年女工在 8 小时之外和休息天加班加点，并不发加班工资，经常做出各种违反劳动基准法的举动。对劳动基准监督署所发出的命令当耳旁风；不加改进。由于原有工会(第一工会)是帮经营者说话的，在全纤同盟的领导下，又组织了新工会(第二工会)，开展斗争。这是 1954 年 6 月 2 日的事。

新工会提出的要求中，包括“允许结婚自由”、“不强制信教(佛教)”、“不私拆信件”等内容。因此，作为“人权罢工”而引人注目。分布在岸和田、彦根、中津川、大垣、富士宫、津工厂的就业人员，约有 5700 人参加了新工会，举行无限期罢工。长达 106 天的劳资纠纷，以 9 月 16 日经营者承诺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斡旋案而告结束，新工会取得了胜利。

同年 8 月，大阪证券交易所工会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也获得了胜利。在这之后，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地方银行也发生了劳资纠纷。这些罢工都带有浓厚的反抗无视劳动基本权，反对实行传统的劳务管理的色彩，具有“人权罢工”的性质。这些劳资纠纷，在大众传播媒介中也得到大量报道，获得了社会的同情。

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无视劳动基本权的劳务管理，大多发生在中小企业。劳资纠纷使劳资双方都遭冲击，成为改善劳动条

件的契机。这一举动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改革引进的劳动基本权思想，已经开始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底层。

总评领导层的交替

1954年4月，在所谓“混蛋解散”后举行的大选中，吉田自由党的议席降为199席，超过众议院议席的半数。这时，高野为阻止吉田内阁重新组阁，提议推举改进党的重光葵为指名组阁候选人。当时，共产党也采取了这一战术。

重光在日美开战时，曾在东条英机内阁中任外相。战后，也出任过东久迩宫内阁的外相。1948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判处7年徒刑，1950年被假释出狱。1952年2月当选为改进党的总裁。

共产党和高野推举重光为组阁候选人的理论基础是：“美国是战争势力，苏联、中国是和平势力”。共产党和高野提倡重光组阁论，采取的是打击以吉田内阁为代表的日本国内的亲美“战争势力”，加强“和平势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术。

就连一直受总评支持而使议席增加的左派社会党主流，也反对拥立重光论。左派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对“苏联、中国=和平势力论”进行了批判，认为形成一股没有美苏参加的“第三势力”，才是最重要的，并主张，与其同重光组阁论这样的保守派搞政治合作，还不如先加强左派社会党的建设。5月19日，选举指名组阁人选的投票结果，吉田茂为204票，重光葵为116票，废票为77票，少数执政党组成的第五届吉田内阁宣告成立。

这一时期，总评内部的路线对立也公开化了。

在1953年7月8日到11日的总评第四次大会上，如前所述，全纤同盟等民劳联系统的工会对高野执行部进行了批判，但

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就在这次会议上，合化劳联的太田薰等人站在不同于民劳联的立场上，批判了高野路线。太田于1912年(大正元年)出生于冈山县，当时是41岁。战前，毕业于大阪大学应用化学系，后在宇部兴产工作。战后，从该公司的课长转任为工会负责人。合化劳联成立后，当选为委员长(1950年)。

在1954年7月12日到15日的总评第五次大会上，反高野派打算拥立太田为事务局长，但高野以140票对107票再次当选为事务局长。然而，根据太田的建议，在大会召开之前由不同产业代表参加制定的运动方针方案，还是采纳了太田的意见，主张“工人运动的中心应放在各企业争取统一工资斗争方面”。

1955年，根据这一方针，组织了首次春季斗争，要求增加工资(春斗)。然而，由于太田领导的第一次春斗和高野领导的第二次春斗，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增资的幅度很小。

在1955年7月26日到29日总评召开的第六次大会上，反高野派拥立国铁工会的岩井章为事务局长。岩井1922年(大正十一年)出生，33岁。毕业于长野县的高等小学，进入国铁后，任火车司机。战后，参加工人运动，成为国铁工会的干部。投票结果以128票对123票，岩井领先，但没过半数(130票)。重新投票时，由于高野辞职，确定岩井为事务局长。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太田—岩井路线。岩井直到1970年为止，一直担任总评的事务局长，太田在1958到1966年这段时期，担任总评的议长。

太田和岩井的上台，既是总评路线的转折点，又标志着领导人的交替。

高野实生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在早稻田大学理工科上学时中途退学。受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者猪俣津南雄理论的影响，参加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刚建党的日本共产党(不久解

散)。曾先后担任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的组织部长、机关报部长。在人民战线事件(1937到1938年)中被捕。1955年,高野为50岁一代的人,太田为40岁一代的人,岩井为30岁一代的人。战前高野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献身于工人运动,但太田和岩井都是在参加工作后投身于战后的工人运动的。高野在辞退总评事务局长后的1956年,正式加入共产党,但在1968年,由于在中国问题上和党中央持对立态度而被开除出党。

太田—岩井路线确定的春斗方式,在后来的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一种重要的决定分配的方式。

在主要按企业组织工会的日本,由于工资交涉实际上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所以,产业组织和全国中央组织的影响有一定的限度。然而,不同企业在增加工资的交涉中,工会方面对于企业相互间的竞争是否会不利于本公司往往抱有不安全感,成为谈判的一大障碍。把同一产业系统要求增加工资的幅度统一起来,统一交涉时间,由实力强的企业工会决定增资幅度,这种春斗方式是解决上述难题,实现全面增资的有效方法。实力强的企业工会提出增资“幅度”后,其他各产业、各企业的经营者和工会就会参照这一幅度,试探适当的妥协标准。

以电产型工资体系为基础,总评提倡的保障生活费用的工资要求,最后还加进了日本式的年功工资体系。这种体系可以与重视劳动者个体的技能、与经验的日本式劳务管理相结合,另外,根据年龄的连续工龄增加工资的做法,可以培养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心,使劳资关系趋于稳定。

总评的工人运动,虽然原则上仍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作为有力的指导思想,但现实是,经营者领导下的企业经营与在保守政权统治下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在和工会运动相统一的趋势中发展的。

50年代的政治，虽然表面上可以看到存在两种政治势力的激烈冲突。一种是打着“和平与民主主义”的旗号，同革命主义色彩很浓的反体制思想关系密切的“左倾”运动。另一种是同企图恢复战前秩序的“逆流”密切相关，执行亲美和促进重整军备政策的“右倾”势力。然而，在当时，日本社会的潜在趋势，实际上是在大力推进产业的合理化和实现经济增长的起劲。

所谓的“逆流”，事实上也并没有得到明显的进展。50年代前半期，“向左转”的总评工人运动所发动的激进斗争方式，一方面，同共产党的极左方针结合在一起，令保守势力忧心忡忡，起到了刺激“逆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成为一支抵抗“逆流”的力量。要对其意义和作用作出正确的评价是很困难的。

总之，事态还是在朝着同各主体所希望或预想的相反方向发展。战后的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还是逐渐渗透到了国民的底层。因此，在战后的世界经济中，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参与战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驱使经济运行的巨大力量，也开始强烈地冲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九章 战后政治的重新组合

1. 保守政治的转机

吉田—鸠山的对立

媾和独立实现后，开始了战后政治的重组。从道奇路线的实施到旧金山体制的确立这段时期执政的吉田内阁，面对保守势力内反对势力的挑战，只好败下阵来。

实际上，作为强有力的专制政府、靠盟军总司令部的支持维持政权的吉田内阁，随着1952年4月占领状态的结束，其统治基础就已不稳。而吉田体制崩溃的直接起因则是占领状态结束后解除了对政治家们的褫夺公职处分。在所谓“混蛋解散”之后，于1953年5月组成了第五次吉田内阁。但这是少数执政党内阁。

事实上，芦田内阁倒台后于1948年10月组成的第二次吉田内阁，也是民主自由党的少数执政党内阁。可是，吉田的民主自由党在1949年1月的大选中却以269个议席（占总议席的57.7%）的过半数优势获胜。而且，同年2月组成的第三次吉田内阁吸收了民主党的两名议员入阁，采取了保守联合体制。当时，民主党议员分裂为联合派与在野派两大派。在芦田均因昭电事件被捕后继任总裁的犬养健和干事长保利茂等，属于联合派；芦田以及少壮的中曾根康弘、圆田直、稻叶修等成了在野派。1950年3月，民主自由党吸收了民主党联合派，并改名为自由

党。同年4月，民主党在野派也与国民协同党合并，组成国民民主党（总裁为吉米地义三）。众议院议席的情况是：自由党286席，国民民主党67席，社会党46席。吉田内阁就是在这种自由党占稳定多数的基础上，从占领时代后期一直执政到媾和独立后的初期。吉田内阁期间，执行了道奇路线，推行了对共产党的限制、产业合理化政策、重整军备，以及签订与批准和平条约与安保条约，制订防止破坏活动法等。

1951年10月，社会党在对待媾和条约上发生分裂。在1952年秋与1953年春的大选中，得到总评支持的左派社会党的席位大增。

在和平条约生效前后，多数政治家被解除了褫夺公职的处分。旧立宪民政党系的大麻唯男（东条内阁国务相）、松村谦三、堤康次郎等，于1951年组织了新政俱乐部。1952年2月，国民民主党吸收了新政俱乐部与农民协同党，结成了改进党（总裁为重光葵）。旧政友会系的鸠山一郎、河野一郎以及策动拥立鸠山的旧民政党系三木武吉和在第一次吉田内阁任藏相后遭清洗的石桥湛山等，在解除清洗令后加入了自由党。以甲级战犯被逮捕而免于起诉的岸信介（东条内阁商工相），也在解除清洗令后与战前的伙伴结成了日本再建联盟。该联盟在1952年10月的大选中遭到了惨败。后来佐藤荣作（岸信介的亲弟弟）让岸信介加入了自由党（1953年3月）。鸠山是在1946年5月即将组阁的前夕被清洗的。组阁的事便让给了吉田。鸠山在解除清洗令后，曾要求吉田让还政权，但遭拒绝。1952年8月28日的“突然袭击解散”，是为了抢在以解除受褫夺公职处分的政治家们为中心的自由党内反吉田派做好准备之前进行大选。可是，即使在10月1日的大选以及10月30日第四次吉田内阁组成之后，吉田体制也没有逃过不稳定的局面。11月27日，通产相池田勇人在

众议院回答加藤勘十(右派社会党)的质询时,讲了“五人、十人的中小企业破产,自杀,是不得已的事”这种话。第二天,改进党、左右两派社会党、劳协党等在野党共同提出了对池田通产相的不信任案。自由党内的反吉田派也采取了缺席战术。结果该提案以280票对201票通过。池田只好辞职。

1953年2月底首相的“混蛋”发言及由此而产生的3月14日内阁不信任案的通过,也反映了自由党内反吉田势力的抬头。大选后,吉田自由党想与改进党联合执政。但改进党的三木武夫等在野党派主张由重光葵组阁,并向左右派社会党游说。5月19日被提名组阁的人选有吉田、重光、铃木茂三郎(左派社会党)、河上丈太郎(右派社会党),票数分散。结果,通过投票表决才让吉田组阁。

这样,第五次吉田内阁虽是少数执政党组成的内阁,但在基本施政政策上,保守势力有着共同的认识,在重要法案的审议方面还是通力合作的。罢工限制法的成立,就是这一年8月的事。

吉田内阁的崩溃

1953年11月,鸠山自由党包括鸠山本人在内的主流派,回到了自由党。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等留下的8个人,结成了日本自由党。

1954年1月,发生了造船贪污事件。与计划造船和造船利息补给法(1953年1月5日公布)有关的造船、海运界,向政治家和官员们行贿,受到追究。1月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开始搜查,并逮捕了造船工业会会长丹羽周夫(三菱造船社长)、造船工业会副会长土光敏夫(石川岛重工业社长)等71人。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以从造船工业会与船主协会受贿2500万日元的嫌疑,自

由党政务调查会长池田勇人以从饭野海运社长俣野健辅那里受贿 200 万日元的嫌疑,也分别受到审查。池田的案情,经过调查,被认定是他在 1953 年 10 月以吉田首相私人特使的身份访美,就防卫问题与美国副国务卿助理罗伯逊等会谈时接受的“饯别”(临别纪念品)。4 月 19 日,首席检察官决定以受贿罪嫌疑请求逮捕佐藤荣作。总理大臣吉田、副总理绪方竹虎、法务相犬养健等经过协商,决定使用法务相的“指挥权”,指示检察厅将逮捕推迟到国会开会终了时^①。因错过了逮捕时机,后来检察厅只能以违反政治资金规制法的嫌疑而对佐藤进行起诉。这一事件的结局是:企业界与官界的饭野海运副社长和运输省官房长等 17 人被判定有罪。在搜查过程中,石川岛重工业的董事与运输省的课长助理自杀。

为了扭转吉田内阁的逆境,副总理绪方于 3 月 28 日提出了保守政党合并的建议,但遭到改进党的拒绝。4 月 24 日,改进党大部分议员对左右派社会党提出的内阁不信任案投了赞成票,但该提案没有通过。4 月 28 日,自由党反主流派、改进党、日本自由党的国会议员约 200 人,结成了建立新党促进协议会。7 月 3 日,该协议会又发展成了建立新党筹备会(事务局长岸信介,组织委员长石桥湛山,政策委员长芦田均)。自由党干事长池田勇人等曾表示打算让自由党也参加,但被筹备会拒绝。11 月 24 日,日本民主党宣告成立。总裁为鸠山一郎,副总裁为重光葵,岸信介任干事长。

12 月 6 日,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联合左派社会党书记长和田博雄、右派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共同提出了对吉田内阁

^① 《日本国宪法》第 50 条规定:“除法律规定外,两议院议员在国会开会期间不受逮捕。”又据日本《检察厅法》规定,法务相对犯罪搜查有指挥监督权。
——译注

的不信任案。吉田虽曾考虑再一次采取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的做法,但是遭到绪方等亲信的反,只好总辞职。第一次吉田内阁以来,吉田担任首相先后总共达7年之久。

左右两派社会党,以提前解散众议院为条件,采取了对鸠山组阁合作的方针。12月9日、鸠山、铃木茂三郎(左派社会党)、河上丈太郎(右派社会党)三党领袖发表了“鸠山内阁将在国会休会期满(1955年1月下旬)后解散众议院”的共同声明。在同日的提名首相投票中,鸠山一郎得257票,绪方竹虎为191票。日本民主党虽在众议院中只有121个议席,但仍组织了单独内阁。12月10日鸠山内阁宣告成立。副总理兼外相为重光葵,藏相为一万田尚登(前日本银行总裁),河野一郎任农相,石桥湛山任通产相,运输相由三木武夫担任。

保守路线

吉田内阁垮台的直接缘由是自由党的分裂与反吉田保守势力的集结。吉田、绪方、池田等,为了增强吉田内阁,曾策划保守政党合并;而改进党和鸠山派则认为保守政党合并的前提是“吉田退位”。被称为“独断独行首相”的吉田,以其强硬的政治姿态在日本好不容易回到国际社会的困难时代发挥了领导作用。可是,执政时间长了,对他的批评和反对也多起来了。美军基地扩建所带来的纠纷以及氢弹试验受害等,使吉田内阁的“从属美国”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在造船贪污事件上使用“指挥权”,使社会上对吉田的评价更加恶化。这样,就不能进行吉田主导的保守势力改组。但是,如果吉田退位,保守政党的合并便会很快成为现实。因为政治家们已对离合聚散感到疲倦,开始强烈要求合并。合并已成为保守势力共同的目标。虽然对抗的起因是吉田和鸠山的对立,因此,吉田退位情况就会完全改变。但是,这一时期

保守政党合并形势的高涨还有更大的背景。

促进保守政党合并的第一个原因是，新的保守势力主流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政策路线。战败后经过近10年，到媾和条约生效，保守政党的基本路线大致形成。特别是改进党的主流派与自由党的鸠山派在日本的前进方向上有着共同的见解。它成为吉田下台后保守路线的主流。其精神体现在日本民主党的下列纲领中：

(1) 在民主主义之下，整顿政界，以期议会政治的焕然一新。

(2) 根据国民的自由意见，修订占领以来的各种制度，完成“独立自主”。

(3) 开展自主国民外交，以期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现亚洲的复兴与世界和平。

(4) 根据综合计划，确立自立经济，以期实现社会正义下的民生安定，建设福利国家。

(5) 基于人类博爱的理念，排除阶级斗争，加强民族团结，伸张道义。

日本民主党的政策大纲，提出了建立“与国力相适应，达到均衡的、少而精的自卫军”，促使美军撤退以及把日美安保条约改为双方承担义务等方针。这是一种消除从属美国、保持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方针。也是一种可以叫做新宪法体制和修改旧金山体制的路线。只是其方法比较稳健。谋求在慎重地研讨内容和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的前提下，对宪法进行修改。在外交方面，以“自主国民外交”为口号，实现与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亚洲各国的邦交正常化。

鸠山、吉田、重光、岸等战后保守势力的领导人，都是与推行“大日本帝国”有关的人物。显然他们在战后都是要被追究在战

前、战时的责任的。他们之中多半本来就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们在战后之所以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民主制度，是出于政治家适应时代潮流的考虑。

左翼势力把吉田内阁、鸠山内阁、岸内阁的政策全都贴上“倒退路线”的标签，新闻媒介也作了大量批判的报道。可是，保守的政治潮流并不是单纯地依照“倒退路线”行动的。鸠山、岸等民族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卷进日本重整军备促进论的行列。可吉田虽然着手重整军备，但他却抵制了增强军备。吉田认为不仅重整军备的负担会妨碍日本经济的自立，而且强大的军队建设有再次使文官控制陷入困境的危险。鸠山、重光、岸等则批评吉田的这种路线，主张配备与独立国相适应的军队。这种政策很可能引起深受第二次大战祸害的国民的强烈反对。左派社会党的铃木茂三郎曾号召“青年们，不要再拿枪了”。这不仅是理性的政策建议，而且是生动的政治口号。它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此外，依照想摆脱从属美国状态的民族主义的主张，在美苏对立的现实国际政治下，却反而可能会随着日美军事同盟的加强加重日本的负担。如若追求日美同盟前提下的“对等性”，美国当然要求日本在军事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便是“与独立国相适应的军队”，也不可能确立单独可以与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相对抗的完全防卫体制。所以，结局还是要对美国的世界战略进行合作。有的时候，很可能发生根据美国的要求把日本军队派往国外的事态。

要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除取消日美同盟外，别无他法。可是，保守政治势力及支持他们的产业经营者们，对共产主义抱有警戒心。他们为了防止苏联的直接、间接“侵略”，而不肯放弃与美国结盟的政策。要取消日美同盟，实现日本的中立化，其不可

缺少的前提,是美苏中等相关各国确立相互信赖,签订关于日本安全保障的国际协定。保守政党的主流派,并没有提出这种大转变的政策思想。

日本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对美国的世界形势观进行明确的批评,也没有根据独自的世界形势观来追求独自的外交政策。

战争结束后已经10年的这一时期,在西欧也出现了重新评价对美关系的动向。它意味着,随着经济复兴的进展,出现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西方世界确立的压倒优势的反作用。开始出现了政治、外交的多极化倾向。日本保守势力中间产生的国家主义,从全球观点来说,也是这种向多极化发展的一个环节。然而,日本保守势力的民族主义,在重新评价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与西欧相比,却具有相当的不彻底性。

尽管如此,随着改进党和鸠山派明确了保守的基本路线以及保守势力集结的活动日益频繁,社会党、总评等左派的反吉田路线与鸠山、岸等右的反吉田路线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明显。此外,随着保守新路线的形成,原国民协同党系的三木武夫等自由主义中间派,在保守派内部成了少数派。他们的独特的“协同主义”和对外政策上的和平共存、中立志向,都不具备维持作为独自势力的力量。三木等在1953年4月“混蛋解散”大选后,立即为拥立重光向社会党活动。可是,左右派社会党并没有与重光等联合的意思。

如果说要找出能够使拥立重光的改进党与这一时期左翼势力连在一起的共同点的话,那只有“反对从属美国”这一点是相同的。共产党和总评的高野事务局长等提倡的“拥立重光”推进论,就是所谓左右两翼国家主义的联合提案。可是,共产党和高野是主张取消日美同盟,确立与他们称为“和平势力”的苏联、中

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重光等则始终认为应该在反苏联、反共产主义的日美同盟之中加强日本的自主性，建立日本自己的国防军。

对第二次大战后保守势力的变迁进行过探索的富森叡儿，关于当时的状况，曾指出：保守势力虽分为吉田自由党、改进党、鸠山自由党，但都明显地存在着“保守”这种共性。因此，象发生在1947至1948年那种由保守势力的一部分人与革新势力联合建立中道政权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参见富森叡儿《战后保守政党史》〔日文版〕P.53）

财界的发言

保守政党合并的第二个原因，是财界即大产业经营者阶层的团结与政治发言力的强化。

产别会议的崩溃以及“向左转”的总评系工人运动的受挫，使经营者阶层掌握了产业的领导权。同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势力，经营者阶层为了私有企业体制的安全与强化，也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行使其影响力来要求建立保守稳定的政权。

对保守政治势力来说，财界成了战后筹集政治资金的唯一来源。曾经是战前许多政治家的后盾的农村地主势力，随着战后的土地改革与通货膨胀，已经没落了。而随着大产业的急速复兴，经营者阶层的社会地位则加强了。在政治资金来源方面，财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保守势力的社会基础，仍是农村的传统秩序占压倒优势。1952年在静冈县上野村发生的事件，很能说明这种情况。1952年5月，在举行参议院议员补缺选举时，部落的实力人物到处在收集投票场的入场券。同一人物曾几次投票。选举管理者

对此竟然默许。这一事件是住在该村的一名富士宫高中女学生投书告发的。警察对村长等十几个人进行了审讯。可是，部落的人们却对此少女的全家实行了“村八寸”惩罚。“村八寸”是除婚礼和葬仪以外停止一切交往的自古沿袭下来的制裁法。当时的农作业还要靠人力。在插秧、割稻等农忙季节，需要在部落内相互提供劳力。该少女之父当过警官，只有小规模农地。农忙期，他被别的农家雇佣，以维持生计。“村八寸”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经济打击。第二年，某电影制片厂想把这一事件拍成电影。可是，部落的人们却集体阻挠拍摄外景，并对少女的家庭施加了暴力。

选举中的这种违法行为，以农村为中心在全国各地都有。“村八寸”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保守势力就是依靠这种社会结构，靠着农村旧势力的支持来获得议席的。

可是，要获得农村的有力人物维持选举的地盘，就需要资金。而且，保守政党既没有建立拥有众多党员的组织，也没有确立靠党员的党费或由党员去筹集资金这种现代化大众政党的体制。

不过，除了共产党和后来的公明党这类意识形态政党和宗教政党外，大众政党问题在日本的所有政党中都存在。社会党也没能建立大众的政党组织。50年代左派社会党在总评的支援下得到较大发展，正是由工会这一大众团体弥补了社会党的这一弱点。可是，总评—社会党集团的形成，一方面使社会党拘泥于总评的立场，脱离了更广泛的国民，因而无法使它成为能够提出现实性改革政策的强大的在野党。另一方面，把工会与特定的政党实行系列化，也有损于工会作为由各种立场的劳动者所组成的大众团体的活动。

财界与保守势力

随着保守政府的长期化,保守派的政治家们的得票数,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行政补助金“许诺”。然而,为了维持自己的后援会,还必须收养一批地方的实力人物和地方议员。这就需要巨额的政治资金。这笔资金越来越多地要由财界来供给。政治资金的某些部分是以对特定的产业或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为约定交换条件而提供的。从昭电疑案和造船疑案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这种政治资金的授受成了保守政治的一种传统。财界也为了保持保守的统治而甘愿承担筹集政治资金的任务。

这种政治资金,虽然谈不上是为了特定的产业、企业而收买政治家,但却具有整个日本政治体制全部被财界所收买的性质。这种资金几乎全都不是经营者的私人资金,而是由企业经理计算在“酬礼费用”上的“企业献金”。直到后来,甚至有的经营者,自己利用大企业的工会来推行“企业团体”的选举,以支持特定的候选者。从业人员出于职业生活的需要,被迫从属于所属工会的特定政治立场。这种背离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常识的行为,当然要受到舆论的严厉批判。

日本的产业经营者阶层,一方面在促进产业的合理化与日本经济的现代化,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在与旧的保守势力联合。他们特意支持保守的政治势力,是为了对抗左翼势力,确保政局的稳定性,维持现有体制。

吉田内阁末期保守政治势力出现了离合聚散的局面后,对此感到不安与不满的产业经营者阶层,便成了保守势力合并论的最热心的推进者。财界团体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在战后政治史上也算得上最活跃的政治发言。经团联、经济同友会等财界各团体,反复地呼吁保守势力合并的必要性,谴责保守派的内部抗争。

财界领导者们认为，一旦吉田内阁不得人心，就应该让吉田下台，以保持保守势力的团结。为此，他们施加了倒阁的压力。1954年12月，面临对内阁不信任，吉田打算以解散国会进行大选来对抗时，财界元老向绪方和池田发出了“即使解散国会，也不用想得到政治资金照顾”的通告。这就是吉田交出政权的直接缘由。

以往是政治家分头向财界要求提供资金，财界改变了这种做法，采取了统盘解决的办法。1955年1月13日，财界领导层设立了经济重建恳谈会，统一处理政治资金问题。但由于舆论界对企业政治献金进行批评，于1961年3月解散。同年7月，自民党设立了国民协会，从国民各阶层广泛地募集资金，但实质上仍是财界的献金机关。

财界领导层在设立经济重建恳谈会以使政治资金供给体制合理化、一元化的同时，更加强烈要求保守势力的团结。在财界看来，需要资金的保守政党，如果处于分裂状况，将给资金供给带来不便。据此，财界要求保守政党合并。然而，产业经营者阶层最关心的，是阻止左翼政治势力的发展。对产业经营者们来说，保守势力的内部抗争会被左翼势力利用，这是他们最耽心的。

保守势力的危机意识

保守势力合并的第三个原因，是左翼政治势力的逐渐增强。

50年代中期，以共产党—产别会议和总评高野指导部等为代表的革命主义势力减弱，在国会中保守势力仍保持压倒优势。可是，社会党的得票率和议席却逐渐增加。特别是受到总评支持的左派社会党，增势更加显著。

先来看看大选的得票率。1952年10月的大选，自由党占

47.9%，改进党为18.2%，两党合计达66.1%。保守派的合计，1953年4月达65.7%，1955年2月为63.2%，都超过60%，但出现了下降的征兆。另一方面，社会党左右两派的得票率在逐渐增加。尤其是左派社会党，1952年10月为9.6%，1953年4月达13.1%，1955年2月又上升到15.3%。社会党系三党(左右两派社会党与劳农党)的得票率，1952年10月为21.9%，1955年2月达30.2%。

从获得议席数来看，1952年10月大选后，保守政党合计为325席(占总议席数的69.7%)。1953年4月为310席(占总议席数的66.5%)。1955年2月为297席(占总议席数的63.6%)。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社会党系三党，1952年10月为115席(占总议席数的24.7%)，1955年2月上升到160席(占总议席数的34.3%)，3年半就增加了45个议席，获得了三分之一的议席数。

再从参议院议员选举后的各党派席数来看。1950年6月，自由党与国民民主党合计为107人(占议席总数的42.8%)，社会党与劳农党合计为67人(占26.8%)。社会党合并与保守政党合并后的1956年7月的选举，自民党为124人(占50%)，社会党为81人(占33%)。绿风会等的人数在下降。参议院在向“政党化”发展。

社会党系在众参两院势力的增强，对保守势力来说是个威胁。而且，左右两派社会党合并的气氛从1954年春季起更加强烈。保守势力感到再也不能这样分裂抗争下去了。当时，由保守政党内部的自由主义、中间势力独自形成中间政党，进而与社会党合作，取代保守的统治，实行所谓中间与革新联合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保守政党内部的自由主义、中间势力不仅过于弱小，而且他们与社会党之间的距离太大。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很深的

左派社会党与保守政党内部的自由主义中间派之间的距离就更大了。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在刚刚经过战败后的混乱期之后，便由战前型的两大保守政党时代转入了战后型的保守与革新两大势力对峙的时代。

保守势力的政治领导人与财界领导人，对左派社会党的壮大特别感到可怕。左派社会党，当时虽采取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方针，但其内部的马克思主义派却很有实力。支持左派社会党的总评，虽说出现了向现实的工会主义转变的苗头，但依然依据阶级斗争理论倾向于劳资斗争。

为了排除左翼势力掌权的危险，保守势力中很多人认为必须确立保守的长期稳定政权。为拥立鸠山而坚持与吉田进行过争论、吉田下台后又大力推进保守政党合并的三木武吉，曾经说过：“打算切断日本全部动脉的二一大罢工之所以停止，虽然直接原因是麦克阿瑟发出指令，但实际上是由于它引起了几乎全体国民的反感，这样看恐怕才是正确的。这种反感正是来源于保卫日本的保守思想。”

三木武吉要求实现代表这些保守国民的政治势力的团结。他认为保守势力必须起到一种能够抵制左翼渗透的抗生物质或抗体的作用。富森叡儿在谈到三木以及三木所攻击的对象吉田之间的差异时，作了下述评论：

“看来，吉田是从衡量国际关系方面的得失来制订战后保守路线的；而三木则是以本能地厌恶激进政策和社会混乱这种大众保守意识为基础来考虑战后保守体制的。”（富森叡儿《战后保守政党史》〔日文版〕第P.69）

然而，保守势力中间，也有人期待，如果由于保守合并而形成保守与革新两大势力对峙的政治结构，那么，“革新”势力方面就会转向通过议会制来参与政权的现实主义立场，从而有助于

克服旧有的意识形态左翼运动。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实质上就是将接替鸠山担任下届首相的岸信介，反复强调保守革新两大政党论，提出了采取英国式的小选举区制的构想。小选举制是在鸠山内阁执政时就曾试图实现，并为此于1956年3月向国会提出了法案。可是，社会党方面因怕由此而导致社会党议席大幅度减少，担心可能会强行修改宪法，因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

在政界重组过程中，保守与革新之间相互作用，为了对抗对方的行动，都急于进行合并。左右两派社会党，虽然为了达到打倒吉田内阁这一当前的目标而以实施大选为条件，在鸠山内阁的成立上进行了合作，但后来对于出现了出乎预料的“鸠山热”却感到不安。于是，赶在保守势力之前实现了再合并。社会党的这一行动又反作用于保守势力，促使保守政党加速合并。

2. 1955年体制

鸠山热

鸠山首相于1954年12月组阁后，即根据日本民主党的“自主国民外交”政策路线，表示了愿与苏联、中国进行交流、和平共处、恢复邦交的姿态。

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与苏联、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便成为有待解决的日本外交重大课题。和平条约生效后，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1952年9月被苏联使用否决权加以否决。与苏联的邦交，是日本加入联合国不可缺少的条件。苏联方面也对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表示了关心。1954年9月12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回答《中部日本新闻》(后称《中日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准备考虑对日邦交正常化。12月10日鸠山内阁成

立。16日，莫洛托夫再次表示了邦交正常化的意向。22日，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认为“旧金山和约不会成为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障碍。”

鸠山的“自主国民外交”，也得到了中国的反应。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日本即使不与美国断绝关系，也可以实现同苏中的邦交正常化。”

重光外相对同苏中恢复邦交持消极态度。1955年1月6日，重光发表谈话说：“日本的外交，第一是与美英协调，第二是与亚洲各国亲善，第三是与中苏调整邦交。对中苏关系，应该等待时机成熟，而不能轻举妄动。”然而，鸠山首相却对日苏邦交正常化抱有强烈的意向。对以批判吉田的“从属美国路线”而上台的鸠山来说，这当然是他的重要政治课题。

1955年1月7日，占领时代的苏联代表团首席代表代理杜莫尼茨基，对鸠山进行了私人访问。吉田内阁时，在媾和条约生效后，曾要求苏联代表团撤退，但苏联方面不予理睬而留了下来。这样，日苏的接触就在东京开始了。杜莫尼茨基建议实现日苏邦交正常化，鸠山对此表示赞赏。25日，杜莫尼茨基再次访问鸠山私邸，亲自递交了“苏联政府打算任命在莫斯科或东京进行谈判的代表”的文书。

鸠山内阁，按照组阁时的许诺，于1955年1月24日解散了众议院，2月7日进行了大选。大选中，鸠山的声望之高，出乎意料。

鸠山一郎，1883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东京。父亲是位法律家、政治家，明治时代曾任众议院议长。一郎曾任东京市会议员，1915年（大正四年），才32岁就成了众议院议员，并加入了政友会。1927年在田中义一内阁任书记长官，1931年又在犬养毅内阁担任文相。鸠山文相曾以著书带有共产主义色彩为由建议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滝川幸辰辞职，但遭到该大学法学部教授会的抗议。于是，鸠山便叫滝川等许多教授退職。后来，鸠山虽对大政翼赞会持批判立场，战后又成为自由党总裁，但由于他在战前所写的赞赏希特勒的文章被外国记者追究，因而被开除公职。

1951年8月，鸠山被解除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但临解除前的同年6月，他在私邸与伙伴们就解除处分后的打算进行商议时，突然脑出血。于是，他只好拖着致瘫的身体重返政界。在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等人的协力下，在72岁时好不容易执掌了政权。吉田茂辞职时是76岁，但他第一次组织吉田内阁时只有67岁，第二次组阁时是70岁。

高龄与病身是鸠山的不利条件。但保守派的选民们对这位因占领政策而失去机会的不走运的政治家深表同情。也由于这些选民们对吉田长期执政的不满而对鸠山抱有期望。鸠山内阁的民族主义，也赢得了对长期占领及对此抱合作态度的吉田内阁感到厌烦的国民们的支持。于是，便出现了“鸠山热”。

社会党对这种局面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鸠山的日本民主党公然提倡修改宪法。如果民主党的议席大幅度增加，再得到自由党的合作的话，修改宪法就有可能实现。修改宪法，按规定需要在国会参众两院各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才能立案，然后在国民投票中获得过半的票数才能成立。当时，保守势力的议席已接近三分之二。主张护宪、非武装、中立的左派社会党，当然要反对修改宪法。右派社会党也以“一旦保守势力确保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就会实现修改宪法、重整军备与征兵制”为由，采取了反鸠山路线的鲜明立场。左右两派社会党约定在大选后重新实现统一，共同对抗“倒退路线”，并提出了“民主护宪”的共同口号。

大选的结果，鸠山的日本民主党虽获得185席，成为席位最

多的党，但仅占总议席数的39.7%。替代吉田任总裁的绪方竹虎统率的自由党，循照惯例在大选后要推举得票最多的大党出任首相，投了鸠山的票，因而第二次鸠山内阁的成立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保守势力却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的议席。左右两派社会党与劳农党的议席合计为160席(占总数的34.4%)。加上共产党的2席，共占众议院总议席数的34.7%。当时，修改宪法是不可能的。保守阶层中间虽然有一股“鸠山热”，但其他国民却不如此，相反地，对修改宪法的提案抱有危机感，因而大力支持社会党。

社会党的统一

社会党的重新合并问题，自1951年10月发生分裂以来早就在两派内部有所议论。在国会内处于少数派地位的社会党，产生分裂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可是，在合并问题上，在左右两派社会党内都有人反对。两派社会党在政治路线上存在很大差异，作为其背景的社会思想也是根本对立的。

1954年1月21日至23日的左派社会党大会，在对纲领草案进行部分修改后加以通过。原案是站在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写的，认为日本的基本矛盾是日本垄断资本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当前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为对抗1951年日本共产党新纲领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路线而提出的。大会虽然补充了也重视民族独立斗争的修改内容，但基本上还是承认了原案的提法。左派社会党的青年团和马克思主义者团体社会主义协会系统的活动家们，认为两派社会党合并关系到否定“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因而加以反对。可是，委员长铃木茂三郎等在反吉田、反对重整军备问题上却与右派社会党在国会中采取了联合行动。到了吉田内阁末期，出于对社会党执

政的期望，以国会议员为中心，加强了合并的活动。

总评的高野实，从“国民总抵抗”的立场出发，主张把劳农党也合并进来。这种主张属于共产国际人民战线论以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战术思想。可是，劳农党认为左派社会党内存在着过于容共的反对论，不容易统一。

这一时期左派社会党势力扩大的部分原因，是左翼势力期待寻求一个能代替衰退了的共产党的政党。然而，左派社会党的支持者并不都期望它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党。更多的是期望它是一个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议会制度为前提，能阻止保守、反动势力的“倒退路线”的强有力的在野党。随着战后改革的成果向国民中渗透，以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与农村传统社会的解体，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已在国民中扎根，因而对社会党的支持者增加了。

战后初期，以对战争的记忆和经济上的穷困为背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主义得到了相当多的人支持。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实现，更多的国民转向了重视议会制的改革主义方面。社会党左派，即没能准确地预测到这种变化，当这种变化成为现实时又没有正确地承认现实。因此，往往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所采取的对策也往往失败。从而难以使50年代社会党的成长与60年代的发展连结起来。

关于社会党的重新合并，在右派社会党中也存在着赞成与否定两种观点。与总评高野指导部对立而分裂出去的民劳联（1954年4月组成全劳会议）系统的政治家们，认为同已经蜕变为容共政治主义团体的总评没法实现重新统一。根据工人运动出现的这种新潮流认为应该确立右派社会党独自的政治基础的人们，反对社会党重新合并。总之，在右派社会党内，持“统一的

前提条件是清算左派社会党的容共性”意见的人占上风。

这一时期，右派社会党围绕政治路线的对立，正在表面化。右派社会党于1951年采取了赞成媾和条约、反对保安条约的态度，与反对这两个条约的左派社会党发生分歧，结果社会党分裂了。后来，右派社会党内认为应该承认重整军备和安保条约的见解占了上风。对此，该党内部也有反对的观点，认为这样做就会使右派社会党提出的政策同吉田路线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会背离国民的“要生活保障，不要重整军备”这种感情。

在1954年1月17日至19日的右派社会党大会上，党内两派在运动方针上发生了对立。西尾末广、曾祢益、西村荣一、伊藤卯四郎等，提倡采取承认安保条约重整军备，不必反对修改宪法，以及不赞成“人民战线护宪运动”的方针。委员长河上丈太郎及浅沼稻次郎、河野密等，则持反对军事同盟、反对重整军备的立场。大会对两派提出的修正案都否决了，但承认了参加护宪国民联合，对此，西尾等表示反对。

造船疑案发生后的1954年3月19日，铃木与河上两派社会党委员长在大阪举行了会谈，发表了两派社会党共同努力，争取在下届内阁执政的设想。4月9日又发表了以两派社会党政策审议会长为中心所写的政策协定。4月19日，两派社会党委员长在京都会谈，再次声明共同建立政权的意向。9月下旬，设立了由两派社会党代表参加的统一促进委员会。11月发表了共同政权下的新政策大纲。鸠山内阁成立之后的12月14日，统一促进委员会决定在大选后实现左右两派社会党合并。

1955年1月18日，两派社会党各自召开党的大会，分别通过了“迅速实现合并”的决议。2月的大选后，两派社会党各派10人，组成了统一交涉委员会。

右派社会党写出了与左派社会党相对抗的纲领性文件，于5

月上旬以“统一社会党纲领草案”的名义发表。草案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反主义”，社会党必须是“国民政党”，掌权后也要遵循在选举中一旦失败就让出政权这种议会制的原则。右派社会党反对左派社会党的“阶级政党论”，认为左派社会党纲领中关于“革命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规定是“永久政权论”，它是违反议会制的基本原则的。在统一交涉过程中，左派社会党在纲领问题上向右派社会党作了大幅度让步。因为左派社会党认为，他们在政治势力上超过右派社会党，即使在纲领问题上作出妥协，在统一后仍能掌握主导权。关于党的性质，把左派社会党的“阶级政党”与右派社会党的“国民政党”加以折中，规定为“阶级性大众政党”。

右派社会党中，西尾等人主张慎重论；左派社会党中的社会主义协会派则对妥协进行了批评。然而，公众舆论期待着保守与革新两大政党时代的到来，许多人都在促进合并早日实现。

1955年9月3日，确定了统一后的日本社会党纲领草案。10月12日，左右两派社会党召开了解散大会，13日召开了统一大会。推选铃木茂三郎任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为书记长。

劳农党因过于容共，遭到强烈反对，没有合并到统一后的日本社会党内。劳农党于1957年1月解散后与社会党合流。

日苏谈判进展困难

1955年3月18日，举行了大选后的提名首相投票。鸠山获得民主、自由两党的支持，共得254票；铃木茂三郎为160票。3月19日，第二次鸠山内阁组成。第一次鸠山内阁的外相兼副总理重光葵、藏相一万田尚登、农相河野一郎、通产相石桥湛山、运输相三木武夫、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等仍留任原职。身患

疾病且又高龄的鸠山，预感在任期间不长。作为一个政治家，急于留下政绩。鉴于修改宪法的可能性为期尚远，于是便想在外交方面取得成果。鸠山主张在终战宣言的基础上通过两国交换公文来恢复日苏邦交，悬案的交涉留待日后处理，即所谓采取即席解决的办法。重光则认为，一旦恢复邦交，苏联就不会同意就悬案进行交涉了，因而反对鸠山的主张。新闻媒介把鸠山与重光的对立说成是“二元外交”。

大选前，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就决定开始对苏交涉。日本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泽田廉三大使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索比列夫转达了这一决定。第二次鸠山内阁成立后，任命松本俊一为日苏谈判全权代表。松本是1951年以来的驻英国大使，对吉田的“从属美国”外交持批评态度。吉田引退后，松本加入民主党。1955年2月大选时当选为众议员。谈判的地点定在伦敦。苏联方面的全权代表为驻英大使马立克。6月3日开始谈判。6月14日和6月16日，苏联和日本分别提出了各自起草的和平条约草案。

在恢复邦交后缔结渔业、通商两协定，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相互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实现日本加入联合国等问题上，双方原则上一致；但在遣送拘押在苏联的日本人，领土，海峡航行权以及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双方存在分歧。日方提出在苏联拘押未归的日本人数字：确认生存者1452人，下落不明者11190人，要求即时送还。苏方则答复说“现在在苏联的日本人是战犯，正在服劳役中，刑满后将予以遣返”。在会谈过程中，苏联从8月到9月释放了一部分战犯，并交出了在押者的名册。海峡航行权问题，苏联承认各国商船在根室、宗谷、津轻、对马等海峡可以自由航行，但军舰则只限于日本海沿岸各国。关于安全保障问题，苏联要求日本不与任何对日参战国家结盟或缔结军事同盟。

换句话说，即要求日本放弃日美军事同盟，保持中立。

在领土问题上，日本要求归还南库页岛、千岛群岛、齿舞、色丹；苏联则要求日本全部放弃这些领土的权利，承认苏联的主权。8月上旬，马立克在非正式场合曾透露打算在适当条件下归还齿舞、色丹。松本全权代表考虑到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归还无望，打算作些妥协，就归还齿舞、色丹进行交涉。

可是，重光则反对过早地妥协。他训令松本提出强硬的提案：“按照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权利，但其归属应按原同盟国国际会议的决定来处理，不能立即承认是苏联领土”；“南千岛（国后岛与择捉岛）并不包含在旧金山和约所说的千岛群岛范围内，它在历史上就是日本的领土，要求归还”。苏方因日方的突然强硬发言而态度恶化，从而使齿舞、色丹的归还可能性成为遥遥无期。9月13日谈判决裂。

鸠山在开展日苏谈判的同时，也在推进日美谈判。目的是，在日苏谈判问题上取得美国的谅解，同时就防卫费分担（驻日美军费用中日本承担的部份）的削减问题及防卫计划同美国进行协商，并就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对美方的意图进行试探。

鸠山内阁于1955年4月决定派遣重光外相访美。但美国以杜勒斯国务卿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到8月份，重光外相访美才得以实现。8月29日至31日，重光在华盛顿同国务卿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进行了会谈。农相河野一郎与民主党干事长岸信介也参加了会谈。杜勒斯表示：安保条约和行政协定都有修改的必要，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冲绳归还和日中贸易也不是这次对话的范围。雷德福则认为保持35万人的自卫队是必要的，并批评日方在两年内才能实现18万人的计划是太保守了。杜勒斯还追问：“将安保条约搞成双边性的条约，日本也必须向海外派兵。这能办到吗？”重光则回答说要遵照宪

法的解释和国民的意志。这一问题，在8月31日发表的重光杜勒斯共同声明中，是这样表达的：

“双方一致同意，为了使日本能尽快地担负起保卫国土的首要责任，‘并且’确立起能有助于维持西太平洋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条件，在切实可行的时候，应在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努力。双方还一致同意，在上述各种条件具备时，应适时地将现行的安全保障条约改变为更具有相互性的条约。”

对共同声明中“并且”后面的提法，美国的理解和报道是：日本同意分担日美的太平洋防卫，许诺向海外派兵。而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则把“并且”（and）译为“从而”，否认许诺向海外派兵之事。重光也分辩说：“海外派兵问题虽议论过，但没有达成谅解。”

保守政党合并的实现

鸠山内阁既没能在大选中使保守势力获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又在外交上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是少数执政党内阁，法案和预算的审议不能如愿，宪法调查会法案和国防会议设置法案等因遭到社会党强烈反对而无法审议下去。而且，社会党合并也取得了进展。在这种情况下，鸠山的最重要的合作者三木武吉认为，要保持鸠山内阁的执政地位，保守政党合并是不可缺少的。

1955年4月，统一地方选举处于高潮时，三木发表谈话说：“保守势力团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有必要，鸠山内阁可以总辞职，下届首相根据众望所归重新推选也可以。”自由党总裁绪方竹虎表示响应，他说：“对保守势力的团结，原则上没有异议。”进入5月以后，民主、自由两党的干事长（岸信介、石井光次郎）与总务会长（三木武吉，大野伴睦）4人多次举行了会谈。7月6日两党

共同组成了政策委员会。

11月15日，召开了自由民主党建党大会。因在事前的协商会上，未能就总裁的选举方法作出决定，因而只好匆忙选出鸠山、绪方、三木、大野4人为总裁代行委员。他们内部商定，首相由鸠山担任，党务主要由绪方负责。并推选岸信介任干事长，石井光次郎为总务会长，水田三喜男任政务会长。

《建党宣言》中说：“沿着议会政治的大道，排击所有以暴力与破坏、革命与专政为政治手段的势力和思想，使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成为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党的使命”是：“以自由、人权、民主主义及拥护议会政治为根本理念，同企图实现专政的共产主义势力、阶级社会主义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

自由民主党的纲领政策是：

(1) 以民主主义的理念为基调，革新、改善各种制度与机构，以期建成文明的民主国家。

(2) 谋求和平与自由，立足于人类普遍正义的基础上，改善并调整国际关系，以期达到自主独立。

(3) 以公共福利为规范，制订实施以个人的创造性和企业的自由为基础的经济综合计划，以期安定民生，建成福利国家。

“党的性质”，兼具国民政党、和平主义政党、真正的民主主义政党、议会主义政党、进步的政党以及谋求实现福利国家的政党等性质，以“实行综合计划来增加生产”和“通过实施社会保障政策与充分就业来实现福利国家”为奋斗目标。

“党的政纲”就主要领域的政策作了简练的归纳。其中关于外交政策和达到独立的问题，作了如下论述：

“外交政策的基调是加强与自由民主主义各国的合作，争取加入联合国，同时谋求与未缔约国恢复邦交，特别是尽快解决与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与赔偿问题。要求归还固有领土及释

放被拘押者。向世界呼吁海外移居的自由、公海渔业的自由及禁止核武器。”(积极开展和平外交)

“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則，自主地修改现行宪法，重新评价各种占领法制，并根据国情进行相应的修改或废除。为了保障世界和平、国家独立和国民自由，在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下，建立与国力和国情相适应的自卫军备，要求撤退驻日外国军队。”(建立独立体制)

这一系列文件显示了保守势力集结的“大义名分”。它集中了以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支持者们的多数要求，也是对日本民主党成立以来新保守主流的基本路线的重新确认。

在外交方面，强烈表明了实现自主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愿望，同时，也明确表示了将保持同美国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但要求增强自卫力量。

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具有志向于“综合计划”、“完全就业”、“福利国家”等“进步政党”的特征。这就等于默认了包含在新宪法体制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要素。战前倍受军部和右翼青睐的“革新官僚”，一直批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主张推行国家统制与计划经济运营体制的岸信介(自民党干事长)，对于新时代强调“综合计划”，并不感到有多大不谐调。岸信介同社会党的政治家也有接触，战后曾考虑过团结社会党的政治势力。岸信介的一贯立场是，总要强化某种计划经济运营的必要性。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

“党的政纲”第1款，是“国民道义的确立与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为了确立和发扬正当的民主主义与热爱祖国的国民道义，需要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实现教育的政治中立，扩充青少年教育制度，加强青年教育”的方针。表明了打算重新编写重视“爱国

心”的教育内容以及为确保“政治中立”而加强对教育现场的统制的意图。这一政策成为自由民主党政府与日本教职员工会发生尖锐对立的原因。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

就在社会党统一与保守政党合并的同一年，日本共产党宣布改变方针。

1955年7月27日至29日，共产党召开了由全国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以下简称六全协)。六全协通过决议，无条件地恢复“国际派”共产主义者的党籍(他们是1950年以后被开除出党的)。还通过了关于克服极左冒险主义(武力革命路线)、宗派主义以及家长制个人专断的决议。“家长制个人专断”具体指的是德田球一总书记的领导。德田球一于1950年6月被盟军总司令部处以褫夺公职处分后转入地下活动，1953年10月病逝于北京(时年59岁)。这是六全协以后公布的。德田在秘密到达中国后曾与野坂参三一道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定了新纲领(1951年10月的五全协通过)。这件事是后来才为人们所知道的。

8月11日，转入地下活动的野坂参三、志田重男、绀野与次郎，在六全协政策纪念会上露面，因违反“团体等限制令”而被捕。这些干部中，志田因与德田球一一道推行武力革命路线而于1957年以反党行为为由，被共产党除名。

六全协是日本共产党为适应已经确立了的议会制民主主义而调整战略的出发点。然而，六全协的决议本身却作出了“1951年纲领中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评价。实际上，正是1951年的纲领，作出了应当采取武力革命方式的形势分析与战略。由于共产党的党员不能表明同党中央的方针相

背离的见解，因而对形势分析和战略没有公开展开讨论。党员的大多数已习惯于无原则地服从党中央的权威主义，所以政策转变只是在党中央的严厉统制下逐步进行。即使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少数派，通常也不能随意地向下级党员传达自己的见解。

六全协后，党的干部的势力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宫本显治掌握了主导权。宫本显治在1950年共产党分裂时属于“国际派”，在德田领导时期，宫本恢复了党籍。六全协后，宫本的地位巩固了。共产党在1958年7月的第七次大会上否定了1951年的纲领，在宫本体制确立后的第八次大会（1961年7月）上通过了新的纲领。共产党在60年代提高了它在议会政治中的地位。在社会党呈现不振时，共产党却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随着民社党的成立和公明党的登上政治舞台，在野党势力出现了“多党化”倾向。共产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日本共产党的政策转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密切相关。苏联与中国的领导人，在50年代后半期采取了同西方各国和平共处的政策，并对斯大林时代采用武装斗争的各地共产党施加压力，要他们转到重视和平斗争手段的路线上来。苏联在斯大林死后需要进行艰难的调整，希望同西方保持安定的关系。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也付出了很大牺牲与负担，打算优先考虑国内经济建设以加强社会主义体制，也期待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1953年9月12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国内政策方面逐渐缓和了斯大林时代的秘密警察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努力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调整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推进同美国等西方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政策。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

表大会。它是 1952 年 10 月以来相隔 4 年又 4 个月,1953 年 3 月斯大林死后首次召开的党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强调两种制度和平共处,否定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强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等新政策。2 月 24 日,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使与会者大为震动。1956 年 4 月 17 日,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宣布解散。

非斯大林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苏联东欧的专制主义与秘密警察政治。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下挣扎着活下来的伊里亚·爱伦堡所发表的作品《雪融》,就说明了这一动向。可是,对“雪融”的期待导致了大大超出赫鲁晓夫政府控制力的政治变动。结果,苏联领导者们停止改革,再次加强专制主义体制,开始后退。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被解职,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又部分地恢复了斯大林主义,加强了统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斯大林死后,东欧各国的不满情绪也表面化了。早在 1953 年 6 月 16 日,东柏林就发生了反苏群众示威。1956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波兰的波兹南爆发了反政府暴动。波兰共产党内部的顽固的斯大林派丧失了地位。同年 10 月 21 日,哥穆尔卡被释放出狱,并被选为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在匈牙利,斯大林派的拉科西拒绝进行改革。1956 年 10 月 23 日,学生与工人在布达佩斯组织了反政府示威,要求苏联撤军,解散秘密警察,实行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示威游行由要求民主发展到革命斗争。共产党任命伊姆雷·纳吉任总理,同时请求苏军出动。苏军的出动招致了群体的反抗,反政府斗争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苏军与工人、学生还有一部分匈牙利军队发生冲突,造成许多人伤亡之后,暂时撤退了。纳吉政府在国民

要求的压力下，停止了共产党一党专政，建立了多党的联合政府。11月1日，纳吉政府宣布脱离华沙条约（1955年5月14日签订，苏联、东欧8个国家参加），成为中立国家。11月4日，苏联再度进行了军事干预。苏军扶植纳吉政府的部长卡达尔建立亲苏政府，并对革命派进行了彻底镇压。纳吉被苏军逮捕判刑。几千人死亡，约20万人经由奥地利逃往西方各国。各国共产党为苏联辩护说，这是为阻止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不得已而采取的军事干预。

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感到不安，对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批判。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上，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新主张，拥护列宁和斯大林，并开展了意识形态上的论战。中苏对立，由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进一步发展为国家间的对立。195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提供军事技术的新协定，但1959年苏联就拒绝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单方面地撕毁了该协定。接着，苏联又中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撤走全部苏联技术人员，使两国关系极度恶化。

为了调整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分歧，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1957年11月，分别召开了十二个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会议与包括西方各国在内的六十四国共产党会议。1960年11月至12月，又在莫斯科召开了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声明”与“告世界人民书”。“声明”论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当前基本课题的方针，承认了作为各发达国家共产党战略的“各种民主改革”路线。“各种民主改革”，是指自共产国际时代就是有名的共产主义者的陶里亚蒂所领导的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开展的以“结构改革”运动为代表的新路线。它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后列宁主义者组成共产党脱离社会民主主义的本流以来，首次正式向回到民主主义运动路线所作的

努力。

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日本共产党认为日本有它的特殊性，“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仍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之下，因此，民族解放斗争仍然是重要的”，强调与以“各种民主改革”为目标的各发达国家的差异。

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学生中间，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种动向。认为有必要对被共产党以帝国主义间谍论处、被斯大林手下的人杀害的托洛斯基重新进行评价。1958年6月，在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联合会）大会的共产党员代表小组会议上，学生党员同党中央发生冲突，其中多数以违反纪律受到处分。多数担任领导的学生党员，对共产党干部就过去的运动所作的半途而废的总结，抱有疑问，感受到托洛斯基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魅力，向往革命主义。在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议会制为日本基本政治前提的时代，他们把多数青年引向了最终使用暴力的路线。他们这种带有革命幻想的运动，后来由于发生了微妙的意识形态分歧和人际关系上的矛盾，陷于四分五裂状态。甚至出现了用杀害对方的办法来处理同其他派别的对立以及同志间的意见分歧的“内部斗争”。1958至1959年，多数学生党员退党，另外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等。在1960年的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中，领导开展激进的街头行动的全学联主流派，其领导成员就是这些托洛斯基集团组成的。

1961年7月日本共产党大会前后，又产生了新的分裂。宫本等主流派的民族主义路线，在党内也遭到以知识阶层的党员为主的强烈批评。持批评态度的党员们认为，日本已经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前最基本的课题，不是民族民主革命，而是通过结构改革，以和平手段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少数派的意见，在中央委员会中也存在。可是主流派强调党的纪律，在大

会前禁止发表少数派的意见，让下级党员按主流派的意图进行讨论，并推选代表。统制委员会主席春日庄次郎等少数派，在大会前夕宣布退党，相当多的知识阶层党员也相继退党。可是，这样恰恰使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一致了，因而有助于日后共产党在数量上的扩大。

中国在苏联中断技术援助之后，继续独自研制原子弹，于1964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1963年，美苏等主要核国家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核拥有国法国以及正在进行核开发的中国，拒绝参加。

日本共产党反对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认为应该把帝国主义的核开发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开发区别开来。日本禁止氢弹协议会中，总评、社会党等认为“任何国家的核试验都要反对”，要求支持部分停止核试验。而共产党对此表示反对。于是，总评、社会党等退出了日本禁止氢弹协议会。共产党的干部、国会议员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对共产党主流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投票赞成批准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结果被共产党开除。志贺与铃木主张，作为唯一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应该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苏联共产党支持志贺与铃木，同日本共产党处于对立状态。

1966年5月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领导人，加强了对苏联的批判，提倡建立反美、反苏国际统一战线。同时，也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批判，强调武装革命的必要性，与日本共产党针锋相对。这样，日本共产党在60年代后半期就与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都处于对立状态。

3. 鸠山内阁与日苏恢复邦交

日内瓦会议

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和中国的和平共处路线，也给东西方关系带来了变化。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了。同年12月4日至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丘吉尔（1951年10月英国大选中保守党获胜，取代工党艾德礼内阁组成了第二届丘吉尔内阁）、法国总理拉尼埃，在大西洋上的百慕大岛举行了会谈，决定就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同苏联达成协议。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在柏林召开了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这是柏林封锁后不久1949年5月召开的那次外长会议以来，相隔四年零八个月的外长会议。

柏林外长会议在对德国和奥地利缔结和平条约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会议决定4月份在日内瓦召开有关国家会议，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苏联主张讨论这些问题必须有中国代表参加。美英法对此表示同意。

1954年4月26日，召开了日内瓦会议。美英法苏四国包括中国、南北朝鲜、印度支那各国等共22个国家与方面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有关的9个国家从5月8日起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

就在前一天的5月7日，胡志明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军队在北越西北部的奠边府包围并歼灭了30万法国军队，大获全胜。

奠边府陷落给法国政府以沉重打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曾希望法国军队能在印度支那阻止共产主义者的渗透，可是这

种可能性正在消失。6月12日,法国的拉尼埃内阁总辞职。18日组成了孟戴斯·弗朗斯内阁。孟戴斯·弗朗斯新总理向法国国民许诺立即实现印度支那停战。

7月20日,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关于印度支那停战与独立的协定。21日会议闭会。日内瓦协定决定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独立以及法军的撤退。关于越南,约定两年之内举行大选,以实现独立与统一。当时划定以北纬十七度线为南北越的临时分界线,北方为胡志明政权(河内)的北越,南方为法国与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政权(西贡)的南越。可是,南方无视日内瓦协定的约定,从而使南北越分割固定化了。

美国代表没有在日内瓦协定上签字,而是发表了独自的宣言。美国政府虽许诺要节制会妨碍这一协定实施的武力威胁,但又表示“对可能会侵害这一协定的新的侵略给以极大关心,并把这种新的侵略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这就成为后来美国以北越向南越渗透为理由而更深地干预南越局势的依据。美国政府把印度支那战争看成是共产主义者向南越的侵犯与渗透,因而,加强了对南越政府的援助。美国过分轻视了越南解放斗争的民族主义因素,而过分重视了共产主义要素。结果,美国便陷入了同受到北越支援、开展反政府斗争的南越民族解放战线之间的全面战争状态。

苏联和中国,在这一时期,都开始认真谋求同西方和平共处。可是美国政府没有消除对斯大林体制下形成的共产主义世界战略的不信任感,费尽心机加强对苏联、中国的军事包围体制,继续坚持以武力对付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政策。而苏联对东欧的支配,封锁柏林,以及朝鲜战争等,促进了美国国内对苏强硬派的抬头,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僵化。虽然东西方之间加强了接触,有了些和平的气氛,但扩充军备竞赛与军事同盟依然在继续

发展。

和平共处政策

在日内瓦会议上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国政府代表，希望早日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也和北越的胡志明一样，都担心印度支那战争继续下去会招致美国更深地介入，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朝鲜。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的签订，也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成功。

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与尼赫鲁领导的印度之间签订了通商交通协定。当时，中国倡导了互相尊重领土与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与印度达成协议。

同年9月20日，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北京政府在成立后5年，建立了国家体制。

中国的领导人，虽然批评了苏联对斯大林的过度批判，但也在努力纠正斯大林主义。1956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试图纠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开展了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目的的“第二次整风运动”以及缓解言论统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了对共产党和毛泽东预料之外的激烈批评。为此，共产党领导层改而进行“反右派斗争”，把批评毛泽东的势力压了下去。毛泽东主导下的“大跃进”的失败以及毛泽东实际上丧失地位之后，6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的复权斗争为起端的“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登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被赶下台，中国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大混乱，对外政策也走向了封闭和僵化。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50年代中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内对外两方面探索灵活对策的时期。中国政府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这种探索的一环。其意图是，团结第三世界的中立势力，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创造一个可以专心从事国内经济建设的环境。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AA会议）。会议由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共同倡导，有23个亚洲（包括中东）国家和6个非洲国家参加。柬埔寨、老挝、南越和北越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代表是周恩来。日本代表是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亚非会议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与民族自决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中，倡导了以下“和平十原则”：

- （1）尊重基本人权及联合国宪章的各项目的与原则。
- （2）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 （3）所有人类与国家一律平等。
- （4）不介入、不干涉他国内政。
- （5）尊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国单独或集团自卫权。
- （6）不参加任何旨在谋求大国特殊利益的集团防卫。不对他国施加压力。
- （7）制止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不对各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实行实力干预。
- （8）所有国际纠纷应按联合国宪章进行交涉、调解、仲裁或通过司法解决，或者用当事者选择的其他和平手段解决。
- （9）促进互利与合作。
- （10）尊重正义与国际义务。

国际关系的变化

50年代也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登场的时代。

象征事件之一就是埃及革命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2年7月，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军官们发动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后纳赛尔就任总统。纳赛尔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及印度的尼赫鲁，共同倡导并推进了不结盟政策。美国政府反对纳赛尔的不结盟政策，撤销了尼罗河上游阿斯旺水坝建设资金援助计划。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0月29日，与以色列入侵埃及相呼应，英法联军进攻苏伊士运河。这恰与匈牙利动乱发生在同一时期。美国对英法进行了谴责，苏联也威胁说，如不停止侵略行为，将不惜动用导弹武器。联合国大会于11月2日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苏伊士立即停火决议案（同月4日，就匈牙利事件通过了谴责苏联、要求苏联撤军的决议案）。11月5日，以色列和埃及同意停火。6日，英法也以联合国警察部队监视为条件同意停火。11月21日，联合国警察部队开始进驻赛得港，22日英法军队撤退完毕。苏伊士运河的暂停使用，使经由运河输入中东石油的西欧各国受到很大影响。

1958至1959年，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古巴等，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阿尔及利亚是经过民族解放阵线的独立斗争取得独立的。

为了打开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局面，法国国民拥戴第二次大战中的英雄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戴高乐于1958年6月就任总理，10月成立“第五共和国”，实施新宪法，加强了总统的权限，并于1959年1月亲自就任总统。1961年4月，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因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发动了反对本国政府的叛乱。戴高乐在舆论的支持下对这次叛乱进行了镇压。1962

年3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签订了停战协定。4月举行的法国国内国民投票，支持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政策的占压倒多数。同年7月举行的阿尔及利亚居民投票，赞成独立的达99.7%。于是，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

戴高乐上台后，修正了从属美国的政策，并开展了承认中国(1964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1966年)等旨在恢复法国威信的外交活动。这种戴高乐主义(戴高乐政策)代表了欧洲反对战后美国中心体制的趋势，使西方阵营内部向“多极化”发展。

在欧洲，东西方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55年5月15日，美英法苏四国签订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同年10月25日，外国军队全部从奥地利撤退完毕，26日奥地利联邦议会宣布奥地利永久中立。12月6日，美英法苏四国承认了奥地利的永久中立。虽然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国，但奥地利却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死后作了让步，且以支付债务和宣布自主永久中立为条件，其统一与独立终于得到承认。在奥地利，战后初期曾参加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于1947年以后退出，后来一直是人民党、社会党的中立联合政府执政，确保了政治上的稳定。

1955年6月7日，印尼总理宣布中国总理周恩来已同意美中两国政府进行正式接触。美中两国的大使级会谈从8月起在日内瓦举行。

1955年7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英国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富尔，在日内瓦进行了会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以来首次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这次会谈，除了就改善东西方经济、文化关系的看法原则上一致外，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都强烈期望缓和紧张局势。

1955年9月8日，西德总理阿登纳去莫斯科访问，13日发表

联合声明，恢复了邦交。9月20日，苏联与东德签订了恢复主权的协定。然而，10月1日，美英法三国给苏联的备忘录中宣称不承认东德政府。

在强调和平共处的同时，军事对峙的体制却强化了。

1949年4月，美国与西欧11国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1950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联军。1952年，希腊与土耳其加入该公约组织。1955年西德也正式加入。与之相对抗，苏联、东欧8个国家于1955年5月14日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华沙条约)。

在亚洲、太平洋方面，1951年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几乎同时，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军事同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签订了军事同盟。1954年9月，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8个国家创设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1955年2月至4月，英国、土耳其、伊拉克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1月，伊朗和巴基斯坦也加入了该组织。1959年伊拉克脱离该组织后改名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所建立的这种从欧洲到南亚、东南亚、东亚的对苏包围圈，与威胁美国世界战略的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这样交织在一起。

核武器竞赛也在发展。1949年苏联的原子弹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垄断原子弹的状况。1952年英国的原子弹试验也获得成功。随后法国也追了上来(1960年试验成功)。1952年美国进行了氢弹试验。1953年苏联成功地试验了性能更高的氢弹。与之相对抗，美国于1954年3月在比基尼环礁试验了含天然铀的氢弹。这是一种散发大量“死灰”的“污染型”氢弹，日本福龙丸五号渔船的船员成了这次试验的牺牲品。1957年英国也进行了氢弹试验。

核弹头运载武器方面也在竞相研制。1952年，美国着手建造核潜艇。洲际火箭的开发是苏联比美国先行。1957年苏联发

射了第一颗无人人造卫星。人造卫星的发射证明苏联已拥有强大的洲际火箭，这对美国是个很大的冲击。它成为美苏间在宇宙开发与导弹开发方面竞争的开端。

第三届鸠山内阁

1955年11月的保守政党合并，使大部分保守系的议员集中到了自民党内。

鸠山内阁总辞职后，鸠山又被提名组阁，组成了第三届鸠山内阁。重光外相、一万田藏相、河野农相、石桥通产相、高碕经济企划厅长官等主要阁僚继续留任。又吸收一部分原自由党系的政治家入阁。鸠山内阁所通过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正是在这一时期。

自民党建党大会上没有确定总裁，而是推选4人代理总裁。当时曾预想总裁将在鸠山与绪方两人之中产生。可是绪方于1956年1月28日突然去世。1956年4月5日的自民党大会上，鸠山在489票中获394票，被选为自民党的首届总裁。鸠山内阁通过保守政党合并并在国会获得稳定多数，并在自民党内部成为多数派之后，便从内外两个方面积极开展施政活动。

1956年1月至2月，鸠山在国会上答辩时曾说“没有军备并不符合现行宪法精神”，“为了自卫，侵略敌人的基地也未尝不可”。虽然在遭到社会党的攻击后，撤回了这些发言，但由此也可看出鸠山内阁在防卫问题上的姿态。

2月11日，自民党干事长岸信介等人以议员提案形式提出了宪法调查会法案。提议修改宪法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其意图在于为修改宪法先进行一些调查研究。该法案于5月16日被国会通过。政府任命了调查会委员。由自民党17人、绿风会2人、学有专长者17人组成，社会党委员空缺。调查会从1957年

8月起开始进行审议工作,直到池田勇人内阁时代的1964年7月,才提出了汇总“改正论”(多数派)与“非改正论”(少数派)两论意见的最终报告。

3月1日,政府向国会提出了国防会议组织法案。该法案于6月3日获得通过。

鸠山内阁还在改革教育制度上进行了努力。

早在吉田内阁时期,保守势力所实行的教育政策就已对战后的改革作了大幅度的修正。1950年10月,文部省通知全国恢复挂“日之丸”(国旗)和唱“君之代”(国歌)。但“日之丸”与“君之代”曾被利用来鼓吹军国主义,因而遭到强烈反对。当时吉田内阁的文相天野贞祐也曾表示正在考虑取代“教育勅语”(明治天皇于1890年颁布的关于教育的勅语。战前、战时在日本所有学校中被奉颂)的纲要,并打算恢复修身课程。1951年1月,教育课程审议会在咨询中表示反对恢复修身课程,但文部省自1951年以后还是采取了开展道德教育的政策。1951年11月,政令咨询委员会就教育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咨询,并提出了教育委员任命制、由文部省编纂标准教科书等提案。

1953年10月,为了协商根据美国的相互防卫援助法(MSA)实施对日援助问题,池田勇人以吉田首相的特使身份访问美国。在同罗伯逊副国务卿助理进行会谈时,池田谈了宪法对重整军备的制约,并认为“占领军的和平教育对重整军备起着很大的政治、社会制约作用”。对此,罗伯逊表示“希望日本培养自卫的观念”。同月,政府决定了制订限制教员政治活动法的方针。同年12月,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长向各都道府县教育长下达了秘密进行“偏向教育”事例调查的通知。正如第8章已经谈到的那样,1954年提出了所谓教育两法案。即“关于确保各义务教育学校政治中立的临时措置法案”与“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部分修改法

案”。这些法案于同年5月被通过。同年7月，全国町村长会要求文相撤销地方教育委员会。8月，全国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协议会对此表示反对。

第三届鸠山内阁成立后的1956年3月，政府把新教育委员会法案与教科书法案提上了国会议事日程。

新教育委员会法案，正式名称叫做“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及运营法律案”。内容是废止1948年的教育委员会法，教育委员由居民公选制改为由县知事或市区町村长任命制，缩小教育委员的权限。教科书法案规定，废除由各个学校和教师选定教科书的做法，改由每个教科书选定协议会指定教育委员会来选定，并对教科书发行者实行登录制。

教科书制度，作为战后教育改革重要的一环，是1947年进行改革的。当时废除了国定教科书制度，建立了教科书审定制度。1948年的教育委员会法，确定了实行分权制度，即教科书内容必须以文部省所定的学习指导要领为标准，教科书的审定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执行。可是，1953年的学校教育法部分修正，把教科书审定权由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移到了文部大臣。

1955年8月至11月，当时鸠山内阁的执政党日本民主党的教科书特别委员会发表了“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的文件。这一文件，批评了竞相出版和推销教科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同时对教科书内容的意识形态偏向进行了指责，指出了共产党和日教组在教科书和学习手册上施加其影响的问题。“教科书出现的偏向教育”，具体列举了“极力称赞教员工会型”、“颂扬苏联、中共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平教科书”等几种类型。

以批判教科书为背景，中央教育制度审议会（会长为吉田内阁时代的文相天野贞祐）于1955年12月经过答辩准备了教科书法案。

以新教委法案与教科书法案破坏民主主义教育为由，爆发了反对运动。日教组于1956年5月18日采取了集体早退战术，在全国1475个场所召开了抗议集会。社会党在参众两院同时行使实力，阻止审议。6月1日，在参议院会议上，社会党议员冲到议长席，与国会守卫扭打。6月2日拂晓，议长要求警察出动，通过了新教育委员会法案。教科书法案没法审议下去，成了废案，但其内容，已通过行政措施实际被采纳了。

小选举区法案

保守政党合并后的鸠山内阁所提出的另一重要法案，就是小选举区法案。

三木武吉和岸信介早就强调小选举区制的必要性。其理由虽说是“确立英国式的两大政党制”，但他们又认为，在当时的日本，这种制度可以使在野党的议席锐减，使自民党获得压倒多数，进而可以使修改宪法的审议成为可能。

小选举区制的长处在于可使政局保持稳定，但其短处却是无效票多。在强调长处的同时，也必须重视短处。如何利用小选举区制的长处来弥补其短处，应该参照西德的小选举区制加比例代表制的做法。战后的西德，采取的是让选民同时分别填写各小选举区的候选者与政党名的投票办法，而下院的议席数则基本上根据政党支持率按照比例代表的原则进行分配（得票率低的小政党例外）。这种做法并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议论的对象。

岸信介干事长，会同岸派的川岛正次郎（小选举区制特别委员长）等，汇总了党内的意见后决定了划区办法，于1956年3月19日向国会提出法案。但是，这种根据自民党议员的意向采取的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划区办法，露骨地显示出是一种“党利党

略”。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盖利曾按有利于自己一派的情况来改变选区。因这种做法很象“火蛇”（神话中状似蜥蜴、可以在火中居住的动物，又叫鲛鱼）那样怪，所以被叫做“盖利怪蛇”。故尔，人们把鸠山内阁的小选举区制案也叫做“鸠怪蛇”。后来政府首相任命了五人委员会就划分选区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妥协方案。好不容易于5月16日提交众议院修改通过。可是，受新教育委员会法审议时出现混乱局面的影响，此方案尚未审议完就中止了，结果成了废案。

在小选举区法案和新教育委员会法案等问题上，社会党所施展的实力阻止审议战术，实际上否定了议会制民主主义。然而，由于对政府在小选举区制上暴露出的“党利党略”及对修改宪法的担心，以及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反对对战后教育制度轻易改废的情绪，因此，对社会党的态度没有过分非难，而对鸠山内阁的批判却很强烈。

在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政治争论存在深刻对立的情况下，按照议会制的原则来进行审议是困难的。如果让行使实力来阻止法案成立的方法正当化，议会制就将失去其机能。如果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政治争论在多数国民看来并不是什么重大问题，那么，国民就会越来越对政治不关心，结果也会使议会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机能。这样，多数国民就会对议论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选择失去兴趣，而仅仅热衷于有利于个别集团利益的政策，以获得有利的财政支出或税制优惠。从而把议会政治的现实机能置于微妙的政治、社会条件之上。

50年代的日本政治，并没有形成能使议会发挥机能的良好条件。共产党采取的是武力革命路线，否定议会制民主主义。社会党左派也是志向于将来掌权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政体制，否认议会路线。否认议会制又要利用议会制来获得政

权的左翼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些政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对战后重建的民主主义的发展是有害的。这样，保守势力和自由主义势力就对左翼抱有很强烈的戒心。

与这种左翼动向相对抗的政府与自民党，所提出的小选举区制，在当时的状况下，也会给在野党带来致命打击，使保守统治永久化，并很可能造成议会制机能的麻痹。而且划分选区也是从“党利党略”出发的。正因为保守势力实现了大合并，所以实行小选举区制后造成一党统治，很可能会使议会陷于停滞与腐败。因此，面对这种状况，社会党认为采取各种手段来破坏议会制是正当的。

滥用这些手段，对以议会制民主主义为原则的政党来说，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然而，对于以革命主义为基本战略、认为议会制不过是便于自己掌握权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以阻止保守的“倒退路线”为理由，采取反议会制性的妨碍审议行为，是正当的。

日苏谈判的恢复

1955年9月中断了的日苏谈判，应苏联方面恢复谈判的要求，在第三次鸠山内阁组成后的1956年1月17日于伦敦重新开始了松本全权代表与马立克全权代表之间的谈判。可是，除了重光外相反对过早妥协外，自民党内原自由党系的反对论也较强烈，所以谈判难以继续。松本全权代表，按照自民党的决议，与上次一样，提出了“要求无条件归还国后、择捉、齿舞、色丹”，“南库页岛与千岛(北千岛)的归属按原同盟国的决定来处理”的提案。而马立克全权代表也重复“齿舞、色丹在日苏和平条约生效时归还日本”、“南库页岛与千岛(南北千岛)归属苏联”的主张。3月20日谈判陷入僵局。以后便进入无限期休会状态。

3月21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苏联政府关于“为保护北洋的鲑鱼和鳟鱼，在日苏之间缔结适当的协定之前，限制（日本）渔民在这一地带的渔业活动”的决议。鸠山内阁立即训令在伦敦的松本，向马立克指出，苏联的这种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日本渔民没有乱捕鱼的事实。4月9日，马立克向日本驻英国大使西春彦转达了苏联打算与日本在渔业问题上达成协议，并指出，如果日苏不签订渔业协定，苏联不打算缓和对于北洋鲑、鳟鱼的限制。这实际上是以鲑、鳟鱼问题为武器强行要求谈判。鸠山派遣河野一郎农相前往莫斯科。河野以在7月底之前恢复日苏邦交谈判为条件，于5月14日签订了日苏渔业条约及海难救助协定。并约定这些条约和协定同恢复日苏邦交同时生效。

7月4日，鸠山的最重要合作者三木武吉病逝。7月8日举行参议院议员选举。当选议员，自民党61人，社会党49人，共产党2人，绿风会5人，无党派10人。选举后的议席数，自民党124席，社会党81席，共产党2席。社会党与共产党合计占总议席数248席的33.5%，超过三分之一。提议修正宪法的可能性更小了。

鸠山内阁在选任恢复日苏谈判的全权代表问题上很伤脑筋。结果，重光外相自己作为全权委员，同松本全权代表一起去莫斯科。日苏谈判从7月31日起在日方两位全权代表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皮罗夫等之间重新开始。在领土问题上双方仍各执己见。重光看到要取得谈判结果不能不作些让步，向苏方提出了“齿舞、色丹必须在和平条约生效时由苏联归还给日本；日本撤回对国后、择捉的归还，要求，和平条约上对这两个岛的归属将不载明，实质上归属苏联”的提案。苏联方面则表示只能按苏联的方案解决。赫鲁晓夫在接见重光时再次重申了这一主张。重光想进一步让步，于是就是否接受苏联的提案向鸠山内阁请示。内阁临时会议作出了反对苏联提案的决定，并指示重光中断谈判。重

光便以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苏伊士运河问题国际会议为理由，离开了莫斯科。

鸠山决心亲自去莫斯科进行日苏谈判。9月，鸠山放弃了和平条约方式，提出了日苏两国通过战争结束宣言方式来恢复邦交的提案。7日的内阁会议上同意鸠山以这种方针去苏联访问。池田勇人等反主流派认为，如果鸠山访苏，除了按苏联提案达成协议外，没有其他道路，因而反对鸠山访苏。反主流派预期到日苏谈判的挫折会使鸠山内阁垮台。

9月7日(日本时间为8日)，美国国务院向日本驻美国大使谷正之递交了关于日苏谈判的备忘录。其内容如下：

(1) 日苏之间的战争状态本该早就结束，但因苏联拒绝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上签字而推迟。苏联扣押的日本俘虏，也本该早就遣返。

(2) 雅尔塔协定只是当时首脑间的共同目标，并不是当事国的任何最终决定。它对领土转移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按照旧金山和约日本所放弃领土的归属问题，应另由国际手段加以解决。

(3) 美国认为，国后、择捉两岛是北海道的一部分，它们与齿舞、色丹在历史上都早就是日本领土的组成部分，应该承认它们是日本主权下的合法领土。对此如果苏联同意，将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起积极作用。

美国在领土问题上支持日本政府的主张。可是，苏联不可能在领土上轻易放手。在日本参加日美安保条约成为包围苏联的军事同盟一环的现状下，苏联更是如此。

9月11日，鸠山就结束战争状态宣言和领土问题的继续谈判等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送交了亲笔信。布尔加宁在13日的回信中表示愿意以结束战争状态宣言方式就恢复邦交达成

协议,但对领土问题的继续谈判避而不谈。9月14日,自民党的外交调查会与政务调查会联合会议,决定了“齿舞与色丹要求立即归还,国后与择捉继续谈判”的新方针。9月20日,松本全权代表再次访苏。29日,松本与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相互交换信件,确认双方在日苏恢复邦交后仍将就包括领土问题在内的缔结和平条约继续进行谈判这一观点上取得了谅解。

日苏共同宣言

1956年10月7日,鸠山与河野作为日苏谈判全权代表从东京出发,12日到达莫斯科。从15日起与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等正式开始谈判。河野与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6日和17日进行了两次私人会谈,争取实现立即归还齿舞、色丹的愿望。赫鲁晓夫没有答应立即归还的要求,但最后同意在恢复邦交宣言中写明“和平条约缔结后将齿舞、色丹交还给日本”。10月19日,日苏联合宣言正式签字。日方首相鸠山一郎、农相河野一郎、众议院议员松本俊一,以及苏方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副外长费多连科分别签了名。联合宣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联合宣言生效时,两国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和平友好睦邻关系。

(2) 恢复外交与领事关系,互派大使。

(3) 两国将遵守联合国宪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两国承认对方参加个别或集团性自卫的固有权利,在经济、政治、思想方面,都不直接或间接干涉对方的国内事务。

(4) 苏联支持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

(5) 在苏联判刑的日本人,将在联合宣言生效时释放并遣

送回日本。苏联将继续对下落不明的日本人进行调查。

(6) 苏联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两国相互放弃对1945年8月9日以来所造成战争结果的要求。

(7) 两国将开始就贸易、海运等条约或协定进行谈判。

(8) 1956年5月14日签订的渔业条约与海难救助协定,将与联合宣言同时生效。

(9) 两国将继续进行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苏联在和平条约缔结后将把齿舞群岛与色丹岛交还给日本。

在签署日苏联合宣言的同时,还签订了给予贸易发展最优惠待遇的通商航海议定书。尽管经过1955至1956年的艰难谈判,但立即归还齿舞、色丹的希望还是成为泡影。北方领土成为日苏间有待解决的外交问题。北方领土曾经是很多日本人生存的国土,对北海道沿海渔民的安全作业也具有重要意义。可是,苏方严厉拒绝就国后岛与择捉岛进行谈判,即使到了80年代的今天,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仍无希望。

鸠山于11月1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在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了引退的意向。选举继任总裁(首相候选人)的自民党大会,定在12月14日召开。11月12日至12月13日,召开了鸠山内阁的最后一次临时国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恢复日苏邦交关系议案和无限延长已到期的罢工限制法案。

从10月到11月,相继发生了匈牙利和苏伊士的动乱。重光外相11月16日在国会的外交演说中,既谴责了英法两国在苏伊士的无视联合国的行为,又批评了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

日苏联合宣言的表决,众议院于11月27日一致通过,参议院于12月5日以244票赞成、3票反对而通过。12月12日,在东京交换了批准书,立即生效。先前签订的日苏渔业条约、海难救助协定也同时生效。12月12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建议

大会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决议。18日的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

4. 亚洲外交的选择

日中关系

鸠山内阁虽了结了日苏复交与加入联合国这些悬案，但领土问题没有解决。此外，在日中恢复邦交、日韩和日朝关系正常化以及冲绳、小笠原的归还等一系列课题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就辞职了。

日本军队在中国从 侵略战争 的时间最长，而且干出了抢占领土、杀害众多居民等无数残虐行为。同中国恢复邦交，尽最大可能加以赔偿并进行经济合作，打好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是战后日本的最大国际责任与义务之一。战后，统治中国大陆的政权发生了交替，但共产党政府是事实上代表中国国民的政府，而且该政府实现了以往所没有过的全国统一。据此，不管以往情况如何，以同新中国建立邦交为目标，是妥当的。可是，中国代表没有被邀请参加旧金山媾和会议，而吉田内阁却同蒋政权缔结了和平条约。

批判吉田内阁的“从属美国”、打出“自主国民外交”旗号而上台的鸠山内阁，本来当务之急的最大课题是同中国恢复邦交，可是，在日中关系上却存在着比日苏关系更大的障碍。

第一，美中严重对立以及美国对日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朝鲜战争使美中两国军队未经宣战就进入了局部战争状态。联合国根据美国的提案把中国定为“侵略者”。美国和西欧各国也对中国加强了经济封锁。中国革命后，美国曾表示对台湾采取不介入态度，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却转而采取了封锁台湾海

峡的方针。朝鲜停战后，美国仍未放弃苏联将与中国合作以达到用共产主义统治世界这种看法，认为在亚洲的共产主义渗透战中，中国将起更大的作用。以优先考虑日美关系为基本原则的日本保守势力，是难以打开恢复日中邦交的局面的。

第二，日本国内存在着反共、反中国的势力。日本的保守派政治家中，与蒋介石政权的要人保持直接亲密关系者不乏其人。他们强烈反对抛弃台湾而同大陆新中国政府恢复邦交。可是，新中国则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不与蒋介石政权断绝关系，就不能使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与台湾政府保持关系，同新中国恢复邦交是不可能的。

在朝鲜战争带来的远东紧张形势极度激化的情况下，美国与日本缔结了以防止共产主义的直接、间接侵略为目的的和平条约与安全保障条约。这些条约，从本质上说不是进攻性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者公然发动武力进攻或悄悄地通过革命主义渗透来变革体制。然而，这一日美同盟，反过来又增强了中苏方面的警戒心。

苏联同新中国的关系，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又存在难以调整的课题，并非坚如磐石。可是，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却把1950年的中苏同盟看作是共产主义世界战略的基石之一。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曾按照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意图号召日本共产党开展反美武装斗争，从而助长了日本保守势力的警戒心。日本产业界的多数首脑，也抱有日中友好运动会共产党利用这种戒心，又担心来自美国的压力，所以，他们虽对日中贸易很感兴趣，但又常常动摇，持消极态度。因为美国政府威胁说，将对推进对华贸易的日本有关产业和商社实行取消其美贸易的处罚。为此，日本的大商社在日中贸易方面只好利用替身商社这种办法。

对日中贸易的期待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尽管中国革命还在进行中,但日中贸易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内战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清朝垮台后首次建立了中国全土的政治统一,并准备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因为如此,日中贸易的潜在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一时期,美国也承认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是错误的,准备承认北京政府。对当时仍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来说,扩大对华贸易的条件也是具备的。

战前,日本从中国大陆进口大量资源,也向中国大陆出口许多工业品。当然,当时的对华贸易带有很强的对中国支配与掠夺的性质。那种关系的再现,是不允许的。可是,无论从两国资源的拥有情况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来说,还是从两国地理接近这一优点来说,战后在新的条件下,按照平等互利原则扩大日中贸易与日中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实际上,早在中国内战结局尚不明朗的阶段,日本的产业、贸易界就已对日中贸易抱有期望了。

另一方面,想与革命后的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政治家、知识界及工会人士,也认为贸易是发展两国交流的契机,开始关心日中贸易。日本共产党也看到日中友好运动的重要政治意义,许多党员都投身于这一运动。1949年5月,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和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后来“中日”都改称为“日中”)。三百十几名国会议员参加了这一议员联盟。志田义信(民主自由党)、苔米地义三(民主党)、帆足计(绿风会)、水谷长三郎、和田博雄(社会党)、堀真琴(劳农党)、野坂参三(共产党)等被推选为斡旋人。同年6月,日产重工经理箕浦多一等,为了避免涉嫌政治,成立了只有经济界人士参加的中日贸易协会。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10日,日中友好协会召开了筹备会。

1950年3月,美国国务院决定了容许日本对华贸易的方针。日本有关人士向盟军总司令部提交了向中国出口商品一览表。中日贸易促进会在被占领的困难条件下成功地同新中国的贸易部门取得了联系,并谈妥利用香港的英国商社与英国船,从中国进口大豆和开滦煤。1946年中国内战时代,经营过从山东省青岛进口盐的日本的一个商社,与革命后的中国也签订了合同,于1950年8月从中国进口了盐。

然而,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同年秋天,中国军队介入了这场战争。美国政府于12月6日决定采取全面禁止对中国出口的方针。日本的产业界与保守政治势力,既对日中贸易关心,又强烈担心日中友好运动是日本共产党策动的。朝鲜战争的开始与共产党转向武力革命方式,使这些持有反共立场的人加强了对日中友好运动的批判。

日中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于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召开。全国22个都道府县的分会代表以及政党、工会、学界、文化界、贸易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自由党的水田三喜男、社会党的和田博雄等政治家也参加了。可是,盟军总司令部却把日中友好协会看作是共产党的特别行动组织而加以干涉。日中友好协会曾通过绕道香港的国际邮件得到中国的出版物并进行分发,结果,大阪分会的4名人员以违反占领政策为由被捕,提交军事审判。

对中国禁运政策

1951年2月,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国”的决议案,并于5月通过了建议禁止对中国出口战略物资的决议案。在此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于1949年11月成立了“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统制委员会”(简称“COCOM”,即“巴黎统筹委员

会”)。1952年8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下又设立了“对中国出口统制委员会”(简称“CHINCOM”,即“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日本于媾和生效后的1952年11月14日被接纳为“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成员。

1951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凯姆议员提出的“对向共产党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的国家给以停止军事经济援助的制裁”的提案。鉴于西欧伙伴强烈反对凯姆提出的这些条款,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阻止了这一议案的生效。1951年10月,美国国会又根据巴特尔议员的提案,通过了禁止对各共产党国家出口法,以取代凯姆条款。巴特尔法依然规定,对向共产党国家出口武器类、原子能器材、石油等战略物资的国家,将停止军事经济援助。

为阻止东西方局势紧张激化所造成的经济交流断绝的倾向,中国方面发起了旨在发展东西方贸易、着手缓和紧张局势的运动。1952年4月3日至12日,召开了旨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交流和推动和平运动发展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裁南汉宸,于1951年12月邀请日本的经济界、政治家、学者参加。为响应这一邀请,石桥湛山、北村德太郎(亲和银行总经理,后为改进党的众议院议员)、鲇川义介(日产联合企业的创业者,后为改进党的众议员)、村田省三(大阪商船会长)、安川第五郎(安川电机社长)、箕浦多一(日产重工社长)等,于1952年1月27日成立了国际经济恳谈会。南汉宸向国际经济恳谈会转达了愿意在莫斯科会议上就发展亚洲地区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同日本代表达成协议的意向。石桥等为派遣代表申请出国护照,但外务省以苏联扣留了很多日本人,苏联可能干出不利于日本的行为为理由,拒绝办理护照。

然而,高良留(参议员,绿风会)、帆足计(前参议员,绿风会)、宫腰喜助(众议员,改进党)等三人,经由西欧进入莫斯科,然后

又访问了北京，同南汉宸（当时是新成立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等中方代表进行了会谈，并于6月1日签订了日中民间贸易协定。这是头一个日中民间贸易协定。进口、出口各3000万英镑，分为甲、乙、丙3类，在总额中各占一定比率，以易货交易方式取得各类进出口的平衡。

日本出口的甲类商品为钢材、铝等金属材料；乙类为纺织机械、汽船、机车、起重机等机械产品；丙类为农业机械、自行车、棉纱、棉布等。日本进口的甲类商品为煤炭、大豆、锰、铁矿砂等；乙类为盐、棉花、羊毛、铝矾土等原材料；丙类为棉籽油、猪皮等。之所以采取分类易货交易的方式，是为了避开巴特尔法和“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的限制，以免造成中国所需的物资日本不能出口，而只有日方能得到必需物资这种不公正的现象。

对于高良、帆足、宫腰等签订的协定，在日本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中日贸易促进会、日本友好协会等组成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中的共产党系活动家，认为这三人“不是正式代表，而是个人行动”，持不支持的态度。而舆论界却热烈欢迎，认为这一协定为促进贸易作出了努力。然而，由于美国和吉田内阁实行对华禁运政策，从日本的出口大大低于协定规定的数额。对此，中方多次表示不满。

日中交流

尽管扩大贸易遇到了障碍，但以民间贸易协定为契机，各方面的日中交流却活跃起来了。

1952年12月1日，北京播放了中国政府愿意协助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回国的报道。一年半之前的1950年夏，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在出席蒙特卡洛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时，曾向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提出协助留在中国的日本人回国的要

求。北京的广播就是对这一要求的答复。由于1945年夏苏联发动进攻后的混乱以及国共内战等原因，许多日本人失去了回国的机会，留在中国。还有些日本人是因在中国犯下残虐行为而以战犯问罪。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平联络委员会等三团体，计划派遣以岛津为团长的代表团。起初，日本政府拒绝给代表团团员高良留办理护照，后来因怕引起舆论的反对而不得不同意办理。代表团一行经由香港前往中国。

1953年3月5日，岛津代表团与廖承志等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日本人回国问题达成协议。从1953年3月到同年10月，约有2.6万名日本人分7次回国。从1954年9月又开始遣返，到1958年7月第21批为止，合计共约3.5万名日本人得以回国。

日方的三团体，应中国红十字会的要求，作为还礼，也办理了留在日本希望回国的中国人的回国手续以及送还在战争中被强行送到日本而已死亡了的中国人的遗骨手续。1953年6月，第一批中国人共551人被送回中国。7月，中国560名殉难者的遗骨被送回中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1943至1945年，从中国抓去做苦工的人数据说约有4万人，其中因残酷劳役和虐待致死的，约有7000人。对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战后日本政府没有进行处理。许多殉难者的遗骨没有得到妥善安置。1958年2月，在北海道雪山中，发现了名叫刘连仁的中国人。他是从中国山东省抓到日本在矿山干苦工的。因不堪残酷的劳役而逃亡北海道山林，连日本战败也不知道，在山中匿居了13年。

1953年10月，以自由党的众议院议员池田正之辅为团长的访华议员团，同中国签订了第二次民间贸易协定。1954年8月，在村田省藏、石桥湛山、高碕达之助、北村德太郎、菅礼之助（东京电力社长）等的努力下，成立了有许多企业参加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后曾任外相、国际

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池贝铁工社长冈崎嘉平太(后曾任全日空社长、60年代“日中备忘录贸易”日方代表)等也参加了贸促会。

自那以后,日中间的政治家、文化人等往来也增加了。1954年10月1日国庆节,日本的超党派议员团(团长铃木茂三郎)和学术文化考察团(团长安倍能成)访问了中国。同年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和廖承志等一行组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日代表团,来日本进行了访问。

周恩来等中国政府领导人,一有机会就指责日本吉田内阁阻挠日中交流,批评吉田内阁的从属美国政策,同时强调在和平与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195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妨碍日中关系的因素,是吉田内阁追随美国的敌视中国政策。并指出,日本的一部分反对者认为,要恢复日中邦交就必须断绝同美国的关系,这是一种误解。

1955年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的周恩来,在演说中表示愿意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会议期间,周恩来同日本代表高碓达之助(经济审议厅长官)和日本代表团顾问藤山爱一郎进行了会谈。

鸠山首相本人表示与关心日苏关系一样也关心日中关系。重光外相也曾提到“可以在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是,现实的政策同吉田内阁时代并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重光外相与外务省,更是持消极态度。鸠山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开日苏关系方面,在日中关系上没有提出具体的对策。1955年3月29日,为谈判第三次贸易协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主席雷任率民使节团来日本,首次在东京进行了贸易谈判。对此,重光外相和外务省仍抱消极态度。当初采取合作态度的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也因美国对日中关系的发展进行责难而退缩了。雷团长等强烈要求设立贸易办事处、用两国货

币直接结算和纠正贸易不平衡。但这些要求没有日本政府的合作,是不能实现的。因此,谈判难以取得进展。5月5日,好不容易签订了第三次贸易协定。但对这些问题只是写明今后应努力争取实现。

日本与朝鲜

建立日韩、日朝邦交,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战后处理议案。

1894至1895年(明治二十七至二十八年)的中日战争以及1904至1905年(明治三十七至三十八年)的日俄战争,都是争夺朝鲜半岛支配权的战争。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把韩国(朝鲜李王朝末期的国号,正式名称为“大韩帝国”)列为保护国,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又将韩国完全吞并。自那以后一直到1945年这35年期间,日本把朝鲜半岛作为它的殖民地加以统治,对朝鲜人进行了压榨和掠夺。朝鲜人的独立运动受到残酷镇压,连姓名也被强制改成日本式的。旅居日本本土的朝鲜人,也是倍受歧视与虐待,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时甚至被大量杀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失去了对朝鲜的统治权。日本当然必须与形成独立国家的朝鲜建立邦交,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向他们谢罪,并进行赔偿。可是,朝鲜以三八线为界分裂了,南北两方分别处于美国和苏联的支配之下。由于美苏对立的深刻化,失去了统一的可能性。南北朝鲜于1948年分别宣布独立,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久,这两个独立国家就在朝鲜全土进行了一场战争。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被要求同南部的韩国进行合作,自然也就同北朝鲜处于对立状态。

从战后初期起,日本政府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旅居日本的朝

鲜人的待遇问题。连盟军总司令部也在这一问题上几度出尔反尔。盟军总司令部起初曾通知日本政府，“凡旅居日本不希望回国的朝鲜人，均视为具有日本国籍”。可是在1947年5月公布的“外国人登录令”中，却把旅日朝鲜人定为外国人，要他们在登记国籍一栏内填写朝鲜。但日本政府的法务当局仍发表见解说，在媾和生效之前，旅日朝鲜人仍具有日本国籍。

据日本政府调查，1950年旅日朝鲜人约有54万。旅日朝鲜人也分裂成北朝鲜帮与韩国帮，为解决归国问题和保护权利问题，分别成立了各种团体。

1949年1月，在东京设立了韩国驻日办事处。韩国办事处向当时代行日本外交权的盟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希望让旅日朝鲜人在登记国籍时使用“韩国”或“大韩民国”用语。1951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把这一要求转达日本政府。外务省表示为难。2月，盟军总司令部再次希望日本政府考虑这一要求，日本政府只好决定在公文中使用“韩国”这一用语。法务厅发表见解说，旅日朝鲜人在国籍栏内可任意选用“朝鲜”或“韩国”，这与承认实质性的国籍或国家无关，使用哪一种用语都不会造成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又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本政府与韩国政府便按照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初次进行了正式的直接接触。

旧金山和约刚签订后的1951年10月21日至12月22日，日韩两国政府代表在东京举行了预备会谈，接着于1952年2月15日至4月26日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日方首席代表为松本俊一（外务省顾问），韩方首席代表为梁裕灿（韩国驻美大使）。讨论了旅日朝鲜人的法律地位、国家间的基本关系以及请求权问题、渔业问题等。尤其是在赔偿问题与渔业问题上，两国意见对

立,谈判难以取得进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结束。

日韩会谈进展困难

在日韩会谈中,韩国向日本提出了巨额赔款要求,遭日方拒绝。美国国务院于第一次日韩会谈结束后的1952年4月29日告知韩国驻美大使说:“韩国应该考虑到,受和平条约的约束,日本对韩国也不能提出请求权了。”(1961年公布)在日韩会谈中比请求权更难取得进展的是渔业问题。韩国总统李承晚于1952年1月18日发表“海洋主权宣言”,单方面在公海上设了边境线(李承晚线),禁止日本渔船进入。后来,多次发生以侵犯李承晚线为理由而拘留日本渔船的事件。

在美军进驻日本后的1945年10月3日,指定了日本渔船操作许可区域,叫做麦克阿瑟线。麦克阿瑟线已在和平条约生效前的1952年4月25日被废除。李承晚线对西日本渔民的作业,是个很大的打击(到1961年为止,被拘留的渔船和渔民,分别达282条和3511人)。

韩国政府于1953年1月对日本海的无人岛“竹岛”提出了领土权要求。并因而发生了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在竹岛附近遭到韩国船的袭击,被韩国方面扣留的事件。根据和平条约生效后签订的日美行政协定,1952年7月日本政府将竹岛提供给美军,作为演习场使用。1953年3月撤销了这一演习场。

李承晚总统利用李承晚线和竹岛问题煽动韩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利于自己的统治。日本方面的重整军备促进论者,也把这些作为他们主张“独立国家必须保持军备”的论据。

1953年4月15日,日本首席代表久保田贯一与韩国首席代表金溶植举行了第二次日韩会谈。但是,两国仍在请求权问题与渔业问题上对立。7月23日自然休会。

1953年10月6日,第三次日韩会谈开始(双方代表与第二次会谈相同)。10月15日,日本首席代表久保田在发言中说:“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不能说全是坏的,也有给朝鲜带来恩惠的一面。韩国没收旅韩日本人的私人财产,是违反国际法的。”韩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0月21日,会谈以决裂而告终。1955年3月9日,鸠山首相与重光外相一致同意:如果韩国在李承晚线问题上让步,日本同意放弃在韩财产的请求权。3月12日,韩国政府表示不能拿李承晚线同在韩日本财产作交易。美国驻日大使安理逊和访韩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曾就日韩关系从中斡旋,但未成功。直到岸内阁时代的1958年4月,正式的日韩会谈一直没有恢复。只是就相互释放拘留者问题断断续续地进行过非正式会谈。

冲绳、小笠原问题

日苏之间存在着北方领土问题这一重大外交悬案。但日本的更大领土问题却在南方,即冲绳、小笠原问题。

冲绳是经过1945年4月至6月的激战之后被美军占领的。幸存的居民多半被美军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1946年1月29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出指令,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的群岛从日本本土分离出来,置于美国军政府管辖之下。包括奄美群岛在内的西南群岛(鹿儿岛县)以及小笠原群岛(东京都)也由美军直接管辖。小笠原群岛同1945年2月至3月美军攻克的硫磺岛不同,它是日本投降后美军才进驻的。大部分居民已按日军命令向日本本土疏散。美军进驻后又强行把残留的居民移送到日本本土。

1946年4月22日,美军成立了由冲绳县人组成的民政府,作为冲绳军政府的辅助机关。知事由美军任命。同月26日,由原

冲绳县议会议员与军政府任命的议员组成了冲绳县民政议会。该议会只是知事的咨询机构,并无决议权。1947年7月,冲绳的通货统一使用美军的B型军票,直到1972年冲绳归还日本为止。1949年3月,民政议会为抗议民政政府的专横,实行了总辞职。

美国政府考虑到起初居住在冲绳的居民是不同于日本本土的民族,认为把冲绳从日本分离出来是理所当然的。为此,禁止冲绳县民与日本本土自由往来。1947年10月,当时尚在大陆的蒋介石政府,要求冲绳归属中国(1948年4月撤回这一要求)。

鉴于中国革命的进展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等事态的发展,美军扩大、加强了在冲绳的基地。1950年春,盟军总司令部宣布开始进行冲绳基地的永久性建设。冲绳军政府也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撂下冲绳不管”。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9月,美国国务院暗示,即使在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也有可能将琉球群岛以联合国委托管辖的形式置于美国永久统治之下。12月,冲绳军政府改称“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驻东京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民政政府长官。

冲绳县民发起了建立公选制民政的运动。回归祖国的运动也在发展。虽然冲绳县民中也有人主张“冲绳独立”,但美军统治的强化则更加推动了回归日本的运动的发展。冲绳县民没有屈服于美军的镇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美国为了缓和县民的不满情绪,在各群岛通过公选知事和议员,组成政府。1950年11月4日,成立了冲绳、奄美、宫古、八重山四个群岛政府。

在旧金山媾和会议前夕的1951年8月,奄美大岛发生了要求回归祖国的绝食示威。各群岛政府的知事和议员,也分别打电报给吉田首相、杜勒斯特使和媾和会议主席,要求回归日本。旧金山和平条约就这些群岛作了如下规定:日本同意美国向联合国提出的关于把冲绳、奄美、小笠原等各岛置于以美国为唯一施

政者的委托管辖之下的任何提案。在向联合国提出上述提案并由联合国通过之前,美国将对这些岛屿实行统治。(第3条)

1952年4月1日,琉球政府成立,作为冲绳最高统治机关的美国民政府,地位仍未改变。琉球政府主席由美国政府任命。立法院议员于3月2日选举产生。社会大众党15人、人民党1人、无党派15人当选。比嘉秀平被任命为琉球政府主席。比嘉于同年8月成立了保守的民主党,并就任该党总裁。

以冲绳教职员工会、社会大众党、人民党等为中心的回归日本运动日益高涨。美军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了压制。美军强制征收农民的土地,以扩大加强基地。还发生了多起美国兵的暴行事件和杀人事件。

美军对共产主义者及其赞同者采取了严厉的态度。美国政府指示,对从冲绳去本土的留学生,凡“赤化”者一律取消其留学许可。另外,冲绳人民党也被指责为共产党,并以隐匿共产党员罪将人民党书记长、立法院议员濑长龟次郎等四十余人逮捕,提交军事审判。濑长被判刑2年,出狱后在1956年1月25日的那霸市市长选举中当选。市议会通过了对濑长的不信任案。濑长以解散市议会相对抗。美军直接介入,在剥夺了濑长的被选举权的情况下进行了市长选举。

美国占领下的日本,言论和报道受到严厉统制,冲绳等的实情没法报道出来。媾和生效后,与当地的回归祖国运动相呼应,日本本土也掀起了归还运动。然而,本土的运动是以冲绳县出身者的团体及革新派的团体为中心,没有发展到多数国民关心的程度。吉田内阁基本上实行的是与美国的远东战略合作、保持对日本有利的同盟关系的政策,因而在这一问题上没有采取相应措施。

1953年8月,来日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同吉田首

相会谈后表示打算将奄美群岛归还日本。同年12月24日,日本外相冈崎胜男与美国驻日大使安理逊签订了关于归还奄美群岛的日美协定,25日该协定生效。12月24日,杜勒斯表示,出于战略考虑,冲绳与小笠原仍继续由美国统治。

1955年10月,美国众议院普赖斯调查团访问冲绳,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并进行了现地调查。1956年6月,普赖斯调查团向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交了报告书。在此之前,琉球政府立法院通过的关于处理军事用地的请求(1954年4月)中,提出了4条原则:(1)反对总付一笔土地费;(2)实行公正的补偿;(3)赔偿损失;(4)反对再征用土地。普赖斯报告书无视这些要求,提出了有必要承认国防部的冲绳基地建设计划的建议。这种做法引起了冲绳县民的反对。

在这种形势下,鸠山内阁不得不关注冲绳问题。1955年8月,重光外相访美时,把冲绳问题也列入会谈范围。然而,并没有提出归还的具体要求,杜勒斯国务卿等当然也对此不加理睬。美军的统治,在小笠原持续到1968年,在冲绳延续到1972年。

第十章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

1. 岸信介内阁

石桥内阁

1956年12月14日，自民党召开大会，公选鸠山辞任后的总裁。河野一部曾建议采取由鸠山指名的方式让岸信介继任总裁，但鸠山以“引退就不应该给以后留下影响”为辞拒绝了。大会确定岸信介、石桥湛山、石井光次郎三人为候选人。各派展开了激烈的选举战。在第一轮投票中，岸得223票，石桥得151票，石井为139票。得票最多的岸也没超过半数，只好进行决选投票。支持石桥的石桥博英与三木武夫，在决选投票前同支持石井的池田勇人约定在决选投票中进行合作。决选投票的结果，石桥得258票，岸为251票。石桥仅以7票之差当选。

石桥湛山出生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当年72岁。早稻田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东洋经济新报社。后来他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投入了自由主义大辩论，反对增加军备与军国主义，批评“满洲事件”与五一五事件^①。1941年，石桥就任东洋经济新报社社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仍拒绝向军部妥协。战后，在1946年4月的大选中，虽被推举为候选人，但落选

^① 五一五事件，指1932年5月15日，一群右翼海军军官与陆军士官学生杀死犬养首相并图谋发动政变的事件。——译注

了。从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在第一次吉田内阁中担任藏相。1947年4月，在新宪法下的第一次大选中当选为众议员。但几乎与吉田内阁总辞职的同时，他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观察战前、战中的所作所为，石桥被开除公职是不公正的。这可能与他任藏相时代与盟军总司令部对立以及自由党内的派系斗争有关。1951年6月，解除了褫夺公职的处分后，他加入了自由党。但他与鸠山和三木武吉一起反对吉田路线。在鸠山内阁时代，他任通产相。对日中贸易非常关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12月20日，石桥被国会指名组阁。由于是党内少数派联合，以几票之差当选为总裁、总理的，所以在组阁时遇到了困难。12月23日石桥内阁成立。外相为岸信介，藏相为池田勇人，文相是滩尾弘吉，通产相由水田三喜男担任。官房长官为石田博英。三木武夫任自民党干事长。组阁后，石桥在谈他的施政方针时说：“关于经济问题，以提高和稳定国民生活为目标，坚决执行稳定的积极政策。关于外交问题，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一员，全力与联合国合作，以确立自主外交”。1956年年底的内阁会议，决定了“尽管当前不能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但是要向同中国扩大贸易的方向发展”的方针。产业界期望同中国扩大贸易。反对日苏恢复邦交的池田等原自由党系政治家们，也赞成扩大日中贸易。因为石桥具有热心推进日中贸易的经历，所以很多人对改善日中关系抱有希望。

1957年1月8日，石桥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发表演说，提出了国会运营正常化、严肃政界官界纲纪、扩大雇用与增加生产、建设福利国家、确立世界和平“五条誓言”。石桥在展望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时指出，在以民间设备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开始起飞的情况下，政府也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加速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提高国民收入，建设福利国家。

鸠山内阁执政的 1955 至 1956 年，是日本经济以往从未有过的顺利发展时期。1956 年 7 月发表的政府《经济白皮书》指出，“现在已不再是战后。今后的经济发展要靠实现现代化”。认为要达到经济恢复时期那么高的增长还有困难，但希望能靠现代化和技术革新来实现持续增长。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产业的现代化与技术革新，促进了民间设备投资的高涨，出现了意味着“神武天皇以来的好景气”的叫做“神武景气”的繁荣高潮。1956 年秋的苏伊士动乱，对国际经济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对日本来说，却带来了批发物价的猛涨，成为经济进一步过热的原因。这种未曾有过的繁荣，使税收大幅度增长。在编制 1957 年度财政预算时，政府预计财源比上一年度增长约 2000 亿日元。1956 年度的政府一般会会计预算额为 10897 亿日元（修正后），因此，1957 年度的预算中，财源预计比上一年度增加约 18%。

池田藏相按照石桥首相的积极政策，提出了“1000 亿减税，1000 亿措施”的方针。即：一方面实行所得税的大幅度减税，全面改革税制；另一方面采取充实产业基础与工业布局条件、普及与促进国民健康保险、创设老龄退休金制度、改善住宅建设与环境卫生设施、加强扶植中小企业以及强化经济外交等措施。

可是，石桥路线尚未付诸实施，就受到了挫折。1957 年 1 月，石桥在回母校早稻田大学参加就任首相祝贺会时患了感冒，发展为肺炎，进而并发了三叉神经麻痹，连说话也发生困难。2 月 4 日国会复会时也不能出席。岸外相被任命为代理首相。在野党社会党认为首相不出席，不能对预算进行审议。

岸内阁的成立

2 月 22 日，石桥向三木干事长与池田藏相表达了引退的意

思。于是，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决定岸信介为继任首相候选人。23日，石桥内阁总辞职。它是只有63天的短命内阁。25日，岸信介被国会提名组阁。岸内阁由石桥内阁的全部阁僚继任，只是新增加了石井光次郎任国务相。岸信介任首相兼外相。自民党在3月21日的党大会上选举岸信介任总裁。

不仅许诺采取积极财政的石桥内阁辞职了，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政策的基调也不能不发生较大的变化。以民间设备投资为主导的繁荣，持续到1956年秋便发生了因钢铁供应不足而价格上涨、电力供应不足以及国营铁路运输能力不足而造成货运积压等问题。1957年1月至3月国际收支也出现了较大的赤字。岸内阁成立前后，日本银行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3月20日与5月8日两次提高利率）。在财政方面，岸内阁也只好暂缓公共投资与财政投融资的实施（6月，实施改善国际收支紧急对策）。

从石桥湛山到岸信介的交替，给外交基调带来了变化。同样是主张“自主国民外交”，可内容并不一样。石桥自回到政界以来，一贯关心日中关系的改善，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而岸信介，无论从经历来说还是从思想来说，对改善日中关系都存在着很大障碍。

岸信介同石桥恰成对比，其经历与交往都迥然不同。石桥在战前和战时都是一个在野的有骨气的自由主义经济评论家。而岸信介在同一时期却是代表“革新派”的有才能的官僚，得到右翼和军部的信赖。他善于顺应时代潮流，在战争推行体制中保持着领导地位。战后，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由于他战前直接而且深深地卷进了对中国的侵略，因而难以持客观态度。

岸信介生于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就任首相时正60

岁。战前和战时，他虽然还很年轻，却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岸信介本姓佐藤。他父亲出生在岸家，后被佐藤家收为养子。岸信介少年时代又过继给岸家。岸信介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时，以国家主义宪法学者上杉慎吉教授为师，参加了右翼学生团体七生会。毕业后，在农商务省就职。后来农商务省分为商工省与农林省。岸信介转到商工省任职。1936年，受关东军干部的招聘，就任当时“满洲国”产业部次长（时年39岁）。产业部次长实际上是产业开发的最高负责人（在形式上由当地人任部长），负责制订“满洲开发五年计划”，创立了“满洲”的重工业。当时支配“满洲国”的日本人实力者共有五人。即：“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后任日本首相），“满洲重工业”总裁鲇川义介（日产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南满洲铁道”总裁松冈洋右（后任日本外相），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其中，鲇川和松冈都是岸的亲戚。1939年，岸回国任商工次官。1941年10月在东条内阁中任商工相（时年44岁）。1942年4月大选中，作为“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1943年11月的机构改革中，商工省与农林省改组为军需省与农商务省。军需相由东条首相兼任。岸任国务相兼军需次官，负责军需生产行政领导工作。1944年夏，考虑到日本本土被空袭会使军需生产遭到破坏，岸提议在马里亚纳群岛进行守岛决战，为此与东条发生对立。它成为东条内阁总辞职的动因。

1945年9月，岸信介作为甲级战争嫌疑犯被美军逮捕，1948年12月，以不予起诉而被释放。1952年岸信介与其同伙成立了日本重建联盟，因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影响而于1953年加入自由党。后来就与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等共同活动。1955年1月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1956年11月任保守政党合并后的自民党第一任干事长。

赔偿协定

50年代的战后处理之一，就是签订对东南亚各国支付赔偿的协定。它也成了日本回到国际经济的契机。

占领时代的美国对日政策摇摆不定。对赔偿问题的想法也是错综复杂，最后才按旧金山和约的精神确定了基本原则。即日本放弃其国外资产请求权，由日本负担战后的占领费，作为实质性的赔偿；原则上不再另向日本索取赔偿，但在联合国成员中如有要求支付赔偿的国家，可以个别交涉。

美国和英国在媾和会议时已决定不要求赔偿。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在1952年4月的“日华和平条约”及其议定书中，也明确表示放弃赔偿请求权，“以表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与善意。”

1954年11月5日，日本与没有出席旧金山媾和会议的缅甸签订了和平条约与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1955年4月16日生效）。规定从条约与协定生效起10年内，日本支付总额720亿日元（2亿美元）的赔偿，并进行180亿日元（5000万美元）的经济合作。双方商定：赔偿的支付以日本提供劳役赔偿或提供生产实物的方式；经济合作采取日本提供实物出资在当地兴办共同事业的方式。后来许多赔偿协定也沿袭这种方式。

1956年5月9日，日本与菲律宾签订了赔偿协定与关于经济开发借款的换文（同年7月23日生效）。赔偿总额为1980亿日元（5.5亿美元）。起初10年为900亿日元（2.5亿美元），后10年为1080亿日元（3亿美元），由日本以劳役或提供各种机械等生产资料的方式支付。日本提供劳役包括沉船的调查与打捞。关于经济开发借款的换文规定，日本政府将提供900亿日元（2.5亿美元）借款。

1958年1月20日，日本与印尼签订了和平条约、赔偿协定与关于经济开发借款的换文（同年4月15日生效）。赔偿总额

为 8030880 万日元(22308 万美元),12 年内以实物支付。经济开发借款为 1440 亿日元(4 亿美元)。

1959 年 5 月 13 日,日本与越南共和国(南越)签订了赔偿协定、借款协定与关于经济开发借款的换文(1960 年 1 月 12 日生效)。赔偿总额为 140.4 亿日元(3900 万美元),5 年内支付。提供借款为 27 亿日元(750 万美元)。在越南分裂为南北的状况下,规定日本只向南越政府提供赔偿与借款。

对以上四国的赔偿总额为 36,434,880 万日元(101,208 万美元),借款总额为 2,547 亿日元(70,750 万美元)。赔偿支付的约定额,在 60 年代初为每年 7500 万美元。从当时日本经济的规模与国际收支实情来说,这决不是一个轻松的负担。然而,后来日本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国际收支也得到改善,因此,赔偿协定和借款协定还是顺利地履行了。期限最长的对菲律宾的赔偿支付,一直到 1976 年才了结。

除此之外,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还对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进行了无偿经济技术合作。

这些赔偿与借款,成为战后日本产业开始进入东南亚的重要契机。

亚洲外交

在担任石桥内阁外相时期,岸信介就曾表示“想成为出访外相”,认为今后的时代,首相和外相都有必要更积极地到海外去访问。

担任首相兼外相后,岸信介于国会闭会后的 1957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4 日,先后出访了东南亚六国和地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泰国,台湾)。

在吉田、鸠山两内阁时代,已与缅甸、菲律宾签订了赔偿协

定。岸内阁时代又与印尼、南越签订了赔偿协定。岸信介的东南亚之行,是在处理昔日日本在“大东亚共荣圈”口号下推行军事统治的善后工作的同时,探索在战后新的条件下日本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发展途径。岸信介的意图是:通过直接与东南亚各国接触,在接下来访问美国时就可以摆出日本代表亚洲的姿态,以强化其自主立场。

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时,曾提出由欧美各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合作,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和技术训练中心的设想,但没有具体化。岸在访问台湾时,曾与蒋介石会谈,对蒋介石所说的“中国大陆有恢复自由的必要”,表示同感。岸认为:“中国在共产主义支配下,对日本也是一种威胁”;“日本人比苏联人更对中国人有亲近感,因此,考虑到共产主义向日本的渗透,应对中国抱有更大的警戒心”。岸的这些谈话内容,日本的新闻媒介也报道了。

1957年6月16日,岸信介率领官房长官石田博英、政调会长福田赳夫、原日苏谈判全权代表松本俊一等出访美国。19日至21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岸信介就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冲绳施政权的归还、小笠原岛民的返岛以及禁止核武器等提出了要求。关于修改安保条约,杜勒斯以“还不到修改的时候”加以拒绝。

21日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说,“为了研究安保条约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双方一致同意设立两国政府间的委员会”,包括研究美国在日本的军队配置与使用的协议。联合公报还附带说明,1951年的安保条约是暂时的,并没有使它永久存在的意图。美国方面欢迎日本的防卫力整備计划,并将大幅度削减驻日美军,包括全面撤退美国的陆上战斗部队。

1957年1月30日,日本一个农妇在群馬县相马原射击场拾

捡美军射击演习的废弹壳时，被美国士兵杰拉德故意枪杀。岸信介访美时，日美两国政府就杰拉德事件的裁判权发生了争执。7月，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联邦地方法院“应提交美国军事审判”的判决。杰拉德被引渡到日本，由前桥地方法院进行了审判。11月19日，作出了以伤害致死罪判刑三年(缓刑四年)的判决。这一判决太轻，但地方检察院没有提出抗诉。12月6日，杰拉德离开日本回国。同年8月2日，又发生了在茨城县作超低空飞行的美国军用飞机杀伤行走中的日本母子事件。美方认为这是“公务过失”，结果，日方放弃裁判权，不予起诉。

围绕东京都立川基地的扩建，砂川町居民及其支援团体，同受到警视厅机动队支持企图强行进行测量的调达厅的冲突。从1955年秋一直延续到1957年。1956年秋，警察袭击了静坐示威的居民、学生、工人，造成一人受伤。从1957年5月到9月，双方又多次发生冲突。

只要美军驻留日本，并不断强化和扩建基地，这类事件还会不断发生。尤其是大量地面部队继续留驻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同日本人之间发生纠纷。为此，岸信介在日美会谈时要求美国削减驻日地面部队。

日美联合公报说，美国承认日本对冲绳、小笠原的潜在主权，但只要远东存在着威胁与紧张，就只好维持现状。日美会谈后，岸信介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认为“这次对华盛顿的访问，有助于开拓日美新时代的途径”。

岸改组内阁

1957年7月10日，岸信介进行了内阁改组，大幅度更换了阁僚。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被起用担任外相。在岸的战后蛰伏期，藤山曾在资金上给予过援助。此外，一万田尚登

任藏相，赤城宗德任农相，通产相由前尾繁三郎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为河野一郎。经佐藤荣作推荐，39岁的田中角荣任邮政相。官房长官石田改任劳动相，遗缺由爱知揆一接任。岸信介希望池田由藏相改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但池田拒绝了，并离开了内阁。自民党干事长由岸派的川岛正次郎取代了三木武夫。三木改任政调会长。

9月23日，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禁止核试验决议案（被11月6日的政治委员会否决）。

10月1日，日本在联合国大会上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外务省认为，在安理会中没有稳定的亚洲席位的状况下，给日本提供代表亚洲国家发言的场所，其意义是重大的。强调了日本是亚洲的代表。

10月4日，印度尼赫鲁总理访日。13日，发表了岸—尼赫鲁联合声明，强调禁止核武器的必要性和亚洲经济发展合作的意义。

11月18日至12月8日，岸首相历访了南越、柬埔寨、老挝、马来亚、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九国。此时，财界的小林中已经代表日方同印尼开始了赔偿谈判。岸于11月27日在雅加达同苏加诺总统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协议。1958年1月20日，日本与印尼签订了和平条约与赔偿协定。同年1月29日至2月15日，苏加诺访问日本。

1957年12月17日，日本政府在经济审议会的咨询（11月25日）基础上通过了“新长期经济计划”。这是政府通过的第二个经济计划。它是1958至1962年度的五年计划，年增长率计划为6.5%，比鸠山内阁1955年12月通过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规定的5%还要高。这是因为，经过“神武景气”之后，估计经济增长的势头还会进一步高涨。这一计划的目标是：通过经济的

持续稳定增长,着实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以达到接近完全就业的状态。为此,出口的扩大、资本积累的增强、基础部门的充实、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农业生产结构的现代化以及就业与国民生活的改善等,是这一时期的政策课题。取代 50 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复兴”而登场的“经济自立”这一目标,已经开始退出舞台,而“经济增长”成了中心目标。

1958年,随着国际收支的恶化,采取了金融紧缩政策,进入了经济调整时期(锅底萧条)。1959至1961年又出现了超过“神武景气”的被称为“岩户景气”的繁荣。在此期间,池田内阁决定了第三个经济计划“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0年)。1958至1962年度这5年的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10.1%,大大超过决定“新长期经济计划”时预想的增长率。

在岸内阁时期,还着力于日韩关系的改善。1957年12月31日,日韩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全部释放在押人员及恢复全面会谈的备忘录。第四次日韩会谈于1958年4月15日开始。日方代表为泽田廉三(前外务省顾问),韩方代表为林炳稷(前驻联合国大使)。

1958年1月29日,岸信介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发出警告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已被国际共产主义的宣传所利用”。

2月4日,日本与印度签订了通商协定与日元贷款协定,由日本进出口银行在3年内向印度提供180亿日元贷款。

日中关系的恶化

岸信介的外交政策,除了推行“联合国中心主义”、“同自由阵营合作”之外,还强调“亚洲一员的日本”。可是,这种外交政策却包含着同拥有亚洲最众多国民的中国关系恶化的因素。以

赔偿与经济援助为武器强化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在联合国强调“亚洲代表”的立场，以及对民族主义运动告诫不要被共产主义渗透利用等岸所推行的路线，在中国看来，这是带有对推行和平共处政策的中国进行政治封锁的意图。正因为岸信介活动频繁，所以中国对他的警戒心很强。实际上，岸内阁的登场使日中关系恶化到了极点。

1958年2月26日，以八幡制铁常务董事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钢铁代表团，在北京与中国方面签订了日中钢铁协定。这是为期5年的1008亿日元易货协定。3月5日，访中贸易使节团(团长池田正之辅)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在北京签订了第四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

第三次协定是1955年5月签订的，1956年4月决定延长1年。1957年5月以后因需要看清新内阁的动向而推迟谈判，因而处于无协定状态。

岸信介任石桥内阁外相时期，就曾表示没有必要设立中国商务办事处。岸内阁成立后的1957年6月，为预定在名古屋和福冈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而准备来日的中国调查团，在办理入境手续时，日本政府按外国人登录法的规定要求中国来日人员按手印。中国方面反对这种做法。商品展览会无限延期。1957年9月21日在北京开始的贸易谈判也陷入了僵局。

第四次协定，就悬而未决的商务办事处问题作了基本规定。具体内容以备忘录形式加以记载。备忘录的原案，准备给办事处人员以外交官待遇，并承认双方的办事处可以悬挂国旗。1958年2月22日，自民党向谈判中断回国的池田等使节团员转达了不给予外交官特权也不承认悬挂国旗的修正要求。池田使节团将此修正案提交中方，遭到中方拒绝。池田等也认为不可能按这种修正案达成协议，于是，3月5日在北京按原案签订了协

定。

同日,岸信介在国会的答辩发言中说:“有悬挂国旗的权利”这种提法不妥当,如不加以修改,政府将不能承认这种贸易协定。3月12日,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驻日大使就签订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递交了蒋介石给岸的信件。14日,台湾政府中止了在台北的日台通商会谈(4月15日又恢复)。岸信介于4月1日给蒋介石送去了亲笔信,表示“日本没有承认北京政府的意思。按照日本的国内法,不能阻止悬挂中国国旗,但并不承认悬挂国旗是一种权利”。4月9日,政府回答日中贸易四团体说,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将在国内法令范围内实施。爱知官房长官也发表谈话,表示不准备给予民间商务办事处以特权地位,也不把悬挂国旗看作是一种权利。4月13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指责说,日本政府的回答,实际上是拒绝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

4月25日,社会党提出了对岸首相不信任案。岸则以解散众议院来对付。实际上,自1955年2月大选以来已经3年多了,政界已进行了重新组合,要求解散众议院、实行大选的呼声很高。这次解散是事前由岸信介与铃木茂三郎两位党的领导人会谈后取得谅解的。

4月30日,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织锦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中国国旗。国民政府(蒋介石政权)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将该国旗取下。5月2日,发生了日本青年把悬挂在该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扯下来的事件。警察虽将犯人拘捕,但不久就以“因没有损坏旗帜,很难说是否触犯了毁坏器物的条款”以及“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为由释放。该青年在长崎简易法庭只是受到违反轻罪法的处分。5月9日,中国的陈毅外长发表声明,指出:“岸内阁对长崎国旗

事件采取放任态度，暴露了他们的敌视中国的政策”。10日，日本外务省发表非正式见解反驳说，陈毅声明等于干涉日本的内政。同日，中国方面发出通告，宣布中断根据日中钢铁协定在东京进行的洽谈，废除一切已达成协议的合同与洽谈。11日，陈毅外长表示：日中之间所有经济、文化关系不得不断绝。5月13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确认，对日中问题暂且采取静观态度。21日，在台北签订了日本与台湾新的贸易协定。

5月22日进行了大选。这是社会党重新统一、保守政党合并、共产党方针转变之后首次举行的大选。自民党的得票率达57.8%，获得287个议席。与上次的民主党、自由党合计数相比，得票率下降5.4%，议席数减少10席。但是，以无党派人士当选的议员中有一些还没被公认的自民党员，当选后加入了自民党，因此，自民党的议席共298席。社会党得票率为32.9%，166席，增加8席。共产党得票率为2.6%，比上次增加0.6%，但议席数却由上次的2席减为1席。本来，对这次大选的预测，多数认为：随着“反动”色彩较浓的岸内阁的登场，自民党将一蹶不振；而社会党将声势大张。可是，大选的结果，却给人们留下了自民党善战而社会党停滞的印象。日中关系的危机并没有给自民党的处境造成多大恶果。

6月11日，中国渔业协会发出通告说，由于岸内阁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日中民间渔业协定(12日到期)已不可能再延长。

修改安保条约的谈判

1958年6月12日，在大选后的指名组阁投票中，岸信介再次当选。在众议院的投票中，岸信介得290票，铃木茂三郎为162票。同日，组成了第二届岸内阁。藤山留任外相。佐藤荣作任

藏相。文相为滩尾弘吉。通产相由高碓达之助担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为三木武夫。池田勇人以国务相入阁。赤城宗德取代爱知揆一任官房长官(爱知改任劳动相)。自民党干事长川岛正次郎留任。政调会长由福田赳夫取代三木。重要的位子都由岸派与佐藤派瓜分。同时拉拢反主流派的池田和三木,以保持政局的稳定。

岸信介在组阁后的一次谈话中说:“这次大选,显示了对保守、革新两大政党的民意所向。自民党以压倒优势取胜,证实了国民是追求进步保守政治的。”在6月17日向国会表示信念的演说中,岸信介提出了下列方针:(1)拥护民主政治;(2)坚持外交三原则(联合国中心主义,与自由阵营保持协调,亚洲一员的立场);(3)谋求经济正常化;(4)实行减税和创设国民养老金。在谈到拥护民主政治时,岸信介说:“必须抑制极左和极右的活动。近来出现一种倾向,即动辄公然无视法律秩序,或者依靠集团的压力,不正当地牵制国会的正常活动,这是很遗憾的。对这种非民主的活动,将采取坚决的态度加以处置。”自民党在保守政党合并后的首次大选中得到了国民的信任,保住了众议院解散前的势力。于是,就摆出了强硬态度。在国会领导人方面,改变了以往把副议长及一部分常任委员长让给在野党的做法,全部由自民党垄断。6月25日,自民党六要员会议决定了解散日中贸易议员促进联盟的方针。27日,该联盟理事会决定联盟继续存在下去。7月1日,自民党干事长发出通知说,自民党议员将不再参加该联盟。

7月18日,藤山外相同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不是战后初期任最高司令官的那位麦克阿瑟)会谈,告知美方,想就修改安保条约问题谈谈日本方面的见解,并约定30日再次会谈。7月30日的会谈中,藤山表示,考虑到日本的国民感情等因素,想就

修改安保条约开始进行日美间的协商。麦克阿瑟反问说，一种办法是以现行安保条约为前提，作些辅助协定；另一种办法是制订与现行日本宪法对立的相互援助型新条约，日方希望采取哪种方式呢？

美方深知，修改宪法在目前是办不到的。说是“相互援助型”，可是在宪法制约前提下，日本不可能向海外派兵。麦克阿瑟大使暗示说，即使考虑到这种制约，也还有修改条约的可能性。

这年5月，黎巴嫩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反美暴动。7月，伊拉克发生政变，推翻了亲欧美的王朝。以黎巴嫩总统夏蒙为代表的亲欧美路线同以埃及总统纳赛尔为代表的泛阿拉伯主义的对立，使整个中东的形势既错综复杂又非常紧张。应亲欧美派阿拉伯国家首脑的要求，美国于7月派去了海军陆战队，英国也派遣了空降部队。为这一事件，联合国于8月召开了紧急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藤山，在纽约同杜勒斯国务卿进行了会谈。

8月25日，岸首相、藤山外相同麦克阿瑟大使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岸信介说：“如要对条约进行根本性修改，估计会在国会引进激烈的争论。但只有经过激烈争论，日美关系才能真正建筑在稳定的基础上。为此，可能的话，希望对现行条约进行根本性修改。”

8月27日，岸信介在去伊势神宫参拜的途中，会见记者时说：“岸内阁的目标，对内是谋求国民生活的稳定，对外是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为此，作为政府领导者，不拘泥于谋求长期稳定，而是有在短期内就坚决实行的决心。”

9月11日至12日，藤山外相在华盛顿再次与杜勒斯国务卿会谈，提出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问题。杜勒斯表示，他自己作

为现行条约制订人之一,当然认为现行条约发挥了它的作用,但并不固执己见,不打算反对对它进行修改。准备探讨缔结新条约的方法。当然,如果缔结新条约遇到困难,仍然可以回到以现行条约为前提制订辅助性协定等方法上来。9月12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藤山回国后,从10月4日起再次进行了岸、藤山、麦克阿瑟三人会谈,修改安保条约的谈判,就在东京开始了。

2. 勤务评定问题

战后教育的重新研究

1958年5月大选中“获得国民信任”而显示强硬态度的岸内阁,矛头首先指向日教组。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方面,最大的争论是教员“勤务评定”的实施。

吉田、鸠山、岸历届内阁所推行的50年代保守势力的教育政策,基本上对作为战后占领政策一环的教育改革在内容上作了大幅度修正。然而,对其动机与内涵并不能简单地地下结论。保守势力的教育政策包含着几个目标。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建立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活伦理体系。

在战后改革中,美军从有必要在日本的教育中消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因素这种观点出发,大幅度改写了历史教育的内容,撤销了以“修身”或“伦理”名目设置的道德教育科目。以重视“忠义”、“孝行”这种为人处世关系的儒教式伦理观为主轴的战前“道德”,确实不能适应以个人的自律、自由与责任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市民社会的伦理体系。在美国看来,战前的这种“道德”,就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温床。可是,这些传统的秩序与伦理体

系一下子全部被否定，这就不能不在国民中间引起不安与不满。当然，战后有許多人欢迎强调自由与民主主义，但同时也有不少感到这样会破坏日本人的社会生活秩序，酿成任意行事的生活态度。持保守态度的人们中间，还有不少人很担心战后改革所带来的“自由”和“民主主义”，有被共产主义者利用的倾向。

有相当多的人们，并不打算建立新的公民伦理体系，而是倾向于恢复传统的秩序与伦理体系。在50年代，农村人口还占很大比重，总的来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仍保持着传统的方式。在农村，古老的共同体章法依然起很大作用。所以，认为“自由”和“民主主义”太过头了，应该尊重日本自古以来的“良好风气”的看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要与这种势力相对抗，以维护战后民主教育改革的成果，就必须提出一种以民主主义与自由为前提的新的公民伦理，并提出在这种新伦理基础上构筑新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阶层不能说没有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但总的来说，这种努力还很不充分。尤其是，革新派中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很多，因而他们围绕教育的争论和斗争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远离了拥护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这一课题。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和战略，对于必须培养一种严守建立在公民自由与人权思想基础上的新民主社会秩序这一课题，持否定态度。他们把民主主义划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认为后者应战胜前者。他们所关心的是，把国民的权利意识引导到集团性交涉或斗争上来，以开展否定现行体制的运动。他们从权宜主义出发，为了达到革命主义的政治目标，采取了对自由、人权、民主主义这些市民观念暂时加以利用的态度。

教育的统制

战后的教育改革,其基本出发点是,重视教育现场教师们的自由与责任,尊重各种地方组织的自主性,实行彻底的分权主义。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对教育发展进行多样的尝试,培养教育现场的创见。但不可否认,却也带来了在教育内容与方法上难以保持全国统一标准的问题。即使从所谓教育“质量管理”的观点来说,也必须对分权制的利弊得失重新进行研究。

具有保守心情的人们,并不认为现场创见和努力的高涨就能克服分权化所造成的混乱。他们不相信现场的自由与责任就是提高教师素质和发展教育内容的基本条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正是自由民主社会所产生出来的重要价值这一事实。他们简单地认为,除了重新建立政府对教育的统制外,就无法保障教育的质量管理。

战后恢复国家统制的一切尝试,并没有企图恢复战前作为国民思想统制一环的那种教育统制的意图。而是迫切希望建立全国性的标准,以保障教育的质量管理。这也正是多数国民对恢复国家统制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左翼意识形态具有同自由、人权、民主主义的原则相对立的性质,阻碍了这一问题的妥善处理。在教育现场,屡次出现企图利用给予教师的自由裁度权夹带左翼意识形态内容的情况。在关心社会问题、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教师中,有很多是受左翼意识形态影响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尽管在理论体系上还欠准确,但它包含着对现行体制缺陷的尖锐指责,正因为如此,它深深吸引了热情有为的青年人的心。

如果教师站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立场上,在强调新宪法理念的范围内,就政治、社会、经济、历史等把自己生气勃勃的关心

传授给儿童与学生,就不会产生什么问题,而会产生很好的教育效果。如果教师本身不具备按公民秩序与伦理处理人际关系的热情与行动,现场教育就不能生动活泼。这样,就不可能把作为民主社会能动主体的新的一代人教育好。此外,在明治以来推进现代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日本站在亚洲人支配亚洲的立场上,对近邻各国进行侵略,实行统治,最终发动了带来难以计算的牺牲与破坏的战争。对这些进行冷静的总结与批判,也必须是战后教育的课题。这种能体现民族自我批判与自我革新精神的教师,才是加强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基础所必要的。

然而,否定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师,在讲台上可以不受任何牵制地向儿童、学生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只能是利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来达到破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目的。战后改革以后的教育现场,对这种思想意识要素很强的政治集团攻势,几乎是没有任何防备。

具有保守心情的人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使多数国民认识到在教育方面恢复与加强国家统制的正当性。教育成了左右两种政治势力激烈冲突的场所。从而完全失去了教师与一般国民共同努力,以战后改革为出发点,发展自由主义教育与和平教育的机会。

自民党与日教组

保守政党为排除教育领域革新政治势力的影响,费尽了心机。在这方面,保守政党与保守政府的意图与背景是:

第一,排除教育内容的左翼思想。为达到这一目的,保守势力动用了文部省的行政处理、保守政党独自的宣传活动以及由政府采取立法措施等手段。攻击对象之一是教科书的内容及其编者、执笔者。攻击对象之二是教育现场教师中的左翼分子。

保守势力之所以重视教科书及指导要领问题，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保守势力之所以对加强现场教师的管理统制异常热心，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第二，把排除教育领域革新政治势力的影响作为政府方面加强对抗日教组（日本教职员工会）这一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

日教组以战后改革为背景，发展成了把全国大部分中小学教员和一部份高中、大学教师组织起来的强大团体。作为总评系统的工会之一，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拥有50万左右会员的这一按产业组织的单一工会组织，其影响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这对保守政治势力是很大的威胁。在山乡渔村，教师有很大影响力。在这些地区，保守势力的政治基础有被日教组挖垮的危险。日教组已经不是单纯在改善教师待遇等经济要求方面进行交涉发挥工会作用的组织。它成了左派社会党的重要支柱，选举时起了很大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日教组已经显示了批判保守势力政治路线的鲜明立场。1951年1月，日教组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不要把学生再送上战场”的口号，同年5月的大会又采取了支持总评的“和平四原则”的鲜明立场。日教组就是这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体验为基础，努力发展反对安保条约和反对重整军备的运动，摆出了同政府、执政党对峙的姿态。日教组还想站在教师的立场就教育的内容拥有发言权。1951年11月首次召开的由日教组主办的教育研究集会，对于现场教师有组织地开展自主性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建设性的研究会。可是，保守势力却把它看作是日益政治势力化的日教组为在教育内容中进一步加进意识形态打下基础的举动。

保守势力所提出的恢复“爱国心”，是以与苏联、中国、共产

主义对抗为理由，缔结日美军事同盟和实现重整军备，而对意味着民族性选择错误与破产的过去那场侵略战争进行历史性总结的必要性并不重视。政府也罢，自民党也罢，都有意地想把国民的深刻的战争体验加以淡化。对国内原子弹受害者等战争牺牲者，以及对从近邻各国强行抓来而牺牲了的人们，政府没有采取负责的对应措施。战争责任的意识，在日本的保守领导层大部分人中间已经逐渐消逝。岸内阁的登场，正是这种事态的象征。日教组的反政府运动基础中，就包含着对政府、执政党这种姿态的不信任与抗议。

勤务评定的实施

保守势力企图削弱日教组的组织、政治影响，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统制。教员的勤务评定问题的表面化，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从吉田内阁到鸠山内阁时代，政府与执政党一再把“偏向教育”作为问题提出来，为此主张必须加强对教师的管理统制。1954年的所谓教育两法案，就是实现这种主张的一个步骤。教育两法案，即：禁止教员从事政治活动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部份修正案以及确保教室教育内容政治中立的临时措置法案。就在这两个法案经国会通过成立的1954年5月，正好爆发了与教育的政治中立问题相关的、有许多学生及其父母都卷进来的大斗争。这就是京都市立旭丘中学事件。

1953年12月，旭丘中学一些学生父母，联名向京都市教育委员会陈告说：“在旭丘中学，教师利用《赤旗》（共产党机关报）等报刊，进行偏向教育。”京都市教育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后，于1954年3月5日发出了将5位教员调职的内部指示。但遭到3位教员拒绝。5月4日，教育委员会对这3位教员给以免职处分惩罚。教员工会对此表示抗议，并让这3位教员在工会管理下

继续授课。教育委员会则利用市劝业馆作临时教室对学生进行补习授业。为此，双方展开了争夺学生的斗争。后来，教育委员会想更换旭丘中学的全体教员，经过交涉，到6月1日才以除最初处分的3位教员外其余不给处分为条件，结束了这场纠纷。

通过这一事件，保守势力痛感有必要建立加强对教员的管理体制。

1956年6月，鸠山内阁提出的新教育委员会法案获得通过。为加强教员的管理，开始推行勤务评定。

1950年12月公布的地方公务员法第40条规定：“有任命权者，必须定期对职员任职的勤务成绩进行评定，并根据评定结果采取相应措施。”可是，对于教育职员，由于其职务内容的分析比一般事务职员困难，而且勤务评定的标准和方法更难制定，因而没有实行勤务评定。1956年的新教育委员会法（关于地方教育行政的组织与运营的法律），重新规定：凡由都道府县负担费用的教员（通常是公立学校的教员），其勤务成绩的评定，由市町村教育委员会根据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的计划实施。任命制的新教育委员会于1956年10月1日成立。政府开始对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实施勤务评定。

同年11月1日，爱媛县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国率先实行通过勤务评定来升级升薪措施，12月发表了实施要领。在爱媛县，教员的勤务评定拖了2年，一直悬而未决。由于教员工会的反对而无法实施。在这种情况下，爱媛县教育委员会决定强行实施。爱媛县的勤务评定要领对中小学教员的勤务评定方法与标准作出了规定。对校长的评定，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为第一评定者，县教育委员会为审查者。对一般教员的评定，校长为第一评定者，市町村教育委员会为第二评定者。教员的升级升薪也全部根据

勤务评定结果进行。爱媛县的勤务评定是全国勤务评定的突破口。为此，日教组发动全国的教职员工会组织来声援爱媛县教员工会的反对勤务评定斗争。爱媛县教员工会连日组织了200人静坐、70小时的绝食示威。爱媛县中小学校长会也决定采取拒绝勤务评定的态度。日教组与爱媛县教员工会对此也进行了声援。全国的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在爱媛县摆出了决一胜负的架势。但在政府的压力与支援下，县教育委员会的决心已定，勤务评定终于付诸实施。

1957年2月，佐贺县教育委员会决定将教员定员削减259人。佐贺县教员工会为反对这一决定，于2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30—40%休假斗争。县教委对11名工会干部进行了处分(停职1—6个月)。4月，佐贺县教员工会的斗争委员长、书记长等10名干部因一齐参加休假斗争违反法律而被逮捕。

从3月底到4月初，爱媛县教委对拒绝实施勤务评定的34名校长和450名工会会员分别给予4个月减薪处分和停止升级升薪处分。5月8日日教组组织全国一齐进行教育现场集会，以示对勤务评定实施与处分的抗议。

9月3日，松永东文相表示打算让校长与首席教员脱离教职员工会。

10月以后，日教组再次组织了反对爱媛县教委实施勤务评定的大规模斗争。县教委则要求“全体教员的评语都一样也可以，不管怎样，总要提出一份评定书”，反对派的校长也不断地抵制日教组的斗争。于是，爱媛县教职员工会于12月12日召开临时大会，决定收拾残局。

通过爱媛县例子，政府坚定了在全国推广勤务评定的方针。保守派的政治家们把学生的父母组织起来，开展了反对日

教组与实施勤务评定的社会性运动。

1957年12月4日，文部省颁布了在中小学设立首席教员职务制度的省令，除大学以外所有学校都要设立首席教员，以加强管理体制。1958年7月，政府制订了对中小学校长支付学校管理职务津贴的法规。

1957年12月20日，都道府县教委与都道府县教育长协议会制订了勤务评定基准案。政府于1958年4月决定在全国同时实施勤务评定。日教组于12月22日召开临时大会，确认了“绝对反对勤务评定，与岸内阁针锋相对”的基本立场，并作出了“为阻止勤务评定，必须扭转政治实力关系”的决议。小林武委员长发表了非常事态宣言。

反对勤务评定斗争

1958年2月18日，都道府县教育长协议会商定，在秋季之前实施勤务评定。4月23日，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实施勤务评定案。东京都教职员工会进行了百分之百休假斗争。这一时期，全国多数道府县也采取了同样措施。

5月7日，福冈县99%的教职员工会会员投入了反对勤务评定罢课。6月5日，和歌山县教职员工会进行了反对勤务评定斗争，全县90%的中小学校一齐放假。此外，各地也展开了反对勤务评定斗争。日教组的集会、静坐、示威，受到警察干涉，各地有不少被捕者。

6月6日，日教组在山形县上山召开第十七次大会。会上，围绕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方针发生了激烈争论。总部提出了坚持绝对阻止勤务评定的基本路线提案；持相反意见者提出了加进更现实路线的修正案。可是，这次大会是在面临艰难而激烈的斗争形势下召开的。在这种气氛下，修正案没有获得多数，被否

决了。大会在选举领导人问题上也发生了纠纷。6月11日宣布暂时休会之后,于7月27日在东京继续开会。选举领导人的结果,现任书记长平垣美代司落选,组成了宫之原贞光书记长、槇枝书记次长的新体制(委员长小林武再次当选)。平垣与高野实、太田薰、岩井章、宝树文彦等人都是劳动者同志会的成员。总评内部高野与太田的对立表面化后,平垣支持高野,对太田进行了批评。宫之原等认为:“扭转政治上的力量关系,贯彻绝对阻止勤务评定的方针,是唯心主义的。从县教委已分阶段地实施勤务评定这一现实出发,除了组织下一步的斗争外,没有别的选择”,对平垣等的方针进行了批评。这一年的7月21日至25日举行的总评大会,选出太田薰为议长,已确立了太田—岩井体制。

8月2日,全国教育委员长协议会决定了对勤务评定持反对态度的母亲大会不予支持的方针。8月16日,和歌山县的反对勤务评定示威者同警察发生了冲突。9月1日,东京都开始提交勤务评定书。9月6日以后,文部省在全国各地举办道德教育指导者讲习会,对教员进行道德教育研修。日教组开展了共同抵制斗争。文部省为排除日教组的纠察队阻挠,叫来了警察。9月12日,下中弥三郎(平凡社社长)与大学校长团体曾试图从中斡旋,未能成功(14日停止)。为牵制日教组预定15日举行的全国统一斗争,岸首相于13日发表谈话说:“总评与日教组怀着政治意图来号召反对勤务评定,把儿童也卷进了斗争的旋涡中,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地展开斗争。对此,深表遗憾。”9月15日,日教组按预定计划在全国组织了正午停止授课的反对勤务评定统一行动。

10月8日,政府向国会提出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对此,在野党与工会等又开展了反对斗争。日教组也再次采取了

反对勤务评定统一行动。

12月9日,神奈川县教委与县教职员工会一致同意采取由教员自己记载评价的勤务评定,叫做“神奈川方式”。文部省表示反对,认为“教员的自我评价不能算是勤务评定”。教育委员长、教育长协议会也于1959年1月23日发表正式见解,认为“神奈川方式不同于勤务评定”。12月10日,日教组组织了第五次阻止勤务评定统一行动。群马县教职员工会进行了百分之百休假斗争。12月15日,发生了日教组的小林委员长在高知县受到居民集体暴力行动而受伤的事件。

1959年2月17日,日教组第二十次临时大会通过了岩手县教职员工会提出的修正案,决定以“神奈川方式”作为解决勤务评定斗争的途径。

使全国教育现场卷入激烈斗争漩涡的勤务评定问题,结局是以政府方面的意图基本得到贯彻而收场。除京都府外所有都道府县都实施了勤务评定。可是,尽管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对立,但日教组还是保持了组织的统一,开展了未曾有过的大斗争。在斗争中,因违反地方公务员法而被起诉的有108人,被解雇的70人,被处以长期休假的42人,被停职的99人,受到减薪等处分的达6万人。然而,最高法院对东京都教职员工会事件的判决(1969年),以及日教组提出的其他诉讼案件,几乎全都是日教组方面胜诉。这就表明,当局方面也有很多非法的镇压行为。

3. 警职法与修改安保条约

警职法修正案

1958年10月8日,岸内阁突然向国会提出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简称《警职法》)修改案。这一修改案是由以岸首相为中心

的少数政府、执政党首脑秘密准备，然后交给大臣传阅，征求意见后提交内阁会议通过，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国会提出的。对此，社会党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战前治安维持法的复活。如强行提出，则不予审议”。8日，社会党与总评分别发表了反对声明。

10月9日，自民党就修正案的宗旨发声表明，指出：“现行警职法不完备，无法预防犯罪活动。现行法律中缺少维持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法规，因而不断发生暴力事件以及最近的勤务评定斗争、反对道德教育斗争等集团性非法暴力事件与流血事件。对此，有必要采取对策。修正案是在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同时，以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为目的的提案。它是民主国家的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

现行警职法是1948年7月制订的。有鉴于战前警察权力的严重滥用，战后，作为民主化的一环，从优先考虑保障市民的自由与人权出发，对警察官执行职务的权限作了严格的限制。岸内阁提出的修正案，就是对此进行修改。包括以下内容：

(1) 将现行警职法中，警察官“在断定犯罪确实会发生的场合”可以发出警告的规定，改为“在断定显然是在进行犯罪的场合”；将“危及人的生命身体时”可以加以制止的规定，改为“在显然会显著扰乱公共安全与秩序，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场合”。

(2) 关于可以采取避难等防止危害措施的场合，除增加“集会的混乱”这种场合外。还将可以采取这些措施的场合，改为不仅是在危险事态已经发生的场合，而且是“在眼前有可能发生的场合”。

(3) 扩大警察官的职务质问范围，“对有理由怀疑犯有罪行者，有理由怀疑其一时保管凶器或持有凶器时，可以要求提出对

所持物品进行搜查”。

(4) 扩大应急保护的规定,喝醉酒者或可能会自杀者,以及离家出走的少年等,也应列为保护的對象。

这样,修改案就把警察官的执行职务目的改为重视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扩大警察官的权限,可以轻易地进行职务质问或预防性保护、警告、处理。

政府与执政党打算将此法案提交给预定9月29日至11月7日召开的临时国会审议通过。他们无视在野党的反对,于10月11日利用众议院议长的职权委托给地方行政委员会处理。

然而,对战前、战中警察官的横暴及治安警察的无数作恶记忆犹新的国民,比岸信介预料的更快、更广泛地汇集到反对运动中来了。社会党、总评等以“连男女约会也不允许的警职法”这种通俗易懂的口号来控诉新警职法侵犯私权的危险。战后的民主化好不容易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人权有再次被蹂躏的危机感,使反对运动一下了扩大了。

10月13日,以社会党与总评为中心的65个团体,成立了反对警职法改恶国民会议。全劳会议(全日本工会)、新产别会议、中立劳联、护宪联合、全日本农民工会以及各种妇女团体、青年团体等,都参加了这一国民会议。由于全劳会议等主张不让共产党参加,所以共产党没被允许参加。10月中旬,44个都道府县都成立了反对警职法的联合斗争组织。

反对修改警职法

反对警职法改恶国民会议于10月25日、10月28日、11月5日、11月7日接连几次组织了全国统一行动,开展了集会、示威、罢工。10月27日,政府列举了勤务评定斗争、反对道德教育指导者讲习会斗争、王子制纸争议(1958年4月至12月)等例子,

来说明为阻止集团性暴力行为有必要修改警职法，发表了谴责工会决意进行非法政治罢工的声明，企图牵制反对运动。但没有什么效果。

以反对运动高涨为背景，社会党在国会也采取强硬态度，以图阻止对修改案的审议。在政府与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岸首相这种蛮干做法的批评。经济企划厅长官三木武夫、自民党总务会长河野一郎等，主张放弃修改警职法。可是，岸信介为了达到坚持修改警职法的目的，于11月4日以突然袭击的手法让国会强行表决通过延长会期30天。这成为使反对运动进一步激化的原因。

社会党则认定临时国会已于11月7日结束，以后拒绝到会。国会处于瘫痪状态。新闻舆论等也指责岸首相的蛮干行为。岸信介终于断了修改警职法的念头，11月22日同社会党铃木茂三郎委员长进行了会谈。众议院因对警职法审议不下去而自然休会。参议院也在审议完补充预算案及其相关法案后宣布休会。从修改警职法的提出到它成为废案为止，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引起了很大骚动。这件事使广大的国民进一步加深了“岸信介是个反动人物”的印象。这一事件成为反体制势力开展更有广泛基础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起因。

在勤务评定等问题上遇到日教组和在野党势力激烈抵制，又预见到修改安保条约也难以被批准的情况下，岸信介认为有必要增强警察权力以抑止反对斗争，为此想一下子就把修改警职法变为现实。这就是大选后第二届岸内阁成立后说过“长期稳定不如短期果断”的岸信介的做法。然而，增强警察权力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会动摇战后民主主义的根本，因而岸信介一意孤行的做法在国民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反对运动一下子发展到超越社会党左派、总评、日教组等的影响力范围的规模。团结了

广泛势力的反对警职法运动能够在全国迅速组织起来，使社会党与总评的领导者增强了自信心。反对警职法改恶国民会议，后来成了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的母体。岸信介所采取的方法，与其意图适得其反，结果是促使反对势力迅速加强，使阻止修改安保条约斗争的基础一下子扩大。

岸信介在修改警职法问题上的失败，使自民党内矛盾激化。反主流四派（池田派，三木—松村派，石井派，石桥派）提出追究政府与自民党干部的责任，并要求更新人事。岸信介根据他们的要求于1959年1月12日进行了内阁改组。起用福田赳夫任干事长。期待担任干事长的河野被排斥在外，从而加深了河野与岸的对立。

修订安保条约谈判

在东京举行的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谈判，1958年10月4日岸首相、藤山外相、麦克阿瑟大使三者会谈开始，后来就在藤山外相与麦克阿瑟大使之间进行。美方提出了新安保条约草案，以此为出发点，双方就主要论点交换了意见。

美方草案的前提是，根据1948年美国联邦议会的“范登堡决议”，^①为了维持军事同盟关系，双方以建立在“连续而有效的自助及相互援助的基础上”为条件，可以行使个别性及集团性自卫权。

美方认为，第三国对日本的攻击将被看作是对美国的威胁，美国将与日本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日方也要把第三国对美国

① “范登堡决议”，是1948年6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项决议。主张美国积极推进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体系。范登堡是当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译注

的攻击看作是对日本的威胁而与美国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如不承认这种“集团性自卫”的原则，就不能算是“双边性”条约。然而，作为鸠山、岸两内阁执政党的日本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尽管曾一再提起修改宪法问题，但改宪派在国会没法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当前还没有可能对严格限制日本行使军事力量的宪法第9条加以抛弃或修改。考虑到国内的政治气氛，政府不得不解释说：按现行宪法，日本没有行使集团性自卫的权利。因此，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日本要求美国帮助日本进行自卫，而对美国的防卫，日本却不能参与。

关于修订安保条约，日方特别提出了下列要求：

(1) 明确安保条约同联合国宪章的关系。

(2) 在明确规定美国对日本防卫义务的同时，也应明确记载日本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宪法范围内的。

(3) 美军的配备以及当美军为防卫日本以外地区进行战斗而使用日本基地时，要事先同日本政府协商。

(4) 取消现行安保条约中关于“为镇压由一个或两个以上外部国家挑动或干涉在日本国内引起的大规模内乱及骚扰”，可以动用美军的规定。

(5) 现行安保条约没有规定期限，新安保条约应明确规定期限。

日方的这些要求中，与范登堡决议相关而问题最大的，是第(2)点关于防卫义务的规定。美方认为，如果日本希望安保条约成为“双边的”，日本当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美国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受到宪法的制约，而且不能不看到，这个宪法，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

此外，尽管考虑到宪法上的制约和日本的政治形势，美国很难期待日本的军事行动，但美国判断，维持日美同盟，对美国来

说还是重要的。出于这种判断,不能不承认,考虑到日本的国民感情,对容易招来“从属美国”批判的现行安保条约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改,是必要的。

美方虽然强调“集团性自卫”的原则,但最后还是采纳了日方的要求,对条约的“双边性”,回避了日本不能接受的严格要求规定,采取了暧昧地表示承认的表达方式。可是,正是这种暧昧,后来在国会上引起很多争论,更起了给反对运动火上加油的作用。

麦克阿瑟大使与藤山外相的谈判,由于日本国内政治状况的不稳定而一再中断。1958年10月22日的第二次修订安保条约谈判中,美方提出了新条约的基本草案,主张防卫的适用范围为“西太平洋”。10月23日,岸首相在国会上说:“自卫权适用到冲绳”。他在31日的发言中又把“西太平洋”从适用范围中去掉了。11月13日,藤山外相申明:由于在警职法问题上国会陷入混乱状态,因此,谈判将延期到正常化之后再行进行。12月16日的第三次修订安保条约谈判中,藤山以“国内舆论与自民党内部情势的原因”,要求谈判延期,因而谈判暂时中断。

在这一时期,苏联和中国等也早已开始对修订安保条约谈判进行了牵制性发言。中国外长陈毅于11月19日就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发表声明,表示中国期待日本成为中立国家。12月2日,苏联政府送来了希望日本实行中立政策的备忘录。1959年1月12日,岸内阁进行了改组。同日,北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对修订安保条约进行了谴责。

1月22日,自民党通过了增加“排除集团暴力”等内容的新政策大纲。1月24日,自民党召开大会,提前实行总裁选举。岸信介得320票,松村谦三得166票,岸信介再次当选总裁。1月27日,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说:“日本的中立化会招致孤立”。同日,

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在苏联共产党大会上强调东西两阵营的“竞争性共处”，提倡使远东、太平洋地区成为非核地区。2月2日，岸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赫鲁晓夫的非核地区提案是不现实的。3月12日，伊能防卫厅长官在一次发言中说：“为了自卫，有核武器也不算违反宪法”。

反对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运动

1959年2月28日，总评主持召开了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国民大会。

3月9日，社会党访华团团团长浅沼稻次郎(社会党书记长)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致词说：“美国正在中国的组成部分台湾扩大实力，而且在日本占领着冲绳。美国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他还在3月12日的演说中说：“亚洲的非核武装与撤除外国军事基地，是两国国民的共同课题。必须把美帝国主义看作是两国国民的共同敌人，对它进行斗争。”3月17日发表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与浅沼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阐明了中方的立场，即：如果岸内阁承认停止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这三条原则，现在的僵局就可以打开；希望日本走和平中立的道路。

3月28日，阻止修订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成立。参加反对警职法改恶国民会议的团体，基本上都成了这个国民会议的成员，只是全劳会议持不参加态度，而共产党则以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阻止修订安保国民会议于4月15日组织了第一次统一行动。这种统一行动，在1959年共有10次，1960年5月19日新安保条约被强行通过之前共有5次，到1960年10月20日为止又有8次。在全国各地进行了集会、示威。在后期，有实力的工会还组织了定时罢工，国铁也大量停止运行。在东京，为了

对付国会对新保安条约的审议，几次组织国会请愿示威，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加。

1959年3月30日，东京地方法院伊达秋雄院长，对在东京的反对扩大立川基地斗争中发生的“砂川事件”（反对派因进入基地内，以违反刑事特别法而被起诉），以“美军驻留日本违反宪法”而作了无罪判决。检察院则向最高法院作了“越级上诉”，最高法院于12月16日作出了取消原判决的结论。但是，伊达判决却对宪法与安保条约的关系作出了一种法律性解释，这对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和反对修订安保条约的斗争，是个鼓舞。

4月9日，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纲要与调整行政协定纲要。4月13日，藤山外相与麦克阿瑟大使之间的修订安保条约谈判再次进行。5月15日，在茨城县矶崎海面上发生了当地200艘渔船包围美军船只，阻止美军轰炸训练的事件。

6月2日，进行了参议院议员选举。这是在“警职法骚动”之后，在修订安保条约谈判开始之后举行的国会议员选举。从中可以看出国民的意向。投票率为参议院选举史上最低的，只有58.7%。在改选的127个议席中，自民党获71席（包括补缺2席），占55.9%。包括非改选议席在内，自民党在参议院的议席，由1956年7月8日参议院选举后的124席增加到这次选举后的135席。社会党由上次选举后的81席增加到这次选举后的84席。绿风会的席位大减，失去的席位大半为自民党所得。创价学会^①在这次选举中首次参加国政选举，值得注意的是，6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参议院选举表明，一般国民对修订安保条约问题及日中问题等外交案件不太关心，尽管发生了警职法骚动，对

① 即现在的公明党的前身。——译注

岸内阁与自民党的支持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岸由此而增强了自信心。

6月16日，总评的太田议长与岩井事务局长发表谈话，希望社会党与共产党加强联合斗争。

6月18日，岸进行了内阁改组。除了藤山爱一郎外相与佐藤荣作藏相外，其余阁僚全部更换。岸曾要求池田勇人与河野一郎入阁。河野坚决要求出任干事长，并要求更换佐藤藏相，结果，拒绝入阁。池田则就任通产相。防卫厅长官由赤城宗德担任。福田赳夫任农相。川岛正次郎再次就任干事长。

6月5日至8日，全学联召开大会。会上，以于1958年6月与日本共产党总部发生冲突的托洛斯基派集团为中心的“反代代木系”，同受共产党影响的“代代木系”的对立表面化了，结果，反代代木系掌握了领导权。从这时起，全学联事实上分成两派各自行动。反代代木系主导的全学联主流派，在阻止修订安保条约的斗争中，开展了更加尖锐的行动。为此，他们屡屡同共产党产生对立，也往往同国民会议发生摩擦。

6月30日，发生了美国军用机坠落到冲绳宫森小学校的惨事。有17名居民与学童死亡，轻重伤者达121人。

为了赶在岸首相7月访问中南美与西欧之前签订新安保条约，政府加紧了谈判进程，并在6月中旬取得了一致意见。可是，6月下旬，日本政府却要求推迟新条约的签订。据推测，可能是自民党内反主流派的河野一郎、三木武夫、松村谦三等对修订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而且从优先考虑日中关系的角度来反对修订安保条约，因此，岸认为有必要在党内进行调整。直到10月26日，岸才在自民党两院议员大会上使新安保条约得到同意。

在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与6月的参议院选举中都受到挫折的

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的对立表面化了。右派在以下几点主张上同左派发生了对立：

(1) 社会党必须明确具有两大政党时代在野党的性质，必须从“阶级政党”转变为“国民政党”。

(2) 在反对修订安保条约斗争上，给国民一种同共产党联合斗争的印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阻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有必要排除共产党及共产党系团体，进行改组。

(3) 对安保条约，不能只喊反对修订，有必要提出异案来。

(4) 社会党总是被总评牵着鼻子走，失去了党的主体性。这点有必要加以纠正。

原书记长西尾末广公然在各地谈论这些主张，并认为修订安保条约在原则上是可以承认的。9月12日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上，左派要求将西尾除名的提案被否决，但通过了将西尾交党的管制委员会(纪律委员会)处理的决议。西尾派对大会采取了集体抵制的态度，并成立了再建同志会。10月15日，社会党的管制委员会在只有左派参加的条件下通过对西尾给予谴责处分的决议。10月16日，在西尾派缺席的情况下社会党大会继续开会。17日，委员长铃木茂三郎、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第四次当选。西尾派与河上派的一部分等社会党右派，于10月25日脱离社会党，组成了独立的会派(社会党俱乐部)。1960年1月24日成立了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为西尾)。当时民主社会党在众议院有40个议席，在参议院有17个议席。

4. “安保”与“三池”

经济高速增长的开始

1959至1961年日本经济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好景气。那就是

出现了超过1955至1956年“神武景气”的“岩户景气”。1957年春为克服国际收支赤字而实施的金融紧缩政策，引起了“锅底萧条”，一直持续到1958年中期。1958年秋，经济开始好转，迎来了设备投资、个人消费、出口全面顺利增长的创记录高涨时期。这次繁荣一直持续到1961年下半年再度出现国际收支赤字及为此而再次采取金融紧缩政策为止。后来以1970年固定价格计算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统计表明，1956至1958年度的实际年增长率为6—8%，1959年度为11.2%，1960年度达12.5%，1961年度更高达13.5%。这说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经开始。

整个50年代实现的经济增长，比预料的要高。结果，国民生产总值水准大幅度提高。以时价表示的国民生产总值，1951年度为54815亿日元，1960年度达162070亿日元，增长了2倍。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也增长了约1.1倍。这一时期的人口，由8454万人增加到9342万人，只增长约0.1倍，因此，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0.9倍。国民的消费水平也因此而上升，消费结构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

1959年7月政府发表的《经济白皮书》指出，设备投资的高涨与消费的旺盛，对经济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有了显著增长。以家用电器为中心的电气机械工业、照相机等精密机械工业的增长尤其突出。此外，由小型卡车市场的扩大逐渐转向发展小轿车的汽车工业的发展，也开始引人注目。这一阶段，机械工业还是劳动密集型工艺居多，它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扩大就业的效果。到1960年，劳动市场已由供大于求变为求大于供。劳动力不足使工资全面上升。双重结构明显地趋于消除。

然而，经济增长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开始发生严重的公害。很多国民还没有觉察到它的严重性，新闻界也没有对此进行充

分的报道。

1958年6月10日,千叶县约700名渔民为抗议本州江户川制纸工厂排放废水,涌进该厂,遭到警察驱赶,结果一百多人负伤。这一事件成了政府制订公用水域水质保全法与工厂排水等规制法(1958年12月公布)的动因。但是,对于象新日本氮素(后改为窒素)水俣工厂(熊本县)的废水所造成的更严重的危害,以及三井金属矿业神冈矿业所的废水所造成的神通川流域的疼痛病(富山县)等,却没有追究公害的真相,也没有采取防止对策与对救济被害者的对策。

已经引起多起死亡的水俣病,被当作“怪病”来处理。许多患者只好从当地迁走。公司方面阻挠追究真相,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对策。熊本大学医学部的专家们,努力查究了水俣病的发病原因,1959年7月,他们发表见解,认为新日本氮素水俣工厂排出废水中的水银,很可能是水俣病的原因。新日本氮素、县议会等反驳说,专家们的这种见解“不过是无根据的推论”。因不知火海^④的鱼鲜类遭水银污染而导致水俣病,这一地区的鱼卖不出去了。遭受打击的渔民开始与新日本氮素谈判。公司方面一再强调原因不明,打算拿出点“慰问金”了事。渔民方面则一再涌进公司。结果同警察发生冲突。1959年11月2日,2000渔民在水俣市内游行示威。渔民们提出要集体与公司谈判,遭到拒绝。于是,渔民们闯入工厂内,同警察发生冲突,有一百多人受伤。

结构性萧条的表面化

出乎预料的高速增长的实现,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比预料还要快的变化,促进了几种产业的夕阳化。为消除经济过热所造

^④ 不知火海是熊本县西南部、九州本土和天草诸岛环绕的一个内海,也叫八代海。——译注

成的国际收支赤字，政府一再实施金融紧缩政策。虽暂时把增长率降了下来，制止了过热的现象，但却给结构性夕阳化产业带来了很大打击。1958年“锅底萧条”时，纤维、海运、煤炭等产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只好裁减人员，并向政府求助。纤维产业在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下，组成联合企业，缩短作业时间，报废一些设备，以摆脱不景气。合成纤维的登场，把原来的化学纤维（主要是人造纤维）产业逼到了窘境，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和削减雇用人员。1958年1月，5家化学纤维公司解雇了6503人。公司答应待经济好转时重新雇用，并得到全国纤业联盟的同意。

随着能源迅速向石油转换，煤炭产业的夕阳化也日益明显。

1958年春，日本煤矿工会组织了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但经营者方面持强硬态度，拒绝增加工资。为此，从3月13日起开始进行24小时罢工，直到6月18日劳资双方接受了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斡旋方案才结束，斗争共进行了90多天。由于产业夕阳化和经营危机的深刻化，经营者方面也陷入了不能让步的地步。经营者方面认为，为了推进企业合理化，有必要限制工会的发言权与交涉权。为此，他们决心针锋相对。

1959年1月19日，三井矿山向工会提出了通过合理化来实现公司重建的方案。内容是：征集6000名希望退职者；大幅度降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与福利卫生方面的费用；加强职务责任制等。1月27日，三井煤矿工会联合会指令开展要求撤回合理化案的斗争。3月以后，以三池煤矿为中心开展了连续罢工。然而，4月6日劳资双方却以接受1324人（其中三池煤矿152人）退职为条件达成协议。几乎同一时期，明治、佳友、古河、杵岛、日铁等煤炭企业也提出了合理化方案，引起了争议。这些企业也都在三井矿山争议的前后以接受包括裁减人员在内的合理化方案而达成协议。

三井矿山的退職应募者人数远没有达到当初合理化方案的要求,因此,矿山方面提出了第二次合理化方案。三井煤矿工会联合会对如何对待公司方面的合理化提案,意见分歧。砂川、芦别、山野、田川各煤矿的工会,为了避免招致指名解雇,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合理化方案。而三池与美呗的工会则认为公司方面的合理化方案实质上带有破坏工会活动的意图,因而主张开展强有力的斗争。事实上公司方面确实把工会的生产第一线斗争看作是妨碍生产的行为,表示要把生产第一线的工会活动家以“妨碍生产者”的名义列为解雇对象。

三池煤矿工会

工会方面采取强硬姿态的是美呗煤矿与三池煤矿。其中,美呗煤矿的煤层条件太差,有可能降为次要的公司。为此,实质上只剩下三池煤矿的工会在坚持斗争。

支撑三池煤矿工会斗争的,是日常的生产第一线斗争。煤矿的生产第一线斗争同工人的安全密切相关,是工会斗争力的重要基础。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危险劳动的煤矿,保持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发言权,要求采取万全的安全对策,改善劳动条件,这也是关系到工人生命的问题。在三池煤矿,当生产第一线斗争加强时,灾害事故就大大减少。而在1960年三池工会受挫,企业优先考虑合理化而牺牲了安全措施后,就发生了未曾有过的大灾害。

三池煤矿工会的另一支柱是“学习”。九州大学教授向坂逸郎等组成的社会主义协会小组,同三池工会全面合作,以提高生产第一线活动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缺陷,提高阶级意识,增强了三池的工人运动素质。

尽管三池工会阻止合理化的斗争遭到挫折,但以对提高三

池工会的阶级意识与斗争性作出了较高评价为背景，向坂小组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对后来社会党一总评系的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此，清水慎三作了如下论述：

“向坂理论被新闻媒介一般评价为教条主义。但笔者通过多年实际感受，认为它的特点就在于是工人很容易理解的理论。因为是通过现实感觉与现状分析来使理论通俗易懂，所以容易为人们很快接受，并成为一种信仰和信条。它成为‘三池的光荣’的支柱，并为社会党、总评所公认或半公认。因此，向坂社会主义协会在60和70年代得到了扩大与加强。”（清水慎三编著《战后工会运动史论》P.474）

8月29日，三井矿山的公司一方，提出了第二次合理化方案。其内容是：在三井6个矿山合计裁员4580人（其中三池2210人）；大幅度削减工资；减少福利相关支出；另外分设三池制作所（机械部门）；建立生产第一线纪律（排除工会的生产第一线斗争）。三池以外的煤矿，公司方面采取“拍肩膀”（管理人员向工人个别进行非正式退职劝告）等方式，达到了希望退职的预定人数。可是，三池煤矿却只有142人表示愿意退职，而预定人数为2210人。

11月，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中山伊知郎会长曾试图就三池的问题进行斡旋，但没有成功，集体谈判于11月12日决裂。11月13日，煤炭工会所属14个大公司的工会进行了反对企业整顿的24小时罢工。12月2日，公司方面将三池煤矿的1492人实行指名劝退。被指名劝退的人员中，包括很多工会活动家、社会党员、共产党员。显然，公司方面的目标之一，是削弱工会的影响。12月8日，工会方面在三池地区进行了“解雇奉还示威”。但是，12月11日，公司方面仍旧发出通告，对1214人实行指名解雇。这样，三井矿山的三池煤矿，便成了劳资全面对立

的场所。

新安保条约的签订

1959年11月21日，藤山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恢复谈判，就行政协定的各条款进行了最后磋商。

11月27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开展了第八次统一行动。以请愿名义蜂拥在国会周围的示威队伍中的全学联的队伍拥进了国会。接着，工会等示威队伍也进入国会。据称，拥进国会的示威队伍，人数共达约2万人。

自民党要求对煽动示威队伍的社会党议员进行惩罚，并向国会提出了国会周围示威限制法案(12月24日众议院通过，12月26日提交参议院审议)。

就在发生闯入国会事件的11月27日，从深夜到翌日早晨，众议院不顾社会党的反对强行通过了与南越签订的赔偿协定。这种同南越政府签订赔偿协定来充当对全越南进行赔偿的方针，遭到强烈怀疑与批评。国会在审议时不断发生纠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是发生在北越。支付赔偿当然应该对北越更多些。南方的越南共和国政府无视日内瓦协定，拒绝进行统一选举，使越南陷于分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越政策，同南越进行了谈判。这事实上是对南越的支援。这一问题暴露了岸内阁东南亚政策的本质，招致了对岸内阁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又与在修订安保条约问题上对岸内阁政策的不信任联系了起来。

1960年1月5日，三井矿山三池煤矿的工会顶回了公司方面对1214人的指名解雇。

1月6日，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谈判达成了协议。这是自1958年10月岸、藤山、麦克阿瑟会谈以来，经过25次正式谈判取

得的结果。

新安保条约叫做“日美互助及安全保障条约”，由前言及10条正文构成。此外，还就关于驻日美军的配置、装备以及装备的重要变更与美军以日本为基地的作战行动的事先协商问题进行了换文，并就为驻日美军提供设施、地区以及驻日美军的地位，签订了“日美地位协定”（即所谓行政协定）。在这些文件中，日方所提出的重视联合国宪章、要考虑新宪法上的制约、剔除“内乱条款”等要求，基本上都包括进去了。条约期限为10年。10年后，如果当事国的任何一方提出废除通知，在1年后即可解除条约。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到冲绳和小笠原是否包括在适用范围内的的问题。如果这两个群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当然应作为日本领土包括在适用范围内；在归还之前就把这些地区包括在适用范围内，是不妥当的。为此，条约中对此没有提及。

如果同1951年9月签订的旧安保条约相比，新安保条约的不平等感确实少了。然而，虽说附加了在宪法制约基础上这一保留条件，但却明确载入了“为应付共同的危险”，日本将与美军合作这一提法，而且关于美军驻日的目的，除了“日本国的安全”外，还写进了“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后来，围绕“远东范围”引起了争论。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即：允许驻日美军可以在广大范围内采取作战行动的结果，不是很容易使日本卷入战争吗？

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说：“日美两国在修订日美安保条约的名义下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这是日本的反动派与美国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重大步骤。”

1月16日，岸首相、藤山外相等全权代表团，为签订新安保条约，启程去华盛顿。全学联的学生等约700人在羽田机场大楼

内静坐示威。警察强行把他们赶走。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在东京日比谷召开了反对签约中央大会。据主办者称,有2万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1月19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新安保条约及有关文件。日方代表为岸首相。美方代表为代替1959年5月去世的杜勒斯任国务卿的C.A.哈特。

1月20日,岸首相公布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与日本皇太子访美的计划。1959年4月10日,日本皇太子举行结婚仪式。当时曾向全国电视播放了他们乘马车的盛况。国民对此记忆犹新。

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与三池斗争

1960年1月25日,三井矿山资方决定三池煤矿停工(为对抗工会的斗争而暂时关闭事业所)。三池工会开展了无限期罢工。

2月1日,岸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说:“日美关系已进入了新的阶段”。2月9日,藤山外相在国会答辩时说:“日美安保条约是纯防卫性的。”2月19日,众议院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开始审议新安保条约。

2月24日,苏联向日本驻苏大使门胁季光发出通告,说日美新安保条约是侵略性的。2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访问印尼的议会上,攻击日美新安保条约的“侵略性”。2月27日,岸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说,新安保条约是防卫性的,赫鲁晓夫发言是干涉内政。

3月16日,全学联召开大会。这次大会因是主流派把反主流派排斥在外强行召开的,实际上已陷于分裂状态。

3月17日,三池煤矿组成了第二工会。第二工会把该矿约

1.5万名工会会员中的四分之一(近3600人)拉了过去。为了分化开展无限期罢工的工会,资方拼命开展拉拢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第二工会的组成对第一工会是个打击。为支援三池斗争,日本煤矿工会本来预定在4月5日以后举行全体煤矿工人罢工。在这一形势下,日本煤矿工会的领导决定改变方针,让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出面就三池问题进行斡旋。

3月23日,社会党召开第十七次临时党大会,24日选出了委员长浅沼稻次郎、书记长江田三郎等新领导人。

3月28日,三池的第二工会方面,手持棍棒、竹矛,试图突破第一工会的纠察线。为此,双方发生激烈冲突。第一工会方面有一百多人受轻重伤。29日,暴力团员持刀袭击了纠察线中的第一工会会员,第一工会会员久保清被杀害。

从2月到3月,社会党与政府在国会上围绕“远东范围”等一再展开论战。对于社会党议员执拗的质问,政府方面答辩说:“远东,是指菲律宾以北,日本周围”,“远东包括金门与马祖在内,但不包括北千岛”;“驻日美军向冲绳移动,不能成为事先协商的对象”。金门与马祖是中国大陆沿海的岛屿,为台湾占有,也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展开炮击战的场所。千岛领土问题日本与苏联有争执,安保条约适用到千岛的什么范围,是微妙的。此外,无条件地承认驻日美军向尚无施政权的冲绳移动,结果就很容易让驻日美军在不同日本协商的情况下以冲绳为基地再向更广的范围采取战斗行动。本来日本对承认集团性自卫处于困境,而条约却又要表达为了执行美军的远东战略需要保持驻日美军的行动有效性,因此,条约的规定不可避免地带有暧昧性。在在野党的质问下,政府的答辩屡次出现混乱。因此,审议只好中斷。

社会党则以国会外大众运动的高涨为背景,在审议中制造

混乱,以达到阻止批准新安保条约的目的。尽管如此,1960年度政府预算案还是于财政年度末的3月31日按原案通过。4月5日,自民党提出了众议院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的表决将于4月22日举行的日程安排,但遭到在野党拒绝。同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开展了第14次统一行动。作为统一行动的一环,合理化劳联组织了半天罢工,全旅劳联、全港湾等工会组织了2小时罢工,公劳协、钢铁、私铁等则举行了生产第一线大会。这一时期,有很多工会还把这种斗争作为要求增加工资的“春季斗争”的一环来开展斗争活动。

4月6日,新任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委员长藤林敬三,为解决三池的劳资纠纷提出了斡旋案。这是一个对工会一方不利的方案。人员整顿实质上还是按照公司方面的提案,只是在名义上把指名解雇换成了希望辞职。

U2飞机事件

4月10日,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演说中提到:“假若缔结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互不侵犯条约,中苏条约中的对日条款也可能去掉。”

4月13日,外务省公布:艾森豪威尔的访日日期定在6月19日。

日本煤炭工会从4月9日起召开临时大会,就三池问题进行了讨论。17日得出了拒绝藤林斡旋案的结论。三井矿山工会联合会倾向于采取除了三池工会外接受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斡旋案的方针。理由是:日本煤炭工会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工会都倾向于接受希望辞职的办法,只有三井矿山在继续坚持斗争,但也已到了极限。然而,三井矿山以外的日本煤炭工会联合会的主力工会代表们,却反对接受斡旋案。表决的结果,决定拒绝

斡旋案。为此，三井矿山工会联合会的代表退出会场。日本煤矿工会联合会大会于18日闭会。该联合会干事以及三井矿山以外的13个大工会的代表，同三池工会代表组成了现场指导委员会，继续进行斗争。

4月20日，岸首相在答辩中说，“新安保条约中日本方面对驻日美军的防卫合作义务，不是集团性自卫权，而是行使个别性自卫权。”同日，自民党在众议院安保特别委员会上强行通过了审议日程。川岛干事长说：“单独审议也在考虑中。”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对全学联的过激行为进行了批评，决定要全学联进行反省。对此，全学联主流派发表了谴责声明。

4月21日，由文化人、艺术家等组织的批判安保会议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执政党的国会运营方针，要求岸内阁引退。

同日，三池煤炭工会决定脱离三井矿山工会联合会，直接参加日本煤矿工会。

4月22日，自民党不顾在野党的反对，强行让国会讨论安保特别委员会的审议事项。国会陷入混乱状态。社会党发表了非常事态宣言。思想科学研究会发表声明，主张在安保条约表决前应该解散国会实行大选。总评与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召开了争取三池斗争获胜、阻止修订安保条约中央奋起大会，并在三井矿山总公司举行了示威游行。4月23日，自民党提出了要求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提交中间报告的动议。这一天，参众两院议长要求警察当局出动5000名警察，以应付示威活动。社会党对此提出了抗议。同日，民主社会党发表了对安保条约的基本态度。认为应该规定在1年前预先通知就可以解除安保条约，必须删去新安保条约的第3条(发展防卫能力)与第5条(共同应付危险)的有关条款。

5月5日，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在苏联最高

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侵犯苏联领空的美国超高空侦察机 U2 型喷气机，于5月1日被击落，驾驶员被擒获。1959年9月24日曾发生过同类型的 U2 型机在藤泽机场迫降的事。11月29日的《少年星期日周刊》对此作了报道。12月1日在国会上曾对此有过紧急质问。当时，藤山外相回答说这种飞机是气象观测用的美国军用飞机。在超高空侦察机侵犯苏联领空并在苏联国内被击落这种确凿的证据面前，美国不得不于5月7日承认了侦察飞行这一事实。后来用军事侦察卫星来监视对方的情况已司空见惯，可在当时却是依靠这种侦察机来收集情报。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商定从1960年5月16日起举行美英法苏四国会谈。但是，5月16日巴黎会谈一开始，赫鲁晓夫就强烈谴责了美国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对会谈进行了抵制。5月17日，首脑会谈以流产而告终。

强行通过

U2 飞机事件使日本国民再次认识到美苏对立的实态，尤其是看清了美国经常有意地侵犯别国领空。这样就使阻止修订派关于日美新安保条约增加了把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的主张更具说服力了。

5月9日，在众议院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社会党认为厚木基地的美军 U2 飞机也同样在侵犯苏联领空进行侦察飞行，并向政府追问此事。5月1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称在日本的 U2 飞机没有进行收集情报的活动。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收集情报是必要的，为了防止突然袭击，必须进行空中侦察。

5月12日，群馬县商工联所属 640 家商店，为表示反对新安保条约，进行了罢市。

5月14日，鉴于国会形势紧迫，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

发表“非常事态宣言”。地方代表、工会会员、学生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成员，不断地到国会去请愿，并在东京都内进行示威游行。据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宣布，参加这些活动的人数有 10 万人。社会党宣布，反对安保条约请愿的署名者，达 1350 万人。

5月17日，自民党总务会与议员大会商定，将延长国会会期，以便尽早让众议院通过新安保条约。自民党干事长川岛等人决意要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

5月19日，总评指令进行紧急请愿示威。全学联也指令将20日的示威提前一天举行。示威队伍包围了国会周围，人数据说有 3 万人。当晚，众议院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上强行打断质问。晚上10点50分左右，约 500 名警察进入国会，把为阻止延长会期而在议长室前静坐示威的社会党议员团和秘书团强行拖走。在一片混乱中，强行通过了延长会期 50 天和新安保条约。连自民党议员中的大多数，起初也认为只是对延长会期进行表决。自民党议员中，三木武夫、松村谦三、石桥湛山、宇都宫德马等，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河野一郎在察觉了连新安保条约也要强行通过的气氛之后，中途退出了会场。

岸和川岛之所以不仅要强行延长会期而且还要强行通过批准新安保条约的决议，是因为他们计算好了日期，以便 6 月 19 日艾森豪威尔访日之前新安保条约能得到批准。根据宪法第 61 条，条约的批准，同预算的决定一样，在众议院通过之后 30 天内参议院如不议决，则以众议院的议决作为国会的议决。即所谓“自然成立”的规定。众议院在 5 月 19 日议决之后，即使参议院的审议中止，在 6 月 19 日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前一天，新安保条约的批准就算自然成立了。实际上，新安保条约与相关文件的一揽子强行表决，是 5 月 20 日凌晨零点 19 分进行的，所以，新安保条

约等的自然成立应该是6月19日,即艾森豪威尔到达日本的当天。

5. 新安保条约的通过

抗议运动的扩大

5月20日,社会党、民社党、共产党分别发表声明,认为众议院对新安保条约的表决无效,并向政府与自民党提出抗议。接着,又对国会的审议进行抵制。多数团体也发表声明,抗议政府与自民党的强行表决。全国各地都组织了抗议行动。在国会周围,据说有10万人冒雨举行请愿示威。全学联主流派组织的7000人示威队伍中,有一部分人冲进了国会附近的首相官邸,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40多人受伤。警视厅在国会正门前用装甲车筑成路障,以防示威队伍冲入国会。据报道,群馬县为抗议而罢市的商店达1000多家。从这天起,国会周围连日有示威活动。各种地方组织也派许多代表到东京示威。许多不属于任何特定组织的市民,也出于对民主主义的危机感,自发地参加了示威活动。示威队伍在都内行进,尤其是在银座等地区因示威队伍呈Z型队形,致使交通长时间停止。

5月28日,岸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说:“屈服于国会外的运动,就无法维护日本的民主政治。我坚信,有许多人是在‘无声地’支持我们。”为反驳岸这种说法,一般市民纷纷组织起“无声之会”,参加示威活动。

5月26日,为了对抗三井矿山所属三池煤矿方面用实力来排除第一工会纠察线的做法,总评、日本煤炭工会以及三池煤矿第一工会呼吁全国支援1万人。

6月4日,掀起了阻止修订安保条约斗争的第一次高潮。据

总评宣布,以总评、中立工会联合会系统的工会为中心,有76个行业工会460万人以及学生等团体、中小企业者100万人参加了斗争。交通系统的工会组织了早晨上班高峰时间罢工或现场集会。在品川车站等处,也发生了全学联静坐示威的队伍同国营铁路工会对立的事件。据报道,到国会示威的人数达12万人。

同日,三井矿山公司方面发布通告,宣布关闭三池港务所,并禁止第一工会会员进入该港务所内。第一工会方面在叫做“加料斗”的装运煤炭设施处设置纠察线,使第二工会会员的操作无效。公司方面则依靠警察企图强行突破这一纠察线。双方的激烈冲突可以想象。

6月10日下午,为安排艾森豪威尔访日,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官哈格蒂到达日本。学生与工人队伍拥进羽田机场静坐示威,并包围了哈格蒂的汽车,阻止他的活动。警察驱散了示威队伍。哈格蒂则乘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脱围。

6月11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组织了第18次统一行动。据宣称,全国366处共有250万人(东京23.5万人)参加了斗争活动。自民党内外都要求将艾森豪威尔访日日期推迟,但岸坚持按原定计划不变。在哈格蒂事件之后,岸要求国家公安委员长和警察厅长官采取万全的治安对策,同时对赤城防卫厅长官说:“为了加强对艾森豪威尔的警备,能否出动自卫队。”赤城回答说:“为治安而出动自卫队,不会得到国民的支持。那样不但会招致对岸内阁更多的谴责,对自卫队也会带来坏的影响。”拒绝了岸的要求。

6月12日,艾森豪威尔从华盛顿启程,开始了他的包括访日在内的远东之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6月14日一致通过日美新安保条约。16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也获得通过。

6月13日,警视厅以涉嫌哈格蒂事件为由,强行搜查了东京

教育大学、法政大学及日本钢管川崎工会。

6月14日，三池煤矿公司方面为对抗第一工会在三川矿装卸料斗处长时静坐，启用运输船来装卸资材，同第一工会组织的船团（“三池舰队”）发生了冲突。

六一五事件

6月15日，总评与中立工会联合会系统的工会发起了第二次阻止安保条约斗争高潮。据宣布，有111个行业工会 580 万人参加了斗争。

这一天，在国会周围，称作维新行动队的右翼团体袭击了无防备的示威队伍。话剧演员、一般市民等约 80 人受伤。对此，警察竟旁观而不加阻止，引起了示威参加者的激愤。接着，全学联主流派的学生在国会南便门附近同警察发生冲突，并大举闯入国会院内。警察包围了国会，对闯入的学生进行袭击和驱赶。下午 7 点左右，在国会院内遭警察袭击的示威队伍中的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死亡。学生们当场召开了抗议集会。警察无视社会党议员的斡旋，再次对学生进行袭击，把学生从国会院内赶了出来。正在采访的记者和在国会外保持平静的示威队伍、行人、大学教授团等，也遭到警察的暴力。到凌晨为止，共有 182 名学生被捕，1000 多学生和市民受伤。6月16日，在东大、早大、明大、一桥大、东京教育大、法大、东京女子大、东海大、立大等都内各大学内，学生和教授都召开了抗议集会，并决定举行罢教活动。总评律师团以杀人罪控告警视总监。工会会员、市民、学生冒雨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据说人数达 10 万人。这一天，岸内阁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推迟艾森豪威尔访日日期。

17日，7家主要报社以“排除暴力，维护议会主义”为题发表共同宣言。宣言说：“民主主义，应该是通过言论来争辩，以任何

理由诉诸暴力，是断然不能允许的。一旦容忍暴力成为社会风潮，民主主义就会灭亡，就会发生危及日本国家存亡的重大事态。”宣言要求政府按照国民的理智来表明决心，也要求社会党、民社党回到国会，应该使事态得到妥善解决。同日，财界四团体（经团联，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发表声明，指出：“应该排除暴力，拥护议会主义，并努力恢复国际信誉。”国立大学协会发表了警告学生运动的声明。这一天，在议员接待所附近受理国会周围示威队伍请愿的社会党顾问（社会党前委员长）河上丈太郎议员，被一右翼少年持刀刺伤肩膀。

18日，在东京大学举行了桦美智子的联合慰灵祭奠活动。事后参加者的示威游行队伍向国会进发。按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发表的数字，这一天到国会去示威的人数达33万人（警视厅发表的数字为13万人）。

19日，新安保条约按“自然成立”的规定在国会获得通过。20日，岸首相向川岛干事长表达了“新安保条约批准书交换后打算表明引退”的意愿。这一天仍有工会会员和学生到国会和外务省去示威。21日，政府在将新安保条约交各大臣传阅征求意见后，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该条约，并得到天皇的认证。

22日，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组织了第19次统一行动。总评及中立工会联合会系统的111个行业工会（620万人）分别举行清晨罢工或召开现场大会。全国参加罢市的商店约有6万家。国会周围及市中心的示威参加者据说有12万人。有人预料“岸以后”可能是池田组阁，所以也出现了“反对池田内阁”的标语牌。23日，在警察严密警戒下的外相官邸，藤山外相与麦克阿瑟大使交换了批准书。岸首相在紧急临时内阁会议上正式表明要辞职。在发表的“总理大臣信念”中，岸信介说：“集团暴力导致出现了破坏议会政治的行动，扰乱了国家秩序，对此深表遗憾。”

在此背后，国际共产势力的策谋特别令人忧虑。”

岸外交路线的限度

1958年8月，岸首相在与麦克阿瑟大使会谈时曾说过：“正是要经过激烈争论，日美关系才真正能建筑在稳定的基础上。”看来，岸对修订安保条约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对斗争，恐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

岸外交的基本路线，是日本民主党时代提出，又由自民党继承的“自主国民外交”。然而，对于在美苏、美中对立之中地处远东一角这种特殊地位的日本来说，“自主国民外交”应该是怎样的呢？对此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探讨。岸信介单纯地认为必须坚持反共产主义的日美同盟，过分考虑在这个范围内来提高日本的地位。如果以坚持日美军事同盟为前提谋求安保条约的对等性，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在条约中双方义务的对等性。假若明确记载美军对日本防卫的义务，那也就必须明确记载日本军队对美军的合作。虽然新安保条约考虑到了日方宪法上的制约，但还是按这一原则的方向制订的。这样，就以“强化”日美军事同盟而受到批评。

不过，在反安保势力中间，对于新安保条约的性质以及阻止修订安保条约的斗争意义，理解也不一致。社会党、总评宣传说新安保条约增加了使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但他们并没有积极地提出代替安保条约体制的可以信赖的路线。共产党是根据民族主义路线来批判新安保条约的，认为这会加深对美国的从属关系。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宣传，远远脱离了修订安保条约的实际情况。在反安保斗争中行动最过激的全学联主流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斗争的目标与手段两方面，既与共产党对立，又同社会党、总评对立。他们主张：当前的革命斗争中应该

打倒的对象不是美国帝国主义，而是日本的垄断资本。他们谴责共产党及社会党、总评的合法主义斗争方针，企图组织过激行动。

认为新安保条约是强化军事同盟，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苏联和中国说新安保条约具有侵略性，这种指责未必妥当。至于日本的反安保势力中有些人援引这种指责来对政府进行攻击，更是考虑欠周。美国是有保持和加强对苏联、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意向，但它本身并无攻击性意图。美国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而筑起包围苏中的体制；苏中对此作出反应加快了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在美苏核武器与导弹的激烈开发竞争中，出现了美国被苏联超过的局面。制止军事对峙相互升级，实现裁军与集体安全保障，必然是当代的课题。日本的和平战略，必须从这种观点来进行调整。

要修正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不容易的，但不能认为在60年代初岸内阁除了推进修订安保条约这一路线外日本别无选择。

同1951年9月签订旧金山两条约时的情况相比，国际形势在60年代初发生了很大变化。1951年不管怎么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斯大林死后，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进行了修正。尽管有曲折，毕竟出现了东西紧张关系缓和的动向。60年代，越南和古巴的民族解放斗争同共产主义的结合，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僵化的新因素，但美苏关系、美中关系本身仍存在着向稳定方向发展的征兆。

苏联和中国提出的以建立亚洲、太平洋地区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与非核武装化为前提的日本中立化方案，应该说很有实现的可能。苏联和中国的提案，未必带有共产主义势力向日本渗透的意图。日本方面如果确实能确立起立足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主体势力，日本的中立化就不会具有使日本共产主义化

的危险。

日本的反体制势力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因而在保守势力中重视这种危险的人具有很大的发言力。在保守势力和中间势力中，没有集结成真正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主体势力，严重地妨碍了日本外交路线的转变。

岸的外交路线，虽然高唱“自主国民外交”，但并没有充分的“自主性”。岸本身并没有离开日美同盟的范畴来独自考虑日本的和平战略。他纯粹是反共产主义、反中国的。岸这种人物的登场，使得通过日中关系的改善来谋求远东势力关系实质性变化的可能性更渺茫了。

岸的外交路线，也没有充分的“国民性”。岸的经历与政治姿态使他在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不是朝着提出克服对立的国民性外交的方向努力，而是起了使对立更加尖锐的作用。岸在战前和战后都显示了少有的行政能力，善于适应时代的主流。但是，岸并不是一个能够肩负广大国民信赖、主动促进时代转变的政治家。

战前、战时的大动乱，给战后的历史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在那些大动乱年代，岸具有明显地站在侵略者一边的经历。西欧的“自主国民外交”推进者戴高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抵抗运动的英雄。但是，日本的“自主国民外交”提倡者岸信介，却是统治旧满洲国的实力者，是东条内阁的阁僚。

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背景

1960年反安保斗争的高涨，对全力投入斗争的左翼势力来说同样出乎预料。警职法问题所造成的反对岸内阁形势的高涨，给社会党和共产党带来了没有预想到的好运。反对警职法

国民会议发展成了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尽管如此，1959年的春季与夏季，要组织反安保斗争还感到困难。当时多数工会会员和一般国民对修订安保条约的内容和意义还不了解。虽说修订安保条约和日中问题在1959年6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已成为争论点，但左翼势力在选举中并没获得多大进展，而自民党却很善战。

但是，1959年秋季以后出现了促使反安保斗争高涨的几个因素。

第一，国民对岸内阁一系列外交政策的不信任。

在国会上追问过决定自卫队更新战斗机方面的丑闻。虽然真相始终没弄清楚，但给人们留下了重新决定机种这种不明朗的印象。在越南赔偿问题上，使人们强烈怀疑岸的东南亚政策。驻日美军和自卫队的装备已到了更新期。厄利康制导导弹、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奈基(胜利女神)地对空导弹等新武器运进日本本土和冲绳，成为人们的话题，也成为国会议论的对象。安保条约审议高潮中所发生的U2飞机被击落事件，不仅使美国失分，对于几乎无条件信赖美国的岸内阁来说，同样失分。

第二，苏联和中国的反应严厉。

两国都把新安保条约看作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一再发表谴责性言论。主导反安保斗争的左翼势力则利用这种谴责。“新安保条约是以苏联和中国为假想敌国的军事同盟，具有侵略性因素”，这种宣传引起了广大国民的不安。人们担心新安保条约会使两大阵营的对立更加尖锐，增加战争的危险。U2飞机事件更加深了这种不安。在国会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的论战中，社会党议员成功地使政府在关于新安保条约规定的“远东”范围的答辩显露窘态。政府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给人们留下了吞吞吐吐的印象。使人们担心这一条约会在预料不到的情况下把

日本卷入新的战争,因而产生了不安与不信任感。于是,大多数国民向政府提出抗议,不愿让政府再次把他们拖入战争。

第三,有意采取激进行为的势力的活动,通过新闻媒介等途径一下子传播到全国各地,引起了更广范围的国民的关注。

全学联主流派的学生们,有意地采取了不断以“耸人听闻”的行动为新闻媒介制造新闻,以震动不太关心的国民的战术。他们之所以一再闯入国会,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采取这种方法再利用新闻媒介的宣传,有助于改变政治空气,可以让敏锐地看出问题的学生们把问题的重要性告诉多数国民。他们的行动反映了具有战斗性的学生们早已对在经济高速增长形势下一般国民越来越不关心政治的现象感到不满。这也是学生们对新闻媒介耸人听闻手法的一种敏感反应。在电视已广泛普及(尽管还有黑白电视)的日本,全学联采取行动那天,电视新闻向全国作了生动的报道。

阻止修订安保条约的国民会议于1959年11月27日组织的第8次统一行动中,有一部分到国会请愿的示威队伍,同全学联的示威队伍一起,乘当局方面警备体制尚不完备之虚,进入国会。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介大量报道,从而引发了一般国民对修订安保问题的关心。以社会党、总评为中心的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指导部,对全学联主流派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一再要求控制过激行为。共产党把全学联主流派攻击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挑衅者”;全学联主流派则把共产党叫做“叛徒”。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和共产党的领导者们,连堵塞马路的Z形示威或跑步示威也打算加以抑制。报纸上的论调,既对全学联主流派的危机意识表示理解,又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批评。然而,正是他们这种被批评为过激的行动,对反安保斗争的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岸内阁的国会运营进一步引起了广大国民的反对。

岸内阁方面，对社会党等阻碍审议感到不耐烦，强行赶在艾森豪威尔预定访日日期之前批准通过。在无视议会制规则这一点上，不只是岸内阁与执政党有责任。反安保势力一再闯入国会对政府与执政党施加实力威胁，在国会会场外制造使议会制陷于瘫痪的事态。社会党议员等在国会内进行静坐示威，以实力来阻止审议，这些在实质上也是无视议会制的规则。可是，自民党的强行通过则被看作是破坏议会制的行为而特别遭到强烈谴责。国内舆论严重分歧。但对于主要在野势力不得不进行拚命抵抗的这么具有危机感的议案，政府与执政党不进行充分审议就强行通过。这种做法，引起了强烈批评。自民党的强行通过，给广大国民的印象是政府、执政党方面使议会制陷入了危机。这样就诱发了人们联系岸首相的经历决心奋起开展“保卫民主主义”的斗争。

民主主义与市民要素

1960年5月20日以后，安保条约问题转化成了民主主义问题。民主主义遇到危机这种意识，扩大了反安保斗争主体势力的基础。战后民主主义的渗透、扎根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急速都市化所形成的市民要素，同斗争运动合流了。同以往的左翼知识界不同的知识阶层参加到斗争中来，也是反安保斗争的特点之一。

后来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一般市民群中，有些人是在十几年前还在青年时期就参加过各种战后的斗争。但是，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已抛弃了革命幻想，比较注重现实，因而没有重新挺身参加政治斗争的决心。这些已经成为普通市民的人们，感到民主主义与人权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是发现了参加政治斗争的

时机,才加入斗争行列的。许多人甚至连孩子也带上,心平气和地走到国会周围,为的是向可能破坏和平生活的势力表示抗议。新闻媒介以很大比重对全学联主流派斗争形态的报道,对唤起这些一般市民关心起了很大作用。全学联主流派本能地利用所谓信息化时代的特点,成功地诱发没有集聚在固定组织之中的这一新的市民要素,使他们作出了迅速反应。然而,一般市民并不赞同全学联所采取的行动,更不打算亲自参加他们这种激进行动。这就说明,政治气氛有可能朝着同全学联领导者所企图的那种经典革命模式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也可以说,它意味着对经典式革命模式的否定。

尽管如此,这些一般市民的大规模参加,还是具有政治色彩的,并不能说同全学联的过激行为毫无关系。全学联主流派把阻止修订安保条约国民会议领导的向国会和平请愿轻蔑地叫做“烧香示威”。可是,如果没有这种庞大的“烧香示威”,全学联主流派的冒进行为就会陷于政治孤立,可能会以遭到更彻底的镇压而告终。

反安保斗争是一种内部孕育着深刻对立的巨大的群众运动潮流。它虽具有一定的力量,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新的主体势力,来从根本上变革日本的政治。现有的革新势力,曾试图把反安保斗争中部分形成或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市民要素纳入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基础的改革政治运动,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反安保斗争是“战后型”反体制斗争的一次最大也是最后的斗争。在“战后”时代与反体制运动有关的各种民主主义势力,很有必要摆脱反安保斗争中所包含的陈旧因素,依靠在这场斗争中萌生出的新的要素,重新确定行动原理。反安保斗争的开展,乍看上去,好象是出现了体制危机,但实际上这时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形成的日本混合经济体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经济高速增长,使国民的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也大大改变了国民的意识。但是,各种革新政党及总评等的主导势力,却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各革新政党和总评系统的劳工运动,仍然因循固有的意识形态,在政治上保持僵化。

第十一章 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

1. 池田内阁

从岸信介到池田

1960年6月24日，在岸信介内阁的促进贸易汇兑自由化的阁僚会议上决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

促进贸易汇兑自由化阁僚会议是1960年1月5日由内阁决定设置的，即在藤山与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就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谈判达成协议的前一天。该促进会由首相当议长，外相、藏相、农相、通产相、经济计划厅长官、官房长官、日银总裁以及自民党政调会长都参加。该会被委任全权决定有关贸易及汇兑自由化的政策。6月24日决定的“大纲”的目标是，3年后自由化率达到80%。贸易及汇兑的自由化问题是关系到日本的对外经济能否同欧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问题，它对提高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来说是不可欠缺的。它也是60年代最大的经济问题。

7月2日，在东京的三宅坂，阻止安保修订国民会议主持召开了“不承认新安保大会”，主持者宣布有10万人参加。

7月14日，自民党召开大会，选举后任总裁。

关于选举后任总裁，岸信介主张“协商推举”，于是以川岛干事长为中心进行了多方调解，但是各派的主张对立，不能统一。这是因为一方面，岸信介为了维持政权，同好几个人乱订了推荐

后任总裁的密约，另一方面，抵制强行批准安保条约的河野一郎派及三木武夫、松村谦三派同岸信介派、佐藤派以及池田派等主流派的对立又深刻化了。各派为了获得党内的多数支持，都花费了巨额资金。其中，池田被看作是下任总裁的当然人选，获得了财界主流的大力支持，因此资金实力最雄厚。

财界担心因安保条约问题日美关系恶化，会影响贸易问题。为此，对大藏省出身的、具有丰富经验的经济官僚池田抱有期望。池田与岸信介一起直到最后都以强硬态度坚持批准安保条约，财界认为即使从继承保守的基本路线这一意义上来说，池田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在预选中，“党人派”的河野一郎、大野伴睦及川岛正次郎等依次败下阵来，确立了池田的优势地位。岸信介派最后支持了池田。佐藤派也感到，佐藤荣作本人是岸信介的弟弟，在岸信介之后直接任首相不适当，于是也转而支持池田。

14日进行总裁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池田勇人获246票，石井光次郎获196票，藤山爱一郎获49票。到决选投票时，藤山的支持票也流向了池田，池田获302票，石井获194票。同一天，在祝贺自民党新总裁就任的招待会上岸首相被右翼分子暗刺负伤。在围绕着批准新安保条约的骚乱中，自民党为了对抗反对派的示威游行及阻止审议，同右翼分子进行了接触，并获得了他们的帮助。所以对于闯入招待会的右翼分子未加戒备，使犯人很容易地刺伤了岸信介。

7月18日，召开了临时国会，池田勇人被指名为首相。19日，第一届池田内阁成立。小坂善太郎任外相，水田三喜男任藏相，石井光次郎任通产相，迫水久常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大平正芳任内阁官房长官。劳相起用了石田博英。石田属于反主流的石桥派，之所以起用石田是由于财界长老樱田武（日清纺会长）竭力

向池田推荐。他说“为了解决三池煤矿劳资纠纷，起用石田最合适。”自民党干事长由池田派的前尾繁三郎担任。

池田路线

池田生于1899年(明治32年)，当年60岁。他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大藏省，战后由第一届吉田内阁的石桥湛山藏相提拔担任事务次官。在1949年1月的大选中，就任第三届吉田内阁的藏相。1952年11月，在回答新闻记者及在野党议员的质询时，因作了“中小企业即使倒闭两家也是不得已的”发言，而被追究责任，国会通过了不信任案，只得辞职。其后，作为自由党政调会长，负责重整军备及美国对日援助的谈判。在吉田内阁后期，担任了自由党干事长。池田还担任过石桥内阁的藏相以及岸内阁的国务相，后一职务因在警职法问题上同岸意见不一致而辞职。1959年6月池田又一次进入调整后的岸内阁，在安保条约的修改问题上，他始终支持了岸信介。

池田重视日美同盟，对左翼运动持强硬态度，促进了新安保条约的批准。不过，池田并没有象岸那样在意识形态方面那么倾向于右翼。实际上，池田完全具备着实业家的特质。组阁以后，池田接受了“参谋”大平正芳（官房长官）等人的劝助，指出：“将用宽容与忍耐精神进行对话，实行议会主义。今后绝不搞单独审议。”池田并言明将与“酒吧政治”、“高尔夫政治”绝缘，而要一边吃着“咖喱饭”，一边与社会、民社两党的领袖进行会晤。事后，池田确实召开过仅仅吃咖喱饭的会议。池田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谦让姿态，努力稳定民心。在安保条约问题上经历了政治的激荡以后，他慎重避免刺激左右对立的发言，而以经济增长政策来获得国民的支持，谋求自由民主党政权的稳定。

从岸内阁转向池田内阁以后，保守政权的注意力也从“政治

主义”移向了“经济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因安保问题的激荡受了创伤，因此当前尽量想避免外交上出大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已经实现了对安保条约的修改，极端的“对美从属”色彩已经减淡，目前可以确立稳定的日美关系框架了。

这样，鸠山内阁以及岸内阁等提倡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从表面上消失了，而吉田茂的“经济主义”复活了。让战后才步入政界、并由吉田提拔和培养的原经济官僚池田来复活“经济主义”确是最合适的。不过，池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谦让姿态一登场，就使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想在国际社会上努力发挥“自主国民外交”的意识也暧昧起来。因为保守政治家们都认为，要实现“自主的国民外交”，就必须以修改宪法与强化军备为前提。现在，既然修改宪法已不可能；而在日美同盟中，想通过修改安保条约来稍稍强化一点日本作用的举动又在政治上引起了如此大的混乱，这使保守政治家们对所谓“自主的国民外交”也泄了气。

在野党方面以社会主义政党为中心，继续批判自民党政权的“对美从属”。日本协助美国对越战争，援助美国的同盟国——南朝鲜、南越及台湾，迟迟拖延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等等，都成了在野党攻击政府的材料。尤其是池田内阁以后的佐藤内阁，被在野党攻击得更甚。不过，在野党本身在实现远东和平及日本中立的外交路线方面也并未成功。共产党虽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立，但其意识形态在本质上都是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相对立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从日本共产主义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日本国民中间似乎并未期望过靠建立共产党的政权来维持日本的中立。至于社会党，其内部有苏联派（社会主义协会派）和中国派，在战略上他们仍不能克服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在外交上，他们偏重于同中国、苏

联及北朝鲜的关系。社会党想在不动摇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非武装的、中立政策,建立新政权的设想也未成功。总的来说,日本任何政党都没有实行真正象样的“自主国民外交”。

三池劳资纠纷的解决

反安保的斗争因新安保条约获批准之后而迅速消沉了。

在野党和“阻止安保修改国民会议”宣告新安保条约无效,并组织了抗议示威。但是政府与执政的自民党使用了强硬手段,在野党与“国民会议”终于未能破掉这一既成事实。

三井矿山中的三池煤矿劳资纠纷,从同一时期爆发的反安保运动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随着反安保运动的消沉,三池斗争也开始孤立化。但三池煤矿的三川矿港务所的加料斗一带,劳资决战的姿态仍然持续着。

当时整个日本经济正出现前所未有的好景气。在风雨飘摇中挣扎的夕阳产业,第一工会正在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武装起来,他们以生产第一线工人的生死悠关的基本要求为基础,强化组织,决心将战斗的劳工运动坚持到底。第一工会与作为后盾的“总评、炭劳”把加料斗的周围搞得如磐石一般坚固。总评、炭劳系统的工会还组织了斗争资金募捐运动,并派来了不少支援队。但是,这些工会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体制来与资方进行决战,甚至连炭劳的友好工会也接受资方对个别工人的解雇,从而瓦解了斗争体制。三井矿山中其他煤矿的工会也未同三池共同行动。

7月7日,福冈地方法院决定,判决三川矿加料斗周围的第一工会的罢工纠察线必须拆除。为此派出了约1万警察去三池地区,动用了在反安保运动激化时改善、强化了了的装备,如装甲车、

催泪弹等，对纠察线进行强制拆除。面临这一危机，为了强化当地的斗争体制，总评、炭劳从全国动员了2万人来加固纠察线，斗争激化了，流血惨案随时都会发生。在罢工纠察线内的工人中间充满了悲壮的气氛。7月17日，在当地的福冈县大牟田市举行了保卫三池的大型集会。

就任池田内阁劳相的石田博英，为解决三池事件，积极进行了活动。石田与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再三协商后，向劳资双方表明了下列意向。

(1) 对于执行法院判决，多数人用暴力进行了破坏。在一个法治国家，无视法律是不能容忍的。

(2) 目前现场状况紧迫，如再进一步持续破坏活动，将会招致流血惨案。为此，三池工会等有关人员应该立即停止破坏行为，退至指定地区外。

(3) 政府为了迅速解决该事件，要求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斡旋。

7月19日，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藤林会长接受了石田劳相的意向。为了避免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藤林要求劳资双方给予全权委任，进行特别斡旋。8月10日，藤林斡旋案提出。内容是，“资方将用1个月时间进行整顿，取消去年底的指名解雇。凡符合解雇条件者在整顿期结束后，将自行退职。”

斡旋案认为，这次资方的指名解雇是在煤矿工业经营困难的背景下实行的，是不得已的。问题只是被解雇者中相当多的是工会活动家。三池劳资纠纷的实际情况表明，由于资方劳务政策的不完备以及工会指令缺乏具体性，“三池事件突破了正常的工会运动的界线”，“至少说这一斗争形态使1953年劳资纠纷以来，在劳资间酿成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了，并发展成迄今为止无先例的大工潮。”斡旋案基本承认，资方认为第一工会是

“生产破坏者”的非难是正当的。斡旋案进而批判第一工会说，这次工潮“利用特大规模的群众威力来妨碍法律的执行，这显然是超出了常识范围”的暴力行为。

炭劳于8月18日召开临时大会，讨论藤林斡旋案。在大会上，存在赞同与否定两派的对立，未能得出结论。8月23日暂时休会，并于9月2日继续召开大会。9月6日终于决定接受斡旋案。三池煤矿工会修改了工会规则，决定对退职者仍保留工会会员的身份。10月29日，三池工会与三井矿山的资方代表签定了重建会社的协定书。11月1日，罢工解除，第二工会与职员工会复工。

三池工会(第一工会)与资方进行了改变安置的谈判，最后双方接受了中央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于11月25日达成协议，12月1日，终于全面复工。此时距离1959年8月资方提出第二次合理化案以来整整过了15个月。

浅沼委员长被刺

9月7日，池田首相会见记者说：“今后三年间经济增长率将达9%左右。而且在十年间将把农民减少到现在的三分之一。”对此，有人批判这是“抛弃农民论”。翌日9月8日，池田只得纠正说：“将减少农民60%。”

9月22日，皇太子夫妇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离开日本去美国访问旅行。虽然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但美国仍然遵守与前首相岸信介1月份访美时的约定，接待了皇太子夫妇。

上一次大选是在1958年5月进行的，因此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应到1962年5月到期。但是池田内阁为了在安保骚动之后考查一下民意，准备于1960年10月就解散众议院。NHK考虑到大选将临近，就筹备了三党(自民党、民社党、社会党)领导人参加的演

讲会。演讲会于10月12日在东京的日比谷会堂举行。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这次演讲会上突然遭到袭击，被一个17岁的少年刺死。该少年原是大日本爱国党党员，曾参加过右翼袭击反安保斗争请愿示威的行动。他虔诚地听从了右翼领袖的指示，一心一意要行凶。该少年于11月2日在东京少年教养所悬梁自尽。

随着反安保斗争的激化，右翼更急躁了，从而一部分转向搞恐怖行为。浅沼事件是继6月17日河上丈太郎议员被刺伤以及7月14日岸信介首相被刺事件以后又一凶杀事件。1961年2月1日，又是大日本爱国党党员、17岁的少年袭击了中央公论社社长鸠中鹏二的住宅，刺死了住在社长家中的女佣人，重伤了社长夫人。在这一事件以前，《中央公论》杂志刊登了作家深泽七郎的作品“风流梦谭”。作品中有天皇一家被处刑的情景。为此，杂志总编向皇宫内厅道了歉。少年犯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翌日自首了。警视厅以杀人教唆犯的罪名逮捕了大日本爱国党总裁赤尾敏。

1960年10月13日，社会党召开临时大会，选举江田书记长代理委员长职务。江田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参加大选的方针，其中内容包括“改变过去的一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战略，而变为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断地进行部分的改革，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江田的提案被采纳，事实上这是一个“结构改革”的提案。

10月24日，众议院被解散，11月20日开始大选。

11月8日，美国进行了总统竞选。43岁的约翰·F·肯尼迪当选。据说，替代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两位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会上亮相时，肯尼迪更受欢迎。11月12日，正当日本的大选进入高潮时，社会党建议

举行三党首脑首次电视辩论会。电视作为政治舞台的新媒介在日本也登场了。此时，自民党的池田、民社党的西尾、社会党的江田在电视中一起亮相了。其中，江田以和过去的左翼不一样的个性博得了人们的青睐。江田生于1907年(明治四十年)，当年53岁。他一头银发，风度翩翩，既冷静又敏捷。随着电视的普及和都市化的发展，以及白领阶层的增多，江田显示出了其作为新时代政治领导家的潜在优势。

所得倍增计划的制定

11月20日大选的结果，池田和自民党获得了稳定的多数。得票率分别是，自民党获57.6%（上次大选获57.8%），社会党获27.6%，民社党获8.8%（上次大选，民社党还未从社会党分裂出去，当时社会党获32.6%），共产党获2.9%（上次2.6%）。议席数自民党获296个（上次获287个），社会党获145个（上次获166个），民社党获17个，共产党获3个（上次获1个）。自民党在众议院解散时283名的基础上增加13名，社会党也在解散时122名的基础上增加23名，无党派4人在当选后加入自民党，使自民党议员总数达300名。1月刚建党的民社党由解散前的40名减了23名，只剩17名，受到巨大打击。

经过了反对修订安保条约的激烈斗争以及三池煤矿工潮之后，自民党政权仍然保住了其优势地位。社会党虽然遭到了民社党分离出去的不幸，但仍然单独确保了众议院总议员数的近三分之一(31.1%)。这一方面表明了人们对浅沼事件的同情以及对右翼的抗议，另一方面多少也是由于江田在电视中给予了人们好印象。民社党建党不久就因安保骚乱被卷入左右冲突中去了，几乎未获得表示自己独自立场的机会，因此大多数国民对民社党印象不深。

12月7日进行了首相指名投票，池田再次当选。12月8日，第二届池田内阁成立。外相小坂善太郎、藏相水田三喜男、劳相石田博英、官房长官大平正芳等人留任，通户相由椎名悦三郎替换了石井光次郎。

12月27日，池田内阁会议决定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关于制定新经济计划，早在1959年11月岸内阁时期就已经在经济审议会进行审议。在审议期间，首相由岸信介换了池田。以前的两个经济计划都是五年制的，这次新计划是十年制的。新计划准备今后10年经济实际增长达年率7.2%，10年后经济实际规模正好增加1倍。计划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完全就业”为目标，要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提出了以下政策课题：

- (1) 充实社会资本。
- (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3) 促进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
- (4) 提高人的自主能力及发展科学技术。
- (5) 缓和双重结构与实现社会稳定。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无论从其计划目标的编制来看，还是从实现目标的手段来看，都没有加进什么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在上一次经济计划制定以后，出现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政治家及经营者们对“经济高速增长”的信心增强了。池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计划向国民表明了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生活改善的可能性。通过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首先是将经济移向了政治舞台，进而经过此经济计划的有效运用来修复政治舞台上产生的深刻裂痕。就这样，池田有意识地将“政治季节”转变成了“经济季节”。

2.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经济增长的时代

60年代全世界都处在经济增长的时代。人们不仅要把经济增长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而且在政策思想和政策手段方面都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课题。可以说，经济增长是这一时代的最大政治主题。

西欧和日本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地区，这一时期也已经恢复了经济，踏上了新的增长道路。战败国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尤其显著，被世人称为“奇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是在新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实现的。即它是在去除了战前旧制度的各种制约，在所谓“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由自由的私营企业体制与加强了社会要素的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结合的产物。它依靠引进和普及20世纪美国的产业，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正如西德历史学家格罗曼所说的那样：

“由于旧权威体制的崩溃，对于1945年的德国人来说，除了战胜国给予他们的一些权力以外，任何权威都不存在了。然而，随着战胜国下放权力，形势发生了变化。从旧统治体制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开始登场了。虽说这仍然是资本主义，但可以说这是纯资本主义。只有在这时，德国工业才停止接受旧权威的价值体制，才开始不再期待旧权威的庇护与承认。不夹杂封建的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在50年代一起深深地渗透进了德国。为此资本主义不再是处在权威的管理之下，而是处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管理之下了”。（格罗曼《德国近代史》Ⅱ，P 361—362）

同样在日本，经过了军部的统治、战争的巨大破坏、战败以

及占领与改革等,实现了对旧体制的变革,旧权威也崩溃了,出现了“纯资本主义”状态。日本虽然并没有象德国及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有意识地追求社会民主主义,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进入了1946年的宪法体制。尽管其要素还不很充分,尽管保守政权进行了长期统治,但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政策化了。日本50年代的“经济自立”与60年代的“高速增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的。

60年代,在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自从以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变动巨大为特征的产业革命以来,60年代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整个历史中是属于创纪录的经济发展时代。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比较稳定,IMF(国际货币基金)的固定汇率制又基本维持,这些都是国际贸易扩大的重要条件。

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在追求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成了能否维护超级大国威信的赌注。不属于任何阵营的第三世界也开始重视经济增长。这些地区中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到了60年代,才先后开始追求经济的自立。不过现实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而发展中的国家则是人口急剧增加。结果,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经济水平的差别反而更扩大了。为此第三世界开始一致要求加强自己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并要求发达国家援助第三世界的经济开发以及实施贸易发展政策。

肯尼迪的经济发展政策

虽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都占压倒优势,但其经济中仍然出现了许多问题。

美国经济未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破坏,不仅如此,工业生产还由于军需的迅速膨胀而急剧增加。而且,从战争经济转向和平经济时竟没有伴随出现众多的专家所担忧的那种大萧条。战后的美国经济靠着强劲的消费需求的支撑,成功地维持了战时的高生产水平。50年代前半期,又靠朝鲜战争的军需支撑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到了50年代后半期,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经济的长期停滞与失业的增加表面化了。

艾森豪威尔政权在对外政策方面失利很多,如U2飞机被击落,巴黎高级会谈失败,因日本政治动荡、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计划中止,中南美反美运动高涨,古巴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1959年1月)等等。这些都降低了美国的威信。同时在这一时期,在宇宙开发方面,美国也被苏联超过,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无人,1957年10月发射),为此美国心急火燎。

艾森豪威尔政权采取与美国大资本家密切合作的姿态,在经济政策方面沿用了保守的方法。在其最后阶段,更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本人及其共和党保守的政策思想。他们在经济增长政策与均衡预算主义之间选择了后者,停止了对公共建设事业与住宅建设的资助。从而使经济停滞更明显,失业者更多。

1960年11月总统大选时,候选人肯尼迪从内政外交两方面批判了艾森豪威尔政权的失败,获得了知识阶层的赞同。肯尼迪还提出了积极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

肯尼迪为了结束反种族差别的斗争,向议会提出了给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公民权法案”。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方面,他以“新开拓政策”为口号,提出了要恢复繁荣和发展经济,政府帮助发展老人医疗事业及教育事业,保存天然资源,促进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住宅建设及地方开发等长期计划。在凯恩斯派经

经济学家的协助下，肯尼迪政权采用了经济增长政策。他们认为，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从短期来说虽然具有增加国际收支赤字的危险，但是从长期来看，将会强化美国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反而会带来国际收支的改善，阻止美元与黄金外流。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了。但是，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军事支出急增，美元大量外流，通货膨胀加剧，从而使这一政策受挫。

肯尼迪很重视美国的威信，在对外政策方面也追求积极的政策。不过这一积极政策受到了对共产党过度戒备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势力也强烈敌对，过多地进行了军事介入。

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要打倒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带有浓厚的反美色彩。不过，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与腐败也是尽人皆知的。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古巴革命的正当性。艾森豪威尔政权表示，如果古巴革命在1959年1月1日成功，美国就将在一星期后的1月7日尽早承认新政权。可是，卡斯特罗后来与古巴共产党合作起来，对在古巴的美国人资产实行了国有化，并开始向苏联靠拢。在肯尼迪政权成立前夕的1961年1月3日，美国政府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肯尼迪政权建立后的当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的、亡命美国古巴人部队在古巴强行登陆作战，这一冒险以失败告终。从此美国与古巴的关系彻底恶化了。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通过电视广播宣布，苏联正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肯尼迪命令美海军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与此同时，要求赫鲁晓夫撤除导弹基地。美苏对立已达到即将爆发核战争的地步。赫鲁晓夫面对肯尼迪的不妥协姿态让了步。他以美国不侵犯古巴、解除海上封锁为条件，同意撤除导弹基地。把导弹运进古巴的冒险政策是赫鲁晓夫的失败之一。

这一事件决定了美国60年代对共产主义政策的方向。其后，

美国政府在越南推进了更加强有力的介入政策，最后遭到失败。对于民族解放战争，只要有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子存在，美国就总是失去冷静，过多地介入。这一外交上的强硬政策使军事支出膨胀、美元外流增加、黄金储备减少，加速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

赫鲁晓夫的经济增长政策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也重视了经济增长。

赫鲁晓夫于1957年2月解除了谢皮洛夫的外交部长职务(葛罗米柯接任)，同年6月又将斯大林时代的实权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谢皮洛夫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清除出党。1958年3月，他又迫使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退职，自己当了共产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掌握了苏联领导权的赫鲁晓夫，为了确立同美国的“和平竞赛”关系，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证实了苏联在导弹开发方面占有优势。以此为背景，赫鲁晓夫开始谋求同美国进行接触。赫鲁晓夫一边发表威胁性讲话“如果美国干涉古巴，苏联就用导弹攻击美国”，一边又希望同美国一起协作来冻结核武器、防止核扩散。在经济方面，赫鲁晓夫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目标。1958年5月，赫鲁晓夫又说，“要使苏联人民人均消费的肉、黄油、牛奶的数量赶上美国”。在苏联新的七年计划中，提出的目标是：到1965年，苏联农业生产赶上美国，到1970年工业生产也赶上美国。

1959年9月，赫鲁晓夫成了首次访美的苏联总理。他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华盛顿郊外的总统别墅)进行了会谈，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全面裁军的议案。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12天，考察了美国各地，亲自接触到了美国产业文

明的一部分。

对赫鲁晓夫的苏联来说，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第一，要抹去人们对斯大林时代黑暗事件的种种记忆，使苏联与东欧国民重新充满信心，从政治上强化现行体制，首先就必须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第二，为了证明共产主义的教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苏联也必须发展经济。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发展、成熟、最后走向停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之快是资本主义时代所不可比拟的。但现实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仅仅在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对落后的工业国中发生了。苏联、中国及整个东欧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威信，也必须发展经济。牺牲了自由，破坏了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否决了东欧各国民族自决的共产主义体制，如果还想证实其正当性的话，除了发展经济已别无他途。

第三，为了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相对抗，苏联也必须发展经济。

斯大林预言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危机将进一步深化的局面并未出现。斯大林认为，战后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生产力的力量。如今斯大林这种预言的破产已是明明白白的事了。战后国际共产主义的极左冒险主义就是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全面危机的第二阶段”的战后长期停滞论相联系的。但是，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各国以及日本都从战争灾害中迅速恢复过来，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经济也保持了活力。赫鲁晓夫的苏联面临的紧急任务并非是要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是要用经济增长来证实共产主义国家的优越。赫

鲁晓夫的“和平竞赛”政策正是表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的转变。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一再鼓吹苏联体制的优越，并告诉人们，苏联赶超美国的日子不会远了。

但是，赫鲁晓夫的主张并非那么简单就能实现的。

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就必须改革经济制度，扩大个人与企业的自由。但是欲扩大经济自由就必须积累能经营自如的管理能力。对已经习惯了长期统制经济的苏联领导层来说，对自由化后将带来混乱的恐怖远远超过了对自由化会带来利益的期待。

经济的自由化归根结蒂是同政治与文化的自由相连接的。赫鲁晓夫要从内政外交两方面打破斯大林时代以来的闭塞状态的积极政策，招致了苏联共产党内保守集团的不安。赫鲁晓夫的美苏合作实现全世界核武器冻结的政策又招致了今后也想进入核大国队伍的中国的不满，最后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重要支柱——农业开发政策因垦荒的失败以及冒进的增产计划受挫而中止实施。至1964年10月，得到了军部及秘密警察支持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苏斯洛夫等组成的集团把赫鲁晓夫从第一书记和总理的宝座上赶下了台。

池田内阁的经济增长政策

任何国家要发展经济都必须以当时的政权得到国民的支持、体制能够保持稳定等作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1960年12月决定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具有下列特征：

最大的特征是，该计划提出了“收入倍增”这一普通国民都明了的目标。其次，计划期也特别长，定了10年。这是因为考虑到要实现国民收入实际水平提高1倍的目标，必须化较长时间。

为了在10年间达到倍增，故设定国民总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7.2%。

“收入倍增”比起基本实现“经济自立”、保持完全就业、提高国民收入的提法，更鲜明地反映了政策当局的意图。通过展望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景，就能增强现行体制的社会凝聚力、消除政治对立及混乱因素，直接为保守政权实现长期稳定统治服务。

池田在就任首相以前就提倡“月薪倍增论”。据说这一倡议最初是由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在“工资倍增的倡议”一文(刊于《读卖新闻》1959年1月3日)中首先提出来的。池田1959年1月因对警职法有异议而提出辞职离开了内阁，同年6月岸信介内阁改组后池田又作为通产相再次入阁。池田在半年的在野期间，开始提倡“月薪倍增”。当了通产相以后，他仍然反复提倡。以后，“月薪倍增”的提法被人批评是只为工薪阶层服务，故池田就改为现在的“收入倍增”。

有“倍增”想法的，并非池田一人。据宫崎勇说，在1957年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时，自民党副干事长福田赳夫就向解说计划的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大来佐武郎问过：“能不能用增加一倍这种提法呢？”(有泽广巳监修《昭和经济学史》P.427)

通过表明“现在的收入水平还很低，随着日本经济的增长就能确实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以此谋求现行经济体制和统治政权的稳定，可以说是执政党的政治家的共同愿望。岸信介首相在池田再次入阁前的1959年5月底，也已经有了“应该制定一个用10年时间使国家经济规模扩大1倍的计划”的设想。关于同年11月26日要求经济审议会(会长石川一郎)编制新计划。因此，“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基本构思并不是池田内阁所特有的，应该说它是在岸内阁时期就已经构思、并由池田内阁继承、确立和

普及。池田内阁在1960年11月接受了经济审议会的咨询,并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此计划(同年12月27日)。经济审议会在审议“倍增计划”过程中,强烈感到日本经济需要更长期的展望,为此设置了长期展望部会(部会长东畑精一),进行一直到1980年以前的展望预测。

据说在池田身旁的不少人认为,“所得倍增”作为政府的基本方针固然很好,但不宜放进正式计划中。可是池田坚持自己的意见,把“国民所得倍增”作了政府正式计划的名称。

所得倍增计划的目标

1957年编制的“新长期经济计划”目标是,为保证完全就业尽可能实现高增长。为此,设想了好几个经济增长率,待看了国际收支情况及其他制约条件后,再选择可能实现的增长率。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明确以“10年时间使国民收入增加1倍”为目标,因此从一开始就设定年增长率为7.2%,在此前提下再调整有关的指标。同时,编制计划的方法也更加单一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现实。

新长期经济计划选择的经济增长率的目标值是6.5%,而现实的日本经济增长率已超过这一目标值。“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回顾了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历程,指出1947年度至1952年度的日本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1.5%,1953年度至1959年度平均达8.3%,近几年的经济增长实绩已远远超过“新长期经济计划”的目标。“倍增计划”还指出,尽管出现了如此高的经济增长,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并未破坏,物价上涨也不厉害,国际收支也未变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从日本经济发展实绩来看,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设定7.2%的增长率仍然是较保守的数字。用简单明了的“所得倍增”作为计

划目标,其现实根据即在年均7.2%的增长率上。事实上,后来10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还是大大超过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预料的指标,达到年率10%左右。当初预计前5年的增长率会高些,后5年因劳动力供给不足等影响,增长率相对会低些,因此决定平均年增长率为7.2%。但是结果是,无论是前5年还是后5年的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指标,而且后5年的增长率还进一步超过了前5年。

迅速增长的经济同时也是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估计到今后10年日本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指出实现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在倍增计划的基准年次1956至1958年度,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数的比率平均是39.6%,计划预定,到目标年次的1970年度这一比率下降到23.7%。即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从1645万人降到1154万人,减少491万人。正如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计划目标值那样,结构变化也比计划预想的巨大得多。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下降极其迅速。据制定“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那年即1960年的国势调查,1960年的第一产业就业数占总就业数的32.7%。10年后的1970年,仍据国势调查,这一比率已降到19.3%。

出乎预料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出乎预料的物价上涨。1960年以前,日本物价还比较稳定。到了60年代,随着持续的高速增长,由劳动力过剩变成了劳动力不足,因此工资水平迅速上升。中小企业等由于人手不足,工资增加的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由此,企业间工资收入水平的差距缩小了,双重结构的矛盾开始缓解。工资、收入的增加反弹到物价上,使消费物价又持续上涨。这是国民对自民党政权的高速增长政策表示不

满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的充实

预计到产业结构将发生变化，自然要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课题。经济增长已成为现实，由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将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加速经济增长，就必须提出能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政策课题。

与“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这一题名及其编制过程给人的印象不同，计划本身的内容未必一定是为了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相反，该计划更重视如何从制度上结构上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是该计划的一大特征。不过，计划中的对应措施从整体来说还是很不充分的。经济增长比计划所预料的要快，因此公害问题、城市问题等也进一步深刻化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采取的方针是，经济增长本身依靠民间经济的活力；政府只是进行适当诱导来保持增长的稳定性。同时，为完成各种政策课题，对公共部门的活动进行计划规定。从这一观点出发，政府所追求的政策课题是：

第一，“社会资本”的充实。所谓“社会资本”即“社会性间接资本”，它指社会的各主体共同需要利用的一般的资本设备。其范围很难下严密的定义，一般来说，它包括作为产业基础的社会资本设备，与生活、居住环境相关的社会资本设备，以及交通、通讯、公益事业等设施 and 治山治水护港设施等等。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举出以下3个项目作为充实社会资本的具体方向。

(1) 首先要确保能强化产业基础的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为此计划强调需要充实道路、港湾、铁路、机场等运输设施、电信电话等通讯设施以及工业用地、用水等。

(2) 扩充住宅、生活环境等设施，以此来缓解城市问题。为

此计划强调需要完善住宅、上下水道、公园、医院、福利以及文教设施等。

(3) 强化保全国土的设施。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指出,过去长期忽视和掩盖的噪音、臭气以及建筑物的密集高层化所引起的大气污染、水质污浊、地基下沉等公害,今后将会更加严重,对此必须采取相应对策。计划中说:

“作为消除公害、防止公害的对策,用法律加以限制自然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需要扩充工业用水管道,加强废水处理设施,以及下水道、堤坝等设施,实施用途地区化、工业配置合理化。同时期待公众道德尤其是企业道德的提高来消除和预防公害。”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公害的发展远比计划所预想的要厉害。政府的对策远远跟不上公害的发展。计划中所谈的公害防止对策没有对公害产生的根源加以严格限制,而只把重点放在扩充工业用水管道以及下水道之类的设施上,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公害不断深刻化的过程中,政府及地方公共团体的行动又受到企业经营者保守意见的强烈限制,使救济被害者及防止公害进一步深化的措施更加落后。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对付公害问题、大都市问题及地区间差别扩大问题,提出了合理配置产业、确立综合交通体系的政策。在对既存工业地带的用地、用水及劳动力加以限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将工业向地方分散。为此国土计划及地区政策也成为重要课题。

在把主要注意力投向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后,在进行工业转移及工业再配置时,就会仅仅对较方便的地区进行重点的社会资本投资,而遗忘日本海一侧、东北、北海道及南九州等工

业发展前景还不明确的地区。所以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附属文件强调对于上述工业过疏地区，即使投资效率很低，也要推进社会资本的充实。

社会保障与农业、中小企业

第二是社会保障的充实及社会福利的提高。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指出，“在今后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即使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难免不会出现收入差别扩大的可能性。为此有必要考虑缓和社会紧张。”作为缓和措施之一，就是充实社会保障。倍增计划中规定，再分配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由计划基准年份的4.8%提高到目标年份的6.1%。计划认为，“这样提高社会保障的规模，虽不及其他发达国家，但预计在计划期间将会有相当的改善。”在西欧福利国家，再分配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已经达到10—20%，与此相比较，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的目标值还是相当低的。日本经济的规模及水准正在迅速地接近西欧发达国家，当时的福利目标其实还可以定得高些，这样就可以纠正后来经济增长过度的偏差，防止社会不均衡的进一步扩大。

自由民主党虽然将福利国家作为政策纲要提了出来，但是并没有把它放在重要地位上。优先加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用经济增长来提高收入水平，这是自民党政策思想的基础。那些重视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的各种政治势力在整个60年代并没有获取政权的可能性。

第三是农业和中小企业的现代化。

为了缓解双重结构，农业和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得到了重视。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认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的增长虽然

不很快,但由于农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可以期待农业人均劳动生产率及收入水平与其他部门能有同等程度的提高。计划提出的方针是,促进“过渡性非自主经营”自立化,并诱导农业向协作化发展;对于完全的非自立经营者则通过扩大兼营机会,来促进他们完全离农,并且也诱导离农的人们走协作化道路。计划预测,10年以后,水田“协农”的经营面积将达20至40公顷左右,旱田“协农”的经营面积将达40至60公顷左右,他们都将引进20至4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池田表示“10年间将减少农民三分之二”,这招致在野党势力及农业者团体的反抗,说是“抛弃农民”。但是事实是,计划和政策都并非是“抛弃农民”,相反,它主要的目的却是保护农民。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工业化及服务业的发展,农业的就业人数下降还是比计划所预料的要快。这并不是由于倍增计划促进的协作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后所导致的结果,而是由于在分散工业的背景下,农村兼业化迅速发展了。

至于中小企业,计划提出的基本目标是,缩小规模差别,促进设备现代化、充实自有资本,改善环境,劳动条件现代化等。为此,提出的政策是,培育中坚企业,促使零星小企业组织化。中小企业政策也是在强烈的政治背景下以行政保护为中心的,计划中设想的培育中坚企业以及促进零星小企业组织化的措施,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不过,这一领域在全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以及生产扩大的影响下,还是发展了不少有实力的专业中小企业,中坚规模的企业的发展也出人意料地增加了。

3. 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

高速增长的原因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取得的最佳效果是政治上的成功。它

使国民意识到目前的政治主题是正在进行着的经济高速增长。倍增计划本身并没有提出能特别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体系。60年代的日本高速增长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下列长期的多方面的因素存在的结果。

第一，日本国民对于经济发展一贯抱有强烈的渴求。受到战争创伤后，国民们倾注了全力，努力恢复经济。但是经济恢复后，日本国民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尤其是同占领日本、并给予日本人意识影响最深的美国生活水平相比，更显得穷困。住宅等虽然不容易一下子改善，但国民强烈渴望能从贫困状态中解脱出来。国民的工作欲望强烈，储蓄率也很高。

第二，尽管受到战争破坏，但是大多数人才与经营组织还是保留了下来。战后，日本不少产业积极地从美国和西欧引进技术，实行了合理化与革新运动。他们消化、改良所引进的技术，积极开拓市场，充分发挥了日本产业人才与经营组织的积极作用。

第三，财阀与垄断企业被解体，培育了新的经营人才。企业间的竞争更趋活跃，企业的经营方式大幅度更新。许多企业增强了独立性，为适应战后新环境都采用了积极的经营战略。

第四，农村和城市下层的人民生活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是由于土地改革以及确立了劳动基本权，保障了一般的政治自由，从而稳定与提高了国民的生活基础。劳动者组织的行动权力得到了保障，他们的发言权增强，从而大幅度缩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这些变化提高了工人与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增加了工人农民的工资收入，从而又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由于工会的普及，即使在经济调整时期，也很少出现大量解雇工人和降低工人工资的现象。战后日本重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是以耐久消费品为中心的民需型商品，它大大依赖一般劳动者的购买力。

因此全体国民的收入上升与稳定对产业的发展来说成了决定性的重要条件。收入水平的提高又使生活内容发生变化，导致精加工和组装工业在国内市场迅速发展。原来面向国内市场而确立生产体制的企业由于推行合理化和改善质量，又成功地转化为出口企业。日本的主导产业由轻机械工业转向家庭电器工业，进而又转向汽车工业。

第五，国际货币体制保持稳定，国际贸易得到扩大。过去日本一直是经济建设一过热，就会出现外汇危机，但在60年代，实行金融紧缩政策进行经济调整时，出口竟意外地增加，从而很容易地又恢复到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去了。对于日本经济发展来说，“国际收支的承受力”特别强。

第六，50年代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与产业基础强化政策产生了效果，经营者的经营意识发生了革命，工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心以及劳资合作的气氛浓厚等等，这一切促使主要产业都进行了积极的投资。经济增长的前景明确，经营者对将来的信心加强，积极投资的欲望旺盛，新兴工厂接连不断地出现。在1美元=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下，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加增强，产品质量进一步得到改善，增长活力越来越旺盛。

在上述因素的基础上，“贸易汇兑自由化问题”也在60年代登场了。这是日本为了进一步回归到国际社会、获得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而采取的步骤。50年代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就强烈要求日本取消对贸易、汇兑方面的限制，对此，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遵守国际公约。于是在1960年1月，岸内阁决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自由化首先从贸易汇兑交易开始逐步扩大到外资引进。日本各产业面对自由化，强烈意识到了外国商品及外资企业进入日本的危险，从而更加积极地推进了自己企业的合理化与现代化。

当然，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在提高日本经济增长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其一，它明确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并加以宣传、普及，从而影响了经营者和一般国民的行动，促进了投资活动，加速了人们心理上对增长的看好。它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空气，长期维持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制度。

其二，计划提出了一些结构性的课题，并采用了一些对策来排除影响高速增长的障碍。例如重视了国土计划和地区开发，提出了农业、中小企业政策。国土计划与地区开发计划一方面对既成工业地带的各企业的用水、用地以及劳动力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明确限制，造就了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老工业地带的新工业地区。另一方面它又为缓和国民对地区差别扩大的不满以及防止政治、社会势力对持续的高速增长进行的抵制而发挥了作用。同样，农业与中小企业的对策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提高了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瓶颈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它又缓和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摩擦。

对高速增长의 批评

对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提出的高速增长路线，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批判。比较典型的批判有两种。

第一，认为不存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在以社会党、共产党为中心的在野党势力中，不少人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持否定态度，并以意识形态的对立来否认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提高的可能性。这些人认为，在现行体制下是无法实现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提出的那种高速增长的。这种势力从

战后起一直抱着“不变革现行体制，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和生活的提高”这一教条主义的观点，即使面对已经在实现的高速增长的现实，这一观点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当前的繁荣是“昙花一现”，是暂时的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在制度、体系的组合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战前的资本主义体制已有很大的不同。第二次大战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丧失了主要的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时代正在结束。在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国，复活并加强了民主主义。工会及其他自主团体的发言权大大增强。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单独或者与中立党一起组成联合政权的例子已有不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得到了飞跃发展，政府及中央银行的政策对经济稳定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负有责任，这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的常识。日本的保守政权推进经济自立、进而采取促进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的政策，正是体现了上述倾向，因为如不这样做，政权就不能维持。这是大众民主主义时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在对各自的制度体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之后，恢复和强化了经济活力。由于30年代的大危机和战争而中断了的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的高潮又一次出现了。20年代在美国开花的20世纪工业文明，战后扩展到了欧洲和日本，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60年代的日本经济是属于整个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高潮中的一个部分。日本产业以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经济为起点，在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元为中心的体制下，实行了固定汇率制，并持续努力地推行了产业合理化和经济自立。最后，以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为主导，依靠国民总消费水平的上升及出口扩大的支撑，实现了长时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超过

了基本赞赏现行体制的大多数专家们的预料，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政府正式计划和政策中所提出的数值。

在野党势力不仅对现行体制下实现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而且对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怀有戒备。在野党阵营内的专家们指出，与其说高速增长会改善国民生活，倒不如说具有恶化国民生活的危险。他们认为，经济高速增长会扭曲国民生活、扩大国民间收入差别、加深双重结构。

这些批判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而在另一方面则具有正当性。

大多数批判者无视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减少了双重结构下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这是错误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劳动力供需状况由供过于求转向供不应求，出现了年轻劳动力为中心的人手不足，产生了劳动工资上升的倾向。双重结构中最低层的工人工资也得到迅速增加，从而缩小了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随着产业生产活动的日趋活跃，日本特有的在企业规模结构上中型企业或者说中坚规模的企业比较薄弱的现象也在消失。在就业结构方面，家庭从业者的比率下降，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比率急剧上升。

不过，经济高速增长又使消费物价持续上涨，并产生了公害等深刻的社会问题。批判高速增长给国民生活带来了不良后果，这并非是完全无意义的。但是批判者们并没有充分具体地讲出会产生什么新的社会问题，更没有提出有效的对策。总之，在野党势力没有成功地蓄积替代保守政权、自己建立改革政府的力量。在60至70年代期间，没有出现因体系、政策的错误而导致政权更替的现象。

即使在野党也无可否认依靠经济增长来提高国民生活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池田内阁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制定后，在野党

为了对抗，也提出了比倍增计划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作为自己的政策。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是日本60年代的政治主题。

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信心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正在实现，但是要明确地预测出这种增长能持续多久是不容易的。在任何时期，未来都是不太能确定的。即使是将“月薪倍增论”发展成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池田及其周围的人，也不能明确预计到将来。

不过，在池田所依赖的专家集团中，有人一贯提倡比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更高的经济增长论。这些议论影响着池田，使他提出了倍增论。

池田原是大藏省官僚，担任过吉田和岸两届内阁的经济阁僚，被认为是强有力的首相候选人。他与产业经营者阶层的交往很深，与经济专家们的协作密切。在经济问题上，池田得到了不少实力人物的协助。例如，宏池会（池田派集团）事务局长田村敏雄，大藏省出身的自民党议员大平正芳、宫泽喜一等，还有也是大藏省出身的伊原隆（后担任横浜银行董事长）、平田敬一郎（后担任日本开发银行总裁）、下村治（日银政策委员，后担任日本开发银行理事），经济评论家高桥龟吉、稻叶秀三，以及原“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与岸信介一样，是原商工省官僚）等等。其中，特别是下村治对日本经济的现状及潜力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对经济发展前景作了重要的预言。

下村治对日本经济的增长力作出明确的展望，是在1958年以后。在1958年9月大藏省的“内部参考资料”上刊登了下村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论文，其中写道：

“在战后的长时间内，令人痛心的是，每每都将旺盛的总需

求限制或调整到总供给力允许的范围之内。如今是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已经加强了供给力来实现健全的经济增长的时候了。”

下村从上述观点出发，力说制定“在尽可能稳定的状况下实现尽可能快的、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目标”的必要性。他强调，这并不是“要将经济增长率固定为一成不变的特定增长率”，而是要尊重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和自我负责精神，实施积极的增长政策。这篇论文被收进了宏池会编辑的下村论文集《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之中（1958年11月）。

下村在1959至1961年撰写的两篇论文（一篇题为“日本经济的基调及其增长力”，刊登在周刊《金融财政事情》1959年2月16日—23日号；另一篇题为“增长政策的基本问题”，刊登在季刊《理论经济学》1961年3月号），用理论和实证材料证明了上述观点。

下村认为，根据日本经济的潜力，在今后10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增加1.5至2倍，换算成年率即年均增长9.6%至11.6%。这比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提出的10年间增加1倍、年率为7.2%的增长率更高。下村提出高经济增长率的根据有两条。

第一，日本的设备投资水准高，创造出的生产能力大。

第二，制约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国际收支的承受力”特别强。

一般来说，经济要持续增长，就需要供给能力的持续扩大，同时与此相配对的需求也要能持续的扩大。

供给能力能否扩大由两大因素决定。

其一是看各年设备投资的多少。在每年形成的固定资本（指民间固定设备投资、公共投资、住宅建设等固定资本设备的形成）中，那种投入生产性设备的民间设备投资的规模越大，创造

出的生产能力也就越高。

其二是一定的设备投资能增加多少供给能力的关系问题。在既存的设备投资中能创造出多少国民生产总值，它们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被称为“产出系数”。它是表示在一定的固定资本中从供给方面可能创造出多少国民生产总值，也是表示设备投资中资本设备增加的那一部分能创造出多大供给能力。如果每年的设备投资(资本设备增加的部分)是个定数，那么，产出系数越高，从供给方面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越大。

下村通过分析过去的发展历史，注意到当时日本经济的实际状况是，固定资本投资的规模大，而且在固定资本投资中，与扩大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民间设备投资所占比率特别高，产出系数也大。为此下村得出了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力相当高的结论。

不过日本经济中，大部分原料燃料资源依靠进口，因此如果经济过热，进口就会急增，从而导致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又不得不用金融紧缩政策来抑制经济增长。所以另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是“国际收支的承受力”。

对于这一问题，下村也是通过分析过去的历史，认为日本“国际收支的承受力”并不象人们往常以为的那样弱。他断定经济增长率在11—19%时仍然能够维持进出口均衡。其基本理由是，全世界都在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随着世界总收入的增加贸易也会增加，而日本的出口增长率又特别高。随着日本今后工业化的大力发展，新的国际收支结构将会形成，即引进的外资将会适当弥补进口入超。从以上理由出发，下村下结论说，即使实现10%左右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受到来自国际收支方面的制约。

从后来的日本经济发展实况来看，下村的分析和预测是基

本正确的。

下村结论的特征之一是，来自直觉和自信。他确信“日本经济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勃兴期”。凭着这种直觉与自信，下村才坚持做了这一系列繁琐工作，对日本经济的各项现实指标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然后得出结论，从中预测出将来会有高速增长。

下村结论的另一特征是，十分强调政府的责任。

下村主张，虽然日本经济中具有很高的潜在增长力，但是如何使它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则是政府的责任。下村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不景气并不会自动复苏，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提高国民的福利，才能防止失业的增加。下村指出，战前日本企图依靠战争和侵略来解决失业和贫困，这是完全错误的。战后，在目前状况下，即使扩充军备也不能保障和平。下村的信念是，为了有效地利用战后改革后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政府有责任去积极追求发展经济的目标。

在日本经济实际发展过程中，情况之好甚至超过了下村的预测。

下村以为，因为日本经济的设备投资水准高，产出系数也高，所以供给能力将会激增，但需求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增长，这就需要从财政方面着手充分创造有效需求。这一观点原出自凯恩斯主义，但实际情况是，并未出现下村所担心的那种需求不足。

之所以如此，其理由之一是，设备投资的速度超过了下村的预测，而且其需求效应也特别大。产业界受到贸易汇兑自由化及资本自由化动向的强烈刺激后，更加积极地进行了技术革新投资，不断创建了许多最新型的工厂。

理由之二是，政府没有从维持有效需求的观点出发，而是为克服经济发展的瓶颈，强化了产业基础；并且为了缩小地区差别

和促进地区开发,随着经济的增长增加了税收,从而持续扩大了公共投资。

日本政府的公共投资规模比起持续迅速扩大的民间的设备投资还相当落后,结果产生了社会的不均衡。不过尽管如此,日本公共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诸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任何发达国家都高,其绝对值也迅速扩大。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国内的消费及住宅投资都比较顺利地得到发展,从而支撑了经济增长。

60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从总体来说,达到了超过下村预想的高水平,不过在这10年间,经济增长并非没有中断过。虽然“国际收支的承受力”确实比一般人所担心的要强得多,但是经济发展过热后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只能用金融紧缩政策来抑制,从而导致不景气的情况也反复出现过。每当这时,日本经济增长趋势将结束的议论就抬头了。

在60年代,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深刻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大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为了适当控制发展过程,在社会变动中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就必须具备计划周全的政策体系。但是,就连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也低估了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从而忽视了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结构改革论

1960年围绕安保条约的修订问题,日本国民运动高涨。这一事实表明,对和平和民主主义的强烈愿望,以及用自己的行动来捍卫和平及民主主义是国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明确意识,已经在广大的日本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通过上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斗争,迄今为止的反体制运

动的界限明确了。在如此激烈的斗争后举行的 1960 年 11 月的大选中，社会党的议席确实增加了，但池田的自民党也善战起来。这使人们认识到用革新统治来取代现行的保守政权是很不容易的。

结束了破坏与贫穷的时代，繁荣与增长的时代来到了。国民生活的水准与内容都在变化，同时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也严重起来。面对这一事实，需要转而用革新的政治路线来适应新的时代。在革新势力的内部出现了促进政治路线转换的新动向。这是在肯定战后经过改革的资本主义体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为解决资本主义体制中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欲对其进一步完善的一种革新性的尝试。同时，这也是在正视了目前为止日本国内外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后，特别是在正视了迄今为止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所建立的体制的缺陷之后，欲从思想上、行动上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

代表了这一动向的是社会党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革”路线。1961年江田在社会党内外合作者的支持下，提出了这一新的路线。

被称为“结构改革”或者“民主改革”的这一新路线，最早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其内容即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推进反垄断资本统治的各项改革，要求实施能保障劳动者就业的积极计划，逐渐地变革社会结构，争取和平地向社会主义新体制转化。它事实上是与以前共产党所主张的俄国革命型的武装斗争以及非议会型的政治变革完全不同的新路线。

1922年以后，意大利共产党在法西斯统治下，一直坚持了地下反法西斯斗争。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确保了合法政党的地位，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成为意大利的一大政治势力，政治发言权大大增强。新路线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帕米尔·陶里亚蒂领导

下的意共提出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中死亡。他在狱中曾写下大量笔记，探讨了适应欧洲政治风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陶里亚蒂实践并发展了葛兰西的思想。

陶里亚蒂是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有力活动家，目睹了斯大林肃反的惨状，深知共产国际的谬误。战后他同苏联共产党仍保持着联系，但在意共运动中创造了独自的战略。其实质就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来克服共产主义。意共并没能同苏联绝缘，也并没有充分总结自己曾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政党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但他们确在努力恢复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威信，这引起了世人注目。

意共的路线被日本社会党左派政治家江田接受是令人惊奇的。不过，日本社会党左派早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自从日本共产党在50年代因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要求，走向极左冒险主义，失去了国民的支持以后，日本社会党就开始代表左翼政治的主流。不少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表示失望转而开始接近社会党。意共的结构改革路线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得到公认，但日本共产党还是压制了党内主张在日本尝试这一路线的势力，固执地坚持独自的民族主义路线。对此不满的派别有的脱离了共产党，有的被排除出共产党主流派。

在社会党内，马克思主义派的发言权及组织力反而大大增强。“三池”斗争以后，在社会主义协会中，以青年活动家为中心用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影响很大，最终在社会党内发展成为有力的派别之一。如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日本社会党，其性质既不算是共产党，也不算是社会民主党。

江田就是在此背景下，看中了意共的路线。在得到了一部

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后,他在社会党内积极地提出了这一路线。

结构改革论的挫折

江田于1961年1月在社会党的机关报《社会新报》以及在总评的机关杂志《月刊总评》上发表论文,提出了结构改革路线。

在同年3月6日至8日的社会党第二十次大会上,河上丈太郎被选为委员长,代替1960年10月被谋害的委员长浅沼。原来兼任代理委员长的江田书记长再次当选(两人都无竞争对手)。

1962年,江田总结出了“社会主义的未来形象”(江田构思)一文,并于7月在日光召开的社会党全国活动家会议上发表。其基本内容刊登在《经济学家》杂志上(10月9日号)。

江田在文章中首先引用了横浜国立大学教授长洲一二的话:“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凡是人类可能办到的事在未来都能开花结果”。江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来意图就是要对阻碍这种开花结果的现行体制进行变革。他说,现实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离开了原来意图,把扩大自己的组织作为目的来追求,把苏联、中国等后进国型的革命经验照搬到日本来,热衷于什么“第一阶段、第二阶段革命”,“国民政党、阶级政党”之类的脱离广大国民的“纲领论争”和“战略、战术论争”。

江田说,不幸的是苏联在斯大林的专政体制及恐怖政治的统治下,出现的并非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结构改革路线就是为了克服这种状况,创建国民自主运动的基础,开拓真正社会主义的航线而提出的。为此,必须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的构思。

江田认为,基于上述立场,利用迄今为止人类通过努力而取

得的成果来改善日本国民的生活,才是真正值得奋斗的目标。江田列举了以下4项人类成果。

(1) 由美国现在的生活水准所代表的高劳动生产率和高生活水平。江田指出,美国的高生活水平也是通过美国国民长期艰苦奋斗才得来的,这一点不应忘记。

(2) 苏联贯彻的社会保障。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和消费水平虽不及美国,民主主义也较落后,但是由于实施社会保障,生活得到了稳定,消除了因失业以及生、老、病、死而引起的社会不安。

(3) 英国的议会制民主主义。“把随意割人头转变为按人数多寡的规则议事,首次彻底地把恐怖政治从大地上清除出去的”是英国。这也是英国劳动者长期斗争的结果。

(4) 日本的和平宪法。它扎根于体验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国民之中,是日本民族的自豪。在原子弹和导弹的时代,战争就是毁灭全人类。

江田说,日本的现状是,工业生产力已属世界一流,在世界水平的工厂里装备了世界最新的机械。但是,日本交通事故激增,水灾多发,住宅条件也很差。“为过剩设备烦恼的世界第一流大工厂与世界三流、四流的消费生活和贫困的社会设施并存,任何人都可看出它们之间极端的不平衡。正是在这不平衡的基础上,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工厂才能建造起来。”如能充分利用这一生产力,保证劳动者的权利,充实社会保障,就有可能实现国民生活的提高。他说,“象社会主义苏联那样,抑制消费来建设重工业的做法,在当今的日本已无必要。”

江田提出的问题,改变了历来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种图解式的体制论,而用一般国民容易理解的表现形式指出了当前的奋斗目标。“江田构思”中指出的社会不平衡,是在

经济高速增长中产生的新的社会政治问题。“江田构思”表明，对于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并不需要用原来的革命社会主义论来解决，而是要积极利用日本经济中已经实现的高生产力、依靠全社会的制约来解决。

但是“江田构思”与社会党内的传统思想和行动方式相距甚远。在同年11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社会党第二十二次大会上，反对“江田构思”的意见高涨，最后通过了反对“江田构思”的题为“强化党的领导体制的决议”。江田辞去了书记长的职务。在选举社会党干部时，江田又推荐成田知己为书记长候选人。最后成田被选为书记长，江田当了组织局长。

“江田构思”就是被江田所批判的那种“纲领论争”、“战略、战术论争”所取缔的，它未成为社会党革新的契机就被埋葬了。后来，江田与党内的部分同志一起又一再努力提倡转变社会党路线，但都未成功。在1966年的第二十七次与第二十八次社会党大会上，江田都被推荐为委员长候选人，但两次都败给了佐佐木更三。社会党亲自抹杀了自己组织内产生的新时代政治领导家。

4. 贸易汇兑自由化

自由化计划

岸信介内阁在新安保条约签订后不久，就于1960年6月在促进贸易汇兑自由化的阁僚会议上决定了“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大纲对60年代的日本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纲提出了自由化的基本方针，以及自由化后经济政策的方向与对策，还制定了各种商品自由化的计划。其要点如下：

首先，大纲指出，日本贸易汇兑自由化不仅仅是世界各国所

要求的，而且对于通过自由化交易而获得利益的日本本身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大纲的基本方针是：

“在慎重考虑到我国经济特殊性的同时，谋求有秩序地实施计划。自由化是加强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基础的重要方案，伴随着贸易及汇兑自由化的实施而出现的经济自由运行，将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要通过内外经济政策的实施来大力推进自由化”。

作为自由化后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对策，大纲列举了8条：

- (1) 保持经济稳定谋求高速增长。
- (2) 扩大就业提高就业流动性。
- (3) 扩大出口推进经济合作。
- (4) 积极利用自由化的有利点，谋求产业结构高度化。
- (5) 改善农林渔业的素质，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
- (6) 为改善企业素质完善环境。
- (7) 调整产业发展顺序。
- (8) 修改关税税率及关税制度。

大纲在实施上述经济政策的前提下，把各种商品的自由化时间设定成4种。

一种是尽早实现自由化。第二种是以3年为限实现自由化。第三种是上述期限内不能实现自由化的，将“极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自由化。第四种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实现自由化的。

大纲决定，特别要优先实施能降低国内产业成本的原材料进口自由化，进而实施与日本国内产品之间竞争度较低的商品自由化，并且要考虑到需求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大纲的目标是，1960年4月自由化率达到40%。3年后达

到 80% 左右,加上实施石油煤炭的自由化,自由化率将可提高到 90%。

在池田内阁下实际推进的贸易汇兑自由化以及后来佐藤内阁推进的资本自由化和追加性的贸易自由化,是整个 60 年代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它将日本经济的开放体制大大推进了一步。

自从 1949 年制定了固定单一汇率、日本恢复了自主贸易以后,日本的进口以及其他对外贸易都由政府加以严格管制。所谓贸易汇兑自由化就是为了逐渐撤销这种管制。迄今为止,日本进口商品根据商品的性质不同分别实行 3 种制度,一种是“进口分配制”(IQ 制),即由通产相分配必要的外汇。另一种是“自动分配制”(AIQ 制),即虽然也要进行进口申请,但原则上是自动接受外汇的分配。第三种是“自动承认制”(AA 制),即允许自由进口。1960 年时,占进口总额 60% 的商品是属于“进口分配制”或“自动分配制”管辖的,当时的自由化政策目标是,至 1963 年使 80~90% 的进口商品适用“自动承认制”。

在贸易外的外汇使用方面,例如对去海外时所带出的外汇额、向国外的汇款等,过去都加以严格地限制。今后对贸易外的这类外汇限制也要逐渐缓和或者撤销。

贸易自由化的背景

这一时期贸易汇兑自由化骤然受到重视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由于日本的迅速复兴和增长,加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为此其他发达国家开始要求日本撤销对贸易汇兑的限制。

日本从战后后进国的贫穷状态出发,首先实现了中进国式的产业发展,后来又一举进入了发达国的行列。其他发达国家认为日本已没有理由继续对贸易及汇兑实行限制。50 年代当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及“关税贸易总协定”时,上述两国际组织

因日本国际收支不均衡,暂时允许日本对外贸、汇兑实行限制措施,但是要求日本今后尽可能早地撤销。

第二,西欧主要发达国家在实现战后复兴后都已经推进了贸易自由化。

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的成员国,在战后复兴后,都在欧洲区域内实行了贸易自由化,并且对美贸易等也在努力推进自由化。

1950年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提出了欧洲煤炭钢铁产业共同管理的方案。1951年4月,法国、西德、意大利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结成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ECSC)。成立ECSC主要是为了防止过去一直是法德之间发生战争的导火线——在两国国境地带的煤炭钢铁产业被德国垄断的现象再次复活,是为了结束国家之间的纠纷,通过取消区域内的关税、赋税金、数量限制、各种差别待遇以及国家补助金等等,来形成欧洲的单一市场。1957年3月,上述六国又结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于1958年1月正式成立。它是为了在共同体国家之间实现贸易自由化、取消关税。与此同时,还成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原子能联营)。

为了对抗EEC等的成立,英国与瑞典、挪威、丹麦、奥地利、瑞士及葡萄牙于1959年11月结成了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EFTA也谋求在区域内实现贸易自由化及降低关税,但是EEC还实行了对外贸易统一关税政策等,形成了更紧密的共同体。EFTA的实绩不如EEC,最后连领头的英国也希望加入EEC。

ECSC、EEC以及欧洲原子能联营等3个组织于1967年7月合并为欧洲共同体(EC)。1973年,英国、丹麦及爱尔兰加入了EC,1981年希腊也加入了EC。

EEC优先在区域内实行贸易自由化,从而区别于同美国、日

本的贸易。不过EEC并非如战前那样的由某个特定的国家支配、主导的封闭集团，而是在参加国对等合作的基础上推进区域内经济统一，并且对区域外贸易也逐渐实行自由化。这是超越原有国境实现经济合作的划时代的举动。这也是欧洲国民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惨祸后，为了克服历史上的对立，希望首先通过经济合作、继而走向政治合作而进行尝试的第一步。

EEC的结成也表明了战后被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丧失了殖民地、痛感自己的威信和力量下降的欧洲经济重建的努力。欧洲各国的国内市场对于战后发展起来的产业来说是太狭小了。在汽车、石油化学、电气机械等大批量生产的重化学工业的许多领域里，无论是欧洲本身的企业还是投资于欧洲的美国企业，都期待欧洲能成为巨大的市场。这也是促进经济合作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发达国家一方面推进经济组织化，同时另一方面在组织化的前提下出现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化的动向。欧洲经济合作的动向就是以国际组织再编成的形式展现了这一倾向。

1958年12月，根据欧洲货币协定，恢复了西欧各国的货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反映了在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中西欧货币地位的提高，表明了西欧货币正在获得作为国际通货进行流通的可能性。西欧发达国家正在朝着国际交易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上述动向对于正在赶超西欧、踏进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来说，自然成了迫使日本也实行贸易、汇兑自由化的巨大压力。

第三，战后确保了压倒优势的美国地位相对下降，并开始动摇。

美国在战前与战后都有大幅度的贸易黑字，积累了大量资

金,并用贸易上的黑字扩大对外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企业。但是,由于西欧和日本的复兴与发展,美国的优势地位开始动摇。为此,美国开始要求其他发达国家也实行贸易自由化。

美国的对日要求

在以IMF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美元对于各国的货币当局来说,它是保证能与黄金交换的基轴通货,因此各国都努力减少国际收支赤字,增加黑字,从而确保美元。战后初期,西欧及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很弱,为贸易赤字而苦恼的国家很多。这些国家都存在“美元不足”的问题。可是随着这些国家产业合理化的进行以及出口的增加,美国反而出现了“美元外流”的问题。美国在此状况下,开始要求国际贸易条件要平等,并对西欧及日本限制美国商品进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美国的自由化要求特别集中于日本身上。

这是由于,其一,欧洲各国先于日本推进了对美元地区的贸易自由化。

看一下OEEC的进口自由化率,其美元区域自由化率虽然落后于区域内部的自由化,但是1960年也已经达到83%。

其二,撇开西欧不说,日本在当时是取得产业发展成功的唯一国家。

1959年11月在东京召开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大会上,美国代表威胁说:“日本限制美元区域的商品进口,实行差别待遇。现在日本如不及早对大豆、生铁等十种商品实行进口自由化,美国将决定对日本商品实行进口分配制。”在这种压力下,日本政府当月就实施了第一次缓和进口限制措施。同年12月和1960年的1月,又分别采取了第二次与第三次的缓和进口限制措施。由此日本的进口自由化率从30%提高到了40%。但是这种程度

的自由化并不能使美国满意。日本如果仍然坚持对进口及其他交易实行限制措施,日本在国际上就将陷于孤立,对方国对于日本的出口就会扩大差别限制。

1960年6月的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就是在这些背景下决定的。结果,日本一举推进了进口自由化。日本自由化原比欧洲落后,但却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而且不象欧洲那样带有区域性差别,而具备整体自由化的特征。虽然日本也部分采取“差别自由化”,即对限制日本产品进口的国家推迟实行自由化,但这是作为要求对方国取消对日产品进口差别限制的手段来利用的,从整体来说,日本并不实行地区差别化,而是一举推进了自由化。

自由化商品在日本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在日本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时的1955年仅仅只有16%,到1960年也只有40%左右,岸信介内阁的“自由化计划”决定3年后(1963年)自由化率达到80—90%。池田内阁时代的1961年9月26日,在促进贸易汇兑自由化的阁僚会议上,决定提前实现贸易自由化计划,于1962年10月1日达到90%自由化。

这一目标基本实现。进口自由化率1963年底达到92%,1964年底以后又达到93%。佐藤内阁时代的1970年以后实施了追加自由化措施,自由化率又提高到94%。1962年2月公布限制进口商品的方式从历来的“可以自由进口货单”改为“限制进口货单”。即日本政府原来通过公布可以自由进口的商品来表明其余商品都受限制,现在日本政府改为通过公布限制进口商品来表明其余的全部实行自由化。1963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理事会通过决议,劝告日本从第14条款国转为第8条款国,日本藏相田中角荣表示接受。

IMF规章第8条规定,废止经常交易时的汇兑限制,取消差

别性的通货措施，对外国拥有的本国通货余额具有恢复汇兑之义务。规章第 14 条规定，以与IMF当局缔结年次协议为条件，允许其因国际收支上的原因，在过渡期实施例外措施。日本是适用第 14 条的，但IMF理事会已劝告日本。1964年 4 月，日本成为第 8 条款国。

关税贸易总协定也要求日本转为该协定第 11 条款国，禁止用国际收支上的理由，实行贸易限制。日本政府于 1963 年 2 月向关税贸易总协定理事会通告决定转为第 11 条款国。

1963年 7 月，由OEEC转变而来的OECD（经济合作开发组织，西欧主要国和美国及加拿大等组成，1961年 9 月成立）理事会批准日本加入OECD（1964年 4 月正式加入）。

1963年，日本为准备转向IMF第 8 条款国以及加盟OECD，阁僚会上决定对贸易外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采取大幅度自由化措施。对去海外用外汇、进口影片等需要的外币汇款、雇用外国运动员以及其他工作者所需的外汇支付等的限制都开始缓解，对引进外资后向国外汇款的限制也开始缓解或废止。

贸易自由化的对应

自由化成了日本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对等交往的基本前提。同时它也成了日本推进企业改善素质、持续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政策。

随着日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化，日本国际收支状况也开始发生变化。单纯用金额来表示通关实绩的进出口差额（赤字）在 60 年代上半期虽然减少不多，但由于出口规模的扩大，赤字确实相对减少了。尽管迅速地实行了进口自由化，但是日本的对外贸易在 60 年代却得到了改善。从 60 年代后半期至 70 年代前半期日本进出口差额转成了黑字。

日本政府的进口自由化政策最终取得了成功。

第一,它改善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创造了有利于日本出口的国际环境。

第二,它推进了产业合理化与技术革新,活跃了投资,提高了经济增长率,进而强化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60年代后半期日本对外贸易的变化,就是自由化这一积极的行动改善了日本企业素质的结果。

然而,当自由化计划刚出台时,产业界的反应是相当复杂的。产业界的领导层认为,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的大趋势”,如果拒绝,日本本身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就可能受到阻碍,因此承认自由贸易的利益,原则上赞成自由化。但是,在各个具体企业,都担心同外国产品竞争激化,希望尽可能拖延实施自由化政策。这种态度被称为“总体赞成,具体反对”。在贸易汇兑自由化计划大纲中也相应提出了一些对策,例如“为了改善企业素质,将努力完善企业环境”、“进行产业发展顺序的整顿”等。日本通产省主张,为了适应自由化,日本产业要强化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再编成”,合并大企业,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通产省的这些对策符合各企业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欢迎。但是同时企业界也出现了戒备心理,担心通产省的上述政策实施后,会导致政府再次对好不容易加强了自主性的民间企业恢复与加强过去的官僚统制。

日本对进口的统制始于1931年的“满洲事变”。它从战时开始一直到战后的复兴期和增长期,整整延续了约30年。正因为如此,当它要向开放经济体制转化之时,许多经济组织表现了巨大的不安。正如鹤田俊正所说:“日本经济长期浸泡在封闭经济体制之中,因此面对贸易自由化,当时的政府、官员及各政党、经营者、工会等等都担心价廉物美的海外产品纷纷涌入日本市场后,

会使日本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激化，众多日本企业在竞争中将被击败被淘汰。”（鹤田俊正《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P.86）

产业再编成

通产省认为，日本的主要产业存在着严重的“过度竞争”倾向，企业规模过小，日本国内市场被外国商品席卷的危险性很大，为此应提倡“产业再编成”，积极建立日本独特的产业体制。通产省认为，为了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推进企业协作和合并，扩大企业规模，就必须发挥政府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政府如不加强指导，就难于制止民间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就难于建立起能充分对抗外国企业的产业体制。并且认为，在进行企业合并及建立强大卡特尔的时候将遇到违反垄断禁止法问题，这也需要政府进行诱导。

日本的垄断禁止法经过多次修改限制已得到了缓解，为了推行产业合理化，还制定了不少其他法律来保证不沿用垄断禁止法。因此在政府行政指导的“庇护”下，日本的卡特尔广泛存在。尽管如此通产省提倡的仅仅以民间为主体进行实为企业再编成的做法，仍然违反垄断禁止法，并很可能会成为政治性社会性问题。但是如果以适应贸易自由化为理由，政府支援企业的合并及卡特尔，也许就能够回避上述问题。

通产省从以上立场出发，鼓吹官民协调。产业合理化计划比预想进展得快，技术革新也远远超过通产省的统制与诱导而迅速地进行着。因此在60年代通产省的发言权在减弱。日本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体制的基本特征从复兴时期的官员主导型变为自立时期的官民协调型，最后又变为增长时期的民间主导型。通产省就是想通过贸易自由化来恢复自己的指导力。

产业再编成政策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查会的

“产业结构政策的方向与课题”的答询中(1963年11月29日)。

“在产业高度化的过程中，虽然期待大企业能发挥骨干作用，但是在日本还可以列举出不少还未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例如，汽车、石油化学、电子计算机、特殊钢、高级机床及大容量火力发电机等等，……这些产业急需强化国际竞争力，为此首先要改变产业体制。其具体课题是(1)规格的整理统一。(2)生产领域的调整。(3)生产的共同化。(4)企业的集中合并等。并且要求金融机关充分理解这些产业所必须进行的体制改革，并给予协助。

生产的协同化、企业的集中合并等是应该由企业自主进行决定的，但是当它符合国民经济对产业的要求时，政府就应该积极地协作，除了采取税制、金融上的措施以外，对于合理化卡特尔的组成以及促进合并的举动，只要在必要的范围内，即使有所违反垄断禁止法，也应加以适当照顾。”

通产省于1963年2月发表了“强化国际竞争力法案”。经济阁僚恳谈会考虑到在野党的反对以及产业界中存在担忧政府统制强化的空气，遂将这法案改称“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特振法)，并决定法案时效5年。法案于3月向国会提交，但审议未了，成了废案。1964年1月再次向国会提交该法案，仍然审议未了，又以废案告终。

在产业界也存在着灵活地运用垄断禁止法、推进企业合并、克服过度竞争的愿望。不过许多经营者担心政府会强行介入，这已经由特振法所显示出来。为此通产省在唱独角戏，未得到产业界的强大支援。在通产省内部也有人批评特振法的民族主义倾向。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正当的，并赞成产业再编成。但是当时不少具有影响的现代经济学家以及一部分自由主义的马克思经济学家，却从各自的经济观点出发，原则上

支持自由化政策，并反对用产业再编来形成限制竞争的市场结构。

全体在野党势力都反对自由化。社会党担心自由化会打击日本产业，从而增加失业，采取了尽可能延期实行自由化的立场。社会党这时还提倡进行“使用国产品运动”。共产党也反对自由化，认为“贸易汇兑自由化是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阴谋”。在野党势力还将特振法看作是“强化垄断体制”而加以反对。

贸易自由化的根据

在历史上，先进国总是最热心的自由贸易推进者，因为它们具有靠自由贸易才能受益的产业。在战后世界，美国采取了最热心的自由贸易立场，就是因为美国的产业具有超群的竞争力。

不过，对于西欧及日本来说，自由贸易正成为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过去，日本为保护本国产业对外国的商品、技术以及资本的进口都加以严格的限制，而在出口方面，由于美国等国家努力维持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日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如今，日本的经济地位提高了，日本也迎来了必须付出相应代价才能扩大出口的自由贸易时代，不如此日本经济就难以继续保持进一步的生长。

反对贸易自由化是不现实的，是非建设性的。其本质是保守的政策。执政党与政府官员受世界大势所驱，不得不采取开放体制立场，而号称革新势力的在野党反而采取保守的态度。这反映了作为革新势力主流的社会主义派僵硬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陈旧，同时也表明了原来的政治基础是打破现状的一股势力，现正在慢慢成为保护既存体制中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

自由化政策在6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政策。这是

因为：

第一，自由贸易能加强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国际交流，创造有利于繁荣和平的环境。

第二，自由化能进一步推进技术革新，加速经济增长，从而能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

第三，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日本市场自由地展开竞争，是符合作为消费者的国民利益的。

当然，为了确保能得到上述利益，就需要日本的主要产业中有实力的部分通过与外国企业竞争后能继续保持一定的市场。如果本国产业太脆弱，那就有可能使本国主要的产业部门都被外国企业占领。

以通产省为中心的产业再编成论低估了日本产业的实力。当时日本的企业与美国等实力雄厚企业相比规模是小了些，但是日本的企业正在迅速发展。由于技术革新，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也在急剧地加强。实施低估日本产业实力、高估自由化影响的产业再编成政策，结果忽视了在60年代最需要干的最基础的政策体系的再编。

在已经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60年代，废弃优先进行产业合理化和资本积累的政策体系，而准备用能对付伴之增长而来的新问题的新政策体系，那是十分必要的。不是优待产业，而是用适当的办法管理产业正成了必须完成的课题。为了阻止产业活动给社会带来不利的方面，就需要确立企业必须遵守的社会法则。例如对垄断禁止政策的再评价，制定保护环境健康以及安全的防公害政策，建立消费者保护政策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以贸易自由化为由缓和垄断禁止政策，其方向是错误的。禁止垄断政策以及保全环境政策等所代表的法制型政策，随着自由化的实施，它将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因为这些社会法则无论

对于本国资本还是对于外国资本来说，都是企业必须共同遵守的规章。确立了法制型的政策，就能不问资本的国籍，给任何企业都附加上条件，不允许企业有损害国民利益的活动，并要求企业公正分配利润。

只有对产业复兴、产业合理化以及经济增长优先政策等从根本上进行再研究、并从中拔出脚来，才有可能建设性地对待60年代的自由化问题。自由化成为现实的政策这一事实，反映了日本技术革新和产业成长的成功，意味着日本经济已进入了要将自由化作为现实政策的阶段。正因为如此，在这一新阶段中，必须重新研究整个政策体系。不是单搞“产业再编成”，而是必须进行“政策再编成”。

日本政府高估了自由化的消极影响，过低估计了其积极影响，结果，它以自由化为由固执地坚持产业优先政策。“自由化=上黑船”的观点推迟了日本经济政策的转变，延误了确立防止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病扩大的政策。

5. 国土计划与地区开发

地区开发政策

60年代日本政府经济政策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国土计划和地区开发。

战后的国土计划早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就由内务省开始研究。由于战败，日本一下子丧失了原有的旧殖民地以及占领地区，复员军人以及从朝鲜“满洲”及其他地方归国的人大增，使日本人口急速膨胀，因而不得不急急忙忙搞经济恢复。内务省早在1945年9月就编制好了国土计划案，一年后的1946年9月发表了“复兴国土计划纲要”。后来内务省被废止（1947年12

月),国土计划的工作移交经济安定本部。

经济安定本部首先确立了推进国土行政的基本法则。1950年5月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其中揭示了国土开发的目的是,“综合利用、开发、保全国土,谋求产业布局的适当化,以资共同提高社会福利。”并且规定设置国土综合审议会,编制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都道府县及地方综合开发计划、以及特定地区综合开发计划等。

在50年代,就已尝试编制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但是未得到内阁会议批准。

这一时期地区开发计划的重点是“特定地区综合开发计划”。

“特定地区综合开发计划”是根据确立开发目标的国土综合开发法的规定而编制的开发计划。所谓“特定地区”,是指资源开发不充分地区、需要特别预防灾害的地区、在城市及其邻近地区需要特别建设或整顿的地区等等。它们要得到政府承认确实必要后,方可被指定为特定地区。根据国土综合开发法的规定,1951年12月19个地区、1957年10月又有3个地区分别被指定为特定地区。从1953至1958年期间,各个特定地区的计划分别得到内阁批准。被指定的地区是:

北上、阿仁田泽、最上、天龙东三河、大山出云、北九州、阿苏、南九州、芸北、能登、锦川、四国西南、只见、木曾、飞驒、吉野熊野、那贺川、利根(以上为1951年指定)。仙盐、北奥羽、十和田岩木川(以上为1957年指定)。

此外,政府还制定了东北开发促进法(1957年)。其后,到1960年为止,根据议会立法,又制定了九州、四国、北陆及中国地方等地的开发促进法。

这一时期的地区开发目标主要是以治山治水为中心的国土

保全以及电力、农林水产等资源的开发,部分也包含了完备工业布局条件的。这是为了复兴因战时经济而荒废的国土,是为了防治频繁爆发的风灾水害等,是为了克服粮食不足、重建农林水产业。而且,作为能源政策,推进水力发电等也成了紧急课题。

在制定特定地区开发政策的同时,为解决既成工业地带的工业用地、用水不足、以及运输力的瓶颈问题等,也开始重视充实产业基础的政策。在政府预算中,与此关连的公共事业支出增加了。不过,随着产业合理化投资的扩大,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要求用新工业区建设新型工厂的动向日益明显,政府也渐渐认识到促进新兴工业地带开发的重要性。

到了60年代,地区开发政策的重点移向新工业地带的形成和工厂的再配置,开始推进能适应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增长的开发。以完备产业基础为重点的社会资本投资也从既存工业地带扩展到了新工业地带。进而为了完备与扩充交通体系(它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这方面的投资也飞跃增加,积极推进了新干线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计划的实施。

这些地区开发计划的实施,一方面自然是由于战后复兴和经济增长后,既成工业地带的用地出现饱和状态,为了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帮助地方形成新的工业地带。但是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成为现实,政府开始意识到产业先进地区与后进地区(低开发地区)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强烈盼望将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给地方的要求。

即使从保障最低国民生活水平的观点出发,对工业过疏地区也需要有能确保生活基础的最低投资,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整个60和70年代,人均行政支出及行政投资数,在大都市明显地少,而地方明显地增多,造成了地区的不均衡的扩大。这

种不均衡是由于财政上的中央集权主义以及地方交付税金和各种补助金的分发而造成的。它对于维持保守势力的政治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人口迅速地向大都市集中，但是日本的政治制度中依然存在着山村渔乡议员过多的现象。各选举区的议员定数没有改动过，因此出现了“得票重点”在山村渔乡，而不在大都市的情形。这种不均衡对于执政党保守势力来说成了有利的条件。为此政治家们都懒于采取纠正这一偏差的措施。它减弱了人们对议会制民主主义的信赖感。这也是将公共投资分配给地方时往往相对偏重于过疏地区的主要原因。

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在上述背景下，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0年12月内阁通过）已经注意到城市问题和地区间差别的问题，即所谓过密过疏问题，提出了制定国土计划与地区开发计划的重要性。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强调了适当配置产业和纠正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将工业开发的重点移向既成四大工业地带以外的地区和确立综合交通体系等政策。

对于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所提出的问题，有人认为其重点太偏向于产业开发和经济合理性了，担心政府政策会忽视目前产业开发还很困难的地区。代表着后进地区的政治势力强烈要求纠正这种偏差，政府与执政党也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池田内阁在决定“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时，还准备了题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设想”的纲要性文件，作为“倍增计划”的附件。其中写道：

“为了促进特别落后地区（包括南九州、西九州、山阴、四国

南部等)的开发及缩小收入差别,要尽快制定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努力去开发落后地区的资源。进而要采取税制金融、公共投资补助等特别措施,并且要研究该地区所需要的立法,要将适当的工业分散到这些地区,从而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福利,并克服其后进性。”

“产业的适当配置,在我国高速增长过程中非要长期推行下去。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社会资本的效益、尊重经济合理性等,不言而喻都是很重要的,不过由此而带来地区间差别的扩大则是不允许的。因此要在尊重经济合理性的同时,防止地区差别扩大。为此在对各个地区进行公共投资时,必须根据各地区的特殊性,有弹性地调整投融资的比重,从而在提高公共投资效益的同时,缩小地区间差别。”

政府依据上述设想决定了推进国土综合开发的方针。并于1962年10月内阁通过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全总计划”(后来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国土计划,改称为“一全总”)是根据1950年制定的全国综合开发法而编制的第一部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全总计划是从重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所指出的大都市过大过密化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角度进行探讨、编制的。全总计划基于要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工业”的配置这一认识,决定推进工厂分散政策。分散时并不是“全面撒播型”的散开,而是要立足于长远的观点,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考虑最大的开发效益,按着开发效益的高低顺序集中地推进。

全总计划在“前言”中写下了以下原则。

(1) 对于住宅、上下水道、交通、文教以及保健卫生等与国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公共设施,不能仅仅讲究经济效益,而是要把重点放在缩小地区差别上。

(2) 对于道路、港湾、铁道、用水等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公共

基础设施也必须从缩小地区差别的观点出发来进行。但是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当前的贸易自由化趋势,还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综合考虑对产业布局作适应的调整。

全总计划指出了两个目标,一是“缩小地区差别”,二是“扩充工业基础”。这是考虑到发展潜在可能性很大的太平洋带状地区比较容易使上述两目标都能实现。因为已有工业地带饱和后向新工业地带发展,就会促进新工业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它们与三大都市圈的差别。但是对于那些不容易发展工业化的地区来说,就不能按照贸易自由化等经济目标、靠工业的开发来缩小地区差别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总计划把全国划分成下述几个地区,分别实施不同的政策,推行了考虑到各个地区不同“特性”的“据点开发”方式。

(1) 过密地区。这主要是指京浜、阪神两大既存都市地区,北九州工业地带也属于此类。

(2) 整備地区。这是指过密地区以外的、“较多地享受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的外部经济利益的地区”。为了诱导工业向这些地区分散,计划准备在这些地区进行工业基础整備。这些地区包含关东、东海、近畿、北陆等。

(3) 开发地区。即上述两类以外的地区。为积极促进这类地区的开发,将进行基础完善工作,北海道、东北、中国、四国、九州等属于该类。

全总计划的方针是,对于上述三类地区,将在整備地区和开发地区中选定大规模工业开发地区以及大规模地方开发城市等,以推进重点开发。

工业据点开发和过疏地区对策

在编制全总计划前后,制定并公布了有关促进地区开发的

一系列法律。

其中有“低开发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1961年11月公布)、“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1962年5月公布)、“工业整備特别地区整備促进法”(1964年7月公布)。

上述法律中，“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布局由当时负责国土计划与地区开发的经济企划厅编制。

从1964至1966年之间，政府依据“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先后指定道央、八户、秋田湾、仙台湾、常磐郡山、新泻、松本諏访、富山高冈、冈山县南、中海、德岛、东予、大分、日向延冈、不知火有明、大牟田等15个地区为新产业都市。在此之前，政府对全国44个地区进行了基础调查，新产业都市就是从中选出的。

1963年7月，政府对上述15个新产业都市候选区首先内定了13个，同时又从其他基础调查地区中选了鹿岛、东骏河湾、东三河、播磨、备后及周南等6个地区指定为“工业整備特别地区”(工特地区)。这些地区都位于太平洋带状地带，工业布局条件优越、开发的可能性大，所以认为有必要迅速完备其公共设施。这些工业整備特别地区同新产业都市一样，将得到政府的资助。1964年，根据议员提案，制定、公布了工业整備特别地区整備促进法。

对于在编制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时特别注意到的后进地区开发问题，在上述两法律成立之前，就已制定了“低开发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并决定以它为主。根据这部法律，从1962至1966年之间，先后3次指定了116个地区。被指定地区中的一部分后来被合并或者又重新被指定为新产业都市。到1973年4月1日，被指定为低开发地区的有146个市362个町39个村，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0.2%。对于低开发区域的工业开发区，虽未象

新产业都市和土特地区那样制定开发计划，但是在税制上采取了特别优惠措施，奖励工厂前往该地区。

此外，50年代以来，又先后制定了以下有关特殊地区对策的特别措施法。政府依据这些法律来实施特别措施。大部分特别措施都是根据议员立法而定的。

特殊土壤地带灾害防除及振兴临时措施法(1952年)、离岛振兴法(1953年)、奄美群岛振兴特别措施法(1954年)、台风常袭地带的灾害防除特别措施法(1958年)、产煤地区振兴临时措施法(1961年)、暴雪地带对策特别措施法(1962年)、山村振兴法(1965年)、小笠原诸岛复兴特别措施法(1969年)、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1970年)。

上述措施中，奄美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对策是在这些地区回归到日本以后才采用的。产煤地区振兴临时措施法是作为煤炭产业夕阳化对策的一环而制定的，它由通产省负责实施。

地区结构的大变动

政府决定下力气抓国土计划和地区开发后，地方自治体的有关人士就开始反复起劲地向政府热心陈述和要求，希望自己所在地区被编入开发指定地区，从而能得到政府的资助来推进本地区的开发。国会议员为了帮助自己出身地区的开发而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实行议员立法。由于这种地区开发的狂热，政府需要资助的地区大大增加。

这些地区开发政策确实给予日本列岛的地区经济结构以重大影响。不过，对日本生产力和人口在空间的配置有决定影响的还是经济和生活的现代化、以及工业化为主轴的经济高速增长本身。

60年代是日本国土结构发生大变化的时代。

第一，人口急剧地向巨大都市地区流入，都市化飞跃地发展。

第二，以太平洋带状地区为中心，扩大了重化学工业为首的工业地区，东京湾沿岸的京叶工业地带，伊势湾沿岸的名古屋南部及四日市，从大阪湾至濑户内海沿岸全区(土界、播磨、水岛、岩国、福山、新居浜等)形成了新的工业地带。

第三，上述地区以外的地方人口大量流出，许多地区出现了过疏化，地方衰退，山乡僻壤的生活基础崩溃。

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三大都市圈及既成工业地带以外的地区中，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工业地带的地方自治体和当地居民们都希望本地区能被指定为新产业都市或工业整备特别地区，从而能在政府的帮助下推进工业化，吸引企业家来建厂。此外，一些地区为了完善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阻止人口外流，也强烈要求政府资助。政府根据防止过密化和过疏化的原则，对三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区也非常优惠。不过，事实上在这期间流向三大都市圈尤其是流向东京的人口反而更加多了。结果，过密化问题更加严重，公害与交通事故激增。无论是形成新工业地带所作的努力还是防止过疏化对策，都没有决定性地制止住这种巨大都市中心的发展倾向。人口向大都市集中的最基本要因还在于信息、权力、文化诸因素在发挥作用，以及与此相关连的服务经济化、管理经略化促进了城市化。中央政府机构和大企业的总公司集中在东京，是人口向东京流入的最基本因素。

东京人口过密并非因为东京有工厂。战后，信息、权力及文化功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才导致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东京(包括东京圈)。在地方城市中，凡是信息、权力、文化功能集中的地方中枢城市(如札幌、仙台、金泽、冈山、广岛、福冈、熊本等)比起一般城市来，人口都急速地膨胀。即使是包括新产业都市在

内的开发地区，人口也未能集中，最终未形成真正都市型的城市。

1920年(大正九年)日本的人口为 5596 万,其中东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等三大都市圈里居住了 1864 万人,占总人口 33.3%。此时三大都市圈还未完全都市化,人口基本集中在东京市、横浜市、大阪市、京都市、神户市、名古屋市等市区中。

三大都市圈中的人口比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1940年上升到39.3%,因战灾,在战后 1950 年下降到34.7%。不过,从此以后就急剧地持续上升,1980年已达到47.8%。1980年日本总人口为 1 亿 1706 万人,约是 1920 年的 1.1 倍,其中几乎一半人口都居住在三大都市圈内。三大都市圈内的人口1980年约是1920年的 2 倍。

战后人口流向的重要特征是,进一步向东京集中。1920年在三大都市圈里,东京圈所占的人口比重为41.2%,这一比重到 1940 年提高到44.3%。战后该比重进一步上升,1970 年达到50.0%,1980年达51.3%。从战前的 1920 至 1940 年的 20 年间,三大都市圈内的人口增加了 1009 万人,其中东京圈增加506 万人,约占50%。战后的 1950 至 1980 年的 30 年间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增加 2671 万,其中东京圈增加 1565 万,约占59%。在三大都市圈中,东京圈的地位相对提高,大阪圈和名古屋圈的地位相对下降。

过疏化的发展

与上述三大都市圈的人口激增相对应,地方圈尤其是过疏地区的人口明显地迅速减少。人口构成比重中,三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圈人口的上升倾向与地方圈特别是过疏地区人口的下降倾向早在战前就已出现,但是其发展速度乃是从战后开始加快

的。

如把全国的都道府县区分成三大都市圈和地方圈、进而再把地方圈区分成中间地区和过疏地区，就可以看到除了战时的1940到1950年，其余年份在地方圈中，无论是中间地区还是过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都比全国平均的低得多。不过，在战前远未出现过负数。到了60年代，过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4.9%。看一下战后每5年的人口增长率，过疏地区在5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60年代都在下降，整个地方圈的人口增长率在60年代上半期开始出现负数。从1960至1965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人口增长率都特别高。

战前，即使是过疏地区，从整体上讲每10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从未出现过负数。战后，整个过疏地区都呈负数。战前的人口增长率比战后高虽然是个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战后的高经济增长率加速了国土构造的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是人口流动最激烈的时代，看一下各都道府县的变化就更清楚了。在战前30年代，有4个县的人口增长率曾有负数记录，总的说大都市圈以外的县人口增长率较低。随着准战时和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开始增加。到了战后这种流动更加激烈。5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率呈负数的县增多，而且下降幅度很大。特别是60年代，以下25个县的人口都减少了(按减少数的多少排序)。

岛根、佐贺、鹿儿岛、高知、德岛、大分、山形、熊本、爱媛、长崎、鸟取、山梨、秋田、宫崎、香川、山口、长野、新泻、冈山、栃木、岩手、福岛、福井、茨城、滋贺。

其中岛根、佐贺二县在10年间减少了10%以上。减少率在5%以上的有15个县。与此相反，50和60年代，东京、大阪、神奈川、埼玉、千叶等人口增长率异常地高。属于东京圈的神奈

川、埼玉、千叶等三县在 10 年间人口激增 50%。到了 70 年代，这一变动开始缓慢。50 和 60 年代是日本近代历史上地区结构变动最激烈的时期。

它也是日本国民的生活结构和生活意识发生大变化的时代。日本从半农业国型的中进工业国一举发展为发达工业国。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机会，使人口向城市流动更加容易。青少年们从学校一毕业，就离开山乡渔村去城市求职。中年农业者们也以“出村打工”形式，季节性地去城市工作。在山乡渔村，不仅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同时由于电视的普及及农村旅游的发展，城市的生活结构和生活意识也开始渗透到农村。从而更加促进了人口向大都市流动。

这种流动对于国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也有重大影响。不过，这些国民的意识并不能一举变为都市化的市民意识。在急速膨胀的都市居民中，大多数人是在山乡渔村长大的，和那里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意识、价值观以及追求要完全转化为都市化市民型的，尚须相当时日。

第十二章 社会不平衡和环境破坏

1. 佐藤内阁

从池田到佐藤

1964年9月9日，池田首相因喉头部感觉异常住进国立癌症中心。医疗小组诊断为癌症，但在正式对外公布时，却称其为“早期癌症”。9月30日，池田带病去皇宫出席了常陆宫(皇太子之弟)的结婚典礼，10月10日，又出席了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但是，10月25日池田听从周围的劝告，表明了辞职的意向。关于接替人选，党内围绕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和干事长三木武夫进行了协商，最后以池田推荐的形式选出了佐藤荣作。

11月9日，池田内阁总辞职，自由民主党的参、众两院议员总会决定推选佐藤荣作为后任总裁。同日，在临时国会上进行了下任首相指名投票，结果佐藤当选。在12月1日的党的大会上，佐藤又被正式选举为自民党总裁。

63岁的佐藤荣作生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1948年担任运输省次官并加入吉田茂的民主自由党，还担任了第二届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佐藤与池田是熊本县旧制第五高中的同窗，他们作为战后由吉田茂培养出来的官僚出身的政治家而活跃于50年代。1954年发生“造船大案”^①时，由于法务大臣犬养健的干预，身为自由党干事长的佐藤才免遭逮捕。吉田内阁垮台后，佐藤

在吉田问题上与鸠山产生分歧，他是当时没有参加保守党派联合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岸信介内阁成立后，佐藤加入了自民党，组成佐藤派，并出任大藏省大臣。在池田内阁中他也曾担任过通产大臣，但在1964年7月10日自民党大会的总裁选举中，他作为后选人与决心三连任的池田对抗，也成为候选人，并获得了高于预料的票数。当时得票情况是：池田得242票，佐藤得160票，藤山爱一郎得72票。池田虽然实现了三连任，但其票数仅仅刚过半数。

佐藤在池田内阁末期，就为下一届政府准备了独特的政策。他在总裁选举时也发言说：“过于重视高速增长，而中小企业对策和农业对策没有跟上”；“虽然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但却并没有展开具有真正自主性的外交”，对池田的内政、外交进行了批评。进入60年代，出乎意料的高速增长虽然得以实现，但在另一方面，消费物价开始上升，人们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强。经济增长正在给国民生活带来大动荡。自民党的政治家中间也开始出现担心经济增长速度过快、社会动荡过于剧烈的倾向。对此，佐藤认为，必须迅速推进技术革新、产业现代化、开发建设新产业城市等，以对付剧烈的社会动荡，并提倡“社会开发”，以取代池田的“经济增长”。佐藤在1964年11月由于池田生病而意外地坐上第一把交椅时强调“宽容、对话、调和”，并说必须“纠正高速增长中的偏差”和进行“社会开发”。同时，他将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威信作为自己的目标。关于对外政策，佐藤说：“日本与韩国的交涉以及中共问题是

① 1953年，日本为了重建在战争中受重创的商船队，制定了造船计划和造船利息补给法。在此前后，企业为得到造船贷款和利息优惠，对负责造船的政府运输省官员进行了行贿。检察当局在调查后决定逮捕当时自民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在吉田茂对法务大臣和检察总长进行干预后，佐藤免于逮捕。

——译注

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摆在佐藤内阁面前的重要问题”。

当时，佐藤在人事和政策方面受到限制。池田把暂时保持池田内阁的政策和在1965年7月参议院选举以前不替换内阁成员及党的领导干部作为把总理和总裁的地位让给佐藤的条件。因此，第一届佐藤内阁除了将官房长官由池田派的铃木善幸替换为佐藤派的桥本登美三郎外，几乎是池田内阁时代的原班人马。

日美会谈与大选

佐藤内阁首先面临的是必须处理池田内阁时代的几个悬案。

在对美关系上，重要的是调整对华政策和在冲绳、小笠原问题上的政策。

战争结束已近20年，但冲绳和小笠原依然在美国的统治下。

佐藤在内阁成立后立即于1965年1月带领椎名外相、三木干事长访问了美国，并与约翰逊总统举行了会谈。约翰逊是因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遭暗杀而升任总统的，并且刚刚在1964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正式当选。在会谈中，日本方面表示：“归还冲绳和小笠原是全体日本国民的愿望”；美国方面则回答：“这些地区的美军基地对于远东的安全是重要的。希望能够出现归还的势态”。在共同声明中写道：“两国首脑认为，冲绳和小笠原的美军基地对于远东的安全是重要的”。双方仅在扩大冲绳的日美协议委员会的机能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次会谈中，还确认日美将就中国问题进行密切协商。佐藤虽然没有赞同中国是好战的，是扩张主义的这一美国的看法，

但日本本身在对华政策上与台湾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而对北京政府则表明了“政经分离”的原则下发展民间一级的交流的立场。佐藤回国后在国会上的施政纲领演说中也强调对华政策的“政经分离”原则，并明确表示没有走向邦交正常化的意向。

1965年5月，在国会审议暂告一段落时，国务大臣河野一郎建议佐藤应在7月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前建立举党体制。为此，内阁进行了调整，结果与其说确立了举党体制还不如说是确立了佐藤体制。河野本人因围绕人选问题与佐藤发生对立，没有参加内阁。大藏大臣福田赳夫、通产大臣三木武夫、经济企划厅长官藤山爱一郎等是第一次进入内阁。留任的是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内阁官房长官桥本登美三郎。干事长起用了前大藏大臣田中角荣。不久，河野一郎（1965年7月）和池田勇人（同年8月）相继去世。河野在30年代由一名《朝日新闻》记者进入政界，他与鸠山一郎、三木武吉等一起，属于和以吉田茂为核心的“官僚派”相对抗的“党人派”，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政治家。由于河野的去世，当时的政坛上失去了一位竞争总裁和总理的有力的政治家。佐藤通过重用福田赳夫、田中角荣、保利茂、爱知揆一、桥本登美三郎等亲信，同时将反主流派的三木武夫吸收入阁，这样，便确立了其长期政权的体制。

参议院议员选举于1965年7月4日举行。各党获得的席位数是：自民党71席，社会党36席，民社党3席，共产党3席。改选后的各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包括选举后入党者）与上一届（1962年7月）相比，在总数250席中，自民党143席保持不变，社会党由66席增至73席，民社党从11席减为7席，共产党4席保持不变。在上一届参议院选举后，创价学会曾占15席，1964年11月该学会会员组成公明党，在这次选举后占20席。

这次在参议院选举的全国选区中，自民党得票率最高，为

47.2%，打破历史记录，以后逐渐下降。地方选区的最高记录是（1959年的52.0%。另外，众议院选举的自民党得票率以岸信介内阁时代即1958年5月自民党成立后第一次大选时最高，为57.8%。自民党在大选中得票超过50%是到池田时代为止，到了佐藤时代降为40%左右，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看着民社党分裂后的社会党的得票率。参议院选举全国选区1962年为24.3%、地方选区1965年为32.8%、众议院选举1963年11月的29.0%分别为最高记录，以后逐渐下降。在佐藤内阁时代，自民党和社会党的得票率都逐年下降，政治上出现了多党化的状态。

参议院选举后的1965年8月19日，佐藤访问了冲绳，这是战后首相的首次访问。佐藤发言说：“只要没有实现冲绳回归祖国，那么对我国来说战后就没有结束”。^①与欢迎佐藤首相大会相对抗，冲绳回归祖国协议会组织了抗议游行，并包围了佐藤的住处。冲绳回归祖国协议会认为，佐藤内阁的冲绳政策是要将冲绳作为越南战争的基地这一现状固定化。协议会要求实现冲绳回归祖国，并提出其前提是：通过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全面撤除驻日美军基地。佐藤后来离开了被游行队伍包围的住处，住进了美军基地内的迎宾馆。

从冲绳回来后，佐藤于9月1日发起成立了冲绳问题阁僚协议会。在1966年度的预算中，对冲绳实施了与日本本土同样的义务教育费的一半由国库承担的措施，并实施了免费分发教科书和经济援助的政策。

日本、南朝鲜关系正常化

^① 此处战后指战后重建时期。——译注

佐藤内阁的另一个外交悬案是日本、南朝鲜问题。

日本、南朝鲜双方代表会谈虽然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不久的1951年10月以后就在东京举行过多次，但由于请求权问题、渔业问题和领土(竹岛)问题的纠葛，一直未取得进展。岸信介内阁时代的1958年4月双方举行了第四次日本、南朝鲜会谈(日方代表是泽田廉三)，作为岸首相的特使，矢次一夫还访问了南朝鲜，并与李承晚总统举行了会谈，但都未达成协议。这期间，岸信介内阁根据关于自由选择居住地的国际原则并按国际红十字会决定的方式，将旅居日本的朝鲜人中愿意回北朝鲜的人送回了北朝鲜，对此，南朝鲜提出了抗议，日本、南朝鲜关系就此恶化。

1960年4月，南朝鲜发生革命运动，李承晚政府垮台。取而代之的张勉内阁对调整日本、南朝鲜关系表示了积极姿态。同年9月，池田内阁的外相小坂善太郎访问了南朝鲜，并举行了双方的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是泽田)。但是，南朝鲜再次发生政变，结果，朴正熙少将于1961年7月就任南朝鲜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掌握了政权(他就任总统是1963年12月)。

1961年8月，朴正熙政府向日本提出恢复双方会谈，于是，同年10月开始举行了双方的第六次会谈(日方代表是杉道助)。11月，朴正熙主席亲自来日本，与池田首相进行了会谈。南朝鲜方面提出赔偿6亿美元的要求，而日方主张提供共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经济合作，会谈陷入僵局。在小坂以后的外相大平正芳与南朝鲜中央情报部部长金钟泌的会谈中讨论了最终方案，出现了妥协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南朝鲜国内局势不稳，会谈再次中断。1964年春，池田内阁的农林大臣赤城宗德围绕渔业问题与南朝鲜进行了会谈，但不久也告中断。

佐藤就任首相后立即着手准备恢复日本、南朝鲜会谈，并

于1964年12月举行了双方的第七次会谈（日方的首席代表是杉道助，以后为高杉晋一；南朝鲜方面是金东祚）。1965年2月椎名外相访问韩国，与朴正熙总统举行了会谈，最后，举行了“日韩基本条约”的初步签字仪式。6月22日在东京首相官邸，日本方面的椎名外相与高杉代表、南朝鲜方面的李东元外务部长官与金代表正式在“日韩基本条约”上签字。

日本、南朝鲜基本条约规定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的日本、南朝鲜合并以及在此以前缔结的旧条约一概无效，承认南朝鲜政府是如联合国决议中所指出的“是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决定互设大使馆和领事馆。除此之外，还同时签订了（1）渔业协定；（2）关于解决请求权问题与经济合作的协定；（3）关于旅日南朝鲜人地位的协定；（4）关于文化遗产与文化合作的协定。

渔业协定的签定实际取消了一直成为悬案的“李承晚水线”，协定决定在12海里的南朝鲜专辖渔业区域以外设置日本、南朝鲜共同管制水域。财产请求权也相互取消。日本答应在10年内提供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和2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年利率3.5%，7年后开始还款，还款期10年）。此外，还答应提供至少3亿美元的一般商业贷款。到当时为止，日本的对南朝鲜出口信贷中还有南朝鲜未付款部分4,573万美元，双方决定从3亿美元的对南朝鲜无偿援助中划出这部分资本，在10年中分期付清。关于旅日南朝鲜人的地位和协定规定，对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作为“日本人”来日本居住的南朝鲜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尽量采取与一般外国人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日本、南朝鲜会谈的妥协结果，苏联、北朝鲜等立即作出了反应；在国内，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势力也表示强烈反对。对1965年日本、南朝鲜基本条约的初步签订，苏联抨击道：“这是

要形成远东亚洲军事同盟,与其他国家为敌”;北朝鲜指出:“它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南朝鲜提供了必要条件”。社会党以“椎名外交对日本与亚洲的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为由,对外相提出了不信任议案。

佐藤对国内外的批评进行了反驳:“这一条约确立了永久的睦邻友好关系,而决不会发展为军事同盟”。

南朝鲜议会于8月举行了正式会议,在只有执政党参加的单独审议下批准了“日韩条约”。南朝鲜学生举行了反对批准条约的示威,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南朝鲜学生和反政府势力认为,“日韩条约”使过去朝鲜的统治者日本帝国主义能再度进入南朝鲜,因而强烈反对。以“日韩条约”为导火线,打倒朴正熙政府和反对美国军事政策的运动不断发展。面对这种情况,朴正熙政权下令封锁学校,同时,出动军队对首都汉城实施了戒严,并逮捕了学生领袖、教授以及记者等。

在日本,各在野党发生意见分歧。其中社会党和共产党对“日韩基本条约”表示反对,而民社党和公明党对日韩关系正常化原则上表示赞成,但对条约和协定中的疑点要求追查。在国会外,总评与全学联举行了示威活动。社会党和总评为了再现5年前的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方式,组织了全国性的反对运动。在此背景下,1965年11月12日自民党以社会党妨碍审议为由,单独在众议院强行通过了“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其他协定。接着参议院也在只有自民党和民社党议员出席的大会上通过和批准了这些协议。同月17日,椎名外相一行访问南朝鲜,交换了批准书。

佐藤内阁与对华政策

佐藤在对华问题上一开始也表示了积极态度。佐藤内阁在

政府成立初期就一面强调“政经分离”原则，一面试图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1965年4月中旬，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召开了亚非会议10周年纪念典礼，佐藤派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出席了这次会议。川岛在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的斡旋下与中国周恩来总理成功地进行了会谈，双方原则上同意定期举行部长级会晤。

双方商定，预定于6月2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上再次举行会谈。佐藤为此准备派遣椎名外相出席。但这时，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没有实现。由此也失去了一次日中两国政府接触的机会。此后，佐藤没有再为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作出积极的努力。

佐藤虽然希望改善在岸信介内阁时期极度恶化的日中关系，但没有积极向邦交正常化发展的想法。佐藤内阁在组阁后不久的1964年11月21日拒绝了为出席日本共产党第九次大会而希望来日本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入境。在以后，日本也坚持对向中国的出口不批准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方针。

针对联合国要求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代表的成员国不断增多的局面，美国从1961年起，每年以过半数的形式通过关于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为《联合国宪章》第18条的“重要事项”，即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的决议，以此来继续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佐藤内阁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始终与美国一起，是“列为重要事项再确认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始终采取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1971年，由于估计用“列为重要事项方式”难以阻止中国的加入，美国和日本准备了“把将台湾政府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列为重要事项”的决议（反重要事项指定方式）。结果，这一提案遭到否决。这一年，联合国通过了接纳北京政府和驱逐

台湾政府的阿尔巴尼亚的提案。

佐藤内阁的这种对华政策，集中体现了始终追随美国全球战略的自民党外交政策。它完全继承了在吉田内阁时期确定的优先与台湾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这一日本保守势力的政治传统。

从1966年春开始，中国爆发了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在国内外政策上反映现实主义的势力受挫，因此，日本以自己的积极性来恢复日中邦交的可能性进一步缩小。

日中关系进入新局面是在美国决定从越南撤军并决心与中国直接接触的1971年以后的事。日本的保守势力这时决定追随美国，实现日中邦交的恢复。但是，这已是佐藤内阁下台后成立的田中角荣内阁时期了。

2. 慢性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池田内阁是通过表明对高速经济增长的信心而获得国民对保守政府的支持的，而佐藤内阁则通过批评过度的经济增长，并以“社会开发”为口号而上台的。这也是国民对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新问题的不满情绪在政治上的反应。眼睛盯着下一届政府的有实力的政治家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即通过采取与各时期现实的执政者的政策相对立的立场来使自己的执政愿望成为现实。从佐藤提出的“社会开发”的政策中也可以看出根据这一政治意图而采取的反池田的立场。尽管如此，它毕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国民虽然对经济增长带来就业机会和收入的增加表示满

足，虽然正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并期待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但同时，也开始对由此产生的问题表示不满。不过大多数国民并不赞同否定经济增长本身这样一种政策。他们毕竟是经济增长成果享受者，并希望继续是这种享受者。因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受到很大损失或作出牺牲的人只是国民中的少数。在这一时期，虽然已有一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公害，相当多的人因此而使健康受到损害或失去生命，但没有在舆论上反映出来。报纸、电视也没有对这类问题全力报道。

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国民表示不满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消费物价的上涨。消费物价的上涨与大多数国民的日常生活发生直接联系，是主持家务的主妇们不满情绪的根源。政治家们不能无视占选民半数的女性对日益上涨的物价的不满呼声。反对物价上涨的呼声迅速高涨。每逢选举，报纸和电视都要公布反映这些呼声的民意测验结果。事实上，50年代后半期平静下来的物价，在进入60年代又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

批发物价与消费物价相比较则稳定得多。特别是60年代前半期尤其稳定。进口物价指数在1973年由于石油危机而暴涨之前也较稳定。对于原料、燃料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这是稳定物价的有利条件。尽管如此，唯独消费物价指数还是一个劲地上升，以1960年为100的话，1965年上升到135，1970年上升到176。

就每5年物价指数的年均上升率来看，50年代后半期的消费物价为2.0%，批发物价为0.5%。另外，出口物价为负0.8%，进口物价为负3.3%，都下降了。整个50年代中，进口物价指数呈下降趋势，批发物价指数基本不动，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很小。但是进入60年代后就不同了，消费物价的年均上升率前半期为6.2%，后半期为5.5%；批发物价指数的年均上升率前半期为

0.4%，后半期为2.2%，后半期呈上升趋势；出口物价指数的年均上升率前半期为负0.8%，后半期为正1.7%，转为上升；进口物价指数前半期为负0.2%，后半期为正1.4%。

60年代后半期，受越南战争激化以及美国滥发美元的影响，发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因此，进口物价上浮，批发物价和出口物价也上升。但是，总的来看，这些物价指数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有消费物价指数在整个60年代中始终大幅度上升。

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佐藤内阁在提出“纠正高速增长偏差”的政策时，强烈意识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上述消费物价的上涨。人们也强烈要求平抑物价。

这一时期的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完全是由于国内原因。因为以原料、燃料为中心的进口物价是稳定或下降的，而唯独消费物价明显上升。

各种物价指数之所以有不同的变化，当然是由于编制各种物价指数时的调查对象不同和各项的比重安排不同。譬如，将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加以比较，那么批发物价中工业制品的比重尤其是大企业产品的比重要高得多。而在消费物价指数中，农林水产业和畜牧业的产品的比重较高。此外，不算入批发物价指数的服务性收费也占较大比重。还有，消费物价指数中的工业制品中，中小企业的产品比重较高。

整个60年代，大企业产品的价格比较稳定，而中小企业产品的价格呈上升趋势。另外，农产品、水产品和畜牧产品的价格以及服务性收费的上升率也较高。一般来说，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的部门的产品价格较稳定，而劳动生产率上升较慢的部门的产品价格和服务性收费大幅度上涨。因此，

在批发物价比较稳定的状态下，中小企业产品、农产水产畜产品、服务性收费的价格占较大比重的消费物价指数就出现了大幅度上升。

另一方面，出口物价指数比批发物价指数更稳定，因为劳动生产率上升较快部门的产品在前者中的比重比后者更高。增长产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果在出口物价指数上的反映最明显。它是在当时对外汇率固定在1美元=360日元的状况下，对出口作出很大贡献的重要因素。

产生这种物价变动的基本原因是在整个60年代实现了工资等收入的大幅度增加。由于从50年代以来实现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从1960年前后起劳动市场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由过去的劳动力过剩经济向劳动力不足经济的转折。其结果，便造成了劳动者一方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容易得到满足的状况。以大企业为中心，按企业组织的日本工会自1955年以来每年固定举行“春斗”等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通过统一各行业乃至所有行业增加工资的要求，工会在高速增长中成功地实现了工资的大幅度增加。

即使在那些没有组织工会，或者即使组织了工会但交涉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部门，由于劳动力严重不足，经营者为确保人手也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工资。此外，还必须以增加休息日的方法来缩短劳动时间，并改善其他劳动条件。由于转变为劳动力不足经济，过去与大企业相比提高工资水平较慢的中小企业部门，在这一时期，工资实现了更大幅度的上升。

在大企业部门，由于技术革新使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很快，因此，工会方面增加工资的要求容易实现。但是，很多中小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并不快。尤其是面向消费者以对个人服务为主要业务的部门（如理发店、美容院、洗衣店等），在

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受到很大制约。因此，由提高工资等改善劳动条件带来的成本上升的主要部分就不得不以提高价格及收费标准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一般零售业也不得不提高商品进出差价，并转嫁给消费者。不能进行这种转嫁的产业和企业则在竞争中被淘汰。即使是工业产品，包括大企业产品和中小企业产品的平均价格水平也上升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新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对个人服务部门的收费标准总的来说比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要快得多。

以这种增加收入的运动为背景的价格体系的变动和价格水平的提高也出现于农、水、畜产品领域。其中一部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其他大部分则通过政府管理的米价等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性提价得以实现。在能够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如养鸡)，即使稳定产品价格也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农林水产业的大多数部门与技术革新迅速发展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工业部门相比，其劳动生产率要低得多。政府从使这一部门的农民的收入也要增加到城市市民水平的观点出发，采取了大幅度提高米价的政策。这一政策扩大了农村的兼业机会，同时，是农民收入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为缩小城乡的收入水平差距作出了贡献。当然，它也为扩大工业制品在农村的市场作出了贡献。

发达国家的物价

从50年后半期到60年代，尽管原料、燃料等国际商品的价格比较稳定，但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的物价都是上升的。

我们就1960年至1970年这10年间的年均物价上涨率来看，所有国家的消费物价上涨率都比批发物价上涨率高，只是各国的程度不同。这10年间的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升率是：美国

2.7%，英国4.06%，西德2.72%，法国4.03%，意大利3.94%，日本5.86%。总的来说，年上升率为3—6%左右，10年中物价上涨1.3—1.8倍。作为和平时期的经济动向，这种物价上涨是不能忽视的。

资本主义经济由于最终脱离金本位制，实现了管理货币体制，因此，失去了自动稳定物价水平的机制。战后国际货币体制中成为中心货币的美元，虽然在1971年8月之前，能保证向外国通货当局兑换黄金，但各国货币与黄金的关系已不紧密，黄金价值决定货币价值这一古典经济机制已不起作用。而且，由于整个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劳动力不足倾向、工会等斗争实力的加强、寡头垄断性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支持农产品价格制度的作用，整个经济出现了名义收入水平的上升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的倾向。这一时期，各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名义收入提高得更快。

由于发达国家政府对30年代的大危机记忆犹新，因此，他们的经济政策强烈地受到强调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责任这种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影响，倾向于即使付出一定程度物价上涨的代价也要优先保持经济增长、减少失业的想法。

日本60年代的物价上涨是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一种慢性通货膨胀形态。只不过在日本，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的技术革新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特别快，名义收入也在这些部门工资上涨的带动下提高得很快。因此，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部门，工资上升率与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的差距特别大。结果，因为劳动力不足，过去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工资差距这一双重结构被一举消除。由于有这一因素的强烈作用，日本的批发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间上升率的偏差就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大。

实际收入的上升

60年代，尽管消费物价持续上升，但总的来说，国民实际收入水平还是急速上升。另外，在企业产生出的附加价值中由劳动者获得的一部分比例（劳动分配率）也有所改善，而且较为稳定。就1955到1975年的名义工资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年均上升率来看。1955至1960年，名义工资为5.8%，消费物价为2%，实际工资上升率为3.8%。而1960至1965年，名义工资竟上升了10.1%，因此，尽管消费物价上涨了6.2%，实际工资仍能达到3.6%，大致与前一个5年的上升率相同。1965至1970年，名义工资上升14%，尽管消费物价上涨5.5%，实际工资还是上升了8.1%。

从劳动生产率指数(制造业)除名义工资指数得出的工资成本指数的变化来看，可以看出，50年代后半期有所下降，60年代前半期有所上升，60年代后半期再次下降。

在制造业，名义工资上升率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的差距并不大。因此，工资成本也比较稳定，有时甚至还下降。但在其他部门，不得不认为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部门低，因此它们的大幅度提高工资便成为物价上涨的因素。

再来看看制造业按企业规模统计的人事费占附加价值的比重(劳动分配率)。例如，5000人以上的企业在60年代前半期为39.7%，后半期40.6%，10年平均为40.2%。3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60年代后半期的劳动分配率都比前半期高。

高速增长，总的来说迅速提高了各层次国民的名义收入，也迅速提高了过去收入水平位于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这是由于整个需求增加而导致经济转为劳动力不足所致。60年代是日本出现一个可称为超充分就业状态的时代。其结果是名义

收入上升率超过物质的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消费物价持续上涨。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名义收入的提高超过了消费物价的上升，实际收入水平迅速上升。附加价值的分配结构也比较稳定，由制造业的技术革新带动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广泛地分配给各阶层国民。

享受着高速增长利益的大多数国民暂时忘记或忽视了在高速增长中被遗留的一部分行业的劳动者问题和随着重工业化而不断严重的公害受害者问题。大多数国民对物价上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意识到了“高速增长的弊病”。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佐藤内阁也一直把平抑物价列为重要课题。国民凭感觉和感情对高速增长政策表示了不满。但是，多数国民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批评或否定高速增长本身。

经济形势的变化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打着批评高速增长，重视社会开发牌子上台的佐藤内阁，迫于形势的压力，反而采用了促进增长型的政策。实际上，在佐藤内阁时代，日本经济实现了超过池田内阁时期的持续高速增长。

佐藤内阁虽然反对过度的高速增长，表示希望有更均衡、更稳定的增长，但现实经济与他这一思想完全没有联系。从池田内阁后期到佐藤内阁成立时期，日本迎来了调整局面。就是说过分的扩大投资带来了经济的过热，并产生了国际收支赤字，这样便不得不实施金融紧缩。其结果，是日本经济迎来了萧条局面。

在池田内阁决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0年12月以后，在高涨的设备投资支撑下，经济增长远远超出了预定指标。但是，由于经济过分扩大带来进口剧增等原因，国际收支转为赤

字，再次出现了不得不采取金融紧缩政策的局面。1961年7月和9月，池田政府连续提高中央银行贴现率，以此为契机，从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降到了10%以下，经济发展进入了调整时期。但这时，对国内经济作轻度调整的结果，增加了对出口的压力，国际收支不久就转为盈余。因此，日本银行于1962年10月与11月通过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实施了银根放松政策，试图复苏经济。

1963年的经济复苏在短时期里由于再次受到国际收支的制约，使日本又一次迎来了调整时期。日本除了在1963年12月提高了存款准备率，在1964年3月提高了中央银行贴现率以外，还实施了日本银行的被称为“窗口指导”的日本独特的金融紧缩政策。政府和日本银行在以后一段时期里继续实行抑制性政策。因此，经济活动又趋于沉闷。1964至1965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萧条感蔓延开来。

佐藤内阁正是在这一时期(1964年11月)上台的。在池田内阁末期的1964年，随着危机感的扩大，要求转向金融缓和政策的呼声开始出现，国际收支也开始好转，但政府和日本银行仍然坚持抑制性政策。理由之一是国际收支虽有好转的兆头，但对其前景不能把握。但是，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批判经济过度高速增长的意见业已高涨，政策当局想把能够平抑引起国民强烈不满的消费物价的抑制政策再坚持一段时期。

1965年的萧条

由于1960至1961年设备投资的猛增以及由此引起经济扩大的规模过大，因此，在调整期以后的复苏过程中，设备投资的恢复缺乏足够的弹性势头。看到这种状况，有的经济专家认为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率趋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出现了这种议

论：出现通过设备投资剧增来带动经济异常高速增长的那种剧烈波动的可能性已很小，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将转向以设备投资、财政、出口、个人消费等均衡增长来支撑经济发展的状况。这一议论的典型就是1962年度政府《经济白皮书》所认为的日本经济增长可能将进入一个“转型”时期。

转型期之说并没断定经济增长率将降低。它的很大特征在于看到了池田内阁初期那种以设备投资为主导的高速增长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正在缩小。这种观点与希望今后日本经济进入多种要素保持均衡的持续缓慢增长的政策性立场相结合，起到的作用是：推迟回到通过放松银根来谋求促进设备投资的经济复苏那种旧政策模式中去。

被认为影响政府和日本银行的政策实施的另一个因素是日本的对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日本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开放体制以及美国开始实施保护美元政策。1960年开始迅速实施的贸易自由化和预计即将实施的资本自由化是这一时期日本各行业经营者和日本经济政策当局最关心的事。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也再次强调了这一时期加强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性。

50年代的一个经常性问题是解决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美元不足问题，而进入60年代，由于美元持续外流，如何“保护美元”（防止美元外流），成了美国方面的一个大问题。1963年7月肯尼迪总统为了限制美国企业和公民的对外投资而向国会提交的包括设立“利息平衡税”提案在内的国际收支特别咨文，就是这一动向的典型例子。对此，日本银行负责人作出反应，多次发言指出：考虑到保护美元政策，必须对国际收支进一步加强警戒，有必要对货币供应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在这些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政府与日本银行坚持抑制性政

策,稍微推迟了银根放松政策的实施。这进一步加剧了1965年的萧条。

为了纠正过度的经济增长,克服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政府的政策体系。但是,政府和日本银行都想用一般的抑制性政策来应付。结果,出人意料地加深了萧条感。许多企业陷入经营萧条后,反而不得不采用积极的经济复苏政策。因此,虽然说是萧条,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仍然使全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维持在正值的调整而已。但对企业经营更有直接影响的,与其说是增长率本身的高低还不如说是增长率的变化。预计经济增长率高而计划扩大生产并实行大规模设备投资的企业,经济增长率一降低,它们就困难重重。因为即使增长率还是正的,但如果它比预计的数字小,企业经营就会陷入危机。在一些行业已出现了因资金周转恶化而面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由于股票市场萧条,靠吸收大众投资发展起来的投资信托陷入危机状态,证券公司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1964年11月成立的佐藤内阁就在这种状况下开始执政,并不得不背离它提出的口号的基本方向,实施促进复苏经济的而不是抑制经济增长率的政策。

3. 经济高速增长的持续

刺激经济政策

1965年1月9日,日本银行将贴现率下降了日利1厘(年利为0.365%),达1钱7厘(年利为6.205%),转为实施放松银根的政策(日本银行的再贴现率1969年9月由日利制改为年利制)。佐藤首相谨慎地说:“稳定的增长是当务之急,要谋求下一时期的经济复苏,但也必须注意物价稳定”。田中角荣大藏大臣

也说：“为了避免经济过度高涨，要维持健全的财政，实施谨慎的金融政策。”就是说虽然谋求向经济复苏政策的转变，但都对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出现再度物价上涨持警惕的态度。

3月6日，山阳特种钢公司由于出现战后最大的负债而倒闭。它暴露出虽然公司内部经营已明显恶化，但仍用虚假决算来防止问题表面化的真相。4月3日，日本银行进一步将再贴现率降低日利1厘，达到日利1钱6厘（年利为5.84%）。5月22日，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的经营危机被报纸披露。第二天起，要索回委托投资有价证券的人以及要求解除投资信托合同的人蜂拥而至，公司倒闭已不可避免。如果放任不管，将出现波及整个证券业界的信用危机，出现类似金融危机的事态。5月28日，大藏省、日本银行和三家主要银行（富士、日本兴业、三菱）进行了磋商，决定采取紧急对策，救济山一证券公司。此事由田中大藏大臣在当天深夜会见记者时公布。5月29日，日本银行根据《日本银行法》第25条^①，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为富士银行等3家银行挽救山一证券公司提供无限期和无担保的特别贷款。另外，7月6日对三井信托银行等两家银行出面挽救大井证券公司也采取了同样措施。

6月1日，政府决定，为应付由于萧条而产生的税收减少和追加的财政需要，原则上暂缓10%的财政支出。就是说在经济不振、危机感加剧的情况下，政府不是朝刺激财政方向努力，相反，决定采取抑制经济的政策。它反映了这样一种立场：坚持均衡财政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与为调节经济波动而有效地运用财政这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思想是毫无关系的。

^① 第25条规定是：“日本银行经主管大臣的认可，可以从事为保持和扶植信用制度所必要的业务”。——原注

自从1947年的《财政法》规定禁止发行赤字公债以来，一般会计中一直采用均衡预算主义。也没有发行所谓建设公债。这是因为由于有战时和战后通货膨胀的经历，担心舆论强烈反对发行公债。这一状况限制了当时财政当局的选择。这成为低估经济复苏前景的主要原因。

6月3日，佐藤内阁调整，田中角荣成为自民党干事长，大藏大臣由福田赳夫担任。

6月18日，政府转而开始从财政方面实施经济对策，决定提前实施财政支出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大藏省于6月23日决定年内以公共事业为中心，提前支出1000亿日元。7月27日，政府解除了对1965年整个预算暂缓支出10%的措施，并决定扩充财政投融资计划和准备发行赤字国债。

这一年的预算没有回旋余地，它是根据各界各阶层人士对财政支出的要求，并最大限度估计了财政收入后编制出的。由于萧条，不得不修正对财政收入的估计，因此，即使不以财政方面实施刺激经济对策的观点来扩大支出预算，而仅实行当初的预算，发生赤字也是不可避免的。

10月12日，福田大藏大臣正式表示将在1965年度内发行国债。

发行公债问题

在被占领时期的1947年，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财政法》第4条规定：“国家的岁出必须以公债以及借款以外的岁入为财源”，原则上禁止对公债的依赖。但其后又附加规定：“不过，关于公共事业费、出资金以及贷款的财源，可在国会批准的范围内，发行公债或进行借款”，即允许发行所谓建设公债。

由于舆论强烈反对发行公债,而且由于经济增长的实现,岁入的增加比较顺利,因此,以后在一般会计中都避免采用将岁入依赖于公债的做法。

政府一直是通过扩大以邮政储蓄和福利年金的公积金等为资金来源和财政投融资方法,来解决满足国民要求的产业合理化、整顿与产业有关的社会资本、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等大部分政策的资金问题。随着国民储蓄的增加,邮政储蓄等资金也增加了,因此,财政投融资容易扩大。但是,政府还增加了政府有关机构的借款,增发了政府保证债券,以期扩大投资规模。这扩大了政府事业对借款的依赖。

由于1965年的萧条,政府不得不公然在一般会计中恢复发行公债。由此,再次爆发了围绕发行公债的两派争论。

一般来说,政府发行公债建立在两个理由之上。

一是为了调整经济波动必须积极运用财政。作为财政的一环,发行公债是必需的。如果萧条加剧,各行业的经营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就会减弱,如果实行放松银根政策大幅度降低利率后还不能使投资活动活跃,经济将难以复苏。在这种情况下从财政方面采取追加公共投资等扩大需求政策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通常在萧条时期税收也难以增长,因此,如果一味强调均衡预算的原则,不仅不能实施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要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了。其结果将会使经济进一步萧条。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使经济顺利复苏,为了使财政能发挥相应的作用,从“反周期政策”(为了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采取的政策)的观点来看,发行公债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个理由是,从谋求长期最佳的资源配置,谋求负担的公正化的观点来看,发行公债也是必要的。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中,虽然民间企业对生产性设备的投资十分活跃,但为了扩大将来

生产活动的基础,为了改善国民的生活条件,也必须充分进行对公共部门的投资活动。不仅要建设与生产活动直接有关的道路、港口及其他设施,而且还要建设城市的绿化地、上下水道、学校、医院及其他设施。建设这些设施所需经费由现在正工作并纳税的人们负担是没有道理的。正确的方法是,发行用将来人们负担的租税还本付息的公债来筹集投资资金。

发行公债作为一种政府吸收民间资金用于加强公共部门活动的方法是有效的。60年代,民间投资活动剧增,而公共部门的投资活动相对落后,因此,社会不平衡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发行公债来获得纠正不平衡的财政保证,是恰当的。

关于发行公债的两派争论

当然,发行公债的规模必须加以限制,财政上也必须节制。而且还必须避免由日本银行认购而产生增发货币的后果。过去发行公债引起激烈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以筹集军费和战后复兴为由而大规模发行公债,而且用日本银行直接认购这种简单手段致使货币发行剧增。但如果方法得当,发行公债是不会与通货膨胀联系的。

全盘反对发行公债,并认为它容易引起通货膨胀的观点是由于对发行公债作了根本错误的理解。它关上了运用旨在调节经济波动,防止失业增加的政策手段的大门,也关上了运用旨在用公正的负担方法为将来充实必要的社会资本并改善国民生活内容和质量的有效方法的大门。

如果根据现代经济理论作冷静分析,这些问题都是不容置疑的,也会有不少专家举出上述论据肯定发行公债。但由于对过去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因此,一般国民对发行公债在感情上

和感觉上持反对意见。也有学者为迎合这些一般国民的感情和感觉，提出了在理论上毫无根据的反对的观点。在这些反对观点中，渗透着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反资本主义观点，其内容已远离理性的讨论。报纸等的论调也认为发行公债会引起通货膨胀，一时反对的空气弥漫。大多数反对发行公债的人对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不出建设性和现实性的替代方案。

在这种空气中，政府虽然也一度看到财政赤字而在发行公债问题上举棋不定，但最终在事态发展的压力下，终于不得不决定发行公债。这时的政府对6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没有明确的估计，发行公债也不是一种建立在长期战略基础上的积极选择。

1965年度，尽管有《财政法》第4条规定，但采取了允许作为“特例”发行公债的“特例公债”（即所谓赤字公债）的形式，1965年12月27日成立补正预算，批准发行限额为2,590亿日元的公债。接着，佐藤内阁决定在编制1966年度预算时也继续实行积极的刺激经济政策，扩大预算规模和大幅度减税，并决定作为解决资本来源的措施，发行“建设公债”（当初预算方案为3,106亿日元）。

作为刺激经济政策的一环，当时还降低了法人税税率。法人税被降低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以后，尽管经济复苏并持续了比以前更长的经济高涨局面，但法人税依然没有提高。它意味着佐藤内阁实行的是比以前历届政府都优惠企业资本积累、加速经济增长的政策。

必要增长率

佐藤内阁虽然出于政治动机对池田内阁时期政府过分强调的高速经济增长路线提出了修正，但并没有有效的经济政策思

想。不仅在政府确定经济政策的方法上有问题，而且在为达到目标而选择必要的经济手段上也有问题。政府受形势所迫，在通过重组日本经济政策体系来试图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一重大课题上失败了。结果，不仅反复强调的稳定物价这一当时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而且为解决进一步严重的公害问题也拿不出对策。正如前首相池田的智囊下村治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日本不仅基本上实现了相当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陷入非实现高速增长不可的状况。

英国的J·M·凯恩斯早在30年代出现大量失业时就强调必须通过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以此来加快经济增长，减少失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凯恩斯的这一主张只注意了投资对增加需求的效应，而忽略了投资也具有在下一阶段增加供给能力的效应。由于投资具有增加下一阶段的供给能力的效应，因此，如果在下一阶段不安排与已经增加的供给能力相匹配的需求，经济最终将产生供给过剩的不平衡，经济增长将遭挫折，大量失业也肯定将再次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和英国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立了纯粹经济学的模型并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引出一个结论，即一国经济如果每年以一定的比率增加投资，或者以相同的比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那么，为了能使每年的需求和供给保持均衡所必要的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必要成长率）与该国民的“储蓄倾向”（也叫储蓄率）成正比例，与经济学家称为“资本系数”的数值成反比例。这一观点以成功地进行这种理论分析的学者姓名命名，即“哈罗德—多马模型”。

这里的储蓄倾向意思是公民拿到的收入中有百分之几用于储蓄的比率。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储蓄倾向越高，“必要增

长率”将越高。换言之，储蓄倾向高的国家，其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否则，将出现不平衡。

另外，这里的资本系数是必要的资本设备规模与某一产值的比率。即是表示为了实现某一年一定规模的生产，需要多少过去积累的固定资本设备的指标。例如，如果假定为了得到一年 100 万亿日元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 250 万亿日元的固定资本设备的积累，那么，其资本系数就是 2.5。这一“资本系数”是前面介绍下村理论时涉及到的“产出系数”（产值与资本设备的比率）的倒数。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资本系数越高，“必要增长率”就越低。

经济增长率的控制

根据对第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统计分析，日本的储蓄倾向与其他国家相比要高得多，而且它在高速增长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日本的资本系数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低水平，说明投资效率很高。60年代初期，资本系数有上升趋势，这被看作是转型期论的根据，但总的来说，以后的资本系数也并不高。

这一时期出现资本系数暂时上升的理由之一被认为是由于这一时期原有工业地带呈饱和状态，各企业要寻求新厂址建立新工厂，因此，如不进行包括有关设施的更大的投资就不能扩大生产力。但实际上一旦在新厂址上形成工业地带，投资效率比以前更高，通过技术革新，一定的投资所产生的产品也更多，因此资本系数并不太高。

这样，在日本，在整个 60 年代，高速经济增长的机制——国民把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储蓄，日本产业又将它用于投资，投资产生了大量需求，同时，在下一阶段产生极其高效的新的生

产力——一直在起作用。如果不用政策来对这一机制施加一定的影响的话,要有效地抑制经济增长率是不可能的。这里,需要从根本上对 50 年代以来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作重新认识。

例如,如果试图平抑物价对经济实施紧缩政策,需求将暂时减少,增长率将降低。但是,它不会使高速增长转轨。如果需求减少,许多行业面临萧条,企业倒闭将增加。由于企业预计会有很高的增长并进行了积极的投资活动,因此,一旦实施过分的紧缩政策,资金周转将发生困难,导致破产。由于必要增长率处于很高水平,而政府和日本银行却要抑制需求强制降低增长率,因此,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萧条也必然更严重。

一旦危机感漫延开来,倒闭企业增加,政府和日本银行都不能放任不管,只好匆匆采用复苏经济政策。因此,提倡“纠正高速增长弊病”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具有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效应的政策。

总之,试图抑制增长率而随便“踩刹车”,结果在产生出的混乱前惊慌失措而比以前更用力地“踩油门”,这就是 1965 年佐藤内阁的复苏经济政策。

为了实现允许增长率稍低一些而经济保持均衡的更稳定的发展,必须要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政策,它不是来自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单纯的抑制增长政策,它应能改变对经济学家所说的必要增长率产生影响的各种要素。

例如,如果大幅度扩充社会保障制度,由此增加的必要负担让国民承担,那么,一方面,将减少国民对年老和生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租税和社会保险费负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将下降,这样,储蓄倾向有可能降低。

再例如,如果政府对各行业要求采取严格的防止和消除公害的对策,那么,结果除了直接的生产设备以外,还必须建设许

多防止和消除公害的设施，这样资本系数将上升。如果更进一步扩大有助于改善国民的生活环境如上下水道、公园绿化地、住宅等方面的公共投资，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资本系数也将提高。

所有这些政策自身都不是旨在操纵增长率的政策，而是为了充实国民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政策。这种政策具有在战后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有力地推进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但是，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将降低经济学家所说的必要增长率，纠正“过度的增长”，创造国民经济在更低的增长率之下稳定向前发展的条件。

佐藤内阁并没有为积极追求这种政策转换作出努力。

对现实的追认

佐藤内阁是创纪录的长期政府，因而它制定的经济计划的数量也创下了纪录。在佐藤内阁时期，内阁会议共通过3个经济计划。

第一个是在佐藤内阁刚成立后的1965年1月通过的“中期经济计划”。

这一计划是在经济增长率之高大大超出意料，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现实不符因而被废止后制定的。其计划期为1964至1968年度的5年，计划的目标是佐藤内阁的招牌——“纠正高速增长之弊病”。这也是首次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的经济计划。计划期年均实际增长率定为8.1%。它比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7.2%的增长率还高。但是，即使是这个增长率也大大低于实际情况。根据计量经济学的模拟分析得知，如果将实际情况的10%的实际增长率视作增长趋势，那么是不可能抑制物价上涨的。因此，就硬将大大低于实际水平的增长率确定为目标增长率。但是，象这样将现实增长率拉低到能与稳定物价

并存的稳定增长水平的可行性手段还没有被发明。

第二个是1967年3月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它与法国采纳的经济计划名称相同。这里反映了提出“社会开发”的佐藤内阁的立场。计划的目的是定为“向均衡的、充实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期为1967至1971年的5年，实际增长率定为8.2%。出于与前一计划同样的理由，这一计划再次采用了低于当年情况的实际增长率。

第三个是在1970年5月由内阁会议决定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正如其名称所示，有很浓的前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重版的色彩，它打出的目标是：“通过均衡的经济发展，建设一个舒适的日本”。计划期为1970至1975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指标定为10.6%，终于采用了追认60年代实际经济的指标。

虽然所有这些计划都以纠正国民经济的不均衡、实现稳定的发展为目标，但是并没有提出通过有效的措施改革日本经济结构的战略。也不能说降低经济增长率后能克服高速增长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文件中，确实反复强调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表面化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拿出使政府各部门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即使是实际经济增长率指标的确定方法，也只是翻来覆去地拿出较低的数字而已。这不过是表示了没有政策保证的愿望。最后，由于这种方法显然不合乎实际情况，只好将计划的数值作接近实际的处理了事。

经济增长的加速

滑稽的是，在政府首次提出10%左右增长率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计划期间，即70年代上半期，受货币危机和石

油危机的冲击,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落千丈。政府在控制 60 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问题上失败了。正当政府采取只好追认高速增长趋势的态度时,却迎来了高速增长时代的末期。

针对人们对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公害问题加剧、社会保障制度落后日益不满的局面,政府的官僚机构内也有人开始认识到政策体系必须来个根本转折,即从以加强国际竞争力和扩充生产力为重点的政策体系转向以强化国民生活基础并改善和保护环境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政府的《经济白皮书》开始反复出现关于“福利”的论述,并开始出现为了扩充福利而要求国民承担相应负担的“高福利、高负担”的观点。

如果仅仅以合理的政策和公正的负担为前提,“高福利、高负担”的观点是正确和必要的。如果能将这一观点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中,那么,通过改变上述规定必要增长率的因素来克服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转轨即走更稳定的保持均衡发展的道路是可能的。但是,这种转折在 60 年代中并没有有效地实现。

多数在野党势力都简单地反对“高福利、高负担”观点。他们比较起来还是喜欢类似“以削减军费来补充社会保障费”的口号,而反对认为必须增加国民负担的观点。但这时军费与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的军费负担率已低于 1%。即使削减全部军费,最终还不能消除日本与西欧福利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差距。为了将社会保障提高到西欧的水平,必须增加百分之几的负担(即社会保障费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在野党势力以及接近于他们的多数理论家们并没有想表明能替代保守势力的建设性的改革立场。

在国内,高速增长带来的消极性危害不断加剧,国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加。但它还不会立即出现现有在野党势力获

得政权的机会。

虽然由于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率起伏很大,但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实际增长率跌为负数以前,实际增长率一直是正数。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说明日本经济的规模在迅速扩大。如果计算5年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则1955至1960年为8.5%,1960至1965年为10%,1965至1970年为11.6%,与1952年相比,1962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增长了2.4倍,实际值增长了1.3倍。如果拿1972年相比,名义值增长了13.5倍,实际值增长了5倍。

打着“稳定增长”招牌的佐藤内阁,实际上采取甚至加强了促进增长的政策体系。结果,在这个许诺要“纠正高速增长弊病”的内阁下,高速增长反而加速并长期化了。这期间,国民的收入水平迅速上升,日本一举跨入了发达国家的圈子,而且,在此期间,由于意识到资本自由化而积极进行投资,日本产业的技术革新进一步发展,因此,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扩大,国际收入盈余也大幅度增加。

进入60年代后半期,基本上没有出现因国际收支赤字导致经济的扩大被中断的事态。相反,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之中,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一直稳定,人们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因此,国际收支盈余的积累反倒成了一个大问题。同时,由于这种高速增长,消费物价持续上涨,而且公害、环境破坏以及城市问题也日益加剧。

4. 环境破坏与公害对策

水俣病

如上所述,在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里,虽然

表述不完整，但强调了公害问题的重要性。在池田内阁之后上台的佐藤内阁批评了过度的高速增长，强调了“社会开发”的重要性。但是，在佐藤内阁执政下，公害问题迅速表面化和激化。政府迟迟拿不出对策，引起国民的强烈批评和不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产业公害事例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水俣病。但是，水俣病一开始是被作为原因不明的怪病处理的，受害者们在社会上受到隔离和歧视，陷于悲惨境地。企业方面妨碍追查真相，继续无视要求处理作为污染源的工厂废水的呼声。水俣市的政府和议会都被代表新日本氮素公司利益的人们所支配。大多数市民和新日本氮素公司的工会也支持企业。城市经济的主要部分依赖于新日本氮素公司一家企业的这种“企业城”的结构成为阻碍追查真相、容忍企业横行霸道，加强对受害者迫害的因素。

这种病的症状是：最初感觉麻木，运动功能失调，出现语言障碍和步行障碍，不久中枢神经受影响，智能明显下降，最后，出现发狂状态，拼命翻滚而死去。这种从未见过的病最初由医生确认产生于水俣地区的是1956年。以后的调查表明，1953年出现过因同类患病而死亡的病例。当时医生以“原因不明”处理，并且以前就有受水银污染的患者存在。

以后，作为污染源而被调查的是制造乙醛^①的工厂。它由新日本氮素公司于“满洲事变”^②后的1932年开工生产。第二

① 乙醛是一种具有刺鼻臭味的液体，其化学分子式是 CH_3CHO ，它是醋酸及其他化学产品的中间原料。当时新日本氮素公司等化工厂从煤和石灰石中生产出碳化钙，再将其中的乙炔以水银盐为催化剂与水进行反应，制造出乙醛。催化剂中的水银经化学反应后成为有机水银，作为工厂废水被排放。
——原注

② 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译注

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水俣湾附近曾因海水受污染导致大规模渔业受害。

战后的1946年2月,乙醛工厂重新开工。随着生产的迅速增加,由工厂排出的有机水银的污染也不断加剧。50年代受害者剧增的原因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经济高涨后扩大了乙醛的生产,也与强制疏浚因污染泥的沉积而不能使用的水俣港湾的工程有很大关系。这个工程是企业而施工的,但却由水俣市的财政负担。该工程将水俣湾内的污泥排入不知火海^①,扩大了污染。尽管不知火海的渔民提出抗议,但疏浚工程仍继续进行,甚至还敷设和扩建工厂废水的排水管。以后,在沿岸各地,经常可见猫发狂而死,许多渔民和他们的孩子吃了鱼和贝后也患此病而死去。还发生多起婴儿在娘胎里因水银中毒而身心严重障碍的胎儿性水俣病。

以熊本大学医学部为中心的医生们,经过努力确定这种“怪病”系新日本氮素公司水俣工厂废水中的水银中毒所致,已经是1959年的岸信介内阁时期。

直到这时,企业还否认事实并妨碍查明真相。通产省对熊本大学的医生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公布结果时要慎重。政府的水俣病事件有关省厅联络会议没有就污染源拿出结论,也没有采取对策就解散了。

在“熊本水俣病”的原因迟迟未查明,对患者和死者家属又迟迟未采取救济措施的时候,1965年,又在阿贺野川流域发现了“新潟水俣病”。这是佐藤内阁刚成立的时期。新潟水俣病的污染源被认为是阿贺野川上游的昭和电工鹿濑工厂(后改为鹿濑电工公司)制造乙醛时排出的有机水银。如果及时查明熊本水俣病的真相并采取对策,对全国同类工厂的排水实行控制,那么可预防或减缓新潟水俣病的发生。

受新潟水俣病的冲击，厚生省终于在1967年认定水俣病为“公害病”。到1975年为止，被确认的患者是：“熊本水俣病患者860人，其中死亡132人；新潟水俣病患者516人，其中死亡23人。

献身于如实反映患者实际情况的非官方的不知火海综合学术调查团医学班的原田正纯报告表明，受害者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该报告，到1982年9月为止，申请认定水俣病的患者有：熊本县9,361人，鹿儿岛县2,122人，新潟县2,084人，合计共13,567人。其中确定为患者的有：熊本县1,525人，鹿儿岛县321人，新潟县685人，合计共2,531人。实际上，由于认定标准定得过低，因此，许多明显带有水俣病预兆的患者被作为“取消”或“保留”处理。报告还表明，未经治疗而死亡的患者达273人（引自色川大吉编的《水俣的启示》上卷，P. 382）。

公害的加剧

政府对公害的具体对策明显落后。倒是一部分地方自治体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在战后较早的时期（如东京都于1949年，神奈川县于1951年，大阪府于1954年，福冈县于1955年）制定了防止工厂公害条例或防止公害条例。

1951年，经济安定本部曾建议政府立法，以防止水质污染，但由于化工行业、纸浆行业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由于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营者阶层，因此，一直避免采取保障生命安全和健康，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措施。正如水俣市这一典型例子那样，由于地区的经济依赖于特定企业，因此，地方自治体的政策也依附于企业，甚至出现一直无视防止公害的要求，疏远以至迫害公害受害者的倾向。

60年代,不少地方自治体从区域开发的角度出发,积极吸引重化工业企业。少数居民预见到公害将加剧而发起了反对吸引工厂的运动。在沼津和三岛地区等一部分地区,由于居民运动而使工厂建设受阻。但是,多数地区的居民期待收入和税收的增加而赞成吸引工厂。

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和生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工业废弃物的污染、食品公害、药品公害等严重事件。

1955年6月,西日本一带发生了人工哺乳的婴儿的怪病。8月,查明森永乳业公司德岛工厂制造的奶粉中混入砒霜。据当时厚生省统计,患者达12,131人,其中死亡133人,受害者波及28个都、府、县。以后的审判认定,作为奶粉的稳定剂而使用的磷酸氢二钠是用炼铝厂的废弃物经脱色后再结晶的劣制品,由于化学检验被省略,将砒霜混入。厚生省对外说“无须担心后遗症”。企业方面也一直否认会产生砒霜中毒的后遗症。但是,1969年大阪大学的丸山博教授等人查明存在许多脑麻痹等重度后遗症患者。

1958年6月10日,为抗议本州造纸公司江户川工厂排放废水,千叶县浦安町等沿岸渔民约700人涌进工厂,结果与警察发生冲突,100多人受伤。以这一事件为起因,制定了公用水域水质保护法和关于控制工厂排水法,并于同年12月公布。企业方面无视当地居民和渔民的抗议随意排放废水,忍无可忍的渔民等一发起抗议行动,警察就介入,并以暴力行为为理由逮捕有关人员,这就是这一时期工厂废水问题表面化的基本情况。

1959年11月,因受污染影响而陷于困境的渔民,认为对于继续拒绝查明真相和补偿要求的企业,不用实力进行抗议就不

能实现正义。他们采取了行动，乘国会议员团视察水俣市的时候成立了渔业协同组合。在该组织的干部领导下，约4,000名渔民集结水俣市进行了示威游行。由于企业方面拒绝团体交涉，多数人冲进了新日本氮素公司水俣工厂，破坏了厂内的设施，并殴打了厂长以下的职员。虽然经警察干预和县议员的调停，事件平息了下去，但有100多人受伤。

企业、一般市民、新闻媒介、工会一致谴责渔民的“暴力行为”。多数渔民被起诉，而对由于严重污染而杀害当地居民的企业，则迟迟不予追究责任。

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生了“痛痛病”。这一名称是由于患者都说“痛”，而由当地医生荻野升命名。该病听说在大正年间就已出现，但战后剧增。该病多发于更年期以后的已生育妇女，病状类似软骨病，伴有腰痛、关节痛，走路象鸭子，全身各处出现骨折，因此，产生剧痛。据后来估计，约有119人死于该病。一般认为是由于神通川上游的三井金属矿业公司神冈矿业所流出的镉而产生的慢性中毒症。企业对此也长期否认。

镉污染也同样出现在其他金属矿山周围。以后又出现了以群馬县东邦锌公司安中精炼所为发生源的镉污染等几个事例。

公害对策的落后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发生了酞胺哌啶酮药害事件。

酞胺哌啶酮是西德开发，在1956年以后生产并销售的一种镇静剂和催眠剂。美国认为还不了解它是否有副作用，因而不准使用，而在日本和欧洲却被广泛使用。1961年，西德小儿科医

生W·兰茨发现,许多妊娠初期的妇女服用该药后生下了缺少上肢的畸形婴儿,于是各国在同年都禁止制造和销售该药。日本于1960年10月前后也出现了酰胺哌啶酮上肢畸形婴儿,但直到1962年才采取禁止生产和销售的措施。据厚生省调查,先天性四肢畸形婴儿达5,000人,其中190人被认定系酰胺哌啶酮所致。以后一部分患者家属为追究销售该药的大日本制药公司和厚生省的责任,向法院起诉。

60年代经常发生的另一个严重的药害是“斯蒙病”。“斯蒙”是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症(SMON)的英语缩略语,它伴有腹痛、腹泻、知觉障碍、运动障碍、直肠和膀胱障碍、视力障碍,最后死亡或失明。在日本它起始于1955年前后,到60年代开始频发。由于是不治之症,不少人在绝望之中自杀身亡。1970年,新潟大学的椿忠雄教授终于查明系作为整肠剂而被广泛使用的奎诺仿所致。结果采取了禁止销售的措施。全国患者估计有11,000人。

1968年10月,发生了因北九州市卡内米仓库制造的食用油引起的中毒事件。申报的患者约12,000人。原因是产品中混入了大米油生产工艺中使用的冷却剂PCB(聚氯联苯)。PCB是电气绝缘性和化学稳定性很好的物质,广泛应用于绝缘油、热媒介质、润滑油、涂料和压敏纸。以“卡内米油症事件”为契机,在PCB的毒性受到重视和发现PCB对大范围的土壤、水质、农水产品污染后,PCB被禁止使用。

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是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导的。各地形成了炼钢厂和石油化学等联合企业。随之而来的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扩大和加剧。化工厂和造纸厂排出大量有毒物质和污泥。大部污染物都任其自流。四日市和川崎出现了由大气污染造成哮喘症状的呼吸器官疾病,有人因此而死亡或

自杀。

重化学工业的发展能提供许多新的合成物质和机械产品，这一点也是破坏环境的因素。农业部门开始使用汞化合物和有机磷肥。它与耕耘机和收割机一起，虽然减轻了农田作业的负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导致许多生物的死亡。使用农药也破坏了农民自身的健康。而且，在食用农产水产品中留下了大量水银。在大城市，工厂排烟加上办公楼的暖气排烟污染了大气。汽车的迅速普及加剧了交通灾害和大气污染。还查明，由于使用汽车用汽油抗爆剂的四乙铅，铅污染也日益严重。还产生了由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的复合大气污染引起的光化学雾污染。

产业界与政府

由于公害的受害者终于排除悲观情绪开始举行抗议行动，由于新闻机构也开始积极报道这类问题，因此，一直持保守和官僚主义态度的政府也不得不开始采取对策。

政府在1958年的本州造纸公司江户川工厂事件的冲击下，先制定了《水质保护法》和《工厂排水等限制法》。1962年制定了《煤烟排放限制法》。

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该法律明确了事业者、国家以及地方自治体在防止公害问题上的责任，并表示必须以区域为单位而不是以企业为单位制定环境标准，以此来防止污染。并明确了防止公害费用必须由事业者承担的“污染原因者负担”的原则。1968年，政府根据《公害对策基本法》，制定了作为综合性立法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取代了前面的《煤烟排出限制法》，并第一次制定了《骚音限制法》。

1967年8月，厚生省终于作出认定水俣病为公害病的结论。

从发现第一例能确认的患者到这时已过了 14 年,从熊本大学的医生们查明系有机汞中毒所致到这时已过了 8 年。第二年即 1968 年 5 月,“痛痛病”的主要病因系镉所致这一结论也为政府所承认。

由《公害对策防止法》所代表的一系列立法措施虽然是政府的一大进步,但这一阶段,政府也根据产业界的要求在《公害对策基本法》中插入了“谋求环境保护对策与经济的健全发展之间的协调”的句子。产业界认为致命性地阻碍经济活动的严厉的防止公害措施是令人头痛的。实际上,许多企业无视当地居民的抗议,甚至没有采取最低限度的防止公害措施,并妨碍调查事实真相,以致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产业界对此缺乏反省。依赖产业界巨额政治捐款维持长期政权的自民党毫无主见地接受了产业界的这种看法。打着“社会开发”口号的佐藤内阁继续持这一态度。

人命关天。必须从这一点出发从根本上对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活动方式进行重新认识。为防止事关人命和健康的污染而采取严厉措施即使可能妨碍产业活动,抑制经济增长,也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这才是纠正过度的经济增长,改变社会发展模式的具体手段。

但是,这一基本认识的确立被大大推迟。断绝公害的根源、救济受害者的活动不得不有赖于受害者自身的艰苦奋斗。

公害受害者的斗争

1967 年 6 月, 13 名新潟水俣病受害者以昭和电工公司为被告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昭和电工公司在审判时提出了“假说”,认为由于 1964 年的新潟地震,导致农药流出。新潟地方法院于 1971 年 6 月驳回昭和电工公司的观点,判原告胜诉。以

后,公司方面与受害者方面就赔偿问题进行了交涉,终于在1973年4月达成谅解。

1967年9月,被认定为四日市市矶津的公害病患者和死者家属12人,以四日市第一联合企业的6家公司(昭和四日市石油公司、三菱石油公司、三菱化成公司、三菱孟山都化成公司、中部电力公司、石原产业公司)为被告提出起诉,要求根据《民法》关于不法行为和共同不法行为的条款,取得安慰金。1972年7月,津地方法院判原告胜诉。在该审判中,从第一次开庭到第七次开庭,共有500名原告出庭。

1968年3月,富山县“痛痛病”患者和死者家属两人以三井金属矿业公司为被告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1971年6月一审判原告胜诉。1972年8月,名古屋高等法院也支持一审。这时公司方面也承认系镉所致,1973年与患者方面就医疗费和补偿问题达成妥协。

1969年6月,熊本水俣病患者和死者家属中的29家112人,以氮素公司(即原新日本氮素公司)为被告提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熊本地方法院于1973年8月认定公司方面有过失责任,判原告胜诉。以后,患者一方的“诉讼派”和“自主交涉派”一起与公司一方直接进行了赔偿交涉。

通过这些“公害审判”,患者的立场终于得到承认,公司方面的赔偿损失责任终于得到确定。虽然四日市公害审判和“痛痛病”审判在认定加害者和证明发病的机理方面遇到困难,但法院表示出承认原告根据免疫学分析的观点、重视救济受害者的立场。

1969年8月,四日市海上保安部控告三菱金属公司与西德的德古萨公司的合资公司——日本阿埃洛基尔公司有一直往四日市港排入大量盐酸的嫌疑。12月17日,又告发石原产业公司

也同样有排入大量硫酸的嫌疑。这是以公害问题为刑事案件的最初案例。其中关于日本阿埃洛基尔公司，海上保安部以保护水质的法制中没有关于 PH（测量酸碱度的单位）的规定、检举后公司已付了渔业慰问金、已及时改善了排水设施等为理由暂缓起诉。

关于公害问题的刑事案件有，70年代熊本的水俣病患者同盟控告在出现受害者时期任新日本氮素公司总经理的吉冈喜一和同一公司的水俣工厂厂长西田荣一，有“未必故意”的杀人和伤害罪。熊本地方检察厅受理此案后于1976年5月对两人起诉。熊本地方法院于1979年作出有罪判决。

1970年11月，“卡内米油症事件”患者300人以卡内米仓库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国家、北九州市以及制造和销售 PCB 的钟渊化学公司五者为被告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福冈地方法院小仓分院于1978年3月作出判决，基本上支持原告方面的主张。

由于公害患者和受害者及其死者家属抗议浪潮开始高涨，由于事实真相开始为广大公民所了解，更由于报道了 PCB、水银和铅的污染已深入到全体公民的日常生活的消息，要求政府加强公害对策的舆论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气氛中，政府开始被迫改变对公害问题的态度。

1970年，佐藤内阁修改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删去“与经济协调”的句子，还加了几项新的规定，如扩大政策的对象——公害的范围；将一部分环境标准的制定权限下放给地方自治体；都道府县有义务设置公害对策审议会等。这时还制定了《公害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1958年制定的《水质保护法》和《工厂废水等规制法》也被进一步强化，改为《水质污染防治法》。

1970年还制定了《关于处罚事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的法律》(简称《公害罪法》)。最初的法案写有处罚“产生可能危害公众生命或身体的状况者”的规定。但是,政府将“产生可能危害的状态者”改为“产生危害者”。在野党批评政府是屈服于财界的压力。

同年,政府在总理府设置公害对策本部。

第二年1971年设环境厅。

1972年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分别加进了“无过失责任赔偿”的规定。现行的《民法》规定,只有在加害者的企业方面“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才产生赔偿损失的责任。有必要修改法律体系,使得在公害问题上,不管有无故意或过失,都有对健康受害赔偿损失的责任。因此,将原来只在《矿业法》才有的无过失责任赔偿原则也写进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质污染防治法》,使救济受害者变得更容易。

汽车与大气污染

需要政府采取紧急对策的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汽车的大量增加带来的交通事故的剧增和大气污染的恶化。交通事故的一部分原因系设计和制造中的缺陷所致,因此所谓“缺陷车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1950年汽车拥有量为41.4万辆,其中小汽车为4.8万辆,占12%。1965年汽车拥有量是15年前的近20倍,达812.3万辆,其23%的187.8万辆是小汽车。1975年的拥有量是10年前的3.6倍达2914.3万辆,小汽车为1482.2万辆,占51%。

因交通事故而死亡的人数的增加持续整个60年代。这时,日本的汽车事故的死亡率和汽车拥有量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进入70年代,防止交通事故的对策才开始收效,因交通事

故而伤亡的人数开始呈减少趋势。尽管如此,每年仍有1万人死亡。

由于汽车的排气,大气污染不断加剧。汽车用汽油,作为防爆剂添加了四乙铅。人们只求效率,毫无顾忌地使用这种具有剧烈毒性的化学品。但是,汽车在高密度社会的急剧增加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铅污染。1970年5月,医疗生活协会的医生小组发表了东京新宿区柳町路口周围检测结果。它表明铅污染已达到严重状态。以这一事件为契机,舆论对铅污染和铅中毒的关心开始高涨,并进行了各种调查。由于国民的呼吁和批评的强烈,石油工业界和汽车工业界决定在1975年以前实施汽油无铅化(1975年2月起实施)。

作为限制汽车排气的措施有,限制一氧化碳措施从1966年起根据运输省的行政指导,1968年起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以后限制措施逐渐加强。1973年起对以汽油和LPG(液化石油气)为燃料的汽车实施限制一氧化碳、碳化氢、氮氧化物这3种物质的措施。受美国的影响,在要求加强限制汽车排气的呼声不断强烈的情况下,环境厅作出了加强限制的方针,但汽车工业的大公司——丰田和日产以技术上的困难为由,要求延期实施措施。但是本田技研公司和东洋工业公司在限制措施实施以前就推出了实施对策的样车,证明技术上控制污染是可能的。60年代通产省的产业重组政策没有获得成功,汽车工业继续存在许多企业竞争的局面起到了推进对公害采取对策的作用。

对工厂和大楼暖气的排烟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这种对策的结果是,在70年代,大城市地区的大气污染状况出现了改善的征兆。环境厅的资料表明,东京和大阪的硫氧化物的测定值从60年代后半期起呈下降趋势。但是,氮氧化物

的测定值在进入70年代后反而增加了。另外,在地方城市的札幌,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都有增加的倾向。

重化工业向地方的扩散和新工业地带的形成将环境破坏扩散到了地方。汽车的普及扩散了大气污染,增加了交通事故。食品公害、药害和农药污染使国民的健康受害的危险也增加了。

而且,随着高速增长而迅速增加的人口流动也是使大城市急剧膨胀,使居民生活环境恶化的因素。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如前所述,呈向东京圈、大阪圈等大城市圈急剧集中的形态。因此,在这些大城市圈,出现了住宅困难、土地价格和房租上涨、上班交通的混杂和长距离化、生活环境受大气污染影响而恶化、公园和绿化地不足、垃圾处理困难加剧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住宅情况总的来说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在大城市周围,无计划、无秩序地向外延伸的现象(住宅无计划地向郊外发展)不断发展。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周围的地方自治体的行政部门,为了急增的居民忙于修建道路和学校。结果,在东京这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城市,居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城市的形成放任自流。

日本人口本来就集结在狭小的国土上,尤其是可居住地面积的人口密度很高。而且,由于人口集中在有限的大城市圈,结果在城市还没有具备城市的各种条件时就开始膨胀。日本主要城市与欧美主要城市相比,不仅道路、公园明显狭小,而且下水道建设也大大落后。欧美主要城市的道路面积都是城市面积的20—40%,而日本则不到10%,在横滨、神户、京都只有2—3%。另外,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的人均公园面积达15—70平方米,而在日本主要城市仅有1.5—4.6平方米。日本与欧美相比,人均城市公园面积只有十分之一。

从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上半期,公共下水道的排水面

积,虽然随着有卫生设备的家庭和人口的增加而迅速增加,但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日本的下水道普及率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使用下水道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即使到1975年也只有21%,在发达国家里这个普及率是非常低的。

公害问题的教训

日本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在收入水平方面迅速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圈子。至于汽车等各种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也同样如此。

由于防止污染保护居民健康的对策致命性地落后,以致许多人或被夺去生命,或健康受损。汽车的迅速增加加剧了灾害和污染,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的迅速集中产生了很大混乱。污染和混乱迅速扩展到地方城市。

关于城市的生活环境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虽然60年代后半期佐藤内阁的口号是“社会开发”,但实际上公共性建设活动的增长赶不上民间设备投资的增长。投资结构依然倾向于扩大生产力。它固然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各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扩大了社会不平衡。

从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在国际上显示了出色的成果,因此,不少人开始评论日本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成就。但是,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犯下的几个严重错误也不容忘却。无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无法无天的侵略和战争来进行杀戮和破坏的这一民族责任是不应忘记的。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有无数被产业夺去宝贵的生命这一事实也应牢牢铭记。当然,应直接追究产业的经营者阶层、官僚、政治家、新闻机构以及专家的责任。然而,长期容忍这些主体的犯罪行为的多数国民的无知、无能和淡漠也是一个大问题。

多数国民出于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一直采取维持就业机

会和提高收入的生活态度，而对环境破坏和污染毫不关心。即使在大量出现死亡和患者的阶段，他们还是将受害者和死者家属关于公害对策和赔偿的要求当作阻碍产业活动、破坏就业机会的因素加以排除。无论是企业里的职工，还是各企业的工会，在这点上都相同。

新闻机构在多数读者对这一问题表示充分关心之前，与多数国民持基本相同的态度。只是在大力报道公害问题不必担心会减少读者，反而有可能增加读者的时候，大报才大量增加了有关公害的消息。

即使在商业主义原则下的自由言论，即使是用多数决定原理维持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没有为及时重视受害的发生并阻止受害的扩大有效地发挥功能。新闻和政治都没有对严重破坏人的要素的事实作出足够敏感的反应。没有形成能打破与产业经营者阶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保守政治家的统治，没有能谋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有效的替代路线的政治主体，也是妨碍日本国民获得机会重新认识自己前进方向的因素。

日本国民已到了站下来或放慢步伐扪心自问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了，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周围那么多人受害以致死去，但他们大多数不屑一顾，仍不顾一切地走在走过来的从复兴到自立再到增长的经济道路上。由于经济增长成了自我目的，由于产业主义成了支配性价值，因此，人被忽视了。

即使在民主主义之下，能对民众的选择行使影响力的领导的结构和性质仍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无视这一问题就不能谈论民主主义的功能。战后日本的保守政党与官僚机构的领导把经济增长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在对重视每个人自由的意见的多元行为方式很生疏，在顺应时代“空气”朝着一个方向行动的倾向很强烈的日本集体主义环境之下，无论从微观上

看还是从宏观上看，都很难形成具有能谋求组织起来进行重大转变的替代性的领导。

一旦通过受害者们自身的斗争和少数理解者的合作，严重的受害问题开始表面化，一旦报道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带来的污染范围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多数国民也不会不关心。“空气”变化了，对政治家和官僚施加压力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

产业的经营者虽然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接受限制。到这个阶段，自由言论和民主政治才发挥了作用，加速了采取对策。政府的对策尽管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毕竟还是被加强到了一定的程度。

5. 保守的长期政权

黑雾

佐藤荣作从1964年11月到1972年7月执政了7年零8个月。这是日本内阁执政史上的最长纪录，这也出乎佐藤自己的预料。佐藤的有力政敌河野一郎的去世，使自民党党内不存在能取代佐藤的实力人物，也是佐藤政府长期化的一个原因。在野党不但没有形成能取代自民党掌握政权的势力，反而出现了多党化，这也使佐藤政府长期化。

大多数国民称赞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入、消费和就业机会的增加，并一直支持保守政府。虽然对于由消费物价上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带来的混乱、环境污染和公害的不满呼声不断高涨，但并没有产生取代保守的自民党政府的革新政府的可能性。

但是，在创纪录的长期保守政府之下，自民党的得票率逐渐

下降。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民意识的变化对政治结构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佐藤在1965年6月3日实施第一次内阁调整，确立起“独家经营”的人事体制后，于同年11月到12月不顾在野党的反对，强行通过“日韩基本条约”。1966年8月1日，佐藤实施了第二次内阁调整。以后，自民党议员和内阁成员接连发生不吉利事件，遭到在野党和新闻界的攻击。

1966年8月5日，新潟县四区选出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田中彰治等七人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田中涉嫌对国际兴业公司董事长小佐野贤治等人进行恐吓(未遂)以及有教唆、欺诈(未遂)、渎职和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田中于9月递交了议员辞职书，被予以受理。

同年9月27日，社会党开始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对“共和制糖公司事件”进行追查。陷入经营困境的共和制糖公司为了措筹生产资金，制定了虚假的建立甜点心综合联合企业计划，从农林中央金库领取13亿日元的非法贷款。农林大臣松野赖三承认，在提供贷款方面有过失。第二年1967年3月1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开始进行强制搜查。检察厅听取了包括50名国会议员在内的180人的证词后，对该公司的8名干部以私自伪造文件和欺诈的罪名起诉。3月18日，在该事件中接受150万日元、受委托请国会在追查时手下留情的社会党参议院议员相泽重明以有受托收贿嫌疑被起诉。

1966年9月3日，各报均报道了运输省大臣荒船清十郎对国营铁路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自10月1日实行新的列车运行表起，让两对快车在自己选区内的高崎线深谷车站停靠。荒船说，“大臣连让四五列快车停车都不能，那还干什么？选民们都很高兴嘛。”以后在国会上还追究了荒船让两名民间人士随行，参加

了9月在汉城召开的日韩经济阁僚恳谈会的责任。佐藤于10月10日撤换了荒船。类似的滥用职权事件相继发生并被揭露，引起在野党和舆论对佐藤政府的强烈批判。自民党党内也出现要求“肃党”的动向。

由于总裁任期到期，1966年12月1日的自民党大会上进行了总裁选举。佐藤在总共450票中获得289票，再次当选。但第二名藤山爱一郎也达170票，超出了佐藤派的预料。

12月2日，众议院议长山口喜久一郎与用巨额空头支票给一般投资者带来损失的东京大证公司总经理的交往受到谴责，被迫辞职。在野党要求佐藤内阁总辞职或解散国会。

1966年12月27日，在举行国会例会的同时，解散了众议院。1967年1月29日举行了大选，被称为“黑雾”解散。是佐藤内阁时期的首次大选，但自民党得票率首次跌破50%，跌到48.8%（上届1963年11月为54.7%）。获得席位数为277席（上届283席）。自民党得票与有选举权者总数之比（绝对得票率）为35.8（上届为38.5%）。自民党成了受全部有选举权者中三分之一支持的“三分之一执政党”。

第一在野党的社会党也不妙。社会党得票率为27.9%（上届是29%），获得席位数为140席（上届为144席）。社会党的绝对得票率与上届同为20.4%。在这届大选中，创价学会系列的公明党首次进入众议院，有25人同时当选。结党以后走过低谷的民社党的席位也从上届的23席增加到30席。在野党明显反映出多党化倾向。

自民党与社会党

1967年以后，所谓激进派学生为阻止佐藤首相访问东南亚和美国，为反对越南战争、反对1970年延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反对建设成田机场发起了骚扰事件。1968年，日本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校园斗争激化。1969年1月，警察为解除学生对安田讲堂的封锁出动了机动队。但是，以国会为中心的政治主流几乎没有受这些政治斗争的影响。

对佐藤内阁来说，继归还小笠原群岛(1968年6月26日实现)以后实现归还冲绳是一个课题。在1968年秋天的自民党大会上的总裁选举中，这一问题也成为焦点。由于外相三木武夫为了与表示要三连任的佐藤相对抗而参加总裁候选，因此，他于1968年10月辞去外相职务的同时，发言说：“冲绳归还应以实现不带入核武器这一与本土相同的条件进行谈判”。佐藤反击说：“以本土相同的条件归还冲绳是作为目标来考虑，但以此作为谈判时的态度是困难的。让三木这样的人做外相做到现在是我的不明智”。11月，佐藤第三次当选自民党总裁。

1969年9月25日，佐藤也说：“归还冲绳要贯彻非核三原则，实现与本土一样无核”。11月17日，佐藤为归还冲绳访问了美国。11月21日的日美共同声明表明日本从美国那里取得了谅解：作为达成具体规定的条件，美国将在1972年把冲绳归还日本。共同声明还表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规定也完全适用于冲绳。在野党攻击说：这是以归还冲绳为机会实现“本土的冲绳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中的“远东”的范围将扩大。

由于冲绳谈判基本成功，佐藤进一步坚定了谋求国民支持进行佐藤执政的第二次大选的信心，并为此解散了众议院。这就是1969年12月27日的“腊月选举”。在这次大选中，自民党虽然增加了席位(从上届的277席增加到288席)，但相对得票率从48.8%降到47.6%，绝对得票率从35.8%降到32.2%。

在野党的多党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社会党的相对得票率从上届的27.9%跌到21.4%，绝对得票率从20.4%跌到14.5%。

席位跌到 100 席以下,为 90 席。公明党得票 10.9%,席位增加到 47 席。共产党也得到 6.8% 的票,获 14 席。

自民党和社会党得票率长期下降和在野党的多党化也在佐藤内阁时期的 3 次参议院选举中反映出来。在 3 次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获得的席位逐次减少,分别为 71、69、63 席(1965、1968、1971 年)。社会党虽出现一进一退的动向,但没有超出 1962 年 7 月的参议院选举时的全国选区得票率 24.3% 的纪录。另一方面,公明党和共产党却稳步地增加了席位,形成国会中的有实力的在野党。

在 1955 年实现社会党再次统一和保守党合并的时候,人们期望通过两大政党的交替执政来运用议会制民主主义,但这一期望没有实现。所谓 1955 年政治体制被作为保守的单一政党的统治体制维持下来。但是,在野党的政治结构有了很大变化。

社会党的老化

社会党之所以会出现停滞不前或者每况愈下的趋势,是因为社会党完全不适应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结构变化。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还是政府目标方面,或者组织活动方面,社会党在整个 60 年代都迅速老化。

当大多数国民从极度贫困中摆脱出来,具有了更高要求的时候,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批判资本主义就没有说服力了。而且,对于消费物价上涨、环境和公害问题的恶化、大城市问题的产生等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各种新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作出有效的回答。通过以工矿业部门为中心的产业工人的阶级团结来与资本家阶级对立,通过强有力的斗争掌握权力这一阶级斗争理论也失去现实内容。随着经济增长和充分就

业的实现,整个国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并出现平均化的倾向。大多数国民都开始有自己属于“中层”的意识。职业生活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从事事务、管理、销售、服务等职业的人数迅速上升。原先属于中间阶层的农业、零量企业的个人业主以及家庭从业者的比重下降,大多数就业者虽然被纳入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中,但他们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意识,都与工人阶级这一形象相去甚远。

现有的工会加强了维护在各自职业地位中的既得权利和利益的这一压力团体的功能。一部分工会在公害问题上与受害者们对立,站在保护工业的立场。即使在公務员工会和政府企业工会中,也将重点放在维护既得权益上,而对改善服务和经营合理化持冷漠态度,甚至有抵抗的倾向。社会党在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为中心的工会的支持下,在贸易自由化以及以后的日元升值问题等产业政策问题上也选择了一条保守的、仅仅是“应付一时”的路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生活意识的迅速城市化,人们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在战后教育内容的固定、生活的稳定、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信息活动的活跃、文化要求的高级化和多样化等的影响下,自由、人权、民主主义的意识基本上为大多数国民所拥有。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民主主义比战争刚结束的时期更广泛地渗透进国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势不两立的,深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势力不能扩大其政治影响,是理所当然的。这反映了日本国民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方面的进步和改善要素的增加。

为了批判和克服保守的统治,必须重新制定改革势力的基本战略,重新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组织运动。但是,江田三郎于60

年代初提出的结构改革路线被成为社会党主力的左派多数派排斥了。当时,在社会党党内,被称为社会主义协会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集团开始强大。社会党成了信奉与议会制民主主义难以并存的社会主义协会派和对此持批判态度的各派的混合组织。领导者们失去了对整个运动的统制力。党员没有超过几万人的规模,组织和财政基础也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在社会主义协会派的影响下,随着这一路线的僵化,知识阶层的合作者也脱离了社会党。社会党在选举时依赖以总评为中心的工会,游离于一般市民之外。在战后政治中,曾是社会主义在野党中心势力的社会党开始一蹶不振,丧失了作为政治革新主要势力的力量。

社会党支持率的下降

社会党的支持率总的来说下降了。而且尤其是在社会党所依赖的产业工人等现代部门的就业者和城市居民中,支持率明显下降。社会党在农村人口迅速减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过程中失去了国民的支持。

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朝日新闻》1965和1975年各职业团体和各地的政党支持率状况民意测验调查上。

据1965年8月调查,自民党的支持率在管理人员、自营工商业者、农林渔业者、无职业人员及其他人员中较高;社会党的支持率在产业工人、事务性工作人员、店员等劳动者中较高。在全部调查对象中,社会党的支持率为34%,其中事务性工作人员为9%,产业工人和店员等劳动者都分别为7%,合计占23%。但是,据1975年6月的调查,社会党的支持率即使在事务性工作人员和店员等劳动者中也比自民党低,而且在产业工人中,社会党支持率也与自民党支持率相同(33%)。

另据 1965 年的调查,大城市(七大城市)的社会党支持率超过了自民党(分别为 43%和 37%)。但据 1975 年调查,即使是大城市(十大城市),社会党的支持率也大大低于自民党(分别为 20%和 44%)。关于“有选举权者 10 万人以上的市”(不包括大城市)的社会党和自民党支持率,1965 年分别为 34%和 44%,而到 1975 年则为 25%和 39%。二者支持率都下降了,但社会党的下降幅度(9 个百分点)比自民党(5 个百分点)大得多。

1965 年所有职工和所有地区的有选举权者的支持率是:自民党 45%,社会党 34%,共产党 1%,公明党 4%,民社党 4%,不支持任何政党或不回答的共 11%。到 1975 年,自民党依然是 45%,社会党减少到 24%,共产党 8%,公明党 5%,民社党 5%,不支持任何政党或不回答的共 13%。这 10 年的变化是,自民党为零,社会党为负 10 个百分点,共产党为正 7 个百分点,公明党、民社党、不支持任何政党或不回答的分别为正 1 个百分点。

在这 10 年中,人口的职业构成和地区构成有了很大变动。民意测验的对象的标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整个调查对象中增长最明显的职业是事务性职业(从 20% 增加到 24%,增加 4 个百分点)和管理性职业(从 3%增加到 6%,增加 3 个百分点)。这两种职业构成比共计 7 个百分点。但是,在这些职业中,支持社会党的人的比率减了 2 个百分点。构成比增加的 7 个百分点和社会党失去的 2 个百分点共 9 个百分点都流到自民党(2 个百分点)和其他政党(7 个百分点)那里去了。

在这 10 年中人口增加最快的是“有选举权者 10 万人以上的市”。这些地区在整个调查对象中所占的比重从 18%增加到 26%,增加 8 个百分点。其中社会党获得的仅为 1 个百分点。其余 7 个百分点流向自民党(2 个百分点)和其他政党(5 个百分点)

那里去了。

就这样，社会党在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变动的过程中，陷入了完全被迅速崛起的新的社会集团抛弃的境地。这个原来应该成为战后民主主义最有力的实行者的政党，结果却随着战后民主主义的贯彻而衰落了。

民社党的一蹶不振

自民党和社会党在政治上出现衰落，特别是第一在野党的社会党明显地每况愈下的时候，在野党势力出现了多党化的趋势。60年代初期，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民社党、加强议会主义路线扩展党的势力的共产党，以及以创价学会为基础作为新兴势力参政的公明党，与社会党一起，成为从中央政治到地方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势力。

民社党虽然在国会维持了一定的势力，但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党的停滞与低落没有带来民社党的扩大。民社党本来是为批判和克服社会党的左翼性而组成的政党。但其政治思想、组织和行为方式都没有让一般选民感到面目一新，因此，没有能在60年代的社会变动中发展成一支新的政治势力。

民主社会党于(1969年改称民社党)1960年1月组建的起因是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上，主张分阶段解除论的西尾末广与主张立即废除论的社会党主流派发生对立，因而受到纪律处分。民社党在结党时没有能拉到全部社会党右派，河上十丈太郎派的主要力量仍留在社会党内。在1960年11月“安保骚乱^①”以后的第一次大选中，民社党由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减少到17席，遭到了惨败。在以后的选举中虽然席位有所增加，

① 指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译注

但得票率并没有上升，一直处于低潮。

民社党以“反自民，非共产”为口号，决心建立一个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的改革派的政党。但是，一方面作为保守势力联合体的自民党与官僚机构相结合，维持长期稳定的政府并炫耀其统治期间的政绩；另一方面，在反体制和反政府势力里面，传统的左翼思想的影响依然很强。在这种状况下，民社党很难确立独立的路线，成为政治革新的主体。

民社党虽然受到“全劳会议”（全日本劳动组合会议，1954年4月至1964年11月）和以后“同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1964年11月成立）的支持，并受到中小企业等阶层的支持，取得一定的地位，但一直没有飞跃发展的机会。“全劳会议”和“同盟”的工会运动批判“总评”的政治主义运动方针和左倾路线，追求现实主义的工会主义路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一直以不断增加的各行业工人为中心扩大其组织。不久，“全劳会议”和“同盟”的会员数超过了“总评”。但是，其运动路线从本质上来讲具有顺应经济增长的倾向，缺乏作为改革势力的形象。

当民社党的批评对象——共产主义和社会党的左翼路线的传统意识形态不适应新时代发展时，民社党的反共主义立场也令人感到陈旧。没有提出积极的改革路线的纯粹反共主义，日益失去了魅力。民社党对公害问题及其他新问题如市民运动、消费者运动，也一概持冷淡态度。并且从反对共产党出发，对这些运动为背景暂时获得成功的革新自治体运动，也采取对立的态度，与自民党发生联系。

共产党的扩大

当社会党因其内部的共产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协会派抬头，坚持传统的左翼路线而处于政治低潮时期时，以本来的共产

主义前卫党自居的日本共产党却成功地扩大了党组织、得票率和议会席位。

从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共产党内的几个反主流势力先后被排挤出党外。1958年，“全学联”主流派的共产党员与党中央发生冲突而脱离共产党；1961年7月的第八届党代会前后，共产党内的结构改革派被排挤出党。受共产党的影响，“全学联”反主流派也发生了分裂。1964年志贺义雄和铃木市藏因在国会对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投了赞成票而被开除出党。通过这一连串事件，共产党内的宫本显治集团的主导力量得到了加强，党组织得到了纯化。共产党“坚如磐石”的特征更加明显。

宫本逐渐修正了倾向于民族主义的战略，实际上转到了类似结构改革路线的现实路线，并致力于扩大党员和党报读者，重视地方选举和国会选举。共产党不能依赖于企业和工会的捐款，而是通过扩大党员和党报读者建立自己的组织和财政基础。在东京、大阪、京都形成“革新都府政”的时候，共产党利用社共联合路线，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共产党虽然有了发展，但其发展是有限的。由于50年代的极左路线，即使到60年代共产党的地位也很低。虽然以后有所恢复，但它在日本的政治作用受到限制。尽管运用在所有选区都参加候选这一共产党特有的战术，但60年代末共产党获得的票数仍仅占全部有选举权者的7—8%。

共产党力量的恢复并不是国民对传统社会主义路线信任的恢复。共产党提倡现实主义路线，并以与苏联、中国的对立为契机强调“自主独立”，企图摆脱自共产国际、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以来的国际主义传统。共产党力图对各种集团关心的每件事都作出反应，并积极展开了“周旋人运动”。它的经济政策虽然反

映了公民的不满和焦虑，但并没有拿出既合理又现实的基本改革框架。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活动方法是彻底的利益诱导性的现实主义，同时，又表现出不听取多方意见的狭隘性，保持着极权主义的控制民众的特点。共产党派系的理论家们不重视客观分析，也不改掉他们的习性，即根据既定意识形态路线来对其他党派理论家进行缺乏理性的、充满中伤的僵硬批判和攻击。

但是，共产党毕竟在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中代表了一部分国民对保守派长期执政产生腐败和官僚主义的不满情绪，它作为对每况愈下的社会党深感失望的势力，确保了一定的地位。在整个60年代，共产党增加的得票率与社会党减少的得票率正好相等。在1961到1976年15年中，这两个党在众议院议员选举中的绝对得票率合计基本保持在22—23%左右的水平。

公明党的出现

60年代，公明党作为新的政治势力初次登上了政治舞台。公明党作为以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为背景的新政党，组建于60年代。

创价学会的前身是牧口常三郎于1930年建立的创价教育学会。小学教员的牧口反对对教育的官僚统治，追求建立在独自的价值论基础上的教育创新。但由于他把该运动与自己信仰的日莲正宗结合在一起，因此，创价教育学会具有强烈的宗教团体色彩。牧口因抵制战时政府的强制推行神道而遭到迫害，1944年死于狱中。

战后，户田城圣将原学会改称为“创价学会”并重建了组织，50年代，又通过多次的“折伏”^①运动扩大了信仰者。户田为了

^① 佛教用语。即用说法、祈祷等的力量，使人屈服。——译注

使全体日本国民皈依日莲正宗，决心以建立“国立戒坛”为目标，进入政界。在1955年的地方议员选举中，创价学会以东京为中心在全国有54人参加候选，51人当选。在1956年参议院议员选举中，6人参加候选，3人当选。

户田会长死后，池田大作于1960年5月就任会长。1962年1月7日，创价学会组成公明政治联盟。在1962年7月1日的参议院选举中，创价学会有9人参加候选并全部当选，取得参议院中第三大党的地位。全国选区的得票率为11.5%，远远超过了民社党的5.3%和共产党的3.1%的得票率。1964年5月，池田表明了进入众议院的意向，同年11月17日，举行了公明党成立大会。1967年公明党在首次参加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了25个席位。

1969年，为阻止藤原弘达的《斩断创价学会》一书的出版，创价学会通过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对作者施加了压力。此事后被作者藤原揭露。这反映了严厉排斥组织内外的批评性意见的排他性宗教团体的本质。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有着类似本质的共产党对这一事件最起劲，把它作为攻击创价学会和公明党的材料。但是尽管有这一事件，公民党还是在1969年12月27日的“腊月选举”中取得重大进展，获得了47个席位。

针对人们对上述事件的批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撤回了“建立国立戒坛”的目标，提出政教分离，将公明党发展成谋求大众福利的独立政党。在1970年6月25日的第八次党的大会上，公明党修改了纲领和党章，从谋求“贯彻尊重人性这一中道主义的国民政党”立场转向实现“人性社会主义”和“保障负责任的自由经济活动及公正分配其成果的经济体制”，这表明了公明党拥护宪法、自由、人权和民主主义，否定暴力的路线。

公明党的出现意味着以信仰日莲正宗这一佛教派别为基础

的大众组织开始介入政治。创价学会不是由日本社会底层已有的任何组织所包容，而是由有各种生活苦恼而通过“折伏”产生信仰的人所组成。社会主义各政党都没有在组织这类人的问题上取得成功。传统的左翼势力顽固坚持外来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失去了政治活力，他们在团结日本最底层的力量上失败了。而且，大部分社会底层人们的政治意识和体制观念反而保守，他们反而拒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创价学会提出的“建立国立戒坛”意味着让大多数国民皈依日莲正宗，即日莲正宗的国教化。但是，由于发生言论问题，公明党和创价学会被迫适应民主主义和自由的原则，其运动的性质也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

路线转变后的公明党以实现大众福利为目标，谋求中道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中道主义并没有表示明确而具体的政策内容。公明党在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两方面，有时接近自民党，有时与其对立而同在野党合作，呈不稳定状态。这是由于公明党本身主体立场的不明确造成的。但这同时也反映了60到70年代整个日本政治的不透明状况。

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各次选举结果可以看出，自60到70年代，自民党的衰退并没有带来所谓革新势力的上升。如上所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总得票在全体选民中的比重基本没变。自民党失去的得票率基本上被公明党所夺走。

革新自治体

传统的社会主义势力虽然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扩大比重，但却在60年代的地方自治体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成果，成功地积累起了作为统治主体取代保守势力的经验。

随着战后地方自治制度的确立，都道府县的知事由官选变

为民选，市町村长也由市町村会的间接选举变为居民的直接选举。自此以后，社会党和共产党派系的知事和市町村长在各地上台。社会主义政党在地方议会获得一定的地位。1950年4月21日，原京都大学教授、曾在战后社会党片山内阁时期担任中小企业厅长官的蜷川虎三，作为社会党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候选人当选为京都府知事。直到蜷川1978年引退为止，它成为长达7届28年的“革新府政”的出发点。

但是，所谓革新自治体运动的高涨是在60年代。历届保守政府都将战后改革后实现的地方自治制度朝着强化中央集权的方向调整。但尽管有这种“逆流”，居民中间还是出现了自治意识，民主政治观开始深入人心。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迅速增加的新居民阶层不受旧有的地缘组织限制，寻求作为自由市民的发言权和行动的机会。对于高速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城市问题，保守政府没有及时采取对策，这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的不满情绪。受地区保守势力的支配，地方议会在由政府补助金资助的公共建设事业等问题上普遍进行相互勾结、贪污渎职的腐败行为日益暴露。“黑雾问题”在地方政治中也经常成为大的政治焦点。

在池田内阁时期的1963年3月16日北九州市市长选举中，保守势力遭到失败，由社会党推举的吉田法晴当选。在随后的4月17日都道府县知事和都道府县议会议员的统一选举中，福岡、岩手和大分都由在野党势力推举的知事候选人当选。在4月30日的市町村长和市町村议会议员的统一选举中，大阪、横滨两市诞生了革新派系的市长。

当选为横滨市市长的飞鸟田一雄在战前曾任工会的顾问律师，战后历任横滨市议会议员、神奈川县议会议员、众议院议员、社会党副委员长。在飞鸟田就任横滨市市长的第二年即1964

年，以全国的社会党派系的市长为中心，组成了全国革新市长会。到1978年因就任社会党委员长而辞去横滨市市长为止，飞鸟田一直是革新自治体运动的领袖。

在佐藤内阁时期的1967年4月15日的统一地方选举(都道府县)中，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统一候选人美浓部亮吉当选为东京都知事。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推荐民社党推举出的候选人，但以极小之差失利。美浓部亮吉是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长子，是所谓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曾于1938年因“人民战线事件”与大内兵卫、有泽广巳等一起被捕。战后任总理府统计委员会事务局长，以后成为东京教育大学教授。他从1967到1979年担任了3届都知事，是革新自治体的象征性存在。

在1971年4月(11日、25日)的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的美浓部再次当选，横滨的飞鸟田实现了三连任，此外共产党系的黑田一当选为大阪府知事。

在许多情况下，革新派系的知事和市长即使当选，但在议会，革新派系的议员也并不占多数。由于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采取的是议院内阁制，而地方自治体则是实行居民直接选举领导的制度，因此，即使大多数居民投票支持给人以新型领导感觉的革新派系候选人，议会也不会倾向于革新派系。不少地方自治体的行政机构与长期存在的保守势力统治经验和官僚机制本身的保守性相结合，对改革持消极态度。即使是在支持革新领导(知事、市町村长)的势力中起重要作用的自治体工会也未必始终是革新的，他们有时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利而抵制机构改革。但是，革新领导扩大了与居民对话的机会，热心支持居民自发地参加政策制订和行政活动，并致力于完善社会福利，对环境保护、防止公害也表示了积极的态度。

努力使1946年《宪法》中的福利国家思想具体化并在60年

代首先顺应重视福利这一时代潮流的是革新自治体。法政大学教授松下圭一提倡的“市民最低生活标准”(civil minimum)这一日式英语的主张，成了以飞鸟田和美浓部为代表的革新领导推行现实行政工作的思想，并波及全国。不少保守派系的领导也受革新自治体运动的影响，转而实行重视环境和福利的路线。

革新自治体的局限

革新自治体运动的基础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在新宪法(1949年《宪法》)体制下，自由、人权、民主主义和分权自治思想对国民的渗透。重视福利和环境问题实际上也是以这种国民的权利意识为基础的宪法思想的扩充和实践。在以中央政府和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增长中，虽然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虽然以补助金为杠杆的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管理得到加强，但战后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成为革新自治体的依据。

另一个是国民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中所包含的人民民主主义的主张以及其对现存体制的抗议精神产生共鸣。由于在战后的民主主义下，国民的权利意识得到加强，对政治的理解力进一步提高，因此，以此为背景，这一要素便成为将人们对长期保守政府执政下的环境污染、企业优先和城市问题加剧的不满意集中起来，通过投票为他们表达看法提供机会的契机。

革新自治体运动是作为传统的左翼政治领袖与日本社会中出现的新的市民成份的过渡性结合体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具有这种性质的政治运动，60年代的革新自治体运动已成为从社会基层变革日本政治的因素。然而在国家政治中，尽管自民

党的得票率下降，但社会党和共产党获得政权的可能性还没有产生。在野党的多党化继续发展，因而也没有形成多党联合的可能性。由于民社党和公明党从各自立场出发与共产党发生严重对立，因此，社会党领导提出的“全体在野党共同奋斗”，只不过是一种期望获得政权的幻想。社会党一蹶不振的基本原因，在于其组织上和财政上过于依赖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总评”系统的工会；在于与市民的感情隔阂越来越大。

在外交政策方面，社会党提倡的非武装中立论越来越失去其说服力。苏联的集权主义与政治封闭状态已众所周知，有关其推行军备扩张政策的信息也不断增加。苏联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以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进一步使大多数国民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警戒心。同时，中苏对立和边界纠纷的表面化亦降低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威信。革新自治体之所以能在这种状况下得到发展，是因为它不决定国家政治，不需要在外交政策上面临重大选择，政权交替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对其影响也较小。而且，人们期待革新自治体会对当前的环境和社会福利问题采取比保守势力更积极的对策。人们还认为它有可能打破保守政权的腐败体制和其在政治、行政上的封闭性。

但是，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依然以传统的社会主义路线为基础。关于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依然坚持中央集权化的管理体制立场。在将来的国家政治中，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以获取政权为其最终目标，并将掌握地方自治体政权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阶段。这就是以革新自治体为立足点包围并进攻中央政府的意图。作为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基本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中央集权主义

的，因而实际上它与分权和自治是不相适应的。只不过这一思想中的某种人民民主主义因素暂时支持了自治体革新运动而已。

自治体革新的展望

通过知事选举和市长选举，即使成立了以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革新都府县政府和革新市政府，但在地方议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加强。相反，即使在地方议会，社会党也一蹶不振。由此也可以看到由于公明党的出现所带来的多党化的趋势。社会党和共产党相互合作的革新自治体也遇到了来之这一方面的障碍。

为了使自治体革新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基础中的局限性。为了使作为对日本的行政和政治体系进行根本改革的自治体革新运动得到确实的发展，就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从根本上打破战后政治和经济中的中央集权体制，确立起谋求真正分权和自治的立场。为此，必须重新研究把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放在优先地位的政策目标体系，并从这一观点出发对规定国家和地方关系的整个制度进行彻底改革。革新自治体虽然确立了使运动向这一方面发展的基础，但还没有发展到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阶段。实际上，即使是革新自治体所实施的政策也远没有超出针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范围。

第二，从根本上克服如前所述作为革新势力政治行动基础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的集权主义及其根本否定自由民主主义和议会制的理论。革新自治体一方面依赖并脱胎于战后改革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框架，同时，它又制定了大大突破这种框架

的目标，并具有对高速增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行政和政治结构进行重大变革的性质。这反映了对在以追求战后经济复兴、自立和增长为目标的过程中形成的整个行政和政治结构进行改革的潜在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为了使革新自治体带来真正的自治体革新，并具备变革日本政治的能力，就必须使战后以来起着动员民主主义运动“力量”作用的社会指导思想本身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现有社会主义在野党的领导势力未能推进这种思想的大转变。因为这种思想会不可避免地改变这些势力立足的社会、政治基础。它包含着使各政党所依赖的现有组织本身可能发生严重动摇的危险性。结果，两党未能将革新自治体运动从各自现有组织的党派利益中完全解放出出，因而也没有从这一运动中抓住对本党派进行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自我革新的机会。不过，一些重要的思想萌芽却作为向下一个时代发展的线索而被保存了下来，因而它预示着谋求自治体革新，政治、行政的分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市民运动，不久将会以更大的规模扩展开来。而行政、财政的分权化问题则已经开始在更广大的国民中引起了讨论，但在70年代，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的“革新自治体”运动本身却进入了一个停滞、衰落、混乱和分化的时代。

第十三章 世界中的日本

1. 越南战争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60年代国际政治中最大的问题是越南战争。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如在朝鲜战争时期那样,日本发挥了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据点的作用。尤其是领土归还会谈的对象——冲绳,被用作轰炸南北越南的基地。美国一方面认识到归还冲绳的政治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却把冲绳当作可自由使用的基地而占着不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越南悲剧始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法国作为统治者回到越南。

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乘法国向德国投降之机,进驻了法属领地印度支那(北方是1940年9月,南方是1941年7月)。这导致美国加强对日经济封锁,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越南有些势力为了摆脱法国的统治而想与日本合作。但是,以胡志明的印度支那共产党(1930年成立)为中心的越南独立同盟(越盟,1941年成立),以“打倒法日法西斯”为目标,势力扩大到日本军队统治下的整个越南。在日本军队统治下的越南,滥发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大米被强制收购,使农民不能糊口,无政府状态造成流经北越产米地区的红河

泛滥。饥饿和霍乱的流行使许多越南人死亡。死亡人数达 200 万，红河三角洲的居民每 4 人就有 1 人死亡。

1945年 3 月 9 日，日本军队为了直接统治印度支那，发动了政变，解除了残存法国军队的武装。3月 12 日建立了保大皇帝的傀儡政府。柬埔寨和老挝也分别在日本军队的指示下宣布独立。而在越南，越盟与这一动向相对抗，发动了总起义，并在 8 月日本投降的同时在河内、西贡等地建立了革命政权。9月 2 日在河内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并组成临时政府。盟军向越南南方派驻了英国军队，向北方派驻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军队，并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戴高乐的法国政府制定了复活旧殖民地体制的计划。在越南，在英国军队的协助下，法国用武力在南方确立了统治权，镇压了越盟等的反法势力。在柬埔寨和老挝，也镇压了反法抵抗势力，恢复了统治。

1946年 1 月 6 日，在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统治区举行了第一次大选，越盟虽得到压倒多数的支持，但它与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支持的越南革命同盟会、越南国民党等妥协，成立了联合政府。3月 6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与法国签定了协定，商定：关于北方、中部、南方的统一由将来公民投票决定；除基地的维修和管理人员之外，法国军队在 1952 年前撤出。法国把这一协定作为对北方确立统治之前的等待时机，企图以统治南越、老挝、柬埔寨为基础，控制北越和复活印支联邦体制。

北越与法国在法国本土继续举行会谈，但没有结果。1946 年 10 月底，法国军队在北方重要港口海防登陆。11月 20 日，两国军队在海防和中国边界附近的谅山发生冲突。11月 23 日法国舰队炮击了海防，杀害了许多市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法国投入了 10 万兵力。越盟通过土地改革等积极政策获

得了农民的支持,克服了军事上的劣势,不久便转为攻势。1954年5月7日,越盟占领了靠近北越与老挝边界的重要边府。越盟在北越一带展开了强大攻势,法国的统治岌岌可危。

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

1954年4月26日到7月21日的日内瓦会议带来的结果是签定了越南、柬埔寨、老挝的和平和独立协定。

在越南,以北纬十七度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实现了停火,并决定在1956年以前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南北统一。在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稳健派经过与法国和与要求完全独立的国内激进派的顽强斗争保住了政权。由于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激进派被解除了武装,越盟从柬埔寨撤出。在老挝,出现了主张完全独立并受越盟支持的展开武装斗争的“巴特寮”(老挝人国家)派参加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受法国支持的南越保大政府声明:不承认越盟领导的国家和政府,并反对日内瓦协议,保留“行动的自由”。由于美国在使欧洲的西德重整军备的政策中需要得到法国的合作,同时美国对北越与苏联、中国的合作体制的形成感到了威胁,因而加强了反对越盟的姿态。艾森豪威尔政府根据如果越南共产化那么整个东南亚都将面临共产化的危险这一“多米诺理论”支援了南越。美国拒绝在日内瓦协议最终宣言上签字,并声明不采用武力的妨害行为。1954年7月7日日内瓦会议正在举行,受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成为南越保大皇帝之下的首相。9月8日,美国、英国、法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八国组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美国形成了东南亚的反共包围体制,开始走上阻止南越“共产化”的道路。

柬埔寨于1955年9月11日,老挝于同年12月25日举行

了选举,并分别成立了独立的统一政府。但是,由于美国为阻止左翼势力的扩展进行了干涉,因而两个国家出现了政治混乱和内战。美国不断对柬埔寨施加压力,要求它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但西哈努克政府进行了抵制。当西哈努克开始与中国接近时,美国勾结右派势力迫使西哈努克垮台。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不断加强,美国还以破坏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补给线为理由,从空中轰炸,从陆地攻击了柬埔寨和老挝。人们惨遭屠杀,国土一片荒芜。

在越南,受美国支持的吴庭艳拒绝了南北统一选举。吴废除了帝政,于1955年10月通过公民投票就任总统。吴无情地镇压了反政府势力。1958年12月发生了佛罗伊收容所的政治犯大批被杀的事件。为了对抗吴的独裁和镇压,1960年12月,南越的越盟势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学生等反政府势力组成了南越民族解放阵线。

南越人对吴一伙的专制和警察政治的不满日益高涨。1963年5月,爆发了佛教徒反对吴庭艳将天主教国教化的斗争。佛教教徒的抗议行动以越南中部的古都顺化为起点,迅速扩大到全南越。在政府军的镇压下,许多僧侣遭杀害。有些僧侣为了抗议甚至自焚和绝食。8月,吴发布了戒严令,进一步加强对佛教教徒的镇压,但反而引起了学生和军队支持佛教教徒的运动。美国也抛弃了吴的政府。11月1日,杨文明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吴被杀。

吴垮台后,美国加紧对南越的军事支援,并以北越正在支援南越的反政府势力为由准备进攻北方。

美国的全面介入

1964年8月2日晚上,发生了在北越沿岸的美国驱逐舰遭

到北越鱼雷艇攻击,美舰反击击沉鱼雷艇两艘的事件。4日,美国海军作为报复,空袭了北越,破坏了25艘巡逻艇、4个基地和石油储存基地(即北部湾事件)。

在上一年肯尼迪总统遭暗杀后就任总统的约翰逊谴责说,这是“北越在公海上的公然的侵略”,并要求国会同意“总统为击退对美军的武力攻击和防止侵略的再度发生,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国会通过了同意的决议(8月7日)。据事后的美国国会的听证和记者调查,一般看法是:当时美国驱逐舰正在北越沿海海域进行收集情报活动,侵入了共产圈各国主张的12海里领海。受美国支援的南越海军以阻止对南方的补给为由对北越沿海岛屿进行了进攻。战争的挑起者是南越和美国方面。美国驱逐舰遭北越鱼雷艇攻击的情报显然是令人怀疑的。

为了使对南越的全面军事介入和把战争扩大到北越正当化,美国政府和军队把这一事件作为说服美国人的借口。1965年2月7日,美国开始了对北越正式和持续的轰炸。这被简称为“北轰”。3月12日,南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与解放阵线直接交战。6月28日以后,美军与解放阵线势力展开了正式战斗。战争扩展到整个南越。

为了抵抗美国的全面军事介入,北越向南方派出了正规军,与解放阵线共同作战。苏联向北越提供了地对空导弹等武器,越南成了两个体制较量的场所。在美国,不断有人要求动用核武器。尽管没有使用核武器,但动用了其他所有武器。为了对付游击战,使用了杀伤力很强的凝固汽油弹和子母弹,并喷洒了大量枯叶剂。越南的美军在1965年2月有2.35万人,而到同年12月增加到18.1万人。到改为实行削减陆战队方针之前的1969年6月达54.3万人。韩国、菲律宾、泰国的军队也参加了越南战争。但是,美国并没有在军事压制南越上取得成功。

解放阵线将据点设在密林中，他们控制了农村，实施了减租和土地再分配，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他们经常在城市进行闪击战，甚至用火箭炮和炸弹袭击美军。美军和南越政府军在农村地区进行的“扫荡战”，在解放阵线方面的巧妙作战和强大反击下终于失败。北越军队经常通过老挝的密林渗透南方，对南越政府军和美军据点发起总攻击。在南越，即使在吴庭艳政府垮台后，统治势力和军队内部的对立也不断恶化，经常发生政变。1967年9月，以军人阮文绍为总统、阮高其为副总统的政府成立。

在美国举行总统选举的那年，美军为了向美国人显示其在越南的军事优势而加强了攻势。而解放阵线和北越方面为了重创美军，使美国的舆论转向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在同期也加强了进攻。1968到1972年，战争不断升级，死伤无数。

越南和平会谈

约翰逊总统终于承认越南问题“军事解决”是不可能的，并开始摸索“政治解决”的道路。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从4月1日起停止对北纬20度以北地区的轰炸，同时表示不参加下届总统选举。5月10日，美国和北越在巴黎进行预备性会谈，5月13日进入正式会谈。美国主张：“只要北越停止对南方的‘侵略’，美军就从越南撤出”。北越认为：“正是美国才是侵略者，美军必须从越南全面撤退”。虽然会谈陷于僵局，美军也增加了，但很难让美国人相信战争的正当性。士兵士气低落，逃兵也日益增多。10月31日，约翰逊声明，全面停止对包括北纬20度以南地区的北方的轰炸，同意南越政府和解放阵线代表参加巴黎会谈。

由美国、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南越政府、南越民族

解放阵线四方参加的扩大的巴黎会谈于1969年1月18日进行了预备会谈，1月25日进行了正式会谈。解放阵线和北越要求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阮文绍政府，并要求美国和其他参战国完全撤军。美国 and 南越政府方面要求北越军队撤退。

1969年1月，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一面削减陆战队，一面扩大了在南越、柬埔寨、老挝的战斗，企图掌握战争和谈判的主动权。尼克松的越南政策虽然要实现军事停火，但让南北政府并存。6月8日，尼克松在中途岛与南越的阮文绍总统举行了会谈，商定美国将支持阮文绍政府，将为加强南越政府军提供援助。7月25日，尼克松在访问亚洲各国前发表了被称为“关岛主义”的基本政策，即：“美国将履行条约上的义务，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直接受其他国家威胁的国家必须为本国的防卫提供人力资源”。尼克松以美国撤军为条件，通过飞速加强南越政府军谋求建立防止共产化体制。

1969年6月6日至8日，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在解放区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为使巴黎和平谈判引向“关岛主义”方向而扩大在南越的战争的企图，在解放阵线方面的抵抗下失败了。南越政府军虽然加强了武器装备，但士气却一落千丈。

约翰逊时期的美国政府，一方面想避免中国影响的渗透和参战，一方面想通过与苏联的会谈抓住越南和平的机会。在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中国的对外政策僵化，与苏联的对立进一步加深，因此中国介入越南战争的可能性缩小了。苏联经由中国大陆向越南运送援助物资受阻，只有依靠海路。

但是，尽管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还是有了提高。美国和日本虽然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中国参

加联合国,但到60年代末期这一政策开始破产。由于亚非新兴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迅速削弱。1971年秋,中国加入联合国,蒋介石政府被驱逐出联合国已不可避免。尼克松政府改变了方针,决定同时接近苏联和中国,想在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下在越南获得有利的和平条件。在中国方面,以周恩来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势力也感到有必要修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僵化的外交路线,希望与美国进行接触。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秘密飞往北京,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并决定尼克松访华。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将在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国。在对华政策上相信美国会与日本协商的诺言的佐藤首相受到很大震动。美国一方面想靠近中国,一方面加强了在越南的战争努力。1972年3月30日,当解放阵线和北越军队向南越主要据点发起攻势时,美军恢复了对北方的轰炸,4月16日轰炸了河内和海防。5月8日,尼克松宣布用水雷封锁所有北越港口。

巴黎协定

1972年夏季到秋季,基辛格和黎德寿在巴黎的会谈进入了最后阶段。双方就美国全面撤军,双方停止向南方两个势力提供军事援助,通过由南越3个势力组成的民族和解全国评议会解决内部问题等条件达成协议。在这时美国仍没有停止对北方的轰炸。12月18日,大量B52轰炸机对河内和海防进行了地毯式轰炸,炸死炸伤许多市民。

1973年1月27日,扩大的巴黎会谈的四方(美国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北越〉、南越共和国政府、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在越南和平协定和议定书上签了字。美军决定撤退,到同年3月29日前基本撤完。但是巴黎和平协定实际上带有美国与北

越的停战协定的性质。阮文绍总统的南越政府无视巴黎协定，依然掌握着政权，并用美国过去提供的大量武器弹药扩充了政府军人员。美国也把 24,000 名军人作为军事顾问留了下来。美国还在周围国家部署了许多兵力，并配备了第七舰队，维持着警戒体制。

1973 年 10 月，北越和革命临时政府决定继续进行解放战争。1974 年末到 1975 年春，北越军队和临时革命政府军在湄公河三角洲等整个南越发起了攻势。1975 年 4 月 14 日，阮文绍辞职，26 日就任总统的杨文明提出举行和平会谈，被临时革命政府拒绝。4 月 30 日西贡失守，杨无条件投降。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柬埔寨和老挝，以共产主义者为主的武装抵抗势力分别占领了首都，建立了革命政权。在柬埔寨，下台后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一度回国担任元首，但在 1976 年 4 月辞职了。以后掌握政权的波尔布特总理等人强制实行废除货币、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在共同体中劳动等极端的共产主义政策，制造了大量屠杀惨剧，并导致国土荒芜。

1976 年 4 月 25 日，在越南为使南北统一举行了大选，6 月 24 日成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由于美国的介入而扩大的越南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过朝鲜战争。虽然战争地点受到限定，但在两种体制的激烈冲突并具有国际性这点上是与朝鲜战争相同的。美国投入了远远超过朝鲜战争的兵力和武器弹药。

据估计，从美国的介入导致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开始，到巴黎协定签定为止的伤亡情况是：北越和解放阵线方面的指战员 227.7 万人，全部印度支那平民 440 万人，南越政府军 59.9 万人，美军 36 万人，其他参战国（韩国等）1.7 万人。难民达 950 万人。美军从 1965 到 1972 年末在南北越南投下的炸弹估计有

755万吨,为第二次大战中投下炸弹总量的2.7倍(樱井、石泽著:《东南亚现代史Ⅲ》P.291、260)。

随着越南战争的激化和以后南越政府的垮台,许多越南人流亡到了国外。即使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后,也有许多越南人乘着小船出国,到西方要求避难。据估计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开始以来逃往国外的越南难民总数达80万人。

为潜伏在密林丛中的解放阵线的攻击而大伤脑筋的美军喷洒了枯叶剂,使山林、农田变成一片荒野,药害还留下了出生许多畸型婴儿的严重后遗症。还发生了由于害怕解放阵线战士与民众打成一片而烧毁村庄、屠杀平民的事件。多数美国士兵对战争目的抱有疑问,他们已丧失斗志。在美国本土,出现了年青人拒绝参军的运动,并组织了反越战的运动。

越南战争及其失败降低了美国的威信,也导致美国人丧失自信。用于越南战争的巨额开支成了美国经济的沉重负担,加剧了财政危机,美元流出和通货膨胀。美国过于相信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又从防止共产主义这一单纯的使命感出发低估了亚洲民族解放的能量,导致过分介入而失败。这加速了美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反越战运动不仅在美国国内,而且也在世界各地展开。1966年春天,英国哲学家巴特兰德·拉塞尔向全世界呼吁设立审判美国及其他参战国的战争罪犯的法庭。在这一倡议下,196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同年11月在哥本哈根,分别开设了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越南战争罪犯国际法庭。反对越南战争和抗拒征兵的运动是60年代发达国家的学生斗争的重要导火线。

越南战争与日本

日本一直以各种形式与越南保持着很深的关系,如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战后对南越的援助，在越南战争时期同意把日本本土和冲绳供美国作为军事基地使用。

日内瓦会议后的 1955 年 10 月，鸠山内阁承认：南越政府是代表全越南唯一的正统政府，并从第二年即 1956 年 1 月开始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赔偿的谈判。岸信介内阁于 1959 年 5 月在西贡签定了赔偿协定。

越南战争增加了美军物资在日本的采购。这就是所谓“越南特需”。外汇收入增加了，有关产业的需求也增加了。美国对越南战争经费的支出，扩大了日本对韩国、台湾、泰国等有关国家地区的出口。许多日本企业以越南战争为契机加强了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日本本土作为美军的补给基地、休养地、第七舰队的停泊地而起了重要作用。冲绳和关岛也成为 B52 飞机轰炸北方的起飞基地。

针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日本政府的合作，日本国民发起了反对运动。1965 年 2 月，为抗议美国轰炸北方而举行游行示威的市民组成了独立于任何政党和政派的自主团体——“要求越南和平市民文化团体联盟”（简称“越平联”，1966 年改称“要求越南和平市民联盟”）。有小田实、开高健、堀田善卫、高桥和已、篠田正浩等人参加。越平联在 1965 年 11 月 16 日的《纽约时报》上登出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意见广告。除了市民自发的示威游行之外，越平联一直到越南和平协定后的 1974 年 2 月解散为止，还举行了校园讨论会、支持反战的美国兵脱离部队等独特的反战运动。这些运动开创了不同于受原来社会主义政党影响的某些社会运动，而由新的市民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越平联”活动代表了 60 年代日本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方面。

社会党和总评系统的各团体也掀起了反对核动力航空母舰

运动等反战运动。从共产党中分裂出去的新左翼派系的学生组织也展开运动，抗议佐藤内阁支持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政策。

在这种局势下，佐藤内阁虽然确立并坚持了拒绝将核武器带进日本的原则，但原则上没有改变对美国的越南战争的合作态度。佐藤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反共产主义信念而不改变支持南越政府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归还冲绳会谈上小心谨慎，害怕与美国发生摩擦，坚持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合作的姿态。

2. 共产主义体制的动摇

中苏冲突

由于美国害怕共产主义者对东南亚的控制而进行的军事介入，使印度支那的内战已一发而不可收。

北越政府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虽然以共产主义者为核心力量，但却拥有广泛得多的民族主义基础。正因为如此，能保持战斗力。美国的军事介入反而强化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斗志和战斗力量。越南的保守势力腐败不堪，他们游离于民众之外，丧失了统治能力。由于美国的介入，这些势力被指责为卖国贼。美国打着“维护自由体制”的幌子，支持反动政府用警察和军队镇压一切反政府势力。美国的军事介入加强了越南民族统一阵线中革命主义左翼的地位，扩大了北方对南方的影响，反而加速了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化。西贡陷落后的大量难民乘船出逃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府独裁政治等悲剧也与此不无关系。

越南战争虽然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亚洲的民族主义以及其中共产主义的作用，但并没有提高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国际威信。60年代中，暴露共产主义缺陷的事件相继发生，共产主义威信空前下降。其中之一就是中苏对立。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把与苏联的结盟作为基本外交政策，但在这个同盟关系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紧张。在中国共产党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以后，苏联在尖锐化的美苏对立下要求确立牢固的中苏同盟。作为其代价就是苏联归还满洲（东北地区）的特权，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新中国在国内外形势的制约和苏联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对苏一边倒”的态度。这导致了美国的“封锁中国”政策。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以后，赫鲁晓夫实行了非斯大林化和和平共处政策。1956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受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的影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奖励批评性言论。由于引起了超出预料的批评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言论，共产党转而展开了“反右派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采取了强硬路线，一扫建国以来统一战线政府的色彩，确立了一党专政体制。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用非斯大林化来防止本国统治体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摇，而不是废除斯大林主义。中国共产党攻击赫鲁晓夫的路线是“修正主义”。中国驳斥赫鲁晓夫与美国合作想在世界的政治秩序的现状下谋求稳定的和平共处路线，主张联合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路线。

1959年6月，苏联撕毁1957年的中苏新军事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技术。苏联害怕中国拥有核武器会激化国际紧张局势，而中国反对苏联妨碍它开发核武器。1960年苏联技术人员撤出中国。

1961年苏联共产党在新纲领中规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已经消灭，全民国家已经出现”。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处于“继续革命”的过程，阶级斗争将会继续下去。这一理论曾被用于斯大林肃清反对派，以后被用于中国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把苏联规定为与美国一样的帝国主义。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入侵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8月，在新疆边界附近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边界一直是自俄罗斯帝政时期以来纠纷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通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强化了一党专政体制以后，开始追求野心勃勃的社会变革路线，谋求生产力的飞跃扩大（大跃进）。并进一步合并农村合作社，组织了以“政社合一”（行政单位与生产单位一体化）的人民公社。但是，这些政策都遭到挫折。大力推行集体化丧失了支撑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物质诱惑因素。各地受鼓励的小工厂的产品质量低劣，根本不能使用。三年自然灾害使农业受到极大打击，苏联停止经济和技术援助阻碍了工业的发展。19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在经济方面虽然采取了“调整政策”，但党内对立进一步加剧。毛泽东来到上海近郊，组织自下而上的斗争，他得到军队里的林彪的支持并试图夺权。毛泽东于1966年8月召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组织了“红卫兵”运动，使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下台。红卫兵通过对毛泽东的崇拜动员了在政治上、社会上还不成熟的青少年的破坏力。毛泽东的亲信和林彪等人利用了红卫兵运动，攻击各级党的干部和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人。许多干部、作家、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久在文革派内部也出现了对立，进行了过激斗争的文革左派大势已去。林彪于1971年9月因飞机事故摔死在蒙古。据说这是在林彪发动政变谋杀毛泽东失败后逃往苏联的途中。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修正内外路线作了努力。在外交方面，

一方面打着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试图与西方接触。在实现加入联合国以后，又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和与日本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内政方面，排除文革派的抵抗，让邓小平重新上台，在1975年1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谋求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路线）。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故。文革派攻击了决心继承周的“四个现代化”路线的邓小平等人。4月5日，北京民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以悼念周恩来的逝世，表达对文革派的抗议心情。邓小平因这一事件再次下台。

同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7日，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等文革左派的“四人帮”被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收拾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了受害者的名誉，推进了“四个现代化”路线。

在日本，与关心苏联社会主义相比，很多人更关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对斯大林体制感到失望的人开始对新中国有了亲近感，并期望它有发展。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60年代中期，当文革在中国出现时，其真相并没有得到正确报道。日本的许多大报社害怕如果坦率地写批评性报道会导致特派记者被驱逐。当地记者也难以接触真相。日本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对以“造反有理”为口号的毛泽东和红卫兵抱有同感。有人还认为，人民公社和称之为“土法”的朴素的生产活动中有在发达国家的大规模产业所看不见的要素。

“造反有理”这一口号也被用于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中的学生斗争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新左翼的斗争口号。因为这是适合于破坏现存秩序、无视法制、开展实力斗争的口号。西欧的新左翼中，也有提倡毛泽东主义的少数派。

但是，对于日本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文革是他们对中国

社会主义失望的材料。他们对鼓励个人崇拜和不成熟青年势力的破坏行为的运动表示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文革与同期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一样，起到了使思想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契机的作用。文革的破坏作用远远超出这些人的想象，是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的。

东欧的共产主义

非斯大林化极大地动摇了东欧的共产党统治体制。1956年10月至11月的匈牙利革命以及苏联军队的镇压，就是其中最大事件。非斯大林化即使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也是以不彻底而告终。赫鲁晓夫下台后又出现了回潮。所谓完全的非斯大林化意味着否定共产党专政和完全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意味着彻底追究斯大林体制下用国家权力犯下难以想象的罪行的责任。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还没有经过充分改革，都还没有自由化。对制度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

在东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管各国人民是否同意，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下，成立了共产党政权。因此在东欧，要求民族自决的民族主义就成为公民的反制度运动的因素之一。

确立共产党在东欧统治的时期是斯大林时期的末期。东欧各国即使在共产党统治制度确立后也进行了许多捏造事实的审判。那里的共产主义者用恐怖主义迫使反对派沉默，并在容共派的合作下吞并社会民主党，掌握了专政权力。虽然也进行过所谓选举，但人们只能对单一的候选人表示赞成或反对，只有表示反对的人才被要求在选票上作记号，因此谁要是反对立即可以知道。甚至连弃权也被禁止，人们被强制拖到投票点。东欧共产主义体制无视现代民主政治为避免掌权者对政治反对派的迫

害而产生的秘密投票原则。共产主义体制下选举中的投票具有强制“踏绘”^①的含义。

一旦共产党的统治制度成立，共产主义者本身就成为这一制度的牺牲品。对肯定专政的革命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社会改革热情并为此献身的人们就会发生悲剧。许多非主流或反主流的共产主义者无辜成为斯大林主义者清洗的牺牲品。清洗经常是在苏联共产党的压力和暗示下进行的。受害者多以西方各国的间谍、反革命分子等罪名被判刑坐牢。

斯大林主义者的僵硬的对苏依附的经济政策，使各国经济丧失了活力，使粮食生产陷于混乱。许多国家被迫进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活动停顿。苏联用合资的形式，以极低的掠夺性价格拿走了东欧的矿物资源(煤、铀等)。许多东欧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与西欧各国在经济上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雅尔塔体制下的东西欧洲分割本身也是加重东欧各国经济困难的因素。

政治上自由和民主主义的要求，民族独立和树立威信的要求，纠正过去不正常审判的要求，纠正对法律践踏的要求，以及改善经济生活条件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潜在可能性开始在东欧各国出现。几个国家发生了民众暴动。斯大林主义的刻板统治者被拉下了台，遭受迫害的共产主义者集团又重新掌权。

苏联军队的入侵

斯大林主义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时期比其他主要国家都长。到60年代，人们日益要求修正路线。一部分作家和经济理论学家开始公开批评诺沃提尼的专政体制和僵硬的政治经济

^① 在江户时代，日本为禁止天主教的传播，强迫人们用脚踩踏绘有圣母像的木板和十字架，以示不是教徒。——译注

路线。但是，诺沃提尼在党内保守势力和苏联的支持下依然掌握着政权。改革势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得势是在1967年。从1967年末到1968年初，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诺沃提尼辞去了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

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是出身于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在改革气氛达到高潮时站在批判诺沃提尼的前列，在改革派中采取了稳健立场。1968年4月，改革派的切尔尼克、库里甘、斯姆鲁考夫斯基分别就任总理、国民战线(统一战线组织)议长、国会议长。诺沃提尼彻底垮台，辞去了总统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率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与苏联军队一起回国，为1948年共产党经过政变掌握政权作出贡献的斯沃博达被选为总统。

4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新的《行动纲领》。新行动纲领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是通过垄断权力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取得民众的信赖才能实现”。并强调：“保障人们有根据宪法所允许的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决定制定法律，保障公民根据各自的意愿组织各种团体和小组。审查制度被废除，共产党以外的许多政党和政治团体相继复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复活。社会民主党在1948年共产党发动政变后，不经民主征求党员意见就被迫与共产党合并而被消灭。

6月27日，作家同盟和工会等团体的机关报纸刊登了由作家巴兹利库起草，由70人签名的《两千字宣言》。宣言尽管批评了过去党与政府的一体化，但期待共产党发挥进步作用，鼓励公民之间的自由活动，主张在企业、党、各政府机构实现民主化。议会的讨论也日趋活跃。并且准备改革经济制度，以确立能加强企业自主性并由工人代表和消费者代表参加的经营机制。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的上台给西方国家的左翼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两千字宣言》中的“重视人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打动了这些人的心。广大关心东方国家恢复自由的人们注视着改革的发展。但是，美国和西欧的政治领导阶层以及军方人士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对立加剧，担心类似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的事态出现。显然，西方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的支持有导致苏联干涉的危险。但美国和西欧各国并没有用实力阻止苏联的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必须避免孕育着核战争危险的东西方武力冲突。

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共产主义制度的统治者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正在脱离共产主义者所允许的范围。采取使共产党的地位相对化的立场，允许多种政治团体活动的立场无非是接近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断定，一旦保障自由化，废除审查，搞活政治活动，共产党就难以维护压倒多数的优势。东德的共产主义者大肆抨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与苏联、东德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了一场毫无结果的论战。6月份，苏联军队以演习为名进驻捷克斯洛伐克。

7月1日，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代表举行了会议。第二天，发表了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联合信件。信中指出：“反革命危险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增长”，并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改变方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者进行了反驳，但争论没有深入展开。7月29日到8月1日，杜布切克与勃列日涅夫在接近苏联边界的捷克小镇切尔那进行会谈。

8月20日夜里，以20万苏联军队为主的华沙条约组织五国军队入侵了捷克。捷克方面避免了武力抵抗，防止了流血悲剧的发

生。继约 12 年前的匈牙利之后，捷克的对民主主义和自由的希望也被坦克压得粉碎。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要为了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利益而受限制”这一“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军队“逮捕”了杜布切克以下的领导人并把他们带到莫斯科，强行撤回了改革路线。杜布切克在 8 月 27 日表示，不得不暂时限制自由化。改革派有的被清洗，有的辞职。1969 年 4 月，杜布切克也被解除职务，亲苏派的胡萨克实施了称为“正常化”的相反政策。

捷克事件是继匈牙利事件之后公然的苏联军事干预，它对西欧和日本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冲击。捷克改革派的主张是关于民主主义、基本人权、自由的正当要求，改革手段也是稳健的。捷克的改革派也强调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尽管如此，苏联军队还是进行了干预。

在 1963 年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中国的立场并与苏联共产党对立的日本共产党也批评了苏联的入侵。日本共产党在以后还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对立，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立场。

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经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痕。

西方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三个动向。

第一，谋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谋求适应西方各国经济增长这一现实，从组织上脱离共产党的动向。一部分对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体制失望，对斯大林体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深感幻灭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诀别，中断了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他们根据以经济增长带来物质富裕为背景的国民意识的变化，

在尊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准备重组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出版《新左派评论》，开展新的左翼思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小组就是其中一例。

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分裂。1917年11月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的革命主义运动的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否定通过议会实行渐进改革的可能性，主张以武力夺取政权。在它的领导下，组织了共产党。由列宁建立、斯大林统治的共产国际从革命主义的立场出发攻击了社会民主主义。对重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议会制度的立场的重新评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可能会使严格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丧失存在的意义。事实上，决心在民主主义社会中进行有现实性的改革的原共产主义者中，甚至有人不惜通过参加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贯彻其主张。西德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就有过这种经历的社会主义者参加，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由共产党的支配性集团自身进行的“零敲碎打”的路线修正。他们虽然将“新左翼”的主张作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排除，但不得不承认革命主义路线的非现实性，并认为除非加强议会制下的政治地位，否则组织没有生存下去的条件。事实上他们尝试了用各种形式对列宁主义路线进行修正。

从战后初期就曾作出这种尝试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劳动计划”、“反垄断民主改革”、“各种结构性改革”就反映了这一点。甚至连有着更强的斯大林式的体制，同时又采取朴素的反美和民族主义路线的法国共产党，在70年代也开始微妙地修改了意识形态的立场。葡萄牙共产党和由于佛朗哥总统死后民主主义恢复而取得合法地位的西班牙共产党，推进了实质性的后斯大林主义化。这些政党依然举着共产主义旗

帜，虽然还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暧昧关系，但主张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运动。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一立场包含着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事实上否定革命主义路线，另一方面一定要保持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主流的组织上的地位。

第三，从“左”的方面展开了对共产主义运动主流的强有力的批判和攻击，即要恢复革命主义传统。随着共产党领导人一面维持权威主义和官僚主义体制，一面表示出事实上复归社会民主主义主流的征兆，来自“左”的批判越来越强烈。对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反驳，对主观的理想主义的朴素的共鸣，以及正在被重新认识的托洛茨基思想的影响，使一部分共产主义青年走上了新的革命主义道路。

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多少已经参予统治，并采取了对福利国家的形成和经济增长负责的立场。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这种成熟和稳定也对憧憬于革命动乱的青年起到了激进作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也有吸引青年阶层的要素。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革命主义潮流，同时包含了不同于欧美思想、欧美文化传统的要素。令人感到它能突破起源于欧美的整个现代文明的薄弱环节。如此形成的新的革命主义激进派虽然也叫“新左翼”，但其运动在本质上并没有新东西。他们经常诉诸暴力，轻视人命和人权，让毫无希望的破坏行为正当化。

这样，在更根本的思想和文化再探讨的基础上采取更现实主义的改革行动的理性的“新左翼”，与夸张地甚至讽刺地呈现出游离于革命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现实暴力性“新左翼”，便形成了僵化的传统左翼运动周围的新的少数派。暴力主义破坏性的“新左翼”的主张，吸引了一部分投身于60年代突发的“繁荣中的叛乱”的青年，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成了毁

灭他们的运动的因素。

3. 繁荣中的叛乱

在富裕之中

60年代是发达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时期。充分就业开始形成,最低收入水平开始上升,公民各层次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在社会民主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西欧建立了福利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即使象美国和日本这些具有明确的福利国家思想的政治势力比较弱的国家也逐渐走向福利国家。

周密组织的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工会,致力于现存体制中争取满足要求的运动。工会与农民团体以及其他经济团体一起成为强有力的压力团体。作为改革或革命运动的执行者的劳工运动这一形象消失了。虽然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受革命主义影响的工会,但现实的行动始终倾向于拥护该集团的既得权益。各种新集团构成社会少数派,他们要求取得权利的运动开始从其他地方发展起来。

在美国,以肯尼迪政府为开端爆发了黑人的公民权运动。为抗议长期受压迫和受歧视的黑人运动常常举行暴动。1964年夏季,一黑人少年被白人便衣警察开枪打死。黑人举行了抗议集会和游行。群情激愤的黑人袭击了商店,最后变成了大规模暴动。1965年,在洛杉矶黑人地区瓦兹发生了大暴动。一星期中34人死亡,1000人负伤,数百幢大楼被烧。为恢复秩序还动员了1500名士兵。1967年各地也频频发生了流血暴动。底特律有43人被杀,7200人被捕。黑人斗争孕育着稳健派与过激派的内部对立,已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因素。1968年4月,持非暴力主义立场的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愤怒的黑人在全国各地举

行了暴动。

联邦政府也开始为维护黑人的权利进行制度改革和采取政策性措施，但重视形成社会少数人权力的动向仍进一步扩大。继黑人运动之后，来自中美地区的移民也开始要求权利，妇女运动也爆发出来。告发大企业的反社会行为的消费者运动也出现了新趋势。汽车、农药、医药品等的危险再次成为问题。还出现了自发的市民运动跨地区联系的动向。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上升，消费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与购买物质财富相比，服务性支出更多。有关知识和信息的支出增加了。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升学率迅速上升。大学教育的规模出现膨胀，学生数量剧增。学生成为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的强有力势力，开始提出各种目标并进行斗争。学生斗争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流行病。

60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开始于对黑人的民权运动的共鸣。1960年春季，组织了“学生非暴力调整委员会”，不仅有黑人学生参加，也有白人学生参加。美国北部出现了“走向民主社会的学生”的组织。

学生斗争与反对越战

1964年，旧金山郊外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斗争。9月，大学方面禁止大学正门前的地方用于政治活动，学生对此提出抗议，并建立了“言论自由运动”组织。学生最后占据了大学本部。大学方面叫来了警察部队，有800多人被捕。以后，该校教授会考虑了学生的要求，提出了大学改革方案，并经学生的同意付诸实施。这成为美国全国学生斗争的导火线。各地出现了批评大学管理体制、要求学生参加决策的运动。1968年，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掀起大规模斗争，出现了

占据建筑物、动用警察、大量逮捕的情况。

已经形成一个社会集团的学生们要求自由活动，而与旧的大学管理体制相冲突。这种学生斗争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进一步与反越战运动相结合。1965年3月，密执安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围绕越南战争举行了长时间的“校园讨论会”（teach-in）。“校园讨论会”在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威斯康辛等各大学举行，最后扩展到全国。1967年4月，纽约爆发了20万人的反战游行。有人还举着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150名青年焚烧了征兵卡。1970年5月，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发生了反对美军侵略柬埔寨的学生游行。州的士兵进行了镇压，打死4名学生。全国各大学为此举行了抗议运动，进行罢课和封锁大学。

在被认为最进步、最民主的民主党肯尼迪政府下，美国以保护自由为名深深介入越南战争，支持亚洲的反动势力，使许多美国青年为此流血。确信美国的进步性和民主性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些事实后受到很大冲击，从而有一种受挫感。学生的行为尖锐地反映了这种气氛。但是，这种运动一旦发生，处于美国深层的顽固的保守性就表面化了。州的士兵和警察无情镇压了学生，造成许多伤亡。

在很长时期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少的国家——美国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出现了重新发现马克思思想的动向。但是，并没有导致引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整个抗议现存体制的学生运动充满着左翼色彩，但在传统的左翼早在遥远的过去就已消失了的美国，是不可能理解共产主义的目前潮流的。尽管如此，他们的领导势力还是标榜为“新左翼”。

正如斋藤真所指出的那样，青年们对制度的批判并不是象过去的左翼运动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单一意识形态为支柱，而是具有多种思想背景。他们即使在反对越战上取得一致，也

并没有拿出对抗性政策和替代性体制的具体方案，他们的立场经常尖锐对立。斋藤指出：“但是在反对现代工业社会，反对机械化、高效、并忽视人的管理的社会所具有的封闭性方面，可以说是一致的。”斋藤进一步指出：“从60年代后半期的青年中常见的嬉皮士打扮，嬉皮群体的形成，大麻和迷幻剂(LSD)等麻醉剂的流行，以及性革命中，可以很容易看到对现存道德主义、技术主义、划一主义的抵抗和反抗的姿态。”(斋藤真著：《美国现代史》P.296)

法国的五月危机

法国在196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斗争，动摇了戴高乐体制。

戴高乐是在1958年6月由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和法国军方作出反动性对策，法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之际掌握政权的。总统权力被加强了，第五共和制度成立了。在温和的改革派没有发育的法国，戴高乐体制是一种解决方案。戴高乐使法国脱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全力进行经济现代化。戴高乐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现代化产生了保存传统秩序的管理社会化倾向。经1962年公民投票建立了总统的直接选举制。在1965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激进社会党的密特朗也是候选人，并成为戴高乐的竞选对手。结果戴高乐得票54%，密特朗得票45%，戴高乐远没有达到压倒多数。

1968年3月，在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学生为抗议同伴的被捕举行了罢课，并占领了建筑物。南泰尔是由于学生的剧增而在郊外新设的分校。抗议运动波及到了巴黎大学总校的索邦。5月3日，大学当局叫来警察驱散了正在索邦召开的学生集会。5月10日，学生在大学内的卡尔切·拉旦道

路上构筑路障，堆积石块。共产党指责学生的行动是“极左冒险主义”。警察施放了催泪瓦斯，而学生用焚烧路障以示对抗。蓬皮杜总理保证释放被捕者，重新开放索邦和促进大学改革。5月13日学生占领了索邦的校舍，宣布成立“学生公社”，并提出巴黎大学是自治的大学、人民的大学，将向全体劳动人民开放。占领持续了约1个月。索邦附近有名的奥台翁剧院也被学生占领。5月13日是10年前驻阿尔及利亚部队反叛、戴高乐上台的纪念日。左翼政党与工会在巴黎市内的共和国广场组织盛大集会和游行。正在进行斗争的学生组织也参加了，学生代表还进行了演说。

据河野健二说，巴黎大学的斗争对过去漠不关心的一般学生和地方大学有很大影响，也给以工运为中心的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很大震动。未组织的青年工人开展了不受工会领导的“山猫罢工”。他们学着学生的样子，占领工厂并实践了工人管理。广播、报纸等新闻业的专业的、有知识的劳动者也要求企业的自主管理和编辑权的独立。

法国的工会并不是包罗所有工厂工人的组织。最大的组织是CGT(法国总工会)。它以现有主要产业的熟练工人为主，受共产党的影响。未熟练和未组织的青年工人既反对企业的管理体制，也反对CGT和共产党的管理体制。在飞机工业和汽车工业也出现了要求自主管理的斗争。他们的行为既是对产业社会的管理体制的抗议，同时也是对现存左翼的抗议。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很有影响力。

五月危机动摇了戴高乐体制。戴高乐提议就大学改革、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地区开发等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但人们对这个实际上赋与总统无限权力的提案的评价并不好。戴高乐指令蓬皮杜总理，让工会同经营者团体签订了改善待遇的协定。5月30日，戴高乐在军方的合作下宣布解散国会和举行大选。这天

夜里举行的从协和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的支持戴高乐游行超过了左翼势力过去组织的游行。在6月23日和30日的大选中，戴高乐派取得胜利，在少数政党分立的国会中取得接近单独过半数的46%的席位。

五月危机虽然也称为“五月革命”，但实际上远远不能算作“革命”。原有左翼没有掌握政权的准备，新左翼虽然暂时掀起了运动，但并没有持续下去的力量。大多数公民都热烈拥护重视秩序的戴高乐。但是五月危机对法国政治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满于CGT统制，要求“自主管理”的工人们参加了CFDT（法国民主劳动同盟），加强了社会党派系的运动。法国社会党虽然历经分裂和衰败的复杂过程，但要求重建的呼声日趋高涨。1971年6月，旧社会党派系的各派和一部分新左翼势力联合组成了新社会党，选出密特朗为其领袖。社会党在70年代扩大了势力，超过了一直处于低落的共产党。在1981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由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左翼联合推举的密特朗当选。

五月危机对其他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冲击。美国的学生斗争中有很强的越南战争色彩。而巴黎大学的学生斗争中明显地反映了抗议国家和大学对学生的管理体制的色彩。法国的学生斗争促使采取独特立场的新左翼出现于这个老的左翼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势力的国家。而且，法国的学生斗争还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并成为左翼政治运动重组的契机。但是，从整个欧洲来看，新左翼运动并不能讲获得了成功。一部分新左翼，如法国社会党，加入了非斯大林主义左翼，另一部分则参加了环境保护运动等新的市民运动。还有一部分新左翼用个人的恐怖活动等其他破坏活动来表示对体制的抗议。他们进行了许多恐怖活动，如西德、意大利就是典型。这些行动使他们越来越游离于整个社会之外。

日本的学生运动

60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是一个围绕着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微妙差异而使分裂和斗争不断尖锐的过程。各学生活动家集团围绕着三个内容展开了运动。

第一，以反对日韩基本条约、反对核潜艇进港、反对越南战争等为政治目标的少数活动家企图使街头行动尖锐化的活动。

1967年5月28日，“三派系”和“革马系”^①的各全学联组织为反对扩建东京都下立川基地，在基地大门口进行了静坐示威，并与机动队发生了冲突。10月8日，“三派系”和“革马系”的各全学联和反战青年委员会在羽田机场附近为阻止佐藤首相访问南越而与机动队发生了冲突，导致京都大学学山崎博昭死亡。11月12日，上述组织为阻止佐藤访美又组织了斗争。

1968年1月15日，许多“中核派”学生因为为阻止“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进港而集结，被指控犯有“准备和收集凶器罪”。学生活动家们为与警察部队对抗经常头戴钢盔，手持钢管。钢管也成为内战的武器。各组织除了集结在佐世保进行阻止“企业号”的斗争外，还在东京举行了抗议集会，并冲进了外务省和美军的王子野战医院。在同年10月21日的“国际反战日”，以“三派系”全学联为中心的学生集结在东京新宿车站周围，占据了站台并纵火，有73人受指控犯有骚扰罪。

60年代末，“新安保条约”的10年期限即将到期，为此学生打出了“70年代安保斗争”的旗帜。佐藤内阁并没有就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和延长问题与美国举行会谈，而是采取了自动延长的方针。

^① “三派系”指全日本学生自治学总联合(简称“全学联”)中的“中核派”、“社会学同”和“社青同解放派”；“革马系”指“全学联”中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译注

第二，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和斗争，并通过激化这些运动，加强反政府的气氛。

1966年7月，政府决定在千叶县境内的成田地区兴建新东京国际机场，引起当地农民强烈的反对。“三派系全学联”支持“新东京国际机场反对同盟”的斗争，展开了阻止建设的行动，多次与警察发生冲突。

第三，发展建立在一般学生对大学不满和批判基础上的学生斗争。

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水平的提高，学生生活的基础有了改善。在这一过程中，只有全学联各派的活动家们的行动日趋尖锐，因此一般学生开始远离这些运动。学生斗争越来越成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少数活动家的斗争。但是，随着大学教育的量的扩大，大学本身面临的问题也经常表面化，有更广泛基础的学生运动也不断爆发。

许多学生对大学的巨型化怀有不满，因此只要陈旧的大学管理体制暴露出其弊病，它就会成为激怒学生的导火线。更主要的是，由于60年代的慢性通货膨胀，生产率不可能有较大提高的大学教育的费用也随之上升。大学给人的印象是采用大批量生产方式而且教育质量低下，然而大学方面还不断提高学费。这就是各大学产生纠纷的原因。

1965年1月，庆应大学由于学费上涨而爆发了全体学生的罢课。4月，在高崎经济大学，学生为反对入学舞弊而举行了全体罢课导致在9月动用了警察。12月，早稻田大学由于学生会馆管理问题而发生了纠纷，警察也进行了干预。

1966年1月，由于反对学费上涨和学生会馆管理问题，在早稻田大学出现了全体学生罢课。同月，在东京大学医学部由于实习医生问题，学生对毕业考试进行了抵制。2月，早稻田大学

“全学共斗会议”与大学方面的会谈破裂，学生占领了大学本部。大学方面再次叫来了警察驱赶学生，大批学生被捕。在严格的警戒下进行了入学考试。12月，在明治大学为反对学费上涨进行了总罢课，在中央大学也由于学生会馆管理问题而出现了示威活动。

1967年1月，高崎经济大学为反对大量入学舞弊和反对处分学生再次爆发了罢课。2月，明治大学出现了反对学费上涨的斗争。9月，在法政大学，警察的机动队干预了大众团体要求撤回对学生处分的交涉，许多学生受到指控。由于学生们采取了以团体交涉的名义长时间扣留大学负责人并强迫其妥协的战术，大学方面也针锋相对经常叫来警察机动队。不少进行激烈的街头示威的学生活动家还占据一部分大学设施。1968年2月，国立大学协会表态：根据情况让警察进入校内是不得已的。

1968年1月，为反对学费上涨，中央大学爆发了总罢课，大学方面于2月撤销了上涨决定。

东大斗争与日大斗争

1968年春，东京本乡的东京大学医学部的纠纷开始激化，发展为全面的学生斗争。

医学部的学生多年来一直强烈要求废止实习医生制度，但毫无进展。2月19日至20日，在东大医学部附属医院内，医学部学生、研修生与医院院长发生了冲突。2月21日，大学公布了对17名医学部学生处分（其中勒令退学4人）的决定。学生方面提出了抗议，要求撤销处分，被处分的一名学生还出示了当时并不在现场的证据。医学部的年轻研究人员也有人认为处分不当。但是，医学部教授会列举了医学部的学生活动家擅自占领医学部本部和安田讲堂的事件及监禁有关人员等集体暴力行为的事

例,呼吁排除这种“异常事态”。

医学部“全学同斗会议”的学生活动家于6月15日以大学方面没有接受要求为理由,占据了安田讲堂的钟楼。17日凌晨,应大学方面的要求,警察机动队进入了讲堂。由于学生在此之前刚退出,因此没有发生冲突。引进机动队事件导致纠纷扩大到全校,因为不管怎样学生对叫来警察强烈反感。许多学部和研究所的学生或青年研究人员都举行了抗议行动。6月20日,除法学部之外的8个学部举行了罢课。法学部也召开了学生大会。26日以后,文学部学生、新闻研究所进修生开始进入无限期罢课。各学部和各专业的学生、研究生院的学生也先后参加了罢课。7月2日,“全学共斗会议”再次封锁了安田讲堂。9月12日,位于目黑区驹场的教养学部办公大楼也被学生封锁。亲共产党的学生组织解除了一部分封锁,反日共的学生又再次封锁,学生内部的对立也日趋表面化。10月11日,法学部也在深夜召开学生大会,决定无限期罢课。

11月1日,校长大河内一男和全体评议员宣布辞职,4日,学部部长会选举法学部长加藤一郎为代理校长。加藤代校长为统一教师方面的意见,多次召开会议,但均未获得成功。如何对付学生的斗争,这在教授之间也有分歧。加藤代理校长为纠正对医学部学生的处分作了努力。学生方面封锁了图书馆和研究室,并拘留了学部部长,要求进行团体交涉。11月4日以后被围困于团体交涉的文学部部长林健太郎于11日被用“暂停”的方式解救出来。

随着斗争的尖锐化,学生组织之间也爆发了冲突。11月12日,全学共斗派系的学生与亲共产党的“民主化行动委员会”在位于本乡的图书馆前发生了冲突。第二天在教养学部也发生了冲突事件。11月22日,两派分别举行了集会。仅仅是用钢管

和头盔等“武装”起来的武装人员就有1万人。以后，在本乡和驹场两处校内，企图强行封锁的全学共斗和对此反对的民主化行动委员会多次进行了内战。

1969年1月9日，全学共斗派和亲日共的学生再度在本乡的校内发生冲突。为了制止冲突，应大学当局请求，警察机动队进入校内。16日，6个学部决定结束罢课。全学共斗的活动家采取了加强封锁的方针。18日，应大学方面的要求，警察出动了8500人的机动队，开始用武力解除对安田讲堂的封锁。机动队用催泪弹和催泪水进行攻击，学生则用汽油瓶和石块抵抗。19日，封锁被解除，许多学生受到指控。第二天即20日，文部省决定停止这一年的东京大学的入学考试。

与东大斗争同时进行的是日本大学的大学改革斗争。

日大历来以学生人数多的巨型大学而闻名，在经营上实行校长一人的专制，现代化要素很少，在财务和人事方面透明度也不强。对于某些教授，大学干部还以“不符合大学的思想”为理由强迫他们辞职，大学里充满着践踏学术自由的空气。学校里经常发生“应援团”等体育会的学生的暴力行为，大多数一般学生也存在着不满情绪。“应援团”还用暴力手段妨害学生的自治组织——学生会的活动。

1968年1月，理工学部的一些有名教授被查出逃税5000万日元。2月，东京国税局同时开始对日本大学本部和全部11个学部和12个附属高中检查。4月，公布去向不明的资金达20亿日元（以后改为30亿日元）。几乎在同时，经济学部会计课长失踪，理工学部会计课的女主任自杀。受暴力行为的妨害被迫保持沉默的学生们也奋起要求大学民主化。学生们在各自学部举行了集会，大学方面则百般干扰，如拉下卷帘门将学生们关在会场内。亲体育会的学生还冲进会场，并用暴力手段占领了会场。

斗争扩大到所有学部。5月27日，成立了全学共斗会议。以亲体育会的学生为中心的校内右翼势力袭击了亲全学共斗会议的学生，致使多人负伤。

6月11日，全学共斗举行大规模集会，有5000名学生参加。右翼学生对此进行了袭击，为此，警察机动队也出动了。全学共斗为反抗暴力，占据了一部分校舍，并修筑了路障。罢课和占领校舍迅速波及所有学部。警察队驱赶学生的游行和静坐示威，并逮捕了一些学生。大学方面一直拒绝学生关于团体交涉的要求。9月，在警察机动队的干预下，路障被破坏。在教师中这时也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动向，9个学部的教师成立了联络协议会，800名教师还联名要求理事总辞职。9月30日，首次约有1万学生参加的团体交涉在日本大学礼堂（原国技馆）举行，但以后大学方面拒绝了团体交涉。另一方面，警察对全学共斗的议长等学生方面的领导人发出了逮捕证，这些学生开始转入地下。斗争被扼杀，不得不进入低潮。

学生斗争的余波

东大斗争和日大斗争尖锐化的1968年也是法国学生斗争高涨的一年。学生斗争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在日本国内到处可见校园纠纷，甚至在一部分高中也发生校园纠纷。但是，各大学的学生斗争的内容和目标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而且在斗争的过程中还经常发生变化。

东大斗争的发端是医学部学生的权利要求，是对旧的医学部和附属医院管理体制的反抗。在引进机动队后导致斗争扩展到全校的时候，学生的权利要求成了一般的动机。除一般学生外的研究生院学生和青年研究人员（助手等）的不满也是使斗争向前发展的因素。但是，随着运动的激化，学生斗争的各个派系

之间展开了对立抗争。尤其是亲日共的和反日共的派系之间的对立尖锐了。参加全学共斗会议的活动家一般讨厌这种派系对立的影响，他们因而被称为“非派系激进分子”。

在要求搞好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这一舆论压力下，大部分学生开始收拾残局。学生活动家集团逐渐孤立，他们铤而走险，加强了封锁，结果被警察机动队排除。全国的电视台都播放了安田讲堂因被投掷汽油瓶而燃烧的情景。

东大斗争是未来的国家尖子的斗争，而日大斗争则是象征着大学大众化时代的斗争。随着经济的增长，升学率上升了，学生数也增加了，但接纳更多的学生的学校却是私立大学。其中尤其是日本大学完全追求“大批量生产方式”，而且在学校管理和教学方法上维持旧的一套。校内民主主义，不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都受到压制。

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学生斗争只能是要求民主的斗争。学生活动家没有与革命主义的左翼意识形态发生联系。他们反抗右翼暴力学生和机动队的镇压，不得不采取了封锁和筑路障的战术。日大斗争所处环境之险恶是东大斗争所无法相比的。

被称为“新左翼”的革命主义的各种集团的斗争力量，虽然一部分助长了这些学生斗争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失去了原来民主主义改革斗争的意义，并出现了为自己的目的搞尖锐斗争的倾向。学生斗争在几所大学里产生了各种各样改革制度的动向。对学生数的增加和研究领域的扩展，大学改革有其必要性。就提出这一必要性来看，学生斗争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名义下，也出现了促进放弃一切管理和领导的倾向，结果导致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教育质量下降。为使这种无秩序、不负责任的行为正当化，“造反有理”的口号被广泛使用。如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过的那样，在学生斗争中使斗争形态进一

步尖锐的革命主义各派,在学生斗争陷入挫折和低潮之后,采用了一些更为孤立的斗争方式。

一部分“新左翼”集团甚至采用爆炸这一类绝望的破坏行为。

1971年6月,在东京明治公园召开的阻止归还冲绳的集会上,“赤军”派向警察机动队投掷了铁管炸弹,造成37人负伤。以后,命名“黑地狱”、“赤军”、“RG”、“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少数激进集团在各地展开了爆炸斗争,杀害许多警察及其家属和一般市民。同年12月18日,一个邮包在警视厅警务部长家里爆炸,部长夫人被炸死。12月24日,一颗挂在东京新宿交通岗亭附近圣诞树上的炸弹爆炸,12名警察被炸伤。第二年的1972年2月3日,一颗定时炸弹在自卫队东京地方联络部大田办事处爆炸。

在此同时,打入东南亚和韩国的企业的本部和工厂也成为炸弹攻击的目标。

1974年8月30日,在位于东京丸之内的三菱重工业公司总公司大楼门前发生了定时炸弹爆炸。由于刚过中午,造成行路的一般市民8人死亡和376人负伤的惨案。10月14日,一颗定时炸弹在位于东京西新桥的三井物产总公司三楼爆炸,17人负伤。11月25日和12月10日,在东京日野市的帝人中央研究所和东京银座的大成建设大厦先后有定时炸弹爆炸,炸伤多人。

1975年2月28日,间组公司的总部(在东京青山)和大宫工厂发生定时炸弹爆炸,5人受伤。4月19日,打入韩国的企业的总部大楼(位于东京银座和大阪尼崎)同时发生定时炸弹爆炸。5月4日,在间组公司的京成电气铁路江户川铁桥工程现场,发生定时炸弹爆炸。11月21日,一颗安放在灭火器中的定时炸弹在位于大阪中之岛的三井物产大楼爆炸。

1976年3月2日,定时炸弹在北海道厅的门廊里爆炸,造成2人死亡,95人负伤。

日本激进派集团的斗争,还以“日本赤军”等名义在海外展开。

如1972年3月袭击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1973年7月在荷兰上空劫持日航飞机;1974年2月袭击新加坡的壳牌石油公司和占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同年袭击了驻荷兰海牙的法国大使馆;1975年8月将美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领事等52人扣为人质,要求释放激进派嫌疑犯并允许他们出国;1977年9月在孟买上空劫持日航飞机。

虽然搞这类斗争的集团仅仅是少数,但由于斗争形态激烈,极大地危害了一般市民。在斗争逐渐少数化和尖锐化的同时,学生也日趋颓废。随着内战的发展,革命主义各派青年的相互残杀也日益激烈。

1972年2月19日,5名自称“联合赤军”的激进派成员冲入位于轻井泽的河合乐器公司的浅间山庄别墅,将管理人员的妻子扣作人质关在屋里。直到28日,警察才救出人质并逮捕犯人。犯人用步枪进行还击,两名警察被打死。3月7日,一具联合赤军成员的尸体在群马县境内的山林中被发现,结果查明在集团内的私刑中有16人被杀害。以后根据被捕者的供认,又陆续发现了尸体。

4. 信息化社会

经济增长的极限

由于60年代的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动。其结果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和背景也开始发生变

化。

第一,由于前所未有的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中老年人对那个贫穷艰苦年代还记忆犹新,他们保持着过去那种埋头苦干的习惯,但是将富裕社会当作现成条件接受的青年一代开始表现出他们不同于过去一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所谓“嬉皮士”的增加即象征着这种变化,学生对权利的主张也反映了这种变化。一部分青年不能理解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某种秩序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基本关系,他们否定从合理性和公正性的角度出发坚韧不拔地改变现有秩序和管理这条路线,而是全面拒绝对秩序和管理作任何相适应的努力并一举采取了破坏性行动。

由于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形成而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扩充也为工作观念和生活观念带来了微妙的变化。由于超充分就业状态,青年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另一份工作而辞去现有的工作。在西欧,辞职率和旷工率从来没有这样高过。单调的流水作业、脏活、危险性大的工作都不受欢迎,人员得不到保证。支撑现代社会迅速发展的技术和产业变化的勤劳的国民性正在出现衰退的征兆。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所谓“发达国家病”。

第二,随着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增长,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汽车的普及,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大气和海洋的污染已不限于发达国家,而是开始扩展到全球。有报告说,长期使用车用汽油造成的铅污染已危及南极的冰层,观测结果也表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由于大量的石油运输和其他船只往来,大洋的油污染也日趋严重。还发生过大型输油船漏油事故,导致大片海洋和沿岸受污染。随着

能源需求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原子能发电，又在从铀矿石的采掘、提炼以及运输的过程直到核放射废弃物的处理阶段都产生了新的危险和污染。大量使用农药开始导致国土荒芜，珍稀动植物绝迹，人类生存受到新的威胁。重视环境问题之严重的人们开始讨论“经济增长的极限”，开始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未来发出警告。

第三，能源及其他资源的供给开始出现缺口。由于消费量的明显增长，对过去一直供应绰绰有余的资源，人们也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供应的制约。

支撑 19 和 20 世纪工业文明的能源是煤炭和石油这类化石能源。尤其是 20 世纪，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不可缺少的资源是石油。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石油资源的有限性重新成了一个问题。虽然离石油真正枯竭还为时过早，但各石油输出国都开始意识到这个贵重的地下资源的有限性。

依赖于照射在地球上的太阳能而可再生的木材也由于以日本为首的大量消费国的出现导致过度采伐和开发，造成开始面临枯竭的危险。许多木材产出国采取了保护资源的政策。

第四，开始感到全球性的人口和粮食问题的恶化。

在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由于医学的进步和防疫对策的改善，结果出现了人口爆炸。死亡率明显降低，但出生率却难以降下来。在这些国家，开发没有取得进展，但人口却急剧增加，因此粮食进口不断增加，危机越来越严重。已经实现高水平人均收入、享受丰富的物质消费的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地球上依然属于少数者。认为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将减少给予落后国家的资源和粮食的应有份额的观点，已超出逻辑合理性问题，开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后工业化

以上所述种种现象虽然增加了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怀疑，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时又显示出走向下一时代的新的技术可能性。我们已经预感到这方面的生产结构和生活结构的重大变化。

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在当前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与大众消费相结合的重化工业。以家用电器和汽车为代表的耐用消费机械、合成纤维和塑料等合成高分子材料、化肥和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等重化工业产品的生产不断增加，随着能源革命和石油产品消费的增加，炼油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但是，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人们的消费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服务经济化和信息化有了发展。在美国和西欧，出现了展望工业文明以后阶段的种种观点。这种展望开始以“后工业化社会”、“后文明化社会”等表达形式广为传播。

日本由于急速的经济增长，在60年代后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已经接近欧美各国。到7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到英国的同等水平。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国，作为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战争废墟中复苏为出发点的国家，其实现迅速发展的势头依然未减。日本经济的活力大大超过其他发达国家，而患“发达国家病”的可能性却很小。但在进入重工业化以后的发展阶段这一点上，日本开始具有与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相同的基础。

60年代后期，美国的哈曼·卡恩和安索尼·维奈在一份题为《公元2000年》的报告中预计，到21世纪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将超过美国名列世界第一。认为日本正在进入发达国家圈子的人逐渐增加。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埃尔·贝尔和法国社会学家阿兰·托雷诺的著作也很快被介

绍到日本。日本专家也写了题为《信息化社会》的书，这成了一句流行语。以产业结构审议会为首的各政府外围机构也对“信息化社会”等有关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工业化以后社会或信息化社会这类表达形式都是被认为意味着post-industrial society。以物质的工业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将转向以服务、信息或知识的生产为中心的经济，人们的要求和价值观将发生变化，阶层或阶级的结构的形成也将发生变化。这些看法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相同的。实际上消费结构和就业结构已经迅速地服务经济化了。信息或知识的生产而不是物质的生产将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这种看法也已在熟悉产业和经济实际情况的知识界中成为充满现实性的展望。

但是，意味着狭义的工业不再成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后工业化”时代，同时也是服务、信息、知识的“产业化时代”。丹尼埃尔·贝尔所列举的“工业化以后”的各种征兆只是反映服务、信息、知识的“产业化”的指标。原来英语 industrialization 一词，狭义上表示“工业化”，广义上其实意味着“产业化”即现代产业的发展或整个产业的现代化。因此，post-industrial society 一词也可有两种理解。贝尔的后工业化社会理论上可看作“作为高度产业化的服务经济化和信息化”。在这里，如何超越产业文明的问题几乎没有反映。

但是，美国的经济学家 K·E·鲍丁认为，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大转折时代，并作了文明化过程将结束、“后文明化时代”将到来的展望。鲍丁论证，在这个大转折时代，人类正在面临核战争、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低开发的陷阱和环境污染、能源危机这类“熵的陷阱”。鲍丁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意识到了“后工业化”存在的问题。

在日本,环境问题也不断恶化,人们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怀疑。但人们对经济的繁荣和产业的发展依然抱着极大的期待和信赖。由于许多知识界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个后起国家,有着结构性矛盾,现代化很难发展,因此哈曼·卡恩的关于“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的预言最初给许多日本人带来迷惑。但是,日本经济实力正在迅速增强也是事实。

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

实际上,“作为高度产业化的服务经济化和信息化”在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第一,国民就业结构的变化。

在60年代,虽然在生产和出口方面重工业化有了发展,但在国民就业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服务经济化、管理经济化和信息化的倾向。根据国情调查,从各行业就业人口构成比的长期变化来看,首先是第一产业的人口比率迅速下降。战后的下降速度比战前更快,1980年第一产业的人口约占1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率有所上升,其中第三产业的比率上升更明显。在50年代,第二产业的比率曾迅速上升,但60年代以后其上升势头减弱了。第三产业的比率始终是上升的。1980年第三产业的比率达55.4%。从就业人口构成来看,60和70年代与其说是以第二产业化即工业化为主导的时代不如是以第三产业化即广义的服务经济化为主导的时代。这一倾向到70年代更趋明显。

再从国情调查中各行业就业人口构成比的长期变化来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事务、管理、专门技术方面的职业的比率始终是上升的。这些职业的合计人口在战前的1930年为7.3%,在战后的1950年仅为14.2%,但到1980年达到了31.2%。这可

以说反映了经济组织化、社会管理化、职业内容信息化和知识密集化。生产、建筑、运输通信方面的职业比率到1970年以后停滞或下降了,1980年为35.4%。销售、服务方面的职业的比率虽然有所增加,但并不明显。这可以理解为在销售和服务领域,古老的方法减少了,新的方法增加了,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管理部门、事务部门、研究开发部门工作。在生产物质的现场工作的人的比率处于下降趋势。因此,按职业分类比按产业分类更能反映服务经济化或信息化的趋势。

第二,国民消费生活和闲暇生活的信息化和知识密集化。

即使是带动以重工业化为中心增长的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从内容上来看也包含了信息化和知识密集化。电视机和电话的普及改变了国民的信息空间,汽车的普及和新干线铁路、航空运输的发展扩大了国民的行动范围,增加了观光和渡假消费。

战后初期是收音机的时代,50年代以后是电视机的时代。在60年代的家用电器中,电视机比洗衣机和电冰箱普及得更快。这也反映出国民对信息要素的关心之强烈。在彩电正式普及以前的1965年,电视机普及率在城市是95%,在农村也达到了89%。在前一年的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其图像立即送入全国各家各户的饭厅^①。以后彩电的普及也很迅速,城乡差别进一步缩小。由于电视机的普及,新闻机构传播的信息在全国实现了及时化、图象化和同质化,其影响远远超过收音机时代。

战前的1935年,电话用户一共87万个,战争最激烈的1943年为108万个。战败5年后终于恢复到122万个,比战前最高

① 日本家庭一般将电视机放在饭厅。——译注

年份增加12%。以后电话用户迅速增加,1960年为363万个,1970年为1517万个,1975年为3034万个,是战前最高水平的28倍。60年代以后,在业务用电话增加的同时,私人电话也增加了,用户数超过总数的一半。电话开始与收音机、电视机一起成为具有耐用消费品性质的民用信息器械。在这期间,建立了电气通信网络,通过电话交换的技术革新,还实现了电话的全国直拨通话。

国内各交通机构的旅客运送量和民航旅客运送量的统计也反映出国民各种目的的移动迅速增加。一部分说明业务量随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增加,另一部分说明以国民的收入水平的上升为背景的观光旅游的增加。

升学率的上升

第三,实行义务教育以后教育的扩大。

在1955年,进高中的男女平均升学率是52%,进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升学率是10%。但到1975年,高中升学率为92%,大学和短期大学升学率达37.8%。如果仅从男生进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升学率来看,1955和1960年为15%,1970年为30%,1975年为43%。如果仅仅看升学率这一数字,日本已一举进入教育发达国家。197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升学率虽然还没有赶上美国,但高于西欧主要国家。

在美国,很多学生即使进入大学也不能毕业,但在日本进入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能毕业。70年代日本已成为男子的大学、短期大学毕业生比率最高的国家。战前的1935年的大学、高中、高等专科学校(旧制)的毕业生为3.6万人,1960年的新制大学和短期大学的毕业生为15.4万人,到1975年达47.9万人。

升学率的上升，一方面意味着教育作为为了在将来获得有利地位和收入的“投资”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作为以青年阶层要求确保闲暇时间为基础的“消费”的扩大。日本的劳动大众通过战后复兴时期和增长时期的艰苦职业生活，好不容易提高了收入水平，他们为了保证孩子们实现自己在青年时代不能实现的升学，甘愿加重经济负担。青年们升学以后的生活费、学费的主要部分来自父母。

更多的人在一生的初期拥有自由时间，这就有可能形成能相互承认多样化的价值观、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具有开发精神的一代人。这为国民开始共同拥有市民感觉创造了基础条件。但是，随着进高中和大学的升学率的提高，升学竞争进一步激化，应考产业有了很大发展，用考试成绩的偏差值来筛选人的方法具有压倒性优势。高中已半义务化，许多学生并没有升学的要求和欲望，但被迫继续过着学校生活。高中和中学的暴力事件也增加了。在高速增长过程中，许多人材被吸引到中央政府机构和大企业去，教育机构出现了人才资源脆弱化的倾向。这给日本社会遗留下了长期性问题。

电脑与信息系统

第四，是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

60年代，许多行业引进了自动化技术。以轧钢、电气仪器、汽车为中心的生产自动化流水线和炼油、石油化学等化学工业的流程自动化就是典型例子。自动化提高了新工厂的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改变了劳动的组织。

自动化指自动操纵，它不仅是机械化和装置化，而是意味着利用有根据作业状况的信息反馈进行自动控制功能的机械和装置。最初自动控制的结构比较简单，很多是组合各种计测装置

和机械的调整装置。用自动搬运装置联接许多机械加工阶段的自动生产线就是这一时期生产自动化流水线的典型。在炼油和石油化工领域,由于采用的是流体的原料和半成品,因而比较容易进行自动控制,很早就使用了许多自动化设备。不久,采用了电脑,自动化迎来了一个新阶段。电脑也给经营信息的处理和事务管理带来了革命。

电脑的加速开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原来的动机是用于计算弹道等军事目的。但是,美国造出的最早的电脑是在战后的1946年(ENIAC)。电脑是代表着“战后”或20世纪后半期的一种技术。50年代,开始利用工业用电脑,应用领域逐渐扩大。初期的电脑(第一代)使用了许多真空管,1957年以后开始使用半导体(第二代),1964年使用集成电路(IC)的第三代电脑出现了(IBM 360系列)。电脑的故障率下降了,计算速度有了飞速提高,存储装置等外围设备和软件也有很大改善。由于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的革新,电脑开始使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促进了电脑的小型化和超小型化。

在国际电脑市场上,美国的IBM公司具有压倒优势。为了与IBM公司抗衡,通产省采取了限制进口电脑,扶植国内厂商的政策。在60年代,电脑多用于科学计算,用于商业的也是以大型的中央控制型电脑为主,但普及却很迅速。1960年的日本电脑产值为25亿日元,进口额为32亿日元,但到10年后的1970年,电脑产值已达3105亿日元,进口额为958亿日元,出口额为58亿日元。在政府的保护下,本国的电脑厂商开始崛起,产值开始超过进口额,而且还开始了出口。1971年日本的电脑使用台数为8680台,价值29亿美元,虽然仅仅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已达到与西欧各国的同等水平。只是从人均来看,如与西欧主要国家相比还处于低水平。70年代,日本在电脑的开发、生

产、运用等各方面都有迅速提高。

由于电脑与电气通信线路连接，银行业务和各种预约业务（如车票、机票、住宿等的预约）均已联机化，服务活动效率飞速提高，已经可以应付急剧增加的需求。国营铁路引进座位预约系统是在1964年，最初阶段每天只能处理3万个座位。以后经过改进和扩充，到1973年以后每天已能处理140万个座位。最早采用联机实时系统的是三井银行，它于1965年5月开办实际性的业务。以后，各银行于1973年4月在全国银行之间实现了汇兑业务的联机化。这些技术革命促进了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的服务行业的发展。

电脑的普及使有关信息化社会的讨论更趋热烈。出现了各种有关电脑的社会影响的看法。既有把利用电脑的未来理想社会描绘成乌托邦的，也有对电脑带来的过剩管理社会危机发出警告的。但是，这一阶段的电脑发展仍属初期阶段。电脑在以后日趋小型化，各种机器开始装上微电脑。到80年代开发了廉价的超小型个人用电脑，应用这种电脑的日语文件处理机也广泛使用。60年代商务自动化和经营信息系统的设计是以用大型电脑的集中信息处理为前提的，而到80年代已变为以相当分散的信息处理为前提了。在以汽车工业为首的机械行业，机器人开始工作。可以灵活应付多品种生产需要的柔性生产系统(FMS)和可以改变所有事务性和管理性工作内容的办公自动化(OA)开始进入实用阶段。

5. 经济大国——日本

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

日本在人均产值和收入方面也正在接近欧美各国。通过与

主要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相比，可以找到这一过程。

国民生产总值减去资本折旧即为国民收入，再用人口相除就得出人均国民收入。因此，国民生产总值越大，人均国民收入也就越大。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统计是用一定的方法推算出来的，各国的推算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另外用汇率水平折算成美元也有问题，因此这些统计只能作大概的国际比较的参考材料。尽管如此，考察日本迅速提高其国际经济的地位还是可能的。

在池田内阁时期的 1963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676 亿美元。这一规模相当于美国的 11.4%、西德的 70.4%、英国的 78.8%。美国人口是日本的两倍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日本的 9 倍，西德和英国人口虽然仅为日本的约二分之一，但国民生产总值却为日本的 1.3 到 1.4 倍。到 1973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3966 亿美元，是美国 13063 亿美元的 30.4%，是同年西德和英国的 1.16 倍和 2.34 倍。从整体上看，日本的经济规模扩大了。到 1978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 44.5%，是西德和英国的 1.5 倍和 3 倍。

1963 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是 573 美元，是美国 2544 美元的 22.5%，不到四分之一。如与西德和英国相比，则分别是它们的 43.7% 和 44.3%，还不到一半。日本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推进贸易和汇兑自由化就是在这一阶段。到 10 年后的 1973 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已达 2964 美元，分别是美国、西德、英国的 52%、60%、108%。这时，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超过了英国。1978 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这 3 个欧美国家的 83.6%、78.3% 和 144%。

70 年代是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终于达到欧

美水平的时代。明治以来多少日本人谋求的“追赶”欧美各国的过程，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谬误和错误判断并使无数本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为之牺牲的现代化过程，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

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

日本作为一个孤立于远东的工业国，在欧洲或发源于欧洲的各国之外，第一个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其结果，从经济方面来看，日本的国际地位有了飞速提高。因为日本是一个拥有 1 亿多人口的较大规模的国家，所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所得的提高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地位。

根据 80 年代初期经济审议会长期展望委员会整理的资料，日本在 1955 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仅占 2.2%，即使是到 1960 年也只有 2.9%。因为虽然日本的复兴和增长很迅速，但以欧洲共同体为中心的西欧各国的复兴和增长也相当迅速，而且美国经济也获得一定的发展，苏联经济也实现了较高速增长。但是，在 60 年代，日本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飞速提高，1970 年达 6%。70 年代，美国经济明显地相对停滞，到 1980 年前后，日本的经济比重提高到 10% 左右。

在西欧和日本的生产活动受战争破坏的影响而一落千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美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特别高，即使是在战后 10 年的 1955 年也占 36.3%。但是，由于西欧和日本的增长，到 1980 年其比重落到了 22%。

到 80 年代初，世界经济的格局是，美国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二成，西欧各国也约占二成，日本约占一成。在这一时期，日本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开始名列前茅，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率之高、失业率之低、物价之稳定等方面都开始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由此人们也开始强烈希望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一

员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也在主要物资的产量的统计上反映出来。1958年日本的发电量是803亿千瓦,约为美国的11%,甚至还低于西德和英国的水平。1973年日本的发电量为15年前的5.8倍,达4700亿度,约为美国的24%,约为西德和英国的1.6倍。1958年日本钢产量为1212万吨,约为美国的15.7%,西德和英国的50—60%。1973年日本的钢产量达1亿1932万吨,已是美国的约87%、西德的2.4倍、英国的4.5倍。1958年日本汽车产量是19万辆,只有美国的3.7%,西德和英国的13—14%。到1973年,日本汽车产量已达708万辆,虽然还只有美国的55.8%,但已是西德的1.8倍,英国的3.3倍,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以后,美国的汽车生产停滞不前,而日本的生产持续扩大,到1980年,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国。

国际收支的变化

随着日本产业的合理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日本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50年代,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常常出现赤字,填补赤字的方法是依靠“特需”和引进外资。在60年代,由于国内过热的设备投资,尽管国际收支多次出现赤字,但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基本上还是平衡的。到60年代后半期,尽管国内的设备投资高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国际收支没有恶化,反而出现持续盈余的趋势。

6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工资的提高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生产率的现象和慢性通货膨胀。60年代后半期由美国的越南战争军费开支带来的美元流出进一步加速了世界

性通货膨胀。日本由于实施合理化、现代化、大规模化和自动化，提高了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尽管劳动工资大幅度提高，但批发物价和出口物价依然稳定，对出口很有利。消费物价虽有上升，但还不致于影响出口。

日本的经济自主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加强，也反映在对美贸易的地位和结构的变化上。50年代，从美国进口等于日本出口总额的50%左右，但对美出口只占20—30%。这一时期日本的贸易结构总的说来是入超，其中尤其是对美国的进口依赖性大，对美贸易是大幅度入超。50年代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焦点——“对美依附”的背景之一就是当时日本这种贸易结构。

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的对美出口的相对规模扩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对规模缩小。结果，日美贸易向平衡的方向发展，“对美依附”的背景之一也随之消除。这不仅是由于日本的经济体制和对外政策发生革命性的转折才实现的，而是由于维持了与美国的同盟，同时采取促进经济自主和增长的政策才实现的。

70年代以后，尽管遇到石油危机，但日本的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总的说来已开始出现盈余性不平衡趋势，在对美贸易方面也是出口开始超过进口。所谓贸易摩擦已成经常趋势，美国方面开始为抑制日本的急剧增长的出口而施加各种政治压力。

政策转折的必要性

出现于50和60年代的日本对外经济关系的变化，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已成为政府改变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吉田内阁以来的保守经济政策基本获得了成功，才迎来了这一转机。

最重要的是，作为改变国际收支的盈余性不平衡的措施，变

更在 1949 年吉田内阁时代由于实施“道奇路线”而制定并固定下来的对外汇率已不可避免。然而尽管政府和日本银行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在 60 年代并没有作出积极的姿态。问题被搁置起来,结果加重了 70 年代初期的“货币危机”。

从长期性和结构性方面来看,政府改变经济政策也是必要的。

第一,在国际收支基本上转为盈余的情况下,有必要最终放弃保护扶植国内产业这一旧的中等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优先政策。而且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有必要进一步使进口和外国企业进入日本更自由,进一步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体制化和国际化。

第二,不管是否愿意,作为正在取得经济大国地位的日本,必须研究如何用固有的方法来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从日本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影响来看,这对于国际经济的稳定,对于日本本身是不可缺少的。为了维持良好的国际关系,日本能够做些什么?日本必须做些什么?现在已经到了认真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第三,必须研究这些问题,如怎样在国内搞活经济力量?应该为充实国民生活的质量做些什么?以确立何种国民生活为目标?如果考虑到由于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环境破坏的危险也将增大,那么研究对增长的控制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制约下,加强国民生活的保障条件,为了环境和安全而对持续的投资进行规划是必要的。这种政策的本身应该成为控制增长的最有效的手段。

日本的主要原料和燃料几乎都依靠进口,因此持续的增长在确保资源方面也可能产生问题。日本在石油、铁矿石、木材、羊毛、水产品以及包括饲料在内的粮食等基础性资源方面正在

成为世界头号进口国。日本的资源进口开始对世界的基础资源市场的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简单地向未来延续高速增长的趋势已不可能。尽管如此，政府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制定了以延续高速增长的各种计划。

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969年5月30日，“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新全综”，后又称“二全综”）经佐藤内阁通过。

1962年10月决定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简称“一全综”），为了应付大城市的过大化、过密化以及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提出了以有效地分散工业为目标、将重点放在形成新工业地带上的“据点开发方式”。据点开发方式根据“一全综”、《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工业整备特别地域促进法》实施。6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比政策当局预计的更高，而且产业界的新工厂的建设也很活跃，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新工业地带的形成也很迅速。“据点开发方式”是针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的地区问题的，同时它具有为进一步经济增长提供必要条件的效应，它为60年代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尽管实施了这种政策，但过密和过疏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圈的集中依然严重，人口流出地区的过疏化也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同时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实施推进均衡发展的区域开发的新的国土计划是必需的。

在制定“新全综”之前，1967年前后成立了以国土综合开发审议会为首的几个研究会，讨论了新计划的前提条件。这些研究会是：有关设计日本列岛未来蓝图和大规模工程的研究会，关于地区开发的各种长期设想的研究会，关于信息网络的基础调

查的研究会。“新全综”就是根据这些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制定的。

“新全综”的计划期限到 1985 年(昭和六十年)为止,基本目标是“面向高福利社会,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此列出了以下 4 个课题。

- (1) 长时期人与自然的调和,大自然的永久保护和保存;
- (2) 健全开发基础条件,使开发可能性在全国均衡化;
- (3) 通过各地区独立的开发和整顿,提高国土利用的效率;
- (4) 健全和保护城市和农村安全、舒适的文化环境和条件。

这些目标的确立,反映了人们开始重视公害和环境破坏的恶化、安全性和自然保护等问题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新全综”实际上还是对促进大规模开发,谋求进一步重化工业化和持续高速增长起了强烈的促进作用。

第一,“新全综”是以向未来延续已经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的趋势这一想法为前提而设计的。“新全综”认为经济增长率在计划期中即使略有降低也能够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因此将健全必要的产业基础和确保资源列为自己的课题。建立大规模的炼油与石化联合企业以及钢铁与机械工业基地的设想就是根据这一展望作出的。

第二,“新全综”准备采取野心勃勃的方法,即把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地区开发的效应扩散到过疏地带,大幅度缩小地区间的差别。这就是所谓据点开发方式的扩充。“新全综”的观点在大规模项目方面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

“新全综”的大规模开发项目包含 3 个要素。

其一是建立新干线交通网络。计划将形成以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营的东海道新干线、东名和名神高速公路为主的辐射全日本列岛的高速交通网。

其二是大规模产业开发项目。在“新全综”中设想建立和健全大规模农业基地、工业基地、流通基地、观光基地等。其中最重视大规模工业基地开发计划。根据“新全综”的具体计划，陆奥小川原地区(青森县)，志布志地区(鹿儿岛县)、苫小牧东部地区(北海道)等被列为候选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典型的过疏地区，而且也是珍贵的大自然被保存下来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兴建大规模钢铁、机械、炼油、石化企业的计划虽然提高了当地自治体和一般居民的期望，但同时也引起了主张保护大自然的反对开发的运动。

其三是从环境保护出发提出的一系列计划。“新全综”包括有关保护和保存自然和历史环境，国土保护和水资源开发，住宅建设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保护地方城市和农、山、渔村以及大城市环境的大规模项目。

在这一系列大规模项目中，引起地方居民强烈关心的是高速交通网络和大规模工业开发。这些项目由于得到以预定开发投资地区为政治活动地盘的政治家们的重视而取得进展。

“新全综”的挫折

参加制定“新全综”的人们虽然处于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已被重视的时代，但仍预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仍预计有更多的资源消费和更大的生产活动。因此，他们为了实施能与环境的控制并行不悖的有计划的发展而煞费苦心。他们并没有作出从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出发对高速增长经济的持续提出疑问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可能有重新全面地探讨经济发展并充分吸收各方面反馈意见的一整套思路。

由于高速增长已成定局，因此尽管人们对环境污染和物价上涨日趋不满，但大多数国民，不论是作为劳动者还是作为

消费者,他们的行为都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为前提,并且视其为理所当然。企业也以持续的增长为前提制定经营计划。“新全综”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的“空气”。“新全综”的制定没有在引导改变这种时代空气方面发挥它的作用。结果,反而暴露了官僚机构和以审议会为中心的政府的决策形成过程的致命弱点。

大规模工业开发项目如果完成,将在这些过疏地区出现在产量和原料及燃料资源的消费量方面大大超过京滨工业地带和阪神工业地带的巨大工业地带。即使在下北半岛的陆奥小川原地区,也制定了兴建几个大规模钢铁厂、炼油厂和石化联合企业的计划。不管对环境保护考虑得怎样周全,这些工业开发也必然会带来大自然的破坏和污染。

60年代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10%。1970年5月由佐藤内阁决定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把1970年到1975年度的6年年均实际增长率定为10.6%。作为政府的经济计划,这是首次(但也是最后一次)将增长率定为10%以上的文件。在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困难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政府放弃了有计划地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努力,而是开始承认高速增长现实,并努力适应这一现实。

不可能年年都会超过中期经济计划10%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但是,以15年后(1985年)为目标的“新全综”也是以年均7—8%的增长率为前提而制定的。这是一个15年后的实际经济规模将为目前的3倍的展望。由于考虑到能源消费量和重化工业产品的产量也将相应增加,因此工业开发规模出人意料地大。

日本在60年代末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之所以还要讨论兴建相同或更大规模的这些工业的课题,就是因为有了上述的前提。无论是1969年的

“新全综”，还是以此为基础由田中首相于1972年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都是以这一假设为根据。

不久，“新全综”所设想的大规模工业开发和新干线交通网络也显然不能如期实现，计划的主要部分或被修改，或被放弃。但是，这并不是由政府和国民的主体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由石油危机这一外来的冲击带来的增长率被迫波动的结果。

第十四章 通货危机和石油危机

1. 归还冲绳

归还冲绳问题

日本在经济上已远远摆脱“战后”，正在赢得发达国家的地位，但在外交上，还遗留几件“战后”悬案。如归还冲绳和小笠原问题、日中两国恢复邦交问题、北方领土问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虽声明没有侵占日本领土的野心，但事实上，战后，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从日本本土中被切割，归入了盟国方面的版图。

第一是北方领土。苏联军队不仅进驻了桦太(萨哈林)、千岛列岛(北千岛)，而且也进驻了国后、择捉、齿舞、色丹各岛。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日本放弃千岛列岛以及桦太(萨哈林)南部，但苏联并未签署该条约。在1955到1956年日苏恢复邦交的交涉中，日本要求归还历史上无疑是日本固有领土的择捉岛以南诸岛，因苏联不同意，作为外交悬案长期遗留下来。

第二是美军直接控制的冲绳、小笠原、奄美各岛。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美国向联合国提出上述岛屿委托美国统治的提案时，日本并不反对，并规定，在没有提出提案之前，由美国对上述岛屿行使施政权。在媾和会议上，美国和英国代表一致认为上述岛屿的主权应归日本，吉田首相对此深表欢迎，确认继续存在

“潜在主权”。

有关奄美各岛，如前所述，在和平条约生效后的1953年12月24日，日美两国政府之间签署了归还协定，并于第二天即25日付诸实施。

冲绳、奄美两岛有许多居民生活，但小笠原群岛上的居民，在战时和战后，就被日军和美军强迫迁往日本本土。小笠原群岛在江户时代末期，一度为英国和美国占领，但后来，国际上承认是日本的领土，战前属东京府(都)。原生活在岛上的居民要求归还该岛，回到该岛上去。小笠原在战略上虽不重要，但由于硫黄岛是太平洋战争的激战之地，具有纪念碑的意义，美国对归还该岛多少有点抵触。可是，1967年11月，经佐藤首相和约翰逊总统协商，决定归还日本。1968年4月5日签署归还协定，6月26日生效。

战后，最大的领土问题是冲绳问题。

据60年代中期调查，冲绳群岛居住着90多万人。由于冲绳远离本土，在历史上又曾受到压制和歧视，因而回归祖国的主张并不能为冲绳所有的人所接受。然而，美国的军事占领却成为强化和重新认识作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契机。

日本本土的居民也接受了1951年的和平条约，实行以割让包括冲绳在内的诸岛屿为条件的“独立”。大战末期，冲绳在日本固有的领土中，成为唯一的居住着众多居民的陆地战场。众多的老百姓遭殃。战后，冲绳曾一度为日本本土所抛弃。

美国关心冲绳，其真正的意图并不在于统治领土，而是在远东战略上，确保具有枢纽地位的冲绳基地，以封锁中国和防止东南亚共产主义化。

在1960年日美修订安全保障条约之际，日美两国政府在换文中商定，美军在日本本土配备的重要变更或以日本为基地的

作战行为等事项，都要事先同日本政府协商。这是美国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日美关系对等的要求。由于日本国民强烈反对核武器，日本政府没有承诺美军持核武器进入日本。因此，美国把归还冲绳理解为一旦归还就不可能自由使用冲绳基地了。

整个60年代，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加深，冲绳被用来作为轰炸南北越南的基地。在这种形势下，归还冲绳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明摆着，如果日本强烈要求归还冲绳，那美国就会要求日本支持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美国的行动，在军事上起更加积极的作用。日本的保守政权，在冲绳问题上一直是抱着期望远东形势变化，等待冲绳作为军事基地的重要性下降的姿态。继续承认美国的施政权，增加日本对冲绳居民的援助，是池田内阁上台后日本自民党政权的基本方针。

回归祖国运动

1965年8月，作为第一位访问冲绳的首相，佐藤荣作曾表示：“只要冲绳不回归祖国，日本就仍是战后，”但自那以后，就开始持慎重的态度。

1960年围绕修订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发生政治动荡。为改善日美关系，肯尼迪任命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为驻日大使（就任于1961到1966年）。赖肖尔上任后不久，就访问了冲绳，确立了归还的信念，开始说服两国政府。赖肖尔在著书中认为，当时的日本保守派担心会损害日美关系，所以对冲绳问题持消极态度，佐藤首相也因担心提出归还要求会遭拒绝，所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E·赖肖尔：《日本自传》P.403）。

美国统治冲绳的政策曾多次动摇，结果刺激了民众回归祖国的运动。

60年代前半期，美国明确表态不放弃冲绳，采取了限制日本

的援助以及抑制当地居民的自治权等强硬政策，以图平息回归祖国运动。这一政策因美国国会抑制美国对冲绳的援助而未能持续。美国的强硬政策更激起了居民的反感，回归祖国的运动也更趋激烈。1960年广大县民组成的回归祖国协议会，于1966年提出了“反对军事基地”的目标。60年代后半期，美国不得不改变现有方针，在允许日本扩大对冲绳的援助的同时，承认居民的自治权。面对回归祖国运动的高涨，美国也不得不认识到，要永远占领冲绳是不可能的，当前只有期望随着县民代表参政，形成冲绳的保守政治势力。美国已进入了具体探讨归还冲绳的时间和方法的阶段。

在越南战争加剧时，反对基地的运动也跟着激化。由于在美军统治下军事基地迅速扩大，与其说岛上有基地，不如说基地上有居民岛。整个冲绳岛，美军基地所占的面积，到回归日本时，已达14.8%。

远距离轰炸机B52从这里起飞进攻越南已习以为常。还发生了核潜艇的钴60污染海水和由于石油渗透基地四周的地下水，导致发生“燃烧井”等事件。为此，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对美国来说，当务之急是稳定冲绳的政治局势。

1968年11月10日，公开选举首届琉球政府主席，革新统一的候选人屋良朝苗当选。当选的屋良要求撤回B52，反对基地，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这反映了冲绳县民回归祖国的运动有了新的发展。美军以加强武装士兵警卫体制来对付反对扩大基地的示威游行。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工人组织(全军劳)，开展了争取团体交涉权之类的权利斗争，对屋良的当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冲绳保守派的政治势力，为削弱在屋良当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教职员工会的力量，准备了企图加强管理体制的法案。这又诱发了一场激烈的反对运动。在这种形势下，实现归还冲绳的协定，

终于成为日本政府外交上的一大课题。

6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内部曾考虑逐步实现回归的部分回归方案和首先恢复教育权等恢复部分机能的回归方案。然而，到60年代后半期，除了全部回归方案以外别的就不考虑了。1967年以后，佐藤首相也开始意识到，归还冲绳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不能不成为现政权的一件大事。

归还冲绳的条件

然而，如何处理基地依然没有确定的方案。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可以有3种设想。

第一，归还冲绳，但以美军能自由地使用冲绳基地为前提。

保守势力的主流也好，外务省也好，当初都认为，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归还。他们认定，只要美国的远东战略不变，不采取这一方法，就不可能实现归还冲绳。同时，他们还隐含着这种想法，既然存在共产主义的威胁，那么，虽然因在野党等的反对，日本本土的基地不会被自由使用，但仅把冲绳委托给美军自由使用还是恰当的。这种方法虽然在与美国的关系上阻力最少，但却无法使大多数冲绳县民接受。1967年，就连冲绳的保守派政治家们也反对冲绳作特别处理，要求在“和本土一样”的条件下归还。

第二，归还冲绳，以“和本土一样”为条件。

所谓“和本土一样”，就是把冲绳列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根据该条约制定的驻日美军地位协议所规定的一般适用对象。关于重要的部署变化和作战行动，无论是必须采取事先协商的方式，还是当时日本政府反对带入核武器的政策，都完全适用于冲绳。这种方式被称为“和本土一样无核武器”的方式，可以说在承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前提下，是最妥当的路线。

第三，建筑在撤消冲绳基地和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基础上的回归。

这种“撤消基地、废除安全保障条约”式的回归，作为当时日美外交谈判的主题，根本没有一点现实意义。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撤消在日的美军基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冲绳归还问题，而是意味着日本外交的根本性变革。它只有在日本国内的舆论发生很大变化，日本政府的主体构成发生交替，而接替的政府敢于把废除安全保障条约这一重大问题提到外交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来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而且，只要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不发生变化，一旦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可能性增大，美国反而更可能坚持占领冲绳。然而，日本的在野党主流势力，采取的是一种中立主义的方式，反对的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只是把声援冲绳的回归祖国运动作为其中的一环。

对冲绳的县民来说，基地问题确实是一个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撤消基地、废除安全保障条约”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它还不能直接成为当时日本外交上的现实课题，但这种激进的主张，通过冲绳县民自身斗争的发展，确实至少起到了促使日本的保守势力向着采取“和本土一样无核武器”这种回归方式转变的作用。保守势力和外交官们本来以为，在冷战状况下实现归还冲绳的现实条件，只能是“可以配备核武器，自由使用基地”的形式，但事态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没有保守派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参与的情况下，当地的斗争规模更大，更尖锐了。美国在越南遭到军事上的失败，迫使它改变远东战略。外交官们对这一事态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也没能看出以“和本土一样无核武器”方式归还的可能性。

冲绳县民进行的回归祖国斗争，是因为切身体验到了被占领的疾苦，所以才坚决提出在外交常识上被认为是不现实的“撤

消基地、废除安全保障条约”式的回归要求。结果，这种预想的斗争目标，对冷战中的归还冲绳的形式，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少成为改变现实的一支力量。

同意归还冲绳

在1967年11月召开的日美首脑会谈(佐藤与约翰逊)中，除了约定在1年内归还小笠原群岛外，还对冲绳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同意，在归还日本这一方针的前提下继续探讨冲绳的地位。结果，冲绳问题成为政治上的重要争论焦点。它不仅成为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论战对象，而且开始造成自民党内的政治对立。

在1966年12月到1968年10月，约两年时间，担任佐藤内阁外相的是三木武夫。在冲绳问题上，三木批判佐藤一直持慎重的态度，从很早起就强调实现“和本土一样条件”归还的必要性。1968年秋，佐藤在自民党大会上立志竞选第三次总裁时，三木明确表示要辞去外相职务，作为后选人，参加总裁竞选，并公然批判佐藤内阁的政策。三木在发言中说：“冲绳归还应以本土相同的条件进行谈判”。佐藤对此持不同意见。佐藤在发言中说：“即使作为目标以本土相同的条件来考虑归还，也不能一开始就以此为前提进行谈判。认为冲绳的全体同胞都希望以同本土一样的条件归还，这是误解”。佐藤甚至谈到：“让三木这样的人做外相做到现在是我的不明智”。

1968年11月5日，美国举行了总统选举。约翰逊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民主党的汉弗莱和共和党的尼克松参加竞选，尼克松当选。

在11月27日的自民党大会上，佐藤获得过半数的选票，第三次连任总裁，进行内阁改组。爱知揆一被任命为外相。

佐藤对冲绳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1969年3月的国

会答辩中说：“同本土一样撤消核武器，是对美谈判的出发点”。同年6月，爱知外相访美，对美国政府首脑阐明了日本政府对冲绳问题的基本立场。其内容如下：

(1) 最迟到1972年，冲绳的施政权应归还日本。

(2)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与该条约有关的协定，也适用于施政权归还后的冲绳，应和本土一样处理。

后来，日美协议进行了多次修改。关于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事前协商一事，日本政府表示，在朝鲜和台湾发生紧急事态时，为维护远东和平，日本政府当然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表明在这种场合下，美军在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基地采取军事行动时，不会遇到重大的障碍。

1969年11月17日，佐藤访问了美国。在佐藤访美之前，社会党、总评、共产党等革新派的各个团体，在全国发起了阻止佐藤访美的统一行动。新左翼派领导的反日共系统的全学联，也以东京为中心，在各地开展了阻止佐藤访美的斗争。从首相官邸到羽田机场，佐藤只能乘坐自卫队的直升飞机。阻拦没有成功的学生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东京各处都出现了骚扰。

佐藤与尼克松的会谈结果，体现在11月21日的共同声明中。

共同声明说，双方同意，将促使两国政府就实现在1972年将冲绳归还给日本达成协议，并一致同意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不作任何变更地”适用于归还施政权后的冲绳。有关事前协商问题，佐藤首相以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为背景，阐明了日本政府的政策。尼克松总统对此表示理解。因此，共同声明明确表明了：“既不得损害美国政府关于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的事先协商制度的立场；也不得违反日本政府归还冲绳的政策”。美国在附加了慎重保留一旦有事，也可以就带入核武器问题进行谈

判的条件后,同意撤除冲绳岛上现有的核武器。共同声明重申,南朝鲜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至关紧要,台湾的安全也是重要的。确认了日本对使用日本本土和冲绳基地的美军在远东地区采取行动时,将予以协助的姿态。

此外,共同声明还谈到,两国首脑强烈希望在冲绳归还之前就结束越南战争。但在越南战争仍继续的情况下,同意“为确保越南南方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其将来的政治命运,美国将不再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冲绳归还,将按照那时的形势,再进行充分协商”。

冲绳回归祖国协议会,采取了“反战回归”的方针,举行了抗议佐藤访美的统一罢工,召开了抗议共同声明的县民集会。据12月5日《每日新闻》发表的对日美共同声明的舆论调查,77%的日本本土居民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另据《琉球新报》在同一时期进行的舆论调查(12月5日发表)表明,15%的冲绳县民表示“不满”;表示“满意”与“不得已”的合计为48%,认为“尽管不满但毕竟前进了一步”的为32%(宫里政玄编:《战后冲绳的政治与法律》P.100)。

共同声明发表后不久,12月4日,冲绳的美军发出通知,大量解雇基地工人。解雇基地工人,对依赖军事基地的冲绳经济是一大打击。“全军劳”于1970年1月,以基地不缩小,反而片面裁减人员为反对理由,组织了罢工,但美军没有让步。

安全保障条约的自动延长

佐藤回国后在一次讲话中谈到:“1972年冲绳归还后,仍应坚持无核三原则。即使存在远东有事时应就运进核武器问题进行事前协商的规定,也还是要遵守上述原则”。社会党和共产党攻击说,通过归还冲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远东”范围将被扩

大。这个协定不是“冲绳的本土化”，而是“本土的冲绳化”。佐藤决定解散国会，众议院于1969年12月2日宣告解散，12月27日进行了大选。

1970年是1960年修订的为期十年的安全保障条约到期的年限。社会党、共产党和新左翼势力，反对延长安保条约，主张废除该条约。安保条约问题、冲绳问题是这次大选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论点。佐藤对另一个外交悬案，即打开日中关系，也表示了积极性，提倡进行大使级会谈。但这次大选是日本议会政治史上，首次举行的“年关(年底)选举”。另外，多数国民对于社会党、共产党的废除安保条约和谋求日本中立化的主张，也并不感到有什么现实意义。因而投票率很低。

自民党的得票率虽从上一次(1967年1月29日)的48.8%下降到47.6%，但议席数却获得288席(增加16席)，占压倒多数。如果再加上保守系的无党派的议席，自民党超过300个议席。社会党的得票率从上一次的20.4%，下降到14.5%，从解散时的134个议席减少到99个议席，减少35个，损失惨重。然而，共产党由于推行稳健路线，得票率从4.8%上升为6.8%，议席从4个增加到14个。公明党从上一次的5.9%上升为10.9%，议席数从25个增加到47个。民社党和解散时一样，仍为31个议席。

1970年6月22日，佐藤内阁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决定“自动延长”日美安保条约。

1960年6月23日生效的日美新安保条约第10条规定：“这个条约在持续生效十年后，无论哪一方缔约国都可以通知对方缔约国解除条约。在此情况下，条约在通知发出后一年内失效”。在10年期限的最后一天，政府决定不重新举行限定条约期限的会谈，而是根据一年前的通告，按照可以撤销条约情况继续延长。这给打算将“1970年日美安保条约到期”作为政治决战的社会

党、共产党和新左翼系统的全学联造成了“扑空失手”。

关于冲绳归还问题,1970年6月以后,爱知外相和美国驻日大使迈耶,举行了实质性的会谈。

在1970年10月29日召开的自民党大会上,进行了总裁选举。佐藤在475票中获得353票,第四次当选。然而,作为唯一的强有力的竞选对手,三木武夫经过一番顽强的拼搏,也获得了意料之外的111票。

冲绳在归还前的1970年11月15日,举行了参政选举。众议院5个议席,革新派占3个,自民党占2个;参议院2个议席,革新派与自民党各占1个。

12月20日,冲绳岛中部的古座市(后来和美里村合并的冲绳市)突然发生暴动。19日下半夜,在古座市内一位在基地上夜班的一位工人被美国军人的汽车撞伤。由于出面处理事故的美军宪兵队置受害者于不顾,释放加害者,目击群众纷纷提抗议。20日清晨,以宪兵开枪威胁为导火线,发生了长达约6个小时的大暴动。约有3000个民众参加,烧毁了73辆美国人的汽车和嘉手纳基地的一部分车辆与建筑物。古座警察署的警察和几百个武装的美国士兵出动,才把这次暴动镇压下去。古座暴动反映出战后长期处于美军统治下的冲绳县民的强烈不安和不满。

日美纤维谈判

在进行冲绳问题谈判的同时,面临着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日美谈判问题。这就是限制日本纤维产品对美出口的谈判。

整个60年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西欧各国和日本的复兴与发展,使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占压倒优势的势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越南战争经费的增加而加剧的通货膨胀,是导致美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

重要原因。美国竞争力的下降，反映在来自外国的进口产品迅速增加上。日本在60年代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扩大出口，与美国之间在贸易上的摩擦也迅速激化。

美国对日本迅速增加的出口一直持不满态度，已多次发展成政治问题。选举产生的议员和总统，决不能忽视美国国内受日本进口产品影响的工商业者的要求。美国政府不但对日本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外国产品和外国资本能自由进入日本，同时还开始要求日本限制对美出口。

1961年，肯尼迪总统曾要求日本及其他各国达成国际协定，限制棉织品出口。1969年5月，尼克松总统派遣史坦斯商务部长前往日本，要求缔结限制对美出口毛织品和合成纤维产品的协定。尼克松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为了争取南部的选票，曾对南北卡罗来纳州的纤维业界许过愿，表示要与各国进行有关这方面的国际交涉。

日本方面则认为，美国的提案是有悖于自由贸易精神的，事实上，即使美国的纤维业界遭受影响，也应该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处理。可是，因为掺杂着尼克松总统自身的政治性允诺，所以，美国政府始终持强硬的姿态。

对1969年11月佐藤、尼克松举行的会谈，流传着佐藤向尼克松保证以纤维问题上的让步，作为归还冲绳的代价的说法，因而被指责为以“纱”（纤维）买“绳”（冲绳）。然而，后来佐藤并没有拿出具体的对策。美国坚持要求缔结两国政府间的协定。1970到1971年，两国继续进行谈判。日本方面虽多次作出让步，但由于美国态度强硬，谈判迟迟不见进展。日本纤维业界组织了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反对签署限制出口的协议。美国提出了限制占日本毛和合成纤维产品对美出口大部分的28个品种的限制范围，以及就其他品种对美出口超过一定水平时，进行协商限制的方

案。1971年3月，日本政府说服纤维业界，实行了出口自主限制，但美国方面坚持要求签署政府间的协定。

归还冲绳协定

1971年6月17日，通过卫星电视转播，在东京首相官邸和华盛顿国务院举行了签订归还冲绳协定的仪式。琉球政府的屋良主席谢绝出席签字仪式。

在冲绳的美国基地上，部署着日本本土上没有的特种部队。其中用于对第三国军队进行教育和训练的太平洋情报学校被废除或撤走，其他部队则在冲绳归还后以事前协商的形式解决。关于撤除核武器这个最大的问题，归还协定上没有明确记载，又不能进行实地检查。对此，日本以在向美国支付的财政支出项目中，加上撤除特殊武器的费用的办法来解决。关于废除作为美国直辖的对外广播机构“美国之音”冲绳转播站，因一旦废除，美国在远东就只剩菲律宾一个中转站了，所以美国坚决不同意，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最后商定，在冲绳归还后，允许再继续使用5年，在冲绳归还协定生效两年后，再就中转站的未来达成协议。冲绳的美国之音中转站，在归还后5年的1977年5月被废除。归还协定规定，从协定生效之日起的5年内，日本要向美国支付3.2亿美元，作为继承美国在冲绳的资产，代替支付基地工人退职金，以及撤除特种武器等的费用。除此之外，日本还要承担那霸机场的防潜巡逻机的转移费用，以及驻日美军地位协定规定的每年的基地维持费用。尼克松为了向美国国会表明归还冲绳的妥善性，很重视减轻美国方面的财政负担。在归还冲绳的同时，还约定日本可以在冲绳配备自卫队。日本原则上放弃了对美国的请求权。

归还冲绳协定签署后的6月27日，举行了参议院议员选举。

由于紧接在4月份的地方统一选举之后，所以，投票率很低。自民党比改选前少了一个议席，只有63个议席。在野党获得的议席数：社会党是39席(增加5席)，公明党10席(减少1席)，民社党6席(增加4席)，共产党6席(增加3席)。

对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的失利负有责任的自民党干事长田中角荣，吐露了辞职之意。佐藤起用保利茂继任，并于7月5日，改组了内阁。任命福田赳夫接替爱知揆一的外相职务，田中角荣接替对美纤维谈判的当事人宫泽喜一的通产大臣职务。

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1972年5月访华。一个月后的8月15日，尼克松发表了保卫美元政策，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通货危机。尼克松发布这两个声明，给佐藤内阁以很大冲击。

通货危机使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崩溃了。在浮动汇率制下，日元行情趋向坚挺，到12月20日，1美元只能兑换308日元。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急剧上升，使严重依赖日本本国进口产品的冲绳经济，遭受很大冲击。在以美元作为通用货币的冲绳，随着日元的上升，以美元计价的日本进口产品也跟着大幅涨价，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归还日本后，冲绳县民手头拥有的美元兑换成日元的金额也大幅度减少。面对这一情况，政府在对冲绳县民的存款和现金的拥有情况作了调查后于10月8日决定按归还时的美元实际汇率，补足其与360日元之间的差额。

纤维和冲绳

在尼克松的保卫美元政策中遭受很大冲击的日本政府，唯恐日美关系恶化，不得不开始考虑按照美国提出的政府间缔结协议的方式，解决悬而未决的限制纤维出口问题。负责此事的通产大臣田中角荣，在领会了佐藤首相的意图后，决心尽快解决，并打算用财政方法处理这一问题。准备按照政府间的协定，由

政府来补偿限制对美出口所造成的纤维业界的损失。

1971年10月15日,日本方面作了全面的让步,在东京草签了接近美国原先方案的政府间协定,在3年内把毛、合成纤维出口总数限制在9750万码,并立即付诸实施(1972年1月3日在华盛顿正式签字)。1974年10月后,这种限制出口的措施稍有缓和。1977年2月作废,实行自由化。政府对自主限制行业,提供了751亿日元的救济金,后来,由于日本纤维产业联盟和作为纤维产业工会的全纤同盟,以通产大臣田中为对象,提起了行政诉讼,谴责政府间协定是违反法律的。政府只好决定再追加1278亿日元的救济金。实际上,日本的纤维产业已不是日本的主要出口产业,对美国的纤维产业来说,也已不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包括纤维产业在内的轻工业和轻机械工业领域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因此,倒不如说,在纤维产品方面,自那以后,日本已从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变。

纤维协定草签后不久,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由美国和日本两国共同提出的有关阻挠中国参加联合国问题的“反重要事项指定决议案”遭到否决,中国参加联合国,台湾丧失了代表权。

秋天,国会审议冲绳归还协定,由于在野党的阻挠,迟迟没有进展。10月27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以提交联合国的“反重要事项指定决议案”这一共同提案中,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败为理由,对福田外相提出不信任案。另外,以日美纤维协定为理由,对通产大臣田中也提出不信任案。虽然自民党的一部分议员因不满意佐藤内阁对中国的政策,没有出席众议院会议,但这两个不信任案还是被否决了。11月24日,众议院会议在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抵制的情况下,通过了自民党、公明党、民社党共

同提议的关于冲绳归还协定和非核武器化、以及缩小冲绳基地的决议案。12月22日，又经参议院通过批准。

1972年1月，佐藤首相和尼克松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利门蒂进行第二次会谈，谋求改善两次“尼克松冲击”后的日美关系。1月7日发表共同声明宣布，3月15日交换归还冲绳的协定批准书，5月15日实现归还。

2. 通货危机与日元升值

尼克松冲击

1971年夏季发生的两次“尼克松冲击”，给佐藤内阁以很大冲击。它不可避免地将引起日本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转变。两次“尼克松冲击”，标志着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动摇。日本政府、执政党、财界等人士对美国作如此大的政策变动，事先对友好国家的日本不透露一点风声，表示惊讶和强烈的不满。然而，美国并没有把日本当作最可信赖的同盟国。除此之外，由于美国自身也陷于困境，不可能再考虑日本的事。为提高政策转变的效果，内容和形式都必需是冲击性的。

1971年7月15日发表的尼克松访华计划，是自1950年秋，朝鲜半岛上美国军队和中国军队交战以来，美国对以“封锁中国”为基本目的之一的远东战略进行修改，而迈出的重大一步。

美国承认对越南的军事干涉是失败的，不得不寻找一条“体面的撤退”之路。为有利于越南和平的实现，利用中国的影响力，也是美国接近中国的一个动机。企图阻止中国参加联合国，至少维护台湾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美国政策已不能再继续了。而且，由于中苏对立的激化，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以对抗苏联的外交战略，已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尼克松从想要作为推动美国外

交历史转折的总统而留下政绩的雄心出发，也强烈希望能够实现举世瞩目的美中对话。基辛格接受了秘密访华的使命。决定邀请尼克松总统的周恩来力图顶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潮流，稳健地探索出了一种合乎现实的政策，以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美国除了原则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外，还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的立场，不可能一举改变美台关系，从而演出了一场戏剧性的尼克松访华事件。

日本政府事先不可能窥视到国际形势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动。美国驻日大使通知日本外务省尼克松访华，只比华盛顿和北京的正式公告早3分钟。对此，佐藤首相只说了句：“这是完全意料不到的”。这一年的10月，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台湾政府丧失了代表权。在野党追究佐藤内阁在中国政策上的失败，认为“佐藤内阁不能做到恢复日中邦交，应该立刻辞职”。佐藤回答说：“欢迎中国参加联合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也不能轻而易举地废除日台条约”。

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开始考虑谋求与中国的接近。佐藤在思考对策时，接受了福田外相的提案，由自民党的保利干事长出面，写信给周恩来，表明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意向，并委托访华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秘密转交。美浓部于11月10日，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佐藤政权不可信，保利书信没问题”。这一消息通过北京的新闻广播传到了日本，佐藤受到来自执政党内的批评，认为他漫不经心地起用政治上属于反对派的人物，谋求与中国接触，导致不体面的结局。

保卫美元政策

恰巧在尼克松访华公布后的一个月，1971年8月15日，星期

天,晚上9点(日本时间是16日上午10时),尼克松总统通过电视和电台,向全美发表了以下述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

(1)暂时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2)立即实施暂定的课征10%的进口税制度。

(3)工资、物价冻结90天。

这是为了对付6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增加和美元外流,所采取的紧急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各自由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根据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1945年12月生效)设立的IMF(国际货币基金)为中心机构正常运转的。IMF体制的建立,原则上是为了稳定各国的货币汇率,并根据需要对汇率作相应的调整。作为衡量各国货币的价值,采用了以大战结束时的黄金的法定价格,以1盎司等于35美元为前提,兑换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体制的建立及在其基础上的国际性的货币金融关系之所以比较稳定,虽然是因为经历过30年代的大危机,各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很重视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但直接原因则是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额资金,无条件地允许外国货币当局(政府或中央银行),按美元与黄金的法定价格(1盎司等于35美元)进行兑换。这意味着,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实行的是一种黄金美元本位制。可是,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的发展,除美国外,其他各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力下降了。而且由于美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和越南战争中军费支出的增加,使美国的国际收支连续出现赤字,黄金的储备量也连年下降。此外,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也是美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的信用动摇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开始出现混乱。渐

渐出现了抛售美元购进国际竞争能力强的联邦德国马克的投机现象,这就不能不使马克升值并向浮动汇率制发展。与此相反,作为软通货的英国英镑和法国法郎趋于贬值。因为不信任美元的价值,所以,西欧货币当局强烈要求把手头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然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已大大减少,已经没有能力无条件地满足外国货币当局提出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尼克松提出了保卫美元政策,决定对外国通货当局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当时,都认为这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但事实上,在美国黄金储备下降的现实面前,这不得不作为一项长期措施。以美元兑换黄金为前提的IMF体制下的固定汇率制,事实上,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新经济政策提出的进口课税制度,意味着在美国国内将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通过抑制进口来改善国际收支。冻结工资、物价,无疑是想以此来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美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外汇市场混乱

尼克松的保卫美元政策,大大冲击了世界各国的外汇市场。由于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元无疑将进一步贬值,所以,预计会出现企业和个人尽可能抛出美元,卖进硬通货的情况。唯恐引起混乱的西欧各国的货币当局,在尼克松发表声明的同时,也决定关闭外汇市场。虽然在一星期后各国开放了外汇市场,但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改用浮动汇率制。

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在外汇市场上保持稳定,中央银行必须按照一定的价格,无条件地进行外汇买卖。各国一旦停止了这种做法,当然会导致市场上的美元贬值、各国货币升值。然而,日本的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却没有关闭东京的

外汇市场，继续保持 1 美元等于 360 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的外汇储备，由大藏省管辖的外汇管理特别会计集中管理，并已形成一种制度，与民间的外汇直接交易由日本银行代替政府进行。1949 年 4 月以来，日本银行通过无条件地进行 1 美元等于 360 日元的交易，维持着“固定汇率制”。政府和日本银行都想维护这一体制。

日本货币当局认为，日本的汇兑交易，由于实行了非常严厉的限制，所以，能够防止大量抛售美元的发生。其次是由于极大部分的日本外汇结帐是用美元结算的，所以害怕一旦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将给出口产业带来很大影响。还担心造船业这类拥有巨额美元债权的产业，一旦美元贬值，按日元计价的收入也将大幅度减少，经营将遭受很大打击。

东京外汇市场不是一个象证券交易所那样的特定场所，而是由进行外汇交易的同业界形成的无形市场。交易通过电话进行。大大出乎货币当局预料的是，东京外汇市场上的“卖出美元，买进日元”的电话接连不断。商社等贸易界人士想尽早收回美元赊欠贷款，换成日元。就在尼克松声明公布后的 8 月 16 日，仅星期一一天，就卖出了 6.2 亿美元，大约是平时的 10 倍。同时，东京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格开始暴跌。

在西欧货币政策有关人士看来，在这种紧急事态下，不关闭外汇市场，由日本银行以固定汇率将卖出的美元全部买进，是不可思议的。并指责日本是否想通过维持过低的日元对外汇率，进一步扩大出口。东京外汇市场上连续几天抛售美元。政府和日本银行虽要求外汇专业银行控制汇兑交易，但没有拿出根本性的对策。

政府和日本银行为对付 60 年代末以来国际收支的大幅度盈余，把相当部分的外汇，强制性地让民间的外汇专业银行保管。

在大量外汇流入时，实行的是让日本银行尽量控制买进外汇的敷衍政策。这样日本的外汇储备，表面上看来是减少了，可以避免外国的批评，同时也是因为担心日本银行会通过增发日元来收购外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如果美元大幅度贬值，被强制保管美元的民间银行，明摆着就会蒙受很大损失。日本银行不得不放宽限制，买进民间银行的美元，避免使其遭受损失。

固定汇率制眼看越来越难以维持，美元抛售得更厉害了。8月27日，星期五晚上，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从28日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仅27日这一天，外汇市场上就抛出了12亿美元。据说在16日到27日这段时期，日本银行买进的美元约达40亿。据正式统计(大藏省)，外汇储备额1971年7月底达79亿2700万美元，8月底达125亿1400万美元，增加45亿8700万美元。仅8月份，外汇储备就增加近60%。

期待贸易交易稳定化的财界，倾向于日本应该马上单方面让日元升值，恢复固定汇率制。然而，美国方面并没有就废除进口加税让步的迹象，因此，由日方单方面让日元升值，与出口有关的国内产业界是不会同意的。除此之外，也还需要与西欧各国保持协调。

东京外汇市场上，9月中旬的行情为1美元等于330—340日元。与1美元等于360日元的汇率相比，日元平均升值7%左右。从那以后，日元对美元一直呈上升趋势。外国的经济人士认为，日本银行在偷偷地干涉东京外汇市场，企图控制日元升值，不然的话，日元还会进一步升值。因为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按照外汇行情，完全由市场调节形成的纯粹浮动汇率制，所以把它称为不纯的浮动汇率制。

通货危机的背景

尼克松的保卫美元政策并不是心血来潮。

在美国的经济实力占压倒优势的50年代,对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美元不足”是国际金融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很多国家都苦于国际收支赤字。然而,到了60年代,美国和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收支赤字和美元外流成为美国的一大问题。加之战后的国际通货制度,是以美元为基本通货的,因而并不拥有一个能节制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机制。国际间的大部分结算是用美元进行的,所以美国可以用本国的货币,购买必需的进口产品,也可以用美元来进行对外投资。对美国来说,不存在外汇储备不足这一问题。只要增发本国货币,就可以用于对外支付。

然而,美国有约在先,只要外国货币当局提出申请,就可以用美元兑换黄金,所以,随着其他国家美元储备的增加,就要把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这样一来,黄金就会外流。日本重视和美国之间的合作,虽然美元储备增加,但并没有要求兑换黄金。然而,法国等国为防备美元将来贬值,无所顾忌地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迅速减少。

美国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和防止美元外流,自60年代以来,就想尽各种对策。如为控制工资、物价,阻止对外投资,采用了“利息平衡税”,对外国的利息汇款加税,等等。但是,包括越南战争军事支出在内的财政膨胀之类的根本问题却没有纠正。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和美元的分布于世界范围,加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到60年代后半期,已不是美元不足,而是美元过剩。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和混乱,迟早是不可避免的。美元继续外流的话,美元的价值信誉也将下降,在各国的外汇市场上,以各种因素为起因,发生了投机性的抛售美元风,更增加了美元不稳

定的色彩。

在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出现赤字的同时，另外几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却经常出现盈余。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在固定汇率制下，出口价格相对压得越低的国家，国际竞争力反而越强。这类国家的出口增加，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联邦德国和日本就是其中的典型。

英国苦于国际收支赤字，不得不将英镑贬值，但联邦德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为控制国际收支盈余，防止通货膨胀，不得不将马克升值。到60年代下半期，英国和法国的通货贬值，而联邦德国的马克升值。

日本由于批发物价和出口物价稳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得到加强，国际收支也转为基本盈余。1970年前后，固定的日元对外汇率，把日元压得过低，对此，国际上认为日本的出口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不正当行为，强烈要求日元升值。

本国通货对外汇率的上升，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例如，如果把1美元等于360日元，变为1美元等于300日元（从1日元兑换约0.278美分增加到约0.333美分，上升20%），按美元计价的出口产品无疑就会涨价。360日元的出口产品以前只需1美元，但日元升值后，就必须用1美元20美分来出售。那就会降低出口产品在外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抑制出口。由于日元升值，按日元计价的进口产品反而降价。1美元的产品从360日元下降到300日元，从而会使进口增加。通过出口和进口两方面的影响，就会使国际收支盈余受到抑制。

在国际社会中，一国国际收支盈余的增加，就意味着其他各国赤字的增加。这种不均衡的扩大是不能置之不顾的。

本国通货对外汇率的升值，是防止外国通货膨胀波及国内市场，谋求物价稳定的一种有效方法。进口产品价格低廉，在一

国的国民经济中,进口超过某一限度时,当然会具有稳定国内物价的效果。象日本这样一个大部分原料、燃料依靠进口的国家,日元升值后,按日元计价的原料、燃料的价格就便宜,就会起到稳定国内物价的作用。此外,在固定汇率制下,由出口过多和国际收支盈余带来的外汇越多,中央银行必须买进的外汇额也就越多。中央银行因买进外汇,就要增发本国货币,由此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也很大。民间银行只要拥有少量现金(中央银行券)储备,就能开展巨额储蓄和贷款业务,所以,银行券的增发,会产生几倍的储蓄货币的效果。外汇流入过多,经过现代金融体制下的信用创造机制,会使货币过多,从而导致通货膨胀。为防止上述事态的发生,必需让货币升值,以减少国际收支盈余。

回避日元升值政策

如上所述,6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货币都必须升值。

日本的国际收支基本上实现了盈余,这表明日本必须重新研究和制定经济政策。可是,日元升值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

控制通货膨胀也是西欧面临的一大难题。1969年底,美国、西欧、日本都尝到了繁荣的甜头。各国为控制通货膨胀,都实行了金融紧缩政策。因为金融紧缩政策具有使国际收支增加盈余、减少赤字的作用。但象西德和日本这样的国际收支盈余的国家,这一时期如果实施金融紧缩政策的话,将导致国际收支盈余的进一步增加。在防止经济过热的同时,又要抑制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国际收支盈余的进一步增加,需要让本国的货币升值。

国际上的专家已注意到,随着国际性货币不稳定的加剧,需

要重新探讨货币体制。60年代就提出了各种方案，如各国货币的汇率变动幅度应更大（在现行的IMF体制下，原则上再上下浮动1%）。然而，那时没有拿出根本性的对策。

1969年9月24日，西德政府估计到马克升值后的投机因素将会直接导致市场混乱，所以决定暂时关闭外汇市场，经过6天，到30日重新开盘时，改为实行浮动汇率制。10月24日，西德政府宣布马克升值9.29%，重新恢复固定汇率制。这一动向是两年后发生的全面通货危机的一个前兆。日本当时也在秘密商讨日元升值问题。以大藏省国际金融局的成员为主，制定了日元升值的具体实施方案，分析了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提出这一建议的是1969年任大藏省大臣官房调查企划审议官的林大造（1971年发生尼克松冲击时，任国际金融局副局长）。他曾以财务官身份在日本驻联邦德国机构工作，对和日本情况类似的西德在马克升值后的实际情况极为了解。

1969年11月到12月，秘密地进行了方案的制定工作。主要负责人确信日元升值将富有成效，但大藏省事务次官以下干部参加的会议则认为“现在为日元升值开绿灯，责任比较重大”。这一工作事实上搁浅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回避作果断决定，致使问题“搁置”下来。

日本当局在日元升值问题上，取消极对策的最大理由是，害怕追究由日本政府作出选择，实行日元升值的责任。除非迫于外来压力不得不作出某种政策选择外，绝不进行决定性、具有重大意义的政策性转变的做法，已成为日本经济政策的传统。

之所以回避决定日元升值的责任，是因为预计到它将给出口产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打击。日元升值不仅会抑制出口，预计还将给已经出口的船舶和成套设备之类的赊卖贷款债权人造成损失。这些赊卖贷款是按照美元计价订货的，在将来回收时，

按日元计价的收入就会减少。随着各产业界按日元计价合同的增加,在通货危机以后,都在防止发生这类汇率差损。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其政策,与其因符合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而获得一般的评价,还不如避免因政策损害了某些特定集团的利益而被追究责任。在这种政治起很大作用的场合,即使制订政策的专职人员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缺少的,但政策的决策者还是会竭力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回避态度,体现在与其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还不如采取拿手的集团性调整。这是日本式决策机制的特点。而且,当时的日本,出口产业的利益就代表了大多数国民利益的想法占压倒优势。

调整通货膨胀政策

因日本银行始终站在回避日元升值的立场上,所以,为防止经济繁荣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开始采取金融紧缩政策。1969年9月1日,提高了法定利率。其成效体现在,从1970年开始,物价一直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但同时却又带来了国际收支盈余幅度的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要求日本让日元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

1970年6月,物价对策阁僚协议会决定采取以促进进口政策为主的物价稳定政策,对18种进口产品实行自由化。即使在物价对策方面,也是尽力回避采取日元升值这一决定性的重要政策手段,玩弄权术。到1970年秋,日本银行估计,由于实施金融紧缩政策,经济过热已得到控制。1970年10月28日和1971年1月20日,先后两次降低法定利率。日本银行在1971年的5月8日和7月28日又降低了法定利率。法定利率已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低水平。

1969年秋实施金融紧缩政策以来,产业界的萧条感有所加

强。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虽然还是相当高的，但由于国内需求不振，只有出口保持良好势头。多少具有抑制出口作用的，由政府出面让日元升值一事，就更趋困难。

1970年秋天到1971年夏天，日本银行实施的金融缓和政策，既具有减轻产业界萧条感的目的，同时，又具有刺激国内经济、扩大进口、缩小国际收支盈余的目的。这种政策，是感觉到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中，日本国内多少也将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才采取金融缓和政策，既可回避日元升值，又可达到国际收支均衡的目的。这就称之为“调整通货膨胀政策”。

国际收支盈余的减少，是躲避各发达国家对日批评的必需。然而，政府就是顽固地坚持不采取日元升值的政策，而是采取效果甚微的其他抑制国际收支盈余的政策。1970年夏天到1971年春天，提前实施了资本自由化的措施。1971年6月，决定实施以促进进口自由化、提前实行优惠关税、降低关税税率、资本自由化、废除非关税壁垒、推进经济合作、出口正常化、灵活地运用财政资金为内容的“第一次日元八项对策”。这也只是一项“回避日元升值的政策。”

日元升值已经不可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意见，在专家们中间广泛流行。7月，国内的现代经济学家集团，提出了应该低幅度、分阶段地实行日元升值的建议。现实情况是，这种低幅度的应付措施，无奈已失去作用，局势日趋严重。

政府和日本银行，在1971年8月因尼克松冲击而在东京外汇市场上发生大量抛售美元之后，还依然顽固地站在回避日元升值的立场上。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银行买进不计其数的美元。大量发行日元，是70年代前半期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第一根导火线。

史密索尼安学会体制

主要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具有解决因尼克松的保卫美元政策所带来的混乱、重建固定汇率制的意图。但围绕着如何确立各国货币之间的新的固定汇率体系，又存在利害冲突。在新的固定汇率体系中，如果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定得过高，就会对本国的出口产业带来不利，国际收支随之就要出现赤字。各国都害怕发生这类事件，要求不要把本国的货币价值定得太高。美国为改善国际收支，要求日本等国际收支盈余国家的货币大幅度升值。美国特别强调日本的日元，要大幅度升值，严厉攻击和批评日本当局。

在各国的外汇市场上，美元已经贬值，在新的固定汇率体系下，和8月份之前相比较，美元肯定还会贬值。主要国家商定了新的美元金平价（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比率），为确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以确立新的固定汇率体系，开始讨论多边性的货币调整协议。然而，协议很难取得一致，人们也担心多边性的调整能否实现。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10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在伦敦（9月15日）、华盛顿（9月底，IMF大会召开前夕）、罗马（11月30日）举行多次会谈。日本方面出席的是佐藤内阁的财政部长水田三喜男。在最后一次罗马会议上，一致同意在12月17日到18日在华盛顿继续召开十国财政部长会议。12月13日到14日，尼克松总统和法国的蓬皮杜总统在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举行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声明宣布，就美元贬值和各国货币重新进行调整、扩大汇率变动幅度以及为解决欧共体和美国在通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开展协商等问题，双方达成一致协议。

12月17日到18日，十国财政部长会议在华盛顿的史密索尼安博物馆召开，并达成一致协议。同意美元贬值7.89%（黄金价

格从1盎司等于35美元提高为38美元)。以各国宣布各自货币的金平价或以美元为中心汇率,确定新的固定汇率。只有加拿大仍坚持采用在浮动汇率制下尽力谋求汇率稳定的政策。英镑和法郎仍以金平价为基准,只照美元对金平价的贬值幅度将其与美元的比价适当调高(升幅为8.57%)。在西欧各国货币中,对美元升值幅度较大的是瑞士法郎(13.88%)、西德马克(13.58%)、荷兰盾(11.57%)、比利时法郎(11.57%)。其他各国也都确立了不同的新的固定汇率。在参加会议的国家中,日本的升值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其他国家都认为,日本的国际收支盈余最多,直到“尼克松冲击”为止,日元的对外价值一直是过低的。美国要求日元升值20%,日本方面不同意,最后,日元对美元的中心汇率定为308日元,升值幅度为16.88%。

在新汇率确定的同时,在“就长期性货币制度达成协议之前”,将中心汇率的波动幅度由原来的平价上下浮动1%扩大为2.25%。以日元为例,就是1美元允许兑换301.22日元到315.09日元。也就是说,日本银行为调节汇兑行情,可以在这一价格范围内,根据需要买卖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体制的崩溃

史密索尼安学会协议被理解为是一种暂时的措施,为探讨国际货币制度的长期性改革,经协商同意,IMF的参加国,相互之间应尽可能早地开展对话。

史密索尼安学会协议确定的固定汇率制是短命的。没有想到国际货币体制尚未改革,1972年到1973年就接连发生了货币波动。1972年6月23日,西欧首先发生货币波动,外汇市场暂时关闭。英国英镑再次实行浮动汇率制。欧共体各国于1972年4月24日,一致同意固定欧共体地区内货币的波动幅度。这就是对外汇

率在某一幅度中变动，称之为“洞中之蛇式的汇率制”。但这种办法也没有被长期地稳定下来。1973年1月20日，意大利实行双重汇率制。2月12日，美国宣布黄金价格从1盎司38美元上升为42.22美元。美元贬值10%。日本受其冲击，从2月14日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这一天，日元一举升值13.5%，1美元等于271日元。日元开始以坚挺的姿态出现。3月14日，西德马克升值3%。19日，欧共体各国实行“共同浮动”。除英国和意大利之外，欧共体各国对欧共体区域内的货币实行“蛇形浮动”，对包括美元在内的区域外各国的货币实行共同浮动。后来由于法国暂时退出，这种方式也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在史密索尼安学会体制建立过程中，日元升值幅度是最大的，进而到1973年2月，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时，又有大幅度的上升。对1949年以来一直固守1美元等于360日元固定汇率的日本政府和产业界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局面。

以美元信用的下降为背景而发生的通货危机，确实是一种难以应付的新情况。尽管如此，日本当局还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危机作出了极其过份的反应。大众传播媒介也大肆渲染日元升值会给日本经济以很大打击。耸人听闻的消息，起到了过分煽动危机感、阻碍冷静对待的作用。

在野党也站在反对日元升值的立场上。和过去实行贸易自由化时一样，主要在野势力从保卫工人生活的目的出发，站在保护产业的立场上。只有一部分专家意识到，日元升值是大势所趋，在此基础上，主张日本的经济政策体系应该作全面调整，疾呼要冷静处理。

从保护出口产业利益的观点出发，在国内舆论大声疾呼反对日元升值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还是一如既往，回避采取日元升值措施，而且过份估计和强调了日元升值的通货

紧缩效果。为此,政府和日本银行的经济政策多次出现谬误、混乱和动摇。1969年,由于决心回避日元升值,采用金融紧缩政策,使国际收支的盈余幅度进一步扩大。在1970年到1971年这段时间里,选择了刺激内需的“调整通货膨胀”的政策,采取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尼克松冲击”后,死死守住固定汇率制是徒劳的,结果导致买进大量美元和增发日币。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和史密索尼安学会体制成立后,过高地评价了日元升值对抑制出口的效果和通货紧缩的效果,把防止萧条作为目的,依靠大幅度的金融缓和和积极的财政,来推进扩大内需的政策。日本银行在史密索尼安学会体制成立后的1971年12月29日和1972年6月24日,先后两次将法定利率调低0.5%。法定利率自1970年10月以来,先后下调了6次,降到了4.25%这一创纪录的低水平。尽管浮动汇率制和史密索尼安学会体制促使日元大幅度升值,但进入1972年后,国际收支盈余还是继续增加。出现了要求日元再次升值的可能。尽管日元升值,但日本产业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由于进一步实施了合理化措施,出口数量一点也没减少。不仅如此,还获得了因日元升值,按美元计价的出口产品价格提价的这部分美元收入反而增加的效益。政府于1972年5月23日和10月20日,先后两次发表了以促进进口和扩大内需为主的“日元对策”(防止日元再次升值对策)。

1972年7月组成的田中角荣内阁,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论”,并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危机发生前后采取的大幅度的金融缓和政策和田中内阁推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使货币发行过多,大大超出国内需求,是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

3. 田中内阁与日中恢复邦交

田中内阁的组成

佐藤内阁的执政期长达七年零八个月。战前，桂太郎3次组阁（1901到1913年，但不是连任，而是和西园寺公望交错组阁），执政期总共七年零十一个月，创历史纪录。佐藤内阁虽略为逊色，但也居历史纪录第二。战后，吉田茂5次执政，总共为七年零一个月。佐藤荣作执政的时间不但比吉田茂要来得长，而且是连续执政。

佐藤内阁后期，在重要问题上，除归还冲绳外，根本不存在首相主动来选择政策的做法。“尼克松冲击”虽然对日本提出了中国问题和货币问题之类的难题，但佐藤内阁并没有准备采取积极的对策，佐藤不理解国际货币和对外汇率问题，没作任何干预。佐藤内阁自始至终，坚持推行回避日元升值这种不现实的消极政策，从而导致失败。

1972年1月，佐藤内阁后期，劳动大臣原健三郎，在选举区淡路岛举行的成人仪式上谈到“如果忘记感恩，那就到了该进养老院的地步了。这是下下策”。这一发言，大大背离了以福利国家为目标的，为老有保障应增设养老院的时代要求。这件事当然受到了在野党的追究。同一时期，身为参议院副议长的荒船清十郎在对后援会的人们作演讲时说到：“社会党、共产党每天为学生提供5000日元，让他们扔燃烧瓶、焚烧商店”。这一说法遭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强烈反驳。原、荒船两位都不得不辞职。

在3月召开的国会上，社会党的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对在冲绳归还的同时，有关恢复美国军用基地的费用和美国之音问题，日美两国之间是否还没向国会提出秘密条约一事进行了追问。

把绝密电报的复印件提供给横路的《每日新闻》记者，吐露了这一复印件来源于外务省的女事务官。记者和该事务官在4月4日，以违反公务员法被捕。

眼看佐藤即将辞职，自民党内围绕下一届总裁的选举，活动频繁。支持佐藤政权的福田赳夫和田中角荣，是富有实力的总裁候选人。佐藤倾向于福田当选。最初，确实是福田当选的可能性大，但田中的势力迅速增强，大有超越福田之势。

5月15日，归还冲绳协定按预期的日期开始生效。6月15日，众议院全体会议否决了社会、公明、民社三党联合提出的对佐藤内阁的不信任案。6月17日，佐藤首相在自民党的两院议员大会上，正式提出辞职。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佐藤提出“新闻有偏向。不想和记者直接谈话。打算通过电视直接与国民对话”。新闻记者一齐退席。这一场面经电视转播在全国播映。记者退场后，佐藤在空荡荡的会客厅里，面向电视摄像机向国民讲话。决定在7月5日的自民党临时党大会上，选举新总裁。临近大会召开之时，各派推选候选人的活动也越趋活跃。中间派的中曾根康弘派决定取消候选人的提名，支持田中。第一次投票，田中角荣为156票，福田赳夫为150票，大平正芳101票，三木武夫69票。在决选投票时，大平、三木的票都投向了田中。田中为280票，福田为190票。在票数相差悬殊的情况下，田中当选。

田中内阁的政策

田中角荣生于1918年(大正七年)，当选时54岁。

田中在新潟县读完小学后去东京，通过勤工俭学毕业于中央工科学校，从事建筑设计和承包土木建筑等事业。1943年战争期间，创建田中土木建筑工业公司。战后，在1946年4月的大选中，接受大麻唯男的劝说，捐款给进步党。在家乡新潟县被提

名为候选人,因得票居第二位而落选。在1947年4月25日的大选中,被民主党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当时仅29岁。围绕片山内阁的煤炭产业国家管理法案,民主党产生了分裂。田中和币原喜重郎等人都投反对票,并退出民主党,组织了同志俱乐部。1948年3月,与吉田的民主自由党合并。田中担任选举部长、法务政务次长等职。同年12月,因被怀疑与煤矿贪污案有牵连而遭逮捕(判决无罪)。1957年,首次入阁,任首届岸内阁的邮政大臣,时年30多岁。后来又历任自民党的政调会长、藏相、干事长、通产相等职。

田中上台之前,都是由吉田、岸、池田、佐藤这些毕业于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的官僚政治家们组织内阁的。正因为如此,不同经历的田中的上台,给人以一种新的印象。报纸称之为“庶民宰相”。因为除了头脑敏捷,擅长记数外,还具有出众的活动能力,所以,还赋予它“带电子计算机的推土机”的雅号。前首相佐藤在退出内阁前夕,迎来了71岁寿辰,而新首相只有50岁,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大雪覆盖的越后^①也出了个首相,这在日本内阁史上也是首次。

7月6日,田中在国会上受命开始组阁。决定了自民党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长铃木善幸、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人选之后,在内阁成员的人选上,围绕着内阁成员的分配,党内各派相持不下。田中以暂时兼任两个职务的方式,于7月7日组成内阁。决定外务大臣为大平正芳,藏相为植木庚子郎,通产相兼科学技术厅长官为曾根康弘。三木武夫任国务相(8月29日为副总理)。经济企划厅长官一开始由田中兼任,7月12日,有田喜一接任这一职位。

^① 越后,日本中部地方的旧国名,今新潟县。——译注

田中角荣就任首相前后,提出了两项重点施政方针。

第一项,积极推进国土综合开发政策。

在佐藤内阁后期任通产相的时候,田中在通产省有关人员的协助下,化了几年功夫,总结形成了他的开发构想。这就是田中以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和下一届首相为目标的,一份贯穿田中政策思想的文件。其成果,是以田中著书的形式,在总裁选举前夕公开发表的。积极推进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的田中设想,和“带电子计算机的推土机”的雅号很般配。田中年轻时就从事与土木建筑有关的工作,成为政治家后,对土地问题和建设事业非常关心。正如后来被证明的那样,作为支撑其政治力量的现实的因素而起重要作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经营土地和依靠政府补助金的建设事业者。

60年代,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公害问题和城市问题,自民党于1967年3月成立了城市政策调查会,试图制定城市政策大纲。调查会的会长就是田中角荣。调查会汇集的自民党城市政策大纲,大约在政府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制定(1969年5月)前一年,于1968年5月以中间报告的形式发表。

第二项,实现恢复日中邦交。

1971年7月公布的尼克松访华计划,于1972年2月下旬实施。尼克松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2月27日,在上海发表了美中联合公报。尼克松访华的实况,经通讯卫星转播,在日本的电视上也播出了。

上海公报包括下述内容:

(1) 中国历来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适用于两国关系。(2)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所有国家有利。(3) 两国希望减少国际性的军事冲突。(4) 两国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也

反对别国在这一地区谋求霸权。(5) 两国都不代替第三者进行谈判、签署协定或取得谅解。

在台湾问题上,并列了中国和美国的观点。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美国主张“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同意分阶段从台湾撤兵。美中两国政府同意,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联络处,并努力开展贸易和进行人才交流,但正式恢复外交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虽说是非正式的,但因为美中确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开始重视对中国的政策,作为美国伙伴的日本,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在是否马上就恢复与中国的邦交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上,保守势力内部还存在分歧意见。

田中组阁后不久,对这个问题就抱着积极的姿态。在进行自民党总裁选举的决选投票中,支持田中的三木,特别强调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在就任首相后不久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日中关系,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瞬间。过去由日本一方给中国添了麻烦。我认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就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也认为:“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首相或者外相有必要访问中国。”

趋于日中正常化

对田中内阁表示的恢复日中邦交的意向,中国方面也迅速作出了反应。周恩来在田中内阁组成后不久的7月9日,在欢迎也门共和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特别提到日中关系,发言谈到:“田中内阁明确提出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是值得欢迎的”。

在田中内阁成立前后,中国方面的重要人物相继来日本,和日本方面接触。7月10日来日的中国上海歌舞团团长、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于20日在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前外相藤山爱一郎主持召开的宴会上,会见了大平外相、三木国务相、桥本干事长。孙平化与田中内阁成立前的7月3日来日的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一起,在7月22日之后,同大平举行了会谈。

自民党于7月13日成立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开始商讨恢复邦交的基本方针。7月24日,在协议会的首次聚会上,田中阐明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

田中和大平坚定了访问中国、实现恢复邦交的决心,但如果日中两国政府的意见过于悬殊,会谈决裂的话,那毫无疑问,田中政权也将崩溃,对日中两国关系也将带来消极的后果。大平秘密地在自民党内,争取与致力于日中交流的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等人的合作,然后又与在野党的领袖接触,试图弄清中国方面的意图。

7月12日,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问了中国。根据事先的商议,向周恩来转达了田中的意向。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佐佐木时,表示“欢迎田中首相访问北京”。

7月25日,公明党的竹入义胜委员长访华时,受田中的委托,就日中邦交恢复时同中国方面发表共同声明的内容,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经过与中国方面的会谈,竹入确认了可以同意的共同声明条件。8月3日,竹入回国后把会谈内容向大平作了转达。8月5日,竹入和田中会谈,约定田中9月访华。

8月3日,发表了政府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8月7日,田中首相在一次记者团的恳谈会上,谈到:“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再继续保持同国府(指台湾的“国民政府”)

的关系。日本当然也不能例外”。8月11日，大平外相向孙平化、肖向前正式转达田中访华的意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窥察到日本政府在恢复日中邦交的同时，将废除“日华和平条约”（1952年4月28日签订），为此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8月3日，中国的姬鹏飞外交部长发表了“周恩来总理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正式声明。8月20日，田中和大平会谈，决定在田中访华前，先向中国派遣代表自民党的大型使节团；与此同时，也向台湾派遣政府特使，说明日本的立场。8月22日，自民党总务会决定田中访华。

8月24日，在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的正副会长会议上，根据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的十条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确立了“复交五原则”。然而，在29日召开的同一协议会的常任干事会上，遭到支持台湾派的强烈反对，作不了决定。31日，围绕修正案，因讨论陷于混乱，只好留待继续协商。9月5日，常任干事会决定对“复交五原则”作部分修改。9月8日的协议会大会上，总算一致通过。

8月31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前往夏威夷，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在8月31日和9月1日这两天举行。会谈结束后，发表了以坚持安全保障条约，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必须纠正日美贸易不平衡等为内容的共同声明。会谈前，就减少日本的对美贸易盈余对策，已在双方业务当局之间进行了交涉。减少盈余对策中包括促进民间航空公司购买飞机等内容。

9月1日，政府先遣团在田中访华之前，访问了中国。9月9日，自民党众议院议员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访问了中国。两位议员在14日拜会了周恩来。9月14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一行访华，与中国方面进行了会谈（逗留到20日）。

9月17日，为阐述日本政府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作为政府特使，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率领自民党15名议员，访问了台北(逗留到19日)。9月19日，台湾方面表示“对日本废除日华条约所产生的后果，日本应负全部责任。国民政府在这一情况下，保留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利”。

到那时为止，日中往来大多经香港绕道而行，但邦交正常化的动态一萌发，就安排了临时的直达航班。8月12日，为上海歌舞团回国准备的试验飞行，由日本航空和全日空的飞机首次在东京和上海之间航行。9月9日，首架直飞北京的全日空飞机，载着为电视转播田中访华情况而准备通讯设施的技术人员飞往中国。

恢复日中邦交

9月25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一行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田中一行乘坐日本航空公司的专机从羽田机场直飞北京。两国首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人员，日本方面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中国方面是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双方各自坚持自己一方的意见，争论相持不下，很难取得一致。9月27日，田中首相拜会了毛泽东主席。

9月28日，在两国政府首脑举行的第四次会谈中，才议定了联合声明的草案。9月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和祝贺宴会的实况，通过卫星转播，在日本电视上播映。

联合声明的序言中谈到：“日本方面对过去因日本国发动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痛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进行深刻反省”。

中国方面提出恢复邦交的“三原则”：(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本和台湾政府的和平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上述原则中的第(1)项,明确地作为联合声明的第2条载入。第(2)项列入联合声明中的第3条,即日本方面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方面的主张;同时,表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原则的立场。所谓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第8条原则,就是履行开罗宣言(1943年11月27日)的条件,此外,还包括战后日本的领土只局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联合国决定的各小岛。开罗宣言明确规定,台湾、澎湖列岛这些岛屿应归还中国。日本通过在共同声明中写明根据波茨坦公告投降和按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领土这一立场,来回答中国方面的主张。

在中国方面提出的三原则中,第(3)项关于“日华和平条约”问题,没有直接写入联合声明,而是在联合声明签署后,由大平外相在北京发表日本政府的见解,表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可以认为是已经结束”。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日华和平条约”在其达成之时是无效的,而是因为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才成为无效的。台湾政府在当天夜里,就宣布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

日中联合声明,表示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放弃要求日本作出战争赔偿的权利。两国还商定进一步就缔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

恢复日中邦交,使日本战后最大的一个外交悬案,终于得到了解决。日本投降实际上已有27年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这一很长时期里,日本对中国采取了最深重、最持久的侵略行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牺牲和损失是无可估量的。蒋介石政权也曾宣布过放弃要求日本作出战争赔偿的权利,现在,毛泽

东和周恩来的政府，也明确表示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中国政府，在会谈中指出了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牺牲是很大的，并严厉指责日本过去所犯的错误，但在正式声明中，以恢复日中邦交和促进友好关系为重，对指责过去和追究责任进行了克制。周恩来深知中国多数民众和干部，对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牺牲还记忆犹新，仍存在强烈的反日情绪，但为了顾全大局，以其出色的胆略，毅然决定恢复日中邦交。

日中关系和美中关系

在美中实现对话后，恢复日中邦交被认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之所以能在这段时间内就一举成功，是因为正碰上不受中国方面信任的佐藤内阁辞职。此外，是由于田中内阁组成后，摈弃了过去的做法，明确表示要恢复邦交。田中既然是自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在佐藤内阁的内外政策上也是负有责任的，只是在政权更迭时，产生了新的时机。中国方面抓住了这一时机。

右翼势力反对日中恢复邦交，他们威胁田中和大平周围的人。有关人员甚至紧张地察觉到有被暗杀的危险。自民党内部的亲台湾派也反对恢复邦交。保守势力曾力图挤进田中访华前夕派出的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协议会访华团，扰乱谈判。

田中以其特有的指挥能力和判断能力，敏捷地采取了措施。大平外相认为恢复日中邦交是不可或缺的，在组阁后仅两个半月，就恢复了日中邦交。

虽说具有赶尼克松访华潮流的因素，但田中个人的果断决策和大平的周密安排也起了很大作用。田中本来对意识形态问题不太感兴趣，在自民党内的政治家中，是一个反共意识很淡薄的人物。大平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不具有反共意识，以诚实的实干家所具有的特征，踏踏实实地干出了一番符合时代潮流的

事业。

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于1973年5月4日，签订了铺设海底电缆的协定，1976年7月完工。另外，于1974年4月20日，签订了日中航空协定(5月24日生效)。

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自民党内很多人持慎重态度。此外，由于中国方面意识到与苏联的对抗，明确表示要把“反对霸权”的条款也写进条约，谈判陷于僵局。然而，因1978年1月福田赳夫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谈到了要早日缔结条约的意向，7月以后，谈判再次在北京举行。园田直外相访华，进行谈判。同年8月12日，签订了该条约。日本政府坚持“对哪一国也不敌视”的全方位的外交方针，强调促进日中友好关系并不是出于敌视苏联的立场。由于存在着北方领土问题这一悬案，作为感受到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威胁的日本，必须避免对苏关系的彻底恶化。

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第二天，23日，在东京举行了交换批准书的仪式。中国克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目标，开始作出积极的努力。日中关系的稳定，在中国看来，具有重大意义。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后，美中两国没有一下子就正式恢复邦交关系。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有所发展的。由于发生了在总统选举中，在竞选对手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的所谓水门事件，尼克松辞职(1974年8月8日)。福特从副总统擢升，就任总统。1975年12月1日到5日，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一起访问中国，继续致力于美中邦交正常化。在1976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福特落选，民主党的卡特当选。卡特总统起初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一事持消极态度，但后来意识到对粉碎“四人帮”和邓小平执政后的中国的现实主义经济建设优先路线进行支援，有利于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为此感到有必要加强美中关系，于是，便

努力促进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12月15日,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公布美中将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的内容为:(1)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保持非正式的关系;(3)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中国的立场;(4)美国和中国从1979年3月1日起,在双方的首都开设大使馆。由于美中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和台湾之间正式的外交关系取消了,保持非正式的关系。

美国要求中国正式同意不对台湾行使武力,但被中国拒绝了。但另一方面,中国要求美国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一事,美国也只同意停止一年(1979年)。1980年,卡特政府又开始出售武器给台湾,1981年1月就任的里根政府,也一直向台湾提供武器。可是,以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开端,1980年,美国政府采取了允许对中国出口武器的政策,包括雷达等电波武器。

4. 日本列岛改造计划

日本列岛改造论

对田中内阁来说,恢复日中邦交是为了努力适应美中接触这一新趋势。虽然田中的果断决策加速了日中邦交的实现,但不能认为这就是田中个人通过灵活自主的选择作出决定的。可是,日本列岛改造论却正是田中在获得政权之际,许下的一个更加重要的诺言,意味着积极地选择了一种政策。《日本列岛改造论》(日刊工业新闻社,1972年5月)因为是新首相著书的缘故,迅速重印,创88万册销售纪录。“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田中内阁上台后,虽没有正式作为政府的计划文件,但因为是首相的基

本设想,实际上是被看作政府方针的。

《日本列岛改造论》首先谈了“明治一百周年(相当于到1968年),日本城市集中的功绩和过失”,期待在明治一百年后,必须进行“国土维新”。田中自诩,在战后的保守政权下,他是如何关心与国土开发有关的重要政策的制定的,认为只有具备这类经验的我,作为推行“国土维新”的领导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日本列岛改造论》在高度评价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取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了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城市问题在日本已发展到何种严重的地步。东京等大城市的大气污染已超过规定容许量。水质污染严重。汽车阻塞厉害。城市公园面积与欧美主要城市相比很小,平均每个人只有1平方米。东京的低洼旧住宅地区,处于无防备状态,一旦发生大地震,导致火灾的话,“在5小时内就会全部化为灰烬”。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地价和各类物价上涨的威胁。与此相反,由于过疏化和外出做工的人不断增加,不少地方面临地域社会的崩溃。

在列举了一系列问题后,《日本列岛改造论》从贯彻“和平和福利”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方案。《日本列岛改造论》认为,必须以“追求发展型”转向“运用发展型”为目标。虽然不少人认为,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将来日本经济还是具有实现高速发展的可能性。

第一,促进社会资本的投资。日本社会资本的累积,和欧美各国相比,要少得多。今后,必需以提高生活水平和发展产业为目标,促进各种社会资本的投资。

第二,扩大个人消费。今后随着收入的增加,国民的追求趋向高级化和多样化。为此,住宅以及教养、休假、体育之类的各种个人消费会有惊人的增加。

第三,日本拥有1亿多优秀国民,在自由的、民主的经济、社

会体制下，可以积极推进有利于增进和平与国际协调的经济运转。

虽说在以往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民间设备投资趋于停滞，但在省力化、防止公害、确保安全等部门，今后将呈现投资活跃。为此，《日本列岛改造论》认为，考虑到上述情况，“要改变以往的民间设备投资主导型等于出口第一主义的经济运转的做法，把以公共部门为主导的福利重点型路线作为政策的基本方针，经过努力，假如实现的话，日本经济仍可能会出现一次高速增长”。

基于上述认识，《日本列岛改造论》预测，1985年（昭和六十年）的日本经济规模要比现在的大得多。1969年政府制定的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预计到1985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7.5%，那时，经济规模将达200万亿日元左右。如果能继续保持10%的增长率的话，日本经济的规模将更大，可达304万亿日元，约1万亿美元。以日本经济可能达到高速增长为前提，为克服过密、过疏问题、城市问题、公害问题，积极进行公共事业的建设，加快国土开发，是《日本列岛改造论》的基本观点。

工厂重新布局和新干线

《日本列岛改造论》以上述论点为目标，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政策措施。

其一是更加积极地推进工业重新布局。

工业重新布局作为解决“过疏”、“过密”的手段，而得到重视。为此，提出了建设新的“无公害工厂地带”，工业与公园、绿地相结合，实现就业和舒适的住宅环境一体化的“公园化工业区”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为加快工厂的迁移，打算采取促进收购旧厂址和贷款，推行各种补助金政策，加速迁移工厂的折

旧，以及地方自治体因诱导建厂而实行减免固定资产税所造成的收入减少部分，由国家进行补贴等措施。

其二，是以新干线和高速公路为中心，建设新的交通干线交通网。作为建设交通干线交通网的一环，将推进本州和四国之间的架桥计划。

在完善陆上交通网络的同时，为应付持续的经济增长，还要促进港湾建设。假如到1985年，一年的石油需求量达到7亿吨（1970年的实际需求量约为2亿多吨），如果港湾承受不了50万吨油轮，一年1400次（一天平均3.8艘），就不可能把所需的原油全部运到日本。《日本列岛改造论》认为，今后可能开发作为大规模石油基地的内港，只有陆奥（青森县）、桔（长崎县）、宿毛（高知县）、志布志（鹿儿岛县）4个地区。然而，并不是所有油轮都是50万吨级以上的。如果大型油轮不能靠岸，那就在海上锚泊，再把原油卸下来。《日本列岛改造论》列举了许多地名，让各地居民对开发抱以满腔的热情。

《日本列岛改造论》认为，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将改变“人和经济的流向”。为进一步谋求人口在地方城市定居，提出了有计划地推行理想的“25万人口城市”的建设方案。

《日本列岛改造论》参考了1969年政府制定的新全综（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但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上，要比新全综显得更有魅力。新全综以建设新交通网为主，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重视间接诱导，但相比之下，《日本列岛改造论》却是重视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和建设新的地方城市等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开发性质。该计划打算通过促进大规模的社会资本投资，和建设新工厂地带，发挥日本经济的潜在力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虽然也在探讨产业要趋向知识密集型，但实际上，仍采取向地方转移重化工业这种传统的手段，来谋求解决过密过

疏问题。

看一下60年代的人口流向,就可以明白,人口大量流入东京圈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东京有工厂,而是因为东京是一个权力和信息集中的地方。《日本列岛改造论》却无视这一事实。把“决策和实行”变成漂亮的词句,成为在田中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央政府推进国土开发的设想。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政治一行政结构上的中央集权,使权力和信息进一步向东京集中。

地方居民的愿望

当今的时代,与其说重视工业化,还不如说重视信息化;与其解决生产资料、生产活动过分集中问题,还不如解决信息和决定权集中的问题。《日本列岛改造论》试图通过生产资料、生产活动的分散化,达到改变人口流向的目的。1971年以来,尽管发生了通货危机,日本经济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经济增长依然保持着高速度。由于公害问题、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和消费物价上升,大多数国民对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许多疑问,但都期待收入有进一步的增加。

《日本列岛改造论》并不是以放慢或控制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来解决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各种新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是以增加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继续促进高速增长的方法来解决。这更容易为期望收入进一步增加的多数国民所接受。虽说经济高速增长正在缩小大城市圈与非大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它更具有吸引强烈要求收入增加的非大城市居民的魅力。以田中的出生地新潟县为代表的非大城市圈,特别是苦于冬季积雪的东北、北陆、山阴地区的居民和过疏地区的居民,非常希望通过这类计划的实施,促使政府建设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网,实现工业的重新布局,建设新工业地带,创造就业机会。《日本列岛改造论》

正是想通过激发国民的这种激情，在解决60年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同时，推进新的建设性事业，以进一步巩固自民党在政治上的支持后盾。于是，对城市居民许诺，将通过迁移工厂和促进再开发，解决公害、过密问题。并对非城市居民许诺，将通过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和新干线交通网以及建设新工业地带，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

因持续高速增长，在名义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时，租税也增加很多。象《日本列岛改造论》这样富有雄心的计划，在当时的情况下，从财政上开展积极投资，看来也并不是不现实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具有掀起新的开发热潮的号召力。然而，事实上，这种开发热潮和通货危机后过度地刺激经济繁荣的政策结合在一起，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列岛改造论》上具体点名的地方，由于各企业纷纷前来征购土地，使地价猛涨。建设投资的扩大，使建筑材料的价格猛涨。这些都成了引发全面通货膨胀的导火线。

田中内阁的积极财政

田中首相在1972年10月28日的施政演讲中作了如下论述：

“70年代的政治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新的时代必需有新的政治。政治家应对国民提出课题，明确具体的目标，全力以赴，限期实现。”

《日本列岛改造论》既是田中作为政治家向国民提出的“课题”，又是“具体的目标”。田中试图依靠《日本列岛改造论》，对70年代的“新政治”提出挑战。

田中组阁后，提出了成立作为首相咨询机构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的设想，8月7日举行了首次聚会。希望成为恳

谈会委员的人员蜂拥而至。乘开发热潮之际，来自产业界的人员很多，成为一个总数达 90 人的大组织。田中在首次聚会上，提出了列岛改造论，但由于现实的政策，是要经田中等官僚机构，以独断专横的方式推行的，所以，恳谈会只不过是田中内阁的装饰而已。

8月23日，田中向经济审议会提出了制订新长期经济计划的咨询。

1973年2月，经济审议会向首相提交了“经济社会基本计划”的答询，并经内阁会议通过。以“同时实现充实国民福利和推行国际协调”为目标，预计1973到1977年度这5年中，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4%。计划期间准备投资的社会资本，按1972年价格计算，相当于90万亿日元。以到1985年建成高速公路1万公里、新干线7000公里为目标，计划到1977年度末，完成高速公路3100公里，新干线1900公里。

田中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组阁后不久的1972年8月，田中和自民党政调会的干部协商后，明确了编造1973年度预算的方针，提出了包括减税5000亿日元在内的积极财政方针。根据田中提出的积极财政方针，对1972年度的财政投融资计划，于1972年8月、10月和1973年3月先后作了三次修改，重新追加财政投融资。1972年10月，内阁决定追加和修改一般会计预算，11月经国会通过成立。上述措施，使1972年度的一般会计预算从最初的114677亿日元，经修改追加到121189亿日元，增加了6512亿日元，增幅为5.7%。正因为进行了追加和修正，1972年度与1971年度追加后的预算相比，增加率为25%（追加前为18.7%）。财政投融资最初计划为56350亿日元，追加后达到64358亿日元，增加了8008亿日元，增幅为14.2%。和前一年度的实际数目相比，最初计划增加12.5%，但经过3次修改后，实际

增加28.5%。

1972年1月，佐藤内阁编制的1972年度一般会计预算和财政投融资，实际上已是一种大型预算。它是在通货危机后，根据刺激经济繁荣政策制定的。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初，经田中内阁的修改和追加，以财政刺激经济繁荣的作用就更大了。

1972年10月20日，田中内阁根据田中在佐藤内阁任通产大臣时期推行的工业重新布局促进法(1972年6月公布)，指定了诱导发展工厂地区和促进工厂迁移地区。

围绕上述立法，大大调动了地方自治体的积极性。《日本列岛改造论》的中央集权性质，在法律上也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于要求到地方建厂的很踊跃，诱导发展工厂地区的计划大大超过当初的方案。与此相反，指定迁移工厂的地区，遭到中小承包企业的强烈反对，这是因为大企业迁移后，将对中小企业造成严重打击，再加上“列岛改造计划”提出了令人反感的“迁移税”，所以，迁移的工厂要比当初的方案少得多。

大选不振

在这一形势下，通货膨胀开始急剧上升。尤其是土地受抢购的影响，价格暴涨。

自1971年通货危机前后起，日本银行最初为避免日元升值，在日元升值后，又为应付出口减少造成的国内需求的扩大，推行了积极的金融缓和政策。如前所述，到1972年6月，法定利率先后6次调低，处于战后的最低水平。这种金融缓和政策，使金融机构、民间企业、商社等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资金。通货危机时，因美元大量流入而增发的日元，造成了民间性的货币“过剩流动性”（过剩性流动资金积蓄）。大企业和商社为有效利用

这些资金,加紧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投资。随着城市的发展,大城市以及地方城市附近的地价日趋高涨,再加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别墅”也开始抱有兴趣。在通货膨胀时期,土地作为硬资产,被选为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

在这种金融形势下,田中内阁提出的列岛改造计划,更助长了土地投机风。根据列岛改造计划,有希望开发的地区,不仅限于大城市圈,即使对地方圈的投资也很活跃。这样一来,导致全国性的土地价格暴涨。据1973年4月建设省公布的全国5490个地点的地价表明,这一年中,全国的地价平均上升了30.9%。

在野党攻击田中的列岛改造计划是把“公害分散到全国去”。由于地价高涨,居民要想购买房屋更趋困难,城市居民对列岛改造计划的批评和不满情绪也日趋增加。田中周围的一些人,曾建议乘繁荣之际,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田中本人主张优先将列岛改造计划具体化,对上述建议持否定态度。然而,由于面临地价暴涨这一预料之外的棘手问题,必须动员官僚机构立即探讨地价对策。在这种局势下,也不得不同意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日本列岛改造论”和恢复日中邦交带来的繁荣,开始趋于衰退,国民的不满情绪也日趋增长。

1972年11月13日,解散了众议院。12月10日举行大选。社会党在上次大败后就努力于恢复议席,这次获得了148个议席(比解散时增加31个议席),共产党也增加到38个议席(增加24个议席)。与此相对照,民社党为19个议席(减少10个),公明党29个议席(减少18个)。自民党减少28个议席,为271个议席。虽然过了半数,但与报纸大肆宣扬“庶民宰相”田中时的景气相比,明显陷于不振。这使田中遭受很大打击。

12月22日,第二届田中内阁组阁。田中为应付措词激烈的

舆论,力求增强阵容。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干事长桥本登美三郎、总务会长铃木善幸等人继续留任。7月总裁选举时作为竞争对手候选人的福田赳夫,也担任了行政管理厅长官,进入内阁。还起用了藏相爱知揆一、经济企划厅长官小坂善太郎。副总理三木武夫、外相大平正芳、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等人也继续留任。

通货膨胀加剧

受增发货币和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1972年上半年还比较稳定的批发物价,到下半年开始急剧上涨。1972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如果以1970年为100,那就是104.3,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上升了5.8%。1972到1973年,发生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进口价格上涨,它和国内的“过剩流动资金”相结合,成为批发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批发物价的上升,是导致1973年消费物价迅速上升的根本原因。由于通货膨胀迅速激化,日本银行开始探讨从金融缓和政策转向金融紧缩政策。1973年4月2日,法定利率提高了0.75%,成为5%。从那时起,日本银行先后又在5月30日、7月2日、8月29日调高法定利率。

面对上述形势,田中内阁在编制1973年度预算时,依然还是推行积极财政政策。1973年1月15日内阁会议通过的1973年度一般会会计预算为142841亿日元,比上年度最初的预算增加24.6%,比上年度追加修改后的预算增加17.9%。财政投融资计划为69248亿日元,比上年度最初的计划增加22.9%,比上年度修改后的计划增加7.7%。1月19日,通过了税制改革纲要,确定了所得税减少3150亿日元的减税方案。

2月,受美元贬值(黄金价格上涨)的影响,中心汇率为1美元兑308日元的史密森氏学会体制崩溃了。同月14日,日元实

行浮动汇率制。第二天,东京市场上,日元汇率急剧上升至1美元兑264日元。

田中接连受到上一年12月大选不振和大选后舆论调查反映出的支持田中内阁比率下降的打击。1973年4月,田中接受自民党选举制度调查会的提案,计划引进小选举区制度。田中说服了自民党内提出的慎重论,主张向1973年5月的国会提出这一建议,结果,因众参两院院长从中斡旋而放弃了这一念头。国会延期到9月,田中为列岛改造计划而提出的许多法律草案没有通过,只好继续审议。

在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发生前,日本就遭受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袭击。首先是因为错误地处理了通货危机,过高地估计了日元升值的通货紧缩效果,导致大量增发货币,采取超缓和的金融政策。其次是因为田中内阁的富有野心的列岛改造计划提案及由此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企业争购土地,导致地价暴涨,加速了通货膨胀。此外,进口的通货膨胀因素也导致物价进一步上升。

1973年8月8日下午,住在东京九段一家旅馆的南朝鲜在野党政治家、原总统候选人金大中,从房间里被绑架,去向不明。8月13日,金大中的私人住宅中露面。据他说是被几个南朝鲜人用麻醉药熏倒后,乘汽车和船被强行带回汉城的。这明摆着是一种侵犯主权,蹂躏人权的行径。警视厅要求追究南朝鲜驻日大使馆一等秘书参与此案的责任,并要求他出庭,但遭到南朝鲜的拒绝。日本政府要求南朝鲜把金大中送回日本,恢复“原状”,也遭到南朝鲜政府的拒绝。1973年11月田中内阁时期和1975年7月三木内阁时期,按照南朝鲜方面的意见,决定采取“政治解决”的方式,不再追究责任。连这样一个重大事件,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也束手无策。在与援助南朝鲜经济有关的权利方面,

也往往是出了问题也不究明真相，一再暴露了自民党政权对南朝鲜政策的不明朗性。

事后才了解到，南朝鲜中央情报部（KCIA）直接参与了该事。金大中以违反国家安全法等名义受法庭审判，1981年1月被判为死刑（马上减刑为无期徒刑，1982年12月去美国）。在野党要求对“政治解决”重新评价，但遭到政府与执政党的拒绝。金大中事件的处理，使国内外的人们看到，日本是一个没有主权、人权保证的，不能保证流亡政治家安全的国家。

5. 石油危机

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中东地区爆发了战争，它成为产生“石油危机”的导火线。

自19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的辽阔地域都是英国委任统治地区或保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了一批独立国家。在以色列地区，原先就居住在那里的阿拉伯人和后来流浪到这里来的犹太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英国放弃了委任统治。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属塞姆系民族，各自拥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在古代建立了独立的王国。基督教是从犹太人的宗教中派生出来的。犹太人王国在罗马帝国统治时的1世纪就灭亡了。亡了国的犹太人流散到各地。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为逃避迫害，掀起了返回祖先生存的土地巴勒斯坦、组建犹太人国家的犹太复国运动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有计划地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战后，生存下来的人们，更强烈希望建设犹太人国家，纷纷移居巴勒斯坦。为此，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对立日趋激化。

1948年5月，犹太人宣告成立以色列国。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各国出面干涉，发生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战争中，以色列占优势。11月，联合国呼吁停战，1949年2月，以色列和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签订了停战协定。

1952年7月23日，埃及发生了由纳吉布、纳赛尔等人组成的“自由将军团”发动的军事政变。纳赛尔驱逐国王后，当了总统。纳赛尔为推动民族解放运动，支援阿拉伯人组成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阻止以色列建国，同以色列政府军之间多次发生冲突。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持有运河所有权的英国和法国对此提出抗议，发展成为国际纠纷。10月29日，以色列在英、法的默许下，进攻埃及的领土西奈半岛。10月31日，英法两国的军队也开始进攻埃及，轰炸开罗。11月6日，占领了位于地中海一侧的苏伊士运河进出口枢纽——塞得港。美国反对英法两国行使武力。11月2日，联合国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立即停战的决议。以色列、英国、法国不得不撤离。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

1966到1967年，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活动更趋频繁。纳赛尔唯恐以色列进攻，处于临战状态，封锁了以色列通向红海、印度洋的唯一出口蒂朗海峡。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进攻埃及、约旦、叙利亚，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这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以收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领土为目标，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开始的。10月6日，埃及军队从苏伊士运河一带，叙利亚从戈兰高地一带，开始向以色列进攻。13日约旦宣布参战，15日沙特阿拉伯也宣布参战。

10月17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6个波斯湾沿岸成

员国决定把原油标价提高21%。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10个国家的石油部长会议声明,石油生产每月减产5%。10月18日,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声明:“石油生产削减10%。如果美国不改变对中东的政策,就全面停止向美国提供石油”。美国原先是一个石油生产国,但随着消费量的增加,成为一个大量进口石油的国家,并且大大依赖中东石油。阿拉伯各国采取的“石油战略”,是通过严格控制提供给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生活上不可或缺的资源——石油,迫使各国在外交上采取亲阿拉伯的政策。

这样一来,本来对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中东纠纷,突然一下子威胁到了日本人的生活。

资源民族主义

产油国采取“石油战略”这一手段的条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60年代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构性变化,就逐渐造就了这一条件。最大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的高涨。资源拥有国对进一步有效利用本国所拥有的天然资源,增进国民利益,抱以极大热情。这就是“资源民族主义”。

中东油田的开发,起始于1901年英国人在伊朗获得了石油开采权。后来,英国、美国、法国的各家企业,为获得伊拉克的原油开采权,展开竞争。这一时期,采掘石油的特权费是极其低廉的,在油田开发上获得成功的企业,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油田不断被开发。到50年代初期,中东石油约占世界石油生产的20%,石油贸易量的约50%。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美国籍企业的地位却平步青云。国际性的大石油企业,在生产和价格上达成协议,通过垄断,统治

市场,维持高额利润。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中东大量提供原油开始,原油价格疲软了。大石油公司虽然也标明原油价格,但在60年代,原油的实际成交价格就呈现出低于标价的趋势。这对日本这样一个大部分石油依赖进口的国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用大型油轮把原油运送到消费地,再进行分馏精制的“消费地精制主义”。战后,日本的石油精制业和石油化学工业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迅速地引起了能源革命。

1951年2月,伊朗的摩萨台政权决定把英国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所有的石油产业收归国有,为此,和英国之间发生了纠纷。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石油的国有化政策也遭挫折,但这一事件,却是资源民族主义的重要体现。

1960年9月,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的代表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后来,大多数产油国都参加了该组织。该组织谋求协调产油国之间的石油政策,开展信息的收集和交换工作,但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止石油价格下跌。1973年10月,毅然决定提高石油价格,发起“石油战略”的就是该组织的成员国。

1968年1月,科威特、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三国成立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后来卡塔尔、巴林、阿布扎比、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也加入,总共为10个成员国。OAPEC不仅谋求协调石油政策,而且还组织起来,共同开创事业,创立了阿拉伯各国的油轮船队,建造了维修油轮用的船坞等等。

随着上述一系列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产油国之间的协调,对大石油公司的发言权也得到加强。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1972年12月20日,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沙特阿拉伯和阿布扎比两国同十大国际石油公司签订了投资协议。这个协议于1973年1月1日起生效。产油国方面先投资25%的资本,以后逐年提高,到1982年,投资力争达到51%。产油国按投资率从石油公司获得石油,再在自己国营石油公司直接销售。以往委托民间国际石油公司开采原油,只收取特权费的各产油国,在参与石油公司投资后,在直接参与原油销售的同时,也开始具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意识。利雅得协议,就是对抗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激进国家的石油国有化路线,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国有化路线。无论是激进的国有化,还是循序渐进的国有化,产油国政府直接管理的国营石油公司的原油销售(DD原油)比率和数量将迅速增加,这是意料之中的。发展到后来,产油国不仅直接出口原油,而且以工业化和经济开发合作为条件,与石油消费国谈判,签订石油出口协定(GG方式)。

这种资源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制度化,使产油国向石油公司的投资大增,创造了产油国把操纵石油供应作为外交手段而加以利用的条件。除此之外,6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的加速,增加了石油的消费量,这也是诱发1973年发生石油危机的间接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中东为中心的原油供给显著增加。然而,各发达国家对石油产品的消费也是惊人的。虽说预计蕴藏的石油量,从整个世界来说,随着新油田的开发,呈增长趋势,但由于消费量的迅速增加,对各产油国来说,已经察觉资源的枯竭已为时不久了。随着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产油国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原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地下资源,采掘光了,就会一无所有。为此,想尽可能高价出售原油,以便将来即使不能依赖石油,也能通过经济开发

来使未来的生活过得富裕、充实。

世界性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美元贬值，也给产油国的行动带来不良后果。整个 60 年代，原油价格稳定在低价或趋于下跌，而用销售原油后所得的美元进口工业产品，则由于美元贬值而使这些工业产品的价格呈上升趋势。因此，产油国的交易条件（出口产品价格的指数除以进口产品价格指数）恶化。此外，以原油特权费或 DD 原油销售收入所获得的美元，再把这些美元作为资本，投放到各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上时，由于美元贬值，显而易见，损失也很大。

现实是只有少数国家拥有油田，如果这些国家达成协议，结成限制供应的卡特尔，是比较容易控制石油市场的。然而，产油国的立场也不是一致的。一部分国家强烈地意识到地下资源是有限的，要通过限制供应、提高价格的方法来获取利益；但另一部分国家却认为，自己拥有丰富的原油，当前要以大量供应、稳定销售价格的方法来获取利益。

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一国际性的政治事件，就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产油国，通过采取限制原油供应、大幅度提高价格这种大胆的统一行动来起作用的。

石油危机的影响

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发起攻击的阿拉伯一方占优势。然而，以色列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埃及成功地挺进到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苏伊士运河东岸，但以色列却攻击苏伊士运河的西岸，并占领了一部分西岸地带。在戈兰高地一战中，以色列军队迫使叙利亚军队退到接近首都大马士革的地带。美国多次派遣国务卿基辛格前往中东和苏联，不断在外交上作出停战的努力。10月 21 日，联合国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通

过了美苏共同提出的中东停战决议案。以色列和埃及首先表示接受,紧接着叙利亚也表示接受该决议案。11月4日到5日,在科威特召开了 OAPEC 的紧急部长会议,决定原油生产一律比9月份削减25%,并预告从12月开始,每月再削减5%。这就是强化石油战略。11月11日,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停战协议书。11月18日,在维也纳召开OAPEC紧急部长会议,决定除亲以色列的荷兰外,对EC各国不实施刚宣布的再削减5%的计划。11月26日,阿拉伯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召开,决定继续实施石油战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首脑会议同时还决定,对日本和菲律宾也不实行再削减5%的计划。石油危机以后,阿拉伯方面对急于表明站在亲阿拉伯立场上的日本,在外交上所作的积极努力,终于作出了最初的反应。

12月6日,在科威特召开的OAPEC部长会议,发表了对欧共体和日本恢复再削减5%的计划。12月21日到22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中东和平国际会议,一致同意关于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的撤军的协议。12月22日到23日,在德黑兰召开的波斯湾六国部长会议决定,从1974年1月1日起,把原油标价从5.11美元提高到11.65美元(标准油种的阿拉伯轻油)。12月24日到25日,在科威特召开的OAPEC石油部长会议决定,从1974年1月开始,取消每月削减5%的计划,反而增加10%的产量。同时,承认日本、菲律宾、比利时是阿拉伯的友好国家,决定把削减率从25%下降为15%。1974年1月18日,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撤军协定,之后,各按协议撤离占领地。

第四次中东战争停战后,阿拉伯各国的石油战略措施也缓和下来,限制措施不久就解除了。然而,因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和限制供给后遭受巨大打击的石油消费国,对各产油国所作出

的各项决定,是喜忧参半。标准油种的原油价格,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前的2.625美元,大幅度提高到10.46美元,约上涨了3倍。许多国家害怕限制供应,急于想确保原油,甚至出现了在现货市场上以平均每桶原油18到19美元的价格进行交易的情况。这种异常的现货价格交易后来逐渐减少,可是,上涨的原油价格在中东战争结束后却没能再回跌到原来的价格水平。到70年代末,各产油国再次大幅度提高了原油价格,导致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

OPEC的石油战略,给石油消费国的经济带来三大冲击。

第一,毋庸置疑,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今,石油既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燃料,也是一种原料。这种必需的物资,并不会因为价格上涨,就一下子减少消费量。石油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促使人们去研究节约石油的对策,但生产结构和生活结构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无疑,仍将继续使用石油。原油提价,导致汽油、灯油、重油之类的石油产品的价格也随之上涨。在石油化学工业,作为原料的石油价格的上涨,无疑将转嫁到产品价格上去。几乎所有产业的原燃料费用都涨价了,产品的价格也提高了。日本的农业,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以石油为燃料的农业机械,以石油为原料的化学肥料,使用以石油为供暖燃料的塑料薄膜温室栽培等。石油危机也影响到农产品的供应,成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作为应付削减石油供给的措施,各产业缩短开工时间,造成供应减少,导致市场价格上涨。仅削减供应这一信息,就会给顾客造成一种价格上涨的不安心理。因为人们预感到所有的东西都将上涨,所以,就会造成卖者舍不得卖,买者囤积的现象。这样又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因为各产业提高了以石油为原料、燃料的产品价格,与家庭

消费有关的汽油和灯油也在涨价,所以导致消费物价急剧上涨。

石油危机诱发了世界规模的通货膨胀。日本的情况,如前所述,在石油危机发生前就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石油危机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事实上,石油危机发生之前,由于受国际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进口物价指数已上升很多。在这种外部环境中,加上国内从金融、财政两方面实施扩大需求政策,导致在石油危机前,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就开始上升。石油危机进一步加速了通货膨胀。

产油国宣布原油提价和限制供应后不久,1973年10月31日,石油产业就赶紧宣布灯油、液化石油气、汽油等石油产品提价30%以上,因为石油公司目前手头拥有的原油库存是在提价前进口的,所以被看作是一种搭车提价。由于这是违反禁止垄断法的做法,故在11月27日,经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强制检查,给予告发。

第二,国际收支赤字。

尽管原油价格上涨,但各发达国家要维持依赖石油的生活结构,就必须进口大量原油。由于支付的外汇大量增加,造成国际收支出现大幅度赤字。在所有国家中,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盈余的,只有各产油国。国际经济发生了很大的不平衡。为避免发生国际经济危机,产油国必须以适当的方式,把获得的美元回流到各发达国家。各发达国家,无论是贸易收支还是经常收支,都出现了大幅度赤字。各产油国增加的美元收入,如果进入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发达国家的资本收支就会盈余,就能填补经常收支的赤字。

受打击最厉害的是发展中国家中的非产油国。这些国家的原料、燃料结构,也在向依赖石油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它们不具有发达国家那样的经济实力,所以没有能力填补迅速增加

的国际收支赤字。这些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危机，使得各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这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因素。

70年代，各发达国家之间，围绕着各国应该承受的经常收支的赤字幅度，产生了不同意见。象日本这样一个比较早地克服了经常收支赤字的国家，反而被认为是与公平负担石油危机的分配原则相违背的，受到其他各发达国家的指责。

第三，是通货紧缩和萧条。

石油价格的大幅度提高，使各国的对外经常收支出现大幅度赤字，这就意味着，国内生产所得的附加价值等于贴补给各产油国，作为这些国家的收入。这就削弱了应该用于购买国内资源和服务的能力。仅这一点，就足以诱发整个需求的减少，产生通货紧缩效果。

除此之外，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为控制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都采取抑制政策。为防止企业和消费者预计物价将迅速上升而采取行动的“通货膨胀心理”的蔓延，政策当局不得不公开站在抑制通货膨胀的立场上。正因为通货膨胀剧烈，所以日本更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政策。这种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必然会造成需求的缩小。

一方面面临着作为原料、燃料不可缺少的原油价格的上涨所造成的成本全面上升，另一方面又面临着由于涨价所带来的需求减少的局面，为此，企业选择了缩短开工时间，压缩生产，防止产品价格暴跌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水平下降与不振，而物价继续暴涨，或者一直保持高价。

在物价上涨，至少在预测到它还不会下降时，企业会采取与其急忙把仓库里的存货卖掉，还不如继续拥有这些货物，通过限制供给来防止暴跌，以保护自身利益的做法。这样一来，又

将发生经济的严重停滞与物价暴涨并存的局面。

石油危机和田中内阁

从1972到1973年，国内对田中内阁推行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日益感到不安和不满。在这一背景下，又发生了石油危机。由于OPEC各国宣布分阶段削减石油供应，致使对未来的不安暴露无遗。

日本经济经过50年代和60年代的能源革命，结构转向全面依赖石油。日本石油的99.7%依赖进口，进口原油的44%来自阿拉伯各国，38%来自伊朗，中东地区合计为82%。如果削减供给的话，冲击是很大的。

原油提价和削减供应的消息一传到日本，冬季所需的灯油和丙烷就上涨了。紧接着，床垫、长统靴、童鞋等石油化学制品也迅速上涨。卫生纸、清洁用纸、合成洗涤剂、砂糖、调味品等商品跟着上涨。在上述商品提价的同时，又发生了担心这些产品是否会供应不足。只要一听到某一超级市场在卖廉价商品，顾客就会蜂拥而至，库存一扫而光。只要传说某种物资会成为紧俏物资，消费者就会忙于抢购，铺面的货物也会被抢购一空。听到这类传闻的消费者还会再次奔忙于各家商店。这样一来，就会在各地发生“物资短缺”的混乱。现代的消费生活是依赖灵活的流通机构得以维持的，各商店为减少不必要的库存，都开展有效的管理。正因为如此，如果消费者一齐抢购货物，流通库存马上就会一扫而光。对此，深感不安的消费者疲于奔命地抢购物资，发生混乱。实际的供给量即使不变，但由于误传和不安的心理因素所造成的国民过度反应，也将搅乱市场机制。

事实上，石油供应刚限制时，消费物资是决不会立刻出现短缺的。对中东战争的局势也不太清楚。然而，因为大多数人根

本没有想到会发生削减石油供应一事，所以，面对这一冲击，表示出深深的不安，小小的风波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从而再次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生活的基础是多么脆弱，它是建筑在“油上楼阁”、“油腌品”^①之上的。

新闻媒介报道铺面发生抢购一事本身，就加深了恐慌心理。甚至连政府当局发表谈话，说明不必担心某种物资会出现短缺，但只要报纸上一刊登，消费者就会怀疑这种物资可能是存在问题，于是就诱发了人们的抢购行动。抢购最早在关西发生，再蔓延到东京等地。抢购的物资从卫生纸开始，波及到合成洗涤剂、食盐等一系列商品。在人们的恐慌心理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即使完全无关的问题，也会导致发生恐慌。1973年12月，有一个高中女学生无根据地传布爱知县某信用金库要倒闭的流言，于是，到各支店去取款的人蜂拥而至。

通产省再三声明，这些抢购物资不会出现短缺，打算阻止这种恐慌情绪的蔓延。可是，因为已经公布了限制原油供应的情况，所以，必须采取抑制消费的措施。11月6日，日本航空公司以航空燃料不足为理由，决定减少国际临时航班。11月23日，汽车加油站宣布实施星期天和假日停止营业的方法。11月16日，政府成立了石油紧急对策推进委员会，发布了石油紧急对策纲要，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实施节约石油—电力的纲要。内容包括缩短百货店、超级市场等商店的营业时间，各电视台自己控制深夜放映电视，缩短霓虹灯用时，削减20%的电梯使用，以及提倡少用私人汽车，暖气温度控制在摄氏20度左右，等等。

① 油腌品：用橄榄油腌制的食品。——译注

控制通货膨胀政策

11月22日,紧急石油对策推进本部在决定向中东提出新政策的同时,把石油供求适当化法案和与稳定国民生活有关的必需品价格紧急措施法案,提交国会(打算于12月21日请国会通过)。此外,还把液化石油气等列入了“防止囤积居奇法”的指定物资。这一天,政府发表的对中东政策,认为以色列应从1967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土地上全部撤退,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表明了对阿拉伯一方友好的立场。这实际上是一种从“想要石油”出发的无原则的表态。23日,美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阿拉伯各国却欢迎日本所作的努力,称日本为“友好国家”。

11月23日,在这一动荡局势中,作为田中政策协作者的藏相爱知揆一蹶亡。田中首相决定以此为契机,改组内阁。25日进行了内阁改组。田中任命福田赳夫为藏相。从此以后所实施的强有力的控制通货膨胀政策,都是在福田藏相的主持下制定的。在佐藤内阁时期任藏相和干事长的福田,60年代以来,就一直反对过度的经济高速增长,提倡“稳定增长”。面临石油危机这一冲击,福田认为“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只能是低速增长”。因列岛改造计划招致通货膨胀,在遭受很大挫折的同时,又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的田中,放弃了对制定经济政策的领导责任,全权委托于福田。福田把石油危机前后发生的异常的通货膨胀称之为“狂乱通货膨胀”,并竭尽全力加以控制。

11月24日,生产新闻纸的制造商通告各报社,新闻纸的供应将大幅度削减。12月18日,政府决定新成立国民生活安定紧急对策本部。22日,该本部决定实施石油和电力供给削减20%的对策。同一天,日本银行把法定利率再次提高了2%。法定利率在1972年6月到1973年4月这段时间内,一直保持在4.25%这一“战后最低”水平。由于通货膨胀激化,1973年4月、5月、

7月、8月连续调高,到12月调高后,一下子达到9%这一“战后最高”水平。存款储备率也和法定利率一样,分阶段地调高。这二三年期间,金融政策变化多端。

政府为确保1974年1月以后的原油供应,商议尽可能与阿拉伯各国进行积极的经济合作。为使实施的政策能引起阿拉伯一方的好感,决定派副总理三木武夫国务相前往中东。三木于12月10日出发,历访了中东八国,同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埃及的萨达特总统、伊朗的巴列维国王等各国首脑举行了会谈,12月28日回国。12月28日,通过了福田藏相主持编制的1974年度政府预算方案。

政府为防止通货膨胀的激化,已经在1973年度预算的执行过程中进行了调整或暂缓执行。1973年4月和6月,专门对公共事业费的安排作了调整。8月,又决定暂缓公共事业建设资金、财政投融资和地方财政等开支。石油危机发生后的12月,采取控制新建公共事业的措施。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1973年度的公共事业费预算中(包括救灾费在内当初为28487亿日元),合计共有12500亿日元的开支挪到下一年度的预算中使用。

1974年度一般会会计预算总额是170994亿日元,和上一年度当初的预算相比,虽增加了19.7%,但由于物价迅速上涨,实际规模要小得多。尤其是公共事业费,名义上控制在上年度最初的预算规模上,包括救灾费,共计为28407亿日元,但如果把物价上升的因素考虑进去,这就表明事业规模有了大幅度的压缩。

然而,田中首相公开作出的减税2万亿日元的许诺,尽管被指责为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但还是实施了。这至少可以弥补一部分因通货膨胀造成的所得和资产实际下降的损失,具有缓和国民不满情绪的政治意义。

第十五章 转折的时代

1. 高速增长의 终结

东南亚的反日示威

在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最严重的1974年1月7日至17日,田中首相访问了东盟(ASEAN)五国。从1957年岸信介就任首相后不久访问东南亚各国以后,池田、佐藤、田中都将访问东南亚列为重要的外交日程。

但是,70年代第一位访问东南亚各地的田中首相,在各地却遇到了反日示威游行。1月9日,在泰国曼谷,大约5000人的学生游行队伍包围了田中一行,他们高呼“田中滚回去”的口号。1月15日在印度尼西亚因田中来访爆发了有组织的反日游行,日本企业和日本造的汽车被烧毁。驻雅加达的日本大使馆国旗被游行的人扯拉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入东南亚的最初契机是50年代缔结的一系列赔偿协定。在整个60年代,日本企业积极地进入东南亚,增加了出口,发展了合资企业,设立了许多子公司。在东南亚各城市,日本产品的广告到处泛滥。人们的欲望受到刺激,不断买进日本产品。生活的每个角落充斥着日本商品。这给人以一个印象,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在经济上却依附于日本。这种状况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势力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分别被

其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雅加达发生的反日暴行，也包含田中访问被当地各种势力的政治斗争所利用的因素。

尽管如此，日本的产业和经济在东南亚“盛气凌人”的印象是不能否认的。不久，人们也看到日本企业开始将在日本国内受强烈反对的产生公害的工厂转移到东南亚，或在那里生产在日本遭禁止的农药。因而在当地和日本国内两处都开始出现了对本国产业不仅出口产品也出口公害的批评。此外，还时常可以听到人们谴责日本大量进口木材对这些地区的热带雨林造成的不可再生的破坏。日本是东亚地区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当时是唯一的工业国。虽然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紧追日本，到70年代开始被称为“新兴工业国”(NICS)或“新日本”，但这些国家和地区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规模比日本要小得多，还没有成为一种具有影响的势力。在这一地区具有成为超级大国的潜在可能性的是中国。但它在70年代中期才好不容易收拾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局面，转而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路线。在这个存在多种不同性质要素的地区，作为唯一的经济大国的日本，很难决定自己的方针。虽然在国际上不断有日本发挥经济大国责任的要求，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没有找到明确的对应方法。当时日本正全力应付货币危机和石油危机的冲击，并没有积极考虑为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和世界和平能做些什么。

战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不擅长有意识地形成一套系统的指导思想。在外交方面也是每当出现问题时才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是名符其实的保守型措施。

执政党与在野党

田中内阁成立后第二年的1974年7月预定进行参议院选

举。由于列岛改造计划的实施和石油危机的出现，情况开始对自民党不利。自民党的得票率从60年代后半期以后逐渐下降，人们开始议论“保革逆转”的可能性。

在野党方面开始探索“联合”的可能性。公明党和民社党有建立不包括共产党的中庸联合政府的意向。社会党提倡建立以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体在野党共同斗争为基础的国民联合政府。如果考虑到公明党和民社党对共产党的反感之强烈，社会党的“全体在野党”路线是不现实的。但是，要成立取代自民党长期政府的改革政府，就必须实现在野党的某种联合，这是显而易见的。

成为半永久性执政党的自民党在选举中也可以充分利用其执政的有利条件。在日本中央集权的行政和财政体制下，执政党为了拉选票可以利用补助金行政权和审批的行政权。而且这一巨大的官僚机构很容易获得新的人才。因此，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是不易被推翻的。

在野党在整个6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处于分裂和群立状态。本来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联合政党色彩很浓的社会党，由于受到要求意识形态上纯化的党内左派的压力，减少了许多支持者，陷于一蹶不振和衰退的境地。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形成的产业社会结构不可能使以单一的阶级利益为背景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政党获得成功。随着收入的拉平，大多数国民开始具有将自己视为“中流”的意识，因此，原来属于阶级对立的意识正在消失。但是，社会阶层结构更复杂了，根据职业上的立场和地位，结合在一种利益关系上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国民被分割成几个集团，人们在一个利害关系上没有结合的可能性。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大阶级对立”的图式越来越失去现实性。由于有这一背景，按照多

数国民同意的改革路线,谋求松散的政治联合是必不可少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的自民党有一种各种势力联合体的性质,因而保证了政权的长期化。自民党是一个由许多被称为“派系”的人脉集团^①组成的结构。在这些人脉集团之间存在着微妙的政策差异,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自民党是一个统一的执政党。派系的领袖,争夺着总裁和总理的位置,在保守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着政权交易。在从岸信介到池田,从池田到佐藤,从佐藤到田中的这一政权交替过程中,保守这一大潮流,出现了微妙的路线变化。这种变化具有不断增强国民对自民党支持的效应。虽然在各届内阁的末期支持率有所下降,但新内阁一成立,支持率又有所上升。

但是,在佐藤长期政府的政策停滞时期,日本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60年代日本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也改变了世界的结构。国内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都有很大变动,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人们开始感到保守政治的局限性。田中为了打开对内对外政策停滞不前的局面,提出了恢复日中邦交和列岛改造计划等积极政策。特别是列岛改造计划,它以经济高速增长延续为前提,约定将平均分配财政资金,因而具有强化保守政府的支持基础的性质。但由于国内外条件已不允许经济高速增长,因此这项政策不能不破产。这说明以维持基本制度体系(体制)的现状为前提的保守政策的挫折。

但是,在野党并没能拿出超越保守政治的可信赖的改革路线,而且也没形成能取得大多数国民信任的人才集团。第一在野党——社会党在人这一要素上比自民党更固定化,更老龄化,因而支持者的社会基础更狭窄。

尽管自民党的得票率逐渐减少,但即使是70年代,自民党

^① “人脉”一词指组织中的派系,从山脉一词演化而来。——译注

依然继续掌权,不过执政者却变化不定。其原因之一是,在佐藤之后有多名想坐上政权交椅的强有力的领袖,他们相互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且自民党没有针对时代的转折确定政策路线,其路线摇摆不定。结果,稳定的领导力量不能确立,各种问题被搁置起来。田中、三木、福田、大平、铃木的政府都是两年左右或不到两年的“短期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自民党党内的斗争此起彼伏。尽管如此,在70年代并没有形成超越战后保守政治界限、超越战后政治界限的政治改革势力。

金权与金脉^①

在被称为“七夕选举”的1974年7月7日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正如预料的那样一蹶不振。选举的结果是,自民党62席,社会党28席,公明党14席,民社党5席,共产党13席,其他8席。与改选前相比,自民党减少8席,社会党增加3席,公明党增加1席,民社党减少1席。共产党取得了60年代以来最好的成绩,增加了9席。自民党虽然在改选的席位中没有过半数,但如果把包括无党派议员的入党和非改选议员的参议院总席数计算在内,那么自民党为129席,在野党合计为122席,没有出现“保守和革新的逆转”。

在参议院选举刚结束后的7月12日,田中内阁的副总理、1973年11月第二届田中内阁改组后任环境厅长官的三木武夫宣布辞职。在参议院选举中,田中不承认来自三木的出生地德岛地方选区的现职议员久次米健太郎,而强行让自己派系的后藤田正晴(原警察厅长官)成为候选人。虽然后藤田落选了,但在这一过程中,自民党党内的斗争却进一步发展。

在参议院选举中,各方投入了巨额选举资金,出现了被称之

^① “金权”指金钱产生的处理问题的权力;“金权政治”指受财界控制的政治;“金脉”指出钱者。——译注

为“金权选举”的现象。一部分大企业利用企业组织，动员公司职员参加选举，支持特定的候选人。这种“全企业选举”也遭到舆论的批评。三木批评了田中政治的“金权本质”，并要求改善自民党的“本质”。金权选举一般来讲是伴随着议会制出现的弊病，特别是对受财界的资助挥霍巨额资金的自民党来说，金权选举的倾向很重。在田中内阁时期，这一倾向更趋露骨，这成为田中政治的特征。

三木的这一石在自民党内激起了千层浪。大藏大臣福田赳夫也指出：“党必须重新改革”。在福田这一派，由于有在上次大选中败于田中的经历，因此要求福田辞去内阁成员职务和打倒田中内阁的呼声日益高涨。7月16日，大藏大臣福田赳夫和行政管理厅长官保利茂宣布辞职。

由于舆论对金权选举的谴责日益高涨，自民党最大的政治资金提供者——财界也作出了抑制政治捐款的姿态。经济团体联合会提出“要进行不花钱的选举”，并于8月12日决定暂时不与自民党的政治资金的集资机构——国民协会合作。8月13日，东京电力公司考虑到自己从事的是公共性强的公益性事业，决定停止政治捐款。随后，其他企业也作出了类似决定。

10月10日，月刊《文艺春秋》第11期出版，该期刊载了两篇报告文学：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的研究——其金脉与人脉》，儿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这些报告文学都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轰动一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周围的见闻。立花的《田中角荣的研究》用令人信服的材料描写了田中通过自己的部下广泛地从事各种事业和在进行政府公共事业、国营铁路的新干线工程时通过操纵地价上涨而获得巨额利润的情况。田中挥霍巨额资金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他的公馆为当代政治家之最也是大家知道的。《文艺春秋》的报道揭示了这种资金力量的基础，因而具

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些报告文学出色地剖析了田中这一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物，在战后长期保守政权下，运用的精明的方法——依靠资金实力获得政治权力，再用政治权力加强资金实力的过程。关于田中的这类传说过去也常流传，但从正面用如此真实的材料来揭露金权本质的报道还是首次。

令人注目的是，报道不是依靠大报社的采访班子，而是由月刊的小型报道组完成的。这对现代的大众传播机构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以后还查明，立花等人的小组在采访过程中受到过自民党和田中周围有关人的威胁，受到过要求停止报道的压力。

田中内阁的倒台

对于政治金权化问题，日本人一般认为：“虽然不能容忍但又没有办法”，因而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他们虽然知道国会议员无视自己制定的法律挥霍巨额选举资金的事实，但又都认为谁都或多或少这样做而没有一追到底。选民中也有不少认为从议员那里接受金钱、物品或应邀吃饭是理所当然的。大报纸过去一直没有深究这一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的风气。

虽然任何国家都经历过民主政治的腐败，但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受到比日本更严厉的批评。对于《文艺春秋》的报告文学，外国记者迅速作出了反应，立即向本国发回有关报道。平时注意外国人反应的日本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开始重新注意《文艺春秋》了。

无论是自民党还是田中都不能继续无视《文艺春秋》的报道了。10月18日，在自民党总务会上讨论了立花的文章。22日，在参议院大藏委员会上，由于在野党提出了“田中金脉问题”，并要

求田中首相出席，因而会议出现争吵。由反田中派的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重建议员联盟开始要求召开自民党临时大会。同年10月22日，田中首相在外国记者俱乐部接受提问，对《文艺春秋》反映的金脉问题作了解释。10月24日，财界的议会政治现代化委员会向田中首相提出了以发展性地撤销国民协会为内容的“关于自民党改革和政治资金形式的提案”。

在这种状况下，田中于10月28日按预定计划开始出访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缅甸。回国后的11月10日，田中与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分别举行了个别会谈，要求就改组内阁取得合作，但都遭到拒绝。第二天11日，田中改组了内阁，任命竹下登为官房长官，任命二阶堂进为自民党干事长。田中在改组后会见记者时就“金脉问题”解释说：“并没有违法行为。”

11月18日，福特总统开始访问日本。由于1960年原定艾森豪威尔的访日受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影响而中止，因而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日。福特于22日离开日本，但在此之前已经有消息说田中将辞职。11月26日，田中正式表示将辞去总理和总裁的职务。

在谁出任下届总理和总裁的问题上，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严重对立，他们都眼睛盯着“田中以后”，无论谁出任都会加剧党内的对立。自民党大会的总裁选举出现了与上一届相同的“金权选举”征兆。以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为首，在党内实力人物和顾问之间进行了调整。最后，根据福田、大平、三木、中曾根、椎名五人会谈的结果，决定由椎名“裁定”后任人选。12月1日，椎名指定了三木武夫，并取得其余三人的谅解，其条件是实现举党体制，克服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公正。

12月4日，在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上推选三木武夫为总裁。田中内阁于12月9日总辞职。同日，三木在国会被指名为总理

大臣，三木内阁成立。全面负责经济政策的福田赳夫被任命为经济企划厅长官并兼任副总理。大藏大臣大平正芳继续留任。外相、通产大臣、官房长官分别由宫泽喜一、河本敏夫和井出一太郎出任。至于文部省大臣起用了来自国会以外的《朝日新闻》评论委员永井道雄。关于自民党干事长，由于预先讲好不用总裁一派的人，所以起用了中曾根康弘。

三木武夫，当年 67 岁，1907 年（明治四十年）出生于德岛县。在明治大学学习期间曾留学美国，回国后毕业于明治大学。1937 年成为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并当选，是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以后在战前、战时和战后连续当选。在战时的 1942 年 4 月东条英机内阁时期的翼赞^①选举上，他作为不受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非推荐议员”当选。战后先后参加了协同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并作为总书记（以后为委员长）参加了联合政府的片山内阁和芦田内阁。以后任改进党干事长。自民党成立后在石桥内阁中担任了短时期的干事长。后虽任佐藤内阁的通产大臣和外相，但后来他批评佐藤的政策，参加了总裁选举。在田中内阁中他任副总理和环境厅长官，不过在批评金权选举最激烈的时候他辞去了职务，成为田中政府垮台的导火线。

椎名之所以会推举在自民党内是小派系和旁系领袖的三木任总裁，是因为无论推举福田还是大平都会留下严重的党内对立，而且为了改变自民党的形象，只有起用改革态度鲜明、在政治资金问题上给人以“清廉”印象的三木。

抑制总需求政策

田中内阁的末期是为克服通货膨胀而实施抑制总需求政策

^① “翼赞”意为“辅佐天子”。——译注

导致萧条日益恶化的时期。

由于列岛改造热带来的通货膨胀之严重大大超出意料和加之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因此,舆论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原来对经济高速增长持批评态度的福田却成了田中内阁的大藏大臣,为因实施高速增长型的积极政策遭受挫折的田中收拾残局。福田打出了“低增长路线”,政府与日本银行实施了强有力的抑制总需求政策。福田在田中内阁倒台后成立的三木内阁中就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继续负责经济政策的制定。

抑制总需求政策虽然能平抑“疯狂的通货膨胀”,但不可能使物价回到原来的水平。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所有产业的成本都将提高,产品价格也必将上涨。在物价全面上涨的同时,价格体系出现了变动。这被称为“向新价格体系的转移”。价格变动的一部分由国民的各种集团交涉决定,另一部分由政府的政策选择决定。政府直接决定的是米价,国营铁路运价、电费、公共汽车费等公共费用的价格标准。过分抑制公共费用价格标准会压迫事业经营,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所得分配。如果由于成本上升而不得不调整公共费用的价格,应自然地转入新的物价水平,这样,在经济上混乱较少。但是在政治上,政府在通货膨胀会受到谴责的环境中,还是实行抑制公共费用价格的政策比较安全。

石油危机以后的1973年12月17日,田中内阁与自民党决定延期半年实行成为悬案的提高国营铁路运价和零售米价。如果提高生产者米价而维持零售米价不动,将会造成粮食管理特别会计的赤字增加。延期提高运价将进一步恶化国营铁路的经营。这些措施作为经济政策都是“敷衍一时”的不合理政策,成为增加财政负担的因素。

1974年“春斗”的大幅度提高工资也有不少问题。在通货膨

胀的情况下,工人为了维持生活当然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由于过剩的流动性^①,企业手头的资金较宽裕,还由于列岛改造热的影响,经营者有支付能力。但是,有人指出,大幅度提高工资会提高各行业的成本,同时还会增加名义需求,拖长通货膨胀。结果,1974年的“春斗”赢得了工资大幅度提高。由于工人对通货膨胀强烈的不满,因此作为工会,努力实现大幅度提高工资对于维持其组织是必不可少的。

大幅度提高工资对于维持工人当时的生活是有效的,但是企业在附加价值的分配上却恶化了。石油危机带来的国民收入流向产油国的这一冲击的绝大部分被企业以收益恶化的形态所吸收。这成为以后投资呆滞和削减雇用的起点。

企业降低了开工率,限制了供给,以防止价格的下跌。但即使生产下降,物价上涨率依然很高,到通货膨胀能被制止还需相当长的时间。不仅日本,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和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同时并存的现象。这被称为“滞胀”(Stagnation)。这是由“通货膨胀”和“停滞”两个词合成的新词。所有发达国家都遇到了如何摆脱“滞胀”的课题。

日本从1974年下半年起出现物价稳定的征兆,但同时萧条进一步恶化,破产的企业也增加了。石油危机一年后的1974年秋天,经济企划厅和日本银行指出:“抑制总需求政策还要坚持,但要作周密的考虑”。1974年12月成立的三木内阁设立了由副总理兼经济企划厅长官福田赳夫负责的经济对策阁僚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以下的方针。

(1) 今后要保持“与国际水平持平的平稳和谨慎的增长”。

(2) 1975至1976年为实现上述目的的“调整时期”。

^① 经济学上的流动性(liquidity)指货币和比较容易转为货币的资产。——译注

(3) 为了抑制工资上涨,必须抑制消费物价上涨率。

1975年3月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率为上一年的15%。整个1975年度平均为一位数。这时人们开始谈论转向银根放松政策。但是政府和日本银行害怕1975年的“春斗”会再次造成大幅度增加工资,因而推迟了政策的转换。在保守政权下,要确立工会和政府正式的合作关系是困难的。政府不能组织有产业界、劳工界参加的有效的协调行动,政府和日本银行完全是通过传统的金融财政政策来抑制工资和物价,这就推迟了经济的复苏。

1975年2月14日,经济对策阁僚会议决定了以完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和促进公共事业等的消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萧条对策。3月24日和6月16日又先后决定了萧条对策。日本银行也于1974年12月24日决定放宽窗口规制^①,并在物价趋势和“春斗”状况已明朗的1975年4月16日开始降低法定利率0.5个百分点(从9%下降到8.5%)。6月7日又再次降低法定利率1.5个百分点,以实现真正的复苏。

走向“中速增长”的道路

石油危机及其以后的萧条成了改变经济趋势的关键。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结束了。

早在石油危机以前,对经济高速增长的疑问和批评就已掀起。《朝日新闻》在1970年刊登了题为《见鬼去吧,GNP》的连载报道(每周星期天,共18次),展开了对经济高速增长的批评。虽然对此有人指出:“没有GNP见鬼去的话,失业会进一步增加,情况会更糟”,不过,这一标题反映了人们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

^① “窗口规制”也称“窗口指导”,指日本的中央银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状况进行的管理,规制的标准根据各时期的金融政策而定。——译注

初对高速增长的怀疑。

1972年，发表了由罗马俱乐部委托研究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

罗马俱乐部是于1968年4月根据意大利奥莉维蒂公司副总经理(以后为总经理)A·佩切依的建议，由活跃于国际上的民间人士成立的瑞士法人组织。它的名称由来是因为第一次会议在罗马召开。罗马俱乐部的目标是发现核战争危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天然资源枯竭、城市化的发展、社会不稳定的增加、青少年异化的增加、通货膨胀的蔓延、传统价值的崩溃等人类危机的征兆，研究其原因，寻求解决的对策。

1970年6月，罗马俱乐部制定了《有关人类危机的项目》的计划，并得到了大众基金会的合作，将第一阶段的研究委托给马萨诸塞理工大学的系统动态小组。研究结果经罗马俱乐部成员的讨论于1972年以《增长的极限》的标题发表。该书于同年5月，由罗马俱乐部成员的大来佐武郎监译在日本出版。这时正好在佐藤内阁向田中内阁交替之前。

《增长的极限》指出，“几何级数的增长”(经济规模根据复利计算的原理增加)在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人口及粮食问题等方面正孕育着巨大危险，如果在现阶段不采取抑制手段，将来可能发生毁灭性危机。书中所用的模型和数据虽然还有局限，但在世界性高速增长时代的末期用数字来警告过度增长的危险是划时代的。60年代以来，关于人类历史性展望的各种警告和对产业化、经济增长的批评此起彼伏，但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以其对问题恶化的具体警告而更具冲击力。

日本依然是一个发展潜力很大的国家，但由于经济增长太快，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费的增加也很迅速。日本已经到了经济增长必须克服以经济本身为目的的倾向，将经济增长转入逐

渐减速的阶段。但是，要实现增长的减速，就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的均衡和就业的稳定。如果一举降低增长率，萧条将加剧，失业将增加，国民生活将受到破坏。这种情况反而有可能造成要求再现高速增长的政治空气。佐藤内阁虽然以稳定增长为目标但结果还是实现了过度增长，就是因为对于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明确的展望和战略。佐藤内阁以后的田中内阁反而实行了明确的高速经济增长型的开发政策。日本政府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石油危机刚结束，作为对高速增长政策的反作用，人们提出了低增长政策。这样一方面有如“新全综”和列岛改造计划中所反映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延续型的展望和措施，另一方面又有如“见鬼去吧，GNP”那样对增长的强烈的怀疑和批评。因此，人们面临着“是高速增长还是低增长”的二者择一的问题。但即使在出现石油危机时也还没有充分形成现实性的抑制增长的观点。

石油危机以后，在田中内阁和三木内阁中担任制定经济政策负责人的福田赳夫作了“2—3%的低增长的展望”。作为日本经济的中期展望，这是一条过低的增长路线。支撑战后经济发展的国际性因素确实正在消失。对于日本经济来说，期待再现过去曾经实现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但是，认为2—3%的增长能使日本经济均衡也是不现实的。从国际上来看，日本国民的储蓄率处于高水平，为了使国民经济均衡，必须实现与高储蓄相吻合的高投资。今后，要将投资的大部分用于不会导致生产能力扩大的改善生活环境方面。由此提高资本系数，以比过去稍低的增长率实现经济的均衡是可能的。但尽管如此，日本保持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因此，与其说只有抑制通货膨胀开始收效，倒不如说，只有

摆脱萧条开始成为一个课题时，这种中期展望才会引人注目。专家们认为目标应是“中增长”而不是“低增长”。在政府内部如经济企划厅也开始努力修正福田赳夫以及一部分财界人士发言中提出的极端低增长的观点。

2. 三木内阁与洛克希德事件

修改《禁止垄断法》

大多数自民党主流的政治家都将1974年末成立的三木内阁看作是解救保守政府危机的临时政府。但是，早就有意识地展开政治活动的三木想利用这一机会实践一下建立在自己的信念基础上的政策。

三木为了恢复国民的信任，公开了自己的财产，同时提出了自民党现代化试行方案。三木认为总裁选举的金权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密室性。从这一判断出发，他提出实现一般党员都可参加总裁选举的改革，还提倡修改《政治资金限制法》和《公职选举法》。一般党员参加总裁选举使自民党的正规党员一下增加到一百几十万人。

三木虽然提倡廉化政治，但自民党如果没有财界的巨额资金支援就不能展开政治活动，不能维持其政权。三木内阁一成立，中曾根干事长就对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提出要求重新进行企业捐款。三木的意见是全面废除企业捐款，改为个人捐款，但由于党内的反对而没能具体化。

尽管自民党与财界处于这种关系，但三木依然在就任后就向国会提出修改遭到财界强烈反对的《禁止垄断法》，并表示决心要在国会通过。

修改《禁止垄断法》，是在石油危机前后批判大企业的高潮

中各界人士提出的强烈要求。参议院物价对策特别委员会在针对石油危机而制定《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案》时，又作出了异常的附带决议：“政府必须迅速着手修改《禁止垄断法》”。在这种情况下，公正交易委员会于1973年12月成立了由法学家、经济学家、记者组成的自己的咨询机构——禁止垄断法研究会。研究会针对由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产业组织的变化，针对人们对企业的批判的不断高涨，研究了需要修改的地方。在这一成果的基础上，公正交易委员会在三木内阁成立前的1974年9月18日发表了禁止垄断法修正案。其重点是对企业在市场占有率特别高的情况下的分割作了规定；加强有关卡特尔的管理；为抑制综合商社和银行通过持有股票来达到经济力量的集中，加强对股票所有的管理等。

《禁止垄断法》自1947年制定以来，1949年和1953年进行了修改，1958年也曾被提议修改，但没有成立。所有这些修改都是趋向缓和限制。但这一次是首次要加强禁止垄断法的限制方面。其直接原因是因60年代后半期公害问题严重，货币危机以后，大企业在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大量抢购土地和石油危机前后大企业乘通货膨胀之机随意涨价以及卡特尔的行为等引起国民强烈批评的结果。

但是，一般来说，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已形成了国民生活的更大部分基本上受大企业提供的物资和服务的影响的格局。由于这一变化，消费者被置于大企业的直接影响之下。对于大多数国民来说，与大企业的关系比以前更密切了。因此，人们也更强烈地要求大企业行为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修改《禁止垄断法》也是日本改变产业政策的基本性质的开端。自从明治时代的殖产兴业政策以来，日本推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近代化。因此政府扶植产业活动、行政机关全面介入民间

事业的色彩很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以复兴和自立为目标依然介入于产业。针对由急剧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构变化而进行的产业调整，也需要政府的介入。但是，时代变了，社会目标与产业课题之间的关系也变了。调整由政府直接介入产业活动这种做法的时候已经到来。介入和管理的产业政策必须向能确立适当规则，以便能使企业的自律性活动与社会目标相吻合的产业政策转换。60年代后半期以来针对公害、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形成的新的法律和行政机构并不具有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直接介入和管理的性质，相反，它应该是确立新规则的政策的一环。

修改《禁止垄断法》也应看作是根本改变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确立新规则的步骤。

三木内阁与自民党

早在三木内阁成立第二天的1974年12月10日，就已经决定向国会例会提出禁止垄断法修改草案。总理府内设立了禁止垄断法修改问题恳谈会。政府根据恳谈会讨论的结果，于1975年4月26日向国会提出了禁止垄断法修改草案。各在野党也提出了各自的修改草案。

但是，自民党的最大资金提供者——财界对该修改案强烈反对，自民党内反对的空气也很浓。自民党内还有人抵制带有临时政府性质的三木内阁为使这一重要法案成立所作的努力。在三木出乎异常的亲自努力下，众议院虽然经过部分修改后于1975年6月24日一致通过，但在参议院却没有被审议而成为废案。在下次国会上，全体在野党提出与上一届众议院修正案相同的东西，但也没有成立，被决定需继续审查。1976年5月，政府再次提出修改草案，但依然被决定继续审查，结果于1976年11

月以废案告终。后来,禁止垄断法修改草案经过修改,于福田内阁时代的1977年5月27日在国会通过,于同年12月2日实施。虽然这是该法制定以来条款内容的第一次强化,但由于修改禁止垄断法问题的旷日持久,因而已完全失去了新鲜感。如果当时三木内阁没有受财界抵制的影响而实现强化禁止垄断法,那么这会被评价为一个划时代的政策措施,自民党的形象肯定也会改变。财界与自民党错过了这一机会。自民党虽然为了改变其形象而选出三木为首相,但自民党却又妨害了能有效地改变自民党形象的三木的改革政策。

三木首相的改革态度比自民党主流的保守路线更接近于中道路线。三木政府如果由有效的中道、革新的联合派组成的话,三木的改革思想可能有其实践机会。三木个人早在田中政府崩溃时就探索过联合部分在野党势力的可能性。但是,在野党没有为给日本政治带来活力而对此作出反应。“椎名裁定”阻止了可能导致产生自民党分裂危险的三木的行动,将三木牢牢地关在了自民党内。因此,三木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其政策思想由于自民党本身而失去了实践的机会。

1975年11月15日至17日,在巴黎郊外的朗布依埃城召开了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这是根据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提议召开的,主要发达国家的首脑将就石油危机以后的世界经济重建问题交换意见。与会国有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日本6个国家。日本由三木首相、宫泽外相、大平大藏大臣参加。会议通过了强调维持和加强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维持和加强自由贸易体制、防止汇率剧烈波动、节约能源和开发替代能源、填补发展中国家的赤字对策等的《朗布依埃宣言》。

发达国家首脑会议(summit)以后每年分别在波多黎各、伦敦、波恩、东京、威尼斯、渥太华、凡尔赛、威廉斯堡和伦敦

召开,讨论各国经济政策、贸易和货币问题、南北问题、能源问题。从第二届开始,加拿大成为第七个与会国,从第三届起,西欧共同体委员长也开始参加。

首脑会议并不决定具体的经济政策,但发达国家首脑能直接进行会谈,就每一时期的主要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不断地为寻求共同目标而努力,它已成为支撑正在寻求摆脱世界性危机可能性的各国经济活动主体的要素。日本从一开始就被列为首脑会议成员,这反映了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

洛克希德事件

三木为使《禁止垄断法》成立而决心作出努力是自民党内反三木势力增强的原因。三木的改革姿态虽然为70年代的政治所要求,但遭到自民党多数政治家的强烈反对。由于党内的抵制,三木内阁以后在任何积极政策上都没有取得进展。由于三木的改革路线的象征——修改禁止垄断法的搁浅,要求改革的国民对三木内阁产生了失望感。三木内阁开始既被保守的主流所撇开,也被改革派所抛弃。

1976年2月4日(日本时间是5日),调查洛克希德公司的不正当支付推销资金问题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披露,该公司在向日本推销“三星”客机时使用了30亿日元的推销资金,其中支付给右翼政治家儿玉誉士夫21亿日元,支付给代理商丸红公司1亿日元。在2月6日的同一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会长考齐扬就向日本、荷兰、意大利、西德推销进行作证,披露了在日本通过国际兴业公司总经理小佐野贤治、丸红公司专务伊藤宏等向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贿赂6亿日元。考齐扬在12日还说为了推销“三星”客机,在1972年会见过当时的通产省大臣田中角荣。

各在野党派出了各自的调查团前往美国，同时在国会开始追查真相，传讯了全日航空公司、丸红公司的干部和考齐扬所点名的小佐野、儿玉(因病缺席)作证。

三木首相表示要彻底查明真相，并说：“对洛克希德事件的美方资料原则上将不删去政府高级官员的姓名而予以公开。在这一问题上绝对不作出象吉田内阁对造船大案问题上所作的动用指挥权的事。”三木还给福特总统写了亲笔信，要求在资料的调查和提供方面予以合作。东京地方检察厅于2月18日搜查了儿玉的住宅、丸红公司本部以及公司干部的住宅，并于3月13日以逃税名义对儿玉进行起诉。以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在美国得到了考齐扬等洛克希德公司的推销资金负责人的调查材料。

从6月到7月，丸红公司前会长桧山广、前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以及全日空航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副总经理渡边尚次相继被捕。7月27日，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捕。田中在就任期1972年10月，涉嫌通过丸红公司的干部接受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推销资金的贿赂，并要求全日空航空公司总理在购买下一代客机时指定购买“三星”客机。到8月，原运输省政务次官佐藤孝行、原运输省大臣桥本登三郎被捕。这些涉嫌者以违反外汇法、收受贿赂的名义被起诉。

在洛克希德事件趋于表面化时，以河野洋平等为中心的年轻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于6月25日组成了新自由俱乐部。目的是脱离腐败的自民党，组成新的政治集团，进行保守政治的自我革新。

在11月的众议院洛克希德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原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原运输省大臣佐佐木秀世，自民党航空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福永一臣，以及原运输省政务次官加藤六月，被点名为“灰色高官”(虽然接受推销资金但不予起诉的人)。

洛克希德事件成了一个大涉嫌审查案件。包括前首相共有17人被起诉,许多政治家被认为是“灰色”的。公判分成丸红、全日空、儿玉·小佐野3个小组,于1977年1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洛克希德事件最初的一审判决于1981年11月5日判处小佐野贤治有期徒刑1年,判处儿玉誉士夫的秘书大刀川恒夫有期徒刑4个月(缓期执行2年)。1982年1月26日判处若狭得治等全日空干部的全部被告为有罪。同年6月8日判处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两被告为有罪。

对田中前首相的判决,到事件发生后7年的1983年10月12日才作出,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款5亿日元。田中不服,审判转入第二审。

三木内阁倒台

洛克希德事件的发生和三木首相全力查明真相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自民党内对三木的畏惧和排斥。曾为三木内阁的成立起过重要作用的椎名副总裁首先开始了打倒三木内阁的活动,并开始与田中、福田、大平等人接触。这一动向被报界披露后,大多数国民谴责这是想“掩盖洛克希德事件”。

1976年8月以后,一个被称为“打倒三木”的倒阁运动在自民党内形成。10月21日,自民党举党体制确立协议会的总会要求三木下台,并推荐福田赳夫为接替者。福田于11月5日辞去了副总理兼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职务。其他大多数内阁成员也开始站到反三木一边。三木虽然顶住压力维持着政权,但已不能实行积极政策了。

12月5日,众议院议员任期到期,开始大选。大选结果,自民党比选举前减少16人,为249人,加上选举后入党的共257人,总算保持住过半数;社会党为123人,增加11人;公明党为

55人,增加25人;民社党为29人,增加10人;共产党仅17人,减少了22人,该党自60年代以来的崛起至此告一段落。6月组成的新自由俱乐部在改选前有众议院议员5人,大选后增加到17人。

自民党的衰落不单单反映了国民对三木内阁的不信任,而且也反映了由于田中金脉问题和洛克希德事件造成国民对自民党“体质”的不信任。但是,自民党内的形势已使三木维持政权成为不可能。12月7日,三木表示将下台,17日正式表示了这一打算。12月23日,自民党两院议员总会选举福田赳夫为总裁。24日,三木内阁总辞职。同日,国会以离过半数还差1票的票数指名福田为首相。

福田赳夫于1905(明治三十八)年出生在群马县,当年71岁,比三木大2岁。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进入大藏省。1948年,福田作为复兴资金金融委员会干事,被指控有接受昭和电工公司贿赂的嫌疑。10年后被判无罪。1952年以无派系身份参加大选,当选后加入自由党,但又参与了鸠山、岸信介发起的新党运动,加入了日本民主党。1959年在岸信介内阁任自民党干事长,在佐藤内阁时期任干事长、大藏大臣、外务大臣等。

福田任命大平正芳为自民党干事长,并决定了其他内阁成员:外务大臣鸠山威一郎,大藏大臣坊秀男,经济企划厅长官仓成正,内阁官房长官园田直。福田内阁的课题是填补自“打倒三木”以来自民党内的斗争造成的政治空白,使好不容易走上中速增长轨道的日本经济持续发展。福田自己也以精通经济问题自诩。他在组阁后说:“1977年是经济之年。只要财政政策运用恰当,6~7%的增长是可能的。”

1976年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5%。但是,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要求日本为复苏世界经济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因此福田内

阁采用了追求更高增长率的方针。政府扩大了公共投资,对1977年度的经济预测是实际增长率为6.7%。虽然这时财政赤字已增加,对公债的依赖比例不断提高,但财界优先考虑追求刺激经济政策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标。

日本银行也在1977年3月12日、4月19日、9月5日和1978年3月16日连续降低了法定利率,结果,法定利率降至3.5%的最低水平。

尽管实施了这种扩大内需的政策,但出口依然增加,经常收支依然出现大幅度盈余,因此其他发达国家要求日本进一步加强刺激经济的政策。

物价的平稳与经济复苏

由于田中政府的崩溃,洛克希德事件、“打倒三木”等一系列混乱局面的出现,经济政策的机动性不断遭到阻碍。但石油危机后的抑制总需求政策在付出了严重的萧条这一代价后,出现了抑止被称为“疯狂的通货膨胀”的物价高涨的效应。政府和日本银行估计物价将平稳,决心采取克服萧条的政策,以摆脱危机。

1973到1974年进口物价指数大幅度上升,1974年比上一年实际上升66.2%。由于存在这种“进口性通货膨胀”与国内通货膨胀因素,批发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也大幅度上升。1974年批发物价上升31.4%,零售物价上升22.6%。以后,虽然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但已停止上涨,而且世界性危机带来的需求不振,也使国际商品价格全面下跌。进口物价指数到1975年以后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在抑制总需求政策的影响下,批发物价与消费物价的上涨率也下降了,其中批发物价尤其稳定。

在这一时期,出口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也很小。在石油危

机后的通货膨胀时期,成为日本出口产品主流的机械产业,由于进一步的合理化,因而稳定了成本,提高了出口竞争力。货币危机以后的日元升值趋势也促进了产业的合理化和技术革新。各产业即使在日元升值的情况下也为增加出口而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改善了质量。各产业还针对石油价格暴涨推进了“省能源化”。

消费物价指数、名义工资指数以及根据这两个指数计算出的实际工资指数也发生了变化。首先,1974至1975年消费物价与名义工资的上涨率同时上升,因此实际工资也被抬高了。1974年6月1日劳动省发表的同年“春斗”的工资上涨率为32.9%。这一年全产业的名义工资比上一年上升27.2%,消费物价比上一年上升22.6%,因此实际工资上升3.7%。1976至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率下降了,但名义工资的增长也很慢,实际工资上升率仅为0.2—2.7%。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的1980年,实际工资上升率降到负0.6%,这是经济高速增长以来的最低纪录。由于萧条的影响,工业生产跌落,就业人员削减,因此工会的交涉力量减弱了。由于企业的名义销售额减少,支付能力也下降。

工矿业生产指数以1973年秋为高峰,以后锐减,1975年第一季度(1—3月)比1973年第一季度下降13%(比高峰时下降20%)。以后由于采用复苏经济政策和出口的扩大,工矿业生产指数迅速回升。但是,有关就业的指标没有恢复到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水平。在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的1979年,工矿业生产指数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的1.25倍,但制造业常用就业指数为0.9倍左右。

日本还没有确立起遇到萧条时的调整就业的途径。企业一般通过压缩加班时间,压缩转包量,削减临时雇用的工人,暂停录用新职工,重新安排工作,保留关系借调出去等方法来应付工

作量的减少。如果萧条加剧,经营进一步恶化,就征集希望退职的人。有时也出现企业破产,工人一下子失去工作的情况。由于要经历这些过程,因此在萧条初期,常用就业指数的下降就比较慢。在美国,有“优先录用权”的制度,在讲好优先录用后再解雇工人。由于有这一途径,因此缩小就业很快,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再就业实现,就业指数也上升。但日本企业在经济复苏时尽量采用加班的方法,而对录用新职工持慎重态度,因此就业指数的回升很慢。而且由于主要产业通过进一步的合理化实现了省力化,因此制造业的就业指数不容易回到石油危机以前的水平。

走向中速增长时代

田中内阁在石油危机以前的1973年制定的《经济社会基本计划》是一个设想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9.4%的高速增长型计划。由于石油危机的出现,其非现实性已显而易见,需要制定新的经济计划。1976年5月12日经济审议会讨论了新的计划方案,同月14日,该计划以《昭和五十年代前期经济计划》的名称在内阁(三木内阁)通过。这一经济计划以1976(昭和五十一)至1980(昭和五十五)年为计划期,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设计为6%左右。这种程度的增长如得以实现,预计失业率将在目标年度下降到1.3%(1975年度为2%),消费物价上涨率为年均6%。以后在1979年8月10日,内阁(大平内阁)通过了《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年均5.7%的实际增长,达到完全就业,充实国民生活。该计划规定将大幅度扩大社会资本的投资,但由于受政府财政危机恶化的影响而遭受挫折。1983年8月由中曾根内阁决定的《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重新将年均实际增长率设计为4%,并预测失业率为2%(80

年代末),消费物价上涨率为3%,批发物价上涨率为1%(均为年率)。

从1973至1974年,由于通货膨胀,虽然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提高了,但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内含物价折算指数^①上升率高,因此,实际增长率在70年代大幅度下降。但是,在70年代后半期实现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以1975年不变价格计算,197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1.2%,1975年为2.5%,但在从1976到1980年期间实现了5%左右的增长。这一数字虽然低于1976年《昭和五十年代前期经济计划》所设想的6%的实际增长率的数字,但能够实现“中速增长”而不是“低速增长”是令人瞩目的。

70年代后半期的物价动向比较平稳。政府在经济计划中所设想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时的1979年的消费物价指数比上一年上升3.5%,在此之前的4年年均上升率为6.4%。

但是,也许是实际经济增长率比计划所设想的略低的缘故,失业率一直略高于计划的数字。

70年代初期的完全失业率处于低水平,仅为1.1—1.4%,依然持续着高速增长时期的特征。在石油危机以后的萧条时期,失业率上升了,到70年代后半期达2%以上。在1979至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这一数字更大。有效求人比率在70年代初超过1,求人数大于求职数。但到1974年的萧条之后大幅度下降,1977至1978年下降到0.56,以后再也没有超过1。到80年代初,由于以财政危机为背景的抑制公共支出带来的内

^① 国民生产总值内含物价折算指数(GNP Deflator)的计算公式为: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基期物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译注

需不足，由于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世界性经济衰退致使增长率下降，再加上技术革新和新的自动化带来的劳动就业环境的变化，以及女性就业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等复杂因素开始起作用，就业状态的改善更趋困难。

3. 经济复苏与政治混乱

石油危机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

1973年的石油危机在全世界激化了通货膨胀，同时带来了大萧条，世界经济面临自30年代以来的危机。但是，通货膨胀与萧条的程度因各国所处条件和政府或中央银行所选择的政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经济危机面前，反映出各国政治与经济的“体质”。

在石油危机刚结束后的1974年，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得最快的是日本。1974年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率是：日本24.3%，美国11.0%，西德6.9%。

日本由于应付货币危机措施的失误和由于列岛改造计划造成的积极财政的影响等国内因素，在石油危机以前就开始出现了物价上涨，因此在日本由石油危机造成的通货膨胀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严重。而与日本相反，西德为避免国际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几次提高了马克的比值，在面对石油危机时，政府和国民也表示出冷静的态度，因此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很轻。以后，西德的物价指数与其他国家相比也稳定得多。

同样是西欧，英国在1975年以后出现了极高的物价上涨率。在美国，1974至1975年出现了由石油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但到1976年又略有平静。1977年以后，卡特政府为复苏经济实施了积极政策，结果导致激烈的通货膨胀再度爆发。到70

年代末，克服通货膨胀成了最重要的课题。在激烈的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英国和美国在付出了失业增加和福利预算削减这一代价之后，成立了提倡“反凯恩斯主义”、“反福利国家”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于1979年5月、美国的里根政府于1981年1月成立）。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矿业生产动向来看，在这些国家中，日本1973年对上一年增长率和1975年对上一年下降率比任何国家都大。这一时期日本的生产特点是高峰奇高低谷奇深。美国的剧烈动荡仅次于日本。美国和日本在70年代后半期，工矿业生产明显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危机以后的复苏是迅速的。但是美国在这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通货膨胀，而日本则成功地让生产在物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迅速回升。与日本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德和英国的工矿业生产在70年代后半期还持续停滞不前，尤其是英国的产业萧条严重。70年代末，也由于有撒切尔政府的抑制性政策的影响因素，生产进一步大幅度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扩大了生产，增加了出口，增加了国际收支盈余。因此，其他发达国家对日本的批评也开始高涨。人们认为日本对美国和西欧的出口增加是这些地区失业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因而出现了企图限制日本出口的动向。这就是所谓贸易摩擦或经济摩擦。

石油危机以后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们把那种为摆脱经济停滞而扩大出口，结果造成对象国失业增加的政策，叫做“近邻贫困化政策”。在70年代后期的克服石油危机过程中，由于日本在多数国家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增加了出口，实现了“中速增长”，因此被谴责为实行近

邻贫困化政策。

这一时期日本的国际收支一直很不稳定。

原因之一当然是石油危机。由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贸易收支的盈余缩小，经常收支、基础收支、综合收支还一时出现了赤字。这反映在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刚结束时的国际收支中。

另一个原因是浮动汇率制。

在经济学家中有人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对外汇率将朝着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方向浮动，因此对外经济关系肯定将会稳定。但是，实际上市场出现了过剩反应的性质，国际收支的不稳定出乎意料。

增加外汇市场不稳定性的一个因素是，从汇率变化到出现出口金额的调整效应为止的“时滞”。日本国际收支在赤字时日元的汇率就下跌，但它不会马上对缩小国际收支赤字起作用。由于日元的下跌，一定出口量所获得的美元将减少，总出口额反而会暂时减少，因此，国际收支赤字暂时会进一步扩大，这将进一步降低日元的对外汇率。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品价格的下跌到增加出口数量、增加出口金额为止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会出现日元过低的情况。国际收支在盈余时，汇率又会出现相反方向的过度，出现过度的日元高美元低的情况。

增加外汇市场的不稳定性的另一因素是资本转移。由于各国间的利差和人们对汇率浮动的预期，短期资本剧烈转移，它会对外汇产生巨大影响。即使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出现盈余，如果短期资本从日本流向美国（如果短期资本收支为赤字），人们就会抛出日元买入美元，就会出现日元贬值美元升值，从而造成出口增加，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盈余进一步扩大。日元对外汇率经常大幅度浮动，日元经常处于过分贬值的状况，又会造成出

口迅速增加。日本产业所具有的竞争力加上日元汇率的过低，往往造成出口“大暴雨”式的增长。

许多专家注意到浮动汇率制的这种缺陷，并开始重新评价固定汇率制的优点，但是能复归固定汇率制的现实条件还没有产生。由于美国拥有的黄金过于减少，而其他国家拥有的美元又急剧增加，因此已没有恢复美元与黄金的交换性的可能性。而且各国通货膨胀程度不同，即使回到固定汇率制，也必须不断变更汇率，这时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规模的投机。

在70年代后半期的4年间，日本实现了超过5%的“中速增长”，但即使在这期间，支撑“中速增长”的因素也有了很大变化。

石油危机后的1974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负0.2%。民间设备投资(负8.5%)和民间住宅投资(负16.3%)的大幅度下降是两大原因。由于公共投资也受到抑制，因此政府投资也为负数。但是出口增长了23.2%。

1975年度，民间住宅投资有明显的回升，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也有了增长。但是，在1976年度，所有这些增长都下降了。民间设备投资到1977年度持续萧条，而与此相反，出口的增长率到1977年度一直超过国民总支出的增长率。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后摆脱萧条的过程中实现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回升。

1977至1978年度，福田内阁为刺激经济大幅度增加了有关公共事业经费，使政府投资增加了15%左右。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已趋平缓，失业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要提高经济增长率，而且来自国外的压力也强烈要求日本挖掘国内需求，实现高增长，以停止其出口主导型部分的增长。

1978至1979年度，由于民间消费略有上升和民间设备投

资高涨，实现了内需主导型部分的增长。而且因为出口增长减缓，进口增长加快，已经可以躲避“近邻贫困化政策”这一谴责了。

到1979年度以后，由于财政危机，扩大政府投资已不可能，民间消费和民间住宅建设也出现了不景气。1979年度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再度出现了出口主导型部分增长的特征。

日本产业的活力

尽管在70年代日元几度大幅度升值，尽管人们对出口受阻忧心忡忡，但日本主要产业还是通过进一步合理化，降低了成本，改善了产品质量，进一步扩大了出口。

针对60年代加剧的公害问题，需要新的技术革新和投资。日本的产业虽然在防公害于未然方面失败了，但随着事态恶化后限制措施的建立，各产业均采用了有效的对策。防止公害的技术也被针对以后石油危机的省能源化所利用。为了不排放污染物质，有必要将工厂设备改成封闭式废物循环回收系统，这一设想也被应用于省能源技术上。必须有效地回收过去一直白白排放掉的能源，为此也必须推进向封闭式废物循环回收系统的转变。许多炼钢厂将高炉（熔矿炉）顶部排放出的能源回收后用于发电。为了节省能源，这类革新广泛地出现于许多工厂。

60年代通过重工业化而发展起来的机械产业，到70年代作为出口产业而获得进一步发展。70年代日本的出口产品逐渐成为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其内容也日益多样化。汽车产业以轿车为中心发展成出口产业，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以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为首的电子机器和器件的出口也迅速增加。

战后曾长期依赖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日本产业，消

化并改进了技术，扩大其适用范围，积累起开发优质产品的能力。从通过彻底合理化的生产体系有效地供给这些产品这一点来看，日本已达到领先于欧美各国的水平。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在美国，政府的扩充军备和有关宇宙开发的研究开发，对促进尖端技术的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军事技术和宇宙技术对一般民用产品来说具有过剩品质（要求有过高的精度和特性），不能马上对整个产业的发展起作用。产业的停滞不前也与过份地将大量科学家、技术专家等人才投入这种特殊技术的开发有关。日本的军费负担轻，它可以一面充分运用来自美国的技术，一面将人力和物力资源集中投入民用产品的开发、改进以及高效率生产上。

国内外大多数专家开始注意到日本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发展受日本固有的稳定的劳资关系的保证这一事实。关于“日本型劳资关系”的讨论开始掀起。

许多人认为“日本型劳资关系”来自日本固有传统，它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性。

在建立组织和管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上，日本的传统出人意料地对现代产业的组织和技术的革新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确是事实。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知识分子一直过分地认为所有日本传统都是必须克服的“近代化之前”的要素，只有欧美的东西才是“近代的”要素，才是应该引进的。现在已到了反省这点了的时候了。

但是，70年代重新受到注意的日本劳资关系是直接由日本的劳资双方各主体通过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经验而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改革带来的工会运动的重建和加强，左翼意识形态带来的激进运动的高涨和挫折，财阀解散以后经

营者支配地位在日本企业的确立，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发展等要素，贯串于战后复兴、自立、增长这一艰苦摸索的全过程，并建立起固有的劳资关系。

50年代的左翼运动遭受挫折后，以民间企业为中心，经营者与工人运动领导人双方形成了非常现实主义的态度。经营者方面开始认识到劳资关系的稳定是经营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一方面对左翼势力对工会内部的渗透持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工会主义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保持协调性的态度。经营者恳切地向工会说明产业和经营现状，并努力要求保持交涉和协商。这样形成了在结构变动引起调整时尊重劳资双方协商的习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扩大当然也成为形成稳定、和平的劳资关系的有利条件。

日本民间产业的工会是按企业组织的，因此工会领导人能很关心产业和企业的实际情况，能得到并充分理解许多信息。日本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因此按企业组织起来的工会领导人也不能不认识到自己所属的企业在竞争中不屈不挠取得胜利是改善工人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经过战后一系列社会实践，形成了以企业为单位的日本型劳资合作关系和以这一关系为前提的工人运动，形成了以这种工人运动为前提的日本型经营者支配的结构。

经济摩擦

如果不理解战后改革就不能理解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也不能理解战后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离开战后改革也就不能理解在70年代骤然成为议论对象的日本型劳资关系的特征。它是在战后国内外各种条件下以固有形态在日本固定下来的产业民主主义与以固有形态在日本固定下来的经营者支配相结合的

产物。

以这种日本型劳资关系为基础而实现的日本产业的竞争力与对外经济关系不稳定因素相结合,激化了所谓的贸易摩擦。与日本的出口结构变化相对应,成为“摩擦”起因的产品的种类也接二连三地发生变化。

70年代初期,日本的纤维产品的出口出现纠纷,它与归还冲绳的会谈纠缠在一起而成为政治问题。佐藤内阁时期的通产大臣田中角荣决定日本作重大让步,签定了政府间协定。以后,日本从纤维产品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而新兴工业国家成了纤维出口国,这些国家在美国市场也占有了很大比重。

70年代,在重化工业和尖端技术产业领域发生了多起纠纷。1977年再次爆发了关于日本向美国出口钢材的纠纷。1978至1980年美国对从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进口器材提出了苛刻的要求。1979至1981年日本的汽车出口在美国和欧洲成为攻击对象。此外,彩色电视机、录像机等各种商品相继在发达国家成为限制进口的对象。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强烈要求日本企业在电脑等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中保持公正,并强烈要求日本在农产品进口、金融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实行自由化。

1977年至1978年,日本在金融财政政策上的选择成为外交上的争论焦点。在1976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卡特击败在任的福特而当选。卡特在1977年1月就任总统后主张为了重建世界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应实行更积极的经济政策,他对日本也要求实现高增长。卡特政府认为美国应起到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并要求日本也成为“火车头”。日本经济的回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口主导型的,内需依然不景气,因此人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也采取旨在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和克服失业的积极的扩大经济政策。

在1978年7月的波恩“七国首脑会议”上，尽管有的国家认为当前应重视克服通货膨胀，有的国家认为应将重点放在经济复苏上，但还是确认了主要国家应为再现经济增长而努力的方针。会议要求日本把经济增长率提高1.5%。这次会议出现了新情况即经济增长率的选择成为主要国家之间交涉的主题。这反映发达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前所未有的地加强，也反映了克服失业在这时期正在成为许多发达国家最为关心的事。

在国内外要求下，1976年12月成立的福田内阁采用了积极的刺激经济政策。可笑的是，持“低速增长”观点的福田首相实行了促进增长政策。在实行金融缓和政策的同时还从财政方面实行了积极政策。特别是扩大了公共投资，一般会计中的有关公共事业经费大幅度增加，公共投资超出了行政当局和民间建筑业的承受能力。在复苏经济的理由下，到处大兴土木。尽管财政赤字已经扩大，但仍然增发公债，有人批评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卡特政府的“火车头”理论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的刺激经济政策确实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克服失业的效应，但激化通货膨胀这一副作用太大了。在卡特政府的末期，公民开始对通货膨胀不满。在1980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里根许诺将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将为克服通货膨胀实行强有力的抑制总需求和紧缩财政，击败了在任的卡特。

在日本，由于财政危机的加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不可能。通过财政来刺激经济，结果用税收的增长来减少对公债的依赖比重这一凯恩斯主义的扩大均衡的设想已行不通。1978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大幅度提高油价，第二次石油危机发生了，各国再度陷于滞胀。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根据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经验，担心出现通货膨胀的心理

状况,为防止由进口性通货膨胀转向国内通货膨胀,决定向抑制总需求的政策转变。恰逢这时出现从福田向大平的政权交替。大平放弃了成为国际诺言的7%的增长路线,遭到了美国卡特政府的谴责。但是,在这一时期,曾经成为日美经济摩擦的直接原因的贸易不平衡已呈缩小趋势。汇率变为日元升值的效应终于开始显示出来。

在野党的混乱

福田首相在经济方面采纳了积极的增长路线,同时在政治方面为实现三木内阁提出的党的改革作出了努力。福田在对外政策上被认为是重视扩充军备和强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体制的“鹰派”。福田派中包括由提倡日本核武装论的国家主义政治家组成的“青岚会”(1973年7月17日由31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牵头人是渡边美智雄和中川一郎)的多名成员。福田内阁与田中、三木、大平等相比,给人以实行“右倾”路线的印象。但福田内阁并没有明显地改变保守政治的路线。内阁成员的交椅也适当地分配给三木派和大平派(原池田派),在政策上保持了平衡。从日本所处的国内外条件和国内舆论情况来看,不可能有重大的政策路线变更。至于当时的政策,日本的选择余地也并不大。这对于在野党所能提出的政策来说也是如此。

如果谋求执政的现实可能性,在野党也处于不能提出与自民党大相径庭的政策状况。如果政策大大改变了现状,使人感到会出现大乱,就不可能获得多数国民的支持。但是,一方面现实地面对当前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作出更长期展望,在一段时期里创造出一种新状况则不是不可能的。为了超越保守主义对每一问题只能采取听其自然态度的局限,这种改革的措施是必要的。日本的选择已不是右或左的问题,而是在产业化和高速

增长后的一个大转折时代能由哪个政治主体来作出更长期的展望,来实践更有深度的措施的问题。

福田内阁虽然显示出扎扎实实处理实务的能力,但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问题。

1977年是参议院选举之年。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在野党发生了小小的变动。

在上一年度的1976年2月,公明党总书记矢野绚也,民社党副委员长佐佐木良作,社会党副委员长江田三郎,加上几个学者成立了“思考新日本之会”。这是想形成能取代自民党政权的现实性在野党势力联合的尝试。社会党内左派的社会主义协会派攻击了江田这一举动。在1977年2月8日至10日的党代表大会上,左派代表激烈谴责了江田。江田认为由于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者集团——社会主义协会派已控制了社会党,因此已经没有认真展开党内争论的可能性,遂于3月26日脱离社会党。正好江田在上一届大选中落选,因此江田决定参加参议员的候选。江田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和一部分市民活动小组合作,组成了社会市民联合。继在1976年洛克希德事件冲击下成立新自由俱乐部之后又一个旨在实现新的政治形式的小政党成立了。但是,江田还没有实现通过在野党的重组革新日本政治这一目标就于5月23日突然去世。

在7月10日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在野党再次提出了“保守革新逆转”的目标。但是,自民党还是获得了63席,只减少两席,总算保住在参议院过半数局面。而社会党和共产党却在选举中失利。共产党改选6席,当选5席;社会党改选32席,当选27席。刚成立的社会市民联合由江田的儿子江田五月取代江田参加候选,他与社会党的田英夫一起在全国选区以极多的得票数当选。

对于在参议院选举的失败，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总书记石桥政嗣表示将引咎辞职。社会党虽然长期占据着象征战后民主主义的最大在野党的地位，但没有在向以自由和民主主义为前提的改革势力的发展中取得成功，它由于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左派势力的渗透而变成陈腐的僵化的集团。成田和石桥在左派势力的支持下形成了党的执行部，孤立了江田三郎提出的结构改革路线和改党的主张，将江田排挤出党外。成田—石桥体制使社会党改革失去了机会，是70年代以来社会党衰败的基本原因，这也对日本整个政治的混乱和停滞产生了很大影响。

9月26日，召开了社会党大会，但在选出新的执行部问题上遇到障碍。在12月26日举行的续会上才选出委员长飞鸟田一雄、总书记多贺谷真稔。飞鸟田是在他横滨市长的任职期间辞职就任委员长的。在这次社会党大会上，众议院议员榑崎弥之助、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和秦丰退党。他们三人与社会市民联合一起于1978年3月26日组成了社会民主联合。

地方的时代

曾经是60年代“革新势力”政治运动的重要要素——“革新自治体运动”，在70年代也迎来了转机。

三木内阁成立不久，在1975年4月13日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横滨国立大学教授长洲一二辞职参加神奈川县知事竞选，结果受到所有在野党的支持和推荐并得到众多县民的选票而当选。在1979年4月知事竞选后，长洲开始受到从自民党到共产党的所有政党的支持和推荐。长洲以超越原来所谓革新势力范围的广泛支持者为基础，在实务上奉行有信任感的改革性行政，为加强地方自治体的决策能力展开了各种活动。

1977年12月，曾经是革新自治体运动领导人的飞鸟田一雄，辞去横滨市长的职务就任社会党委员长。继任横滨市长的选举于1978年4月16日举行，由受从自民党到社会党的保守、中道、革新的六党(共产党除外)推荐的细乡道一(自治省出身)当选。

1978年7月，在长洲的提议下，第一届“地方的时代”讨论会在横滨召开。“地方的时代”讨论会以后每年由几个地方自治体和其他团体共同举办，讨论各种问题。“地方的时代”成了一句流行语，它敏感地感受到了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新征兆，并预示着面向21世纪的制度上和政策上的课题。

反映经济增长的曲折和家庭成员构成的变化，人口流向也开始发生变化。从70年代后半期起，过去那种人口从地方圈大规模流向三大城市圈的情况呈现出缓和趋势，出现了人口“定居化”的征兆。

随着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已经实现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并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的日本，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扩大，开始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一种要求重新认识政治、行政、财政形式的空气逐渐酿成。1974年末就任首相的三木武夫在施政纲领演说中也讲到：“一个重新认识明治一百年以来的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暗示了转折的时代的基本课题。

1977年11月4日在内阁(福田内阁)通过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三全综)，也是一个包括对新时代探索要素的计划。“三全综”针对高速增长时代已结束、人口流向正在改变和人口老龄化正在发展等情况，以创造协调的生活环境为基本目标，拿出了将着眼点放在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城市上的“定居圈”设想。与1969年的“新全综”以高速交通体系和大规模工业基地开发为支柱的列岛改造计划不同，1977年的“三全综”是把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的面向定居社会的计划，国土计划的基调

有了很大转变。“三全综”依然有由中央政府来帮助形成定居圈地区这一旧有的中央集权行政特色，离真正的分权化、分散化、分级化还很远。它反映出过渡期的特征。尽管如此，反映在政府本身的国土计划的这一变化象征着时代转折的开始。

从财政危机的加剧这一进退维谷的事实来看，重新认识支撑“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和财政也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中央政府的一般会计的赤字一再扩大，但由于增税等追加国民负担的措施在政治上常遭拒绝，因此政府不得不提出行政改革这一难以回避的课题。

但是，要打破“明治一百年”的惯例是不容易的。打破维持了一世纪的中央集权制遇到了顽强抵制。通过战后改革引进的地方自治也在许多地方徒有其表，重新向集权化方向发展。地方自治体对中央的依赖依然很强，补助金行政依然具有很大作用。在以后有关行政改革的讨论中，要求改变这种情况的依然属于少数。预计走向“地方的时代”的现实课题将被继续研究，它将在各种主体的探索和实践得到发展。

在1978年4月的京都府知事选举中，由自民党和新自由俱乐部推荐的候选人当选，结束了28年的“革新府政”。在1979年4月8日统一地方选举的知事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推荐原总评议会议长太田熏为东京都知事候选人，但落选了，当选的是自治省出身的铃木俊一。在大阪府知事选举中，共产党推荐的在任知事也落选。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轴心的“革新自治体”的时代结束了。

从福田到大平

福田首相也与历任首相一样，重视对美外交与对东南亚的

外交。参议院选举后的 1977 年 8 月 7 日,福田首相出席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东盟(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扩大的首脑会议。

在会后发表的日本与东盟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了日本与东盟建立起的密切关系,超越与印度支那半岛(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不同体制谋求和平共处,以及日本将向东盟提供 10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之后,福田访问了东盟各国和缅甸共 6 个国家。

8 月 18 日,福田在访问的最后一站即菲律宾的马尼拉宣布了反映日本的亚洲外交的基本立场的三项原则,这被称为“福田主义”。

(1) 日本决心奉行和平,不成为军事大国。

(2) 日本准备与东盟各国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还在社会、文化等广泛的领域,建立起真正朋友的相互信赖的关系。

(3) 日本作为同等的合作者将对加强东盟及其加盟国之间的联系进行积极合作,并将谋求与印度支那各国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关系。

从东南亚访问回国后,福田提出有必要进行行政改革,并开始听取政府和党内的意见。但是在行政改革问题上遇到党和官僚的强烈抵制,具体实行很困难。

11 月 28 日,福田改组了内阁。福田除任命园田直为外相之外,还为了加强对付贸易摩擦,从国会外起用了原外务次官牛场信彦任新设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务大臣。福田还任命安倍晋太郎为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为经济企划厅长官,河本敏夫为通产大臣。

7 月 16 日至 17 日,福田出席了在西德波恩举行的第 4 届西

方七国首脑会议。会上，日本被强迫规定要实现比上一年度提高1.5%达到7%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国内，由于国际收支的盈余已经出现日元升值的动向，人们估计经常收支的盈余将缩小，而且财政赤字和对公债的依赖比重不断增长，因此有人批评说，在这种状况下实行刺激经济政策是有问题的，5—6%的增长已足够。另一方面，有人预计会有日元升值的紧缩效应，因而主张实行刺激内需政策；还有人认为尽管有财政赤字但从防止失业率上升的意义出发应实行增长速度更高的积极政策。围绕选择经济政策，决策当局内部和在野的专家的意见都大相径庭。

8月8日，园田外相访问了中国，12月在北京签定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据说福田在取代三木就任总理和总裁时向大平说：“我只干一届(两年)”。但到1978年福田开始表示再次当选的意向，福田与大平的对立趋于表面化。经三木提议，在福田执政时自民党总裁选举采用新的方式。首先由全体党员进行预选，得票前两名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正式选举。大平为在预选中获得大量选票而进行了活动。11月1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公开举行，由福田、大平、中曾根、河本四人参加候选。11月26日，大平在预选中名列第一，福田退出了正式选举。12月6日，福田内阁总辞职。由于在干事长人选问题上自民党内发生争执，国会出现了延期对首相进行指名投票的异常事态。7日，大平被指名为首相，同日，大平内阁成立。

大平于1910(明治四十三年)出生于香川县，当年68岁。1936年从东京商科大学(即以后的一桥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战后，在任吉田内阁的池田勇人大藏大臣的秘书官后，于1952年参加大选并当选。1960年，他作为池田内阁成立时的官房长官，

导演了“宽容与忍耐”的池田的谦逊诚恳姿态，确立了以所得倍增论为中心的新的保守政治路线。大平个人虽然据说是个官僚臭气较少的人，但他继吉田、岸、池田、佐藤、福田之后成为官僚出身的首相。六人中竟有三人是大藏省出身这一事实象征着经济官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位。

4. 面向21世纪的探索

第二次石油危机和财政危机

70年代的中速增长路线由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而遭到挫折。一个原因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另一个原因则是财政危机。

大平内阁成立后不久的1978年12月17日，欧佩克决定在1979年分阶段提高石油价格，累计提高14.5%。这就是第二次石油危机。

中东实力雄厚的石油供应国之一伊朗的革命也加剧了原油供应的紧张。1978年12月26日，伊朗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发展成了暴动，石油生产停止，巴列维国王表示了退位离开伊朗的意向。1979年3月27日，欧佩克决定从4月份开始将原油价格提高9.05%。

4月17日，日本银行将法定利率提高0.75%，由原来的3.5%上升为4.25%。就是说由于害怕再次产生因原油价格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心理，日本政府提前采取了紧缩政策。6月28到29日，在东京的赤坂行宫召开了第五次首脑会议，大平首相分别会见了来日本参加会议的卡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等领导人，并主持了会议。大体上在同一个时间的6月26日到2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欧佩克全体成员国会议上决定了包括大幅度提价在内的双轨制新原油价格。在首脑会议上，重新调整了各国

石油进口量的上限。7月24日，日本银行再次将法定利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达到5.25%。

第二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再次受到冲击。日本虽然提前采取了抑制总需求的政策，防止了严重通货膨胀的又一次爆发，但结果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财政危机也是严重制约80年代财政支出，阻碍经济中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政府的一般会计岁入中，虽然1965年的萧条导致了公债的发行，但由于这以后的税收大幅度增长，因此，到1970年度公债依存率仅为4.1%。但石油危机之后，公债依存率开始上升，1974年度为10.6%，1975年度达到24.6%，到扩大公共投资的1977和1978年度时依存率已高达30%以上。显然这样高的公债依存率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为此大平内阁不得不提出了“重建财政”的政策课题。

财政危机是因为在70年代尽管经济和税收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但财政支出却持续膨胀，才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从1971到1980年这10年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8%（新国民经济计算法，按照1975年固定价格统计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60年代平均10%的增长率相比，大体上减少了一半。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也引起了设备投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率仍旧很高，因此，设备投资水平的降低造成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而国内需求不足又成为贸易出超的基本原因。

与财政支出直接相关的名义经济增长率，在高速增长时期的1961到1970年的1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是16.3%（根据旧国民收入统计计算）。其中前5年平均为15.2%，后5年平均为17.4%。这个时期，可以反复地实行一边实施税法上的所得税减税，一边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政策。从1971到1980年这10年

间的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是12.3%（新国民经济算法）。其中前5年平均为15.1%，后5年平均为9.5%。前5年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大，后5年在通货膨胀减弱之后，由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因此，名义增长率跌到了60年代后半期的约一半。然而尽管这种名义收入增长率的下降限制了税收的增长，但财政支出却仍在大幅度地增加。

如果比较一下1970年度和1980年度政府一般会计的主要经费，就可看出岁出决算总额10年间增加了4.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8.2%，远远高于70年代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12.3%的增长率。

岁出中的国债费是支付公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公债的费用。这部分经费随着公债发行累积额的增加而增加。1970年度国债费在决算总额中的比率是3.5%，但到1980年度已达到了12.7%。一般会计扣除国债费后的有效经费规模，1970年度是79007亿日元，1980年度是379134亿日元，10年间增加了3.8倍，年平均增长16.9%。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于60年代高度成长时期的名义经济增长率。

财政危机的原因

日本的财政是一种确保中央政府能够得到更多租税收入，按照各种行政目的进行分配的财政结构。地方自治体的财政由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央政府的补助金和交付金，因此，它受到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限制。

在日本，自明治时代殖产兴业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在助成民间经济活动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又实施了促进经济复兴、自立和增长的政策。同时为了维护保守势力的政治基础，有关农业和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政策也受

到了政府的重视。米价逐年上涨，生产米价与消费米价存在着“倒挂(逆差价)”现象。粮食管理特别会计的赤字由一般会计的支出来弥补。用于产业基础和生活基础建设的公共投资也得到积极地推行。公共投资按人口平均计算地方要比大城市地区投入的量更大。虽然这是为了诱导产业向地方发展并在全国内统一国民生活的基本水平，保障最低国民生活水平，但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保守势力的政治基础。虽然由于社会生活汽车化的发展，使国铁经营急剧恶化，但政府不仅继续坚持国铁的赤字经营路线，而且还在核算前景暗淡的地区建设新的铁路干线。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国铁的赤字和一般财政的补贴。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和税收增长的呆滞则一下暴露了这种将资金分散化的行政决策和财政投资的缺陷。

除此之外，在70年代，为了适应国民要求的发展，政府还逐步增加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其中，在除国债费外的主要经费中，增加最明显的是社会保障关系费。10年增加了6倍。而同期主要经费总额的增长是4.3倍，扣除国债费后实际有效经费的增长是3.8倍，远远低于社会保障关系费的增长。总额中社会保障关系费的比率从14.1%增加到了18.6%。另一方面，防卫费在10年中增加了2.8倍，低于总额的增长幅度。防卫费的比率从1970年的7.2%下降到1980年的5.2%。

在实现60年代的高速增长之后，国民中要求采取稳定国民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措施的呼声高涨起来。这些措施一个是环境保护政策，另一个是充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60年代革新自治体的形成则推动了这些措施的实施。地方自治体顺应居民的意向增加支出，政府则紧追其后。即使保守政权也不能无视国民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要求。历届自民党内阁逐步扩充社会保障制度，并采取了相应的预算措施。在70年代，尽管由

于经济增长出现曲折,使财政的基础发生了问题,但政府仍继续扩大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预算。由于没有从根本上重新认识公共养老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而扩大了这方面的支出,因而,一般会计的负担急剧增加。可以说在没有制定出明确的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和目标的情况下,日本便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因此,当时并没有采取以社会保险费和租税的方式来扩充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财政基础的基本措施。

自民党政权在财政宽裕的60年代没有选择扩大社会保障预算来改善经济体制的政策,没有明确的将经济增长的成果系统地运用于“福利”的政策思想,也缺乏努力确定实现这种政策思想的财政基础。因而,福利预算的增加在没有具备所必需的财源措施的情况下,被带入了70年代。而且60年代政策选择的迟误又使其从70年代被带入了80年代。

除此之外,在1977到1978年度,为了提高增长率采取了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发公债的政策。但当这些措施还没有充分起到促进增长率的作用时,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了。于是经济增长率再次下降,而且由于政府和日本银行为了防止通货膨胀恶化而采取了慎重的对策,因而连名义收入也没有增加。结果税收没有增加,而剩下的仅仅是增发的国债。

不仅一般会计,而且作为财政投资对象的政府有关机关的经营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此外,公共养老金的基金也因为支出多于保险费的收入,出现了潜在的财政危机。所有这些问题都遗留到80年代去解决了。

重建财政和增税问题

重建财政已开始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为此大藏省和政府的税制调查会主张,为了克服财政危机,导入拥有广泛课税

基础的大型间接税是必要的。

这种间接税在西欧被作为附加价值税而得到广泛实施。因此，在西欧的租税收入中，间接税占有很大的比重。日本没有这种租税，所以，直接税尤其是所得税占的比率很高。而且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趋势。一般来说，按照累进税率，直接税的所得税要比间接税更能够起到发挥收入再分配的效果。而且，纳税者也能够意识到纳税的义务。因此，即便从民主主义的观点来看，直接税也被认为是适宜的。但是在现实的征税中，所掌握到的每个人的收入情况是不准确的，因此，所得税就其公平性而言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财政当局估计进一步加重所得税的负担是不妥当的，因此，提出了通过导入一般消费税这种形式的间接税来增加税收，同时改变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比率的方案。

大平首相接受了大藏省和税制调查会的意见，并提出通过导入一般消费税来实现重建财政的目标的建议。作为一个理应关注国民投票的政治家来说，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大胆和率直的提案。但是使国民接受导入新税是困难的。因为不仅行政财政的现状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国民对租税制度和征税的实际现状也非常不满。因此，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大型新税就无法得到承认的意见十分强烈。中小零星企业和农业等申报纳税者出于更加直接的原因而反对导入新税。这些申报纳税者同被征收所得税的薪金生活者相比，税务当局所掌握到的收入是不充分的，因此，显然现行的税制对他们是有利的。但是一旦导入一般消费税，那么税务当局就能够比以前更加准确地掌握进货和销售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强烈地反对导入一般消费税。

仅仅将重建财政的问题作为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来提出，也是大平提案在政治上的弱点。政府应该从今后长期展望的角

度，提出将要干什么或必须干什么，作为它的一个环节来表明解决财政问题的方策。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明治一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时代将要结束。因此，它要求行政和财政需要具有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姿态。不仅是财政收支的平衡，而且必须将确立有效公正的行政、财政和税制作为课题。

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在保守传统的政治作风下是很难做到的。大平就任首相以后，非常关心在长期展望的基础上日本发展方向的选择，采取了集中许多专家，依靠多方面的政策研究的独特对策。但是，即使是大平也没有将财政问题同日本未来有关的更加重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大平担心财政危机的激化，开始诉诸作为恢复收支平衡一般方法的增税。

1977年9月，为了取得国民的信任，大平下决心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当时，大平发表讲话，提出了在1984年前实现解决赤字公债的目标，因此，他认为在努力节减经费的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还将导入新税。但实际上，当大选的活动一开始即出现了就连自民党的候选人也公然反对一般消费税的情况。显然大平路线是不受欢迎的。

大平首相去世

1979年10月7日的大选，自民党受挫。不仅导入新税的提案不受欢迎，而且投票的当日，由于台风临近而天气极其恶劣，从而使自民党本来很容易动员的流动选民难以出门参加选举。此外这一年4月进行的统一地方选举和自民党系统的地方议员竞选不积极，也是造成选举受挫的原因。选举结果，自民党获得248个议席，比1976年12月的大选（三木内阁）又减少了一个席位。但是社会党也受挫，减少了16个席位，变成107席。共产

党挽回了上一次的不利形势，增加了 24 个议席，共获得 41 席。新自由俱乐部减少 13 个议席获得 4 席。在整个 70 年代，大选结果变化剧烈，政治形势扑朔迷离。在中选举区制下，微小的选票差都会使各党派的议席增加或减少，因而这也是造成选举结果不稳定的原因。

面对大选结果，自民党内出现了要求大平辞职的动向。反大平势力集结在福田赳夫周围，与大平派进行了持续 40 天的党内抗争。11月 6 日，自民党在分裂为大平和福田两派的情况下，进行了首相提名。众议院第一次投票结果大平获得 135 票，福田获得 125 票（以下的得票名次是飞鸟田、竹入、宫本、佐佐木等各党派的首脑）。在决胜投票中，大平当选为首相。

组阁的人事问题也遇到了麻烦。11月 7 日，第二届大平内阁成立，外相起用了来自国会外的大来佐武郎，其他内阁成员的名额则在包括投票支持福田的势力在内的党内各派中分摊。

11月 4 日，发生了美国驻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被革命派学生占领，大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的事件。

12月 27 日，苏军入侵阿富汗。理由是支援马克思主义派的政权。美苏关系趋于紧张。许多国家抵制了 1980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日本也参加了抵制。美国自越南战争失败以来，重新调整了它的全球战略，采取了抑制军备扩张的姿态。但是苏联却继续增强军备，同古巴合作参与非洲各新兴国家的内战。现在又侵入阿富汗。在这种形势下，大约在 10 个月后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主张“强大的美国”的共和党的里根当选。里根的上台使美苏之间的对抗升级。美国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量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

虽然自民党的党内斗争进一步发展，但日本的在野党却无法对政局产生任何影响，在野党痛感自己的软弱无力，于是，为

了打开局面再一次试图组成联合政权。1979年12月16日，公明党和民社党首先在建立中庸联合政权的构想上达成了协议。1980年1月10日，社会党和公明党也一致同意建立联合政权的构想。而共产党则被明确写明排除在外。因此，通过公明党的媒介，社会党与民社党都愿意参加松散的联合。

在国会上，国际电信电话公司经理（前邮政官员）的经营管理混乱和将公司业务费私吞事件，以及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指使因洛克希德事件受到起诉的小佐野贤治掩盖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博损失事件等，播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自1980年4月末到5月初，大平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9月1日，大平在华盛顿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卡特要求日本增强防卫力量，并希望日本限制汽车等产品的对美出口。9月4日，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逝世，大平出席了葬礼仪式。

9月16日，社会党和公明党对大平内阁的不信任案，由于民社党的赞同和部分自民党议员的缺席而获得通过。结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再次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

大选决定于6月22日和参议院选举同时进行。但当竞选正处在高潮时，大平首相突然因心脏病发作，在6月12日去世。于是由官房长官伊东正义就任临时代理首相。6月22日到23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第六次首脑会议，决定由外相大来佐武郎代表首相出席。

自民党大胜

1980年6月22日的参众两院同时选举，以自民党的大胜而告终。在众议院中，自民党增加了36个席位，获得284席，从而恢复了稳定多数。社会党与解散前相同，获得107席。公明党减少了25个席位，获得33席。共产党减少了12个席位获得29

席。结果在野党在上次选举略有进展之后又再次受挫，未能显示出使政局发生大转变的力量。社会党虽然多少已开始认识到联合政权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党内，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们仍拥有很大的力量，在国民中，并不存在希望将政权委托给社会党的社会舆论的可能性。结果，随着参众两院同时选举的结束，自1979年底以来在野党之间的有关联合政权的议论便烟消云散。

参议院地方选区的定员数较少，因而，在野党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和有效的。但是众议院各选区的定员数较多，各党纷纷推选自己的候选人进行竞争。同时选举不仅使在野党在参院选举中必须建立的相互合作变得困难，而且它对一举动员自民党地方议员的支持者是十分有利的。此外，对大平突然去世的同情票也造成了自民党的大胜。

7月15日，自民党两院议员全体会议推选铃木善幸为新总裁。7月17日，国会进行了首相提名和组成新内阁的会议。伊东正义和中曾根康弘分别就任外相和行政管理厅长官。

铃木于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出生于岩手县，就任总裁时年69岁。他自农林省水产讲习所毕业后，曾在渔业团体工作。在战后1947年的大选中，因社会党一致同意而当选为候选人，但是自那以后，他由民主自由党转入了自民党。作为大平派的一名干部，铃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温厚诚实的调和者，但却不是一个公认的首相候选人。他是自佐藤之后作为首相候选人的田中、三木、福田和大平都担任过首相后，作为党内的一种暂时的调和而被选为首相的。

铃木内阁最大的承诺是“行政财政改革”。由于大平的一般消费税提案不受欢迎，因此，“不增税重建财政”便被作为基本的课题。

以前首相田中角荣为首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卷进了洛克希德

事件,加深了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田中利用政治地位,从地方上获得大量补助金,然后用这些补助金来巩固选举地盘,筹措政治资金的事实也增强了对政治和行政状况的批评。由于既暴露了许多诸如国际电信电话公司事件那样的与行政权利纠缠在一起的不幸事件,又发生了包括医生在内的各种纳税上的违法事件,同时揭露政府补助金的不合理和浪费的新闻报道也显著增加,因此,如果不端正政治和行政上的形象,就不可能提增税的问题。这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舆论。

1980年10月24日,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制定了设立临时行政调查会的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11月21日,该法案经国会表决通过。1981年3月16日,政府任命了临时行政调查会的9名委员,财界人士土光敏夫被推选为会长。

1981年5月,铃木首相一行访问美国,同1月就任总统一个月的里根进行了会谈。在此之前,美日间举行了有关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问题的谈判。5月1日,日本决定将1981年度对美国出口的轿车自动限制在一年168万辆的数量上。

5月8日发表的日美首脑共同声明强调了坚持两国的同盟关系。美国方面解释说,根据安保条约,“同盟关系”将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对此,日本外务省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铃木首相却解释共同声明的“同盟关系”不带有军事色彩,并指出在制定共同声明的过程中,他本人的意向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此,伊东辞去了外相的职务。

在同一个时间里,报纸报道了前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关于“日美两国政府间口头上已达成了同意美国核舰艇停靠日本港口和通过日本领海的谅解”的讲话(5月18日《每日新闻》)。于是围绕日美军事同盟问题,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新的争论。

田中角荣因金权政治和金钱的来源问题而辞去了首相的职

务,并且洛克希德案件也还在审理过程中,但田中派仍是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铃木和大平一样,如果失去田中派的合作,就无法执掌政权。这一事实已成为在野党和宣传机构攻击自民党金权政治的材料。

走向21世纪的课题

1982年6月,经济审议会设立的长期展望委员会(委员长大来佐武郎)发表了题为《二〇〇〇年的日本》的报告书。

报告书研究了21世纪初日本将面临的国内外各种条件和经济社会方面的各种问题,提出了下列3个课题并论述了日本的基本战略。

第一,“经济社会的国际化”和“全球范围问题”的对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日本自身经济社会的国际化,国际社会将越来越强烈要求日本向开放体制转变,并承担起国际性的义务。因此采取积极的对策来适应这种形势已成为今后日本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这一观点,报告书提出了下列对策:参加促使世界经济重新活跃化和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国际合作;通过积极的产业调整和经济合作支援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日本向更开放的社会发展,促进人员的交流;采取针对南北问题、粮食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全球范围问题的对策;努力维护国际和平环境,寻求和平利用资源的途径,等等。

第二,防止“人口老龄化”,努力“实现居住条件优良的社会”。

由于人口老龄化将急速发展,为了应付这种新的情况,必须整备社会保障制度,并调整其负担和支付,增加老年人就业和社会活动的机会。报告书阐明必须将建立一个充分关心残疾人和

老年人,使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得到保障,居住条件良好的社会作为课题。

的确,人口老龄化的倾向已经开始出现。根据国势调查,1920年(大正九年)日本的总人口为5596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为294万,占总人口的5.3%。日美开战前不久的1940年,日本的总人口为7308万,65岁以上人口为345万,占总人口的4.7%。以后这个比率逐步上升,1970年为7.1%,1980年已达到9%。1980年,65岁以上的人口为1057万,第一次超过了1000万。这种高龄化趋势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出生率下降,儿童的数量减少,青年层的人口渐趋缩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延长了国民的平均寿命,使老年人口稳步增加。估计日本从20世纪最后的20年到21世纪最初的20年间,将以其他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速度向老龄化社会发展。为此《二〇〇〇年的日本》认为应付这种形势已成为一个十分紧迫的课题。

第三,边实现经济社会的“成熟化”,边继续保持“解决问题能力的活力”。

日本正在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向“成熟的阶段”过渡;从谋求提高收入和要求物质上满足的时代转向在多种价值观的基础上,重视宽裕与和谐的生活的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促进社会成熟化的重要原因。但同时,这种成熟化也会引起社会发展的停滞。因此,《二〇〇〇年的日本》强调必须开发创造性的技术,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建立创造性的社会体制和整备保护企业竞争的社会环境,以及重新认识日本的经营雇佣惯例和中小企业的作。

中曾根内阁

1982年10月12日，铃木首相宣布辞职。11月27日，中曾根康弘内阁成立。中曾根和铃木一样，如果没有田中派的合作就无法执掌政权。因此，在野党又将对“金权政治”的批判转向了中曾根。

中曾根于1918年（大正七年）出生于群馬县，就任首相时64岁。自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内务省。战时曾担任海军会计官。战后，在警视厅任职，1947年的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中曾根经过民主党和改进党转入自民党，属河野一郎派。自岸信介内阁以来，中曾根曾历任过内阁大臣和党的负责人。三木内阁时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在洛克希德事件中，因与右翼儿玉誉士夫过从甚密而受到怀疑。

中曾根主张“战后保守政治总决算”。1983年1月11日到12日，中曾根访问了南朝鲜，同全斗焕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就日本和南朝鲜的经济合作问题达成了协议。1月17日到21日，中曾根访问美国同里根举行了会谈。中曾根同意日本将加强防卫力量，承担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责任。在访美过程中会见记者时，中曾根发表了“日本列岛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一旦发生事情，日本将封锁三个海峡”的讲话，从而引起了日本国民的震惊。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坚持和美国同盟，实现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如果重新使用“同盟”这个字眼，就会动摇国内舆论和国内政治，发生实际上否认首相亲自签字的声明和外相辞职的事件。

战后初期的政治领导家吉田茂，一面结成与美国的同盟，一面又限制同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将经济的复兴和自立放在优先地位。企图修改吉田路线的鸠山和岸信介的民族主义政策由于被看作是促进重整军备和强化军事同盟的路线而遭到了国

民的强烈反对。池田内阁以后，吉田派的经济优先政策作为保守政治的基本路线得到了恢复并被固定下来。但尽管如此日美同盟的军事因素仍继续存在。不正视这个事实，主张视而不见是不可能建立起对日本外交的有效议论的。是否赞成军事同盟暂且不谈，即便从政治、经济、产业和文化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重视日美关系都无疑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因为如果没有同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的合作，日本就无法捍卫“战后”所取得的成果。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明确这种认识之后，还必须考虑今后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必须明确是赞同里根的强大路线，朝着为加强美国的立场，在军事上承担更重要的责任的方向发展呢，还是优先考虑同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阵营的合作的同时，朝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日美同盟中的军事因素而追求独立的和平战略的方向发展。

确立日本独立的和平战略，依靠复活民族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冷静地总结战前战后日本人的历史经验，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来考察针对人类历史上各种问题所应采取的对策才是可行的。这不是回到民族主义，相反却是有意识地克服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军部和“革新派”官僚通过激发日本国民的民族意识，加强民族扩张主义，力求取得对亚洲的统治地位。他们无视朝鲜、中国等邻国的民族主义，过于低估了“美国世纪”到来的意义。这种扩张性的民族主义使日本在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和对外战略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战后大多数日本人，无论是政治家、官僚，还是一般国民，又都放弃了坚持独立判断世界形势和掌握对外战略的立场，而是跟着形势的变化亦步亦趋。战后的日本历史完全是努力适应“美国世纪”的历史。

在 50 年代，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攻击吉田的“对美从属”

路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民族主义虽然具有一时的政治号召力，却并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力量。相反，它却使问题搞模糊了。因此，无论是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路线还是鸠山、岸信介的“自主国民外交”，在战后的历史中都留下了失败的记录。

作为一个青年政治家，中曾根首相从批判吉田路线的时代起，就以一贯坚持民族主义而闻名。中曾根用“战后保守政治总决算”这句话来表明了他的政治抱负。但是民族主义对于建立80年代以后的日本外交战略也不是有效的。事实上，倒不如说，中曾根内阁是不得不采取与美国的对苏对抗型全球战略紧密合作的姿态。

日本承担与经济大国相称的责任，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日本的和平外交战略中必须反映以战前和战后的经验为基础的理念。的确，战后日本的历届内阁都提出了“和平主义”和“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外交思想，但是作为执政党的保守政党却轻视本应作为这些思想基础的1946年宪法的意义，并一再提出要修改这个宪法。这种态度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对日本外交的不信任和怀疑。不过，日本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体，亲自体验过自己招致的惨祸并成为核武器最早的牺牲品。由于战后选择了军事小国的路线，因而，实现了经济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对于这样的“战后”日本来说，重新评价1946年宪法的积极意义也许是一个必要的课题。

地球的课题

1983年3月14日，欧佩克在伦敦召开的临时大会上决定降低石油价格。标准石油(阿拉伯轻油)每桶减价5美元，降为29美元(降幅为14.7%)。这次降价是因为石油危机引起的萧条和节省能源带来的对石油需求的停滞，使继续维持高油价已成为

不可能。这样，对石油价格无限制提高的不安情绪开始消除，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3月15日，铃木内阁时期成立的临时行政调查会解散。临时行政调查会在3年期间共提出了5份咨询报告。其中“基本咨询”报告(第三次咨询，1982年7月30日)表示今后日本的行政所要实现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有活力的福利社会”和“对国际社会作出积极贡献”。临时行政调查会的咨询文件十分庞大，涉及到行政的合理化、效率化财政支出的削减，以及国铁和电电公司等公共企业的分割民营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合理化、效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它的实施估计将会遇到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对。行政改革延误，重建财政前景渺茫，也看不到积极研究面向21世纪的各种课题的可能性。日本产业的实力虽然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政治上却没有有效地选择将这种实力充分运用于国内外的措施。

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虽然具有同30年代危机相同的规模，通货膨胀猛烈发展，失业急剧增加，但发达国家却避免了恐慌和动乱。“战后”的混合经济体制经受住了考验并生存下来。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上的努力发挥了防止因人们的绝望行动使危机加剧的作用。30年代是一个经济恐慌、政治危机、集权主义、独裁、侵略战争和集团化的时代，但是70年代却阻止了由于信用崩溃而引起的一连串破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继续受到普遍的信任。人们已从过去的深刻体验中获得了无论是对左的还是右的集权主义的免疫力。即使不是全部，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必须得到维护。虽然国际货币基金体制崩溃，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作用也已减弱，但各国仍在努力加强国际合作。虽然经济摩擦的加剧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不可避免，但恢复闭关锁国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然而发达国家之间潜在力量的差距已日渐明显。日本显示出了超群的适应能力,而美国和西欧则暴露出了混乱。“美国世纪”虽已越过了顶峰,但并未结束。走向“下个世纪”的长期调整和摸索已经开始。领导 20 世纪产业文明的美国仍未丧失它的活力。美国产业恢复活力和再产业化的热情十分旺盛。里根政权依靠强有力的抑制政策,成功地克服了通货膨胀。1983年以后,经济繁荣恢复政策使美国经济再次出现了较高的增长。它是受惠于原油价格疲软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标志着世界经济迈出了恢复的第一步。

“南北问题”也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分化为资源国和非资源国,并且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业的发展,取得了新兴工业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仍未摆脱低开发状态而面临饥饿的国家。

“东方”和“西方”界线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石油危机也给共产主义各国带来了打击。80年代,波兰要求工会独立的伟大的民主斗争虽然因苏联的胁迫和保守派的压制政策而受到挫折,但波兰已背上了来自西方的巨额债务。中国为了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正开始认真地探索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调整,并努力促进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虽然东西方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是使地球数次毁灭的核弹头的数量仍在增加,而且电子技术的应用提高了导弹的精确度,因此,反而使核战争的危险增大。电子学和生物工程学等虽然有可能成为抑制现代文明造成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都市巨大化和环境污染趋势的有效技术手段,但同时也产生了对人和人性的新威胁。当前的开发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展开,尚未显示出有意识地控制整个技术发展方向的动向。

各发达国家将自由和民主主义作为制度来保护,但缺乏有

效地发挥其机能的充分保证。政治家们拘泥于调整细小的利害关系，而难以提出长期的战略和选择。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已不再是作为神话或意识形态加以朴素地颂扬、拥护或鼓吹的对象。而是必须考虑站在人们觉醒和理解的基础上，如何使其发挥作用。

然而，即使是这种不完善的自由和民主主义，在地球上也并未充分普及。在世界人口中拥有政治自由的人依然是少数。在许多国家中，限制言论、禁止自由的政治活动，甚至弹压、拷问、枪杀、制造内乱和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已成为惯用的伎俩。而且在发达国家内，也早已在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的深处显露出了颓废和解体的征兆。

尽管存在着防止核战争和实现裁军、保护环境和资源、控制人口和防止饥饿这种全球范围的重大问题，但是却看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的国际合作。虽然问题已从各个方面被提了出来，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组织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仍然很微弱。因此，对于20世纪后半叶在经济方面已基本取得“成功”的日本国民来说，21世纪，不是考虑如何去适应外部世界的环境的时代，而是要更多地考虑为了创造出人类理想的世界，如何去行动的时代。

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年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931年 4月 (昭和 9月 六年)	若槻礼次郎内阁(第二届)成立。 关东军在柳条沟附近炸毁“满铁”,先后 占领“奉天”、抚顺、吉林等地(爆发 满洲事变)。中国向国际联盟起诉。 10月 关东军轰炸锦州。 12月 犬养毅内阁成立。 重新禁止黄金出口(停止金本位制)。	4月	西班牙发生共和革命。
1932年 1月 (昭和 3月 七年)	第一次上海战事(1—3月) 宣告建立“满洲国”。 血盟团暗杀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 5月 五一五事件(犬养首相被杀)。 斋藤实内阁成立。 共产国际发表32年纲领。	7月	在德国大选中,纳粹党 成为第一大党。
1933年 2月 (昭和 3月 八年)	小林多喜二在东京的筑地警察署被特 高警察杀害。 3月 国际联盟通过对日劝告案。日本退出 国际联盟。 三陆地区发生大地震和大海啸(死亡 1535人)。 5月 实施外国汇兑管理法。 鸠山一郎文相发布命令,开除京都帝 大教授滝川幸辰(滝川事件)。 11月 实施大米统制法。	11月	福兰克林·罗斯福当选 为美国总统。
1933年 2月 (昭和 3月 八年)	小林多喜二在东京的筑地警察署被特 高警察杀害。 3月 国际联盟通过对日劝告案。日本退出 国际联盟。 三陆地区发生大地震和大海啸(死亡 1535人)。 5月 实施外国汇兑管理法。 鸠山一郎文相发布命令,开除京都帝 大教授滝川幸辰(滝川事件)。 11月 实施大米统制法。	1月 3月	希特勒就任德国元首。 美国开始推行新政。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934年 (昭和九年)	1月 日本制铁股份公司成立(制铁大合并)。 4月 三菱造船改名为三菱重工业(6月和三菱航空合并)。 7月 实施石油业法(附有储油的义务)。冈田启介内阁成立。 9月 室户遭受台风,关西地方受害(死亡、不明去向者3036人)。	10月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长征。
1935年 (昭和十年)	3月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遭到镇压破坏。“国体明征”决议(攻击天皇机关说)。 5月 战前最后一次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6200人参加)。 6月 梅津一何应钦协定(国民党直系部队从河北省撤退)。 8月 吉川英治“官本武藏”开始连载(《朝日新闻》)。	1月 10月	苏联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开始大规模清洗运动)。 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
1936年 (昭和十一年)	2月 二二六事件(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1400人叛乱,杀害了斋藤实内大臣、高桥是清藏相等人)。 3月 广田弘毅内阁成立。 8月 在柏林召开奥林匹克运动会(决定1940年在东京召开,可是日本于1938年回绝)。 11月 日德防共协议签署。	6月 7月	法国成立了人民战线内阁。 西班牙的佛朗哥发动叛乱(导致全面内战)。
1937年 (昭和十二年)	2月 林銑十郎内阁成立。 6月 近卫文麿内阁(第一届)成立。 7月 芦沟桥事件(“支那事件”=日中战争开始)。 11月 意大利参加日德防共协议。 12月 日本军占领南京。大量残杀、逮捕屠	4月	德国空军轰炸西班牙的盖尼卡。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民,成为国际性问题。 检举山川均等劳农派(第一次人民战线事件)。	
1938年 1月 (昭和 4月 十三 年) 7月	开始实施物资动员计划。 公布国家总动员法(一部分从5月开始实施)。 电力实行国家管理。(1939年4月成立日本发送电公司) 张鼓峰事件(日苏两军冲突)。	3月 德国吞并奥地利。 9月 慕尼黑协定(英、德、法、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割让给德国)。
1939年 1月 (昭和 2月 十四 年) 4月 5月 7月 8月	平沼骥一郎内阁成立。 内阁决定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政策。 公布大米供应统配法。 诺蒙坎事件(日军和苏联、蒙古军队发生冲突,惨遭失败。9月签署停战协议)。 公布国民征兵令。 因德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平沼内阁辞职。阿部信行内阁成立。	3月 西班牙叛军占领马德里。 8月 德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9月 德国进攻波兰。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1940年 1月 (昭和 7月 十五 年) 9月 10月 11月	米内光政内阁成立。 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推行包括行使武力在内的南进政策。 日本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同德意两国缔结军事同盟。 大政翼赞会成立。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	5月 德国进攻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 7月 法国投降。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941年 4月 (昭和 7月 十六 年)	日苏签署中立条约。 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日本军进驻法 属印度支那南部。 美国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 10月 东条英机内阁成立。 12月 对美、英、荷开战(偷袭夏威夷、菲律 宾、马来亚。大东亚战争=太平洋 战争开始)。	6月 德国进攻苏联。 8月 发表大西洋宪章。 12月 德意两国对美宣战。
1942年 2月 (昭和 4月 十七 年)	日军占领新加坡。 美国轰炸机开始空袭东京。 6月 中途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遭受重大 打击)。 8月 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反击开 始)。	1月 盟国宣言。
1943年 2月 (昭和 4月 十八 年)	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战死。 5月 在阿留申群岛阿图岛的日军被全部歼 灭。 6月 修改府县制一市町村制(中央集权 化)。 7月 实施东京都制。修改国民征兵令。 11月 设立军需省、运输通信省、农商务省。 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日本统治地 区的亲日派势力集会。 12月 第一批学生兵入伍(学生出征)。	1月 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 降。 9月 意大利投降。 11月 第一次开罗会谈(美英 中首脑)。 德黑兰会谈(美英苏首 脑)。 12月 发表开罗宣言。举行第 二次开罗会谈。
1944年 7月 (昭和 十九 年)	英帕尔战役失败。塞班岛的日军被全 歼,很多平民成为牺牲品。东条内 阁总辞职。小矶国昭内阁成立(米 内光政进入内阁)。 10月 美军登陆菲律宾群岛的莱特岛。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1月	B29开始空袭东京（从此之后，正式轰炸日本本土）。	
1945年 2月 (昭和二十一年)	近卫文麿独自上奏，说明必须早日结束战争。	2月 雅尔塔会谈（美英苏首脑）。
3月	小笠原群岛硫黄岛上的日军全部被歼。东京遭受大轰炸（以后，主要城市也被彻底毁坏）。	5月 德国投降。
4月	美军登陆冲绳本岛。 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米内留任，外相为东乡茂德）。	6月 签署联合国宪章。
6月	苏联通告，日苏中立条约不延长。 全歼冲绳岛上的日军，很多平民也成为牺牲品。	7月 发表波茨坦公告。
7月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请苏联斡旋和平（苏联拒绝）。	10月 联合国正式成立。
8月	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苏联对日参战。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久迩宫稔彦内阁成立。占领日本开始。	12月 布雷顿森林协定生效（设立国际货币基金）。
9月	签署投降书。盟军总司令部进驻东京。	
10月	币原喜重郎内阁成立。废除治安维持法，释放政治犯。	
11月	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等成立。	
12月	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大会。 公布工会法（1946年3月实施）。 公布修改土地调整法（1946年2月实施，第一次土地改革）。	
1946年 1月 (昭和二十一年)	盟军总司令部命令褫夺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	
2月	实施金融紧急措施法（冻结存款，发行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p>新日元)。</p> <p>3月 公布物价统制令(实施三三物价体制)。政府发表宪法修改草案纲要。</p> <p>4月 战后第一次大选(第二十二次,妇女首次参加)。</p> <p>5月 战后第一个五一节。东京发生粮食五一节示威游行。麦克阿瑟声明“暴民不准进行示威游行”。吉田茂内阁(第一届)成立。</p> <p>8月 创立了总同盟、产别会议。</p> <p>10月 产别会议举行“十月斗争”。</p> <p>11月 公布日本国宪法。</p> <p>12月 内阁决定实施以煤炭、钢铁为重点的倾斜生产方式。</p>	<p>3月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讲中谈到“铁幕”。</p> <p>9月 美国开始研究对日媾和(国务院成立波顿小组)。</p>
1947年 (昭和二十二年)	<p>1月 麦克阿瑟下令政府机关和公共机关停止二一大罢工。</p> <p>3月 公布教育基本法。</p> <p>4月 实施六三制义务教育。公布禁止垄断法。公布地方自治法。参议院举行第一次议员选举。举行第二十三次大选(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p> <p>5月 实施日本国宪法。</p> <p>6月 片山内阁成立(社会、民主、国民协同党联合)。</p> <p>7月 盟军总司令部下令解散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p> <p>12月 公布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公布煤炭行业临时管理法(煤炭国家管理)。</p>	<p>3月 发表杜鲁门主义(援助自由世界)。</p> <p>6月 公布马歇尔计划。</p> <p>10月 设置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p> <p>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p>
1948年 (昭和二十三年)	<p>1月 美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作了有关对日政策的演讲,提出了让日本成为自由阵营中的一员的复兴方针。</p>	<p>2月 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发动军事政变。</p> <p>4月 开始封锁柏林。</p>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2月	开始指定集中排除对象。	
3月	芦田阁成立（民主、社会、国民协同党联合）。	6月 全面封锁柏林。西方各国开始大空运。
9月	开始揭露昭和电工事件。	8月 大韩民国成立。
10月	芦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	9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
11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12月东条等7人执行绞刑）。	
12月	解散国会。盟军总司令部发表经济安定九原则。	
1949年 (昭和二十四年)	1月 第二十四次大选（吉田的民自党获得过半数）。	4月 西方十二国，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2月 道奇公使来日。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	5月 柏林封锁解除。
	3月 提出道奇方针。	9月 美国宣布苏联拥有原子弹。
	4月 公布实施团体等限制令。实施1美元=360日元的单一汇率。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西德）。
	7月 发布裁减国铁人员。下山事件（国铁总裁下山定则去向不明，发现被车轧死）。盟军总司令部允许太平洋岸制油所重新开工。三鹰事件（无人驾驶的电车突然冲出车站撞死6人）。	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东德）。
	8月 松川事件（东北本线发生旅客列车颠覆事件，3人死亡）。发表夏普劝告（第一次）。	
	12月 公布外汇及外贸管理法。	
1950年 (昭和二十五年)	1月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批评日本共产党。和平问题谈话会发表媾和声明。	1月 英国承认新中国。印度共和国成立。
	3月 结成自由党（吉田的民自党与民主党合并）。	6月 北朝鲜军队开始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
	5月 公布国土综合计划法	9月 联合国军队在仁川登陆。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6月	参议院举行第二次议员选举。麦克阿瑟下令褫夺 240 名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公职。杜勒斯特使为媾和问题来日。	10月 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队退却。
7月	麦克阿瑟下令组建警察预备队（开始重整军备）。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成立。	
1951年 2月 (昭和二十六年)	日本出口银行开业(1952年4月改名为进出口银行)。	3月 伊朗国民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5月开始接管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
4月	麦克阿瑟被解职，离日。	7月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
5月	日本开发银行开业。电力事业改组（形成九家电力公司体制）。	8月 美菲签署防务条约。
9月	在旧金山签署对日和平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9月 签署澳新美防务条约。
10月	共产党在第五次全国协议会上通过了新纲领。社会党大会围绕两条约分裂成左右两派。	
11月	日教组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研究大会（教研集会）。	
1952年 1月 (昭和二十七年)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事件（英国劳伦斯著，1950年4月日本翻译出版后在日本成为畅销书。译者与出版社负责人以出版淫书罪被起诉。日本文艺界对此不服，提出抗议——译注） 一审作有罪判决。	2月 英国宣布拥有原子弹。
3月	公布企业合理化促进法。	
4月	日本飞机木星号在大岛坠毁（37人死亡）。反对建立破坏活动防止法案的罢工开始（到6月为止掀起3次高潮）。旧金山两条约生效。和台湾“国民政府”签署和平条约。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2月	<p>血染五一节示威游行事件。</p> <p>高良富等人签署第一份日中贸易协定。</p> <p>公布防止破坏活动法。</p> <p>电电公社成立。加入IMF (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众议院被“突然袭击解散”。</p> <p>电产开始举行停电罢工(12月结束)。</p> <p>第二十五次大选。警察预备队改名为“安保队”。炭劳开始举行罢工(12月采取紧急调整权而结束)。第四届吉田内阁成立。</p> <p>内阁决定把内滩作为美军演习场使用。</p>	7月 埃及, 由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将军团发动军事政变。
1953年 (昭和二十八年) 3月 4月 5月 6月 8月 10月	<p>通过对内阁不信任案, 众议院解散 (“混蛋解散”)。</p> <p>第二十六次大选。参议员举行第三次议员选举。</p> <p>第五届吉田内阁成立。日产汽车发生大规模劳资纠纷(9月结束)。</p> <p>反对美国接收内滩静坐示威, 和警察发生冲突。美军射击场开始使用。</p> <p>公布罢工限制法。三井矿山开展反对裁减人员的斗争(11月结束)。</p> <p>池田一罗伯逊会谈, 共同声明要逐渐加强防卫力量。</p>	<p>3月 斯大林去世。</p> <p>7月 签署朝鲜停战协定。</p> <p>9月 赫鲁晓夫就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p>
1954年 (昭和二十九年) 3月	<p>美国在比基尼海域进行核试验, 第五福龙丸遭殃。日美政府签署MSA (相互安全保障)条约。为反对教育两法案(确保教育政治上的中立和禁止教员的政治活动), 日教组发起了全面斗争。</p>	4月 日内瓦会议开幕。中国和印度同意和平五原则。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4月	在造船贪污案件中犬养健法相行使指挥权, 阻止逮捕自由党干事长佐藤荣作。全劳会议成立。	5月 莫边府陷落。
6月	公布教育两法。近江绢丝开始发生劳资争议(人权罢工9月结束)。 公布修改警察法(国家地方警察和自治体警察统一为都道府县警察)。	7月 签署日内瓦协议(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
7月	创立防卫厅和自卫队。日钢室兰发生劳资纠纷, 公司封闭工厂。	9月 签署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
8月	成立禁止原子弹签名运动全国协议会。	
9月	比基尼海域受害者久保山爱吉死亡。青函渡轮洞爷丸翻船(死亡与下落不明者1155人)。	
11月	与缅甸签署和平条约和赔偿、经济合作协定。日本民主党成立(总裁鸠山一郎、干事长岸信介)。	
12月	吉田内阁总辞职。鸠山内阁(第一届)成立。	
1955年 (昭和三十一年)	1月 日苏开始谈判。 春季提高工资联合斗争誓师大会(斗争方式的开端)。 2月 日本生产性本部成立。 第二十七届大选革新势力获得三分之一以上的议席。 3月 第二届鸠山内阁成立。 7月 日本共产党第六届全国协商会议召开, 自我批判极左方针。经济企划厅成立。 总评第六届大会召开, 选举岩井章担任事务局长。 8月 第一届禁止原子弹爆炸世界大会召开。	4月 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通过和平十项原则)。 5月 联邦德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签订。 美英法苏在奥地利国家条约上签字。 7月 美英法苏在日内瓦举行四国首脑会议。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9月	为扩大立川基地开始强行测量(工人、学生与警队发生冲突)。		
10月	社会党统一大会召开。		
11月	自由民主党组成(保守党合并)。 第三届鸠山内阁成立。内阁会议通过经济自立五年计划。		
1956年 (昭和三十一年)	3月 政府向国会提出新教育委员会法案、教科书法案和小选区法案(教科书法案和小选区法案审议未了)。	2月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发表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演说)。
7月	第四届参议院议员选举,革新势力获得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 《经济白皮书》说明“已不是战后”。	4月	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解散。
9月	全国中立工会联络会议(中立劳联)成立。	6月	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反政府的暴动。
10月	签订日苏恢复外交关系的共同宣言(12月生效)。	10月	匈牙利发生骚乱(苏军出动镇压)。
12月	加入联合国。石桥湛山内阁成立。人民党赖长龟次郎当选为那霸市长。		英法军进攻苏伊士。
1957年 (昭和三十三年)	1月 美军士兵杰拉德在群马县相马原射击场枪杀一农妇。	3月	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签订(1958年1月开始工作)。
2月	佐贺县教员工会开始反对削减定员的休假斗争。 石桥首相因病辞职。岸信介内阁成立。	10月	苏联首次发射人造卫星。
5月	岸信介首相访问东南亚六国。	11月	六十四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6月	岸信介和艾森豪威尔会谈,强调“日美新时代”。		
10月	爱媛县教委通知实施教员工作评定。		
11月	岸信介首相访问东南亚九国(-12月)。		
12月	文部省实行小学初中首席教员组织制度化。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p>警队出动平息爱媛县教员工会反对工作评定的斗争。</p> <p>内阁会议通过新长期经济计划（以经济增长为目标）。</p>	
<p>1958年 1月 (昭和 三十三 年)</p> <p>2月</p> <p>3月</p> <p>5月</p> <p>6月</p> <p>7月</p> <p>9月</p> <p>10月</p> <p>12月</p>	<p>和印度尼西亚签订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p> <p>和印度签定通商协定（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p> <p>在长崎发生中国国旗事件（中国通知停止贸易洽谈，取消合同）。</p> <p>第二十八届大选。</p> <p>千叶县约7000渔民抗议排放废水，闯入本州造纸江户川工厂，与警队发生冲突（100多人负伤）。</p> <p>第二届岸信介内阁成立。</p> <p>王子造纸工会无限期罢工（12月结束罢工）。</p> <p>藤山外相和杜勒斯国务卿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修改安全保障条约（从10月开始在东京进行谈判）。</p> <p>政府向国会提出警职法修改案（11月审议未了）。</p> <p>东京铁塔竣工。</p>	<p>3月 苏联赫鲁晓夫总书记兼任部长会议主席。</p> <p>10月 法国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于12月当选为总统）。</p>
<p>1959年 1月 (昭和 三十四 年)</p> <p>3月</p>	<p>三井矿山提出希望6000人退职的企业整顿方案。</p> <p>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发表“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演说。</p> <p>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国民会议组成。</p> <p>东京地方法院在砂川事件中违反宪法，判决美军驻扎日本。</p>	<p>1月 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取得成功。</p>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5月	签订向南越赔偿的协定(1960年1月生效)。	9月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发表演说(建议4年内全部废除军备)。
6月	第五届参议院议员选举(创价学会6人全部当选)。	11月 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纲领,脱离马克思主义。
7月	最低工资法实施。	
8月	三井矿山提出希望4580人退职的第二次企业整顿方案。	
9月	伊势湾台风使中部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死亡5041人)。	
10月	西尾末广等人脱离社会党(1960年1月组成民主社会党)。	
11月	国民年金法施行。 举行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第八次统一行动,示威游行队伍约2万人进入国会大院。	
12月	三井矿山通知实行指名解雇。	
1960年 (昭和 三十五年)	1月 签订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华盛顿)。 三井三池工会将解雇通知全部退回,公司封闭三池矿,工会无限期罢工。	2月 法国在撒哈拉首次进行核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5月 政府和自民党让警队进入众议院,强行表决新安全保障条约和延长会期。	4月 南朝鲜发生“4月革命”(李承晚政权垮台)。
	6月 举行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统一行动,全学联游行队伍在国会大院内与警队发生冲突,1名女学生死亡。社会党顾问河上丈太郎被右翼刺伤。政府决定要求艾森豪威尔推迟访日的时间。 新安全保障条约“自行通过”。 促进贸易外汇自由化内阁会议通过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	5月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立。 苏联击落美国U2侦察机。 巴黎首脑会谈破裂。
	7月 岸信介首相被右翼刺伤。岸信介内阁总辞职。池田勇人内阁(第一届)成立。	7月 比属刚果在独立的同时发生动乱(1961年2月卢蒙巴总理遭杀害)。 八十一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OEEC改组为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0月 11月 12月	社会党浅沼委员长被右翼青年刺杀。 三池劳资纠纷在中劳委的斡旋下得到解决。 第十二届大选。 第二届池田内阁成立。 内阁会议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组织)。 南越组成民族解放阵线。
1961年 2月 (昭和 三十六 年) 6月 7月 8月 10月 11月	右翼青年杀伤中央公论社社长家的两名成员。 农业基本法公布。 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纲领(结构改革派脱离共产党)。 大阪和釜崎2000人暴动。 参众两院通过停止核试验的决议。 第一次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箱根)。	1月 美国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 5月 南朝鲜发生军事政变, 成立军人内阁。
1962年 1月 (昭和 三十七 年) 7月 10月 11月	签订偿还美国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经济复兴基金的协定。 第六届参议院议员选举(创价学会9人全部当选)。 社会党总书记江田三郎提出“社会主义新展望”, 主张结构改革路线。 内阁会议通过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高崎达之助和廖承志在“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上签字(LT贸易开始)。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批评“江田展望”的决议。	10月 中国和印度发生边境冲突。 美国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 苏联撤走导弹基地, 危机消除(古巴危机)。
1963年 2月 (昭和 三十八 年)	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1条国过渡。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3月	北九州市(2月份由5个市合并组成)产生革新市长。	7月 肯尼迪总统发表国际收支咨文(优先购买美国产品政策等)。
4月	在统一地方选举中,产生了福岡的革新知事和横滨的革新市长。	8月 停止在大气层内、宇宙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美英苏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并要求其他国家参加)。
7月	内阁会议指定13个新产业都市(水岛等)和6个工业整备特别地区(鹿儿岛等)。 肯尼迪咨文发表,股票价格暴跌。 中小企业基本法公布。	10月 朴正熙就任南朝鲜总统。
8月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分裂。 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11月 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
11月	三池三川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458人,大多数人一氧化碳中毒)。 第三十届大选。	
12月	第三届池田内阁成立。	
1964年 (昭和 三十九 年)	4月 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8条国过渡。 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5月 参众两院承认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共产党的志贺义雄等人因投赞成票被开除出党)。 6月 三菱系统的三家重工业公司合并。 10月 东海道新干线正式运营。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举行。 11月 池田首相因病辞职。佐藤荣作内阁(第一届)成立。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组成。 公明党成立。	1月 法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8月 北部湾事件(美国开始对越南实行全面军事介入)。 10月 赫鲁晓夫被免职(柯西金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就任总书记)。
1965年 (昭和 四十年)	3月 山阳特殊制钢公司申请适用公司更生法。	2月 美军开始轰炸北越。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5月	日本银行为救济山一证券向其提供特别贷款。	9月 印度尼西亚发生“九三〇事件”(从9月底到10月共产党被大批杀害)。
6月	签订日本南朝鲜基本条约和渔业请求权等4项协定(12月生效)。	
7月	第七届参议院议员选举。	
8月	佐藤首相访问冲绳,发表“冲绳不回归祖国,日本的战后状态就没有结束”的讲话。	
11月	内阁会议决定发行赤字国债。	
1966年 (昭和 四十一年)	2月 全日空波音747飞机在东京湾坠毁。	7月 法国正式脱离北约组织联合部队。
	3月 加拿大客机猛撞羽田机场的防波堤。英国客机在富士山附近的上空断裂。	8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7月 内阁会议决定将成田作为新东京国际机场的建设地。	12月 联邦德国成立联合政权(社会民主党参加政权)。
	8月 日产汽车与王子汽车两公司合并。	
	11月 全日空的YS11型飞机在松山机场坠落。	
	12月 众议院“黑雾解散”(连续发生数起渎职案件)。	
1967年 (昭和 四十二年)	1月 第三十一届大选。 新宿站西口广场建成。	5月 主要国家在肯尼迪回合中签字(一揽子降低关税谈判)。
	2月 第二届佐藤内阁成立。	8月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组成。
	4月 在统一地方选举中,美浓部亮吉当选东京都知事。	
	6月 内阁会议决定资本交易自由化基本方针。 佐藤首相访问南朝鲜(参加朴正熙就任总统仪式)。	10月 华盛顿10万人举行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
8月	公害对策基本法公布。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0月	阻止佐藤首相访问东南亚的学生与警队发生冲突, 1名学生死亡。	
11月	阻止佐藤首相访美的学生与警队发生冲突。	
1968年 (昭和 四十三 年)	1月 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驶入佐世保港。 2月 东京大学医学部处分学生(东大纠纷的发端)。 4月 签订归还小笠原群岛的协定。 5月 厚生省认为富山县的疼痛病是三井金属神冈矿业所引起的公害病。 7月 第八届参议院议员选举。 9月 厚生省断定水俣病的起因是新日本氮素工厂, 科学技术厅发表报告认为新潟水俣病的起因是昭和电工鹿赖工厂。 日大会长与1万名学生进行集体交涉。 10月 北九州市就大米渗油中毒事件责令卡奈米仓库炼油部停止营业。 11月 在野党代表候选人屋良朝苗在琉球政府主席的公开选举中当选。	1月 约翰逊总统发表保卫美元特别咨文。 5月 巴黎学生斗争激化。就越南和平问题开始举行巴黎会谈。 8月 苏联东欧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镇压改革派。 11月 尼克松当选总统。
1969年 (昭和 四十四 年)	1月 东京大学为解除安田讲堂的封锁引入警队, 入学考试停止。 3月 八幡和富士制铁所签订合并协议。自卫队的半自动防空警戒体系启动。 5月 决定设立大米自由流通制度(8月实施)。 东名和各神高速公路全线开通。 内阁会议决定新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月 就越南和平问题扩大巴黎会谈。 7月 美国阿波罗 II 号首次载人登月。 8月 法国法郎贬值11.1%。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6月	运输省发表对有缺陷汽车的综合对策。	9月 联邦德国马克转向浮动汇率制(10月马克升值9.29%，恢复固定汇率制)。
11月	佐藤、尼克松会谈，一致同意归还冲绳。	
12月	第三十二届大选(第一次在年底进行选举，社会党大败)。	
1970年 (昭和 四十五 年)	1月 第三届佐藤内阁成立。 内阁会议决定扩大对汽车排气的限制。	8月 苏联和联邦德国签订互不使用武力等条约。
	3月 万国博览会在大阪举行(9月闭幕)。 新日本制铁所成立。	9月 在智利总统选举中，左派统一联盟的阿连德当选为总统。
	6月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动延长。	
	7月 东京地方法院判决审定教课书违背宪法。	
	8月 东京都设立光化学烟雾警报发令体制。	
	9月 厚生省因怀疑斯蒙病通知停止使用和 销售奎诺仿。	
	11月 冲绳首次参加国家政治选举。	
1971年 (昭和 四十六 年)	3月 第一银行和日本劝业银行签订合并协议。	7月 尼克松发表访问中国计划(1972年2月实现)。
	4月 在统一地方选举中，美浓部再次当选为东京都知事，黑田一当选为大阪府知事。	8月 尼克松总统发表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等保护美元的政策(货币危机)。
	6月 经济阁僚会议为避免日元升值，决定8项综合对外经济政策。 签订归还冲绳协定。	12月 主要国家在华盛顿的史密索尼安博物馆举行会议，一致同意调整货币汇率(恢复固定汇率制)。
	7月 环境厅成立。	
	8月 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日元转向浮动汇率制。	
	12月 警视厅警务部部长住宅炸弹爆炸(夫人被炸死)。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史密索尼安会议同意实行 1 美元兑换 308 日元的新固定汇率制。 新宿伊势丹前的交通派出所发生圣诞树炸弹爆炸。	
1972年 1月 (昭和 四十七年)	日美签订纤维协定。	5月 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发生日本游击队的滥射事件。
2月	联合赤军浅间山庄事件。	6月 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
5月	冲绳实现归还。	10月 美苏两国批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SALT)。
6月	通产相田中角荣出版《日本列岛改造论》。	
7月	佐藤首相引退。田中角荣内阁(第一届)成立。 四日市气喘诉讼案第一审判决原告胜诉。	
9月	田中首相访问中国, 签订日中共同声明。	
12月	第三十三届大选。第二届田中内阁成立。	
1973年 2月 (昭和 四十八年)	史密索尼安体制崩溃。日元再次转向浮动汇率制。	1月 在巴黎签订越南和平协定。
3月	水俣病第一次诉讼案第一审判决原告胜诉。	9月 智利发生军事政变。
8月	金大中事件。	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爆发。
11月	石油危机引起的“物资匮乏”骚动。	
12月	三木武夫特使遍访阿拉伯各国。	
1974年 1月 (昭和 四十九年)	田中首相访问东南亚五国(曼谷和雅加达举行反日游行)。	8月 尼克松总统辞职(水门事件)。
6月	国土厅成立。	
7月	第十届参议院议员选举(保守派和革新派意见接近, 批评“金权选举”)。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8月	三菱重工业总公司炸弹爆炸事件(8名行人死亡, 385人重轻伤)。当时相继发生企业遭炸弹爆炸事件。	
10月	《文艺春秋》刊载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田中的财源和人事关系”。	
12月	三木武夫内阁成立。	
1975年 3月 (昭和 五十 年)	东海道、山阳新干线到博多的新线开通。	4月 西贡陷落(解放力量统一越南全土)。
4月	在统一地方选举中, 东京的美浓部第三次当选, 大阪的黑田再次当选, 长洲一二当选为神奈川县知事。	7月 全欧安全保障合作首脑会议举行(8月发表赫尔辛基宣言)。
6月	众议院通过禁止垄断法修正案(参议院审议未了)。	11月 朗布依埃会议召开(第一次发达国家首脑会议)。
7月	国际海洋博览会在冲绳召开。	
9月	天皇、皇后访问美国。	
11月	公劳协举行192小时的“争取罢工权罢工”。	
1976年 2月 (昭和 五十一 年)	洛克希德事件在美国参院公开化。在野党开始在国会上追究。三木首相答应查明事件真相。	9月 在瑞典的大选中, 社民党失败(44年的社民党政权结束)。
6月	河野洋平等6名众议院议员脱离自民党, 组成新自由俱乐部。	10月 中国政府逮捕江青等“四人帮”。
7月	社会党江田副委员长、公明党矢野总书记和民社党佐佐木副委员长等人组织的“新日本研究会”成立(探索在野党的重新整编)。 东京地方检察院因洛克希德事件逮捕前首相田中角荣。	
8月	自民党内出现“倒三木”的活动。	
10月	内阁会议确定防卫计划大纲(防卫费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2月	第三十四届大选(任期已满选举,自民党失势)。三木内阁总辞职。福田赳夫内阁成立。	
1977年 3月 (昭和五十二年)	江田三郎脱离社会党(5月突然死去)。	6月
5月	公布领海法(12海里)和渔业水域暂定措施法(7月施行)。	西班牙举行41年来的第一次大选(民主中立联盟获得多数席位)。
6月	公布禁止垄断法修改案(12月实施)。	
11月	内阁会议决定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12月	经济对策阁僚会议决定8项减少经常项目黑字的对策。 牛场信彦对外经济相谈判对美贸易。	
1978年 4月 (昭和五十三年)	在横滨市市长选举中,由除共产党外的六党推荐的细乡道一当选。在京都府知事选举中,保守派候选人29年来首次当选。	9月
8月	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10月生效)。	戴维营的中东和平协议达成。
9月	经济对策阁僚会议决定综合经济对策(扩大内需等)。	12月
12月	大平正芳内阁(第一届)成立。	越军入侵柬埔寨。 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1979年 3月 (昭和五十四年)	全国直拨电话建成。	1月
4月	在统一地方选举中,东京的太田薰和大阪的黑田一落选。	美中建立外交关系。 伊朗发生革命(国王流亡国外)。
5月	日本电气公司推出个人计算机PC8001(9月发售)。	2月
6月	在东京举行发达国家首脑会议。	中国军队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
10月	第三十五届大选(自民党失势,出现要求大平辞职的动向)。	11月
11月	第二次大平内阁成立。	伊朗发生占领美国大使馆事件。
12月	大平首相访问中国。	12月
		苏军侵略阿富汗。

续表

年 月	日 本 大 事 件	世 界 大 事 件
1980年 5月 (昭和 6月 五十五 年) 7月	众议院通过内阁不信任案。 大平首相突然去世。 参众两院议员同时选举(自民党大 胜)。 铃木善幸内阁成立。	9月 波兰创立自主管理的 “团结”工会。 全斗焕就任南朝鲜总 统。
1981年 3月 (昭和 5月 五十六 年)	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成立。 日美两国政府在对美出口汽车自动限 制上达成协议。 铃木首相访美,同里根总统会谈(日 美同盟关系首次写入共同声明)。 回国后伊东正义外相辞职。	5月 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 12月 波兰政府宣布紧急状态 (镇压“团结”工会)。
1982年 7月 (昭和 五十七 年) 11月	因审查教科书问题中国和南朝鲜等向 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铃木内阁总辞职。中曾根 康弘 内 阁 (第一届)成立。	11月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去世。
1983年 1月 (昭和 五十八 年) 10月 12月	中曾根首相访问南朝鲜,同全斗焕会 谈。 中曾根、里根会谈。 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田中角荣在洛克希 德事件中有罪。 第三十七届大选(自民党不振,田中角 荣获得高达22万张的选票)。 第二届中曾根内阁成立(和新自由俱 乐部联合)。	9月 苏联在萨哈林上空击落 南朝鲜客机(包括28 名日本人在内的269 人死亡)。 10月 仰光炸弹爆炸事件(南 朝鲜高级官员等21人 被炸死)。